深蓝的故事

（全3册）

一线民警真实案件记录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深蓝的故事

（全3册）

一线民警真实案件记录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深蓝的故事

The Story of Shen Lan

深蓝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COPYRIGHT

书名：深蓝的故事

作者：深蓝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ISBN：9787513339629

字数：118千字

本书由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SHAREBOOKS4YOU

感谢Telegram 频道 @sharebooks4you制作，欢迎大家扫码订阅

序言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2016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网易·人间栏目的征稿启事。

思索再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下了第一篇故事，初稿干枯刻板，如同结案报告般，只有寥寥两三千字。

没想到，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诗如编辑的电话，她详细询问了我文章的有关内容，并指导我如何把故事书写完整。

又经过三天的修改，我终于磕磕绊绊地写完了我的第一篇故事。

22日傍晚时分，当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时，激动之情难以自持。

2

我祖籍山东，曾任职于湖北某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后在武汉某高校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入职之初，由于所学的专业与公安工作尚有差距，我曾以为自己会留在机关任职，做一名“朝九晚五”的制服公务员。但没想到，进入单位后，我被分配到了最为基层的岗位——派出所——成为一名基层民警。

工作辗转于小偷、失足女、瘾君子、赌徒、杀人犯之间，日复一日的是做笔录、抓捕嫌疑人和处理各类案发现场。

新鲜感过后，我开始困顿于现实。一是的确很明显地感受到一线警务工作的强度和压力，二是对自己所处理的一系列人与事产生各种不解。

不断地发现“坏人”，然后抓捕、做材料、送拘（拘留）或送看（看守所），继而又不断地有新的“坏人”出现；掀掉一个赌场或色情场所，马上就又有一个新的赌场或色情场所出现。

无论如何严防死守或者严厉打击，各种人间悲剧却并未减少太多。

如果仅仅是对于我自己的人生，这份工作的意义究竟在何处呢?

3

上班之后，我发现“和稀泥”是派出所里解决问题最常用的办法。

开始时，我单纯地以为，同事们总爱“和稀泥”是怕麻烦，后来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两个打架的人，全部拘留的办案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但进行治安调解，往往会消耗半天的时间和精力。一次，一对夫妻一周内因琐事在家打了三架，也闹到派出所三次，见不得同事们反复调解，我终于下定决心将二人全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结果二人的矛盾不但没有因受到治安处罚而化解，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在结束拘留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丈夫向妻子举起了尖刀。

事后，丈夫在询问室里说，就是那一次拘留，在他的“行为档案”上记下了浓重的一笔，更断绝了他与妻子和解的可能，他将前途尽墨归过于妻子的斤斤计较，所以痛下杀手。

做完笔录，我有些自责。

想起之前同事对我说的一句话：“依法处理其实最简单，但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却不好说，因而我们的工作本着尽可能化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的目的，做了太多不该我们做的事情。”

4

前往学校报到之前，公安局政委曾找我谈话，建议我读书期间如果时间宽裕，最好能够把之前所经历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尽可能也应该能让这些故事发挥更多的社会效应。

每一名基层民警都是一本关于生活的百科全书，经年累月地经历着各色人生悲喜。我们既是看客，又参与其中，时间一长，便能在一个故事中看到另一个故事的影子。

不一样的人生总会有些许相类似的经历，也许悲剧更具穿透力。用真实的故事惊醒现实的迷茫，也许就是警察这份职业的意义所在吧。

“公安工作的目的不应仅限于惩处一时一事的罪恶，更应负有以真实案例教化人心、宣扬正气之责任。”我时常想起政委的这句话，既是嘱托，也是命令。

5

当警察之前，印象中的公安工作，就是港片中张家辉的“放下枪，我是警察”，但当警察之后，现实中的公安工作却成了梁朝伟的“对不起，我是警察”。

一位憔悴的女子向我求助，请求我帮助她摆脱母亲无处不在的控制。我问她需要我做些什么，她求我逮捕她的母亲，我不可能满足她的要求。后来，她真的疯了。

一位做好事救人却被讹诈的商人，求我默许他对讹诈者“以牙还牙”，我明知他的委屈却不能默许，眼睁睁地看着他为自己的见义勇为付出巨额代价。

我很想对他们说“对不起”，但却说不出口，因为那时我感觉自己也同样无助。我只好把他们的故事记下来，写成《“任性”的母爱》《好人难当》两篇文章，聊以抒发心中的愤懑。

6

后来，我开始相信因果报应。

张得胜是辖区里的一名“老赖”，被人们蔑称为“二球”。他常年混迹于街头的麻将馆，靠四处耍赖、偷盗和“碰瓷”为生。

我们尝试过在法律层面上把他打击掉，但无奈想尽了办法，却动不了他丝毫。张二球凭着自己一身的痼疾和铁打的脸皮不断与我们周旋，过着赖一天是一天的生活。

张得胜善于钻法律的空子，他得意地称这是“弱者的生存方式”。

为了他，我不断地翻阅各类法条，想从中寻找能够将他绳之以法的办法，然而，在我几乎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他却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受到了惩罚。

他在“碰瓷”的过程中遇到一名比他更赖的“老赖”，张得胜转眼间变成了受害者，连本带息品尝到了被“赖”的滋味。

一名将讹诈医院当作财路的职业医闹，重病之后也被妻子当作讹诈医院的工具，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一名把孙子宠成“爷爷”的爷爷，毫无底线地包容熊孩子的一切行为，最终却被骄横的孙子推下楼梯，摔成了植物人。

一对各怀鬼胎的青年男女，妄图用自己的谎言骗来一场理想化的婚姻，最终却发现，这个世界谁都不傻，自己施害的同时也成为受害者。

……

英格索尔曾经说过，“幸福不是奖赏，而是结果；苦难不是惩罚，而是报应”。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不该妄谈“报应”，但我写下《“碰瓷”者的下场》《生也医闹，死也医闹》《要命的熊孩子》和《谁骗了谁的婚》四篇故事，只想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真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也曾有一起案件让我心怀惭愧却又无力挣扎。

2015年5月，一起恶性电信诈骗案件中，一个向诈骗集团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牟利的团伙被举报。但当我们进入这个团伙位于一个小区的窝点时，却发现对方只是一个安详的三口之家。

一瞬间，我们怀疑过情报出错，但随后调查中从他们家中电脑上查获的200G公民个人信息证实了举报的真实性。夫妻二人用各种方式获取了这些公民的隐私信息，再利用网络销售出去以获取报酬。

女主人说他们只想攒钱给即将参加工作的女儿买辆代步车，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直和民警商量能不能“少罚点款”。她不知道，在他们通过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6万元的背后，是11个家庭和单位被诈骗900余万元的滔天罪恶。

我们铐走夫妻二人的时候，他们的女儿，一名大四学生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们。我试图去劝慰女孩子，她却惊恐地关上了房门，并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几个月后，此案告破，不久却听到了女孩子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一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夫妻二人出事时正值女孩子报考公务员的当口，她已经通过了笔试、面试，却在政治审查中因直系亲属犯罪被取消资格，同样考取了公务员的男朋友也因此和她分道扬镳。

面对从22楼跳下的22岁生命，我曾一度惭愧，却又不知自己该惭愧什么。只好试着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用以告诉后来人——你的背后还有你的家庭。对于世界来说，你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对于你的亲人来说，你却是整个世界。

8

上班之后，我努力回忆从小到大看到的影视剧中的警察形象并试图模仿他们，但实际效果却不好。

第一次110出警，面对被群众当场抓获的惯偷，我像木头一样呆站着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在同事惊异的目光中憋出一句："大哥，偷东西不对……"

第一次处理自杀现场，我被上吊者因绳子突然断掉而坠落的脑袋当场吓哭……

第一次追捕偷电动车的蟊贼，我情急之中选错了交通工具，踩着环卫工的三轮车跑得自己"丢盔弃甲"……

第一次带犬巡逻，巡逻车前排的同事装容齐整，巡逻车后排的我撩拨警犬，然后和它打得鸡飞狗跳……

师父宋警官说："你一定得把你做的这些事儿都记下来。"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要拿去做典型案例，去教育以后的徒弟。

但真正决心写作，其实是从一个人开始。

那个女孩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个瘾君子。她的男友早前因吸毒被我们上了“常控”，两人投宿时触发警报，她也在之后的尿检中查出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毒）“阳性”反应。

她在我的硕士母校就读大三，深爱着她那做混混儿的帅气男友。她说自己吸毒是为了帮助男友戒毒，男友会对她不离不弃。

她哭着恳求我不要通知她的学校，她承诺自己会戒掉自己的毒瘾。

后来，我和她的父母都在全力帮她戒毒，我们想了很多方法，但不幸的是，那些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

她曾一次次发誓，一次次宣称自己戒毒成功，她的父母也一次次向我登门致谢，我一次次深感欣慰自豪。但时隔不久，她却又一次次地复吸。

终于，她放弃了自己，在2015年一个夏日的傍晚，留下一张字条后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留下了白发苍苍的父母和一个几近破碎的家庭。

她的男友依旧在吸毒，并不断更换新的女友，经常在街面上招摇过市。

一段时间，我刻意寻找那个混混儿，然后将法律赋予我的自由裁量权在治安处罚层面发挥到极致。我不奢求他能够戒毒，只希望尽可能地让他在拘留所和强制隔离戒毒所之间往返，不要再来祸害其他无辜的女孩。

但我的计划似乎并未奏效，依旧有懵懂的女孩子为他前赴后继，甚至充当他的毒资来源。

“她们傻吗？”我问同事。

“也许是没有亲身体验过‘那东西’（毒品）的危害吧。”同事说。

那是一条很难回头的路，我不能让她们去亲身体验，但可以把那些故事告诉她们，希望别人的真实故事可以震撼到她们。

9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网易·人间栏目写了接近一年的非虚构故事。

感谢网易·人间栏目的各位编辑同志，她们不但指导我提升写作技巧，同时在日常的聊天中不断激发我回忆起那些逐渐生疏的记忆，并从中寻找出好的题材。

我会继续写下去。

近段时间，几位读者朋友联系网易·人间栏目组，希望能够和我在现实中做进一步的交流，但由于工作原因，也基于保护文中人物隐私的考虑，我既不能在文章中公开我的身份，也无法在之后的公开活动中露面。

因此，只好在这里先向各位读者朋友致歉。

但请您相信，我就在您的身边，在静谧安详的小镇街头，在忙碌熙攘的城市道口，在每一个午夜时分悬挂着深蓝色灯箱的派出所值班室。

我是深蓝，200万人民警察中无比普通的一个。2017

年10月27日 深蓝

报告阿sir，

杀人犯想做刑侦特情

1

2012年5月，我还是河西社区的一名社区民警。一天午后，街道办事处的老张领着一名年轻人来派出所找我。

“这是小忠，5月初刑满释放，需要办理入户登记和重点人口登记。”

我打量了一下小忠，他浓眉大眼，长相颇为周正，一眼看去，很难把他和罪犯联系在一起。

“个人基本情况说一下。”

“报告警官，我叫马×忠，现年31岁，本市人，1997年因故意杀人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在沙洋服刑，今年5月减刑出狱，现来找警官报到。”小忠立正站好，一字一句地报告。

我准备处理老张递来的材料，发现小忠还笔直地站着，便打发他去对面的照相馆拍几张登记照。

小忠离开后，我打趣：“张科长，你一驾临我就知道没啥好事儿，我这个社区本来就忙，你还给我添麻烦。”

老张略带委屈地说：“这政策上的事儿，哪是我说了算的。小忠入狱前户口就是咱这儿的，不然，你以为我想要啊。”

我苦笑着点点头。“他当年犯的啥事儿你清楚不？”

“听说他把他后爹砍死了，不过话说回来，那姓覃的也是活该，一搞粉子（海洛因）嗨起来就像疯了一样，打砸抢是常有的事儿，四邻八舍都怕得要命，更何况小忠母子俩了。”

“你是不知道啊，当年他和他妈经常被姓覃的打得不敢回家，而且姓覃的只要被派出所处理，就认为是小忠和他妈举报的，回家之后他们肯定逃不了一顿暴打。后来小忠实在忍不了了，就把姓覃的给砍死了。”

听老张这么说，我心里泛起了些许同情。“那他这是身不由己，也算为民除害了吧。”

老张“嘿嘿”两声，没回答。

2

小忠入狱的第八年，他母亲在一场交通事故中离世，给他留下了22万元的赔偿款。

出狱后，小忠拿出3万元给母亲重修墓地，打算用剩下的钱开家餐馆。为了方便管控，我要求他把餐馆开在河西社区内，并帮他找到了合适的房源。

为了表示感谢，开业那天，小忠要请我吃饭。刚开始他有些腼腆，酒过三巡后气氛转暖，我借机问起他当年的事。

“我幼年丧父，母亲带着我改嫁，继父是个木匠。他是个不错的继父，除了供我上学，还在市里买了套新房子。”

然而，1994年小忠的继父因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他先是吸光了积蓄，后又卖了房子，再到后来，整个人变得神志不清，经常暴打小忠和他妈妈。

1997年，小忠的继父吸毒后将妻子捆在椅子上殴打，看到母亲满脸鲜血，奄奄一息，小忠捡起斧头向继父砍去……

“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恨他吗？”我问。

“我已经把他宰了，自己也在局子（监狱）里蹲了15年，是人这辈子最宝贵的15年。现在想开了，也就没有什么恨可言了。”小忠点了一根烟，面色沉重。“我恨的是那些引他吸毒，卖他毒品的人。我们全家都被他们毁了！”

“警官，你猜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没等我接话，小忠开始自言自语，“说来你可能不信，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警察。”

他笑得有些伤感。“出事那年我刚上高二，想考警院，可现在我却成了警察管控的重点人员。”小忠抬起头，眼圈发红。

3

种类繁多的检查给了我们交流的机会，休息的时候，我也常到他店里坐坐。慢慢地，小忠对我的称呼由“警官”变成了“阿sir”。

一次，小忠讲起了他在监狱里的往事，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人，就问他：“陈狗子你认识不？”

“哪个陈狗子？”

“后湖的，一米六多，五十来岁，2006年因为强奸罪在沙洋蹲了五年。”

陈狗子和一起毒品案件有关，此前一直被禁毒支队的特情跟着，但在收网之际，他却突然消失了。领导要求我们发动一切资源找他。

小忠点头。“以前，陈狗子和我关在同一个‘号子’里，我还是他的‘领导’呢。”

“现在和他有联系吗？”我赶紧追问。

“他早我大半年出狱，犯‘花案’（性侵害案件）进去的，没人看得起他，一出来也就断了联系。”

“你要找他？”小忠试探着，“那我帮你问问？阿sir，具体啥事儿能透露一下不？”

“贩毒，”我盯着小忠，“这事儿注意保密。”

三天后，我正在所里办公，突然收到小忠的短信，只有八个字：狗在刘湾三组一号。

电话打过去，对方拒接。我赶紧向领导汇报，二十分钟后，我们荷枪实弹冲进刘湾三组一号，小忠正陪着陈狗子聊得热火朝天。为了保护小忠，民警也作势把他按倒在地。

4

毒品案告破的那天，我邀小忠来我家喝酒。席间，我问他是如何找到陈狗子的，小忠冲我狡黠一笑。“阿sir啊，你应该知道的，像我这种有前科的人，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只有两种人愿意和我们打交道。”

“警察和坏人呗，”我哈哈一笑，“不过你也得注意，如果狱友出来不走正道，你还是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放心，我心里有数，局子里的环境比现在复杂多了，我不也顺顺当当过来了嘛。”

席毕，我去厨房收拾碗筷，出来刚好撞见小忠穿着我的警服在自拍。这违反了相关规定，我厉声让他把照片删掉。

小忠失落地删照片，我不知该如何宽慰他，只好打哈哈：“以后你想穿警服过把瘾，可以随时来家里，但进门前要先把手机上交哈。”

小忠抿嘴一笑。

他临走时，我拿出公安局批的特情经费和破案奖金。“2000块钱不多，你开饭店也没啥生意，拿去补贴一下生活。”

小忠坚决不要，我以为他是客气，小忠却掩上房门说：“阿sir，其实发现陈狗子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远处给你打个电话就行，根本没必要冒险进他屋里。你知道我为啥要进去吗？”

“为啥？”

“我就想亲眼看着这帮贩毒的王八蛋被警察抓走！”

5

陈狗子被绳之以法后，小忠对提供犯罪线索这件事就越发上心了。

在搜集信息这方面，他的确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身份是“两劳”（劳动改造人员和劳动教养人员）释放人员，辖区里的不法人员对他少有防备；开了一家小饭馆，常有本地的狱友来蹭吃蹭喝，聊天中总能漏出点小道消息。

小忠把一些他感觉有分量的消息整理好交给我，我有需要的时候，就按照他给的线索去抓人，基本不会扑空。但我也担心小忠的安全，就劝他少和那些人打交道。

小忠总说不要紧，他爱看《无间道》，经常对我说：“我就是陈永仁。”

“别，陈永仁最后挂了，你别学他，还是好生活着吧。”

2013年年底，我调往市局刑侦支队任职。临走前，我来到饭店跟小忠告别。聊了一会儿，我准备告辞，小忠却突然拉住我，“阿sir，想求你件事儿。”

“啥事儿？”

“你现在调去刑警队了，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当个正式的刑侦特情？”

“你港片看多了吧，内地的特情人员比不了香港的线人，那点特情费还不够你喝几顿酒的呢。想赚钱，好好开你的饭店去。”

“我不要特情费。”小忠急忙解释。

其实，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最后却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职业特情不是警察，除了人身安全缺乏保障外，他们还会受环境的影响——一旦没有把持住，很容易沦为犯罪分子的同伙。

如今，小忠已经走上了正途，开启了新的人生，我不愿让他再涉险了。

6

2014年10月，我参与了一起部督（公安部亲自监督、必须侦破的案件）毒品案件的侦破工作。有情报反映，嫌疑人老猫刚从边境进了一批“货”，准备转手。

老猫是个老毒枭，他曾三次被抓，都因证据不足逃脱法网。他为人狡猾，从不把货放在身边，一旦感觉到风险，就会毁货自保。

上级要求我们这次行动要“打准、打狠、打死”，除掉这个危害江汉平原十几年的“毒瘤”。但老猫行踪诡秘，为人多疑，一般的特情员跟不上他，所以他的藏毒点仍旧未知。

这起案子让我焦头烂额。那天，小忠约我晚上一起喝酒，我本想推辞，可他说自己谈了女朋友，打算结婚。“想给你介绍一下，帮我把把关。”

小忠的未婚妻是个湖南姑娘，离过婚，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晚饭时我跟小忠开玩笑："祝贺啊，你这一步到位，老婆孩子全有了。"

因为心里挂着案子，喝酒的时候我一直走神，小忠见状，对未婚妻说："你去客厅看会儿电视，我和阿sir有点事儿要说。"

"你有啥事儿？"姑娘走后，我问小忠。

"你有啥事儿？"

"我没事儿啊。"

"别装了，吃顿饭都魂不守舍，我女朋友的名字跟你说了三次，你都记不住。"小忠把脑袋伸过来，神秘地说，"是为了老猫吧。"

我心中猛的一震，立即警觉地盯着小忠，但随即意识到这样做无疑是肯定了他的猜测，急忙收回目光，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次行动关系重大，上级要求绝对保密，一旦泄露，我们的侦查工作就要功亏一篑。我当时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

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客厅那边传来了电视剧的声音。

"他把毒品藏在白×乡。"小忠率先打破了沉默。

白×乡尚在我们的侦查范围之内，我抬起头看着小忠，心中一团乱麻。

"相信我，阿sir，我要做陈永仁。"小忠坚定地说。

眼看瞒不住，我心一横。"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但如果消息出了这间屋，咱俩就一起玩儿完。"小忠说，消息是一个名叫阳阳的混子前天在店里喝醉了走漏给他的。2013年年底，毒枭老猫欠了阳阳的大

哥阿东二十几万元赌债，躲了起来。一周前，阿东在沙市找到了老猫，逼他还钱。老猫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就说出自己刚进了一批货，出手后会立刻还钱。可阿东担心老猫忽悠他，就逼老猫带他们去看货。

刚开始老猫不肯，最后实在是怕被人打死，就带他们去了白×乡汉江边的一处浅滩。

“好家伙，那老猫从地下挖出来整整一麻袋‘果子’（毒品麻古）！”醉醺醺的阳阳跟小忠感叹。

小忠劝我赶紧抓人。我摇摇头。“一来，你没有亲眼看到那些毒品埋在哪里，稍不留意惊了老猫，这起案子就办不下去了；二来，我们这次不但要扫货，还要‘搞人’，必须在老猫出货的现场抓他。”

“好的，我知道怎么做了。”小忠淡淡地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劝他到此为止，不要掺和进来。“你能提供线索已经很不错了，一旦查实，我肯定给你报功。但老猫这次是冲着‘要么发财、要么发丧’来的，你快结婚了，好日子等着你呢，何必跟亡命之徒以命相搏。”

小忠笑了笑。“我就想和他玩玩命，看究竟谁的命硬。”

我依旧不同意，但小忠说不管我同不同意，他都要掺和。“要是你不答应，我就去找其他民警。”

就这样，小忠卷入了一场本不属于他的战争。

7

我立即向领导汇报。因为小忠曾在陈狗子一案中有贡献，所以领导暂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而是指示我：“要看好、用好、保护好特情员

小忠。”

第二天，小忠便去投奔阳阳的大哥阿东，声称要跟着东哥发财。因为小忠背着杀父的狠名声，阿东收下了他。

一段时间后，小忠主动要求去帮阿东追债。“想做点业绩，好提升在兄弟们当中的地位。”正好马仔们盯烦了老猫，阿东便答应了。

就这样，小忠来到了老猫身边，与他同吃同住，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老猫的行踪源源不断地从小忠那边传来。从老猫和什么人见面，去哪里嫖了娼，到他生了什么病、吃了什么药……事无巨细，小忠都用短信汇报。一份发给阿东，一份发给我。

有时老猫质问小忠给谁发信息，小忠就把手机扔过去，黑脸骂：“你个老东西，老子给东哥发短信汇报你的表现。东哥说再不还钱，就把你扔到汉江里喂鱼！”

“你们整天跟着我，我怎么还钱？”

“我管你怎么还钱，反正春节前还不了钱，你就死到汉江里去吧！”

2015年春节，是老猫的最后还钱期限。1月中旬，他终于决定冒险出货。几个月来，阿东步步紧逼让老猫乱了方寸，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谨小慎微，而是选择了拿钱速度最快，风险最大的交易方式——现场钱货两清。

小忠把他们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发给我。收到短信的当晚，整个专案组都处于巨大的兴奋之中，省厅的一位领导甚至当场表示：“破案之后，我要以个人名义给小忠发一万元奖金。”

阿东派小忠全程监督老猫交易，防止他携款逃跑。而狡猾的老猫把交易时间定在白天，因为埋毒地点处在汉江浅滩，周围没什么遮蔽物，

公安机关无法设伏。

好在有小忠提供的信息，专案组决定使用无人机跟拍交易过程，还从武汉调来了两台改装过的“大疆精灵”。技术部门也提前赶往交易地点安装了密录设备。

万事俱备，只等第二天老猫和买家现身。

8

我们抓捕老猫的过程十分顺利。当老猫被按倒在地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地叫嚣：“警察打人了！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这是滥用职权，我要去告你们！”

我们现场展示了无人机拍摄的高清交易画面，画面显示，老猫似乎想让小忠去挖毒品，但被小忠踢了一脚，老猫只好亲自把麻袋从地里挖了出来。

“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问老猫。

“我不知道，这能证明什么？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不信你们来搜，搜啊！”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在距离我们几百米远的汉江大桥停车场设伏，抓捕对象是前来提货的甘肃毒贩。原计划是在毒贩携带毒品进入停车场后将其制服。

我们焦急地等待对讲机里的消息，却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爆炸声，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开阔的汉江滩涂没有遮蔽物，声音直接震着我们的耳膜。

“不好，那边响枪了。快去增援！”带队领导一声令下，除了四人留下看守老猫，其他人全向枪声传来的方向奔去。

我跑在最前面，冲锋枪坠得我后脖颈生疼。枪声已经沉寂，只听见对讲机中同事在喊："有人受伤。"我心中很不安，因为小忠跟着甘肃毒贩去收款，一旦我们行动曝光，他面临的危险最大。

当我们赶到大桥停车场时，甘肃毒贩已被制服，公路边有一摊血，弹壳散落在地上。

我扫了一眼人群，没发现小忠，急忙大呼他的名字，却没人回应我。现场的同事说："他中枪了，已经被送往医院。"

同事说，本来一切顺利，设伏民警在停车场内张开大网，只等毒贩走进去。然而就在毒贩要踏进停车场大门的时候，一个女人突然出现了，她对着收费亭里化装成工作人员的民警大喊："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在我的收费亭里？"

这一声大喊在安静的停车场如同惊雷，警觉的毒贩立即意识到收费亭有问题。他收住了脚步，而那个女人还在不依不饶地质问收费亭里的民警。

指挥长看事态有变，命令提前行动。收费亭里的民警离毒贩最近，他立刻冲了出来，但那名毒贩突然从怀中掏出了手枪，千钧一发之际，毒贩身旁的小忠猛地扑上去抢枪……

争抢中，毒贩开了两枪。第一枪打在小忠的腹部，第二枪打在小忠的胸部，民警赶来开了第三枪，击中了毒贩的肩膀，随即将其制服。

"那个女收费员本来说今天请假不来了，保密起见，我们就没跟她交代。结果中午她突然来岗亭里拿东西，外围同事来不及阻拦，她已经骑着电动车冲到了收费亭前面。还好没伤到她，小忠是好样的。"同事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我立刻赶往市医院，一路上不停地祷告："小忠，你千万别做陈永仁。"

然而，一切都晚了，手术室的医生出来说："我们尽力了，一枪打在肝上，另一枪正中心脏……"

护士们在收拾抢救器械，小忠就静静地躺在床上。我哭着喊他的名字，他不答应，护士把我拉开，我愤怒挣脱，要去找毒贩和那个没眼力见儿的泼妇算账。

同事把我摁在椅子上。"做我们这行的，要随时准备着。"

我气急败坏地吼道："小忠不是警察，他没有这个义务！"

9

小忠的追悼会上，湖南姑娘来了，社区干部来了，派出所和专案组的民警来了，小忠的一些狱友也来了。

在告别大厅里，我和同事们一同举起右手，向小忠敬礼。那一刻，他不再是一名"两劳"释放人员，不再是派出所重点人口，是我们的战友、兄弟。

湖南姑娘为小忠守灵一个月，她临走前把小忠的10万元存款交给我。"我和小忠还没来得及登记结婚，不能继承他的遗产。"

我说："你收着吧，小忠除你之外，没有别的亲人。用这笔钱好好抚养孩子。"

由于证据充足，三个月后，老猫和甘肃籍毒贩被送去了该去的地方。阿东一伙也被依法惩处。为害江汉平原十几年的毒瘤被连根拔起。

2015年5月，在各方推动下，我市拟将小忠饭店建设成为"回归人员再就业基地"。小忠的事迹也要被记录下来。

整理遗物时，我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个隐藏文件夹，里面只有一张名为"马sir"的图片。我好奇地打开，发现是一张自拍。

照片上的小忠，身着警服，露出淡淡的微笑。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相信我，阿sir，我是陈永仁。”

“任性”的母爱

1

2015年1月的一个凌晨，我被指挥中心转来的电话惊醒，一个女人报警称自己遭受家暴。

到达现场，一个30岁出头的女人正站在楼下。寒冬腊月里，她只披了一件薄薄的棉衣，光脚穿着一双布拖鞋。

“是你报的警吗？”我问。

女人点点头，带我们上楼。来到家门前，我示意她敲门，她却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我，于是我就上前敲了两下。

“日你先人个板板……你还敢回来？”一个男人拎着擀面杖开了门，见是警察，连忙扔掉擀面杖，转眼间就挤出个笑脸。“哎呀警官啊，没事儿，我们闹着玩呢，没事儿……”

“大半夜玩擀面杖啊？”同事说。男人似笑非笑地“嘿嘿”两声，把我们让进了屋。

这是一起由家庭琐事引发的治安案件，因为事实明了，双方又是夫妻，我们打算做现场调解处理。

报警的女人名叫小璐，被打的原因是她丈夫单位有个公派出省的机会，一去半年，酬劳很高，小璐劝丈夫前往，但丈夫不同意，双方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之后丈夫动了手。

“他说，我让他出去上班，就是为了支走他，好在家里偷人……”小璐边哭边说。

“你让我出去，不就是想在家里偷人？”小璐的丈夫不依不饶。

“偷不偷人，警察不管，再敢动手打人就抓你！”我们连吓唬带说和，最后双方表示愿意调解。

只是，小璐的丈夫在调解书上签字时，小声嘀咕了一句：“妈的，这年头，打老婆警察也要管。”所以在回派出所的路上，同事说：“我觉得，他家这事儿没完。”

2015年元宵节，早上8点，110指挥中心转警：“赶紧来，辖区里有人开天然气自杀。”

消防大队早一步赶到了，全楼住户被紧急疏散到楼下，这正是小璐的家。

楼道里弥漫着天然气的味道，房门紧紧反锁着，消防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门撬开。进屋后，我发现小璐躺在卧室的床上，已经陷入昏迷……

好在发现及时，经过一天的抢救，她终于醒了。因为开天然气自杀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小璐情况好转后，我到医院给她做询问笔录。

一个月之内两次报警，又开天然气自杀，做完笔录，我觉得有必要和她聊几句。小璐犹豫了一下说：“警官，我的事情有点啰唆。”

2

1985年，小璐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外公曾是市里的领导，母亲也在单位担任领导职务。

“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木偶戏，从小，我就生活在我妈的阴影里……”

从她记事开始，她的生活从吃饭穿衣，到升学择业，事无巨细全由母亲做主。实在想自己做决定，母亲却总将她的这种想法定义为“不

孝”“忤逆”。

“爸爸是上门女婿，又是沾了姥爷的光在单位提的干部，所以在家里，从来不敢对妈妈的决定说半个‘不’字。”

小璐高考报志愿时，母亲指示她就近填报一所高校的油气专业。“学校好坏无所谓，离家近点儿就行，反正回来工作的事情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小璐思量再三，最终背着母亲填报了一所西安的名校，专业也没按母亲的要求选择“油气”，而是选了自己喜欢的艺术设计。

为此，她母亲大动肝火。“你反了天了，不听话就回来复读，想出去？门儿都没有！”

父亲为小璐说了两句话，立刻就被赶出了家门，在单位睡了两天。

虽然在亲戚和老师的劝说下，母亲最后勉强同意小璐外出求学，但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在校期间，小璐每晚要准时与母亲视频；随时汇报自己的行踪，除此之外，还要接受母亲不定时的“突查”。

“你妈也是怕你一个女孩在外上学不安全，这个可以理解啊。”我插话。

“我理解，但很难接受。”小璐说，“四年大学，我妈去学校突查了200多次，除去寒暑假，平均一周一次，如果不是身负公职，她肯定会去西安陪读。那四年，我虽然人在西安，但从来没有感受过自由。”

即便是在学校，小璐的一举一动依然在母亲的掌控之下。

“她什么都管，每次来学校，先要检查我的手机，里面既不能出现和学习无关的事，更不能是空白。每月，她都要去营业厅调取我的通话

记录，联系稍频繁的电话，她就要去核实对方的身份。甚至连我投票选班长，她都要过问。”

小璐毕业后，她的专业课老师邀请她和几个同学在自己开办的工作室实习。小璐母亲强烈反对，命令小璐马上拿着“三方协议”回家。

那段时间，小璐母亲正忙于竞争单位的二把手，自顾不暇，小璐这才得以在老师的工作室里工作了半年。

半年后，小璐的母亲晋升失败，便重新将注意力转回到小璐身上。小璐的设计生涯被迫宣告结束，带着满心的不情愿回了老家。之后，便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母亲所在的单位，接受“双重领导”。

“那时候，我对工作和事业已经死心了，我想，我这辈子再也逃不出我妈的手掌心了。我曾和她闹过一次，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最后我妈说，她做这一切都是为我好，等我结婚了，她就不管我了。那时我真信了，所以就开始盼着结婚。”

3

虽然大学四年一直生活在母亲的“严防死守”之下，但青春靓丽的小璐依然吸引了不少追求者，同学小陈便是其中之一。

小陈是武汉人，算是半个老乡，毕业后他们一同进入老师的工作室实习。其间，暂获自由的小璐和这位俊朗、勤奋又执着的男孩相爱了。

小璐被迫回家后，小陈也紧随其后回到武汉工作，两人继续秘密交往着。

小陈的父亲是武汉的局级干部，母亲是中学高级教师。按理说，出身于“干部世家”的小璐母亲应当会满意这门亲事。然而，当她得知小璐恋爱的消息时却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要求小璐马上分手。

我大惑不解，小璐看看我说："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爸爸告诉我，妈妈反对这场恋爱的原因不是对方配不上我，而是她已经给我安排好了终身大事。她说，结婚这事，我不能自作主张。"

"然后呢？给你安排了现任丈夫？"

"对。"

小璐的公婆是母亲多年的同事，她公公还曾是母亲的下属，对她俯首帖耳很多年。按照小璐母亲的想法，女儿嫁入这样的家庭，无疑是"大权在握"，可以像自己一样，在家呼风唤雨一辈子。

小璐却从未向往过这样的生活，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男方当年为了赶上单位子弟"退伍包分配"的末班车，初中毕业便匆匆入伍。参加工作后，在本地也是出了名的桀骜不驯。

为此，小璐和母亲争辩过，但母亲总是以她父亲举例，"学历低怎么了？学历低的人花花肠子少，你爸当年连工作都没有，现在不也过得很好。只要女人有本事做得了主，一点问题都没有！"

小璐拒绝接受母亲安排的婚姻，母亲认为，这是因为小璐还妄想和小陈在一起。于是她直接找到了小陈父亲的单位，一番无理吵闹后，小陈的父亲大怒，责令儿子"立刻与这家人撇清关系"。

小陈舍不得小璐，想上门把事情说开，没想到小璐母亲竟然直接从单位叫来保安，把他"护送"上了返回武汉的列车。

就这样，小璐反抗到2011年，再次妥协，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4

新婚，一切还算平静。2012年，他们的宝宝出生。2013年，小璐母亲退居二线，交权之前，她想仿效自己父亲当年的做法，把小璐的丈夫

扶上基层领导的岗位。

可是，时代风云已变，几轮民主评议下来，小璐的丈夫没能走上他梦寐以求的科长位置。小璐的噩梦，也由此开始。

婆家对小璐母亲在最后关头没能有效运作，感到十分不满。小璐的丈夫早就在单位以科长自居，竞选失败的羞愤让他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了小璐身上。

先是冷战，之后他不知怎么得知小璐有一个前男友，便经常出言挑衅："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二手货！"最后，直接发展成了肢体攻击。

"你母亲知道这些事吗？"我问她。

"知道，我第一次被打后，就跟我妈说要离婚，但她反对。"

"为什么？"

"她始终认为她掌控了全局，我的家庭结构她很满意。另外，她觉得是我故意和丈夫闹矛盾，想离婚去跟小陈过，她不能接受。"

2014年，小璐单位的效益大幅滑坡，职工收入也随之下降，她丈夫的脾气更加阴晴不定了，什么事都会怪罪到小璐头上。"如果当初我能当上科长，年底还有'兑现奖'，手头也不会这么紧张。"

2015年年初，单位有高薪外派的工作机会，小璐劝丈夫报名，想不到却引发了他强烈的不满和猜疑。小璐直接被打出了家门。

也就是那次被打后，小璐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离婚。

元宵节的前一天，小璐回家和母亲商量，没想到母亲的火气比她还大。她把一切不顺都归罪于小璐"不肯听话"。

“如果当初不是你执意要去西安读书，我就不用每周请假去西安。如果不是屡次请假，我必然会给上级留下好印象，那四年前的提拔，我肯定能成功。如果当上了二把手，我就可以在退居二线前把你丈夫推上基层领导岗位，他们一家人会感恩戴德，那现在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另外，她还说：“如果不是你背着我去谈什么朋友，现在，也不会给你丈夫留下话柄。”

小璐被家暴，本想回娘家得到支持，结束这场失败的婚姻，可母亲的一番话，却让她感觉人生失去了所有继续下去的动力。回到家中，她打开了天然气阀门……

“警官，我真的好想脱离现在的生活，再这样下去，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小璐哭了。

作为警察，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执法范围，但作为普通人，我还是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这样吧，我有个同学在杭州开了一家青年旅社，等事情处理完了，如果你有意向的话，我给你打个招呼，你去那边散散心。”

5

十几天后，事情处理完毕，小璐跟单位请了假，踏上了前往杭州的列车。本来，小璐的母亲要陪同前往，甚至还规划好了行程路线，被小璐断然拒绝。

母亲不高兴，但女儿的现状在那里摆着，这关口，她也不敢强求。

转交小璐案件的家属回执材料时，我和小璐的母亲进行了一次交流。

小璐的母亲是一个相当强势的女人，即便已经退休，那副处级干部的气势仍在。她不止一次强调：“多年来，我一直把单位和家庭管理得

井井有条。在我的有序安排下，单位获得了多少荣誉，家庭避免了多少危机啊。”

我问她：“安排有序，你女儿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故呢？”

小璐的母亲脱口而出：“谁让她不听我的安排！”

路过的同事听不下去了，冒出一句：“你安排，你安排，你看你安排的么斯（什么）嘛，人都不得活了，你还安排？”

这句话激怒了小璐的母亲，她指着同事的鼻子吼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所长都不敢这样和我说话！”

谈话不欢而散，临走时，我劝她：“养大个女儿不容易，顺其自然吧。”

小璐的母亲没说话。

小璐在杭州待了一个月，其间我致电同学，询问情况。同学说她的精神状态很好，有时还帮忙做一些社工工作。

2015年3月，小璐从杭州返回。

“有什么打算吗？”我问她。

“想好了，先回来离婚，然后辞职，我想去开一家设计工作室，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你的同学还答应资助我，谢谢你，警官。”小璐兴奋地说。

“孩子咋办？”

“以前都是我妈带，离婚之后我要自己带，绝不再让她安排什么。”

6

小璐离婚的过程并不顺利。丈夫先是百般威胁，无效后低头求饶，最终两人是通过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小璐离开家乡，投奔了武汉的朋友，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我的同学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为小璐提供了10万元的无息借款。

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通话时，小璐更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等我安定下来，就把女儿接来武汉。”

2015年10月，一位小有名气的设计师走入了小璐的生活，二人由工作关系上升为朋友，又进一步发展为恋人。

此后，我与小璐的联系逐渐减少，但心里依旧担心，偶尔联系，我总问她：“你妈妈有没有再干涉你的生活？”

小璐沉默一会儿。“别问了，我不想提她。”

我继续追问，小璐说她母亲最近一直神神秘秘的，父亲在电话里总是叹气，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又不敢说。

2016年3月，我在所里值班，突然接到报警。事发地又是小璐以前住的那个小区，我心里一惊，但转念一想小璐离婚后已经搬出去了，便放下心来。

然而进场之后，我却猛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小璐的母亲。

这时我才知道，小璐的娘家也住这个小区，这大概也是小璐母亲的安排。

只见客厅里一片狼藉，小璐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她的额头高高肿起。小璐的父亲蹲在地上扶着她，她母亲则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

“怎么回事？”我急忙问。

小璐的爸爸向我们讲述了一切。

小璐离婚后，在武汉过了半年多的自由生活，但在这半年中，她母亲表面没说什么，但私下却十分不满。痛定思痛，小璐母亲认为是自己过去的安排不够好，因此这半年来，她一直悄悄地为小璐张罗婚事和新的工作。

工作方面，她动用自己过去的关系，在兄弟单位给小璐找了一份办公室行政的工作。她觉得“行政工作压力小又体面，适合小璐的性格”。婚事方面，她相中了林业局的一位中年丧偶的男士，“公务员工作和薪水稳定，个人素质也好”。

而这一切，小璐毫不知情。

2016年春节，小璐带设计师男友回家，想和父母说再婚的事。结果遭到母亲强烈反对，她连挖苦带讽刺，气走了小璐的男友，之后，把自己半年来的“新安排”和盘托出。母女再度发生激烈争吵。

小璐一怒之下返回武汉，不久之后却发现自己工作室账户内的29万元资金不翼而飞。几经查询，她才知道，是母亲猜出了账户密码。

为了逼她回家，小璐母亲把工作室全部的资金都转到了自己手上。这笔钱是小璐四处筹借的，其中有工作室新一年的房租、员工的工资，还有她准备结婚的钱。小璐求母亲把钱还给她，但母亲只回了她一句话——“回家，接受安排。”

眼见交房租的时间临近，工作室的运营也因为缺少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小璐无奈回家，试图与母亲协商。

看到小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母亲不为所动，并明确告诉小璐，除了服从自己的安排，她别无选择。

小璐被逼进了死胡同，她回忆起30多年来被母亲规划的人生和那场失败的婚姻，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失心疯似的在客厅里抓起什么就扔什么，并且不断用头撞墙。

“这孩子真是不知好歹！我为了她费了那么大劲，她竟然一点也体会不到家长的良苦用心。”小璐的母亲在一旁插嘴。

“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家都要被你毁了！”小璐的父亲终于憋不住了，冲妻子吼道。

小璐的母亲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丈夫，我想，这可能是他们结婚以来，这个男人第一次愤然指责她。

我扶起小璐，发现她浑身颤抖，面无表情，眼神呆滞。试着问她话，也毫无反应，我心想："坏了，别是激出了精神问题。”

我想劝她两句，刚一开口，小璐就冲我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跟着，她扬手就给我一巴掌。

我挡开小璐的手，对同事说："打电话送医院吧。”

7

市中心医院的救护车到了。

上车的过程中，小璐还在歇斯底里地喊："你为什么要逼我！你为什么要逼我！”两名医护人员几乎控制不住她，小璐的爸爸一边帮护工控制着不断挣扎撕扯的小璐，一边带着哭腔喊女儿的名字。

此时，小璐的母亲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她拉着我的衣袖，不断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你陪同去医院，问大夫吧。”说完，我就不想再说任何话了。

一个月后，我杭州的同学在电话里问起小璐的情况，隐约提起借给小璐的10万块钱，说她一直联系不上人。我试着打小璐的电话，对方一直关机，我便决定去她家看看。

来到小璐家，小璐的父亲将一个装有10万块钱的文件袋交给我，让我还给杭州的同学。我有些诧异，问起小璐的情况，小璐的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不太好，还在住院。

我问具体在市中心医院的哪间病房，表示想去看望。

结果，小璐的父亲哽咽了："别去了，她转到武汉六角亭（精神病医院）了。"

好人难当

1

2012年12月22日中午，我接到110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一高中女生在家中被人“绑走”。

重大警情全局联动。交警上路设卡堵截，特警也登车候命，我和同事按照报警人提供的车辆情况全城搜索。

搜索中途，接到指挥中心电话，称有人在国道延长线上看到了绑匪车辆，我们立刻调头准备出城。走到一半，指挥中心又打来电话，说交警队已经找到车了，在国道延长线上，涉事车辆与一辆越野车相撞。

等我们赶到现场，就看到一台“志俊”翻进沟里，一台越野车横在路边，车头已经报废。

“人质”在车祸中受伤，四名“绑匪”也挂了彩，其中一名“绑匪”满头鲜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正在等候120救护车。

“枪打的？”我问现场的同事。

“不是，车撞的，翻车的时候这小子从车里飞了出来，脑袋撞到马路牙子上了。”

越野车车主是皮外伤，正在接受交警的初步询问。

车主名叫高明，同车的女性是他的邻居，是被“绑架”的女高中生的妈妈。中午高明正在家中做饭，邻居突然来敲门，火急火燎地说女儿小秋被人带上一辆无牌“志俊”绑走了，求他帮忙开车一起追。

高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两人开车边找边追，走到318国道延长线上，刚好发现了那辆无牌“志俊”从小路上拐进来。高明驾车上前试图截停“志俊”，不料双方在纠缠中撞到了一起，“志俊”翻进了路边沟里。

“我们两家很熟，我和小秋妈妈以前还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两家住上下楼，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管吗……我就是想把车拦下来……你说这事搞的……”车主高明还未从刚才的惊慌中缓过劲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交警申辩着。

说话间，120救护车赶到，医生下车一看躺在地上的“绑匪”，便皱着眉头说：“完了，这个救过来也傻了。”说着轻轻扶起“绑匪”的脑袋，我一瞥，正看到有糊状物从伤口处流出。

2

必要的医疗处理后，三名“绑匪”被带进了公安局办案中心。

经审讯，四人共同受雇于一名叫陈平的贷款公司老板，专门负责“要账”。

陈平在本地有些名气，“两劳”人员出身，出狱后从事放贷多年。虽然被相关部门打击过多次，但依旧活跃于地下贷款行业。找他贷款的，既有“赶本”的赌徒，也有大大小小急等用钱的小老板。陈平经验丰富，善于规避各类风险。他的“借款”利息并不比银行同期的利率高出多少，但名目繁多的“手续费”“保证金”数额却极为惊人。

小秋的父亲成大海在市郊开了一家塑料制品厂。半年前，因资金临时周转困难，向陈平借款40万元，约期三个月偿还。成大海用一辆30多万元的新奥迪车作价15万元抵押，加上在本市有实业，陈平同意借钱，但扣除“头期利息”“手续费”“保证金”等后，成大海实际得款仅32万元左右。

虽然明摆着是个“坑”，但其他途径确实一下筹不到这么多钱，成大海咬咬牙，还是签了字。

成大海本来打算着自己在外还有60多万元的货款没收回，三个月内收回货款后足以偿还这40万元借款，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眼见三个月期满，欠自己货款的人先是表示无钱可还，随后便人间蒸发，成大海这下慌了神。

先是把奥迪车以抵押价转给了陈平，成大海仍欠款20多万元。随后，剩余的借款加上逾期后按天计算的“滞纳金”“违约利息”，数额越来越大，成大海发现自己陷入了陈平的圈套。

陆陆续续又还了一部分钱之后，成大海一时再也拿不出钱来偿还越滚越多的借款。陈平便开始派人收账，逼迫成大海还钱。

有时是厂子玻璃被砸，有时是送花圈，有时是家中大门上被红色的油漆写上“欠债还钱”。后来，收账的“小弟”开始频繁进入成大海家，与他同吃同住。

12月初，眼看成大海借款的各种“复利”“违约金”“罚息”“车马费”加在一起，竟然滚到了60万元，陈平交代收账的，年底前务必把账要回来，不然就想办法把成大海的塑料制品厂搞过来。

成大海的厂子前后投入100多万元，坚决不同意转让，陈平便指示收账的三番五次去骚扰成大海，成大海无奈，只好停了工，暂时躲了出去。

小弟们四处找不到成大海，眼看年底将至，担心拿不到陈平的“年终奖”，便加大了催讨的频率。22日中午，一伙人来到成大海家，依旧寻不到成大海的踪迹，见女儿小秋一人在家，便连蒙带骗地拉着小秋“回公司”，逼成大海露面。

四人带着小秋下楼上车，车子刚刚发动，正巧遇到匆匆赶回的成大海妻子，司机一脚油门跑了出去，成大海妻子一边报警一边找邻居高明帮忙，之后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老板让我们这样干的，我们也是打工的。”其中一个收账的小弟辩解道。

3

陈平归案以后，毫不隐瞒与成大海之间的借款关系。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你看合同都在这儿，成大海自愿签的字，我又没逼他。”陈平不屑一顾地说。

“那你们可以去法院告他，由法院执行部门来找他要钱啊。”我摆出教条式的谈话项目。

陈平的眼中划过一丝戏谑，但转瞬即逝。

“法院？打官司？那得猴年马月判下来！警官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那也不能绑人！你胆子够大的，晓不晓得自己判几年？”我呵斥陈平。

“那是收账的个人行为，我只让他们要债，没让他们绑人。”陈平回答。

“之前往成大海厂里送花圈、泼油漆、砸玻璃这些事也是你让干的吧？”我追问。

“不知道，我从没让人这么干过，即使是我这边收账的干的，那也是他们的个人行为。”陈平把自己推脱得一干二净。

回头去审三个小弟，结果三人谁也证明不了陈平明确说让他们去绑成大海的女儿。

“那你们绑人家女儿做什么？脑子让门挤了？”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们就是想着逼成大海还钱，不带他女儿回公司，他死活不露面啊。”一个小弟解释道。

“老板是说让我们‘动动脑子’，有啥事儿他来担待，咋现在不认账了呢？”另一个小弟抓着头皮抱怨。

我心里暗骂这三个收账的，但由于没人能证明陈平所说的“动动脑子”的意思就是绑架成大海的女儿，我们折腾了大半天，也不能把陈平怎么样。

陈平反而问我们：“警官，听说有个收账员伤了是吧，这个事情和我无关哈，得撞他的那个人负责，你们得依法办事对吧？”

我十分生气，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得到消息的成大海也从藏身地匆匆赶来派出所，一进门就急切询问女儿小秋的情况，同事把大体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同时让我取一份成大海的笔录材料。

笔录过程中，我问起成大海借款的原因，成大海也是一肚子恼火和怨言。“你以为我愿意借他陈平的钱啊，我好几个朋友都是找他贷款贷的，现在买卖也没了，人也跑了。但我有啥办法呢？厂子周转不过来啊。”

“银行贷款啊。”

“难啊，像我的这种小厂子，银行给的额度低不说，就是真同意放款，就他们那套手续和速度，等钱放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那现在你那‘黄花菜’还热着呢？”

成大海苦笑着摇摇头。

“他们砸玻璃、送花圈、泼油漆的时候，我也报过警，当时派出所也出了警，但没啥用啊，过不了多久，那帮人又回来了，还闹得变本加厉了！”

成大海说得没错，兄弟单位确实为了成大海的事情出过不下十次警，但无奈这些专业的收账团队都具备一定的“法律经验”，从不打砸贵重物品，也不暴力伤人。因而行为即便违法，公安机关也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最长15天的治安拘留，等到拘留期满，这些人便又卷土重来。久而久之，不少受害者怕遭到报复，遇事反而不愿报警求助。

4

现在情况最棘手的，反而成了高明。

对于他的行为性质，局法制科同事之间产生了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四人的行为是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建议按照交通肇事对高明立案，由交警部门办理；另一部分人认为高明涉嫌故意伤害，建议先执行拘留，之后听取检察机关意见；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起绑架案，高明属于见义勇为，不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因此，高明行为的定性关键在于收账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但从审讯结果来看，四名“绑匪”既没有暴力胁迫又没有直接索要赎金，不但够不上绑架，甚至连非法拘禁都因时间过短不能成立。

最终，经过一番商讨，局法制科只能采纳了第一种说法，将高明移交交警部门处理。三个收账的小弟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当晚被送往市拘留所拘留。高明则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伤者的治疗费用。

临走前，高明委屈得不得了。“你说这事儿和我有啥关系？我就是想救人而已，搭上自家的车不说，还得另外赔给人家钱，冤死我了。”

成大海夫妇也对结果表示不满，成大海的妻子激动地说：“明明就是他们绑架了我的女儿要挟我老公给钱，怎么就成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了？”

同事解释了半天，高明和成大海妻子还是想不通，怪警察不通情理。“这么小的女孩子，真被他们带走了，万一出点儿啥事怎么办？”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先安慰他们说，高明毕竟是为了救人，交警部门在处理时会考虑这些因素，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实在感觉委屈，还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或者要求复议。

一行人听罢，也只好悻悻离开了。

送走高明等人，想起还有一名受伤的“绑匪”在医院躺着。我驱车来到市中心医院，负责看管的同事说伤者重度颅脑损伤，刚动完手术，送进了ICU病房，情况不乐观。

伤者名叫刘大军，35岁，“两劳”人员，讨债公司“马仔”兼司机。

家属聚在医院走廊里，看装束打扮应该是市郊乡村的农民，刘大军的父母年近七旬，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一言不发。老头见到我，站起来小心翼翼地问该怎么办。

我告诉他：“一切按照法律程序处理，无论是涉及绑架还是交通肇事，双方都需要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老太太抹着泪说，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受这么重的伤，以后可怎么办。我问二人知不知道儿子平时做什么工作，老俩说只知道儿子给别人当司机，具体什么职业他们也不清楚。

我们找到主治医生询问伤情。医生说现在尚未脱离危险期，但依照经验来看，这么重的颅脑损伤，即便救活，人也废掉了。

同事感叹说这是报应，我也点点头。

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如期下达，判定双方同等责任。高明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同等责任，也就意味着自己免除了牢狱之灾。相关的赔偿也可申请由保险公司代为赔付。好在高明之前购买的保险保额较高，此次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代为赔付。

伤者经过全力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但变成了痴呆，生活基本无法自理，更别提再去为陈平要账了。

陈平的其他小弟看到伤者的惨状，也都心生畏惧，暂时放松了对余款的讨要。成大海家为感谢高明的出手相助，东拼西凑为他送去了3万元谢礼，但被高明谢绝。

一场高利贷引发的冲突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之后警方再次对陈平一伙进行立案调查，试图从涉黑、敲诈勒索等方面着手打掉这一高利贷团伙。

5

原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但没想到，时隔一年，又生出了新的事端。

2013年11月15日清晨，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某公司有人闹事。

我和同事驱车赶往现场，刚到现场便看到这家公司的大门口挂着一条白色的条幅，上面用墨水写着：

“撞人不赔我家生活困难，为富不仁欺凌弱势群体。”

条幅下有不少人在围观，我们拨开人群走进公司大院，工作人员赶紧迎了上来。经了解，高明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而闹事的不是别

人，正是之前受伤的要账人刘大军一家。

刘大军一家坐在高明公司办公楼的一楼大厅里，旁边堆放着他们带来的被褥、铺盖、衣物、脸盆、饭锅等一应生活用品。

“这是干啥？搬到这里来住吗？”我诧异地问刘大军一家。

没人理我，刘大军的父母依旧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一眼。刘大军傻呵呵地坐在地上，眼神呆滞，半张着的嘴角上挂着口水，头上有一块明显的疤痕。

高明从一旁走出来拉住我说：“警官，咱借个地方说话。”

我和高明来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下，高明开始向我讲述事情的经过。

事情还得追溯到上次高明救人的那起交通事故，事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刘大军一家未对事故责任提出异议，高明支付了规定的赔偿金之后，双方一拍两散。

但没过多久，刘家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知道高明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是“有钱人”，便开始转头找高明要钱。

开始时，只是刘大军的父母或者老婆来公司找高明，说家里揭不开锅了，让高明可怜可怜他们。高明不堪其扰，陆续三百五百地给过几千块钱，但后来发现刘家人没完没了，便拒绝再掏钱。

这下刘家人不愿意了，开始守在高明的公司门口、家门口，车来拦车、人来拉人，死活要求高明继续出钱“接济”。高明报警求助，警察来了把刘家人劝返，但警察前脚走，他们后脚又回来了。

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双方都精疲力竭。一周前，刘大军的老婆来到公司，跟高明说家中生活困难，希望高明能够一次性再补偿刘家一些

钱，双方就此两清，他们也不来闹了。高明受够了骚扰，也想花点钱一次性把问题解决，便问刘家想要多少。

刘大军的老婆估计受了“高人”指点，只说要“救济”却不说数额，等着高明出价。

“我本来想着他们如果要个一两万，我直接给他们算了，但她一直不谈数额，等着我‘出价’，后来我都给到五万了，她还是不满意！”高明恨恨地说。

“你中圈套了，你知道为啥她不开价？”

“为啥？”

“这种情况她开口要钱，如果达到一定数额就可能涉嫌敲诈勒索，我们就能法办她！”

高明这才恍然大悟。

双方谈不拢，今天早上，刘大军和父母便搬到了高明公司的大堂里。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不服责任认定的话，可以去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我问高明。

“说了，但估计他们知道责任认定书提出复议的时限早就过了，去法院打官司也赢不了，白花诉讼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来找我要钱！”高明说。

我无奈地摇摇头，出门打算找刘大军父母谈一谈。

然而口舌费尽，刘大军的父亲始终只对我说一句话——穷，帮帮忙。

之后，刘大军的父亲便不再作声了。刘大军依旧傻呵呵地坐在一旁，仿佛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无关。

6

就这样僵持了一天，我联系公安局法制科，看是否能依法处理此事。法制科同事无奈地告诉我，按照现行法律，刘大军的父母已经年满75岁，即便行为构成违法，也只能裁定“拘留不收监”。

联系医院，要求他们派救护车到现场以备强制带离时的不时之需，但医院建议我慎重行动。刘大军的父亲是医院的老病号，有严重的心脏病，强制带离过程中诱发了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再联系刘大军所在村的村干部前来协调。村干部如约而至，好话说尽，刘大军父母不为所动，村干部无功而返。

眼见天色已晚，刘大军一家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好找高明商量，先在办公楼里腾出个地方来让他们睡一晚。湖北的11月，已经寒气浓重。

高明不同意，担心一家人就此在他公司里住下。我无奈地说：“他们就这么睡在大厅里，万一夜里出个三长两短你真的就说不清了。”

高明想想也是，只好吩咐保安把公司的杂物室腾出来让他们暂时住进去。

回派出所的路上，同事说这事真的难办了。我点点头，一直痴呆的刘大军和他年迈的父母在高明的公司里要钱，而刘大军的老婆始终没有出现过，估计她担心自己出面闹事会被依法处理，所以一直不敢露面。

我协调村干部找过刘大军的老婆，她表示“静坐”是公婆的个人意志，她毫无办法。之后便拒绝同警方沟通。

刘大军一家就这样在高明的公司里住了下来，他们白天在公司办公楼大厅里席地而坐，晚上就回杂物间里睡觉。

高明虽然恨得要命，但除了一遍遍地报警没有其他办法。派出所民警出警后，也只能对刘大军父母好言相劝，到了这个年纪的人，法律的威慑作用已经大打折扣。

高明几次来派出所找我，试探着说过自己打算“想个办法”把刘大军一家“弄走”。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只能严肃地警告他，别做违法的事情。

高明愤然说：“刘大军以前不就是用那种方法找成大海追债的吗？”

“他这不遭报应了吗？”我说。

高明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7

双方又僵持了一个多月，2014年1月初，一批日本投资商将要来公司洽谈合作事项，合伙人要求高明迅速解决刘大军一家的问题。高明一方面天天跑派出所，另一方面继续和刘大军一家交涉。

高明公司已经成了辖区的一处治安隐患点。几经考虑，上级部门协调城管、街道办、刘大军一家所在的村委会、市中心医院和派出所进行联合行动，全力解决高明公司的问题。

就在联合行动即将展开的前夜，高明突然打电话给我。

“警官，事情解决了。”

“解决了？什么意思？”我诧异地问高明。

“我说给他们20万，他们同意了。”

“我们马上就要进行联合行动，你再坚持几天！”

“算了，算了，我服了这家人了，生意事大，我花20万买个平安吧。”高明在电话中无奈地说。

第二天，高明和刘大军一家来到派出所，我和同事接待了他们。刘大军的老婆也破天荒出现，拿到钱，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

我却遏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这分明就是敲诈勒索，20万，已经达到数额较大了！小石（单位同事），别让他们走了，控制起来带走做笔录！”我不愿就这么放过刘大军一家。

“算了，算了，警官，我不报案行不行？我服他们了行不行？我自愿扶贫行不行？这钱算我送给他们家了行不行？”高明一看事态有变，一连说了四个“行不行”。

我怔怔地看着高明，刘大军一家也趁机急匆匆地离开了派出所。

“明天合作商就要来我公司调查，我实在不敢耗下去了。”高明苦着脸小声对我说。

我无言以对，心中为高明鸣不平。双方一言不发，高明给我点了一支烟。

“这好事做的，真他妈窝囊！”高明愤然地甩下一句。

“真他妈窝囊！”同事忍不住也小声啐了一句。

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我知道，同事的这句“窝囊”，多半是在说我们自己。

生也医闹，死也医闹

1

2013年11月的一天，110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出事了”。

“咋了？又送来死人了？”钻进警车，我急切地向接警的同事询问。

“比这还严重，送来个病危的，人还没上手术台就断气了，家属赖上医院了。”同事边开车边回答我。

到达现场，一条长长的白布条幅横扯在医院急诊室的大门前，上书“草菅人命”。条幅之下，隐约看到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和一群人纠缠在一起。

“完了，又要闹一场了！”同事无奈地说了一句后，打开警笛，把车停在了急诊室门口。

保卫科张科长见我们到了，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快步往警车跟前跑，两个从人群中扔过来的空矿泉水瓶被丢在他身后。

“哎呀你们可算到了，大门马上守不住了，让他们冲进急诊室就麻烦了！”张科长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冲我们喊道。

张科长说，死者名叫刘斌，徐庙村村民，三天前的深夜，被一辆农用车拉来医院，家属说是在小诊所挂吊瓶时青霉素过敏，要求医院治疗。值班医生赶紧组织人员抢救，但没能救过来。

“青霉素过敏死亡，要闹也是去闹小诊所，怎么闹到你这儿来了？”我诧异地问。

“哪儿是什么青霉素过敏！值班医生查了病历，这个患者是癌症晚期。之前一直在他们村的卫生院挂水（打吊针）维持，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呼吸。”

“现在遗体在哪儿？”我转头问张科长。

“在太平间放着呢，有四个保安看着。”

“一定守好遗体，现在这阵势，万万不能让家人把遗体抢出来！”

遗体是医疗纠纷中的重要筹码，在以往的医闹案例中，家属只要把死者遗体往医院大厅一摆，医院便不得不就范。

“放心，他们只要不冲进医院里面来，遗体不会有问题。”张科长抹了一把汗。

2

刘斌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我想起了一个人，向张科长求证，张科长连连点头：“没错，就是他。”

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他生前是一名职业医闹。

刘斌在医闹行当里颇有些名声，据说只要他出面，没有要不到的钱。几年前，公众对“医闹”二字还陌生的时候，刘斌便组织起一帮游民游走在周边各大医院，专门帮人“维权”。

停遗体、摆花圈、搭灵堂、放鞭炮是刘斌一伙的拿手好戏。只要这四招一使出，医院大多乖乖就范。

眼前的这家医院之前便吃过刘斌的亏，那年，刘斌曾“代理”过一起医患纠纷，凭着摆在门诊楼里的一具遗体，最终从医院要走了40多万元。

刘斌团伙后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打掉，但他浑身是病，一直取保候审，至死仍是戴罪之身。

他的死出乎我的意料，也让医院和警方十分紧张。这些年我没少和刘斌打交道，他那一幕幕“专业”手段令人记忆犹新，而如今，躺在太平间的成了他本人。

我和同事打开执法记录仪，紧跟着张科长挤进人群。

披麻戴孝的家属带着香炉、纸钱、鞭炮、花圈堵在急诊室大门口，医院保安围成人墙阻止他们进去，急诊室的玻璃门已经在混乱中碎了一地。

现场乱得一塌糊涂，急诊室大门前上百人在围观，很多人拿着手机拍照摄影。

现场几近失控，我和同事上前进行劝阻，但毫无效果。家属和保安此时都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哭闹推搡乱成一片。

好在治安支队的增援及时赶到，远处的扩音器里传来同事的喊话声。

“我们是××公安局民警，请围观人员马上离开现场！”

“冲击和打砸医疗机构涉嫌违法犯罪，请现场人员稳定情绪，理性对话！”

一队防暴警察开始上前疏散人群，外围看热闹的群众逐渐离开。

防暴警察的出现暂时平息了现场的混乱，死者家属放开了保安。治安支队领导上前劝说双方保持理性，家属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谈。

“他们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怎么谈！”刘斌的妻子激动地说。

“不是不让你们进来谈，你们要抱着鞭炮、花圈、火盆进急诊室，这是来谈事的吗？”张科长也激动回应。

“谈不好我们就把灵堂设在这里！”刘斌的妻子说。

“你听，你听，有……有这样谈判的吗！”张科长气得说话都结巴了。

“不这样谈怎么谈，我们是弱势群体，斗不过你们！”另一名家属在一旁边说边作势又要往急诊大厅里冲，我急忙阻止。

3

暂时平息了急诊室门口的骚乱，刘斌的妻子同意和医院谈判。

医院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尸检、查明死因；二是医疗事故鉴定；三是赔偿金走司法程序。

刘斌妻子立刻否决了医院的意见，也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进行尸检，遗体由家属领回；二是医院提供一次性补偿，数额为170万元。

双方从中午12点谈到晚上8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你说这不是讹人吗！170万？还不让尸检，不走司法程序，这不是做梦吗！”副院长忍不住指责刘斌的妻子。

“别的我们不管，我男人送进医院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现在死在医院了，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他们医院得负责！”刘斌妻子说。

不出所料，谈判不欢而散。

“你看你看，和当年刘斌的套路一模一样。”张科长在会议室外拉着我愤然说道。

首次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同来的家属扬言第二天继续来医院“讨说法”，言下之意大家都明白。医院是公共场所，急诊室又是要害部门，此事谁也不敢怠慢。公安局与医院协商后，决定第二天继续派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天一早，刘斌家属来到医院，开始和院方进行第二轮谈判。

刘斌妻子拿出了一张“清单”，上面列明了包括死者丧葬费、医疗费，死者子女抚养费在内的一系列费用，加上精神抚慰金，共计170余万元。

医院的态度与昨天一样，要求走医疗鉴定程序。双方你来我往，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上午10点，双方谈崩了，刘斌妻子一个电话，几辆农用三轮车载着20多名自称刘家亲戚的人来到了医院。

这群人虽然净是老人和怀抱孩子的中年妇女，但一看便训练有素。一进医院即兵分两路，一路奔向医院急诊室，另一路奔向医院行政楼。

好在医院和公安机关早有防范，把人群拦在了急诊室和行政楼外。抱孩子的妇女开始哭天抢地，老人们也上去拉扯守门的保安和民警。刘斌妻子则披麻戴孝抱着刘斌的遗像在急诊室门口席地而坐。周围很快又有人上来围观。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同事无奈地对我开玩笑。

“抓人吧，这么闹下去可不行。”我没有心思理会他的玩笑。医院在我的管区里，我不想出事。

“等等上级命令吧，毕竟他们家刚刚有人去世，现在抓人有些欠妥。”同事说。

4

“丈夫去世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你要么谈要么告（走司法鉴定程序），可这样闹下去，性质就变了啊。”我蹲在刘斌妻子身旁劝她。

刘斌妻子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似乎划过一丝犹豫，但转眼便消失了。

“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要你提的要求合情合理，他们（医院）该赔你多少钱一个子儿也少不了。”我继续劝她。

“警官你说说，丧葬费、孩子的抚养费、我们一家的精神损失费，哪一样不合理？这么大个医院，170万对他们来说算得了啥？”

“那你得先同意尸检啊，不走法律程序，医院为何赔你钱，赔你多少钱都没有个说法嘛。”

“那不行，反正我男人死在医院了就得医院赔钱，还走什么法律程序？”

“照你的意思，你男人如果死在马路边还得让修马路的赔你钱呗？”一个看热闹的人突然插了一句。

刘斌妻子狠狠瞪了那人一眼，我赶忙示意那人别掺和。

我想再劝劝刘斌妻子，她却不再搭理我。

刘斌的遗体没能抢到手，灵堂也没能在医院搭起来，同来的刘家亲属没有可以凭借的“抓手”，只有一众老人、妇女与医院对峙，也慢慢安静下来。有个别试图再去扯条幅、摆花圈、放鞭炮的人，被警察制止，骂骂咧咧又坐回到一边。

调解和劝说一直在继续，派出所、刘斌所在村的村干部轮番上阵，但医患双方谁都没有松口的迹象，只好僵持着。

“你们赶紧想个辙，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同事对张科长说。

“村委会干部不是来了吗，院领导说先等他们做工作。”张科长说。

同事苦笑着摇摇头。

不是不信任村干部，照以前的经验来看，这种事情村干部能起的作用很有限。一来村干部没有强制力，来了也就是继续劝，而事主如果听劝的话，他们就不用来了；二来村干部本身也不愿掺和这种事，万一自己话说多了，真要是挡了人家的“财路”，人家回头非把村委会闹翻天不可。

和预料中一样，村委会象征性地派了两个人过来，劝了几句没有效果，也就回去了。

“吃一堑长一智吧，刘斌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接，忘了当年那大几十万是怎么赔出去的了？”同事跟保卫科的张科长说。

“瞧你这话说的，哪怕明知道可能出事，病人拉来了我们也不能不救啊！”张科长说。

想想也是这么个道理。

5

刘斌妻子提出的不走法律程序的170万元赔款，被医院称为“梦幻170万”。但说归说，医院不掏这笔钱，刘斌妻子就不撤人。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医院几次通知刘斌妻子“开会”，刘斌妻子回应：“除了赔钱，别的不要谈！”

“你这不叫维权，叫敲诈勒索，懂吗？”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别跟我说什么违法，我没文化，不懂法！”

“不懂法不是理由！你真是想走刘斌的老路吗？”我压制着心中的怒火对刘斌的妻子说。

她不再说话。

医院快撑不住了。半个月来，几十号人在医院，虽然不闹了，但一天到晚披麻戴孝坐在大院里，网络上的评论铺天盖地。有人说他们是职业医闹，来找医院发财，但更多的人在指责医院管理不力，个别人还添油加醋杜撰了好几个医院“治死人”的故事。

尤其是前来治病的病人和家属，看到这群手捧遗像、披麻戴孝的人感觉“晦气”，不断向医院投诉。

“他们少要点儿的话，双方还有继续谈的可能，开口170万，胡闹。”一位医院领导私下抱怨。

从“不走司法程序一分不赔”到“少要点儿还有谈的可能”，医院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刘斌妻子那边也有些兴味索然了。半个月来，前来“维权”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减少，来到医院也不再哭闹，只是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其间，刘斌妻子还与一名“亲属”发生了争执。

公安机关继续维持秩序，刘斌的家人不哭、不闹、不堵门，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他们不能在医院大院里坐着，因此警察也无法把他们强制带离。

“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我向同事抱怨。

“快结束了。”同事意味深长地说。

“为什么？”

“明摆着的，都快撑不住了。‘维稳’要花钱，‘维权’也要花钱，半个多月，得花多少钱。”

6

经过半个月的走访调查，公安机关基本确定了前来“维权”的“亲属”身份，其中大多数人并非刘斌的亲属，而是受雇于一个名叫“王拐子”的职业医闹牵头人。

搜集了足够的证据，随时准备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

毕竟刘斌的遗体还在医院太平间里放着，医院还是希望能够平和处理，因此提出最后一次谈判。

“领导说，只要刘家人同意走司法鉴定程序或者把遗体拉走火化，不再闹了，医院愿意出两万块钱的‘救济金’。我们花钱求个平安吧。”张科长告诉我。

谈判桌上，刘斌的妻子也显得急躁起来。两万块的“救济金”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死者妻子开始歇斯底里谩骂起院方谈判代表来。

谈成这样，也就没法继续下去了。双方散会，我们开始做强制带离的准备。毕竟对方都是老人和妇女，公安局增调了女警，医院也备好了十几张床位，以防各种意外事件。

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刘斌的妻子跑了。

从谈判室里出来之后，刘斌的妻子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他们的“亲属”那里，而是悄悄地混入前来医院治疗的病人和家属之中，溜出了医院。

医院门口的“亲属”开始以为刘斌妻子被警方扣留，哭闹着要求警方和医院放人，但后来发现警察和医院也在找她，方觉不妙。

有人想趁乱离开，有人缠着警察要求找刘妻，有些“业务不熟”的“家属”情急之下说漏了嘴：“她还欠着我们的劳务费呢！”

“都别走，全都带回公安局去！”局领导一声令下，所有参与“维权”的“家属”都被带进了公安局。

办案大厅里热闹非凡，“家属”们形态各异。很多人交代了自己的“光辉事迹”，纷纷承认是王拐子招聘来的职业医闹。最终，一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其他人被拘留（11人因年龄超限不予收监）。

一场医患纠纷就此落幕，刘斌妻子自此从徐庙村消失。后来医院曾接到电话，来电人自称刘斌妻子，要求医院兑现谈判时所承诺的两万块钱。医院让她来医院处理刘斌的后事。但此后刘妻没有来领钱，刘斌的遗体也一直停在医院太平间里无法处置。

医闹们供出了王拐子的下落，他很快被抓获归案。

7

在对王拐子的讯问中，我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死者刘斌和王拐子是同行，都是吃职业医闹这碗饭的。一天晚上，刘斌的妻子突然联系王拐子，说有事情要谈。

王拐子来到刘家，得知刘斌快不行了，刘斌的妻子让王拐子“帮个忙。”

刘斌的妻子对王拐子说，刘斌一辈子吃喝嫖赌，现在一分钱没给家里剩下不说，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以后人没了，自己还得替他还债，怎么想怎么亏。现在看刘斌“差不多了”，想起以前刘斌做医闹能赚死人钱，自己也想做一把，让王拐子帮帮忙。

王拐子万万没想到刘斌的妻子找他做这事儿，本来打算推辞，但转念一想，反正自己就是干这行的，赚谁的钱不是赚，虽然心理上有些过意不去，但自己和刘斌也算是“兄弟伙的（朋友）”，就当帮他家一个忙，便答应下来。

村卫生院不能闹，一来乡里乡亲的，实在磨不开面子；二来也闹不来多少钱，所以二人商量趁刘斌还有一口气，赶紧把他转到大医院去。

二人知道刘斌当年曾在人民医院闹到过几十万元钱，觉得那家医院有钱又好说话，便决定连夜把刘斌送去。

谁知刘斌“不争气”，去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王拐子本想算了，但刘斌的妻子说来都来了，就试一试吧。

双方约定，王拐子负责组织人员，“赔偿金”一九分成，刘斌妻子负责支付医闹的“工钱”“车马费”“午餐费”等。

二人本以为会像刘斌几年前那样，闹上个三五天，医院便承受不住压力付钱。不料刘斌妻子寄希望于通过此事一夜暴富，开出了170万元的天价，直接堵死了与医院对话的大门。

“都怨她，我一开始就劝她，要个三四十万就算了，但是她不愿意，她太贪了！”王拐子抱怨道。

“哎哟，你还有理了是吧？接着说！”我怒斥王拐子。

王拐子给刘斌妻子找了20个人，价格是每人每天200元，30块午餐费和两包黄鹤楼“硬蓝”香烟，抱孩子的每人每天加50块。如果医闹被拘留，刘斌妻子还要按照拘留时间每人每天出500元的补助。

“维权”半个多月，账上一共要花十几万元，刘斌妻子支付了两万块钱预付金后便再也拿不出钱来，后来的钱一直由王拐子出面欠着。

最后一次和医院谈判之后，刘斌妻子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闹了半个多月，眼见成本越来越高，不但自己的发财梦彻底破灭，另外还要支付医闹的巨额费用，便动了逃走的心思。

刘斌妻子甩开医闹匆匆回家，带上孩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一跑，王拐子不但拿不到当初协议的10%的劳务费，连雇用医闹的钱都要转嫁到自己头上。医闹们没拿到钱，天天成群结队地去找王拐子要账。

“警官，你说我冤不冤啊，我也是受害者！”王拐子竟然冒出这么一句。

“放屁！你这是自作自受！等着吃牢饭去吧！”我骂了王拐子一句。

尾声

找不到刘斌的妻子签字，刘斌的遗体无法火化，就这样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

一次，我去医院办事，保卫科张科长拉住我问：“他老婆有消息吗?遗体就这么放着怎么行？”

我告诉他，公安机关也因为医闹的事情一直在找刘斌的妻子，但至今毫无消息。

“活着折腾医院，死了还折腾医院！”张科长啐了一句。

我也暗自叹息，刘斌这位“老熟人”当年在医闹这个行当里混得风生水起，恐怕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半辈子医闹，最后却也因医闹落得个无人收尸的下场。

就怕真的把领导告倒

1

2013年4月13日上午8点半，我接到社区干部张耀武的电话，他火急火燎地在电话中喊道：“警官，那个，那个王志芬又跑了……”

张耀武口中的王志芬，是社区的上访户。

“先别急，她会不会是出去办事了？”

“不会的，我刚刚在小区门口查了监控，早上五点多，她拖着那个红色的旅行箱走了，还跟门卫说她要去北京告状。”

“这家伙……”我心里觉得好笑，王志芬明知自己因上访备受关注，还偏偏要大张旗鼓。

“通知她单位没？”

“通知了，他们单位的人已经出发了，正在去你们派出所的路上……”

王志芬，女，56岁，湖北Q市人，系某银行合同制员工，因住房等待遇问题一直和原单位闹纠纷。

王志芬与银行的矛盾缘于一套房改房。20世纪90年代，各单位还有福利分房政策，银行在某小区里也建有三栋宿舍楼。1998年房改时，银行职工纷纷将原本的福利房买断。王志芬当时虽然也在银行宿舍里居住，但作为非正式员工，按照政策，她无法参与房改。当时Q市房价很低，王志芬的前夫在老家村里有房，因此她在领到一笔“周转金”后，便退掉了宿舍回前夫家住。

2005年，银行宿舍所在位置被划入市经济开发区，房价上涨。2009年，每平方米价格较之前翻了三番。王志芬此时与前夫离异，居无定所，原本只是惋惜自己没能赶上分房子，但后来有人告诉她，一名和她同样身份的“合同工”当年没有领银行的周转金，而是买了银行宿舍福利房。

王志芬动了心思，她想交回“周转金”，再以当年的价格从银行买福利房。

银行拒绝了王志芬的要求，王志芬就找银行领导讨说法，双方之间还动过几次手。2010年春天，在一次冲突中，王志芬把副行长的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被派出所拘留15天。银行也借此解除了与王志芬的劳动合同，没了工作的王志芬此后便开始“维权”。

双方打了若干次官司，但王志芬胜少败多。2012年开始，王志芬开始上访，从单位信访办出发，一直走到国家信访局。从正常上访很快发展到缠访、闹访。

后来，王志芬还建了一个“维权”QQ群，省城和北京一有重要会议召开，王志芬便联络群里的“同志”一同前往“维权”。

这段时间，北京有重要会议召开，王志芬扬言，再不解决她的住房待遇问题便要到北京绝食。银行和社区不敢怠慢，不停给王志芬做工作。

头天晚上，张耀武一直等到王志芬家里熄了灯，才惴惴不安地回家，本来约好今天找王志芬继续谈待遇问题，结果早上来到王志芬家里时，发现已经人去屋空。

“那个红色旅行箱是她进京‘维权’的标配，她的QQ名也叫‘红色斗士’，只要红箱子不见了，她八成就是进京了。”来到派出所后张耀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2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Q市某银行、市信访办、市劳动局、社区和派出所的人坐在一起开会。

“她确实是去北京了，今天上午8点钟的高铁。”同事拿着铁路部门提供的信息说。

“你们之间不是刚刚打过官司吗？她怎么又要去上访？”我忍不住问刘科长。

“还能为啥？输了官司不服气呗，愣说我们和法院勾结判她败诉，你说官司都打到省高院了，我们这个七八线城市的小银行，真要有本事和省高院勾结，事情哪会拖到现在都解决不了啊！”刘科长向我诉苦。

“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满，走信访路子也是有法律程序可依的，我们也不能为这个怎么着人家是吧。”我想试着劝一下刘科长，但可能这话说得有些不合时宜，同事在桌子下面踢了我一脚。

“我们也知道上访是她的权利，但她总去闹啊。前年她在省信访局门口放鞭炮被拘留，这次她又说去北京绝食。”刘科长无奈地摇头。

“能解决的，你们就尽量帮忙解决一下嘛。她一个离异妇女，又在你们单位工作了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适当给点照顾，不就没这档子事儿了！”我换种方式想再劝一下银行。

“我也不瞒你们了，这次她提出来的条件，我们绝对没法答应。”刘科长双手一摊，跟我说了实话。

“她的小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参加了银行招考，但没有进面试，她要求银行破格录取，我们没有同意，领导说先干合同制，王志芬又不同意。房子的事情只是个由头，她在用上访给我们加压。”

这事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没想到维权还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心里还是有些不相信，毕竟这只是银行的一面之词。

“这几年，我们给她的‘照顾’实在太多了，她从2010年开始就不再上班，但直到现在，我们每月还给她开1800元的‘救助金’，又帮她争取了1000多块钱的低保，她自己在外面做事也有收入，甚至两个儿子上大学的钱都是我们出的，单位很多职工对此意见很大，王志芬还闹，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了！”

我有些听糊涂了。

“你们这样做，有些违规了吧？”我诧异地问刘科长。

刘科长若有所思地笑笑说：“按说这些事情都不能摆到台面上讲的，但这次我们也是确实没办法了，求你们帮帮忙吧。”

会议开了一上午，最终决定派人去北京把王志芬劝回来，哪怕劝不回来，也不能让她胡闹。银行派了刘科长，社区和派出所各派一个人准备进京。当天晚上，三个人正在所里商量劝返对策，突然接到北京警方的电话，说王志芬在北京因打架斗殴被拘留了。

我赶紧追问案情，北京警方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她是来上访的吧？在‘上访村’和卖‘资料’的打起来了，一般治安案件，拘留七天。”

刘科长松了一口气，还想再问别的，对方挂了电话。上级决定派人赴京，等王志芬拘留期满后把她劝返。

3

从拘留所把王志芬接出来时，她情绪十分激动。坚决继续上访，不同意离开，还要把拘留她的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一并告了。我们几个人苦劝半天没有用，最后，我一怒之下只好把事情点破。

“王志芬你别闹了，你不是想让你儿子进银行吗？进银行要直系亲属政审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搞了一个治安拘留了，再从北京闹出个三长两短，弄个刑事拘留，就算银行给你开后门，你儿子也过不了政审！”

听闻此言，王志芬一下子愣在那里，思考了半天，最后同意跟我们一同回家。

返程的列车上，刘科长看我在拘留所外面一句话唬住了王志芬，便让我再帮忙给她“做做工作”。我说要做工作大家一起做，但他借口和王志芬“不对路子”，拉着张耀武跑到餐车去了。

我明白，他俩长期和王志芬打交道，早就相看两生厌了。加之一直对银行给王志芬的优待不满，真说起话来，难免带有火药味，便随他们去了。

车厢里没几个乘客，我找话头和王志芬聊了起来。

我之前点破了她的心事，王志芬也就不再向我隐瞒什么。上来便一个劲儿地问我，她这次拘留会不会给儿子进银行工作带来麻烦。

我心中好笑，但也不好表现出来，只好半开玩笑地反问王志芬：“银行对你这么不好，你也和它打了这么多年官司，怎么还让你的宝贝儿子进银行工作？不怕他走你的老路啊？”

“那不一样，我儿子进去是正式职工，又不是合同制，怕什么！”

“你儿子连笔试都没过，银行凭什么录他当正式职工？”

“警官，这里面肯定有黑幕……”王志芬一副神秘的样子。

“哟，黑幕你都知道，说来给我听听？”我故作感兴趣地追问，其实心里烦得不得了。这世上有种人，只要别人得了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便

会归因于种种黑幕。

王志芬开始细数自己听来的各种小道消息，什么笔试考第一的是市里王市长的侄子，前年银监会陈秘书的儿子没参加考试就进了××银行，还是正式编制，等等。

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对王志芬说："这种事情你要是真有证据，就直接去有关部门举报，或者去媒体曝光，怎么能指望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给儿子找工作？"

"他们靠着手里有点权力就胡作非为，都是大学生，凭什么他们的孩子一毕业就有正式工作？我儿子就得在家里蹲着，这社会也太不公平了吧？"

"你的意思是，把你的儿子也安排进去，这个社会就公平了？"

"他们的儿子能安排，我的儿子凭什么不能安排？"

我觉得没法继续和她聊下去了，打算换个话题劝她两句。

"这几年，单位对你的照顾也够周到的，现在你要钱有钱，要闲有闲，也年过半百的人了，在家享享清福多好，还出来闹个什么劲呢？"

王志芬看看我，愣了一会儿说："一套房子值多少钱？他们给我的这点钱算什么？"

"你当年不是银行的正式职工，又领了房改的'周转金'，按道理这房子确实没法给你啊。"

"那黄××他们怎么就能买？他们当年也和我一样是合同制！"

"我不是说你不该反映问题，你按照程序一级一级信访，谁也说不出个'不'字。不过，咱实话实说，如果他们真是违规拿的房子，查了他

们就能分给你？”

王志芬不说话。

“三年前跑到省政府去放鞭炮，这次又扬言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绝食，你这明显不是反映问题的做法嘛。”

听我这么说，王志芬叹了口气。

“警官，恕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这年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不闹，哪个把你当回事儿？”

“你就不怕闹过了火，真和单位撕破了脸，现在的这些‘优待’也被取消了？”

“你还别说，开始我还真怕过，但我后来发现，我越是去告状，他们越怕我，现在逢年过节，领导大包小包拎着东西来慰问我。你看我们单位那个姜××，和我一样的情况，他要面子，从来不去闹，现在领导鸟都不鸟他。”

我竟无言以对。

4

王志芬此次北京之行虽然没有成功，但她在“维权”QQ群里还是掀起了一番波澜，有些人竖起大拇指夸她是孤胆英雄，也有人骂她虚伪，去上访只会装腔作势，拘留一下就害怕了。

王志芬也不是一点儿收益都没有。回家半个月后，王志芬每月的“救济金”涨了200元，她的小儿子被安排到银行做合同工，并承诺有机会转正的话优先考虑。

我气得想掀桌子，就是“越闹越有，越有越闹”，才导致一些单位缠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

王志芬的上访之路还在继续，虽然单位满足了她提出的部分要求，但每逢特殊时期，王志芬还是会象征性地“耍一下”，有时玩几天失踪，有时拉着她的红色旅行箱声称要去省城或北京“走亲戚”。她自称这是要“保持威慑力”。

2014年开始，国家信访局下文取消“越级上访”，王志芬再反映情况需要逐级递交材料。家访时我去找王志芬谈话，王志芬说小儿子到现在还没转正，她绝不会罢休。我气愤地指责她这是在“要挟”“勒索”，王志芬就辩驳说银行某领导“搞到的好处更多”，警察怎么不去抓他?

我气愤地回应：“你要举报的话写封举报信，或者去纪委告他，你去不去？”

王志芬沉默。

“你如果有顾虑，我以私人身份代替你去递举报信，行不行？”

她还是沉默。

“你要不放心我，自己去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上写举报信举报他！这总行了吧？”

她依旧沉默。

私下里我和刘科长聊天时，骂他们都是软柿子。

“这么明显的违反规定的事情，你们怎么能答应她？她一个已经和你们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的人，怎么能月月从你们单位账上支‘救济金’，报销儿子读大学的学杂费？”

“上边这几年被她上访搞怕了，不也是想息事宁人嘛。”

“事息了吗！人宁了吗！有规矩不尊，有制度不依，就想着息事宁人。现在倒好，你们让她牵着鼻子走，连派出所都被你们捎带上

了！”

刘科长也一脸郁闷。“你别总冲我发火啊，领导交代的事情哪个敢不办！”

5

原以为王志芬的上访之路还会继续，但一切却在2015年年初突然停止了。

她口中那位“搞到的好处更多”的领导，在上级纪委巡视组的检查中落马，并随即因经济问题被“双规”，后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那位领导的落马牵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便有违规买卖房改房、违规给子女安排工作和单位账目混乱等王志芬先前十分“关注”的事件。

因为王志芬曾长期因上述事情上访、告状，纪委干部也找到她，希望从她那里收集一些证据。我和社区干部张耀武一起前往王志芬家时，却发现王志芬脸上并没有成功扳倒“老虎”的喜悦。

“这些年你确实受了不少委屈啊，王大姐，把你了解的情况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吧。”纪委干部语重心长地对王志芬说。

“没有什么好说的！”王志芬转身进了卧室，重重把门关上，留下纪委干部和我在客厅里面面相觑。

“她……这是？”纪委干部疑惑地问我们。

“可能是听到这事儿太高兴了，还没适应过来吧。”张耀武冒出这么一句。

我看了张耀武一眼。

王志芬拒绝配合调查，我们也只好先行告辞。临走，王志芬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她的“好日子”却也结束了。

4月，银行清退了落马领导近年来违规录用的一批人员，王志芬小儿子的转正梦想破灭，他又不愿在银行继续干合同制，便回到家中待业。

5月，司法部门联合审计部门在清查账目时发现银行一直给王志芬违规发放“救济金”，并出钱供王志芬的两个儿子读大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王志芬归还多年来领取的“救济金”和两个儿子的学杂费等，共计人民币18万元。

“为什么要把‘救济金’要回去？”我问刘科长。

“王志芬有低保，自己还在外面做事，一个月收入加起来五六千，还发她么斯（什么）‘救济金’，这明显就是那个落马领导违规给她的封口费。”刘科长回答我。

“王志芬究竟知道多少事情？”我追问。

“她可能知道一些事情，但也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们领导为什么给她封口费？”

“这还用说？她一直上访，领导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啊，反正是花公家的钱，平自己的事儿，不用白不用。”

“我说之前让王志芬去举报，她怎么不去？”我感叹。

“那是她的财神爷，真告倒了他，王志芬能捞到什么好？”刘科长甩下一句。

“这些事你看来早就知道啊，你为什么不去举报？”

刘科长苦笑着摇摇头，没回答我。

尾声

2015年8月，银行每月发给王志芬“救济金”和供他儿子上大学的事情被人在她的“维权”QQ群里曝光了。

QQ群里骂声一片，有人说她是“骗子”“奸细”“叛徒”，有人说她“不要脸”，“难怪那么积极，原来是搞了这么多好处”，还有人把自己以前上访失败归咎于王志芬“告密”，说她是“卧底”。

不久，王志芬被踢出了QQ群，之后她的精神便开始不太正常。

一次，接群众报警称“有个疯子要砍人”，我和同事赶到现场时，看到王志芬正披头散发，手持菜刀站在一户居民楼下大声叫骂。

“×××，你个婊子养的王八蛋，你就见不得别人过得好！我让你举报，你给我滚出来，我非砍死你！”

夺过菜刀，制服了王志芬，我准备把她带回派出所。一路上，王志芬不停叫骂。

“×××，我要砍死你！你害得老娘儿子转不了正！”

“×××，你赔老娘那18万，不然老娘杀你全家！”

……

开车的同事回头看了她一眼说：“别回派出所了，先去医院吧。”

11月的一天，我在路边巡逻时遇到了出院后的王志芬，她全然没了当年“红色斗士”的风采，面无表情、眼神木然，只是嘴里依旧念念有

词。我凑上去仔细听："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过得好，王八蛋！"

吊死在

儿子饭店门口的母亲

1

时间是2014年11月底，一进刘老太家门，迎面就看到刘老太的儿子王波和三个陌生男人。王波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刘老太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王波绰号“麻将王”，在派出所“名声正盛”。

几个月来，我们为了他，已出了十几次警，其中抓赌七次、扫黄三次、打架一次，剩下的几次都是去“解救”他——因为赌博他四处赊账，每当码钱（赌博时用以代现金的筹码）到期，他能躲就躲，躲不了就报警求助。

三个月前，王波在赌场上输红了眼，回家偷拿房本去贷款公司抵押了35万元。他本想杀回赌场翻本，结果又输了个一干二净。约定的还款期限已过，他无力还债，贷款公司的人拿着抵押合同找到了家里，他们要求刘老太“要么帮王波还钱，要么腾房准备过户”。

屋里坐着的三个陌生男人是职业追债的，看到警察自然见怪不怪，其中一个男人还说：“警官，我们这是债务纠纷，好像不归你们管吧。”

的确，警察不能介入债务纠纷，我只能无奈地劝道：“你们就事论事，不要有过火的行为。”

经过一番谈判，贷款公司又给了刘老太三天的时间筹款。送走追债的人，刘老太就哭了：“我还以为我能死在这个房子里。”

三天后，我在备勤室午休，突然听到报案大厅里吵吵嚷嚷，出去一看，是刘老太母子，还有一个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走到近前，把一个鼓鼓囊囊的提包撂在桌子上，愤然地说："派出所里有监控，为了妈，今天我替你把钱还了，以后再敢赌，我打死你！"

说罢，他气呼呼地离开了，我诧异地看着刘老太母子，赶紧上前问发生了什么事。刘老太说他们想在派出所里还钱，"这里比较安全"。

我劝不走她，无奈只能默许，我问起刘老太筹款的过程，刘老太不愿多讲，只说是王波的大哥王成拿出35万元，替弟弟把钱还了。

说话间，刘老太频频回头骂王波没良心，差点儿害得自己无家可归，王波则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仿佛早就习惯了的样子。

收账的人来了，刘老太把钱交给他们，要求他们在警察面前做书面保证，以后绝不再骚扰王波。收账的人呛道："王波不欠钱，我们才懒得理他。"

我作势吓唬了一下收账的人，转头告诉刘老太，其实那种保证并没什么意义。

送刘老太出门的时候，同事把她拉到一边仔细嘱咐："回去仔细问问儿子，在外面还有没有欠债，另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可看好了。"

刘老太不说话。

2

半个月后，刘老太又跑来派出所报警了。称家中被盗，自己压箱底的金银首饰和5000块钱不知所踪。同事做完现场勘察后悄悄跟我说："看情况像是熟人作案。"

派出所里，做着笔录的刘老太正哭天抢地。“首饰是我的嫁妆，这辈子多苦都没舍得卖，没想到被挨千刀的小偷搞走了……警察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帮我追回来。”

我问刘老太谁有家里钥匙，刘老太说房子就她和王波住。我让刘老太把他叫来了解情况，刘老太说王波已经失踪个把星期了。

我上警综平台查询，发现王波三天前又因涉赌被兄弟单位拘留，正关在拘留所里。我叫同事去拘留所提王波问话，出门前刘老太问我找她小儿子干什么，我直截了当地说：“王波作案的可能性最大。”

刘老太很吃惊。“如果真是他干的，会不会被判刑？”

“案值已经超过了立案标准，该判刑就得判刑。”

刘老太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的，我儿子从来不会偷东西，一定是外人干的。”

然而，到了拘留所，王波却干脆利索地就承认了。“前几天赌瘾上来了，四处弄不到钱，就把我妈的首饰和钱拿走了。首饰当给了寄卖行，钱已经输光了。”

我打算在拘留所直接给王波办手续转刑拘，但同事说：“告知一下刘老太比较好，毕竟是亲属盗窃，稳妥一点。”果然，刘老太一听到消息，马上要求撤案。

几天后，王波拘留期满，重获自由，依旧四处滥赌。刘老太家中值钱的物件也开始不断地“丢失”。

每一次刘老太都偏执地认为“这回真是小偷干的”，她多次报警求助，然而每次都坐实了的确还是王波，然后刘老太就又会跑到派出所要求撤案。

如此反复了好几次。

有几次我直接告诉刘老太："你这是在纵容王波的不法行为。"但刘老太总是默默地掉眼泪道："我不舍得亲手把他送进监狱。我死了，这些东西也都是他的，他愿意卖就卖吧。"

3

2015年2月底，桥头酒店有人打架。我和同事赶到现场时双方已被拉开，动手的人是王波的嫂子和刘老太。

桥头酒店是王波的大哥王成开的，几天前王波来店里找他借六万块钱，说是要和朋友去湖南合伙开汽修厂。一想到王波既不会修车也没开过店，王成立刻认定，这次他又打着幌子借钱去赌场翻本。

王成当场拒绝了，王波一看从哥哥手里借不到钱，便回去找刘老太"做工作"。刘老太被王波一忽悠，便到店里替王波借钱。虽然不信弟弟真的会去开汽修厂，但王成怕惹母亲生气，最终还是从店里拿出三万块钱，让母亲代为转交给弟弟。

没拿到预期的数额，刘老太本就不太高兴，但好歹也算是给了。谁知刘老太准备离开时，正好遇到王成的妻子，儿媳坚决不让刘老太把钱拿走，婆媳二人先是理论，再是争吵，最后直接动起手来。

"你去把事情搞清楚啊，也许你弟这次真是有正经用处呢。"我劝王成。

"可别给我提'正经用处'了，他次次来拿钱都是正经用处，赌场就是他的正经用处！"王成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因为三万块钱让老婆和妈撕破脸，不值得。"我劝他。

“这次只是个由头，上次替弟弟还债拿走的35万才是我老婆发火的主要原因。”王成说。

经过一番调解，最终，刘老太还是拿走了那三万块钱，王成的老婆哭着离开了派出所。

4

3月中旬，我去王成店里做例行消防检查，他的饭店一直是“三合一”场所（指生产、经营、自住一体，这是《消防条例》明令禁止的），一家人就住在饭店二楼的一间屋里。

公安局消防部门多次下过消防隐患通知，可是王成一直没整改。检查结束后，我和王成说起了这件事，要求他赶紧和家人搬出去住。

“没钱咋搬啊？”王成愁眉不展。

“饭店生意这么好，你也赚了不少吧？房子差不多就行了，你还打算买别墅住啊？”我打趣道。

“哪个不想买房子？哪个愿意一家子窝在店里住啊？上次替王波还债的钱就是我攒着准备买房子的，楼盘都确定了，这下可好，钱没了，我还买个鬼啊！”

“你为啥要给你弟填这种窟窿？”

“一个妈生的，你说咋办呢？”

“亲兄弟不假，但毕竟都成年了，没人规定你得给他还赌债啊。”

“唉，我们家情况不一样。”王成摇摇头，“我妈逼我给我弟还债啊。”

王成的父亲去世早，母亲刘老太带着两个“拖油瓶”，靠摆小吃摊艰难维生。凭着一股韧性，刘老太愣是把一个小吃摊做成了小铺面，还在

市里买了一套二手房。

王波是早产儿，当年差点儿没抢救过来，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两岁那年父亲又撒手人寰。刘老太觉得小儿子命苦，从小就对他百依百顺。

两个儿子逐渐长大成人，王成初中毕业后便和母亲一直经营小吃店；王波考上了中专，毕业后进了市印染厂。兄弟二人结婚后，刘老太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便决定“退休”。她几经考虑，把铺面给了有经营经验的王成，把住房给了有正式工作的王波，自己就带着存款跟王波过。

那几年，兄弟二人相互照应，王波拿到住房赡养母亲，王成专心经营小吃店，一家人过得和和睦睦。

2008年，318国道改线，与城市外环线的交会处正好落在了小吃店门口。小吃店的客源一下子猛涨，王成夫妇头脑灵活又踏实肯干，生意日渐兴隆。2010年，他们夫妇二人索性买下了旁边的两个门面，打通之后，开了“王成饭店”。

可王波却不知怎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先是因此丢了工作，后来妻子也和他离了婚。几年间，王波游走于各个麻将馆和赌场，不仅将母亲的存款输得一干二净，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王成和刘老太想尽了办法，却没能把王波从赌场里拉出来。伴随着王波的豪赌，一批批债主纷至沓来，其中不乏一些带有黑恶势力背景的职业放码者和亡命之徒。管不了小儿子，又怕小儿子出事的刘老太只能抓住大儿子这根救命稻草，要求他替弟弟还债。

5

长兄如父，王成一直尽自己所能帮弟弟应付各种各样的债主。先是三千五千，后来是一万两万，到最后，王成觉得自己也扛不住了。

“2011年年底，他在仙桃的场子里欠了‘校长’（黑话，指组织赌博的人）10万块的码钱，追债的人追到家里，我替他还了。”

“2012年，他骗朋友说合伙开公司，拿了人家几十万跑到新疆去赌，我怕他被警察抓去坐牢，又替他还了。”

“去年，他被追债的堵在沙市，对方扬言两天内不见钱废他一条腿，我拿钱把他赎回来，自己还挨了两个耳光。”

加上赎回母亲住房的钱，细数起来，王成已经为弟弟掏了近百万的巨款。

“他赌博我‘买单’，这些年开饭店赚的钱，差不多都给王波填窟窿了。”王成说，“一开始，我是真想管，毕竟是我弟，后来，我是真不想管了，赌场无父子啊，更何况是兄弟。他赌瘾一上来六亲不认，后来干脆不回家了。”

厌倦了家中母亲和哥哥的管教，王波开始长期在外游荡，偶尔回家，也多是被追债的人逼得走投无路。

面对弟弟欠下的数额越来越离谱的赌债，王成不止一次跟母亲说不想管了，但每到此时，刘老太就声泪俱下恳求他，最后直接发展到以死相逼。

“我妈说，王波再浑蛋也是我亲弟，我不帮他说不定哪天他就在外面被追债的搞死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夫，我妈都经历了，她不想再经受老年丧子了。”

王成怕刘老太真的想不开，即便自己万般不愿，但只能硬撑着给弟弟堵窟窿。可王波似乎是抓住了哥哥的软肋，往后他一出事就直接找母亲求救。

“我妈老了，脑子也没那么灵光了，我弟随便编个理由就能忽悠她来找我拿钱。说是借，但从来没还过。现在，我自己家也快被我弟拖垮了。警官，别人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有别的办法吗？”王成点了一根烟，猛吸了一口。

我遇到过类似的事，除了少数以亲情感化，大部分都是以亲人反目结局。对于王成的求助，我也没有两全的办法，只能实话实说。

王成叹气道：“现在年景这么好，我真想集中精力把我的饭店干好，但现在这种情况，唉！”

6

刘老太从王成那里拿走三万块钱后，派出所关于王波的警情消停了半年有余。

我觉得王成这次把弟弟“救”回来了，后来遇到王成时聊起来，他也觉得自己错怪了弟弟。

可是事情刚过去半年，2015年9月，湖南警方突然来访，要求调取王波的相关资料，原因是他涉嫌诈骗和盗窃。来访民警告诉我，王波在2015年4月至8月期间，伙同他人以开办汽修厂为名义，将顾客的13辆车变卖或抵押给贷款公司，获得赃款290余万元，全部用于赌博。

王波是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地下赌场被抓的，当时他在赌场里已经狂赌了三天三夜，归案时，290多万元赃款剩下不到1000元。

消息传来，王家的天都塌了。

刘老太执拗地认为，“湖南警方抓错了人，王波不可能犯下这么大的事”。她神经质一样在派出所大喊：“冤案，一定是冤案！”突如其来的重击也让王成方寸大乱，他抛下生意不管，只待在派出所接待室不停地抽烟。

湖南警方很快出示了相关证据，要求母子二人配合调查。双方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凌晨时分，王成陪着母亲匆匆离开派出所。

9月27日，湖南警方走后第六天，清晨5点，110指挥中心转警称“一名老年女性吊死在王成饭店的大门口”。

我迷迷糊糊地被同事塞进了警车，一路上还在不停地向指挥中心核实：“你说啥？吊死的？你没听错吧？”

“这得多大的仇，才能大清早吊死在人家大门口。这让人家的饭店以后怎么开。”我心想。

到达现场之后，眼前的一幕却惊得我目瞪口呆——吊死在王成饭店门口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成的母亲，刘老太。

王成跪在母亲的遗体旁痛不欲生，他妻子呆呆地站在一边。医院的救护车已经离开，法医随后到达现场进行尸检。我把王成拉进警车里，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成泣不成声地向我讲述了一切。

这次王波被抓，刘老太起初坚决不信，但在湖南警方给出的证据和王波的口供面前，她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眼看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刘老太和王成只能恳求湖南警方给王波一次机会，“家里一定全力配合”。

湖南警方说此案已经坐实，当下只能由家里尽快筹钱，尽可能替王波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以求获得谅解争取在法庭上从轻判决。否则按照此次的数额，王波至少会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

刘老太和王成方寸大乱，回家之后就着手搜罗积蓄，可他们发现，这几年，家底已经被王波折腾得一干二净，唯一值钱的只有全家赖以生存的王成饭店。

刘老太要求王成尽快将饭店盘出。王成托人问了市价，但回话称："时间仓促，只找到一位仙桃老板愿意全款接手，但出价只有80多万。"

这离近300万元的诈骗金额相去甚远，而且饭店凝聚了王成多年的心血，是他的立身之本，他不愿出手。可刘老太救子心切，只说："能凑多少凑多少，不够再去借一下，先救人要紧。"

几经磋商，24日，王成和仙桃老板约定次日进行交易。

当晚王成回到家，才想起因为之前忙乱，竟然忘了把盘店的事情告诉妻子，他硬着头皮对妻子讲出实情，希望得到谅解。

王成妻子二话没说，就出去买了农药。"饭店是我们的心血，也是唯一的住处。之前为了王波，前前后后已经花了100多万元，这次为了救他再卖店，我马上死给你看！"

一边是母亲不停催促，另一边是妻子以死相逼，王成陷入两难。

他先是怪妻子的做法不合时宜，但平静下来一想，一旦饭店盘出，自己今后该何去何从？母亲、妻子、孩子又该如何生存？思量一夜，王成最终决定不再为王波补窟窿了。

25日一早，他电话回绝了仙桃老板。到了母亲家里，他把昨晚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母亲，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刘老太先是歇斯底里地骂他不念兄弟情义，接着狠狠地抽了他几个耳光，王成一动不动。可突然刘老太又一下恢复了平静，瘫坐在椅子上，一字一句地问："你最后再说一次，到底救不救你弟弟？"

"不救！"王成坚决地说。

然后，他就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出门前，他听到母亲叹息：“这个家，真的要散了。”

“我真的没想到，我妈最后会走这一步……”王成说完，将头埋进胳膊里，痛哭了起来。

7

这一次，王成真的没有为弟弟筹钱。

因为涉案金额巨大、性质恶劣且受害人损失分文未赔，王波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因为母亲自杀，王成的饭店此后也没有再开张。王成联系之前的仙桃老板，要价50万元，但被对方一口回绝：“大门口吊死人，哪个敢来你的店里吃饭！”

无奈，店面只能闲置。

办完母亲的后事，王成举家迁往外地，此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偶尔还会有一些王波的旧债主跑到派出所来找人，我们只能回复：“人在湖南蹲监狱呢，已经家破人亡了，去法院问问吧，看能不能打官司。”

渐渐地，王家的事情被人们淡忘了。

只是在抓赌的时候，我会把一车赌徒拉到王成饭店的旧址，指着破落的门面骂他们：“浑蛋们，使劲赌，你们老娘也会像这家一样，吊死在自己家门口！”

“公务员考试社”

社长的歧路

2016年探亲假前，我兴冲冲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母亲突然打来电话：“回家之后低调点，不要惊动你陈阿姨一家。”

我不解，陈阿姨和我们做了近三十年邻居，她的儿子林云青和我一起长大，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追问原因，母亲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你云青哥出事了，电话里不方便多说，你听我的就是了。”

1

云青哥大我两岁，在老家当警察。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小学时代。

我家住在母亲单位的职工宿舍小区，林云青的父母和我母亲都是山东某国企职工。我和云青哥就读于这家单位的职工子弟学校，只不过他大我两级。

1996年，母亲的单位破产改制，林云青的父母和我母亲一同“息岗”在家。三人还合伙去济南西市场批发过手套、袜子，在夜市上摆摊赚钱。

两年后，原单位被中国重汽兼并，母亲选择返厂上班，而林云青的父母则出于收入方面的考虑，选择继续干个体户。

学生时代，林云青一直是父母耳提面命，要我好生学习的对象。中考时，他考上了省重点；高考时，传言他又考入了省内一所著名的师范

大学。而我，费尽全力也只考上了那所师范大学的独立学院。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母亲拧着我的耳朵骂我不争气。

但当我入学后，发现林云青竟也在这所独立学院读书。面对我的惊诧，他的解释是那年高考发挥失误了。但此后，陈阿姨不止一次悄悄对我说：“你云青哥学校的事儿，一定不要告诉别人。”

我读大一时，林云青读大三。他不但是学生会的副主席，还自创了一个社团并担任社长——公务员考试社。

那时，公务员考试在我们学校热得不行，几乎每一名文科专业的毕业生都热衷于参加“公考”，林云青更是其中的领潮者——从大二起，他便开始报名。

林云青鼓动我加入他的公务员考试社，我问他：“还没毕业就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即便考上了也不能去面试，考它何用？”林云青说：“嘻，说的就像你能考上似的，现在不去积累点‘临场经验’，到了毕业真考的时候，岂不是一点儿准备都没有？”

有一次，我被他说动了，也试着上网报名，但由于仍是在读生的身份，连基本信息审核都没法通过。林云青不住地损我是“榆木脑袋”。“编个假信息不就行了？反正就是去参加笔试，又不让你真去上班！”

我胆子小，不敢，一直被林云青鄙视。

“就你这胆子，以后当了官也没魄力！”

“我不想当官……”

“那你就做好毕业就失业的准备吧！”

2

在林云青一家眼里，“当官”是他们两代人的共同追求。

陈阿姨在当个体户之前，曾和我的母亲在一个车间里共事十几年。用母亲的话说：“你陈阿姨是个‘官迷’，以前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连车间选个‘卫生组长’她都会去给领导送礼。”

可惜陈阿姨官运并不亨通，离职当个体户之前，最大的成就也就干到了车间的卫生组长。因此，当官的愿望便寄托在了林云青身上。

林云青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从小学开始便一直担任班里的学生干部。虽然事后得知，那是陈阿姨每学期给班主任送去的20斤鸡蛋和两箱青岛啤酒产生的效果。老人们都说，林云青一家，“脑袋活泛，情商高，会来事儿，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

林云青比同龄人更早熟一些，当同学们大多沉浸在“推塔”“CF”“劲舞团”中时，他便早早报名参加了“中公”“华图”等公务员考试辅导班。每天奔波在学校和培训机构之间，还不止一次教育我要提前准备，毕业给自己找一个“金饭碗”。

大学时，老师们说林云青“执着”“懂事”“有抱负”，而同学们却大多讽刺他“矫情”“封建”“官本位”。

林云青的大舅在城管局工作，是他们家族中唯一捧“金饭碗”的人，同时也是林云青的偶像。平时聊天，林云青经常会把话题引到大舅身上。

“你看我大舅，人家那才叫工作。上班有公车，下班住公房，手里有公款，看病是公费……”

但其实，林云青的大舅和他们一家关系并不太好，城管局的执法队还没收过林云青父母的夜市摊子。那天，陈阿姨当着执法队员的面给自己的哥哥打电话求助，但林云青的大舅只是说了句：“人家是正常执法，我也帮不了你。”

夜市摊子还是被没收了，陈阿姨在楼下痛骂自己的哥哥，临了还教育林云青："你大舅真不是东西，你以后可不能像他这样！"

母亲听陈阿姨这样教育孩子，忍不住插嘴提醒，陈阿姨却说母亲"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上去和她争论，母亲急忙把我拉进了屋。"别和你陈阿姨计较，她这脾气也是生活逼的。"

3

陈阿姨一家生活不易，这是小区里有目共睹的事实。

离职之后，陈阿姨和她老公成了专业个体户，两人在附近的大市场租了一个铺面卖衣服。晚上大市场关门，夫妻二人便开着电动三轮车去夜市上卖"十元精品"。

早些年生意好做，夫妻二人也赚下了一些钱。但后来大市场周边相继修路、拆迁、改建，交通受阻，加上网购兴起，大市场的客源大幅减少，两人的铺面开始赔钱。陈阿姨索性把重心放在夜市摊位上，但那个夜市是周边商户自发形成的，既没人管理，又时刻面临着城管检查，生意很不好做。

林云青每次说起家里的事情，都忍不住唉声叹气。"都是老百姓，为了赚点钱搞个夜市，结果还三天两头打架，你说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

他说得没错，夜市摊主之间经常发生争端，有时是为了占一个好地方，有时是为了同一商品间的几毛钱差价。一次，夜市上有人摆了一个"五元精品"摊，冲击了陈阿姨的十元摊，两人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起来。后来，陈阿姨和那个摊主都因"殴打他人"被派出所拘留了三天。

"明明是他先动的手，凭什么处罚我？还不是他有个亲戚在派出所里当协警！"陈阿姨这样抱怨。

“真他娘的不公平，有人贪污受贿那么多都没人管，我妈这做小生意的和同行发生点冲突就要被拘留，有朝一日我当了官，一定让这帮人好看！”林云青也恨恨地说。

我却不太明白，他口中的“这帮人”具体是谁。

4

林云青从大二就开始参加公务员考试，国考、省考、事业编一次不落。

学校辅导员知道林云青在校期间用虚假信息报名考试，虽没有明确制止，但暗地里也提醒他，即便笔试过了线，也千万别去参加资格审查，一旦查出来，小心被禁考。

林云青一直小心翼翼，中途有几次“过线”，他也没敢去参加资格审查。对此，林云青既骄傲又懊恼，骄傲的是自己长期的学习没有白费，懊恼的是，由于身份虚假，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官”的机会白白流失。

大四那年，林云青终于可以用真实身份参加考试了。为此，他提前半年开始给自己进行高强度“封闭训练”。为了节约精力，他不参加学校的实习，不去招聘会，也不准备考研，甚至毕业论文都上网找代写。

“祝‘林局长’仕途的第一步一帆风顺啊！”考试之前，身边的同学和老乡们无不揶揄他，林云青面无表情。

但遗憾的是，那年的国考、省考、选调生、事业编他考了个遍，却没有一场过线，连参加面试的资格都没有。

为此林云青沮丧了很久，但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去找其他工作，而是选择回家复习，明年继续。

“我今年运气不好，也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再努力一年，明年肯定能行！”毕业时，他坚定地对我说。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以前用虚假信息报名时，林云青经常过线，但现在可以用真实信息报名了，却总是“不理想”。

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他满怀信心地进入考场，却满怀失望回到家中。

林云青在小区里出了名。毕业四年，一直不工作，天天在家复习考公务员，很多邻居开始笑话林云青一家是“官迷”。

“他们家就没有当官的命，还折腾啥！”有人说。

对于这种说法，陈阿姨十分生气。“让他们走着瞧，哪天云青当了官，气死他们！”

母亲想劝陈阿姨，不要总让孩子盯着公务员考试，现在就业的路子那么多，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但一开口就被陈阿姨顶了回去。

“你老公是转业军官，你们一家吃香喝辣，没人敢欺负，哪能体会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的艰难！现在云青努把力，以后当了官就能造福子孙后代！”

母亲只好作罢。

5

其实我也很是奇怪，为什么林云青如此认真备考，却始终考不上，难道真是以前把考运用完了？不过后来，一位大学老乡道出了玄机。

“他考不上纯属活该，你看看他报的岗位，离家远的不去，工作苦的不去，事儿多的地方不去，不是实权部门不去，基层不去，穷地方不

去，名头不好听的地方不去。他想去的岗位，全中国人都想去，次次考录比都是几千比一，他能考上才怪！”

一年寒假，我和母亲去林云青家中做客，看到他还在忙着复习考公务员，想起此前老乡的话，便劝他：“先别挑岗位，考上再说。”

云青哥也有些动摇，沉思了片刻。但没想到这话惹怒了陈阿姨，她突然满是恼怒地指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看不起你云青哥？那种岗位是人去的吗？钱少、事多、离家远，别人都不考凭什么让你云青哥考？”

“陈姐你误会了，孩子的意思是他先考上一个工作，以后可以想办法调。云青也二十八了，不上班也不找对象，眼见着就耽误下去了。”母亲急忙圆场。

“二十八怎么了？我们云青等得起！你没见现在的小姑娘，只要对方是公务员，都上赶着要嫁，三十二的娶二十三的比比皆是，他真要是考到‘老少边穷’的地方去了，那才真是耽误了！”

6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和林云青同一年考上警察，不过他在本市，我却远在湖北。这已经是他参加公务员考试的第七年。

表面上，陈阿姨对我充满了溢美之词。“你云青哥不如你。你是研究生入职，副科待遇。他是本科生入职，科员待遇。”

但背地里陈阿姨一家根本看不上我的工作。

“我们家云青考的是大城市，家门口，你看那个谁（指我），考不上大城市，才去的湖北那个又小又穷的地方，哪能和我们比，他将来娶的媳妇都是乡巴佬。”

我听了很生气，母亲劝我别和他们家一般见识，但能看得出心里也不是滋味。

陈阿姨依旧在夜市摆摊，但自从云青哥考上警察之后，她的腰板明显硬了起来。

听母亲说在陈阿姨的“宣传”下，现在大半个夜市的摊主都知道林云青考上了本市警察，还分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很多人开始在陈阿姨面前大肆夸奖林云青。

陈阿姨很享受这种感觉，一次母亲去逛夜市，听到陈阿姨冲着周围几个摊主骄傲地说：“我儿子就在咱辖区的派出所上班，就管咱们这块，以后你们有事儿跟我说就行！”

母亲和我通电话时说起陈阿姨的现状，好奇地问我：“你在那边也是这么厉害吗？啥都能罩得住？”

我不禁笑出声来。

“我就是一派出所民警，有什么罩得住罩不住的，别听陈阿姨的。”

上班之后，林云青和我的交流又多了起来。毕竟是同行，虽然不在同一省份任职，但工作内容都差不多，有时我们也会通过微信和电话分享一些彼此辖区的逸闻趣事。

林云青大我两岁，想事情也显得比我“成熟”很多。上班之后，他一改大学时独来独往的性格，变得极善与人交往。

“有空回来找我玩，我给你介绍几个哥们儿，都是咱这边有钱有势的老板！”林云青在电话里兴冲冲地对我说。

听了这话，我心里却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2015年春节，陈阿姨提着“礼品”来到我家。父母和我都十分诧异，虽然两家是二十几年的邻居，但从没有送年礼的先例。母亲推辞了半天，陈阿姨却一个劲儿让母亲“别客气”。一边说还一边把礼品盒打开，里面是两条香烟和两瓶酒。

“嗨，年前云青的朋友送来几箱东西，我们也吃不了，这不，咱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给你们提过来了。”陈阿姨春风满面地说。

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母亲不好驳了陈阿姨的面子，只好先把东西收下，又暗地里吩咐我抽空给林云青送回去。两人在客厅坐下聊天，陈阿姨还不经意地问起母亲我今年回家带什么回来的。

“他啥也没带，就带着张嘴回来了！”母亲跟陈阿姨开玩笑说。

“不对，他还算有点儿孝心，临进家门之前从超市买了两盒松花蛋。”母亲笑着补充道。

“唉，你说云青这孩子也是，就在本地上班，大过年的都不回家，光让他的朋友往家送东西。我就盼着他回来和我过个年，哪怕他就提一盒松花蛋回来都成。”陈阿姨更加喜笑颜开了。

7

我当然知道云青哥那些“朋友”是怎么回事。我不放心，劝他“自重”，林云青说我是“榆木脑袋”“憨货”。

电话里，母亲告诉我陈阿姨不再摆夜市了。

“听说有个公司请你陈阿姨去做‘顾问’，一个月3000多块呢！”

“啥‘顾问’？陈阿姨干了十几年夜市，那公司的老板要请她去传授怎么‘练摊’吗？”

“谁知道呢，听说是你云青哥的朋友介绍的。”

陈阿姨成了小区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邻居们一提起林云青，纷纷竖起大拇指。“云青这孩子有出息，从小就与众不同！”

2016年春节休假，林云青约我出去吃饭。酒桌上除了他和我，还有一群他的“朋友”。都是一些“刘总”“王总”，还有一个平头戴着金链，好像是本地一个有名的混子。

听说我和林云青是同行，“刘总”“王总”“金链”们纷纷热情敬酒。席间，他们好像商量着要合伙做什么事情，要给林云青“入一份干股”。

酒足饭饱，“王总”提议去夜总会继续聊。我要求回家，林云青嫌我不给他面子，在酒店门口冲我发脾气。

“林云青，你他妈疯了吗？”我忍无可忍，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以前我都是喊他云青哥。

“你他妈的不怕被人举报了，吃不了兜着走啊！你考了七年公务员，就是为了这个？”

林云青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撂下一句：“傻×，别说有事儿我没想着你。”

8

母亲多虑了，我回家休假期间压根儿没有遇到陈阿姨一家。

打电话给林云青，无人接听。我问母亲云青哥出什么事了，母亲说他好像犯了什么错误，挺严重的。那天听陈阿姨在家又哭又骂，母亲想过去问问情况，但陈阿姨死活不给开门，以后也没见林云青回来过。

“是不是上次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的事情？”我试探着问母亲。

母亲突然紧张起来，连忙问我有没有跟他掺和，我说怎么可能，母亲长出一口气。

后来，在一位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口中，我得知了林云青的事情。

林云青的确毁在了那件事情上。同学说，那个“刘总”“王总”在林云青的辖区里搞了一个“不夜城”，里面有涉黄、涉赌的服务。林云青给人充当保护伞，还入了“不夜城”的干股。

“这事儿怎么处理的？”我问。

“‘脱衣服’（调离公安系统）是肯定的了，估计这事儿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同学淡淡地说。

“他上班满打满算才四年啊，就这么完了？”

“他活该！一开始考公务员就用心不良，考上之前骂社会不公，等自己考上了，比他骂的那帮人还坏！”

尾声

20天探亲假期间，我一直没有见到对门的陈阿姨。假期结束我回了单位，后来和母亲通电话，听说陈阿姨一家搬走了。

“林云青呢？他最后到底怎么处理的？”我迫切想知道林云青的结局。

“不知道，有人说他被调走了，有人说他被公安局开除了，还有人说他进监狱了。”

再也娶不到好妻子

的官二代

1

2016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所里值班，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吵闹，紧接着一男一女相互拉扯着走进了报案室。男的拽着女的头发，女的扯着男的衣服。两人一路还在骂骂咧咧。

“你们干什么！都放手！”一旁的同事赶紧喝止，但两个人谁也不相让，闹得脸红脖子粗，直到我上去帮忙，两人才分开。

“疯了吗？跑到派出所来打架，想‘住进去’了？”同事吓唬他们，两人粗气喘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平静下来。

简单了解情况后，得知二人是夫妻，因为家庭纠纷，要求警察处理。

类似的事件很常见，只是站在我面前的这对夫妻略有违和感——妻子身高一米七左右，长发披肩，身材苗条，容貌姣好；丈夫身高一米六左右，矮胖身材，腆着肚子，右腿还有点儿残疾，30岁出头的年纪已经谢了顶。两人站在一起，外人谁也想不到这会是两口子。

我把两人带进了调解室。妻子叫乔洁，丈夫叫白志斌。双方因为离婚问题发生了争执。乔洁要求与白志斌离婚，但白志斌要求乔洁给他生个孩子再谈离婚的事情。双方因此产生争执，继而发生厮打。

我暗自诧异，平常闹离婚的大多是为孩子的抚养问题而争执，今天这位丈夫却要求妻子“生个孩子再离婚”，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她从结婚开始就不生孩子，即便怀上了也找理由打掉，你说她是什么意思？”乔洁默不作声，我心中隐约猜到了几分。

“她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生孩子的工具，生与不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你再动手打人试试？”听我这么说，乔洁有些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白志斌却气哼哼地低下了头。

调解过程中，乔洁一口咬定要与丈夫离婚，对于两人之前发生的争执则可以不予追究，白志斌也咬死就是不肯离。我只好跟他们说，派出所只处理打架的事情，要离婚的话还是去法院吧。两人悻悻离开。

2

不料，仅仅过了一周，这对夫妻便又再次来到了派出所。

这次，妻子脸上带着手掌印，头发凌乱不堪；丈夫的脸上多了几道抓痕，身上的衣服也被撕得七零八落。

“过不下去就离婚，这么打，真以为派出所不敢拘留你们吗？”我说。

“就是因为我要离婚，他才动手打我！我说协议离婚，他不愿意。今天我要到法院去，他知道后就开始动手。”妻子诉苦。

“离婚？凭什么？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个骗婚的婊子，想坑我们一家！”白志斌怒目圆睁，一边吼一边又要冲上去。

我急忙招呼同事把二人隔开，打算先带白志斌去办公室，稳定情绪，了解情况。临出门时，他还冲妻子乔洁叫嚷：“姓乔的，我把话放在这里，就是最后法院判了离婚，你也别想活着走出我家门！”

“派出所不是你斗狠的地方！”我一边训斥，一边和同事连拉带拽地把白志斌弄进了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白志斌便激动地冲我表态："她不给我家留下个一男半女，这婚我坚决不能离。"

"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生不生孩子你们自己商量，为啥打架？"拉了把椅子让白志斌坐下，我直奔主题。

"她把我妈气住院了，我今天叫她去医院跟我妈认个错，结果她又跟我提去法院离婚，我实在气不过就动手了，怎么处理我认了！"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忍不住问。

"也不瞒你，这事儿想起来我就觉得窝囊……"

原来2010年，白志斌和妻子乔洁都在市里的一家大型国企上班，但彼时两人的身份却截然不同。白志斌是"正式编制"，父亲又是单位的主要领导，而妻子乔洁只是刚进单位的一名"劳务派遣"临时工，家里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父亲。

那时，31岁的白志斌和23岁的乔洁都没结婚。乔洁长得漂亮，性格也好，白志斌对她一见钟情。虽然明知乔洁根本瞧不上自己这五短身材、高中学历，但白志斌相信，自己的"背景"是临时工乔洁难以拒绝的。

"那时候，像她这种'派遣工'能不能转正，甚至能不能继续干下去，就是我爸一句话的事儿。"白志斌说。

讲起直到31岁还没结婚，白志斌说自己当时"挑花了眼"。虽然长相一般、学历有限、右腿还稍有残疾，但由于父亲身居高位，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有很多。介绍的姑娘也都相貌周正，身体健康，其中不乏长相不错，在单位干"派遣工"的女孩子。

白志斌在择偶上心气颇高，白志斌的母亲也倾向于找个漂亮的儿媳妇。

“儿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爸的基因不好，不找个漂亮点儿的媳妇，以后还得生个丑儿子！”白志斌的母亲如是说。

虽然乔洁开始看不上白志斌，但经过白志斌全家的不懈努力，一年之后，乔洁最终还是接受了白志斌，在全厂人的瞩目中当上了“书记儿媳”。和白志斌结婚半年后，乔洁成为同期105名“劳务派遣”工中唯一一名转为正式职工的人。

“当时她爸得病，医院天天催她去交费，她家一点儿钱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我爸想办法从厂里解决的！”

“要不是她进了我们家，不是有我爸的关系，她能转正？现在她不但转正了，还提了干，当上了科室干部，转头就不认人了！”说到这里，白志斌声音高了八度。

“那你爸呢？你爸不管你俩离婚的事儿吗？”我问白志斌。

“操……”白志斌啐了一句。

其实我知道，白书记年前已经因为经济问题和滥用职权问题被纪委带走了，当时此事还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城市里闹得满城风雨。

3

“离婚？她想得美，我们家正好的时候她嫁进来了，想得到的都得到了，现在我们家落难了，她拍拍屁股就想走，哪有这样的事儿？”

“你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人家现在就是不想和你过了，你又能怎么办？”我不好把话说明，但明眼人都清楚，失去了“衙内”的身份，白志斌那些靠“衙内”身份得到的东西也注定会得而复失。

“那离婚也行，先生个孩子，生了孩子再离！”白志斌气呼呼地说。

“你这想法……”我简直不知道该说白志斌点啥了。

白志斌的母亲就是因为“留后”问题，与乔洁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急火攻心进了医院。我想白母也明白，一旦离了婚，就凭白志斌现在的条件，想再找个像乔洁一样的妻子基本就是做梦。

我决定再去找乔洁谈谈，一来这种事情不能偏听偏信，二来也看看双方关系还有没有继续协调的必要。

乔洁本不想和我深谈，做了一番工作后，她终于决定开口。

“我承认，我当初嫁给他的动机确实不纯。”乔洁不否认白志斌对她的指责。“但我就是个普通工人家的孩子，面对那种情况，我有选择的余地吗？”乔洁反问我。

“别扯什么‘普通工人家的孩子’，这么多普通工人，没见谁家孩子做你这种事儿。”我也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对乔洁把“普通工人”四字当成说辞很是不满。

“我做哪种事儿了？白志斌跟你说他家帮我转了正、提了干，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当初他爸妈是怎么逼我嫁给他的？”

白志斌倒真没给我说过这事儿。但仔细一想，无非是“等价交换”“大树下面好乘凉”嘛。难不成朗朗乾坤，还有书记给儿子“强抢民女”的事?

“我就知道他不会说……”乔洁嘀咕。

乔洁在进厂工作之前已经有了男朋友，是单位的技术员小沈，两人还曾是大学同学，乔洁选择进厂干“劳务派遣”，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和男友在一起工作。

白志斌的母亲私下里托人问乔洁时，乔洁明说“已经有男朋友了”。这并不能让白志斌放弃，他被乔洁迷得神魂颠倒，有事没事就去找乔洁“贴乎”。

男友小沈对白志斌的做法十分气愤，但对方是书记的儿子，自己只是厂里的一名小技术员，下不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决心，只好就这么忍着。

白书记虽然没有直接出面干涉过此事，但厂里的中层干部多次担任“说客”来“点拨”乔洁：“女人一辈子就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投胎，一次是嫁人，多少人想嫁进白家，你这傻孩子怎么这么不上道呢？”

“你说，那个小沈家也是农村的，家里全靠他这点儿工资支撑。你爸爸又有病，你俩结婚，这不是穷上加穷嘛！真要是跟志斌结了婚，你转正这事儿白书记能不管？正式职工的工资有6000多元哪，是你现在的三倍！”

也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乔洁：“你这种身份的职工，能不能继续在单位干下去就是白书记一句话的事儿。你要是不打算和志斌好，就做好走人的准备吧！”

“你说这不成了卖身吗？”乔洁想不通，自己只是想安安分分找个工作，照顾好重病的父亲，为什么要以婚姻作为代价。

即便如此，乔洁还是没有答应白志斌，反而和小沈商量着赶紧结婚，幻想着两人结婚之后，就能摆脱白志斌的纠缠。

然而，就在两人放出打算结婚的消息之后不久，单位人事处也发出了一个令二人始料未及的消息——技术员小沈调“援疆项目部”任用，为期五年。

两人都震惊了。小沈去找领导要求退出项目组，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要退出就辞职。小沈入职时与单位签订过最低服务年限合同，按合同规定，如果此时辞职，小沈需要向单位缴纳5万元的“违约

金”，并退还3万元的“培训费”，而这笔钱对于家境贫寒的小沈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乔洁想辞职和小沈一同去新疆，但无奈病父在家无人照料。一来二去，两人全无办法，只得抱头痛哭一场。

没过多久，小沈便随项目组去了新疆，临走前两人立下海誓山盟，约定等小沈休假回来，两人便去民政局领证结婚。岂料仅仅过了三个月，新疆那边就传来消息，小沈在一次野外测绘工作中不幸遇难。

“那个项目组所负责的项目危险系数很大，去的都是一些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同志。本来根本轮不到小沈所在的科室派人，就是派，也绝对不会派小沈这样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人去，但最后偏偏就把他派去了……”乔洁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你怀疑这是领导故意调走小沈，把你们两个分开？”我问乔洁。

“岂止是怀疑，我甚至觉得他的死都是一场阴谋！”

“这种事情不能乱说，你有证据的话可以去举报。”野外工作出现伤亡事故并不罕见，但小沈在那个关口出事确实比较敏感，然而是否关乎“阴谋”，不是哪个人凭空就能说的。

“就算不是阴谋，小沈这事儿他们家也脱不了干系！要不是他们授意把小沈派去，他怎么会出事？”

我也叹了口气。“那你后来怎么还要嫁给白志斌呢？”

“我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乔洁哭得更厉害了。

4

乔洁的父亲老乔以前也是这个厂的职工，不过早在1997年便已经“协解”（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原本的“协解”协议上规定原单位要负责

老乔等人的医保等事项，但实际上并没有人真正过问这些事情。

同批的“协解”员工为此四处上访、告状，后来单位也承诺为他们解决问题，但始终拖着，一直没有落实。此前老乔父女虽然着急，但想到“反正没解决的人那么多，单位终究会给个说法”。

但在2011年，老乔一场大病耗尽了家里所有积蓄，父女两人开始迫切希望单位能够赶紧落实老乔的医保问题。

“我家这边没有什么亲戚，我们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以前我爸为办医保的事情前后给单位交过一部分钱，当时我们就想着，要么单位能把他医保的事情赶紧落实，要么就先把之前交的那部分钱退回来，让我们去把医药费缴了。”

乔洁去了很多部门，但得到的大多是“知道了，回去等消息吧”“情况已经备案了，还在等上级通知”之类的说法。实在没办法，乔洁买了礼品去了一位分管此事的领导家，想让他帮忙照顾一下父亲的情况，快些把事情办了。

“那位领导是个好人，他没收我的东西，但告诉我白书记过问了‘协解’职工医保的事情，还亲自划定了一批要求‘尽快处理’的人员名单，可是里面并没有我爸爸的名字……”

“可能是白书记不了解你们家的情况吧？”我插嘴说。

“我们家的情况在工会是挂了号的，全厂都知道，他是主要领导，怎么会不知道？”

那位领导说只要白书记有批示，乔洁父亲的医保立马就能办，建议乔洁还是去白书记家里“坐坐”。虽然当时乔洁还没走出小沈遇难的阴影，但为了父亲，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白书记不在家，白志斌的母亲隐晦地告诉乔洁，白书记也很想帮乔洁父女渡过难关，可是老乔的情况“很特殊”，这批办不下来。但是，只要乔洁同意和白志斌“好”，白书记可以“担着风险”，让这事“特事特办”。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老白为自己亲家冒点‘风险’是应该的！”白志斌的母亲这样对乔洁说。

明知对方给自己下了套，但走投无路的乔洁为了父亲的医药费，带着一腔的怒火、怨气和绝望跟白志斌走进了民政局。

一旁做记录的同事气得摔了杯子。

“白志斌怎么不说这些事儿呢？刚才他要是说了，我非当场给他两个大耳刮子不可！”同事在一旁怒吼。

“他们一直以为给我爸爸落实了医保，又帮我转了正、提了干，让我过上了有车有房的生活，我应该感激他们，可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心里恨死他们了！”

“我爸爸的医保按照规定那是早该他们解决的，他们却把这个当成要挟我的筹码，他们怕我反悔，一直拖到我和白志斌领了证才给落实，医保办下来不到两个月，我爸爸便走了。”

“如果当初我和白志斌一样是正式编制，转正、提干这些我都可以靠自己工作干出来，车子、房子我也可以和小沈一起攒出来，根本用不着他们‘照顾’我、施舍我！”

“本来我有我爱的人，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他们为了给白志斌‘讨个漂亮媳妇’，愣是毁掉了我的生活……”

我愣愣地听她发泄，没办法接话。

“他们不是能一手遮天吗？苍天有眼，白老头终于‘进去了’，白家的房子、车子、存款该扣押的扣押，该冻结的冻结，我现在就是要和他离婚，让他们家就此一无所有，也尝尝绝望的滋味！”

“生孩子？让他做梦去吧！”乔洁最后说。

一个认为妻子应当“知恩图报”的丈夫，一个认为丈夫“报应不爽”的妻子，两个面面相觑的民警，这场调解看来是做不下去了。

“你看看笔录材料，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字按印吧，你们之后如果要打离婚官司的话，这些材料可能用得着。”我不愿劝乔洁和白志斌夫妻和好，也不好明说支持他们离婚。我们履行完自己的程序，其他该法院去处理的事情，还是交给法院去办吧。

5

不久，白志斌和乔洁以离婚告终。

离婚时，乔洁放弃了一切财产，离婚后又从单位辞去了工作，不久便去了外地，从此不知所踪。

乔洁和白书记一家的事情成了那个单位职工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骂乔洁不要脸，白书记在位时帮了她那么多，一出事她就要和白家撇清关系；有人说这是报应，白家多年来在厂里飞扬跋扈，现在活该家破人散；也有人感叹乔洁这姑娘城府太深，一直念着小沈，嫁进来是为了报复白家。

白志斌失去了“衙内”的地位，凭自己的条件又很难找到中意的媳妇，因此至今没有再婚，也很少在社区露面。

倒是白志斌的母亲，夏天经常在纳凉的人群中破口大骂乔洁：“这个小婊子，狗东西，吃干抹净看我们家不行了，拍拍屁股就走，连个孩

子都没给志斌留下，她把我们坑成这样，我以后就是做了鬼都不会放过她！”

纳凉的人群都乐得听个热闹，虽有人迎合着指责乔洁，但多数是在看白家的笑话。

一次，跟省纪委的朋友一起喝茶，我讲起乔洁的故事。朋友说，这个人他们知道。

我很是惊奇，刚想问他是如何知道的，但突然心中一动。

“难道说白书记的落马……”

朋友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笑而不答。

我的父亲是毒贩

2015年高考前夜，我和专案组同事一行人分坐在三台车里，在大雨中静待天亮。

贩毒嫌疑人王庆来被两名民警夹着呆呆地坐在后座，闭着眼睛，心中不知在盘算什么。车上很安静，只有雨点敲打车窗玻璃的声音。

五点钟，雨停了，我下车点了一支烟，驱赶一夜未眠的困顿。旁边车上的同事也下车伸懒腰，我们相视一笑，便又被各自的车长唤回到车上。

六点钟，已经有居民开始出门晨练或者过早（吃早点），有人看到我们三台车里坐满了人，大清早就停在楼前很是诧异。有几位老者上前想一探究竟，同事亮了一下警官证，示意他们赶紧离开。

七点多，一个女孩终于从楼梯口出来，是王晓晔。她身着校服，左手拿着水壶，右手拎着一个透明的塑料文件袋。

王晓晔是王庆来的女儿，此时，她似乎下意识地向我们这边望了一眼，后排的同事赶紧把王庆来的脑袋按下去。

我们在等这一刻，王晓晔要出发去高考了。

1

王庆来今年45岁，有八年的吸毒史。以前开过一家装修公司，辉煌过几年，后来染上毒品，公司慢慢荒废了。一年前，王庆来不知从哪里寻来路子，开始以贩养吸。

几年前，王庆来的妻子不辞而别，据说是跟王庆来以前的一个生意伙伴跑了。头几年还偶尔电话联系一下女儿王晓晔，后来便彻底消失。

老婆跑了之后，王庆来也不怎么回家了，女儿王晓晔独自料理自己的生活，俨然成了一个“孤儿”。

2011年，王庆来被送往戒毒所强戒（强制隔离戒毒）前，王晓晔来派出所给王庆来送衣物，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小姑娘。那年她虽是个读初中的小女孩，但脸上却带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

当时，王庆来家在我所管理的社区，由于王晓晔特殊的家庭情况，我和她的几任班主任老师一直都有联系。类似家庭中的孩子，很多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担心王晓晔，便联系她当时的班主任老师一同进行过几次家访。

开始时，王晓晔对我的到来很是畏惧，从不敢抬头说话。去的次数多了，双方就没那么生分了。王晓晔和同龄的小女孩一样，有着自己的小心事、小梦想，也有自己的爱好和喜欢的明星。但父亲王庆来一直是交谈的禁区，无论之前聊得多么愉快，只要话题扯到王庆来身上，晓晔便咬起嘴唇不再接话。

“这孩子命苦啊，怎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呢？”这是她初中班主任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每次家访结束后，我和班主任老师都会给她留下点儿钱，并嘱咐她把钱收好，不要让王庆来知道。毒品是个巨大的窟窿，王庆来毒瘾上来，难保不会打这些钱的主意。

后来我听说，王晓晔每次都会用小本子把我们给她的钱数记下来，班主任感叹：“小姑娘自尊心强得很，她这是打算以后还给咱们呢……”

王晓晔中考时，王庆来躲高利贷跑路去了外地，要账的马仔频繁上门骚扰。王晓晔在本地没有什么亲戚，我和班主任老师商量了一下，在派出所对面的宾馆给她开了一间房，晚上我负责给她“看场子”，白天班主任老师护送她去考试。

王晓晔很争气，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学校为照顾王晓晔的情况，还给她免去了高中三年的学杂费。王庆来自己都朝不保夕，更拿不出钱来供女儿生活，好在靠着周围人的接济，王晓晔磕磕绊绊地终于读到了高三。

王晓晔学习刻苦，性格温顺，在班里还当了班干部。别人不说，外人根本看不出她来自一个那样的家庭。

5月底，她的班主任杨老师告诉我，王晓晔最后一次模考进了全校前二十名，有望冲击武汉的名校。

“她打算考到哪里？”我问。

“照她现在的成绩，北清复南（北大、清华、复旦、南开）这样的名校有些困难，但去武汉的几所‘211’应该没什么问题。”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真替她高兴。

2

2015年6月6日，王庆来等人的贩毒案进入抓捕阶段，主犯王庆来在仙桃市被抓获，有情报称大批毒品被他藏在家中某处。当时我被抽调到专案组，正好参与了这次抓捕。

禁毒支队领导指示专案组带王庆来回家做毒品搜查，王庆来拒绝配合，在车上拼命挣扎，两个民警使劲才把他按在车后座上。

“王庆来这次完了，根据我们前期掌握的情报，这回的货估计够他在里面蹲半辈子了。”同事在车上悄悄告诉我。

凌晨三点，我们来到王庆来家。车外大雨瓢泼，不时滚过几声闷雷。辖区派出所的同事已经在门口等待多时。见到我们，一名派出所老民警拉住组长的手说：“有个情况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原来，第二天就要参加高考的王晓晔此时已经睡下，一旦我们进屋搜查，势必会惊醒她。

王庆来作为王晓晔的父亲一直是失职的，但谁也没想到他就连案发都赶在了王晓晔的人生节点上。

我们组长有些为难，贩毒案办到现在，现场搜查是固定证据的必由之路，但是一旦进屋搜查，按照规定王晓晔也必须起身配合民警工作。

通常情况下，毒品案件的搜查不会顾及这些，但今天情况有些特殊，王晓晔毕竟是个无辜的孩子，高考前夜目睹父亲被抓，不知会给她明天的考试带来多大影响。

为了稳妥起见，组长召集大家在王庆来家楼下开短会商量对策，希望把此事对王晓晔的影响降到最小。

我们决定先做王庆来的工作，用女儿高考的事情说服他带我们进屋，在尽量不惊醒王晓晔的情况下快速取证。换句话说，就是让王庆来自己把窝藏的毒品交出来。

我把王庆来从车里拽出来，向他出示了搜查证，问他："女儿明天高考？"

王庆来不置可否地看着我，憋出一句："好像是吧。"

他的心思常年在"出货"上，根本不记得女儿高考的事情。

"家里钥匙带了吗？"我问。

王庆来点点头。

"那你打开门，静静地带我们进去，把你藏的东西交出来。"

"我家里啥都没有，不知道你们要什么。"王庆来装傻。

“没有证据能抓你吗？赶紧的，你女儿天亮就要去考试，按正常程序搜查，你女儿这觉还睡不睡了？”我看他装傻有些生气。

王庆来不说话也不挪步子。他心思缜密，又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藏货非常有一套。他也知道，找不到家中的毒品，他所面临的惩罚就要轻得多。

“这也是给你个从宽处理的机会，你别有侥幸心理。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就按正常程序进屋搜查，到时候再搜出来，可就不算是你主动交代了。”

我的话似乎对他没什么作用。王庆来看看我，又抬头看看五楼自家的窗口，依旧一言不发。

凌晨三点多，整个居民楼一片寂静。

3

王庆来和我们僵持着，一口咬定家里没货，“不信随便搜”。

“既然不配合就别和他废话了，进屋吧！”组长一把拉起王庆来准备上楼，其余同事打开执法仪。

“等一下……”我真心不想现在上去把王晓晔吵醒，虽然王庆来不配合，但我还是拉住组长，希望还能有折中的办法。

“按理说孩子是无辜的，我也不想这时候把她吵起来，但现在连他爸都不配合，你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真就这样上去，万一，这孩子明天……”同事也很担心，但抓人之后的案件办理有时间限制，所以十分棘手。

组长听出了同事的意思，想了半晌。“要说不惊动她，目前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到明天他女儿离开之后我们再进屋……”

“那我们先带王庆来回去，反正现在离天亮也没几个小时了。”我说。

“不行，王庆来是在街上抓的，难说现场有没有走漏消息。万一他还有同伙没有归案，我们前脚走了，他同伙后脚来把货弄走了怎么办？”组长说。

“留一台车，我和派出所同事在屋外守着？”我建议。

“这天气？”组长指了指天。

“嗨，有车怕什么，一年不就这么一次嘛。”一位派出所的民警也说道。

组长又征求了其他几位同事的意见，跟领导电话汇报后决定：“要等一起等吧，案子办了那么久，也不在乎最后这几个小时了。”

“那程序上……”有同事担心我们的等待可能会有违执法程序，给将来证据上庭带来麻烦。

“真要出了问题，我扛了。”组长一字一句地说。

终于等到王晓晔离开，我们下车开始搜查工作。

临上楼前，组长最后一次问王庆来：“最后一次机会，自己交出来还是等我们搜出来？”

“我没有货，你们搜吧。”王庆来还是不松口。

王庆来家所在的旧公房不像其他吸贩毒人员一样杂乱，三室一厅，家具摆设虽然陈旧，但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王庆来长期不着家，一看便知是王晓晔打理的。

我们打开执法仪，带着王庆来从客厅开始搜查，之后是卧室、阳台、卫生间。知道王庆来很擅长藏毒，我们不敢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一圈找下来，家里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在衣柜里找到一个自制的“吸壶”和两小包冰毒之外，并没有其他发现，更没有情报中所说的“大批毒品”的影子。

专案组很着急，王庆来很得意，甚至故意卖弄：“抽屉里有烟，警官想抽随便拿。”

没有人动他的烟，民警们又铆足劲儿折腾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眼看已经过了11点，专案组民警已经整整24小时没有合眼，看实在搜不出什么东西，组长决定暂时收队，临走时吩咐民警把王庆来家收拾好，尽量恢复原样。

当天傍晚6点多，我接到王晓晔班主任杨老师的电话，杨老师说王晓晔哭着要找她爸爸，说怀疑王庆来被人绑架了。

听到这里，我只好实话实说，并请她帮忙做一下王晓晔的工作。毕竟高考还未结束，明天她还有两门考试。

杨老师在电话里长叹一声，挂断了电话。

4

由于没有搜出关键证据，王庆来当晚以吸毒被行政拘留。在去拘留所的路上，王庆来似乎有些得意。

6月8日，专案组开会，反复思考了整个办案环节，寻找哪里出了纰漏。同事挠着脑袋说：“我的特情员信誓旦旦地说王庆来的货就藏在家里，怎么就是找不到呢？”

有同事怀疑到王晓晔身上，毕竟那晚她自己在家。如果是她察觉到了我们，灭失了父亲王庆来的货，那么我们那晚无疑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事到如今，我心里一团乱麻。一方面痛恨王庆来的狡诈，另一方面也不愿相信那晚真的是王晓晔做过什么。

领导暂时没有深究专案组的责任，只是要求我们再把现有的资料梳理一遍。散会之后，我找到组长，他只是叹口气，交代我找合适的时机接触一下王晓晔。

晚上10点多，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材料，杨老师又打来电话，说王晓晔有事要见我。

我还没做好和王晓晔谈话的准备，想先推辞，但杨老师说她正在王晓晔家，最好今晚能见个面。王晓晔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当面说方便。

我只好跟同事交代一声，驱车前往王晓晔家。

见到王晓晔时，她正红着眼睛，伏在杨老师怀里，好像刚哭过。

王晓晔说，她要举报父亲王庆来吸毒。

以前王晓晔从不跟我聊关于她父亲的事情，第一次主动提起来，不知预示着什么。

我对王晓晔说，王庆来目前已经因吸毒被我们拘留，让她别想太多，考完试放松一下。

想起组长的要求，我便又装作不经意地问了王晓晔一句："平时有没有见过你爸在家藏过什么东西？"

"见过。"王晓晔点点头，我心里一震。

"我之前看到我爸半夜爬窗出去，把一个塑料盒子放在了外面。"

说着王晓晔把我领到卧室窗边，我从窗户里探头出去，旧公房的顶楼外墙上有一条从楼顶直通楼下的雨水管道，上面有一个大漏斗。

我猛地一激灵，因为那个位置不在房间里，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在里面藏东西，因而在搜查过程中被我们忽略了。我不禁检讨之前的搜查行动，同时赶紧向组长汇报。

专案组收到消息，带着王庆来回到家中。王庆来依旧是一副无辜的表情，直到我们把他带到主卧室的窗户边上。

民警当着他的面从雨水管道的漏斗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塑料打包盒与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用保鲜袋和避孕套包裹着的毒品。

“真他妈不要命，这么高，绑着绳子我腿都发抖。也真有你的，大半夜的敢爬上去放货。”那位爬出窗外取货的民警冲王庆来吼道。

王庆来身体一颤，随即一屁股坐在地上，汗水从额头上流下。

5

“其实那晚我也一直醒着，直到天亮。”后来王晓晔告诉我。

那晚，虽然我们没有上楼，但之前王庆来曾答应她当晚会回家，第二天陪她去考试，这让王晓晔十分兴奋。虽然长期以来都是自己一个人打理生活，但面临人生中的重要时刻，18岁的王晓晔还是需要亲人的陪伴。

然而，“嗨”完“冰”的王庆来早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当晚在仙桃被抓时，他正盘算着一会儿应该去哪个夜场“散毒”。

王晓晔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王庆来的电话打不通，她每过一会儿就爬起来，去窗口看看父亲有没有回来。

就这样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当王晓晔再度从窗口向外看时，发现一群人正裹挟着父亲，好像在讨论着什么。

自从王庆来染上毒品后，来找他的人五花八门。有“道友”、有毒贩，也有高利贷派来找父亲收账的“小弟”。

那帮人或是神经兮兮，或是凶神恶煞，有时还会对晓晔动手动脚。王晓晔不知道来的是哪一伙人，吓得缩在床上，一直熬到天亮。

没想到我们自以为是守护的等待到底还是吓到了她。

尾声

王庆来最终交代了犯罪事实，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贩卖、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管制器具罪，故意伤害罪等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5年7月底，王晓晔以文科574分的总成绩被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

凭什么要我管我妈

作为基层民警工作至今，我曾面对过形形色色的人群，工作自然力求平静客观，可内心难免会有波澜。

辖区王桂芝老人家的院门上一直挂着一个“五好家庭”的牌子，可如今，每当我走到这块牌子下面时，都会忍不住冷笑。

同事问我笑什么，我说：“这牌子还是改成‘五好保姆’更贴切。”

“为什么？”

“雇主不用给保姆养老啊！”

1

2014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位独居老人倒在家中地上，叫不开门，怀疑是出了意外，请求民警帮助。

老人叫王桂芝，74岁，家住辖区一栋老公房的一楼。我和同事到达现场后，120急救车已经在门口了。

“晚上我到王嫂子家串门，她家卧室亮着灯但没人开门也没人回应。我心里觉得不好，就让孙子翻院墙进去看看怎么了，结果孙子出来之后说从窗户里看到王奶奶躺在地上呢……”一位邻居急切地说。

社区里住着很多独居的留守老人，之前也发生过几起老人突发疾病在家中过世，直到遗体发出味道才被人知晓的事情。为此，社区专门在留守老人之间成立了邻里互助社，每天互相见面报个平安。今天便是同组老人报的警。

我和同事决定自行破门而入。老人还活着，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声音十分微弱。120医生紧随我们进屋，简单抢救了一下便把王桂芝抬上救护车。

我向邻居们打听王桂芝亲属的联系方式，可几个子女的电话号码没有一个能够打通。

我有些诧异，呼叫指挥中心要求帮忙查找。

过了好一会儿，指挥中心才回复说，已经联系上了她的女儿，但对方称自己离医院很远。指挥中心命我和同事前往医院，等待王桂芝的家属。

来到医院时，王桂芝已经被送入急诊手术室抢救。见我们来了，护士不断地催促我们，赶快把王桂芝家属找来签字。

我只得把从指挥中心要来的王桂芝女儿的电话交给护士。没一会儿，护士气呼呼地从办公室出来，劈头盖脸地冲我吼道："哪儿有这样的家属？祝她出门就被车撞死！"

我和同事更诧异了。护士告诉我们，王桂芝的女儿是联系上了，但她现在拒绝前来，理由是"大哥大姐都还没到，我不能一个人去"。

"她啥意思？"同事问护士。

"她要求我们同时通知她的大哥大姐，不能让她自己来签字，说她做不了这个主！"

"什么叫做不了这个主？"

"说白了是费用问题。人是你们送来的，还是你们去协调吧。"说完护士又急匆匆进了手术室，留下我和同事两人面面相觑。

2

直到当晚王桂芝被护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我们也没能把她的孩子们找来。

“她家人呢？”护士不满地问我们。

“老大老二联系不上，老三不来。”同事无奈地回应道。

“她说不来就不来？你们怎么不去把她抓来？”

“你说抓就抓啊？我们这不还在医院陪着嘛？都是干工作，你冲我们发什么火！”同事有些窝火，怼了回去。

护士气呼呼地推着王桂芝往病房走，我和同事跟了进去。

经过一番抢救，王桂芝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告诉我们，王桂芝本身患有高血压，右腿以前出过车祸，还没恢复利索，另外心脏也不太好。今天可能是在屋里不慎摔了一跤，把以前的伤腿又摔断了，自己又爬不起来。幸亏发现得及时，不然大冬天就这么在冰凉的地板上趴一晚，到不了明天人就没了。

“她的家属呢？不是说联系上了吗？现在到哪儿了？”医生问我们的还是这话。

我只得又解释一遍，医生听了摇摇头走了，临出门前还小声骂了一句：“畜生！”

王桂芝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她的另外两个孩子，本以为这事就算是解决了。

一天，医院报警称有人逃费。我和同事赶过去，远远就听到住院部办公室里有人叫骂。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我要报警！我要报警！”

“我们已经报警了，你别嚷，这是在医院。”

走进办公室，一个中年女子坐在办公室沙发上，身旁站着两名医院保安。见我们来了，女子大声呼救：“警察同志救命，他们要绑架我！”

“怎么回事？”我问现场人员。

“她就是王桂芝的小女儿，刚刚和她大哥大姐在病房里打了一架，把我们的心电监护仪都干到地上了……”

“那俩人呢？”

“打完跑了。她也想跑，被我们拦下来了。”“怎么回事？”我又转头问王桂芝的小女儿。

“我没钱！”她答非所问。

“先不说钱的事，为什么在医院打架？”

王桂芝的小女儿不说话，坐在沙发上咬牙切齿。

原来，今天王桂芝老人非要出院，医生和护士拗不过她，便通知了她的孩子过来办一下出院手续，结一下医药费。然而，三人到场之后，却因医药费归属问题起了冲突，拉扯中还把老人病房里的心电监护仪摔坏了。大哥大姐一看事情不妙便抽身离去，住院部的医生护士只来得及拦下了小女儿。

我让一名护士带我去病房看看摔坏的设备。走进病房，护士指了指依旧扔在地上的心电监护仪，“你看，我们没敢‘破坏现场’，机器还在地上呢，摔坏了，价值5万多呢……”

我没有顺着她的指引去看心电监护仪，而是将目光留在了王桂芝老人身上。老人呆呆地坐在病床边上，手里攥着一个旧手帕，静静地抹

泪。她身旁放着一个红色的、鼓鼓囊囊的购物袋，里面应该是住院的一应生活用品。

我想上前安慰她几句，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护士问我摔坏的心电监护仪该怎么处理，我从肩膀上解下执法记录仪递给她，让她去把摔坏的地方拍个照。

王桂芝老人抬头看看我，嘴唇动了一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我坐到她身边。“老太太，先别想别的，身体要紧。”

老人没有反应，依然在抹泪。等了一会儿，她伸手去购物袋里摸索，我以为她要找东西，赶紧帮忙。摸索了一会儿，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又从小布包里找出一把钥匙。

“警察同志，麻烦你件事儿。”

“嗯，你说。”

“我走不了路，求你带我回趟家，我去拿点儿钱……”

“拿钱做什么？”

王桂芝没说话，又开始掉泪。

3

王桂芝是用自己的“养老钱”结了医院的医药费，又替孩子们赔了损坏的心电监护仪。医院方面听说是老人自己拿钱，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只收了她3000块钱的押金，说拿去修一下，维修费超了就算了，用不了的话再把多余的钱退给她。

我和同事把王桂芝送回家，想再联系她的三个孩子前来照顾，三个人虽然嘴上答应，但始终不见人来。

好在互助社的几个老邻居出面说他们可以先帮忙照顾一下，我又交代社区和居委会多关注一下王桂芝。“切，你们就该把她家那三个畜生都抓起来！”居委会的干事气不过。我只得在一旁苦笑。

“说来也奇怪啊，以前他们家还是‘五好家庭’，门上有牌子的，孩子特别孝顺，有几年还作为社区的敬老爱老典型宣传过，现在怎么闹成这样了。”

我追问原因，居委会干事说具体原因她也不知道，让我有机会亲自找王桂芝问问。

2015年年关的一次社区家访，我记挂着王桂芝，便抽出一个下午专程去了趟她家。

王桂芝的身体还在恢复中，依旧下不了床。互助组的老邻居们也一直在轮流帮忙照顾。我感慨了几句，一位老邻居赶紧不好意思地说，住了几十年的邻居了，孩子都不在身边，谁都有遇到事儿的时候。

我试着把话头引到孩子的问题上来。王桂芝却不想多谈，只是一个劲儿解释说孩子平时工作忙，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老邻居听不下去了，气冲冲地打断了王桂芝的“自责”。

“都啥地步了，你还维护那几个小兔崽子？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

王桂芝想阻止，但老邻居直接就说开了。

“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妈老了，没得用了，榨不出油水了，成累赘了，所以这就都不上门了……”

王桂芝年轻时随丈夫从四川调来本市，丈夫去世前是一家国企职工，按照当时的政策，王桂芝也在这家企业干“家属工”。

三个孩子长大后相继结婚生子。1998年，大儿子的儿子出生，彼时王桂芝已经“内退”，在家中承担起帮大儿子看孩子的工作。

2004年，大孙子上小学，王桂芝本以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但这一年大女儿的孩子出生，婆家又远，看孩子的重任又落到了王桂芝身上。

“那个时候她家里不断人，大孙子大外甥女都跟着她，三个子女更是天天围着老太太转。尤其是逢年过节，热闹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邻居家很多孩子在外地的，过年都回不来，看着她家的‘人气’，别提多羡慕了！”

“王嫂子七十大寿那年，他们一家人包车去海南岛旅行，这事儿在我们这里无人不知。”

“这不挺好吗？子女给老人过生日，还花钱包车出去旅游，怎么现在连门都不上了？”我有些诧异。

“好是好，但你得看是花谁的钱……”邻居笑了。

4

王桂芝退休之后，在帮子女带孩子的同时，还在一所中学门口租了一个铺面，开了家小卖店，平时卖些文具百货，中午还兼营“小饭桌”，每月算下来收入不菲。

三个子女工作都不太好，收入有限，王桂芝不但没有跟子女要过“养老钱”，反而谁家需要用钱了，她都会毫无保留地赞助。三个子女守着这位“财神妈”，自然贴得近。七十大寿那次全家海南之行，也是王桂芝满心欢喜自掏的腰包。

2009年，小女儿的孩子出生了，王桂芝“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看孩子的任务。可就在2013年夏天，王桂芝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路上出了车

祸，虽然没碍着性命，但腿上却落下了残疾。

年老体衰的王桂芝在医院躺了三个多月，其间赶上城管局在市里拆违建，小卖部生意也就停了。

出院后老人由于身体状况没法继续给子女们带孩子了。没了小卖部的收入，每月只剩下不到一千块的退休金，平时自己也需要打针吃药，经济上自然不太宽裕。

开始时三个子女还轮番来家里伺候腿脚不便的母亲，然而过了不到一年便出了问题。

当时车祸的肇事方赔了王桂芝一笔钱，王桂芝原打算把这笔钱作为自己的“棺材本”，但矛盾却因此爆发了。

那时候，小女儿还没有正式工作，孩子也小，王桂芝觉得女儿生活不易，便从赔偿金里拿出一些钱来，悄悄地塞给了小女儿，但这件事不知怎么就被另外两个孩子知道了，这便起了矛盾。

“她那个小女儿也忒不是东西，跟她大哥大姐说：‘妈把你们两个的孩子带大了，你们俩都省事儿了，现在该带我儿子了，出了这事儿带不成了，我得花钱雇保姆，这个钱是不是该从那个赔偿金里出？’你说这是人话吗？”邻居气呼呼地说。

先是大儿媳生王桂芝的气，不让老太太的大儿子来了；后来大女儿说工作忙也不怎么上门了；最后连最该来照顾王桂芝的小女儿看那笔赔偿金花得差不多了，也借口大哥大姐不来自己也不来，消失了。

“唉，说句不好听的，王嫂子一开始有钱又能帮着带小孩，大家都争来抢去的，现在钱没了，不但不能带小孩了，还需要旁人照顾，那几个畜生全跑了……”

王桂芝始终没有反驳老邻居的话，靠在床沿上又开始落泪。

“实在不行……你要愿意的话，我帮你找个律师吧……”警察没有强制子女赡养老人的权力，我在权责之内没法帮她太多，只能劝她逼不得已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王桂芝听我这么说，赶紧摇摇头说：“不用不用，没到那个地步……”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话，咋叫‘没到那个地步’？你还想到哪个地步？”老邻居当即质问道。

“孩子们真是都忙，都忙，不是故意的……”王桂芝喃喃道。

5

出了王桂芝的家，老邻居也向我抱怨：“你们还是尽快联系一下她的子女，你看我们这些人也是老胳膊老腿的，平时也就帮着看看，养老这事儿哪能全靠我们呢？”

的确，互助组里前来帮忙照顾王桂芝的也都是老人，作为邻居，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把王桂芝的情况通报了居委会和街道办，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找王桂芝的子女，开展一下工作。可过了不久，居委会就反馈说工作开展不下去。

居委会先联系了王桂芝的小女儿，对方一听这事儿，当即就在电话里骂他们“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再联系大儿子和大女儿，得到的结果也差不多。

“老三说了，凭什么大哥大姐不伺候偏叫她来伺候，她没钱也没空；老大老二说了，家里三个子女，谁拿了王桂芝的赔偿金谁伺候……”

我想把王桂芝的三个子女约到一起谈谈，但三个人都推说自己忙，不来。我找到了王桂芝小女儿打工的地方，那里其实距离王桂芝家只有

三条街的距离。小女儿看实在躲不过，不得已答应和我谈几句。

一开口，她就向我描述自己目前生活的困顿，表示自己对赡养母亲王桂芝一事“有心无力”。

“因为你穷，就不打算管你妈了？”

“老大老二都不管，凭什么就让我管？”

“你妈拿她的车祸赔偿款补贴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没给老大老二你也不要？”

“凭什么不要，我妈把他们两家的孩子都带大了，他俩都没操什么心。到了带我孩子的时候出事了，现在我还得每月雇保姆照顾孩子，这个钱我找谁要去？”

“我就问你一句，你妈现在在家里躺着，你到底管还是不管？”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凭什么就叫我管！”

一连三个“凭什么”，我实在没压住心头的怒气。“这话你也说得出来，真他娘的畜生啊！”我忍不住骂了一句。

“你骂谁畜生！你骂谁畜生！你警察了不起啊！你敢骂我，我要去告你！”

“去告吧，看法官骂不骂你！”我气愤难耐，扭头离开了。

6

2015年初春时节，王桂芝的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因为心脏和血压的问题，她还需要不定期地去医院打针。其间派出所和居委会又找过她的子女好几次，但依旧如此。

王桂芝每月只有不到一千块钱的退休金，为了节省开支，她只去社区诊所打针。有时在路上遇到，我总是劝她去打官司，让三个子女出些赡养费，王桂芝却总是摇头。

7月的一天，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诊所发生了一起老人非正常死亡事件，家属带人把诊所围了，让我们赶紧出警。赶到现场之后，我在围堵诊所的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王桂芝的三个孩子。

下车、开执法仪、走进人群，有人喊道：“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把这个草菅人命的浑蛋拉出去枪毙了！”

我抬眼一看，是王桂芝的大儿子。他见我看他，连忙拉住我要讲述他的“冤情”。我推开他的手，径直走进诊所。看到王桂枝平躺在一张病床上，打了一半的吊瓶挂在架子上，身边放着上次在医院见她时的那个红色购物袋。

“怎么回事？”我转头问诊所老板，一名退休大夫。

“估计是心脏病突发，瞬间人就过去了，诊所抢救了一番没辙，等120来了，人已经没了……”

“之前知不知道她有心脏病？”

大夫点点头。

“本来我也不想让她来我这儿打针，但我这儿离她家最近。不也是看她孤苦伶仃的，一瘸一拐走路不方便，又没有家属照顾，这才可怜她让她在我这儿打针。医药费还欠着一部分呢，我都没好意思开口要……”

“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家属？”

“她自己说的啊，之前我还问过她怎么总是一个人来打针，她说她老伴去世得早，自己也没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会儿门口来了这么多人……”

“娘啊，你死得好惨啊……”门外传来王桂芝儿子、女儿们的干号声。

尾声

后来，经过市卫计委、公安局法医和武汉某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共同工作，对王桂芝的家属出具了死亡鉴定意见书，结果是心源性猝死，非医疗事故。虽然诊所无责，但诊所医生实在受不了王桂芝子女的反复骚扰，主动提出四万元的“人道补偿”，派出所几经劝诫无效，只得沉默。

双方交钱的地点就定在派出所报案大厅，诊所医生说报案大厅里有视频监控，也可防止王桂芝的子女“反悔”。

我不愿再见这家人，便让同事在一楼看着，自己回了二楼办公室。

坐了一会儿，楼下传来喧闹声，紧接着腰间的对讲机里传来同事的喊声：“快下来几个人，打起来了！”

我心里一惊，以为王桂芝的家属和医生打起来了，赶紧往楼下跑。跑到楼下，却发现诊所医生已经不在现场，打架的竟然是王桂芝的孩子们。

“王八蛋，上次钱的事儿你还没说清楚，这次你又想拿……”

“你才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王八蛋，多吃多占……”

为了那四万块钱的“人道补偿”，王桂芝的大儿子、大儿媳，大女儿、大女婿，小女儿、小女婿六个人竟然在派出所报案大厅里打作一团。

“把这几个狗日的都给老子抓起来！反了天了，就忍不到回家分钱了吗？敢在派出所里就动手，一个也别放跑了……”

带班教导员的怒吼声从一楼值班电台里传来，估计有同事给他汇报了情况。教导员平时一向温文尔雅，从来没听过他用“狗日的”三个字骂人，看来这次真是火了。

在场的同事们早已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一拥而上……

儿子要杀我，

这不怪他

1

2015年1月的一个凌晨，派出所的值班电话骤然响起，一位老妇人在电话那头声嘶力竭地喊：“救命啊，快来人啊！我儿子要杀我！”

光是听声音，我们就知道又是辖区“黑老大”郭强的母亲，这时候打电话，八成又是郭强在家里犯病了。

到了现场，家里门户大开却不见人影。我和同事走进屋，郭强正拿着菜刀疯狂地砍着自家卧室的房门，砍一刀，骂一声，踹一脚。

见我们进了屋，郭强二话不说抡起菜刀就迎了上来，我和同事急忙躲闪。好一番纠缠，菜刀才被同事夺了下来，人也被我用约束带绑了按在地上。

郭强在地上拼命挣扎，干瘦的身躯爆发出惊人的蛮力。

“这人估计又吸‘果子’了，不然不会这个点犯病。”同事边说边掏出止血带，他的右臂刚刚被菜刀划了一道口子。

过了好一阵，卧室的房门才从里面被打开。郭强的父母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我抬头一看，老郭一瘸一拐的，母亲王金丽则用手捂着脑袋，指缝里有血流出来。

“要不要紧，赶紧去医院包一下。”我赶忙说。

王金丽却顾不得自己头上的伤口，蹲在被我们绑在地上的儿子旁边，一边看一边埋怨：

“手上绑得太紧了，勒到他了，松一下吧……”

“地上有水，凉，你们快把他搬到床上去……”

同事不满地瞪了王金丽一眼。“就他这架势，刚才我可以一枪打死他！”

“使不得使不得，他有精神病……”王金丽赶紧辩解，但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地上的郭强。

郭强还在地上挣扎，嘴里不停地喊打喊杀。汇报了情况之后，上级要求连夜将郭强送往县精神病院，可却被王金丽拦住了，她坚持要送郭强去本市二院精神科暂时治疗。

“郭强有医保，送县精神病院也用不着你们拿钱。”我以为王金丽担心县精神病院费用高。

“不行不行，县精神病医院的大夫太坏了，用电棍子电人，那边的伙食也不行……”

无奈，我们只好联系二院。

二院的值班医生一听是郭强，直接在电话里拒绝了我：“不行啊警官，我们精神科就几个女同志，治不住他。我们可以派医生过去，帮你们送他去县精神病院。”

王金丽不满地嘟囔了几句，最后不得不同意我们连夜将郭强送往县精神病院。

2

从县精神病院出来，已经是早上六点。

“我估计用不了一个星期，王金丽就会把郭强接出来，不信咱走着瞧！”返程路上，同事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说。

我深以为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三个月前，郭强吸毒后突发精神病，在辖区学校门口拎着棍子手舞足蹈，被学生家长和学校保安一同扭送到派出所。

那时候，也是我和同事一起，叫二院精神科的医生把郭强送去了精神病院。本来医院要求郭强至少要完成三个月的治疗，但三天后便被王金丽接回了家。

一个月前，郭强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开山刀，挥舞着在小区里乱跑，同事出警又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但不到一个星期，又被王金丽接了出来。

我质问王金丽，但王金丽总是满面愁容地向我诉苦：“精神病院的日子苦啊……”

“可你儿子有病，得给他治啊！”

“在家治吧，在家也能治，不就是吃药嘛，吃了药就好了……”

每次把郭强接回家王金丽总会再三向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管着他，绝对不会再出事。”

但郭强的事就从来没有停过。

虽然王金丽也管儿子，但无奈已年过七旬又身患疾病，生活能够自理就已实属不易。精神病儿子正当壮年，一旦犯病，老两口根本控制不住，反而时常遭到痛打。

“我这个月出王金丽的警已经五次了，都是被郭强打，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们老两口会被郭强打死。”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前脚把人送去精神病院，她后脚就把他接出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都被儿子打成这样了……”我感慨道。

“切，郭强落到现在这个境地，少不了他妈的‘功劳’！”同事不屑地回答我。

3

郭强生于1973年，翻开档案，密密麻麻的全是他多年的“光辉历史”。

32岁之前的郭强劣迹斑斑，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敲诈勒索，让他在辖区“声名显赫”。

19岁时他就是黑道数得上名字的“人物”了；24岁时他带着一帮“小弟”垄断了市里一半以上酒店、大排档的酒水业务；2003年，30岁出头的郭强开始涉足高利贷行业。他拥有名车豪宅，曾号称身家千万。

32岁开始郭强“试水”海洛因。之后的10年，31次治安或行政拘留、8次劳教、3次强制隔离戒毒、数次精神病强制送医。直到最后，公司垮了，“小弟”散了，老婆跑了，自己也疯了。

“你看看这张照片，能认出他就是现在的郭强吗？”同事从档案里抽出一张郭强20年前的照片指给我看。

那是一次郭强因聚众斗殴案件被抓获后在派出所留下的“登记照”，照片上的郭强膀大腰圆，目光凶悍。那个曾“叱咤风云”的“黑老大”和眼前这个又黑又瘦、目光呆滞、精神错乱的“废么子”（废人）完全是两个人。

“这和他妈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那关系可大着呢！”

33岁才得了郭强这个独子，王金丽把儿子宠得不像样子。

郭强的父亲老郭当了一辈子石油工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参加“会战”，郭强从小就跟着母亲王金丽一起生活。

中学时代的郭强就是学校里的“扛把子”，带着一帮“志同道合”的小兄弟，在同学之间到处收“保护费”。

对于儿子的所作所为，王金丽是知道的，但奇怪的是，她并不认为郭强这样做有问题。

退休教师刘汉生是郭强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一提起这个学生，刘汉生便不住地摇头。

那时候郭强就和一帮社会人员在辖区饭店里吃“霸王餐”，被老板抓住，可几个人不但掀了桌子，还出手把老板夫妻打伤了。店老板认出了郭强，报案后和派出所民警找到了学校。

刘汉生通知王金丽来学校处理，可王金丽到了学校，先是怪店老板报警“坏了儿子的名声”，又怪刘汉生“不去维护自己的学生”，最后不但拒绝配合学校和派出所的工作，还砸了学校会议室的玻璃。

刘汉生无奈通知了远在陕西“会战”的老郭，老郭千里迢迢赶回来，这才压住了此事。那时候郭强还没成年，最后只是向店老板赔礼道歉，并配合派出所抓了那几个一同打砸饭店的社会青年便罢了。

但刘汉生没想到，就这件事，还给自己惹来了一屁股麻烦。自那时起，王金丽竟然记恨上了刘汉生，隔三岔五地便去刘汉生家里叫骂，足足坚持了一年。

到后来，郭强在本地“混黑”出了名，王金丽对此还颇为骄傲。

徐富强是王金丽上班时的领导，头上至今留有一块三厘米长的伤疤。2002年，徐富强因王金丽长期不来上班，停了她的工资，很快，郭强便带人在下班路上截住了徐富强，给他一顿暴打。事后郭强虽被派出所抓去拘留，可王金丽却在单位“豪迈”地宣扬，“谁再敢惹我，徐富强就是例子”。

2004年，郭强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公安机关追逃，派出所希望王金丽能规劝郭强来投案。但得到消息后，王金丽不但没有规劝郭强，反而安排他逃往外地“避风头”。郭强被抓回来后，王金丽也因包庇罪被判了半年。

4

在染上毒瘾之前，郭强对王金丽极为孝顺。

辖区有几栋“处长楼”，原是某国企专门为单位处级干部建造的福利住宅。在本市人眼里，能住进“处长楼”就是“混得好”的象征。后来，这批住宅楼被放到市场上销售，虽然房型好、环境好、位置也好，但由于售价很高，鲜有人问津。

王金丽就是第一批住进“处长楼”的人之一。

“那时候王老太太出门穿金戴银，强子不但给他妈买了房，后来还买了车，又专门安排一个‘小弟’去给他妈当司机。”陈九江是郭强的发小，“拜把子”的兄弟，曾为郭强立下汗马功劳，也因此为自己换来了四年的牢狱之灾。“强子疯掉之前，孝顺他妈是有目共睹的。”

“他妈就不关心你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吗？”我问陈九江。

“王老太太从来不管这些，反倒是强子他爸很生气，没和他妈一起搬到‘处长楼’里，一直还在以前的老公房住着。”

2003年是郭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32岁的郭强染上毒瘾，“事业”急转直下。

按照陈九江的说法，彼时的郭强“有钱有势”，正准备“洗白”自己，为此还开了公司打算做正当买卖。那时陈九江也刚刚出狱，本打算继续跟着郭强干，但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九江发现郭强吸毒。

“一开始是吸白粉，时间一长，就开始注射，也不管生意了。他有几个‘小弟’原本和我一样，打算跟他走‘正道’的，一看这架势，便都散了。”

“他妈也不管？”我问陈九江。

陈九江摇摇头。

“管不管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强子几次因吸毒被抓，都是在他妈住的‘处长楼’那里。”

为了防止便衣民警进小区排查，郭强还在保安队里安排了两个“小弟”，专门负责通风报信。

“那套房子呢？”

“听说后来卖了吧，还有王老太太的车和那些金银首饰什么的，钱都让强子拿去吸毒了。”

“哪怕看在钱的分儿上，也得管管儿子吧。”

“管了，哪能不管！王老太太看强子毒瘾上来那么痛苦，也确实想管儿子，但她一出手，直接把儿子‘管’疯了……”陈九江哂笑道。

5

王金丽的办法的确让人哭笑不得。

2008年，郭强败光了家产，一家人又搬回了以前住的老公房。此时郭强的经济条件已经无法负担他的毒瘾。看到儿子毒瘾来袭时满地打滚的惨状，王金丽心疼万分，后来居然不知从何处听来一个法子——用冰毒戒海洛因。

“之前王老太太找过我，问我有啥办法能让强子不那么难受，我又没吸过毒，哪知道什么法子。听说后来她又去找了六子，六子吸毒，可能是他告诉王老太太的吧。”

的确有一些海洛因吸食者会用价格便宜且反应不那么强烈的冰毒来戒断海洛因，但这种方法无疑也是饮鸩止渴。因为冰毒及其副产品“麻古”所带来的“心瘾”，会直接伤害吸毒者的脑神经，吸到最后人就疯了。

果然，改吸冰毒之后郭强的身体确实没有那么痛苦了，但很快精神就变得不正常了。

“你怎么不劝她送郭强去戒毒所呢？”

“怎么没劝过，老太太怕强子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她是一刻都离不了儿子的人，哪会同意……当时强子为了筹毒资，老太太是要钱给钱、要首饰给首饰，即便到了卖房子的地步，老太太也是二话不说就搬回了旧公房，生怕强子受一丁点儿委屈……”

等王金丽开始意识到要给儿子戒毒时郭强已经成了重症精神病人，根本没有戒毒所愿意接收他。即便是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也需要去精神病院控制住他的病情后才能执行。

郭强彻底成了一颗“定时炸弹”，王金丽便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不知为何，郭强只要在家中犯病，首当其冲就是殴打王金丽。王金丽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报警，强行送郭强去精神病院，没两天再去把人接出来，然后再犯病。

如此不断地反复至今。

6

不出所料，没过一个星期我就又遇到了郭强。他就坐在马路边晒太阳，身边是头上依旧缠着绷带的王金丽。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反倒是王金丽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开口解释：“警官你看，他已经好了，不打人了。”

郭强抬起头，傻乎乎地看看我，估计是药劲儿还没下去。

“看好他，不要让他再碰‘果子’，也不要让他的那些吸毒的朋友再来找他！”

王金丽点点头。

三天之后的一个清晨，我按例接班，发现夜班同事一个个两眼通红，面带倦色，似乎一夜未眠。问他们怎么了，一个同事表情复杂地告诉我，昨天夜里郭强又犯病了，他们刚刚从县精神病院送人回来。

“这他妈不是折腾人吗！去告诉王金丽，再这样把郭强接出来，以后出了事让她别再找警察！”我气冲冲地对同事说。

“不用了，估计这次没人接郭强出来了。”同事淡淡地说。

原来，昨天深夜郭强在家发病，疯了似的要往外跑。王金丽夫妇上前阻拦，神志不清的郭强顺手抡起了家里的椅子，直接砸在了王金丽的头上。父亲老郭见势不妙报了警，等同事们出警赶到现场时，郭强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王金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120急救车拉走了王金丽，同事们找了两个小时才逮到郭强，连夜送去了精神病院。

“王金丽怎么样了？”

“在总院ICU呢，还没来得及去看……”

到了总院病房，老郭正坐在楼道里抹泪。我问王金丽的情况，老郭说她颅骨骨折，颅内出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算是万幸抢救过来，以后也可能变成植物人。

“郭强那个畜生呢？”老郭问我。

“已经送精神病院了……这次必须让他治完整个疗程！”我有些担心老郭，不知他是不是也和王金丽一样。

“接他？这次就让他死在里面吧！”

尾声

再次见到王金丽已是半年之后了。

十年前，王金丽走在路上，街边的商户们都会恭敬地喊她一声“王姨”，不是因为她的人缘好，而是因为儿子郭强是本地有名的“黑老大”。

如今，半身不遂的王金丽被老伴用轮椅推着走在路上，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看，这就是‘黑老大’他妈，被儿子打成了傻子。”

“碰瓷”者的下场

2017年8月，“老赖”张得胜在市养老院孤独离世，至死都没有收到属于他的几十万交通事故赔偿款。有人说他可怜，遇到了如此可恶的老赖；有人说他活该，遇到了比他还赖的老赖。有人问我信不信“报应”，我只能笑笑说：“我是警察，我信法律。”“那你从法律角度，跟我讲讲张得胜的事？”“他这或许真是报应……”

1

“警官啊，我们确实没有赌博啊。能不能麻烦你，放我们一马啊……算我求你了。”

“是啊是啊，你们老来搜查，客人们吓得都不敢来了……”

一天晚上下班后，河西社区几家饭店的老板把我约到一家酒店的包间吃饭。菜过五味，店老板们一个个堆着笑脸对我说。

“真没组织赌博？”我盯着他们问。

“真没啊。也没这个必要啊！”

最近正值小龙虾上市，一桌虾宴连菜带酒能赚四五百元，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摆几十桌，傻子才会在饭店里“开场子”（组织赌博）。从包间窗户向外看，楼下停车场的确停满了车，店门口的“休息区”坐满了排队等位的客人。

正说着话，手机响了，指挥中心的同事说，又接到报警称有人在饭店包间里聚赌，所里值班人手不够，让我加个班到现场去看看。

“哪个饭店？”

“××饭店。”

“我就在××饭店吃饭，哪个包间？”

“208。”

我走到门口，一把拉开包间的房门。一家老小正在里面用餐，根本没有人“聚赌”。见到陌生人进来，一家人疑惑地抬头看着我，我借口走错房间，退了出来。又到其他几个包间查探了一番，也没有发现报警电话中的“聚赌”情况。

很显然，又是一起假警。

2013年夏天，有段时间派出所经常接到匿名报警，称河西社区的几家饭店里有人“聚赌”。出警到达现场，几经盘问搜索却根本没有发现有人“聚赌”。

有好几次客人们正吃得高兴，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闯进门来，要求所有人站起来配合调查。客人们被搅得不欢而散，事主也不敢冲警察发火，只能把火气都撒在饭店老板身上。有人要老板“送菜”，有人要老板“敬酒”，有人要“免单”，还有借着酒劲要“赔偿”的。

饭店老板怕丢了客源，只好忍气吞声。但警察频频上门，时间一长，客人们便不愿再去那几家饭店消费。

饭店老板们忍无可忍，联合起来到公安局信访处告状，说警察胡乱执法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告状材料转到督察支队，督察支队要求指挥中心做情况说明，指挥中心找出接警电话录音。“不是我们找碴儿，确实是有人举报啊。”

当然，报警电话录音不能向酒店老板们出示，但又对公安局的答复不满，请我们吃饭也是万般无奈之举。

正巧，就又遇到了报假警。

2

“你们最近得罪谁了吧？”回到包间，我问几个店老板。

几个人面面相觑，都说自己和气生财，没和人有过“过节”。

其中一个店老板突然说，最近张二球找过他，让他每周交100元“管理费”，被他拒绝了。话刚说完，其他几位店老板也纷纷点头，说自己最近也和张二球打过同样的交道。

“啥管理费？”我有些迷糊。

“他说是替社区民警收的，我觉得有诈，就把他轰走了。结果从那以后，你们便经常来抓赌，我们还以为……”饭店老板小心翼翼地看着我说。

我明白了，顿时火冒三丈，再三说明绝对没有收过所谓的“管理费”，同时让几个店老板第二天一早去派出所说明情况。

第二天一早，几个店老板来到派出所，我通知张二球过来。张二球不肯，我只好吓唬他不来就强制传唤。等到10点钟，张二球才很不情愿地出现在我面前。

“张二球，你去人家饭店收管理费了？”

张二球矢口否认，没等我说话，旁边的一个店老板就火了，冲着张二球吼：“没有？你要点儿老脸行不行，我前台有监控，你来要钱的视频都录在里面！”

还真有人给张二球交过管理费，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今收到×××本期治安费100元，张得胜（张二球名字）。”

“这怎么说？你都给人打条子了？”

张二球不说话，站在那里装愣。

“把你手机交出来！”我想起报警电话的事情，要过张二球的手机，通话记录里赫然出现了几个公安局报警指挥中心的号码。

我没说话，把张二球单独带进办公室，暗地让同事联系指挥中心核实他手机上的通话记录。过了一会儿，指挥中心回复说举报赌博的就是这个号码。

“你报的警？”

张二球沉默。

“你看到他们饭店里有赌博的？”

张二球沉默。

“说话！”

“没有，我猜的……”

“你他妈缺不缺德？顶着警察的名义找人家收管理费，不给钱就报假警骗警察去冲人家生意，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什么性质？”

张二球索性一屁股坐在地板上，称自己心脏病犯了，要去医院。

“别跟这儿装！去把钱退了，不然现在就把你拉回去收监！”

半年前，张二球因诈骗被刑事拘留，后来因为身体有病，现在正在取保候审阶段。

3

张二球是我的“老熟人”，本名张得胜，快80岁了，膝下无儿无女，家里只有一个瘫痪的老伴。

张得胜年轻时也有过工作，20世纪70年代因“打砸抢”被判了刑，工作就没了。1983年“严打”又被送去新疆改造了10年，回来之后就一直混着，靠捡破烂为生。

“以前二球是个宝啊！”一位快退休的老同事戏谑地说。老同事刚工作那几年，派出所每年还有“拘留指标”。只要盯住张得胜，当年的“拘留指标”肯定能超额完成。

“都犯些啥事儿？”

“年轻的时候厉害，敲诈勒索判过，故意伤害判过，耍流氓也判过，年纪大了没那精神了，也就偷个东西、碰个瓷、耍个赖啥的搞点钱花，还去当过几次医闹。”

过了75岁，张得胜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法律上所规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群体，加上自己身体有病、家里的瘫老伴没有自己之外的监护人，犯起事来更有恃无恐。

平日里，张得胜常骑着捡废品的三轮车满大街转悠，看到挂外地牌照的汽车开过来，就赶忙上去“贴乎”。一碰上就顺势倒在地上要求“赔钱”。外地司机怕惹事，一般都会给。张得胜也不怎么计较数额，三十五十、三百五百，只要给钱就行。

两年前，张得胜把农机所几间没人住的危房私自上了锁，“租”给别人开“晃晃馆”（麻将馆）。农机所来拆迁，他就把瘫老伴放到房子里要“补偿”。拆迁队不敢硬来，又气不过，站在房子外面骂他。老伴虽然瘫了但也不傻，知道张得胜拿自己当枪使，躺在房间里骂他。

张得胜老伴原本有一套单位安置的旧公房。一年前，张得胜在屋外搭了一个窝棚，和老伴搬了进去，把旧公房转租给两位失足妇女。同楼

的邻居受不了天天晚上各色的“牛鬼蛇神”出没，闹到了居委会，居委会又告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抓了失足妇女后，居委会就和张得胜老伴的原单位一起要把旧公房收回。张得胜二话不说，背起瘫老伴就住进了居委会，居委会没辙，只得又把旧公房还给他。

半年前，几个假药贩子在辖区偷偷开了一家“诊所”。张得胜不知怎么搭上了线，专门负责去医院拉那些外地患者去诊所看病。凭借着那张老脸，张得胜还真骗来不少人，结果很快东窗事发，张得胜因诈骗被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待了没几天，张得胜便借口心脏病和瘫老伴无人照料，办理了取保候审。周围邻居对此意见很大，但也没有办法，只能背后偷偷骂他“好人不长寿，王八活千年”。

我去找张得胜做工作，劝他“这么大年纪了，收敛一点儿”，张得胜苦着脸跟我说自己真缺钱。

张得胜的确不宽裕。虽然有低保，老伴也有退休工资，但由于老伴瘫痪在床，每月需要一定的开销，加上张得胜特别喜欢打麻将，只要有一点儿钱就会跑去“晃晃馆”打牌，手里根本留不住钱。

这次又闹出“管理费”这一出。

4

管理费风波平息没多久，张得胜又出现在了派出所。

2014年年初，张得胜捡破烂过程中看到一辆货柜车正在给超市送货，便顺手从货柜车上“捡”了两箱白酒，被超市保安当场抓住，扭送进派出所。

在派出所，张得胜可怜兮兮地说，自己经济太困难了，希望我们能帮帮他。我还真帮他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张得胜名声在外，仓库老

板好不容易才同意雇他，每月1000块钱工资。张得胜千恩万谢，我也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结果没过半个月，仓库老板就把张得胜辞了。我去问原因，老板说，张得胜竟然趁夜里值班的时候偷仓库的东西拿出去卖，被逮个正着。

我气得不行，要去抓张得胜，仓库老板反倒拦着我。“算了算了，这老东西报复心强，抓进去也判不了多久，出来以后再来给我使坏就麻烦了。”

找到张得胜时他还在“晃晃馆”不出来。我质问他为什么偷东西。“缺钱嘛，一个月1000块钱哪里够用？他那么有钱，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老头子嘛。”

从那以后，我一听到他的事就头疼。

此后，还真是好久没有张得胜的消息。

“这老头儿凭空消失了？”我问同事。

“真要是凭空消失就好了，只怕又在暗地里搞什么幺蛾子吧。”

虽然他不惹事我确实轻松了不少，但转念一想，上次的诈骗案还没了结，他还在取保候审阶段，我还有责任看着他。

打电话给居委会治安干事，治安干事却告诉我：“张得胜出事了，在医院躺着呢。”我问出了什么事，治安干事说是被大货车轧了。

“严重不？”

“蛮严重的，应该达到重伤标准了。”

“怎么回事？”

“唉，说他啥好呢？自己给自己惹麻烦……”

原来河西社区与318国道接壤的地方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停车场，往来的大货车司机常在那里停车过夜，张得胜“敏锐”地发现了里面的“商机”。

那段时间张得胜没事就在停车场里转悠，一看到有大货车准备发车便靠上去，只要接触上张得胜就立即顺势倒地，要求货车司机赔钱。

大货车起步时车速通常都很慢，张得胜也不会真受伤。遇到厉害点儿的司机，就骂他一顿轰走，遇到怕事或赶时间的司机，多少会给他点儿钱打发了事。

张得胜转悠了半个月，前后碰了十几次，讹了几千块钱，但还是在一天早晨出事了。

5

那天早晨，张得胜“碰瓷”的时候被货车司机发现了，司机骂了张得胜几句。一般情况下张得胜不会还嘴，但那天早上大概司机骂得难听，张得胜便不依不饶，和司机对骂起来。

司机进了驾驶室要关门走人，张得胜还晃晃悠悠地围着驾驶室转着圈骂，结果正巧旁边另一辆货车司机发车时走了神，没注意到走到自己车旁的张得胜，一发车就把他撞倒了，一侧的车轮随即从他的腿上轧了过去。

十几吨重的货车把张得胜双腿轧得血肉模糊，送到医院后医生看了一眼就说腿保不住了。

“老家伙，‘碰瓷’真把自己碰进去了……”交警队的同事感叹道。

到了医院，张得胜正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见到我竟老泪纵横，我以为他是疼的，他却不停地喊“冤”。

“事情已经发生了，保重好身体，等事故责任认定下来之后对方该赔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不知说他什么好，只好说了几句套话。

听我这么说，张得胜更激动了。“我冤啊，那个撞我的王八蛋连医药费都不给我交……”

张得胜说，他在医院躺了这么久，肇事方的家属不但从没露过面，连医药费都没给垫付，医院就快给停药了。

我有些诧异，打电话问交警队同事，同事告诉我张得胜真是可怜，这次遇到“老赖”了。

肇事司机赵小五，39岁，是一个比张得胜更“孤独”的人。

张得胜至少还有一个瘫痪的老伴，但赵小五至今未婚，父母早亡。原本有一个姐姐，但几年前因父母遗产问题两人闹掰，姐姐远嫁东北，从此再无音讯。

赵小五卖了父母留下的两间破房子，又从银行贷了一笔款，买了辆货车跑运输，平时吃住都在车上。

“他一点儿财产都没有吗？先把医药费垫上啊。”我问同事。

“本来就是个滥赌鬼，自己非但没有任何财产，还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办过几张信用卡搞网络赌博，都刷爆了，欠了银行一屁股债。车贷逾期好久，车都快被银行收回去了。”

“那保险公司呢？”

“嗨，别提了……”

三个月前赵小五因醉驾被外地的交管部门吊销了驾驶证，这次是偷偷上路，正好出了张得胜的事故。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只在交强险范围内给张得胜垫付了一万多元的医疗费。

交警队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了赵小五，让他赶紧联系亲戚朋友给张得胜凑医药费，但赵小五只有一句话："没钱，该坐牢坐牢。"

交警队没辙只能告诉张得胜自己先想办法筹款，然而他自己也没什么存款，费尽周折只凑到了不到三万块钱的医药费。

"我们和医院打过招呼了，让他们先治着，但医院那边同不同意还另说。之后具体的事情由法院来判吧，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交警队也很无奈。

挂了电话我把事情告诉张得胜，让他先想办法尽量筹点钱把伤治好，之后再去和肇事司机打官司。听了我的话张得胜又悲又怒，躺在床上大骂肇事司机"畜生"，这关口我也不好说他什么，只好先由他发泄。

6

张得胜还是挺了过来，但是他的右腿没了，左腿也短了3厘米。

司机赵小五无证驾驶，被判全责。张得胜的事故医药费、伤残补偿等一系列赔偿款总共将近60万元。然而，除了交强险起初垫付的1万元医疗费和后期赔偿的12万元之外，保险公司拒绝承担其他赔偿款项。好在医院给张得胜减免了部分医药费，使那笔钱勉强支付。对于后期的赔偿，司机赵小五拿不出一分钱来，也坚决不同意想其他办法凑钱。

"反正我都这样了，你们判我多久我都认了，但我现在就是没钱赔，也不会去借钱！"法庭上赵小五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张得胜一再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赵小五的财产，但法院查了一圈，发现赵小五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张得胜原本也寄希望于法院对赵小五名下的大货车进行扣押和拍卖，结果法院一查，那台车是赵小五贷款买的，因贷款逾期已被银行收回。

赵小五最终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顶格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张得胜却难以获得任何赔偿。

法院能做的只有要求赵小五出狱后分期履行张得胜的赔款。

得知消息张得胜气得痛哭不止。“他就是个‘癞子’啊！我今年都八十了，还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啊！”

虽然之前对张得胜意见很大，但这起事故中他毕竟是受伤者，我私下里也找有专业背景的朋友帮忙咨询，看是否有办法帮张得胜多少争取点儿赔偿金。

朋友看了张得胜的材料，摇摇头说，这种情况他也没辙，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法院说的那样，让张得胜好好活着。同时盯紧赵小五，发现他有了财产马上向法院报告。

我只好无奈苦笑。

尾声

张得胜在医院住了半年，其间之前的诈骗案判决书生效，张得胜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一年。因为身体问题无法收监，直接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

张得胜出院后由于生活无法自理，也和瘫痪的老伴一样，被送进了市养老院。开始时经常跟我打电话，询问赵小五的情况和自己的赔偿金问题。我只能劝他安心在养老院住着，一有消息就通知他。

后来，张得胜的电话越来越少，可能连他自己都对此事不抱希望了。

2017年8月，我正在省城参加学习，同事打电话告诉我张得胜去世了，临终都没有闭上眼睛。居委会刚刚代替他的亲属来派出所办理了销户手续。

“他的赔偿咋办呢？”

“放心吧，赵小五跑不了，放出来以后接着赔，张二球的老伴还活着呢。即便以后老伴也没了，公安机关还要继续替张二球找赵小五追偿。”

“为啥？”

“老家伙之前的那起诈骗案还欠着受害者赔偿款呢！”

谁骗了谁的婚

2014年春节后的一天，派出所报案大厅里乱成一锅粥。双方10多人不断地拉扯叫骂。

“她个婊子就是骗婚！”年轻男士指着站在对面的女孩吼道。

“放屁！你说谁是婊子？要说骗婚，你才是骗婚！”女孩的妈妈毫不示弱地回击，身边的两个亲戚更是跃跃欲试。

双方队伍里的几个人都撸起了袖子。

我和同事见势不妙，赶紧站到两拨人中间。

“哎呀，有话好好说，都是亲戚。”同事唱红脸圆场。

“都住手，别在派出所里给自己惹麻烦！”我唱黑脸警告。但双方仍剑拔弩张，如果不是隔着民警，又要打作一团。

1

吵架的是两口子。年轻男士叫迅生，两年前，在一次相亲活动中与杨楠相识，迅生英俊潇洒，杨楠青春靓丽，都到了适婚年龄。两人一见钟情，相处不久便见了彼此家长，没过多久就领了结婚证。

两个人的婚礼在市里唯一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举行，豪车开路，羡煞不少旁人。可仅仅过去一年多，两个人便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离婚就离婚，好说好散不行吗？怎么还打起来了？”我把迅生父子请进办公室。

“她个婊子骗婚啊，诈了我们家十几万不说，还动手打人！”

“怎么个骗婚法？”

“结婚之前她家说杨楠是‘黄花闺女’，连恋爱都没谈过，结婚之前碰都不让我碰一下，结果呢？”说着，迅生甩给我一份病历，我草草翻了一下，只见诊断结果上写着“不孕症”。

“啥意思？说明白点儿！”

“还怎么说明白？不孕！习惯性流产！这是‘黄花闺女’？”迅生的父亲在一旁嚷嚷起来。

这种事情我们也不好评价，只能处理双方打架的事。

“你们两家人在私底下商量着解决就行了，至于在街上打架吗！嫌知道的人少不是？”同事劝迅生。

“商量，还商量啥？就是离婚啊！当时我那彩礼钱可是他们家以‘黄花闺女’的名义骗去的，现在是不是要退给我？”

迅生说，当年和杨楠订婚时，杨楠的母亲要了迅家十五万七的彩礼钱。其中十万七代表着“十万里挑妻”，图个口彩，另外五万则是因为杨楠是“黄花闺女”，这是“出闺钱”。

“去法院打官司吧，法院说能退就一定能退，说退不了就肯定退不了，打架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回迅生。

迅生却低下头，小声说他已经找律师问过了，律师说这种情况属于“赠予”，离婚退彩礼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你还闹个什么劲？”我有些同情迅生，但法律规定了的事情，不行就是不行。

“忍不下这口气啊，这不是找我当‘接盘侠’吗？”迅生愤愤地说。

2

26岁的迅生俨然一副“富二代”的模样：身穿“范思哲”，手持Gucci钱包，腰上扎着LV皮带，脖子上还挂着一根将近一指粗的金链子，座驾是一台40多万元的路虎极光，抽着100元一盒的“黄鹤楼1916”。

“一日夫妻百日恩，算了吧，再说你差那十几万吗？”既然双方争执的焦点就在那十五万七的彩礼钱上，律师也说讨回的希望不大，我也只能试图劝说他想开点儿，放弃算了。

迅生说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据他调查，杨楠婚前至少处过六任男朋友，在武汉读大学期间还“跟”过一个跑物流的“老板”，做过三次人流，已经无法生育。这些事情杨家早就知道，但婚前向他隐瞒了实情。

结婚之后，迅生父母急着抱孙子，不断地催促迅生和杨楠要孩子。但杨楠一直不肯怀孕，三个月前终于怀上了，但没过多久就大出血流产了，杨楠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迅生这才知道妻子婚前的秘密。

“和我结婚之前，她和上一任男朋友也都处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就是因为她生不了孩子，丑事曝光了，人家才甩了她的，所以婚前她碰都不让我碰一下……”迅生还在滔滔不绝。

“行了别再扯别的了，警察对你们那种事不感兴趣。去打官司离婚吧，这个钱法院怎么判就怎么办。”迅生还要接着说，我急忙制止。

“她家就认钱，房子、车子、家电、装修这些都是我们家出的钱，婚宴摆了六十桌，花了十几万，份子钱却全让她妈拿走了。本想给儿子娶个漂亮媳妇，结果却当了‘绿毛龟’，再不把彩礼钱要回来，你说这口气我们怎么忍！”迅生的爸爸在一旁听我劝迅生“算了”，十分不满。

迅生父亲的打扮和儿子差不多。他在武汉开了一家公司，一年有上百万元的利润，也算本地的一位“名人”。此前我们在片区走街串巷，邻里对迅生父亲的一致评价是“酒量好”“路子多”“好面子”，但对他的财力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有钱得很，“从武汉过来都是奔驰和专职司机”，但也有人说他喜欢“装”，其实就是个打工的，没多少钱。

通常来说，对于婚姻中的彩礼问题，各地往往依据风俗习惯来定，而离婚时彩礼是否要退，只能由法院进行判定。法律条款中所规定的离婚退彩礼情况大致只有三种：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二是虽然结婚但双方没有共同生活，三是彩礼造成给付一方生活困难。但迅生和杨楠的情况，似乎跟这三条都不沾边儿，见迅生父子纠缠不休，我只好向他们解释了一下法条。

“照你这么说，我们家这个亏就吃定了？”迅生父亲问。

“你们请个好律师，让律师给你们出出主意吧。”

迅生父亲显然对这样的答案不满。“我把话放这里，如果这个钱她们家不退了，我这边绝对没完，让她们一家人走着瞧！”他狠狠地说道。

“别跟警察这儿抖狠，你家迅生也问过律师了，这个钱要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你们爷儿俩又不缺这点儿钱，何必呢？”

迅生和父亲都默不作声，是无声的拒绝。

3

留下同事继续劝说迅生父子，我走出办公室找到杨楠一家，试图核实一下情况，再帮忙协调一下。

杨楠家两个亲戚已在争斗中受了伤，去了医院。杨楠母女坐在报案大厅等亲戚回来，我把二人领进了调解室。

杨楠不想谈，做了好一番工作，杨楠的母亲才勉强同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对于女儿的这场婚事，杨楠的母亲也满腹怨气。

杨楠父母早年离异，她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杨楠母亲没有正式工作，一直四处打工，好在杨楠颇为争气，大学毕业后考进了本市的一家事业单位，端上了“铁饭碗”。长得漂亮，工作稳定，杨楠身边一直不乏各种追求者，其中也有不少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男孩。单凭个人条件，杨楠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

由于之前忙于生计，杨母并不清楚女儿在武汉读书期间的感情经历，三年前杨楠因无法生育被前男友家退婚后，母亲几经盘问方才得知了实情。对于女儿的所作所为，杨母气得大病一场，住了一个月医院。

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恨女儿不争气，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就这么“砸在手里”，杨母便寻思着，怎么帮着女儿顺利地把婚结了。

自己离婚后吃了半辈子苦，过够了拮据的生活，杨母自然想让女儿嫁个家世背景和经济条件都好的老公，但又担心如果对方条件太好，婚后得知女儿不孕不育的实情，接受不了女儿的过去，最后难免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谁不想让女儿嫁个好人家享福，说实话，我一开始确实就是看上了他们家的家务条件（经济条件）不错，这也没啥不能说的吧！”

结婚之前，迅家称已经准备好了160平方米的婚房，还承诺婚后就给小两口买辆好车。在外人眼里，迅生的父亲在武汉做生意，开的是奔驰，迅生在烟草公司上班，工作也不错，有车、有房、有生意，这让杨楠的母亲放了一半心。

恋爱时的迅生对杨楠百依百顺，要啥买啥，随叫随到，还说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会照顾杨楠一辈子，这更让杨楠母女彻底放下心来。

“他家‘家务条件’这么好，看上你家女儿什么了？”我忍不住问杨楠的母亲。

“还能看上她啥，长得好看呗！”杨母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你就不担心他家知道了杨楠的身体情况之后变卦？”

“唉，说不担心是假的，我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嘛……”

一方面，杨母带着杨楠不停地穿梭于各大医院，看是否能够通过治疗或调养让女儿恢复生育能力；另一方面也告诫女儿，“脑袋聪明一点儿”，结婚之前千万别让迅生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当时想着女儿一边治疗，一边调养，结婚之后缓几年要孩子，估计身体也就养得差不多了。一旦生了孩子，以前的那些破事儿就都过去了。退一万步说，他家‘财大气粗’，之后万一离了婚，女儿也能有点儿‘保障’嘛……”杨母没有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女儿是这种情况，为啥还找那借口跟人家要五万块钱？”

“那个……”杨母想了半天，没有想出合理的解释回答我，只好叹了一口气，不再理会这个问题。

“现在事情已经曝光了，你看怎么办？”我继续问杨母。

“还能怎么办？想离婚就离呗，反正我们早就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杨母讪讪地答道。

4

既然杨楠母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看时机差不多了，便提出了迅生父子退彩礼的要求，试着征求一下杨楠母女的意见。

“退钱？门儿都没有！他们家说我们‘骗婚’，他们家就那么清白吗？我们家这要是骗婚，他们家那就是‘诈骗’！”没想到一提钱，杨母的怒气全被激起来了。

我有些诧异，不知杨母口中迅生父子的“诈骗”从何而来。

“他们爷儿俩穿的‘人模狗样’，整得像多有钱似的，结果一结婚就露了馅儿。”

杨母说，结婚后她们母女才慢慢发现，迅生的父亲并不是什么“武汉的老板”，只是武汉一家公司老板的司机，开回家的奔驰也是老板的。

至于迅生，既不是“富二代”，也并非他自己口中所说的“烟草公司正式职工”，他确实在烟草公司工作，但只是一名高中都没毕业的临时工。

“可是迅生身上的穿戴和开的车都在那儿摆着啊？”

“假的！全是贷款！各种贷款加起来一共一百多万哪！”

迅家用来结婚的160平方米的“婚房”其实是租来的，迅生身上的范思哲、LV、Gucci和屁股下面的路虎极光都是贷款买来的。迅生一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康家庭，却把自己演绎成了“豪门”。

“结婚之前你们都没有深入了解一下吗？”

杨母叹了口气，女儿和迅生从认识到结婚一共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自己当时被迅生一家的外表和说辞迷惑了，另外也是急着把女儿嫁出去，担心夜长梦多，所以没怎么深入了解就答应了婚事。

“不瞒你说，杨楠自己是这种情况，我也是担心时间拖得久了再出变故，所以……”

结婚之后，迅生无法再隐瞒自己的家世，在妻子和丈母娘面前露了馅儿。

得知真相的杨母几乎被气炸了，原想帮女儿“嫁入豪门”，求个衣食无忧，没想到却被迅生一家给忽悠了。本就憋了一肚子火气，一直想劝女儿和迅生离婚，但又迟迟下不了决心。

恰在此时，迅生却发现了杨楠的秘密，跑到杨家大闹了一场，并提出了离婚。对于离婚，杨家并无二话，但听迅生说要讨回当初结婚送给杨家的彩礼钱时，双方立刻发生了争执。

“房子是租的，车子是贷的，家里的一应东西都拉着银行的‘饥荒’，女儿白跟了他一年啥也没得到不说，即便离了婚，弄不好还要帮着他们家还贷款！你说我凭什么再把那些钱退回去！”说到这里，杨母气得拍起了桌子。

和女婿话不投机，杨母叫来几个亲戚把迅生赶出了家门。站在楼下，迅生越想越窝火，也喊来了本家亲戚。两方亲戚见面以后没说几句便动上了手，纠缠中两边亲戚都受了伤。

“定亲的时候，迅生他爸把条件说得那么好，结果闹了半天全是假的，害得我女儿白白成了‘二婚’不说，还落下一‘傻帽儿’的名声！”杨母越说越气。

“你也别说人家，当初你们不也想着忽悠人家来着……”我忍不住呛了杨母一句。

“谁家的女儿谁家疼，无论孩子做过什么，总归是我的孩子，我就是想帮孩子嫁个好人家，这有错吗？”杨母不满地反驳道。

5

回到迅生这边，父子二人还在办公室里生闷气。

两人并没有否认杨母的说法，迅生的父亲还说，自己低头弯腰做人一辈子，就想趁儿子娶媳妇的当口驳个“面子”，谁承想上了人家的当。老迅脸上表情复杂，有懊恼、有疑惑，还有愤怒。

作为三十年前第一批辞去公职“下海”的人，老迅在武汉打拼了大半辈子，但事业却并不顺利。跑过销售、开过工厂、倒卖过二手车，虽然赚到过一些钱，但远称不上发财。

后来，生意破产赔光了本钱，老迅只得在武汉找了一家公司当起了专职司机，一干就是八年。爱面子的老迅从来不肯在老家人面前吐露实情，有时朋友问起他的生意来，也总是含糊其辞地说，“也没干啥，就是瞎忙”。

老迅说的也算是实话，但越是这样，旁人越觉得他有钱，这么说不过是谦虚。加上老迅每次回家都是开着老板的奔驰，人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老迅在武汉发财了。

老迅也乐得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三十年前辞职下海时，身边的朋友同事就质疑过他的选择。如今，当年的同事大多在单位有所成就，老迅更不愿让自己显得混得不好。在省城奋斗了半辈子，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至少在外面闯荡过一番，不能被那些依旧留在老家的亲戚朋友看扁了啊。

独生子迅生是老迅的心肝宝贝，也是老迅经济实力在老家人面前的“直接体现”，因此，无论自身经济情况如何，老迅总是尽可能满足儿子提出的各种要求，努力把迅生“包装”成一个别人眼中的“富二代”。

迅生相亲前，老迅就做足了打算，准备按照当年老板娶儿媳妇的套路也在老家“火一把”，有个别了解老迅底细的朋友劝他“还是实在点儿好”“玩大了当心收不了场”。老迅却坚定地认为自己走南闯北见过大场面，可以“摆得平”这事儿。尤其当听说杨楠是单亲家庭时，老迅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孤儿寡母，家里没个出主意的，真就出了啥事儿，还能闹上天不成？”

“你这不是坑人家闺女吗？哪有你这样娶儿媳妇的？”我又忍不住呛了迅生父亲一句。

“女人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定下了，还能为了这个跑了不成？”老迅喃喃地说。

我摇摇头，不知该说什么。

6

最终，迅生和杨楠两口子在派出所便达成了离婚协议。我和同事本还打算试着说和一下双方，但两人一致回绝了我们的调解，出了派出所便直奔民政局。

对于那十五万七的彩礼钱，杨家答应退给迅家十万块钱，条件是此后迅家的贷款、外债和杨家再无半点儿干系。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两家亲戚也都瞒不住了。

得知真相之后，亲戚们都觉得脸上挂不住，怕事情弄得满城皆知，纷纷表示就这样算了，打架的责任也不再追究了，两边的人都默不作声地离开了派出所。临走时，老迅和杨母先后向我抱怨，这个世道骗子太多，孩子以后再结婚，一定要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口径倒是出奇的一致。

要命的熊孩子

1

2014年4月的一个下午，派出所辖区内的一所小学报警，称学校的教导主任王慧斌在办公室被学生家长打了。

出警到达现场，学校领导和保安正与一个老头激烈地交涉着。办公室书柜上的玻璃碎了一地，王慧斌不知去向。老头插着腰站在办公室门口，怒气冲冲地要求在场校领导“把王慧斌那个王八蛋交出来”。

老头姓张，73岁，在市机械厂当了半辈子副厂长，虽然退休多年，但周围人依旧习惯喊他“张厂长”。此前，我和这位张厂长打过很多次交道，都是因为他的孙子张东东。

彼此都是熟人，所以直入主题，我问现场的双方究竟为了什么事儿。

果然，张厂长说，张东东昨天被王慧斌打了，哭着回家向他告状，他是来找王慧斌替孙子出气的。

我问东东挨打的原因，张厂长激动地冲我吼了起来：“还用问么斯（什么）原因？老师打学生就是不对！那个姓王的一直针对东东，我早就想来收拾他了！”

听张厂长这么说，同事有些生气，想上前理论。我了解张厂长的脾气，拍了拍同事，示意他不要冲动。

“王主任人呢？”我问站在一旁的学校领导。

“在二楼语文组躲着呢……”一位学校领导本想悄悄告诉我，但还是被张厂长听到了，他二话不说就要往楼上冲。我急忙上前拦住，让同事在楼下先拖着他说话，然后跟学校领导去找王慧斌。

找到王慧斌时，他脸上、胳膊上带着伤，正躲在语文组办公室里屋。见我来了，他一边迎上前来问："那人走了没得？！"一边眼睛警惕地向我身后扫视。

我忍不住揶揄他："你这堂堂一米八五的教导主任，怎么被一老头子吓成这样！"

王慧斌苦着脸说："我哪敢跟他动手啊，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工作还要不要了！唉，惹不起就躲呗。"

"今儿为啥事儿闹得这么厉害？你打人家孩子了？"

王慧斌给我讲述事情的经过：昨天三年级二班的一名学生向他告状，说新买的文具盒被同班的张东东抢走了，自己还被打了。王慧斌叫来班主任去教室找东东，东东自己不承认，但班上的同学纷纷做证说看到他抢文具盒并打人了。

王慧斌只好和班主任一起，把东东带到办公室，批评了他一顿，让他回去把文具盒还给同学并向同学赔礼道歉。东东在办公室满口答应，但一回到教室便拿着同学的文具盒，把它扔到了女厕所的大便池里。

王慧斌十分生气，在班里当众训斥了东东，还用教学用的木头尺子打了他的手，并让他把家长叫来谈话，赔偿同学一个新文具盒。

今天下午，东东果真叫来了爷爷，只是没承想，老头是来找王慧斌"算账"的。张厂长见面就质问王慧斌为什么打东东，话没说两句，便把办公室的凳子抡了起来。王慧斌左躲右闪挨了几下，实在不愿在办公室和学生家长动手打架，急忙跑了出去。好在旁边办公室的老师听到动静赶了过来，拦住了拎着凳子追打的张厂长，并通知了学校领导和保安。

"老头说'早就想收拾你'，你俩以前是不是有什么梁子？"我想起张厂长在办公室门口的话，抬头询问王慧斌。

“我跟一学生家长能结下什么梁子？还不就是因为他家孩子的事情！”

王慧斌说，东东在学校里比较调皮，时不时会和同学打架，下手还挺黑。他因此“收拾”过东东几次，让张厂长很是不满，几次来学校处理孙子打架的事情时，双方言语上也发生过冲突，估计这次张厂长是“新仇旧恨”，一起来找自己“算账”。

“他家孙子打伤了同学，从来连句关心别人的话都没有，要是感觉自己孙子吃了亏，那老两口能从学校大门一直骂到教学楼里。”

“今天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征求王慧斌的意见，毕竟他是受害人。

“还能怎么处理？道歉、赔偿、依法处理！教室和我办公室都有监控，从我叫张东东来办公室到他爷爷来打我，录像里都有，不怕他不认！”

“身上的伤要不要紧？先跟我去医院看看。”我看到王慧斌身上的伤，建议他先去医院看一下。王慧斌点点头，跟着我去了医院。

2

带王慧斌验完伤回到学校办公室时，张厂长脸上怒气未消。我问同事谈得怎么样，同事不屑地回了我一句：“跟这老家伙没法谈，他非要学校开除王慧斌，还要赔偿他孙子的医药费。”

开除王慧斌的这个要求着实过分，学校断然拒绝，但学校也退了一步，同意付医药费，因为王慧斌确实动手打了东东，学校领导这边也想息事宁人算了。

双方又争执了半天，最后学校无奈答应，让王慧斌给东东道歉，同时要求张厂长就今天的事情向王慧斌道歉。

随后，张厂长回家拿了昨天带孙子去医院检查的缴费凭据交给学校，一看检查项目和金额，学校领导立马炸了。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CT、核磁共振、心电图、肝功、肾功啥的全都查了一个遍，光检查费用就三千多，这不是扯淡吗，木尺子打手用得着去拍脑CT、测肝功肾功吗？这不是讹人吗？！”

“他们说就打了我家东东的手，是不是真的我怎么知道？孩子那么小，万一被打出什么内伤来，现在看不出来，以后落下病根儿怎么办！”张厂长理直气壮。

“你以为老师都是武林高手啊？还打出内伤来！那你再跟我说说，心电图是啥意思？”我问。

“怕孩子心脏吓出毛病来。”

“那血液五项呢？这也用得着查？”

“不放心嘛。”

我直截了当地划掉了五分之四的检查项目，张厂长不满地冲我嚷嚷，扬言要去投诉我。我明确告诉他，不必要的检查项目不能作为索赔依据，告到公安部也是这么个结果，张厂长这才悻悻地住了口。

回头处理王慧斌被打的事情，我和同事打算带张厂长回派出所追究责任，学校领导却劝我“尽量低调处理”。我又问王慧斌的意见，他见学校领导表了态，也没再提“依法处理”，只是不情愿地点点头说：“那就算了吧，毕竟我是学校的老师，别为这事儿再给学校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听王慧斌这么说，我瞪了他一眼。既然当事人都不再追究，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只好随了他们。

3

张东东是张厂长唯一的孙子。

张厂长膝下两儿两女，大儿子和两个女儿生的都是女孩，只有小儿子给他生了这一个孙子。

张厂长想孙子想得着魔。东东出生那天，儿媳在妇产科生孩子的时候，张厂长和老伴居然把家里的佛像、香炉摆到了妇产科走廊里，一边磕头上香，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医院保安上来制止，结果还发生了冲突，差点儿被保安扭送到派出所。

直到护士出门通知家属“是个男孩儿”，张厂长才长出一口气，继而欣喜若狂。“终于有孙子了，张家的香火可算续下去了！”

小儿子一家在武汉做生意，张东东一直跟张厂长老两口一起生活。平时在家呼风唤雨，有时甚至称得上飞扬跋扈。他经常给爷爷奶奶提各种要求，老两口稍有不从，便跑到屋外一边打滚一边叫骂，直到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周围邻居都说，“在他们家，张厂长是孙子，东东才是爷爷”。

张厂长的家紧邻派出所，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东东骂爷爷奶奶的声音。有一次，东东又在楼下叫骂，内容实在难以入耳。一位同事吼了东东两句，不料却引来了张厂长，老头非但没责怪孙子，反而和同事吵了一架。

“我的孙子教成什么样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多管闲事！”张厂长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也真是有些过分了，哪有孙子站在楼下骂爷爷奶奶的！”每次见到东东在楼下骂人，我都忍不住要感慨几句。

“这孩子长大以后也是个人才，这么小就知道制造‘舆论影响力’，啥事在楼下一闹，周围邻居都听得见，丢他爷爷奶奶的人，搞不好就能如愿。要是在家里闹，搞不好就要挨顿打。”同事笑笑说。

“这孩子年纪这么小，怎么骂起人来这么难听！”

“这还用说吗，肯定有人教啊，这个年纪的孩子教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像什么。”派出所的老同事在一旁回忆，张厂长的老伴年轻时就在本地以“泼辣”出名。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她就曾因为一些琐事，跑到一个小区里，一边踱步一边骂街，从午后一直骂到黄昏，连续几个小时声音嘹亮，且措辞少有重复。从那以后，周围再没有人敢和她发生争执。

4

终于，张东东长大了。我们也正式开始和张厂长“打起交道”。

第一次闹到派出所的时候，张东东还在我们辖区的一所幼儿园读学前班，他用一个中号燕尾夹夹伤了同学亮亮的“小鸡鸡”，幼儿园把双方家长叫来协商处理。

见面后，张厂长先是拒绝承认孙子弄伤同伴的行为，又拒绝了亮亮家长提出的“带孩子治病”的要求。

但当听说孙子被受伤后哭闹的亮亮抓伤了胳膊后，张厂长竟然立刻上前，当着对方家长的面，打了人家孩子一巴掌。双方家长随即大打出手，直到民警赶来制止。

张厂长被亮亮爸打了几拳，亮亮奶奶被张厂长老伴骂得犯了心脏病。事后双方都不同意调解，从派出所闹到了法院，针对谁该赔偿谁的问题，扯皮了一年半。

实在受不了双方隔三岔五就来派出所吵架，我强行把东东爸从武汉叫了回来。本以为老子胡搅蛮缠，儿子应该也是个“扯横皮”（不讲理）的主儿，我还提前准备了“话术”，没想到东东爸居然压根儿不知道儿子的事情。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一见面，东东爸就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反而搞得我有些不知所措。

“这不是给我添麻烦的事儿，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麻烦，你看这个事，你爸也忒冲动了，怎么能动手打人家的孩子……”

我话还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张东东的叫骂声：“鸡×眼子，老不死的……”

东东爸听出了儿子的声音，一下愣在了那里。

“他骂谁呢？”东东爸问我。

“站你家楼下，你说骂谁呢？”

“小兔崽子！”东东爸爸猛地转身就往外跑，我隔着接警台拦不住他，只能把头伸到一旁的窗户外头喊他“别打孩子”。

不过我的话已经晚了，东东爸爸冲过去一巴掌拍在了儿子屁股上，东东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张口还想骂，却被爸爸拧住了脸蛋子。

“住手！”张厂长的怒喝随即传来，眼见着就从楼上冲了下来，一把抢过了儿子怀中的孙子，站在楼下开始高声训斥儿子。

“唉！”我关上了窗户，坐回到接警台前。

东东爸在家待了一个月，总算把幼儿园的事情处理妥当。临走前，他愁眉不展地找到我，想让我帮忙管管他家的事情。

“一边是你爹，一边是你儿子，我一个外人能管你家的事儿？”我哂笑着拒绝他。

“唉，这样吧，以后我们家这边再有啥事儿闹到派出所来，你直接打电话通知我，别由着我老爹瞎搞！”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我答应下来。

5

2012年年底，派出所维修办公楼，并对楼体和外墙进行了粉刷。民警们看着里外一新的办公楼，心情很是愉悦。

没过几天，我早上下楼到值班室接班，发现所长脸色不对。问同事怎么了，同事指指门外说：“出去转一圈看看，你就明白了。”

我走到门外一看，派出所新刷的外墙上满是墨水涂鸦，还有几句骂人的脏话，其中有些字还用的是拼音。

“去调监控看看，把那家伙给我找出来！”所长在值班室里怒吼。

很快，同事就通过监控找到了“幕后黑手”——张东东。

监控录像里，前一天夜里11点多，张东东拎着爷爷平时练书法的家什来到派出所外，一笔一画地在院墙上完成了他的“杰作”。

来到张厂长家，老两口矢口否认孙子昨晚出去过。我们只好出示了监控视频截图，张厂长看了半天，才很不情愿地承认。

我让张厂长把孙子叫出来，想和孩子聊几句，但老两口一口拒绝。“孩子小不懂事，又没造成多大损失，你们至于和个小孩子一般见识嘛！”张厂长的老伴抱怨道。

“不是损失大不大的问题，我们至少得知道你孙子为啥干这事儿吧？”

张厂长说什么也不让孙子见我们，没办法，我打电话叫回了东东爸。

听说儿子这次把祸惹到了派出所，东东爸放下生意，急匆匆地赶回来，问清原委后，带着父母和儿子来派出所道了歉。

原来在派出所修楼时，东东看中了施工队工人的手电钻，找工人讨要不得，便把“仇恨”记在了派出所头上，趁晚上画花了派出所的外墙。

东东爸找人给派出所重新粉刷了被涂画的外墙，看到不菲的花销，张厂长老伴很是不满。她不好意思冲民警发作，只是不断地咒骂那个不满足她孙子要求的工人。“手电钻又玩不坏，给孩子看看怎么了？这么抠门，活该一辈子打工！”

“得亏这次是画的派出所，让赔钱她没敢闹我们，要是画了别的地方，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同事听到张厂长老伴的抱怨，小声对我说。

处理完派出所外墙的事情，东东爸又被我请到了办公室。

“以前我爸妈不是这样的，教育我们兄妹几个的时候很是严格，现在带孙子咋给带成这样了？”东东爸也十分苦恼。

“你还是尽量把孩子带走吧，跟着你爹妈这么个搞法，迟早学废了。”办公室里一位和东东爸相熟的民警劝他。

“不是我不想自己养，老两口不愿意啊，他俩盼孙子盼了好多年，我哥姐家的女孩子他俩还不带，就想带孙子。”

“你做做工作吧，俗话说‘隔辈亲隔辈溺’，带出问题来以后还是你们两口子承担。”

东东爸不住地点头。

教导主任王慧斌被张厂长打了之后没多久，东东爸也忍不下去了，他和妻子回到老家，坚决要把儿子转到武汉去上学。

因为这件事，婆媳之间、父子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民警为此又出了好几次警。最后，张厂长老两口终于拗不过儿子一家，同意东东去武汉生活。

孙子要走了，张厂长的老伴气不过，就把邪火往教导主任王慧斌身上发。连续半个月，天天去小学大门口堵着门叫骂，吓得王慧斌只好请了年假出去躲避。

办完转学手续送东东走那天，张厂长老两口足足买了六大包玩具、零食，硬是塞进了儿子的车里，并说好以后隔周就要去武汉看一次孙子。

东东走后，我经常在周末的清晨遇到等公交车的张厂长。他衣着光鲜，手里拎着两个鼓鼓的最大号超市购物袋。

“干啥去老张？”我问张厂长。

“去武汉看孙子！”

“不用带这么多东西，武汉超市多得很，到地方再买多省劲。”

“哎，这都是东东以前爱吃、爱玩的东西，怕到武汉一下找不到，还是从家里带方便。”

之后，有段时间我都没再见到张厂长老两口，我以为他们也搬到武汉常住去了。2014年年底，去居委会办事时，居委会干事突然拉住我问：“你记得以前住派出所边上的那个张老头不？”

“哪个张老头？”

“唉，就是张厂长！”

“记得啊，好长时间没见他老两口了，怎么了？”

“老头快完了，住院呢。”说着，居委会干事指指医院方向。

“咋了？之前不还好好的吗？”

“嗨，听说是被他孙子害的。”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怎么会把自己的爷爷害到这个地步？我着实不解。

几经查询，才在武汉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警情通报上查到了寥寥几句记录。一个月前，张厂长带孙子去武汉街道口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购物，被孙子从电动手扶梯上猛推一把滚了下来，受了伤。

“哟，估计伤得蛮重啊。”一旁的同事说。

“为啥？”

“在武汉受的伤，回老家来住院，咱这儿的医疗水平哪能和武汉比。他又不缺钱，这八成是回来维持了……”

尾声

2015年春节前的辖区重点单位检查时，我在医院见到了张厂长一家，这才知道了真相。

东东爸告诉我，两个月前，张厂长带东东在武汉街道口的一家大型商场购物，东东在商场一楼看上一款进口玩具，闹着让爷爷给他买。张厂长一看价格有些发怵，加上身上带的钱也不够，便和孙子商量着下次再买。

东东却不依不饶，当时就在商场里闹了起来，还用上了之前在家门口骂爷爷奶奶的词。大庭广众之下，张厂长实在磨不开面子，打了孙子一巴掌，拽着他离开了柜台。

正当爷孙俩走上电动扶梯，马上要到二楼时，站在前面的东东突然转身发力，猛地撞向张厂长。猝不及防的张厂长失去重心，从上行扶梯上倒栽葱似的滚了下来，后脑受伤，当场不省人事。

虽然张厂长第一时间就被商场的工作人员送往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医生说脑部严重受伤，让家属做好长期护理的准备。在武汉住院医保不给报销，家人只好把张厂长接回了老家医院。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们两口子可别……”听到这些，我实在不知道该跟东东爸说什么好。

他没有接我的话茬，自顾自走到住院部门口抽起了烟。

我的朋友是赌徒

基层民警的交际圈子很广很杂，但真正能做朋友的人却不多。作为外地人，日常警务工作之余，能够接触到的，除了同事和有业务联系的人之外，基本只剩各类“打击目标”和“工作对象”了。驻守派出所的日子里，生活即是工作，工作也是生活。工作中的交往对象逐渐构成了我生活中的朋友圈。在警务工作冰冷、严肃的规章制度之外，我们之间也有着生活化的交流和沟通。我曾努力走进他们的生活，并试图在权责允许的范围内做好朋友该做的事情，且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和独一无二的活法，我只是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认真地生活。

1

2016年6月的一个雨夜，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强睁着眼睛看了下时间，凌晨两点，滑开屏幕，肖宁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兄弟，能不能来‘浅水湾’一趟？”

“疯了吗？这么大的雨，去那里做什么？”

电话那端陷入一阵沉默，我耳边只剩下窗外传来的滚滚雷声。

“我要出趟远门儿，想跟你告个别。”

“扯什么犊子？凌晨两点出远门儿！”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拒绝了他的请求。

电话那端又是一阵沉默，肖宁又开口：“兄弟，哥借你那一万块钱暂时还不了你了。”

“拿去用拿去用，我又没催着你还。”深夜被吵醒，我不满地答道。

“唉……那没事儿了，我挂了兄弟。”听语气肖宁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最终犹犹豫豫，没有说出来。

挂断电话，我闭上了眼睛，刚要再次入睡，手机又“叮”地响了一声，还是肖宁的信息：“车在王俊琪那里。”

“车？什么车？”看到信息我有些迷惑不解——我没有车，肖宁也没有车。回信息询问，肖宁半天没有回复，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

“真他娘的有病！”我心里暗骂肖宁，把手机扔到了一边，继续睡觉。

早上8点，下楼去值班室点名，居然四五位民警都不在。同事说半个小时前东荆河边发现了死人，他们出警去了。

我心中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赶紧给出警的同事打电话。果然，同事说死者是肖宁，身边扔着一瓶敌敌畏，初步勘察是自杀，具体死因还得等法医鉴定。

我呆立着，很久说不出话，直到领导叫我去办公室——因为肖宁留在现场的手机里，有发给我的信息。

2

肖宁殁年33岁，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那晚他约我去浅水湾酒店到底要做什么。

他的父亲得到消息后来到派出所，坐在接待室里，老泪纵横。他始终不愿相信独生子自杀，坚持要求警方调查儿子的死因。

除了最后发给我的那条信息外，肖宁在人世间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因为那条信息，我被领导留在办公室里，等待督察支队的约谈。

我承认自己曾借给过肖宁一万块钱，因为那时他跟我说，在武汉打工需要租房子，缺钱。督察支队的民警问我有没有向肖宁逼债，我把手

机交给了同事，让他去查阅我俩之间的通信记录。

督察支队民警又问，“车在王俊琪那里”是什么意思。我的确不知道，只能摇头。

不过，关于车的答案没有让我们等太久。当天下午，肖宁的前女友来派出所报警，称肖宁两天前借走她的日产轿车，今天他失联了。

同事恍然大悟。根据推测，我们很快找到了“王俊琪”——一家寄卖行的老板。王俊琪说肖宁把那辆轿车作为抵押，从自己手里借走了四万块钱。

“那笔钱呢，见过没？”同事问肖宁的父亲是否见过这笔钱，老人颤抖着声音说：“你们去卖彩票的店子里问问吧。”

根据“天眼”的监控视频，视侦中队的同事也迅速摸清了肖宁生前最后一天的活动轨迹：早上9点进入了城南浅水湾酒店旁的一家彩票店，直到晚上11点才出来。我和同事赶到那家彩票店，才得知肖宁前一天在这里输掉了八万块钱。

“他人呢？今儿怎么没来，是不是跑了啊？他还欠我不少钱呢！”彩票店老板不住地向我们抱怨。

“一天（让他）输八万，你太过分了吧？！”

“我敞开大门做合法生意，他买我卖，有啥过分的？”店主毫不客气地回应。

我按照程序调取了昨天肖宁在彩票店的视频录像和所打的彩票副本，临走时看了一眼彩票店的墙，“理性投注，量力而行”的提醒公告分外刺眼。

3

肖宁生前原本是一个自信快乐的胖子，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因为和派出所有业务往来，所里的民警都认识他。我也与他打过不少交道，知道我也爱好摄影，肖宁经常给我看他在全国各地游览时拍摄的照片，这让我们的关系拉近不少。

2015年5月，局禁毒支队指派我蹲守监视辖区一家日用品店的人员往来情况，有家彩票店就开在日用品店的马路对面，我便将观察点选在了这家彩票店里。

一个星期的蹲守，没有查到日用品店有什么不正常，倒让我发现肖宁竟然是彩票店的常客：每天上午9点，肖宁准时来到这里。坐定后，彩票店老板就会喜笑颜开地送上两瓶饮料和一包黄鹤楼“硬珍品”：“拿去抽、拿去抽。”肖宁也不推辞，气定神闲地拧开瓶盖儿，点上香烟，开始在小本子上计算今天的“热号”。

一开始，我惊异于彩票店老板的慷慨：一注彩票才2元钱，他送给肖宁的饮料和香烟加一起得50多元。

直到肖宁开始“打票”后，我才知道彩票店老板的“慷慨”，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肖宁玩的是体彩的“11选5”高频开奖彩票。购彩人可以从1至11这11个数字中任意选择1个到8个号码，10分钟开奖一次，每天开奖80多期，一期开出五个中奖号码，根据购彩人购买号码的个数和猜中的个数，单注奖金从6元至1170元不等。

大多数时候，肖宁选择的是“任三四码”玩法——这是一种“高效投注法”：选择四个号码投注，只要猜中其中三个，单注便可获得19元的彩金，如果四个号码都被猜中，则可以赢得76元。“任三四码”单注需投入8元，但肖宁在投注时又会使用“倍投守号”的方式：第一、二期买1倍，第三期买2倍，第四期买4倍，第五期买8倍，第六期买16倍，依次类推，直到中奖为止。

这种投注方式在理论上号称可以不断依据上一期开奖结果提高下一期中奖率，但投入的资金也十分惊人，等投注到第十期的那轮，肖宁需要一次性投入2048元。假如中奖，他至少可以获得4864元的奖金。去掉之前的本金，他还可以赚千把块钱——但如果没中奖，后面将会是继续翻倍的巨额投注。

肖宁坐在彩票店里，时而写写画画，时而苦思冥想。往往从第五期开始，他便紧锁眉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开奖电视的滚动屏幕。他最希望能在第八到第十期之间中奖——因为太早中奖奖金不多，太晚了中奖则本金太高买不起。

肖宁总是信心满满地把选定的号码报给店主，店主并不要求他立即交钱，而是等到本金凑够一定数额后再一次性收款。肖宁“看号”的水平据说不错，能时不时中些小奖。有几次他见我站在旁边，还撺掇我也跟他买几注。我推说不会玩，他便替我选了几组号码，结果还中了几注。

一周过后，禁毒支队的任务结束了，我也要从彩票店撤走。临走那天下午，我正和彩票店老板交代事情，只听肖宁在我身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转头询问，肖宁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彩票，说自己中了两万多块钱。

我接过肖宁手中的一摞彩票，一看，这轮他总共投入了14000多元，终于在第十二期等到了他想要的数字。看他志得意满，我不禁替他捏了把冷汗——如果这期再不出那组号码，那么下期他要投入接近两万块钱才能继续他的“押注”。

“这东西，玩归玩，适可而止就行，别搞得跟赌博似的。”我劝了肖宁一句，把彩票递还给他。

肖宁正在中奖的兴头上，没接我的话茬儿，反倒是彩票店老板略有不满地说道：“我们这个是正规的体育彩票，不是赌博。”

我不好再说什么，摇摇头，收拾东西离开了彩票店。

4

没想到，没过两天，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彩票店有人打架。我和同事赶到现场，发现肖宁正跟彩票店老板撕扯在一起。

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肖宁还是像一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一样凶狠地瞪着彩票店老板，声称要让对方赔偿自己几十万元的损失。而彩票店老板也骂骂咧咧，要求肖宁把之前赊的上万元彩票款还上。

原来，这天肖宁选定了一组“任三复式四码”号码，连追了13期倍投。到第十三期时，需要投入16000多元，肖宁身上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了，好说歹说，老板看在老顾客的分上让他赊了账。但不幸的是，这一期肖宁依旧没有中奖。

从第十三期出结果到第十四期开奖的10分钟里，肖宁一边打电话筹钱，一边要求彩票店老板继续帮自己追号，但老板坚决要求肖宁先把第十三期的彩票钱还上，否则拒绝帮他追号。两人争执间，第十四期彩票开奖了，肖宁选定的四个号码全部出现在中奖号码中——如果他按照原计划继续完成了“倍投”的话，他将会得到20多万元的奖金，不但之前的投入全部能回本，而且还能大赚一笔。

“警官你看，他这期要是给我打了（号），我一下就‘上岸’了！”肖宁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得了吧，想靠这个发财，死了那条心吧！不交钱哪个给你打彩票？抓紧把欠人家的钱还上！”我没好气地回吼了肖宁一句。

自知理亏，又看我不站在他这边儿，肖宁只好悻悻作罢，给彩票店签下一张欠条后离开了。见他走了，彩票店老板反而有些后悔。我明白老板的那点儿小心思：彩票中心按照彩票店的销售额给店主“返点”，

肖宁是他的“大客户”，他其实是怕这次得罪了肖宁，肖宁以后再也不来他店里打票了。

我的同事敲了敲墙上贴着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标语，意味深长地瞪了老板一眼。老板明白了我同事的意思，连忙再次辩解体彩的“合法性”。我有些烦，冲店主摆摆手，示意他住口。

“他再来这儿玩这么大的，你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因为之前辖区里出过几个买彩票买到家破人亡的案子，和肖宁毕竟又是朋友一场，我想尽可能地控制他一下。

彩票店老板不情愿地点点头，走之前又听他不满地嘀咕：“多管闲事，又不是我一家店，他不来我这儿也会去别人那儿。”

5

肖宁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老弟，你知道买彩票最怕什么吗？”

“还能怕啥？怕不中奖啊。”

肖宁摇摇头说：“不对，买彩票最怕中奖。”

“为啥？”

“有了希望，就让你永远停不下来。”

肖宁说，他第一次接触彩票，是陪朋友来玩。那天朋友买了几百块钱的彩票但一分钱没中，他只是随意地选择了一组号码便中了500多块钱，从此感觉自己“有财运”，便迷上了“11选5”。

“这种玩法玩的就是心跳、刺激！”肖宁之前经常这样说。因为“11选5”不像“大乐透”“双色球”“七星彩”这些需要一天或隔天才开奖的彩票，理论上号称超过50%的返奖率和高频的开奖次数，让人欲罢不

能。虽然每张彩票限制最大投注倍数为99倍，但很多彩民会以多张连打的方式规避这一规则。

“你这个和赌博差不多吧？”我经常问肖宁。

每当听我这么问，肖宁都会连忙摇头：“不不不，这怎么能叫赌博？国家禁止赌博，但彩票是合法的。”

迷上“11选5”之后，肖宁对照相馆的生意也不上心了，很多次去照相馆找他，他都正专心致志地抱着本子研究彩票号码。我提醒他千万别走火入魔，他总是不屑一顾地摆摆手。

但分明已经沉溺其中了。

2015年12月，也是一个深夜，电话响起，电话中肖宁恳求我“以个人身份”去他家出一次警。听他吞吞吐吐，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然，更不可能“以个人身份出警”，便叫上当晚值班的同事，一起赶到了肖宁家。

没想到，肖宁家在深夜“热闹非凡”，至少有三伙人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原来都是肖宁的“债主”。

与儿子同住的肖宁父亲呆坐在沙发上，眼前摆着一摞借款合同，全部署着肖宁的名字。我简单翻了一下，不算利息，光借款本金就有70多万元。肖宁承认这些都是他借的，钱都被他买彩票了。

“买了70多万元？”我吃惊地问肖宁。

肖宁点点头，说他从年初开始不断地筹钱打彩票，除了这70多万元的“小额贷款”，还有10多万元的网贷，也早已逾期，不知对方何时会上门讨债。

警察无法介入借款纠纷，我和同事只能从中尽力调解。我们说得口干舌燥，但“债主”们仍旧非要当晚就拿到钱。正僵持着，肖宁的老父亲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债主”们跟前，恳求他们宽限一个星期。

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肖宁更是一下跪到父亲旁边不断地抽自己耳光。“债主”们见状，也怕讨要得太过急迫会催生出其他事端，商量了一番，只好答应一周之后再来收款。

送走了“债主”，我问肖宁父子下一步怎么办。肖宁沉默不语，半晌，肖宁父亲长叹一声：“还能怎么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卖房子吧。”

6

肖宁父亲的房子加急卖，只卖了50万元，肖宁又把照相馆盘给别人，找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总算把欠下的各种“小额贷款”还清了。

从家里搬出去那天，肖宁抡起菜刀要切自己的手指，说让自己长个记性。我一边拉住他，一边指指他的脑袋，说长记性靠这里，真要切，切脑袋。

肖宁的父亲自始至终站在客厅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墙面。我顺着他的目光跟着望去，墙上贴的都是荣誉证书。老爷子当了一辈子工人，在工厂里兢兢业业，因工伤失掉了两根手指，得了不计其数的奖，这套房子还是当年从单位退休时单位发给他的“终身成就奖”。

“别赌了，戒了吧。”我劝肖宁。

“真不是赌……”肖宁又要辩解。

“还他娘的不是赌？房子、店子都进去了！”看他这样，我的火气“嗖”地窜了上来，恨不得打他一顿。

肖宁看我动气了，急忙摇头：“不赌了不赌了，再也不赌了……”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没有在我们派出所辖区的彩票店里见过肖宁。打电话给他，他说人在武汉一家影楼打工，赚钱还债。我很欣慰。他又说自己需要一些钱在武汉租房子，我打给了他一万块钱，并反复提醒他不要再碰彩票，肖宁在电话里满口答应。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其实肖宁并没有去武汉，而是继续买彩票，只是躲到了城南的彩票店里去了。

再打电话问肖宁，他开始还不认账，但在一次通话时，彩票店里突然响起的开奖音乐出卖了他。我愤怒地要求他见面还钱。肖宁无奈，只好承认自己又开始玩“11选5”了。

“之前怎么承诺的？再赌切哪里来着？”见面后我冷笑着质问肖宁。

他低头不语。

肖宁父亲曾找到我，求我“处理处理”城南浅水湾酒店旁的那家彩票店的老板。我问原因，肖宁父亲说，那个老板最近几乎天天找肖宁推销“新玩法”，还说什么“谁家孩子天天哭，谁买彩票天天输”。

肖宁过去在彩票店里一掷千金的事情早已在本地口口相传，很多彩票店老板都把他当成“财神”，城南那家彩票店刚刚开业，急需找人“冲排名”，所以老板三天两头地来“邀请”肖宁。

我怒不可遏，托城南管片的派出所民警约谈了那个老板，告诉对方肖宁目前窘迫的经济状况，并尽可能地“敲打”了老板一番，让他少动歪心思。

面对民警，彩票店老板信誓旦旦地说不再撺掇肖宁，但事后表明，那些保证不过是他搪塞我们的谎言。

为了防止肖宁再去借钱，我又联系了一些有过“放码”前科的人和辖区所有小额贷款公司，告诫他们不要给肖宁放款。这些人有的支支吾

吾，有的点头称是，但我心里也清楚，他们都知道警察其实管不了这些，应付我的成分更多一点儿。

肖宁跟我透露过他始终不能“跳出来”的原因：“我对不起父亲，害他这么大年纪了要卖掉房子替我还债。靠打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给父亲买一套房子。我就想再搏一把，把房子钱赚回来就收手，以后绝对不玩了！”

而城南彩票店的老板依旧在私下里撺掇肖宁，并且给他提供“小额贷款”。肖宁也梦想着“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像无数赌徒一样，一步一步坠入地狱，永不复生。

肖宁的不悔改让我失望，也就懒得再管他的事情，借给他的一万块钱自然也不指望他还能还我。但肖宁的父亲经常来找我，求我把肖宁从彩票店里拉回来。“你们毕竟朋友一场，年龄又差不多大，你说的话他听。”

看到肖宁父亲苍老无助的面庞和缺了两根指头的右手，我心一软，只好再陪着他去拉儿子回家。

一次在城南彩票店里，肖宁父亲气急之下冲店老板吼道：“像你这种人，坏了良心，迟早被警察抓去坐牢！”老板却微笑着指着我回敬说：“我这是合法生意，你看看他敢不敢抓我。”

看他竟然将矛头指向了我，我忍无可忍道：“咱俩可以赌一把，就赌警察有没有办法抓你。”

7

肖宁的丧事办得悄无声息，之后半个月，他生前的各类“债主”因为找不到肖宁，开始陆续来到派出所。这些人大多都是之前被我告诫过的对象，他们有的借口“找人”，有的声称被肖宁“诈骗”要报案，但真实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派出所找到肖宁，让他还钱。

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这半年里，肖宁又为买彩票借了一大笔钱，本金加利息足有60多万元。

“他死了。”我告诉“债主”们。

有人错愕，有人质疑，还有人扬言“子债父还”，要去找肖宁的父亲要账。

找了一天下午，我把所有的“债主”约到警务室，包括城南彩票店的老板。肖宁从他那里借走了7.3万元的“小额贷款”，按照协议应当还他11万元。

他们纷纷指责肖宁“不是东西”，有个别激动的竟在我面前喊打喊杀。我冷笑着看他们表演，等他们各自“秀”完，开口问他们：“之前警告过你们吗？”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不置可否。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借给他钱？”

“他说他去干正经事儿，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借钱给他啊……”一个人小声嘀咕。

“放屁！干正经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从你那儿借一万，两个月还，每个星期光是利息就要两千，哪个‘干正经事儿’的人借得起你的钱？”我愤怒地瞪着那个“债主”。

众人不语。

“人死账销也好，‘子债父还’也罢，去法院打官司解决！丑话放在前面，哪个敢私下里去骚扰肖宁他爸，别怪我到时不给你们面子！”

打发走了一众“债主”，我也返回派出所。路过辖区的彩票店，门面上悬挂着的火红条幅正迎风飘扬，上面是几行烫金大字：

“祝贺×××彩票站开出双色球/大乐透头奖×百万元。”

条幅下面，抱着发财梦的人们进进出出。

被全家人

逼着去卖身的女孩

去年7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在省厅办完事，晚上一起到街道口吃饭。

正在等菜时，有一家三口走进了饭店。妻子齐耳短发，手里抱着年幼的孩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丈夫憨厚敦实，一手提着大大的购物袋，一手轻轻扶着妻子。

服务员将一家人引到离我们不远的位子前面，丈夫将手中的购物袋放在一旁，亲昵地接过妻子手中的孩子。这间隙，妻子放松下来，四处望了望，目光掠过我们桌，停了下来，眼神中有喜悦、有错愕、有吃惊，还掠过一丝忧虑。

四目相望，我也愣了一下，下意识想起身打招呼——但又意识到不妥，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只是轻轻冲她点点头、笑了一下，便收回了目光。

“认识？”同事发现了我的异常，转头看了一眼，轻声问我。

“嗯。”我点点头，然后岔开了话题。

其实，目光交错的那一刻，我很想像老友相见一样，上前和她寒暄，听她讲讲最近的境况，还有那个以前她向我提起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没有。

但我不能那样做。我怕我贸然上前，会打扰她现在的生活。

“相见不如怀念，愿一切安好。”当晚，我在QQ空间里突兀地写下一句心情。

没过多久，有人留言。是一个陌生号码，只有两个字。

“谢谢。”

1

她叫方巧，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我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一个对她来说很不光彩的地方。

2014年年初，公安局组织了一次“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在突查辖区一家酒店时，方巧被我逮了个正着。

派出所里，她没怎么抵赖，也没做过多辩解，还算配合。民警审讯她时遇到的唯一困难，是她不会说普通话，那地道的山东方言，让来自南方的同事们一筹莫展。

我是山东人，自然被派上了场。老乡见老乡，本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这种环境下相见，谁都愉快不起来。

方巧那年21岁，来自鲁西南山区，“从业”一年有余。

讯问过程按部就班，方巧说自己家中困难，不得已从事了这个不光彩的职业。对于她的话，我懒得深究，因为之前被抓获的失足妇女大多也都是同样的说辞。

做完方巧的材料，同事去公安局法制科报裁。等待的间隙，我坐在讯问室里，便找话头和这位老乡聊了起来。

“家中困难，还用这么好的手机？”我指着桌上的一堆手机问她。

现场收回来的手机摞成一摞摆在我面前，基本都是当时上市不久的iPhone 5S。

方巧却摇摇头，指着其中一部显然不太入流的翻盖手机说，那个才是她的。我反而有些不解，以前进到派出所的失足妇女大多人手一部高档手机，她们的钱来得快，一般都舍得在这些方面“犒劳”自己。

“少见啊。你留着钱干啥用？”

“给我弟用。”

方巧说，她的弟弟在南京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她来负担，赚的钱基本都给她弟弟转走了。看我不太相信，还让我打开她的手机相册，看她弟的照片。

我打开手机，里面确实有一个男孩子的几张照片，看长相和方巧有几分相似，看背景也确实是南京某大学的校园，只是那个男孩子的衣着打扮看不出是家庭困难的样子。

“你父母呢？去世了？”我顺着方巧的话问她。一般来说，这些失足妇女总会顺势编一个类似父去世母病危的“感人”故事，然后试着“恳请”我“放她一马”。

可方巧却说她的父母都在，自己是自愿干这行承担弟弟学费的。我再深问她就不说了。

同事从局里回来，告诉我法制科裁定，对这批失足妇女拘留10天。我向方巧出示了处罚通知，让她在上面签字按印，方巧紧张地问我她会不会被送去劳教。

“不想去劳教？怕耽误‘赚钱’吗？”其实在2013年年底劳教制度刚刚被废除，但我不想直接回答她，反问了一句，希望她断了重操旧业的念头。

方巧说，年后弟弟开学要各种费用，钱她还没凑齐。

“怎么着？你还真打算接着干啊？”我继续反问她。

方巧赶紧怔怔地摇摇头。

2

方巧的住处在辖区内一个老旧小区里，原本她是和另外一个“姐妹”一同租下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白天做一些手工活，晚上去夜场“上班”。两人都不是“全职”，大多数时候是在夜场陪酒、陪唱，只有当客人提出额外的要求并支付高价，才会“出台”。

这样既可以让夜场老板摆脱“容留、组织卖淫”的罪名，又能吸引一批抱着不纯目的前来消费的客人，因为陪酒、陪唱并不犯法，警察也拿夜场老板没什么办法。

后来，方巧的“姐妹”嫌夜场老板“提点”太狠，辞了工作，在自己的房间里专职“开工”卖淫，结果遭到邻居举报，被警察抓走。但房子租期未到，所以方巧依旧住在这套房子里。

专项行动之后，领导要求我“处理”一下涉案的失足妇女。所谓处理，就是暗示我要把她们全部从管区里“赶走”，我心领神会，找到房东，让他把方巧二人剩余的租金退掉，把房子收回来。房东虽不情愿，但还是连连点头。

拘留了10天之后，方巧回到了住处，发现房东已经把她的行李扔到了楼道里，让她“拿东西滚蛋”。方巧要求房东把剩余的8000多元租金和押金退给她，但房东坚决不肯，不但很露骨地说了一些侮辱她的话，还动手打了方巧。

那次，还是我出警帮方巧要回了租金和押金。方巧很感动，说没想到警察还会帮她。我说，一码归一码，你“捞偏门”该打击就打击，他“趁火打劫”该处理就处理。

方巧拖着行李满城找了三天房子，也没找到合适的。市里的便宜房子基本都在我们的管区里，她又跑回来求我网开一面，让她继续在附近找地方住，并保证一定会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绝对不再“捞偏门”。

我勉强同意了方巧的请求，明确告诉她，再被我抓住一次，马上收拾东西走人。方巧千恩万谢，不久就在附近租到了合适的房子，然后又在步行街的美甲店里找到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

领导责问我为什么不把人“撵走”，我解释说，人在这儿我还能看着，撵到别的地方成了“暗娼”，更难管控。何况我们的管区本身就鱼龙混杂，赶走了方巧，再搬来个张巧、刘巧，谁知道会惹来什么麻烦，还不如把这个“在控”的管好算了。

领导听完，还亲自去步行街“暗访”了一圈，看方巧确实在那里规矩上班，方才作罢。

3

步行街是管区的“重点部位”，上级要求我们每天必须完成两次巡逻。方巧工作的美甲店位于步行街的第一家门面，每次巡逻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望一眼，看方巧有没有“脱管”。

后来跟方巧熟了，我也问过她，为什么不去省城或南方的大城市找一份工作。方巧说自己只有小学文化，又不会说普通话，没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大城市消费水平太高，去了也只能重操旧业，还是留在这里学点手艺吧。

像方巧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很少有没完成义务教育的，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老家也并非极端落后，正常人家孩子不至于连小学都读不完就出门工作。

我问她原因，她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我原委。

方巧一岁那年，亲生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现在的父亲。婚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

继父本就是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更何况方巧又不是自己亲生的，因此方巧从小就不受继父待见，动不动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方巧家境贫寒，继父在济南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母亲在老家的一家医院做清洁工，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年幼的方巧身上。到了上学的年纪，继父想让方巧留在家里继续照顾两个弟弟，一直拖着不让她去上学，后来，还是村镇两级政府来干预，继父差点儿为此进监狱，方巧才终于得以读上了书。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方巧已经10岁，比同学们足足晚了三四年。那时，8岁的大弟已经读二年级，7岁的二弟也入学了，方巧和二弟同班，所以，方巧还要继续负责照顾他。

方巧上学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读到四年级，二弟放学之后和同学一起玩耍时，失足掉进养鱼塘里淹死了。继父把小儿子的死全部归咎于方巧当时没有在场，没“看住”弟弟。等二弟的丧事办完之后，继父把方巧狠狠打了一顿，剥夺了她继续上学的“资格”。

“你后爸这样做是违法的，你们当地（政府）没再管吗？”我有些生气地问方巧。

“管了，后来我又去读了两年……”

在当地政府的再次干预下，方巧总算读完了小学，本该继续读初中，但就在她小学毕业那年，继父在工地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造成重伤，几经抢救，命算是保住了，但人却残废了，在家卧床需要人来照顾。母亲的工作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小学毕业的方巧无奈又一次辍学，回家专心照顾继父。

“实话说，也是我自己确实不想再上（学）了，我不是个读书的材料，年龄大，学习差，同学都笑话我。而且，只要一到学校我就想起二弟来，总觉得是我没看好他，害死了他……”

出于对死去的二弟的愧疚感，方巧对大弟疼爱有加。大弟也算争气，一直读书，考上了二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大弟看到家徒四壁和躺在床上的父亲，发愁学杂费无处张罗。方巧又主动承担起了供大弟上学的责任。

最初的一年，方巧卖过衣服，打过零工，去电子厂站过流水线，但无奈学历太低，收入太少，挣来的钱根本不够支付大弟在南京读书的开销，最后只好经人介绍，跑到我们这里做起了“小姐”。

知道了方巧过去的经历，我有些动容。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警察不是救世主，我也没法给她太多的帮助，只好劝她想开点，真要缺钱缺得厉害，可以从我这儿先拿一点去应急。

“你不怕我拿钱跑了啊？”听我说可以借钱给她应急，方巧不好意思地问我。

“敢借就不怕你跑，警察追债的手段可比一般人厉害多了。”我也笑着跟她开玩笑。

4

方巧从我这里拿走过9000块钱。

那是2014年4月，她说弟弟要交“实习费”，自己手里的钱不够。我心里有些疑惑，大学生实习为什么还要倒交费？但毕竟自己承诺在先，也不好多问，便把钱转给了她。

方巧十万分感谢，一个劲说发了工资马上还我。她那时每月工资只有2000元多一点，我也没指望她很快还我，只好说不急。

之后的每个月，方巧都会转给我1000块钱，但到了那年8月，方巧居然一次性把剩余的5000块钱还给了我。我正奇怪方巧怎么突然有钱了，她却因卖淫又一次被邻市公安机关抓获。

因为涉及违法，方巧美甲店的工作自然也丢了。从拘留所出来，她躲了我很久，但最后还是被我堵到。我愤怒地质问她当时怎么跟我承诺的，为什么又去重操旧业。

“我需要钱……”方巧低头说。

“我不是一再跟你说，我的钱不急着还嘛！”

“不只是你的钱，我弟弟那边还需要一大笔钱……”

方巧说，大弟前段时间打来电话，说开学之后就读大四了，想准备考研究生，要报一个“包过”的培训班，需要一万块钱，加上新学期的学杂费，总共要两万多块钱。

方巧自己实在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来，又不好意思再找我开口借，思来想去只好再去以身试法，想着“赚够了就收手”。

“警官，我怕给你惹麻烦，没在你的辖区里干，求你别撵我走……”

我有些忍无可忍，但愤怒的理由并不单纯是因为方巧又去“捞偏门”。

“你弟弟一年学费多少钱？”

“学费一万，住宿费……”

“胡扯！哪有收一万学费的二本学校？你弟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什么专业？”

“南京××大学，××专业。”

方巧见我不信，连忙掏出手机，找到弟弟发来的催款短信给我看。

我拿过方巧的手机，她大弟近期确实发短信找她要“学费”。再往上翻，看到以前的通信记录，我不禁火冒三丈。

除了学费之外，方巧每月给大弟要转2000元的生活费。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书本费”“杂费”“培优费”“实习费”“考试费”“建校费”“入党费”“通信费”“服装费”，等等。

这些在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看起来荒唐可笑的“费用”，却成了大弟找方巧要钱的理由，其中那项4000元的“通信费”，因为方巧晚给了三天，还被大弟一通埋怨。

我告诉方巧，大弟可能在骗她，高校压根儿没有这些收费项目。方巧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可依旧不太愿意相信大弟在欺骗自己。

5

2014年国庆节假期，我要去南京看望女友，想到方巧的大弟，便问她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给他。

方巧先是说有点东西请我帮忙带，但后来又说不用了。我猜她大概是怕我把她的事情告诉弟弟，便没再提。

结果临行前，方巧又找到我，犹疑了好一会儿，才说请我帮忙查探一下，看看她大弟到底在大学里做什么。

“什么意思？”我问方巧。

方巧说，大弟又来催款了，继上次的两万元之后，大弟又说学校要求“补交”以前的“实验费”5000块钱，可这次她实在拿不出钱来了。上次给大弟汇过去两万块钱之后，她也找别人问过，谁都没听说过学

校有大弟说的那些收费项目，所以想请我顺路去大弟那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到南京，我找到方巧弟弟所在的学校，却没有见到她大弟本人。我自称是他的老家亲戚，问他的同学他人去哪儿了，同学说国庆节他带女朋友去厦门旅游了。又问同学他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没想到那位同学不屑地回了我一句："富二代嘛，家里有钱，在学校不都这一个屌样儿。"

我又提了一句学校收"实验费""通信费"的事情，几个学生都摇头说没听说过。我暗自摇头，心里暗骂方巧的大弟"不是东西"。

在南京待了五天，也没有等到方巧大弟从厦门回来，假期快结束了，我便回了湖北。回来不久，方巧来单位问我大弟那边是什么情况，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方巧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听完默默地离开了。

之后方巧消失了一段时间，房东几次上门收水电费都找不到人，电话也联系不上，便来派出所举报方巧"逃费"，我让房东先从她的押金里扣水电费。

房东嘀咕几句走了，我连忙给方巧打电话，提示对方关机。我以为她悄悄搬走了，心里还埋怨她"不够意思"，走之前也不来告个别。又转念一想，毕竟我和她非亲非故，人家好像也没有来跟我告别的义务。

一个多月以后，我竟然在医院遇到了方巧。她正在办出院手续，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我急忙上前问她怎么了，为啥病了也不说一声。

一问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并没有搬走，而是独自去南京她弟弟就读的学校。直到她到了南京，大弟仍在厦门旅游，方巧找到了他的辅导员老师，向老师询问弟弟在校的表现和三年来学校缴费的情况。

弟弟的所有谎言不攻自破，方巧踉踉跄跄地走出辅导员办公室，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去学校后面的“堕落街”租了一间日租房等弟弟回来——她依然不肯彻底相信弟弟骗了自己。

又过了半个月，弟弟终于带着花枝招展的小女友从厦门回了学校，两万块钱“学杂费”花得一分不剩。见到愤怒的辅导员和在学校待了半个月的姐姐，他几乎惊掉了下巴。

在周围人鄙夷的目光下，方巧大弟花了三年时间构建起来的“富二代”形象轰然倒塌，刚刚花重金追到的新女友也毫不犹豫地和他吹了。大弟恼羞成怒，和方巧大吵一架，动手打了方巧。

方巧一路哭着坐上了离开南京的列车。

伤心至极的方巧刚回到住处，没想到家里的“问罪”电话竟然也随之而来——原来弟弟在她离开南京后，向父母狠狠告了方巧一状，说她因为不想给自己交学费，跑到他学校里大闹一场，弄得他没脸继续读书，要退学。

一听儿子要退学，父母不问青红皂白，把怒火全都撒到了方巧身上，指责她“自私”“浑蛋”。方巧在电话里争辩了几句，继父开口就说她，“当年害死了一个弟弟，现在又想害另一个”。

方巧又冤又气，急火攻心大病了一场，住了半个月的医院。

“你电话咋还关机呢？”

“家里天天给我打电话，一边骂我一边让我去跟大弟赔礼道歉……”

我心里有些自责，觉得自己不该“多管闲事”，又怕方巧想不开。脑子里组织了很多语言，打算开导一下她。然而还没等我开口，方巧却抢先对我表示感谢，说如果不是我提醒，她还一直蒙在鼓里。

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

6

2015年年初，看方巧一段时期以来行为良好，没有再去“捞偏门”，我便把她从“临控”人员名单上撤了下来，平时主动和她接触的次数也相应减少了。

但方巧却时不时来找我，问我一些培训的事情。我有些奇怪，以为她大弟又来找她骗“培训费”，方巧跟我说，是她自己想学点东西开个店，二十多岁了，“要为自己活着”，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

她的观念转变令我十分欣慰。从警以来，抓过那么多“失足妇女”，在派出所里个个都掏心挖肺地承诺以后绝对会改行，但一从拘留所里出去，基本都把自己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方巧这句“要为自己活着”却很有深意，她本性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女孩子，若不是家庭的原因，她也不会去“捞偏门”赚钱。

我问方巧想学什么，她说高技术的东西她学不了，就学点动手能力强的吧，“美容美发美甲、裁缝、化妆、家政什么的都行”。

“那你回山东呗，你想学的这些专业蓝×技校都有。”

方巧却说她再也不想回去了，那个家已经把她伤透了，她在努力学说武汉话，决定以后就留在湖北了。“我想以后学好了，回来自己开一家店，做老板！”方巧笑着说，眼神中充满了向往。

我也替她高兴，还上网找了几家培训机构，反复考察了广告的真实性和教学实力之后，推荐给了方巧。她选了武汉的一家，又找我借钱凑够了学费，便兴高采烈地准备上学去了。

“那个，到了武汉……”我有些担心，想给她提个醒，毕竟她有过前科，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能不伤着她。

方巧立刻听出了我没说出口的下文，直白地告诉我，以后哪怕再难，她也绝不会去碰那个行当了。

“你弟那边的学费……”

“前段时间我妈打电话替他跟我求情，说他研究生没考上准备找工作，手里没钱，让我不计前嫌再资助他一下。我把工资卡里所有的钱都打给了他，但以后不会再出一分钱了。”

“那个家，以后再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方巧的语气很决绝。

我想劝她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吧。

尾声

方巧在武汉培训了半年，取得从业资格后，进入武汉一家有名的连锁美容美发机构工作。

参加工作之后不久，方巧给我发来了她的工装照和工作环境照片，说老板很赏识她，准备把她列入“储备店长”序列加以培养。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地夸她越来越漂亮了，好好干，以后争取做“女强人”。

方巧要把之前欠我的钱打给我，我说钱不急着还，你之后不是想回来开店嘛，开店也需要本钱，那点钱你先拿着吧，选地方的时候欢迎选在我的管区里，我负责“罩着”你。

电话那头，方巧犹豫了许久，说自己打算就此留在武汉发展，不再回来了。

“也好，武汉毕竟是大城市，发展空间不是我们这个地方能比的，好好赚钱。”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却突然有些莫名的失落。

方巧听出了我的失落，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是……想彻底忘掉以前的那些事，警官，之前……谢谢你！”

“放心，你在我这边的一页翻过去了，你不提、我不提，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祝你今后一切顺利！”

插他两刀的兄弟

1

我刚到派出所不久时，就知道喜子这个人。

喜子一直跟舅舅生活，舅舅退休前在派出所工作，而喜子退伍后暂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来派出所当过两年协警。后来，不知为何离开了派出所。

虽然离了职，但喜子依旧常来所里玩，平时在外面见了民警也是一口一个“大哥”。

与喜子对人的热络相反，所里民警似乎都不愿与他“深交”。有时和同事在路上遇到喜子，喜子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递烟，同事的反应却很冷淡，即便是有些常常吸烟的同事也会推说自己“刚刚灭了（烟）”。

起初看到同事们这样对待喜子，我心里多少有些凄凉，感叹喜子虽是个协警，但毕竟在所里干过两年，怎么人一走，茶凉得就这么快。

虽然当我分到派出所时喜子已经离职，但后来我们还是成了朋友。他比我小三岁，自来熟，经常趁我值班的时候来派出所找我，遇到有人在值班室扯皮，他还会插嘴说几句话。喜子从小在这一片长大，周围很多熟人，有时他三言两语的“公道话”还真能把人劝开。

看他做起调解来“轻车熟路”的样子，有时我还说他不在派出所干真可惜了。喜子听了，总是摇头笑笑，不多说什么。

喜子不干协警后，并没去找个固定工作，总是这里跑跑、那里混混。他是一个讲究义气的人，平时说话做事“江湖气”很重，身边倒也聚了一帮朋友、兄弟。

每每和同事聊天时谈到喜子当时从派出所离职的原因，感觉同事们对此事大都避讳不愿多讲。问多了同事就会有些不耐烦地说："那个事儿你别再打听了，总之尽量和他拉开些距离就是了。"

直到后来，终于有位要好的民警悄悄告诉我，喜子当时离职，是因为"出事儿"了。

"出啥事儿了？"

"他犯了个蛮大的'忌讳'……"民警讳莫如深地说。

2

那是2011年春天，一天中午，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突然到访，在同事们惊诧的目光下，带走了还在值班的协警喜子。临走时，所长命令喜子脱掉警用外套，去向邻市公安机关"把事情交代清楚"。

还未等同事们回过神来，本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和纪委干部便出现在所里，对所有民警进行了约谈。

原来，喜子惹下了大祸。一周前，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有一起"部督"毒品案件到了收网阶段，几个重要嫌疑人的行踪已被确定，其中一人是本市户籍，就在我们辖区居住，抓捕时需要我们派出所民警配合。

邻市公安机关通报了案情和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所里也安排好专人做好配合抓捕的准备。然而，就在行动前夜，那名嫌疑人却突然失踪了。

邻市禁毒支队的民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将差一点就逃出边境的嫌疑人从云南抓回。

经过审讯，嫌疑人交代称是自己的表弟提供了警方即将对自己采取行动的消息。民警随即又抓捕了嫌疑人表弟，审问他的“消息”从何而来，表弟便把喜子供了出来。

喜子作为协警，本没有获知抓捕行动细节的权力，办案民警又是几经查问，才知道是我们所里的一位民警，无意中把行动的事情透露给了喜子。

喜子和那名嫌疑人并无瓜葛，但却和嫌疑人的表弟是“好兄弟”。得知行动消息后，喜子本是好意提醒“好兄弟”规矩一点，风口浪尖上别跟他表哥在一起瞎混。“好兄弟”不明就里，非要问喜子原因，喜子想了又想，在得到对方“绝不泄密”的保证之后，把实情告诉了他。

没想到，嫌疑人的表弟可没有将喜子当作“好兄弟”。喜子前脚离开，他后脚想都没想就打电话通知了表哥，还特地跟表哥强调说：“是派出所上班的喜子漏出的消息，绝对错不了！”

真相大白之后，嫌疑人的表弟被判了刑，泄密的民警也被调离了公安机关，喜子虽然没有直接向嫌疑人通风报信，但行为也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了巨大损失，最终被所里开除。

那个被调离公安机关的民警，之前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本来前途光明，但因为这事儿脱了警服，所里很多民警都认为，是喜子害了他。何况“通风报信”是公安机关工作中的大忌，因此喜子走后，没人愿意再跟他打交道。

“所里的民警大多是他舅舅退休前的同事，他有事没事地来派出所晃悠，民警们看在他舅舅的分上，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赶他走，但也都不想和他有什么瓜葛。”

“他在派出所工作了两年，起码应该有点政治觉悟，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人是个好人，讲义气，但脑子好像不怎么够用，加上交了一帮别有用心的朋友，把他给坑了。”

3

刚认识喜子时，他给我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

他经常说自己“兄弟多”“路子广”“遇到难事儿跟他说一声”，而且确实说到做到，有时辖区组织一些群众性的互动活动，需要有人协调、帮忙，只要一个电话，喜子从不推脱。

2013年年底，我买房差两万块首付，急得焦头烂额。本没打算向喜子开口，但他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二话没说给我把钱打了过来。

我问他，你也没有工作，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他说这是他的退伍安置费，让我先拿去用。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还钱的时候，我要付给喜子利息，他坚决不要。

喜子爱喝酒，说自己特别喜欢在酒桌上被众星捧月般的感觉，我也经常在夜间巡逻时遇到醉醺醺的他与一群人吆五喝六地走在大街上。喜欢喝，自然就喜欢“攒局”，彼此相熟之后，他经常打电话约我去参加他组织的酒局。

“你是外地来的，在本地认识的人少，没事儿我给你多介绍介绍！”

我去过几次，发现喜子的酒局上各色人等俱全，而且基本酒过三巡，都会无一例外地拍着胸脯说：“喜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啥时候有用得着兄弟的说句话就行！”

酒席结束，见喜子还在兴头上，其他人便开始撺掇他：“去‘好乐迪’唱歌吧，听说那儿新上了设备！”

“量贩式KTV有啥意思？还是去‘钻石国际’呗，听说那儿新来了几个姑娘……”

喜子一挥手：“好！今晚去‘钻石国际’，我请客！”

但一转身，我却分明听到，有人刚出饭店，便躲到一旁打手机呼朋唤友：“快点儿过来，今晚那个‘憨货’请客‘HAPPY’……”

我把喜子拉到一边告诉他，喜子说我肯定听错了，他们都是“兄弟伙”的，不可能有人说出这样的话。

后来，我渐渐感觉自己很不适应这种聚会，便推说有事不再参与，也劝喜子注意交友的分寸。

“年纪轻轻多去学点东西，你才二十出头，出去上上学，整天在家瞎混什么！”

“我这怎么是瞎混？！人在社会上走靠什么？就是靠兄弟多、朋友多、够‘江湖’！”喜子向我阐述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对我的建议很是不屑一顾。

“兄弟都是平时处下的，我现在是没啥事儿，你看不出来，等我万一有事儿了，才能体现出这帮兄弟的‘价值’来！”喜子总是憧憬着有朝一日他的这群“兄弟”可以为他“两肋插刀”。

“你当人家是兄弟，人家拿不拿你当兄弟呢？”我想起他当年被“好兄弟”坑得丢了工作，忍不住怼了他一句。

那件事对喜子的刺激很大，他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一时住了嘴，不再说下去。

一次，遇到喜子的舅舅，提起喜子，老人对我说：“这孩子真就是个憨货！”

“为啥？”

“你看不出来他那帮‘兄弟’都是什么货色吗？”

喜子的舅舅说，以前聚在喜子身边的那帮人大多是辖区麻将馆、网吧的小老板，和一些靠“捞偏门”为生的人。那帮人跟喜子走得近，就是因为他当时在派出所当协警，多少知道点事情，指望他关键时刻能漏点消息出来，后来喜子离开了派出所，那帮人就不和他玩了。

现在聚在喜子身边的这帮人，则是看喜子手里还有点儿退伍费，哄着喜子带他们吃喝玩乐。

“你看着，等他把那点儿退伍费花完了，那帮人还跟不跟他玩！”

“叔你也别太悲观，喜子毕竟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不会那么不开窍。”

“唉，干咱们这行的，社会上的朋友，究竟有几个是真心实意的，也只有咱们自己知道，喜子这孩子从小就不会交朋友，你有空儿帮忙看着他吧。”

我点点头。喜子交朋友没原则，这一点，他舅舅和我一致认同。

“这孩子从小不会拒绝人，就这毛病迟早把他给害了！”老爷子叹气说。

4

2014年5月，我从外地学习归来，听同事们说喜子“又出事儿了”。

就在我出外学习的几天里，有人举报辖区一家网吧里偷偷摆了几台“老虎机”组织赌博。民警出警后查获了老虎机，并将网吧老板带回了派出所。审问老板老虎机是哪儿来的，他支支吾吾不肯说。审讯还

没结束，喜子却突然来到派出所，找到带班副所长，说老虎机是自己的，跟网吧老板没有关系。

带班副所长自然抓了喜子，并准备沿着线索“深挖”。喜子暂时被判治安拘留十天，如果后期还有新的发现，再转刑拘。

我回来时，喜子还在执行期里。我感觉事情有些蹊跷，连忙开车去了拘留所，把喜子提出来问话。

“老虎机真是你的？”按照我对喜子的了解，他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门路”，我怀疑他是在替人“背锅”。

可是喜子坚定地点点头，一口咬定老虎机就是自己的。

“别跟这儿扯淡！你说是你的，那你告诉我，你从哪儿弄来的？难不成是你自己生产的？”

“哥，你别问了，这事儿我一个人扛了！”喜子被问急了，回了我一句，摆出一副不再搭理我的样子。

“这事儿你扛得了吗？！你别以为拘留十天就算了，你知道这事儿有多大吗？两台以上老虎机就是刑事案件，你这事儿真要坐实了，准备好坐牢吧！你档案上留下污点，将来你找工作、结婚、入党，甚至孩子的前途都会受到影响！”

喜子听我这么说，有些动摇，但又拗不过自己的“义气”，依旧坚持说老虎机是自己的。

我看说不动喜子，便开车去了网吧，将网吧老板从后院扯出来，瞪着他说：“你但凡有点良心，就别让喜子给你扛这事儿。这些东西进出货都有固定渠道，我们顺线查下去肯定能找到主家。你最好现在告诉我，不然之后被我查到了，你的网吧就准备关门吧！”

网吧老板支吾了半天，最终还是担心网吧被封，对我说了实话：老虎机是网吧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买来，放在他网吧里“赚外快”的。我向所里做了汇报，所里组织民警很快将网吧老板的亲戚抓获归案。

我再次来到拘留所，提出喜子来把他痛骂一顿，问他为什么替人扛这事儿。喜子寻思了半天，说网吧老板被我们抓走后，老板娘就请他帮忙去派出所“求求情”，说那个弄老虎机的亲戚家中情况特殊，有老母亲卧病在床需要人照顾，一旦亲戚进了监狱，老母亲也完了。

那女人一个劲儿地称喜子“重义气”“够江湖”“一看就有做‘大哥’的气质”，这下算是抓住了喜子的要害。喜子头脑一热，便跑到派出所，声称网吧里的老虎机是自己的。

“放他娘的屁，那家伙的娘死了快十年了！”我气得忍不住爆了粗口，“你脑袋让门夹了吗？别人只是让你去求情，你怎么还往自己身上扣起‘屎盆子’来了？！”

喜子说，他觉得这是一个证明自己“朋友圈”能力的好机会——本以为之前在派出所工作过两年，外加看在自己舅舅是老民警的分上，所里的民警能多少会给他些面子，对他从轻甚至免除处罚——结果没承想“老同事”们当天晚上就把他送进了拘留所。

“你他娘的真是头猪，忘了你的工作是怎么丢的了！”我气得不知再说什么好。

5

老虎机事件之后，网吧老板一家不但没有感激喜子，反而认为是喜子出卖了自家亲戚，先是取消了喜子在网吧上网的优惠，然后又不断地在坊间传话，说喜子是派出所的“耳目”“二五仔”。

一些“好兄弟”开始疏远喜子，还有人甚至扬言要“教训”喜子。喜子请客“攒局”，那些人也不来，他很苦恼，跑来派出所找我诉苦。

“以前都是‘兄弟伙’的，他（网吧老板）做事怎么这么不‘江湖’！”

“这下看到你这帮‘兄弟’的真面目了吧？你还指望自己出了事儿他们帮你扛？醒醒吧，平时不坑你就阿弥陀佛了！”

可最终，没过多久，喜子还是被他的“兄弟”害了。

2015年年初，喜子在市里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包吃住，月薪3500元。我还没来得及替他高兴，就听说他被兄弟单位抓了。

喜子的舅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叫上我一起去兄弟单位打听案情。一问，居然是“容留他人吸毒”。

讯问室里，喜子垂头丧气地坐在审讯椅上。我要过他的讯问笔录，想看看这次他是不是又在帮人“扛包”。

案情是这样的：喜子找到工作后不久，一个“好兄弟”找到他，请喜子喝了一顿酒，说想“借”厂子分配给他的宿舍用一下。喜子爽快地答应下来，还给“好兄弟”配了一把宿舍钥匙，但不承想，这个“好兄弟”来“借”他的宿舍，是为了吸麻果。

“我们在他屋里一共抓了三个，都不是第一次在那里吸麻果。这三个人早就上了公安局的‘常控’，只要在宾馆登记开房就会引发‘常控’报警，民警就会去做‘临检’，所以他们为了躲避监控，就找到喜子那里。”兄弟单位的同事向我们解释。

“喜子知道那帮人在他屋里吸毒不？”我急忙问那位同事。

同事点点头，说喜子在宿舍里撞见过三人好几次吸毒，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既没有立即报警，也没有阻止他们。

进了审讯室，我把笔录摔在喜子面前，质问他是不是也跟着那三个人一起吸麻果，喜子连忙摇头，说自己当过协警，知道麻果的危害，不

会跟他们一起吸。

“亏你还记得自己当过两年协警！既然自己不吸，为什么让别人在你屋里吸？！”喜子舅舅怒不可遏，抬手就要打喜子。我急忙拦下，讯问室里有监控，不能给兄弟单位惹麻烦。

“都是‘兄弟伙’的，我说了他们几次，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硬赶他们走……”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这是什么行为？知不知道后果？！”

喜子点点头。“我也担心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平时都不怎么回宿舍住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被牵扯进来了……”

那天，喜子那三名吸毒的“好兄弟”就关在隔壁，我进去讯问他们为什么坑喜子。三个人辩解了半天，最后终于有个人说了一句心里话：“那孩子脑子打铁，好说话……”

事已至此，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三名吸毒者不过因为吸食毒品被“治安拘留”，喜子却因为向他们提供场所，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事拘留，最终被法院判入狱半年。

6

2015年8月，喜子出狱。

以前的工厂早已将他开除，那笔退伍费也早都被他用来“处兄弟”花光了。喜子找他之前“处下”的那帮兄弟，想借点钱开个小店，但“兄弟”们大多推说没钱，借来借去，只凑了不到一万块钱。

他的“兄弟们”依旧每日吃喝玩乐，只是不再招呼喜子参加。喜子有时无聊想找以前的“梗兄弟（好兄弟）”们“联络一下感情”，然而，对方要么不接电话，要么推说自己在外地，谁也不愿见他。一次，喜子听

说几个“梗兄弟”晚上摆酒，自己主动找了去，没想到当晚一帮人谁也不点菜，硬生生地在包厢里坐到酒店打烊。

半年的牢狱之灾和出狱后“兄弟们”的落井下石，让喜子伤心至极。他终于不再将自己那套“兄弟多”“够江湖”的“生存法则”挂在嘴边，经常一边生气地喝着闷酒，一边骂那帮兄弟“不是东西”。

最终，喜子还是从舅舅那里拿了三万块钱，加上我借给他两万，总算把店开了起来。

看喜子开店，以前的“兄弟”们又接连有人来找他“出去耍”。喜子见到他们，二话不说就把人往街上推，买东西想赊账的也一概不允。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喜子你个王八蛋，现在当老板了！牛气起来了！赊条烟都不行，打算和我们这帮穷兄弟划清界限哩！”一次，路过他的店门口，听到一个以前的“梗兄弟”站在门口骂他。

“滚！”喜子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父母犯了罪，

一切都完了

2015年1月，我所在的省内发生一起性质恶劣的系列电信诈骗案。

湖北仙桃籍主犯王某伙同多人冒充公检法部门人员，使用改号软件拨打受害人的电话，以“快递包裹藏毒”“信用卡被冒用”“企业账户被封”等借口，欺骗受害者将所有资产打入他们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内，前后共诈骗受害人、受害单位人民币900余万元。

2015年4月，王某及其同伙先后被抓获归案。为了将省内培植此类案件的土壤彻底清除，省厅要求各办案单位对这起电信诈骗案进行深挖。

次月，我所在的公安局抽调了五名民警组成专班，在省厅技侦、网安等部门的配合下，对向电信诈骗团伙售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抓捕。

1

5月8日中午，我与同事们进入位于武汉光谷附近的一栋高层住宅中。有情报显示，该栋22楼的一个单位内，盘踞着一个专门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团伙。

在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敲开了目标单位的房门，出乎意料的是，现场并未出现想象中整齐排列的计算机和惊慌失措的人群。房间里，一个三口之家出现在我们面前。

整洁的客厅，温馨的居室，正在准备午餐的男女主人，还有坐在沙发上抱着宠物看电视的女孩。

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几乎要质疑自己的情报产生了偏差。

面对一家三口的错愕，有同事甚至还劝慰他们：“先别紧张，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带队领导急忙联系技侦和网安部门，对方表示情报完全准确。

接下来的调查也证实了技侦和网安部门的说法，我们在男主人张超的电脑硬盘里找到了80GB的公民个人信息，又在书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三个移动硬盘，里面总共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总数高达2TB。

这些信息以Excel表格的形式保存，里面详细地记录着一个个陌生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银行账号、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辆牌号、工商注册信息等内容。

登录张超的QQ号码，赫然看到多个转卖公民个人信息的QQ群，还有频繁的交易记录。

此外，大量银行“黑卡”（通过互联网购买的冒用他人姓名登记办理的银行卡）、记录有交易金额的笔记本、银行转账记录单等物品也被一一起获，面对这些证据，夫妇俩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随后，技术部门在张超的QQ上找到了他与诈骗团伙的交易记录，又从附近银行的ATM机的摄像头中截取了妻子存取相关款项的视频记录。

一切都已水落石出，我们需要将张超夫妇带回办案场所进行讯问。

临走之前，按照程序，我们还需要对张超夫妇做一份现场笔录。面对民警的询问，夫妻二人似乎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妻子多次小声地询问民警：“能不能少罚点款算了。”

“你不知道自己这事儿有多大？”同事抬头看着张超的妻子。

“嗨，能有多大？不就是些姓名、电话啥的，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你看你们兴师动众的……再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从别处买来的，没赚多少钱……”

“你账上有记录的就有四五万，你觉得多少是多？”

张超妻子一时哑口无言。

2

我们进屋时，张超夫妇的女儿张晓颖正在看电视。张晓颖20岁出头，脸上带着学生气。

张超一开始就说，女儿还在读大学，平时一直住校，对于他们夫妻做的事情并不知情，希望我们能够照顾孩子的情绪，让她回避。

做父母的谁都不想在孩子面前现这个眼，我们也理解，便简单和张晓颖谈了几句，安排她回房间暂行回避。

我和同事们在屋外忙着采集笔录、取证、拍照、拷贝资料、拆卸电脑设备时，隐隐听到张晓颖的房间里传来哭声。正在做现场笔录的张超夫妇也停了下来，带着担忧的神情望着女儿的卧室。

带队领导担心张晓颖一个人在屋里出什么事，便朝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进屋里看看。

走进张晓颖卧室，她正伏在床上抱着被子哭泣。看到她这副样子，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尴尬地坐在她书桌旁的转椅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劝她“放平心态”。

张晓颖对我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依旧趴在床上低声啜泣着。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兴师动众的搜查以及前路未卜的父母，换成是谁也很难“放平心态”。

虽然带队领导没有直说，但我明白，自己此时的任务其实只是“看好”张晓颖，万一她想不开，闹出点事情，我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竭尽所能地劝说着张晓颖，几乎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够宽慰人心的语句都搜刮了个干净，但始终得不到回应。我说得口舌发干，却没有效果，只好闭上嘴巴，静静地坐在那里。

门外做笔录的对话声一直在持续，又过了好一会儿，我实在无聊便掏出手机，打算解解闷。张晓颖却突然停止哭泣，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盯着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我急忙收起手机，也看着张晓颖。

张晓颖思考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话了，语气怯生生的，问我她爸妈这次的事情会有怎样的后果。

我就怕她问这种问题。

因为此时，我既无法给她确切的答案，也不忍心将心中预判的结果告诉她，只好模棱两可地说了句：“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得看你爸妈的配合情况，具体结果也得依照检察院和法院那边的意思。”

“我爸妈不是坏人，求你们放过他们吧……”张晓颖的脸上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下意识地苦笑一下，表示自己现在也无能为力。

我理解此时此刻张晓颖的心态，但父母的大祸已经闯下，法理难容，真不是我们肯不肯放过的问题。

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换个话题和她聊几句。张晓颖时年22岁，在武汉某高校读大四，即将毕业，有一个谈了很久的男朋友，希望毕业后

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

我与她聊了聊有关学校生活和学习的事情，希望能暂时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但她心中终究有所牵挂，两人的对话时断时续。

谈话中，张晓颖不止一次提到，父母不过是从网上“收集”点资料换钱，没杀人放火，不会有多大的事情。

不知是她真的不懂法律，还是故意安慰或是欺骗自己，我只好向她简要讲解了一下“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和认定标准，并希望她对父母的事情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虽然张晓颖还是一名在校学生，但毕竟已经成年了。

张晓颖显然一时难以接受我的劝慰，但也没有什么过激反应，只是坐在床上抹泪。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客厅里的同事通知我现场笔录已经完成，准备收拾东西走人。我起身向张晓颖告辞，走到门口，想起了什么，回头对张晓颖说：“目前事实就是这样了，你是个大人了，有些事情需要撑起来了。”

张晓颖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无助地看着我。

“方便的话通知你本地的亲戚，过来帮忙处理一下爸妈的事情，后期你爸妈办各类法律手续、聘请律师之类的事情，还需要你们来做。”

张晓颖迷茫地点点头。

初步工作完成，众人准备离开，张晓颖也走出门外，张超夫妻需要向她交代一些事情。

现场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我内心非常紧张。带离嫌疑人是整个办案过程中最容易出事的环节，尤其此次带离是在他们家中，还当着女儿

的面。

同事们经验丰富，两名民警看似无意地隔在张晓颖和张超夫妻之间，而后微微朝我点点头。我感觉没什么问题，便和同事各自掏出手铐，迅速上铐并将张超夫妻二人往门口带。

“妈妈——”张晓颖突然朝我们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我吓了一跳，屋里的同事急忙示意我赶紧把人带走，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处理。

回公安局的路上，同事把车开得飞快。我从副驾驶上回头，看看张超夫妇，他们面无表情，各自望向窗外，不知在思考什么。

3

5月9日凌晨，上级要求连夜突击审讯张超夫妇。好在两人都没有犯罪前科，刑警大队讯问室里，张超和妻子没怎么抵赖，便一五一十地向我们供述了自己参与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经过。

两人原本都是武汉某国企的职工，19年前双双下岗后，张超以开出租车为生，妻子则在亲戚开办的超市里打工。

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一家人齐心协力，自是其乐融融。张超开出租车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应事务交给妻子打理。

张超妻子是典型的武汉主妇，精打细算、善于持家，虽然收入有限，但在她的筹划下，不仅家庭生活井井有条，还赶在光谷房价飙升之前置办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商品房。

在旁人眼里，张超妻子是个“蛮精明”“路子野”的女人，超市打工之余，她开过淘宝店、做过微商、炒过股票、做过家政、摆过夜市，只要能赚钱的事情都做过。

张超妻子说，她竭尽所能地搜索和尝试任何可能赚钱的门路，一来为了偿还房贷，二来也是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

“女儿大学读的是三本，学费、生活费林林总总加起来，每年接近三万块，经济压力大得很。”张超妻子抱怨。

2014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朋友口中获得一条“赚钱门路”，朋友介绍她加入了一个名为“信息服务”的QQ群，花1000元购买了一个文件包，又在另一个QQ群里以15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转手赚到了500元钱。

整个交易过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张超妻子看着账户里多出的500元余额，心中激动不已，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此后，张超妻子便开始沉迷于这一“捷径”，开始只是作为超市打工之余的“兼职”，后来感觉“兼职”有时一天所赚的钱要比在超市辛苦一个月的收入还高，便索性辞去了工作，在家成了一名专职的信息售卖商——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也不再仅限于QQ群里的买卖了。

张超起初对妻子辞去超市工作专心做“信息服务”感到不解，但看到妻子支付宝账户里不断上升的余额后，也被这条“财路”吸引，主动加入了进来。

有了张超的协助，妻子开始将“业务范围”由线上发展到线下。在“同行”的指点下，张超夫妇陆续从各种渠道购买了一些没有实名认证的手机卡和银行“黑卡”；除了直接购买QQ群里那些已经被整理完成的“二手”公民个人信息外，张超夫妇还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了房地产商、汽车4S店、电信营业厅、旅行社、金融服务企业等单位的个别工作人员，从他们手中购买客户的各种个人信息，自行整理后挂在QQ群和一些非法论坛上销售。

由于夫妻二人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一手”“质量高”“内容全”“新鲜”等优点，在QQ群和论坛里的销售量一直名列前茅。有些购买者出于各种目的，有时甚至点名要求出高价购买张超夫妻整理的信息。

几个月的时间，夫妻二人卖出的公民个人信息就达到上百万条，看着账户里不断上涨的存款数字，夫妻俩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你们自始至终就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吗？”我一边打字记录，一边抬头问张超妻子。

她摇摇头，说自己开始确实有些顾虑，但后来听群里的“同行”说这些东西不涉及国家机密，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获得的信息，顶多算是“灰色产业”，完全谈不上违法，自己也就打消了顾虑。

4

不到半年的时间，张超夫妇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流水就超过20万元，从中获利6.7万元。

至于这6.7万元赃款的去向，张超妻子说，这笔钱他们一直存着，没舍得花。

“女儿马上大学毕业，男朋友也谈了两三年，双方父母都见过，孩子说他们两个人准备考上公务员后就结婚，对方家庭条件不错，已经在汉口买了新房，我们也想给孩子攒钱买辆小轿车。”

“唉，都是讨生活，别的赚钱门路我们两口子也找不到，不都是为了孩子嘛，怕她以后在婆家没面子……”

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继续说了，同时心中暗自叹息，现在已然东窗事发，买轿车给女儿挣面子是别想了，也许他们更该关注自己的行为将会给孩子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警官，我们两口子不懂法，平时从没做过违法犯罪的事儿，这次也真的没安害人的心。你看我们又不是杀人放火啥的，如果把钱退了，能不能放我们一马？罚多少钱我们都认！”另一间询问室里，张超不断忏悔，也不断恳求警方能不能“下不为例”。

“罚钱？你还觉得你们这事儿就是交点罚款这么简单？”

张超也许不知道，在夫妻二人通过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6.7万元背后，是十几个同他们一样的家庭被骗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有的家庭因此破碎，有的受害者因此精神失常，甚至服毒自杀。

我和同事曾在武汉某医院见到一名受害者的老伴，他的妻子被这个诈骗团伙骗去了一生积攒的58万元巨款，得知受骗后当场心脏病发作离世，他也因悲痛过度住进了医院。而侦查结果显示，他老伴的个人信息，就是通过张超妻子收集并售卖出去的。

“这次的事情你们是过不去了，如果真是心存悔意，就把交易的上下线一五一十交代出来，争取个宽大处理吧。”同事冷冷地说着，把一本厚厚的受害人笔录甩到张超面前。

“看看吧，别觉得委屈，上面全是被你卖出信息的受害者情况！”

张超怔怔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笔录副本，先是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而后绝望地将头抵在了卷宗上。

当晚，夫妇二人如实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了大量与其一同从事公民个人信息搜集和销售的人员情况。根据夫妻二人的供述，公安机关继续出击，将整个通过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的地下链条连根拔起。

2015年7月，经法院审判，张超夫妇虽有立功表现得到了从轻处理，但依旧因涉嫌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五年。

这件案子就这么了结了。

5

2015年年底，我再次遇到半年前配合我们敲开张超家门的那位社区民警时，他忽然告诉我，张晓颖死了，跳楼自杀，在2015年8月的一个深夜。

“跳楼死了？为什么？”我眼前浮现出张晓颖的容貌，还有押解张超夫妇出门前的那一声绝望的“妈妈”。

社区民警说，张晓颖今年参加了省公务员考试，已经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成绩很不错。但在入职前的政治审查过程中，因父母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羁押，张晓颖未能通过主要家庭成员的政治审查，被录用单位取消资格。

男朋友顺利考入理想单位，男友爸妈却担心此次家庭变故以及张晓颖父母的罪犯身份，会给儿子未来事业发展带来潜在危害，便强令儿子与张晓颖“划清界限”。

男朋友考虑再三，最终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向张晓颖提出了分手。

面对家庭、工作和感情的三重变故，张晓颖一时没能找到出口，便在深夜拉开家中阳台的窗户，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你们抓走她爸妈的时候，孩子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考公务员这事儿基本上没谱了，只是心里还有点侥幸，觉得父母的事情不大，应该过不多久就能被放出来，结果……”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所里找到了张晓颖的前男友，他是这样说的。”

专案已经结束，张晓颖的父母也早已被收监服刑。我无法获知夫妻二人听到女儿死讯后有着怎样的反应，也不敢去想象张超夫妇出狱后该如何面对残酷破碎的现实。

“这孩子也真是够惨，事情都赶在了一块儿。”社区民警的表情中既有惋惜，也有无奈。

“那家人也真是……”我忍不住想挖苦张晓颖的前男友一家几句。

“唉，啥也别说了，这种事儿放咱谁身上也难说会怎么做……”社区民警打断了我的话。

尾声

后来，每当同事提起2015年的电信诈骗专案，我都会想起张晓颖。

心中情绪复杂，难过？惋惜？甚至有时会感到莫名的内疚，但转念一想，又不知自己的内疚从何而来。

更不知她从22楼跳下的那几秒钟里，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挣扎。

“你说，那孩子跳楼之前，最想不开的是什么？”我问同事。

同事也摇摇头。

为了利益，

断了兄弟手足

2016年8月，以尚材为首的涉黑团伙案开庭审理。

主犯尚材因身患疾病，被抓获后一直在武汉安康医院监视居住。8月12日，开庭时间临近，尚材由安康医院转至我市中医院等待上庭，局里指派我与另一名同事进入病房看管。

我对尚材这个名字早有耳闻，他在坊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号，一个是“著名乡镇企业家，资产过亿的地产商人”，而另一个则是“手下百号马仔、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老大”。

当我见到尚材本人时，眼前的他不过是一个患有严重糖尿病和高血压的47岁谢顶、矮胖男人。他倚靠在特护病房的床上，穿着医院统一发放的竖条纹病号服，与护士交谈着，言语中满是客气，甚至可以说是谦恭。

乍一看去，尚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电脑城批发配件的小老板，早市卖热干面的憨厚大叔，大街上的中年出租车司机。如果不是与床架铐在一起的手腕和身旁坐着的警察，没人会把他与威震一方的“黑老大”联系起来。

此次出庭的27名被告中，22人是尚材的亲属，既有兄弟辈，也有子侄辈。一起专案抓了一帮亲戚，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加上病房里看管疑犯的日子着实单调无聊，我便与尚材聊起了他的往事。

1

“我以前还真卖过热干面！”尚材笑笑。他是孤儿，父母去世早，在同村亲戚的接济下长大。17岁那年，尚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便随叔叔来到汉口卖早餐，一干就是五年。

堂弟尚武小他一岁，上完初中不愿再读，也一同在早餐店里帮忙。

我认得尚武，涉黑团伙的另一主犯，服刑人员，尚材当年的左右手，现在的主要检举者，按港台那边的说法，他应该被叫作“污点证人”。

1994年年底，叔叔的店面搬迁，尚材不愿继续奔波，便回了老家尚家村，靠着跟叔叔学到的做饭手艺，在村口开了一家小饭店，算是个挣口饭吃的营生。

尚材赶上了好年景，当时尚家村被市里划入新区建设范围，大批工程项目开工，小饭店开得红红火火。到1996年，他不仅还清了开店时借下的外债，还攒了几万块钱。尚材用这笔钱娶了媳妇、盖了新房，成为村里人的羡慕对象。

堂弟尚武也回到老家，跟着尚材一起开店。弟弟的加入让尚材很高兴。多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尚材决定把店面扩大一些。

1998年，省道改线路过尚家村，村子周围越来越热闹，尚材的小餐馆也逐渐升级成为吃饭、住宿、停车一条龙的中型酒店，还雇了不少厨师和服务员。

尚材说，那时他的目标是赚钱买两台车，一台轿车私用，另外再买一辆货车，雇个司机跑运输。因为来他们店里吃饭的除了工地上的人之外，还有很多来往的货车司机，尚材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新的商机。

2

“那你后来为什么没有去跑运输，而是去搞土石方了呢？”我问尚材。

尚材想了想说，事情得从2000年3月说起。

一天，尚材接到一位同族长辈的通知，让他晚上来家里坐坐。尚材去了之后，发现长辈家里坐满了人，基本都是自家亲戚。

尚材有些蒙。晚饭时，那位长辈揭开了谜底——他们希望尚材出面牵头，带着大伙去工地“搞点事做”。

“说白了，就是去工地‘擂肥’（敲诈）。”尚材跟我解释。

那时村民们去周围建筑工地“搞点事做”，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被开发商征用耕地后，村民们虽得到一笔补偿款，但由于没有其他生计，除了小部分人外出打工，大多数人只能在家坐吃山空。

按尚材的说法，去工地“搞事做”也算是无奈之举，搞来的“事”也各式各样。有的村子组织了几个施工队去工地打工，有的村子则分包了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程。但无论哪种形式，都不是工地一方可以拒绝的。如果拒绝，轻则被村民频繁骚扰，重则被堵门封路。甚至有的村子什么都不做，只是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向来往的施工车辆收取“过路费”。

当时，周围几个村子已经有人走在了前面。亲戚们说，邻村的混子陈山之前带着一帮人拿下了几个工地的土石方工程，赚得钵满盆满。“既然陈山能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干？”

“当时为什么让你去牵头？”我问尚材。

他笑笑，有些无奈，有些自嘲，甚至还有一丝恼怒。“用他们的话说是我这个人年轻有魄力，开店也见过世面，但我心里清楚这事我干大伙儿没顾忌……”

亲戚们算得很清楚，尚材是孤儿，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媳妇还是外地的。这事儿干成了大家一起受益，真要是干砸了惹出什么祸端，尚材

无父无母，大不了凑笔钱，让他带着老婆远走高飞。

尚材说他一开始也不想答应，自己的饭店效益不差，收入完全可以让一家人过得逍遥自在。但一族亲戚大多没什么赚钱门路，都将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自己从小到大一直靠亲戚们接济，现在有事找到自己，没有拒绝的道理。

当然，尚材自己也承认，混子陈山那两年的发迹也的确令自己眼红。陈山家原本是邻村的破落户，穷得叮当响，但这几年，就靠着土石方工程，不但摘掉了破落户的帽子，还开上了小轿车。

都是“靠山吃山”，凭什么全被他吃了？

尚材把这事应了下来。

陈山的做法很直接，就是在村里找一帮人，年轻的跟他去工地上谈判，要求承包工地的土石方工程；如果谈不成，年纪大的就带好板凳马扎，直接去工地门口堵门——你不让我做，那谁也别想进来做。

工地报警也不好使，警察前脚把人赶走，陈山后脚再换一批人过去。村里不缺闲散劳动力，反正在家也是闲着，跟陈山去工地每次还有50块钱拿。

施工方被搞得没有办法，又不敢得罪本地村民，只得就范。陈山虽然自己没有资质做土石方工程，但可以包给外面有资质的公司做，转手就是一笔钱入账。

尚材摸清了陈山的路子，便开始学陈山的套路。尚材也有这个底气，一来尚家村也是大村，尚姓又是村里第一大姓，村民追溯一下家谱，多少都能攀上点亲戚关系。

更重要的是，尚家村周围的工地远比陈山他们村多。

3

尚材的加入自然引起了陈山的不满，两个“牵头人”之间的矛盾很快上升为两个家族乃至村庄间的冲突。陈山试图与尚材谈判，但眼前的利益谁也不愿让步。谈判桌上，两人不欢而散，谈判桌下，两村村民也针锋相对起来，先是见了面相互叫骂，而后发展到棍棒相加。

“抢工程最厉害的时候，两村都是每家出一个人，去国道上守着，只要看见对方村里拉土石方的车辆，马上赶走，如果赶不走，拦下车来就把司机暴打一顿！”

我见过此案的卷宗，有至少三十几名证人证实过尚材的说法。

“黑社会封路？当地（政府）不管？”我问尚材。

“也管过，但没多大作用。村委会面上制止，但钱就放在眼前，你让哪个不去拿？”

除此以外，两村人之间也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比如报警——无论发生怎样的后果，两村人都不会通知警方处理。“为了抢工程，轻伤、重伤甚至死了都有价钱，照价赔就是，谁要是通知了警察，就是断了全村的财路，那同村不找他玩命才怪。”尚材说。

“死过人吗？”我试探尚材。

他明显看出了我的意图，哂笑了一下，摇摇头。但顿了顿，又改口说死过一个，但和抢工程没关系。

他说的就是陈山。

陈山死于2003年，那年8月，他的轿车与一辆工地施工卡车相撞，脖子被拧成了麻花。当地交管部门判定是一起普通的车祸，但陈山的家

人不服，坚决认为是尚材一伙害死了陈山，至今都没有停止上访，因为肇事者正是尚材的一位同村亲戚。

“陈山的车祸是你们谋划的吗？”

“我说不是，可你们信吗？”尚材反问我。

我也笑笑，不好作答。

陈山死后，尚材最大的竞争对手消失了。陈山的同伙虽然陆续推举出了几个牵头人，但都没有陈山的能力，很快就被尚材打压了下去。

2005年开始，尚材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他以尚家村为根据地注册了公司，不但垄断了周围大小工地的土石方工程，还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

之后的四年，尚材风光无限，到了2009年，他的公司至少从表面看来已经走上正轨，招聘了过百名员工，土石方工程已经成为副业，主业是搞地产开发。

公司每年净收入上千万，尚材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场新贵”。每次出门，身边都会跟着两台车十几号人，很是气派。从乡镇到区县一级政府都很给他面子，更不用说在尚家村，尚材说话比村干部好使得多。

回忆起这些，尚材的脸上难掩骄傲的神色。

4

“说说你和尚武的事情吧，你们是怎么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我问尚材。

尚材沉默许久，方才叹了口气说，自己当初如果不和堂弟共事，也许两人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按照尚材的说法，堂弟尚武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脑袋比一般人聪明，胆子也大，做事雷厉风行；而缺点是做事情没有底线，完全不讲规则。

“我和尚武不是一路人，我本质上是一个生意人，一切向钱看，当年对付陈山一伙也是为了‘抢市场’赚钱。但尚武不一样，他很江湖，甚至可以说是个亡命徒。”

尚材与尚武的分歧产生于2007年，起因是一笔巨额赌债。

那年3月，尚材派堂弟前往广东谈生意，那是他拓展省外市场的第一步棋。为了讨合作伙伴欢心，尚材特意交代，让尚武请他们过关去香港和澳门游玩一趟。但没想到尚武在澳门耐不住诱惑，本来是“陪同旅行”，结果自己却赌性大发，不仅一口气输掉了600多万元，还吓跑了合作伙伴。

尚武此举给了尚材当头一击，两人大吵一架，差点儿因此决裂。

尚材生气堂弟嗜赌成性，毁了自己的规划，要找尚武算账；尚武则认为堂哥的事业是自己一手支持起来的，自己也是公司中的二老板，为公司赚了不少钱，做事理应百无禁忌。

尚武甚至在公开场合把话甩在了尚材脸上：“想想你当年开小店和斗陈山的时候，要是没有我尚武的帮衬，哪有你的今天？现在你尚材飞黄腾达，竟然为了区区几百万和我过不去，简直是狼心狗肺。”

尚材一怒之下，要把堂弟逐出公司。虽然此事在亲戚的劝说下最终不了了之，但还是在兄弟二人间划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其实我当时搞尚武，也不单单是因为他赌掉了几百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尚材解释，公司算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绝大多数部门的领导都是自家亲戚。公司初创时，大家可以凡事拧成一股绳，但随着公司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比如，内部管理混乱，各项规章形同虚设，奖惩制度根本无法推行，等等。

尚材处置尚武，本想借机给公司中的亲戚们敲一下警钟，但不知尚武是不是不理解他的用意，在这件事情上始终与他针锋相对。

尚材也明白，如果尚武这次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以后身旁的亲戚做起事来会更加肆无忌惮。但是他又下不了“大义灭亲”的决心，加上亲戚们的掺和，尚武这事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来，尚材悔青了肠子，他说那次自己放过了堂弟，也就等于错过了让公司走上正轨的机会。

5

尚材一直说，自己想做一名正当商人，但直到2014年被抓，他在别人眼里还是一个“黑老大”。一方面，坊间早就把他早年带着村民抢工程的“事迹”传得神乎其神；另一方面，因为他本人经常游走于合法与违法的边缘。

“既然你想洗白，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儿参与之后的事情？”我问他。

尚材苦笑一下，说有句话叫“人在亲友圈，身不由己”。

2009年，尚武又惹出了祸事。上次赌博事件后，尚材虽然继续给尚武发工资，但基本剥夺了他的其他权力。尚武自感无聊，便四处寻觅别的赚钱机会。

赌掉的600万元刺激了尚武的神经，他感觉开地下赌场肯定是一个赚钱的行当。尚武找到尚材，希望堂哥能够给他一部分“启动资金”。

尚材当然不同意。原因很简单，他清楚自己的“底子”本就不那么干净，现在正努力洗白，这当口绝对不能再掺和这种事情。

但尚武的地下赌场还是开了起来，因为他的计划得到了很多亲戚的赞同。尚武承诺，自己会分些赌场的股份给亲戚们，让亲戚们一起上阵去给尚材做工作。尚材经不住亲戚们的劝说，默许了。

尚武从公司账上拿走了60万元，但在尚材的要求下打了借条，上面写明这笔钱是用来做一些合法买卖，尚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免责。

但现在看来，他的愿望应该是落空了，因为在检察院最终起诉尚材的罪状里，还是有一条“开设赌场罪”。

“谁都知道尚武是我最亲近的人，有些事他们说到底还是会算到我头上。而且尚武做事也一直打着我的旗号，不然他根本做不下去……”

果不其然，2009年6月，地下赌场出事了。一名同在“道上”混的赌客在桌面上耍诈，被尚武指挥的“保安”打成重伤。对方团伙扬言要废了尚武，尚武看事情闹大，找尚材救命，尚材不得以出面协调。

尚材想拿出一笔钱了结此事，但对方却说要命不要钱。尚材以为对方嫌少，又追加一笔，但对方依旧要废掉尚武，并几次付诸实施，甚至连尚材自己的生活也遭到骚扰。尚武认为，堂哥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在“道上”的名声和实力与对方硬碰一场，让他们知道尚家人的厉害。尚材却劝说尚武投案自首，让警察来保护他的安全。

尚武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坚决不同意。尚材的叔叔也老泪纵横地跪在尚材面前，说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养老送终，这次要是进去了，估计自己是看不到尚武出狱了。

同村亲戚又一次聚集起来充当尚武的说客，因为他们都在赌场里有股份，一旦尚武东窗事发，他们谁也跑不掉。

6

关于后来尚武究竟如何进的监狱流传着各种说法，但他的亲戚们却口径一致，都说是尚材举报了堂弟。我问尚材真实情况，尚材不愿多说。

整个赌场被连根拔起，尚武也被抓获归案。他确实获得了保护——对方团伙的陈年旧事被牵扯出来，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尚武自己也因开设赌场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刑。

除此之外，由于入股地下赌场，亲戚们也难逃一劫，多人被判有期徒刑。他们开始憎恨尚材，说尚材忘了自己小时候得到大伙儿多少接济，走到今天这步，大伙儿出了多少力，现在他却为了自保把亲戚都卖了，真是狼心狗肺、猪狗不如。

讲到这里，尚材满脸都是痛苦和愤懑，他指责这帮亲戚只记得当初帮过自己，却不记得自己这些年来已经给了他们多少分红和回报。

“我的姑妈一家，在汉口有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开着40多万的车子，但一家人都没工作，这钱哪儿来的？”

“老姨一家全在我公司上班，在村里有洋楼，在市里有复式（房），我表妹在英国留学，这些钱又是哪儿来的？”

“侄子尚××在外面酒后惹事把人打成重伤，法院判他赔人家50多万，这钱谁给他出的？”

尚材说自己这叫“斗米养恩担米养仇”，十次如意换来的感情，一次不如意就全部烟消云散。

“既然这样，你没想过彻底与亲戚们划清界限吗？”我问尚材。

“想过，也确实这么做了……”尚材点点头，然后又说，大家最后也是因此闹翻，自己才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2011年9月，尚材的一个决定越过了亲戚们的最后底线。

尚材说，那时他的房地产公司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效益和发展前景可期。但同时，他也对公司中自己亲戚们的行为忍耐到了极点。

“公司里的规章制度管不了这帮亲戚，做事时谁都不愿出力，分钱时谁都不愿少拿，出了问题谁也不能动，账目也是一塌糊涂。甚至有些过分的亲戚，竟然私自以公司的名义在外面搞事情，还搞得理直气壮！”

经过反复思考，尚材终于下定决心搞一次彻底改革。他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什么是“职业经理人”“股权改革”，但目的却也差不多——把一批“只会惹事不会做事”的亲戚从公司的实际管理层赶出去。

此举立即遭到了公司内部大多数亲戚的反对，近十年来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白天在公司里混日子，晚上躺在床上算分红。尤其是堂弟尚武，人虽在牢里蹲着，但每年账上还能收到数额可观的“年薪”。

他们一直把尚材的公司当作大家的“集体饭碗”，尚材只不过是他们的“牵头人”。他们联合起来否决了尚材一套又一套的“改革计划书”，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要么保持原状，要么公司解散大家分钱。

当然，尚材身边也有几个得力的亲戚，他们站在尚材这边，赞同进行公司结构改革。但这些人很快也成为其他亲戚的攻击对象，一时间公司内分作两派，日常运转几乎完全停滞。

这一次，尚材没有满足同村亲戚的要求，无论劝告、哀求、吵闹、谩骂甚至威胁，都没有改变他的决心。

2012年春节后，改革全面展开。

7

2014年7月，一封举报信彻底改变了尚材和公司的命运。其实在那之前，省市两级多个执法部门已经陆续接到不少有关尚材的匿名和实名举报。

真正引起公安机关关注的，是这封举报信的内容和作者。这封信来自某监狱，举报者是仍在服刑的尚武。

信中尚武说了三件事。第一是尚材早年依靠“黑社会”起家，指挥实施了多起伤害案件；第二是赌博案中尚材为自己提供了原始资金，也应属于同案犯之一；第三是2003年的陈山之死，尚武说是尚材当年授意那名亲戚制造车祸撞死了陈山。

“他之前是我的左右手，知道我的很多事情，他来举报，效果最好，成功的可能性也最大。”尚材说，他从知情人口中得知，堂弟尚武的这封举报信，是一些亲戚用200万元“安家费”和出狱之后公司总经理职位的承诺换来的。

“把你搞掉，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你还看不出来吗？只要把我搞进监狱，公司的改革就会停下来。他们接手之后，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他们举报的这些事情你能解释清楚吗？”我问尚材。

尚材没有回应我。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省公安厅综合多年来针对尚材涉嫌领导和组织黑恶势力团伙的举报，对此案进行了立案侦查，为保险起见，采取了省厅督办、异地用警的办案措施。

经过不懈努力，尚材当年“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犯下的罪行被一一查实，他随即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那些接手尚材公司的亲戚们，还没来得及“反攻倒算”，就发现自己也已无法脱身了。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阻碍执行职务”“敲诈勒索”“强买强卖”，等等，多达16条的罪行不可能是尚材只靠一己之力犯下的，他虽是主犯，但从犯也不能因为举报而免责。

眼看谁也跑不了，亲戚们大惊失色，但很快又陷入无限的内斗之中，相互检举和揭发成为常态，大伙都想依靠举报他人为自己赢得从轻处罚的机会。接着，一些亲戚打着尚材名号犯下的，甚至连尚材本人都不曾知晓的“贩卖、运输毒品”“组织、强迫卖淫”等罪行也一一浮出水面。

连那个原本被计划作为尚材入狱后实施“反攻倒算”的“接班人”，都因为挖出旧案而被刑事拘留，这下公司乱成一锅粥，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下好了，公司垮了，人也都‘进去’了，以后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吧……”尚材最后留下这一句。

尾声

几天后的案件审理现场热闹非凡，因为涉案人数众多，当地法院要求我们在外围实施安全警戒。

中午，我们照旧目送前来旁听的家属们离开法院，同事轻声对我说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对劲，让我做好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因为每个家属脸上都挂满了怒气，人群中还隐隐传来小声的咒骂。

不出所料，一群人刚刚走出法院大门，顿时就乱作一团。远远看去，有人脱下了高跟鞋拿在手中挥舞，有人已经扭打在一起。法院大门口

的保安大声喝止，但他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

我和同事们赶紧朝大门方向奔跑，同时打电话通知本地路面巡逻人员快来增援。

跑到近前，我才听到有人在叫骂：

“妈的，你家那个畜生举报的是你亲哥哥，他亲舅舅！”

“你们一家婊子养的！为了自己少蹲几年竟然连亲戚都不放过！”……

声明

为保护文中当事人和当事单位隐私，本书中所有人物及单位名称均为化名，请勿对号入座。


深蓝的故事
The Story of Shen Lan II
深蓝的故事 2
局中人
深蓝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COPYRIGHT

书名：深蓝的故事2：局中人

作者：深蓝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7月

ISBN：9787513340366

字数：131千字

本书由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言

人间这场局，谁能置身事外

两年前的夏天，如今回想起来，似乎已是略显遥远的事情了。

《深蓝的故事》第一本刚刚出版，仅仅过了一天，首版初印就全网售罄了。那一刻，在北京后厂村巨大的办公室里，编辑部的每一个成员眼里都闪着光。

在此之前——自网易·人间初创起的任何一刻——我都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敢想过，我们这个不大的团队，会和每一位来自大江南北的作者与读者们一起，谱写出一部怎样的人间篇章，一字一句汇聚成的浩瀚海洋，又会在世间留下怎样的痕迹。

而那一刻，一盏深蓝色的灯，亮了。

深蓝是网易·人间的老作者了。

从2016年第一篇仅有3000字的、未完成的“结案报告”，到今天共20余篇、近30万字的作品集，深蓝一点一点地，将自己，一位曾经的一线民警、中国普通三四线城市基层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眼中最真实的社会图景，用平易近人的质朴文字铺陈开来。

深蓝与网易·人间，就这样相互见证着彼此的成长。

自五年前创立至今，网易·人间要求每一位作者的每一篇稿件中，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最开始让你有记录这件事或这个人物的想法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你经历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让你有将它记下来的冲动——写作的初衷如此重要，就如同一盏长明灯，指引着每一个写作者向前，一寸寸地通过文字探寻更幽深的地方。

对于深蓝而言，这个开始多少显得有些“无奈”。

社区里有一个空巢老人，老人有三个儿子，各个都很有出息，却都不在身边。有很多次，都是深蓝和他的同事们出警，把走失在野外的老人接回家。细聊起来，就是一个把孩子送得远、自己却照顾不了自己的一个可怜的老父亲。

相对于自己参与办理的类似连环杀人、毁尸灭迹、非正常死亡等大案要案，反倒是这个略带着无奈和感伤的小人物的故事，让深蓝备受触动，深感自己在职责之外的确还有许多无法做到的事情。

“无论如何严防死守或者严厉打击，各种人间悲剧都并未减少太多。如果仅仅是对于我自己的人生，这份工作的意义究竟在何处呢？”

他说，自己是带着一些不解和思考，也带着探寻与疏解自己内心的冲动才开始的，同时更希望如果能够发表，也看看其他读者会有怎样的见解，或者能对个中让自己这么多年反复思考都束手无策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解决路径——这一切汇集到一起，便是最初决定提笔的原因，后来，也都在两年前的《深蓝的故事》里娓娓道来。

故事总是越挖越深、越写越多，在讨论稿件甚至日常闲聊中，曾经的困惑一个接一个涌出来，便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一幕连着一幕。

法律与制度自有明确的界线，生活却时常黑白不分，而人心之幽暗乃至人性之复杂，更远非单纯的善恶、对错所能简单归类与分别的。像是世间的大幕缓缓拉开，再也没有一个故事、一段人生能让人轻松翻阅而过。

一个吸毒十几年的父亲，在得知自己儿子吸毒、反复“强戒”（强制隔离戒毒）不得之后，发誓要将儿子身边所有的“坏朋友”全部拉下水，用自己的生命换儿子未来的希望；

一起家暴致妻子脑死亡的恶性案件，背后却是老实本分的丈夫，把自己在外辛苦一整年的工资奖金全部交给妻子，不仅被嗜赌成性的妻子输得精光，还欠下了数不清的债的绝望；

一个高中时被同学屡屡霸凌的优秀男孩，最终在“校霸”的不断威胁下，高考失利、精神失常，十七年后一刀捅向了当年的“仇人”，而两个年轻人背后，却另有家人之间的利益纠葛；

还有费尽心思想找个老实下属托付自己精神病女儿的老处长，眼看着未婚妻被毒品一点点拖入深渊、自己却束手无策的年轻警察，因刑讯逼供被判刑八年、出狱后追凶千里也要完成心愿的刑警队队长……

肩负着人民警察的职责，深蓝看似站在每一个故事之外，询问、观察、经历继而反思、下笔。而不论是作为人间主编的我，还是作为读者的大家，我们所阅读的，似乎也只是“他者的故事”。

可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一篇篇如此日常却又如此厚重的血与泪、希望与绝望交织的人生故事中，我们每一个人，又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

我想，看完书中的这些故事，才会有答案。

希望这本书，能带给大家一点光芒，一点思考，一点感动和一点回味。就像里面的每一篇，曾经带给我的那样。

沈燕妮

再见，警长

前言

2016年，三级警长周明在办理一起涉枪毒品案件时殉职，年仅44岁。这三年间，我曾数度提笔，想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数次成稿，又数次放弃。

过去，我曾接受过他的指挥，危难时也曾被他舍命相救，直至殉职，他都是我的战友，我的前辈，更是我奋力追赶的榜样。

可即便如此，他在我心里似乎依旧带着陌生感。

即使后来我又从前辈们的口中和材料里搜寻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可脑海中却依然拼凑不出一个更完整的刑警形象来。他似乎和那些我所熟悉的警察迥然不同，又似乎能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人的影子。

清明将近，我还是决定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1

2012年7月，我在日常巡逻排查中抓获了吸毒人员邓某。

那天晚上，我在讯问室里给邓某做嫌疑人笔录。出乎我意料，邓某很配合，给我讲了很多话——他说自己被妻子抛弃，万念俱灰，染上了毒品。他这些年来一直想戒毒，但前妻家人总来骚扰，让他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所以屡屡戒毒失败。

可能是因为邓某当年做老师的底子犹在，讲话太有感染力，更可能是因为我经验尚欠缺，我渐渐相信了他的话，甚至有些同情他的遭遇，语气也逐渐软了下来。

最后，邓某问我这次他将受到怎样的处置，我翻了一下警综平台的记录，发现他一个月前就曾因为吸毒被判社区戒毒，这次被抓，按程序是要被送去强制隔离戒毒的。

我把实情告诉他，邓某表情痛苦，说自己坚决不能被强戒，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父亲无人照料，他要进去了，父亲也就活不成了；又说自己心脏不好，去强戒也过不了体检，哀求我手下留情，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自己主动戒毒。

我被他说动了，起身拿着笔录材料去找带班领导，试图咨询一下邓某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不办强戒。

那天，我在带班领导的办公室里第一次遇到了周警长，当时他正在和带班领导聊天。我刚开口给领导汇报了两句邓某的事情，周警长在一旁竟直接笑出了声，搞得我一头雾水。没等我说完，他打断我，问了一句邓某关在哪间讯问室后，就自顾自地出了办公室。

我转身继续，领导耐着性子听完我的汇报后，什么都没说，只让我下楼去看看周警长是不是过去了。

我回到讯问室门口，周警长正好从里面出来，见到我，面无表情，迎面就是一句："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你当的么X警察？他的话你也信？还去汇报？幼稚！"然后就径直走了。

我急忙推门进屋，邓某正耷拉着脑袋歪在审讯椅上，协办民警正在电脑上打字。我说："刚才不是说好找领导汇报完再整材料吗，你怎么先做上了？"

同事说不用了，周警长一进来就把他搞定了。

我很诧异地问："他做了啥？"

同事笑了笑，说他啥也没干，就是进来问了邓某一句："你爹还活着呢？"结果邓某一听，马上就给周警长道歉，说自己不该扯谎骗警察。

我当即火冒三丈，一拳砸在办公桌上，"咚"的一声巨响，同事和邓某都吓了一跳。

2

辖区的涉毒人员都怕周警长，那个“道友圈子”里还有一句话：“宁送强戒，不惹周X。”

“周X”就是那群人对周警长的“敬称”。他们都说周警长下手“太黑”——在他那里，从来都没有“苦口婆心”，也没有“嘘寒问暖”，他曾说那些给吸毒成瘾人员掏心掏肺做工作的民警是“闲得蛋疼”，而那些试图感动“老毒么子”的举措，根本就是“浪费国家粮食”。

甚至在领导开会时，他都毫不遮掩自己的“一贯态度”。

一次，局里请一位规劝了多名吸毒人员戒毒的优秀同行来做报告，晚上吃饭时，周警长一言不合，便和那位同行顶了起来，还直言说那些所谓的先进经验“屁用都没有”。

对方脸上当时就挂不住了，作陪领导赶忙打圆场，说：“人家这也是工作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你不学怎么知道不管用……”

周警长就用筷子敲着桌子说：“先不先进咱这儿不谈，咱就看看三年后全国吸毒人员信息平台上还有没有那几个人的名字，现在谈先进？谈个锤子……”

话说完，竟抬起屁股就走了。

我第一次见识周警长抓捕涉毒人员是在2013年年初，当时辖区一家公司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安全动员大会，上百名员工聚在办公楼前的篮球场上接受安全教育。那次，我作为社区民警，应邀参加大会并做安全宣讲，和我一同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那家公司的两位副总以及安监部门的领导。

大会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直到被周警长的出现打断。他带着两名便衣警察直接进入会场，穿过人群径直向主席台走来。所有人都一脸茫然地望着他，我礼貌性地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理我。

当着全公司员工的面，周警长走上主席台，一把抓住台上一名副总的胳膊，亮了一下警官证，就让那位副总跟着他走。那位副总显然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还笑着说："正开会呢，请稍等一下。"可周警长并没有多等一秒钟，副总话音刚落，一把就将副总按倒在桌子上，场下一片哗然。

我赶忙站起来，试图上前去打个圆场，周警长却一把将我推开，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后像拎小鸡一样拽起那名副总，离开了会场。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周警长正在办理一起毒品案件，那名副总因提供交通工具和吸毒场所被毒友供出。此前，那家公司与公安局关系很不错，老总是辖区的"治安先进个人"，每年公安局举办的各种群众性活动对方也一直积极配合。

那位副总被抓后不久，在一次内保单位检查中，我又遇到了那个公司的老总。谈起那天的事情，他一脸幽怨地说，当天与会的除了本厂职工外，还有他请来的合作伙伴代表，本来是要展示公司"积极有为、组织有力"的一面，结果反而当场现了眼。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抓副总，这给厂子管理层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他犯了罪是该抓，但晚一会儿抓，他又不会跑，何必呢……"公司老总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毕竟周警长抓人并没错——但心里总归有点不舒服：那天我在他的抓捕现场，按照惯例，他应该提前通知我要抓人，至少，不该一把将我推开，以至于被他瞪了一眼之后，我像傻子一样站在主席台上，尴尬得不知所措。

后来和同事谈起此事，同事劝我不要放在心上。同事说，周警长那天并不是故意让我难堪，这人就这性格，“他那里从来没有面子一说，对谁都这样”。

“而且，被抓的人也是活该，谁让他落在老周手里呢？”

3

其实早在2004年，周警长曾有机会调往省厅任职。那年他因连续在两起部督毒品案件中立功而受到上级青睐，省厅禁毒总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作为一名基层民警，从地方派出所直调省厅，这几乎是所有人遥不可及的梦想，人们都说，周警长命太好，好得令人嫉妒。

同事们接二连三地给他办“送行酒”，说着“苟富贵，莫相忘”；领导也仿佛一下与他亲近起来，隔三岔五找他谈话，让他“就算去了厅里，也别忘了老单位”。据说当时省厅已经给周警长安排好了职位，只等他交接完手头工作，就可以直接去报到。

但周警长最终却没能走成，局里给出的官方说法是，他对本市公安工作感情深厚，因此主动放弃了省厅的机会。但这个说法着实有些牵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留下的真实原因，知情者则对此讳莫如深，即便私下里有人无意中提起，也很快会在旁人的示意下寥寥数语带过，从不深谈。

作为新人，我当然也不清楚周警长当时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让省厅收回了调令。直到后来，在经办一起案件时，才无意中听到了一个说法。

2013年，在一起系列摩托车盗窃案中，嫌疑人王涛被抓了现行，他本是辖区的一名吸毒人员，也算是“老熟人”了。

王涛时年50岁出头，年轻时就是个混社会的痞子，无恶不作，身边围了一群混子，无人敢惹。为获取毒资，这些年他一直四处敲诈勒索、偷鸡摸狗，家人亲戚也早跟他断了关系，辖区居民敢怒不敢言。

与警察打了半辈子交道，王涛又赖又横，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后来吸毒染了一身传染病，拘留所、看守所、强戒所都送不进去，甚至判了刑，连监狱都给他办保外就医。这让王涛更加有恃无恐。每次犯了事

被抓，脾气比抓他的民警还大，要么胡说八道乱指一气，要么两眼一闭缄口不言。问急了，就喊身体不舒服，故意拖延审问时间。

那天他故伎重施，坐在派出所讯问室里一言不发。虽然我有信心给他办“零口供”案子，但事关系列案件的追赃，我也只能耐着性子跟他讲法律谈政策，希望他如实交代。可眼见着20个小时过去了，他都没跟我说一句案子上的事情。

24小时的留置审查期限将近，带班教导员等不下去了，来到讯问室，铁青着脸对王涛说：“既然我们‘盘不开’你，那就找周警长过来吧。”

没想到，一听“周警长”三个字，王涛脸上的表情立马变了，说话也有些结巴：“多……多大点事……你……你找他来……你找他来做什么呀……”

那天教导员没有把周警长叫来，但之后王涛的态度明显发生了转变。虽然之后交代的事情也有所保留，但至少开了口，我们也很快找到了切入点。

结案后，我好奇地问教导员为何这些吸毒人员都对周警长如此畏惧，教导员反问我：“那你怕不怕他？”

我想了想说：“怕，那副黑脸谁不怕？”

教导员笑了。“连你个警察都怕他，更何况那帮人。”又接着说，“你怕周警长，是怕在了他的脸上，但王涛怕周警长，却怕到了他的骨子里，王涛曾经亲口说过，这辈子被谁抓都可以，就是不能落在姓周的手里。”

4

此前，王涛曾下套坑了辖区一名高中女生，不仅让那个女生怀了孩子，还带她染上了毒品。后来女孩退了学，为了给王涛筹集毒资，一直在外卖淫，被派出所抓住过好几次。

没过多久，王涛“玩腻了”，将女生抛弃，转头找了新欢，女生一气之下留下一封遗书跳了楼，死时年仅19岁。跳楼那天，王涛甚至还挤在围观的人群中看热闹，仿佛这条年轻生命的逝去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那天周警长值班出警，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王涛。周警长没有说话，推开人群就挤向王涛身边。王涛发现了周警长，转身想跑，周警长两步就追上了他，把他按倒在地。

教导员回忆说，那天他和周警长一个班出警，直接把王涛从现场抓回了派出所。他晓得周警长的脾气，还悄悄劝他适可而止，现在纪律要求严格，千万别对王涛动粗。周警长笑着让教导员放心，说自己心里有数。

那天在派出所，王涛矢口否认女生的所作所为与自己有关系。他把女生怀孕说成“自由恋爱”，把女生吸毒说成“耐不住诱惑”，把女生为他卖淫筹集毒资说成“完全是自愿”，最后女生自杀，就是“自己想不开”。

周警长全程微笑着给王涛做完笔录，让王涛签字捺印后就放了人。这让教导员很吃惊，赶忙对周警长说，该给王涛做一次尿检，“天天吸毒，跑不了阳性反应”。

但周警长却反问：“阳性又能怎么样？他这老毒么子顶多认个吸毒，拘留强戒太便宜他了。”

没想到，事发三天之后，王涛竟然主动跑来派出所，跟教导员说自己教唆吸毒，要投案自首。教导员还没细问，王涛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如何唆使那个女孩吸毒、卖淫的经过，教导员惊得目瞪口呆，以为王涛真吸坏了脑子。

听到这里我也很诧异，催教导员讲下去。他想了想，说之后他的话“哪儿说哪儿了”，不要出去乱说，更不要再跟周警长提起——

就在王涛离开派出所的第二天深夜，周警长在一个公共厕所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吸毒，周警长只问了一句：“那个女孩是怎么死的？”王涛还是重复之前的说法，周警长便没再多问，直接把他拽出了公厕，塞进了路边一辆汽车的后备厢里。

车子颠簸了好久才停下，等周警长打开后备厢盖子时，王涛发现自己正在汉江边上，面前有一个新挖的大坑，坑边插着铁锹，周警长阴森森地看着他，手里拎着枪，一句话也不说。

王涛当时就吓尿了裤子，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认罪，他承认自己是为了把那个女生搞到手，故意让她染上了毒品，而后又唆使她出去卖淫给自己筹集毒资。但对于女生的死，他抱着周警长的腿哭求说，真的与自己无关，求周警长放过自己。

那晚，王涛最终安然无事地回到了家，天一亮，就乖乖去派出所投案自首，最终因教唆吸毒领了两年半的刑期。

后来王涛一直坚称，那天晚上他真的从周警长眼睛里看到了杀机，以至于那之后一听到周警长的名字就直哆嗦。那句“宁送强戒，不惹周X”，也就是那时从他嘴里说出，并在“道友圈子”里流传开来的。

我说：“王涛这家伙也是个㞞蛋，没长脑子。这明显吓唬他的，周警长是个警察，怎么会杀他？”

教导员也笑了，说：“鬼知道老周那次是怎么想的……”

那次，周警长“蹲”了王涛两天，平日里，王涛一直行踪诡秘，周警长最终选择在他深夜跑去公共厕所吸毒时才动手。而那个大坑，挖在一个几乎从来都不会有人去的位置，“那个施工量，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完成的……”

“就是吓唬一下，有必要那么认真嘛！”最后，教导员感叹了一句。

“周警长去省厅这事儿也是因为这个才黄的？”我问教导员。

他想了想，若有所思地说不知道，只是听说之后王涛去省厅举报了这件事，地（市）厅两级为此派人查过，但没有结果。再往后，甚至连王涛本人都缄口不言了，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你周警长真的是自己打报告放弃调动的，这个在局里有底的。”最后，教导员坚定地说。

5

那些年，我与周警长共事的次数不多，我本以为他只是对涉毒人员态度粗暴，但后来才发现，我误会了他，他对所有人的脾气都不好，其中也包括我。

起初，周警长听说我的大学专业后，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客套什么“中文好啊，以后可以当局里的‘笔杆子’”，而是转头问了我一句：“你学过侦查吗？”

我摇头，中文系怎么可能学侦查学。

“你懂审讯吗？”他又问。

我还是摇头。

“那法律条文呢，这个总该知道一点吧？”

我赶快点头，公务员考试时接触过一些。但他紧接着就说：“那你把‘违法’和‘犯罪’的区别跟我讲讲。”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答非所问。

他脸上立刻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你看你还戴个眼镜，这要是抓人的时候动起手来……”说了没两句，他就总结道，“现在公安局真是啥人都招啊！”

当时身边还有好多同事，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一旁的同事劝我别往心里去，“他就这脾气”。我也只能尴尬地笑笑。

没过多久，我就和周警长一起办了个案子。

那次禁毒支队收到情报，一名毒贩从外地运毒至我市进行交易，支队决定从各所抽调民警成立专班，在火车站设伏抓捕。在派出所领导的强烈推荐下，专班便把我抽走了。

那天，周警长担任我所在组的领队，一见面他就问我："你所里的刑警呢，怎么把你派来了？老吴、老李又'甩坨子'？"

这样的开场白着实不太友好，我小心翼翼地说，领导派我来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他哼了一声，没把话说完，过了一会儿，回头补了一句，"来了就来了，一会儿听指挥，别自作主张。"

然而那天，我根本没有机会"自作主张"——因为直到行动结束，我都只能一直坐在距离抓捕现场很远的车里——上级原本安排我假扮成放假返乡的大学生去站里埋伏毒贩，但周警长却命令我坐在车里，睡觉都行，就是哪儿也不能去。

晚上8点，行动顺利结束，毒贩被抓，大家回来时兴高采烈，只有我在车里睡得七荤八素，后来的审讯，周警长也没让我参加，直接打发我回了派出所。

回到所里，教导员很生气，怨我浪费了一次学习机会，说哪儿不能睡觉，非去专班丢人。我也很委屈，说自己也不想，可周警长给我的命令就是在车里待着，哪怕是睡觉，也不能下车。

教导员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没过多久，公安局内网上就发了嘉奖令。那天，所里同事都围在电脑跟前看，有人问我："那起案子你不是也参加了嘛，怎么没见你的名字？"我能听出话中的味道，但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好依旧尴尬地笑笑。

我心里对周警长多少是有些不满的——队伍是你带的，命令也是你下的，事到如今你一句话也不说，搞得我在同事和领导跟前有口难辩。我找教导员说，请他出面约周警长聊聊，教导员就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说这事怪所里没跟周警长沟通好，让我别放在心上。

我作为一个晚辈，还能说什么呢?

直到周警长殉职后，教导员才告诉我，其实那次行动结束之后，因着我的事，他是找过周警长的。教导员的本意是和周警长聊几句玩笑话，让他之后不要对我的“出身”有偏见，多提携一下年轻民警，结果没说两句，两人就吵了起来。

周警长说那个毒贩当过武警，退役后又在公安系统待过几年，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情有可原，教导员以前办过他的案子，不该不知道。“把一个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年轻人派上去，出了事咋向他父母交代？”

教导员解释了几句，不想周警长竟直接骂教导员：“17年的刑警干到狗肚子里去了！”他说这话时，两人身边也有不少同事，教导员虽然跟周警长关系一直挺好，也深知他的脾气，但多少还是有点抹不开面子。

教导员也急了，话赶话，双方说的都不中听。可能教导员又说了什么把周警长激怒了，他直接冲教导员嚷嚷了一句：“干政工干的，把脑子都干傻了！”

恰好那时，公安局主管政工的陈政委从两人身边经过，听他这么说，气也不打一处来：“老周！我看你才是把脑子干傻了，你走到这一步，说轻了是嘴上没个把门的，说重了就是缺少政治素养和纪律观念，你就这样干下去，迟早把自己干回家！”

好在周警长没跟政委抬杠，但他也没给政委多少面子——那天他是去局里学习的，但学习一开始，他就不见了踪影。政委打电话问他跑哪

儿去了，他就推说有事，直接挂了电话。

“周警长就这臭脾气害了他，不然他现在也不会去干么斯‘警长’……”

教导员后来说，周警长当上警长之前，很多年都一直是个副所长。他原在我工作的派出所任职，年纪轻轻就提了副科，按惯例，副所长干上几年都会提教导员，之后便是所长，或去支大队任职。但周警长的仕途却止步于“刑侦副所长”，因为每次民主投票时，大家都嫌他脾气臭，谁也不选他。

“干刑侦的没几个好脾气，这个我们都承认，但也没几个脾气坏成他那样的！”有同事曾经抱怨过，“有事说事，有错改错，都是同事，你骂人干啥？显得你工作能力突出是不？”

后来赶上搞“警员职务套改”，局领导看他干了十几年副所长却一直提不了正职，便劝他参加“套改”，让出刑侦副所长的位置，搞个“三级警长”，解决正科待遇问题。周警长考虑了很久，答应了。

这么多年了，他确实需要一个正科待遇：老婆是工人，厂子效益不好，儿子在读高中，学习情况也不省心。虽然三级警长比副所长的工资高不了太多，但操心的事情少一些，顾家的时间多一些。

可惜，这个“三级警长”的任命下达速度还是慢了一些，直到殉职前，周警长还是个“刑侦副所长”。

6

也是因着这个臭脾气，凡是打过交道或共过事的同事，大都对周警长颇有微词。

“干咱这行的，都是换命的交情，关键时候弟兄们是能给你挡刀的，就他那操性，你敢指望吗？”那时候，还有同事私下里这么评价周警长。

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他真给我挡了刀。

2014年年底，邻县民警在围剿赌场时遭到攻击，一名民警的手臂被赌场马仔用开山刀当场砍断，伤人者趁乱逃脱。上级要求我们配合邻县民警，对周边地区的宾馆、出租屋、娱乐场所进行搜查。

这一次，我又被分到了周警长的组里。在停车场见到周警长，他只是瞅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我假装没听见，和其他人一起上了车。七座SUV，周警长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我挑个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下。

出发前，周警长例行交代注意事项。全都交代完了才转过头来，目光落在我身上：“你，等会儿就跟在老秦身后警戒……”

我明白他的意思：一般遇到这种事情，领导都会把老同志安排在队伍最后，名义上是“压阵”，实际是怕他们年纪大了，应付不了突发状况。老秦已经快退休了，让我跟在他身后，也就意味着在周警长眼里，我比他还不靠谱。

到达预定地点后，搜查随即展开。敲门、开门，简单说明情况，查验住户身份信息，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着，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我跟在老秦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队伍，像一个看热闹的观众。

凌晨时分，我们检查到一栋短租楼的三楼，周警长敲了其中一户的房门，很久都无人回应，一行人便继续往前走。就在大家走过那扇房门没多远，我忽然听到身后有轻微的开门声。猛地回头，那扇敲不开的房门竟被人打开了，昏暗的灯光下，出现一个男子的半张脸。看到我们，又一下缩了回去。

我下意识感觉那人十分可疑，大喊了一声“站住”，就向那扇门跑去。老秦急忙在我身后喊“等一下”，我没有理会。

我原在队伍末尾，转身就成了排头。冲到门前，我一脚踹开房门，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名持刀男子，手里的刀已经扬了起来。

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突然侧方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撞飞了出去，然后是“啪”的一声枪响。我躺在离门口两米多远的地上，看着周警长举着枪一边叫喊着一边和大家一起冲了进去。

后来，周警长在医院急诊室里一边包扎伤口一边骂我——那天他赶上来踹了我一脚，也替我挨了一刀——那刀本来会砍在我的头上，但他把我踹了出去，刀砍在了他的腿上。

经事后核实，持刀男子并非我们要找的嫌疑人，但也非善类——他也是一名吸贩毒人员，那间屋里随后搜出了大量冰毒。

“我当了20多年警察，没受过这么重的伤！说了听指挥、听指挥，你偏去逞你妈个X的能！”

我很想跟他道歉，但他骂了很久，我一句话都插不上。

7

刚入警时，教导员问我以后的岗位选择，我说想搞刑侦。教导员就是刑警出身，听我这么说很高兴，点头说年轻人的确应该去刑侦岗位上锻炼一下，还说有机会就把我推给周警长。

那时我还没见过周警长，教导员告诉我，他就是局里刑侦工作的一面旗帜，局里专门会在年轻民警中挑出“好苗子”推给他带，他的不少“徒弟”后来都成了局里的刑侦骨干，有的还干上了科所队长。因此，对于认周警长当师父这事儿，我一直非常期待。

那时候，我是同期入警同事中各项成绩最好的，全省新警培训时又拿了优秀奖，一心觉得自己很有希望。后来，我甚至多次在各种场合直接或间接地表露过这种想法。

可是，即便转正之后，周警长依旧没有选我——不选也就罢了，反而经常对教导员说，最好把我放到内勤去写材料——原话是：“他根本就不适合搞案子！”

我不知道他为何一直对我抱有这样的成见，也想找机会和他聊聊，但一想到他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面孔，心里便十分发怵。

2015年9月，在一起案件中，我终于有机会与周警长进行了一次长谈。

那天我们执行一次蹲守任务，两个人在车里从上午10点一直待到傍晚。原本都不怎么说话，但嫌疑人迟迟没有出现，实在无聊，周警长才终于开了口。

他说我不该待在派出所，应该去局机关写材料，“案子上的事情你搞不了”。我入警已经好些年了，没想到他还这么说。我不太高兴，说

自己的确不是科班出身，但一直都在学习，从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到省督、部督的大案子，一直都在积极参与。

他摇了摇头，说这个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性格上适不适合的问题："对待好人有对待好人的方法，对待畜生有对待畜生的路子，你心太软，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即便学会了'套路'，也下不了那个狠心……"

然后，他竟然把我从入警开始被赌徒骗、被吸毒人员耍、被混子忽悠，甚至被嫌疑人背地取笑的事情一件挨着一件讲了一遍，好些事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他说，这是教导员告诉他的，他都记得。

我很吃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又说，教导员第一次向他推荐的时候，他就在注意我了，只是我后来的表现一直没能让他满意。

"交心也分人，有些人注定不能和你交心。你想，你和他交心的结果是套出他的龌龊事，而他和你交心的结果却是自己在局子里多待几年，换你，你会交心吗？

"你来的是公安局，不是居委会，更不是扶贫办，你以为跟他们推心置腹，把自己的辛苦钱借给他们，他们就会买你的账？钱你花了不少，有没有用，你自己说……"

我无言以对，但还是想辩解一下，拿我们所的林所长举例子，说林所也经常在讯问室里问嫌疑人要不要和他交朋友，也的确跟不少嫌疑人做了朋友，那些朋友帮他破了不少大案子。

周警长却笑了，说那些人究竟是不是朋友，这事儿林所长心里门儿清："你不要只跟他学套路，你的本事他学不来，他的本事，你也学不来。"

"对待畜生，就要用对待畜生的方式，不然，不但畜生会伤了你，你也会伤了你的同类。"最后，周警长说。

8

后来，我曾问过教导员，周警长的脾气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教导员叹了口气说：“他受过刺激……你听说过刘所长吗？”

这个人我记得，刘所长的名字就刻在公安英烈墙上，牺牲于1996年。

“他以前是周警长的师父。”

周警长当年是从企业调入公安系统的，上级委托刘所长带着他学习。刘所长年龄比周警长大整两轮，儿子在外地干警察，一年回不来几次，所以平时就把周警长既当同事，又当儿子。

1996年，刘所长在一次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为保护周警长而牺牲。那是一起因毒品引发的抢劫杀人特大案件，警方将两个嫌疑人堵在国道边的一个小院里，最后只能强攻，穷途末路的嫌疑人向着冲进院子的民警们举起了“五连发”。

事发时，刘所长将周警长死死挡在身后，自己中了枪，在医院里痛苦挣扎了半个月，最终宣告不治。

临终前，刘所长对周警长说，不要愧疚，他有儿子，自己没了，家里还有个续香火的，而周警长那时还没结婚，“如果这枪打在你身上，我这辈子都走不出来”。

但周警长为此还是愧疚了好多年，一喝醉了就提，嘴里总是念叨说，那天中枪的应该是自己，刘所长是替自己死的。

“那件事情之前，他性格其实很好，见谁都笑呵呵的，年纪大的就叫‘大哥’，年纪小的叫‘兄弟’。但那件事情之后，‘大哥’和‘兄弟’两个词再没从他嘴里说出来过……”

到了2003年，局领导将刚转正的新民警小徐交给周警长带，让他做小徐的师父。小徐那年22岁，家在外省，大学毕业后一人考来本市当警察，周警长把小徐当弟弟看待，不仅业务上尽心尽力地指导，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照顾他。

平时周警长一直带着小徐，从巡逻排查到笔录组卷，事无巨细地教他；周末两人都不值班时，周警长还会请小徐去自己家吃饭。小徐转正前工资低，后来在本地谈了一个女朋友，钱总不够花，周警长还常常帮他周转。

小徐对周警长也很敬重，一口一个“周哥”，对周警长言听计从，很快，业务水平就飞速进步，一年实习期未满，已经能够参与局里一些大案要案了。

可没想到，小徐也出事了。2004年，周警长带小徐办理一起涉毒案件，抓捕嫌疑人时，小徐跑得最快，追在最前面。不料嫌疑人突然回身，一刀捅在了小徐的要害部位，小徐从此落下终身残疾，一生不能离开药物。

“那起案子最可恨的地方，是那个捅伤小徐的人，一直居住在小徐负责的辖区。案发半个月前，小徐还帮那名吸毒人员的女儿联系了入读学校，不想才半个月，就被那人捅成重伤……”时隔十余年，教导员提起此事，脸上依旧难掩怒气。

虽然最后嫌疑人被抓，小徐也被记了功，但周警长却始终无法面对小徐的父母。

“当年小徐父母送儿子来公安局报到时，是周警长接待的，他曾向小徐父母保证自己会带好小徐，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

从此之后，周警长似乎从心底里恨上了这群不法之徒，尤其是那些无法无天的涉毒人员，以致后来在办案过程中，也不时出现违反纪律的

行为。领导找他谈话没有用，处分和记过也没用。教导员常劝他，说现在执法环境不同了，嫌疑人也有人权，对待涉毒人员要抱着“打击是手段，挽救是目的”的原则，没有必要为了案子上的事情把自己卷进去。

心情好时周警长还打着哈哈应付他，但多半时候，周警长都会骂人：

“你让我跟那些搞毒的杂碎讲道理、讲权利、讲挽救？那我去跟刘所长和小徐讲什么？讲奉献、讲付出、讲职责？放你娘的狗屁，你的职责是让老婆孩子抱着花圈去给你上坟吗？”

9

2016年6月，周警长在办理一起涉枪贩毒案件时殉职，时年44岁。那次，周警长的探组里没有年轻民警，因为他跟领导说，这次要抓的毒贩都是老油子，毒贩经验丰富，反侦查意识很强，不仅多次变更交货地点，而且反复试探警方布控密度，“太狡猾，年轻人对付不了”。老警察对付老毒贩，职业打专业，所以他的探组只要经验丰富的老手。像我这样的，也只是负责一些外围工作。

最后一次见到周警长是他殉职前的那个下午，当时我和同事去局机关交材料，刚好遇到周警长从办公楼出来往停车场走。我跟他打招呼，他依旧面无表情，只是看了我一眼便走了过去。同事在一旁说，你送材料的速度快一点儿，兴许我们能蹭上周警长的车。

交完材料下楼，我看到同事一个人站在办公楼前抽烟，问他周警长呢，他说老周就甩给他一句“没空”，便独自开车走了。我那时还跟同事打趣说：“你也是闲的，没事招惹他做什么。”

当晚一夜加班，天快亮时才休息，一觉睡到中午，醒来习惯性翻手机，却发现专班的微信群里乱成一团，仔细看，竟然是周警长的悼词。

“周警长，没……了？”我愣了半天，赶忙给同事打电话，电话那头哽咽着声音说：“嗯……突发心肌梗死，昨晚人没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周警长去世之前，他已经带着探组不分昼夜与毒贩连续周旋了60多个小时，白天在烈日下的私家车里蹲守，为了防止被毒贩察觉，不敢开空调，车内温度高达50摄氏度。

因为毒贩有枪，周警长赶走了所有没成家的青年民警，拒绝了原本上级安排的轮班，几乎一个人完成了全部的蹲守、追踪和取证过程。可最终，却倒在了抓捕前夜的车里。

就在他走后的第20小时，这起特大涉枪涉毒案件宣布告破。

后记

2017年清明，我和教导员去给周警长扫墓。

那天天气很好，没有清明时节惯常的阴郁和冷雨。陵园坐落在一座矮山上，我和教导员拾阶而上，手里提着烟酒水果，还有那起涉枪毒品案件的嫌疑人终审判决书复印件。在那起案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最终分别被判处死缓以及有期徒刑13年。

山坡上，周警长和刘所长的墓碑挨着，刘所长在前，周警长在后，一如当年两人冲进院子时的样子。

请转告局长，

三大队任务完成了

1

送水工真名叫程兵，曾是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2002年8月，他因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渎职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2009年3月减刑出狱。2013年9月，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2002年“8·22案”的犯罪嫌疑人王二勇。

我看到这份履历已是一年之后。那天，程兵的同事老张就坐在派出所值班室里，他点了一根烟，向我讲述了程队长当年的故事。

“2002年8月22日，我在刑警支队三大队值班，接到报警说辖区一个女孩子在家出事了。” 老张回忆道。

那天是程队长带班出警的，众人赶到案发现场后，室内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气血上涌：一名17岁的女孩赤身裸体躺在卧室地板上，头上有一处明显伤口，鲜血伴着脑组织流了一地。随后赶来的120医生把女孩送上救护车后，技术队民警继续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据女孩的父母称，两人当天外出走亲戚，女孩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想卧床休息便没有同去。夫妻二人在亲戚家打牌直到凌晨才回家，不想回家之后，却发现女儿在家出了事。

案发现场位于小区较偏僻位置的一座居民楼四楼，勘察后，技术民警发现嫌疑人一共有两名，是相互配合从一楼攀爬防盗网和空调外机到达四楼，而后扒开纱窗进入室内的。

后经受害者家属确认，当晚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经济损失在6万元左右，而最令他们痛心的还是女儿——经医院全力救治，女孩虽然挽回了生命，但因脑部受到重创，成为植物人。

这是一起典型的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从入室盗窃的手法来看，应该是惯犯所为。

“当时程队长在大队会议室听案情汇报时，状态就有些不对。他铁青着脸，瞪着眼，手里不断地攥着烟盒，那包烟都被他攥成了麻花，跟人说话就像吵架一样……”

在场民警谁都看得出程队长的怒火，当时程队长家中也有一个10岁的女儿，被他像掌上明珠一样宠着，或许被害女孩的惨状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女儿——那种愤怒既是出自警察，同样也出自父亲。

当时，程队长向分管刑侦的杨副局长立下军令状，五天内破案。杨副局长担心时间不足，想把时间拉长，但程队长却坚持说只要五天，限期若破不了案，他就主动辞去大队长职务，去狗场（警犬基地）养狗。

2

“当时程队长这样立军令状，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数啊！”老张叹了口气。

程队长21岁从“省公校”毕业后便当了警察，从户籍、管段民警做起，到2002年，已是从警第十六个年头，积累了大量的办案经验。那次，从嫌疑人攀窗入室的手法上，他认定是一伙四川籍盗窃团伙所为。

“那年头，我市有不少流窜盗窃团伙，各地团伙都有各自的手段，河南团伙喜欢‘溜门’，贵州团伙擅长撬锁，而惯用‘攀窗’入室的，基本都是四川那边的。”

法医从受害女孩的体内提取到了精斑，又从阳台窗框上采集到了指纹。经比对核查，指纹比对锁定了曾有盗窃前科、并被公安机关打击过的四川籍犯罪嫌疑人王大勇，DNA比对则锁定了王大勇的弟弟王二勇。

王大勇，时年32岁，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他的弟弟王二勇也是一名盗窃惯犯，兄弟二人曾做过空调安装工，善于攀窗入室盗窃。

公安局马上对王大勇兄弟发出了通缉，仅仅两天后，兄弟单位传来消息，兄弟俩竟然继续作案，王大勇在现场被抓获——那天他和王二勇在攀窗盗窃后，同样试图对女主人做出侵害，不料女主人的丈夫和哥哥突然回家，混乱中王二勇逃脱，受害人亲属则抓住了王大勇，将他痛打一顿后拨打了110。

“王大勇被带到三大队的时候，已经被受害人家属打得面目全非，我们对着照片认了半天，才确定是他。”老张说。

公安机关早已有“文明执法”要求，但面对眼前的王大勇，在场民警谁也没能守住底线，尤其是程队长，见到王大勇的“见面礼”，就是一记

老拳。

“那时候还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室，对嫌疑人的审讯都是在民警办公室里进行的。”老张接着说。

那天，老张被程队长安排在办公室隔壁的值班室值班，没有亲自参与对王大勇的讯问。但从隔壁传出的惨叫与怒骂声中，他知道自己的同事们正在给王大勇“上手段”。

“中途我因为送材料进过隔壁一趟，王大勇正在窗户上‘背宝剑’，旁边一位民警手里拿着电警棍，问他弟弟王二勇跑哪儿去了，他不说……”

老张说，不知那晚算不算是自己走运——后来王大勇死了，所有参与讯问王大勇的三大队民警都受到了处分，最轻的也是被调离公安机关，只有他因为没有参与刑讯逼供，在三大队被撤销后，转岗去了派出所。

“你也得亏没参加，算是三大队‘硕果仅存’了……”我心情复杂地对他说。

但老张叹了口气说：“一起案子，嫌疑人没抓完，办案的兄弟们先‘进去’了，民警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谁都跟王大勇没私仇，可他一死，整个三大队‘报销’了，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三大队，队伍没了，我虽然还是个警察，却总觉得像个‘弃儿’啊……”

3

王大勇死于接受讯问当晚23点10分，老张说那个时间他记得很清楚。

“王大勇说要上厕所，被带出了办公室，他上完厕所就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满头大汗，全身发抖，表情非常痛苦，以前我见过不配合的嫌疑人被‘收拾’，但没见过这么重的，我提醒他们下手轻一点，但那个同事也是一脸怒气，说拖把杆都断了三根，可王大勇死不开口，还在民警面前说风凉话……”

民警们本来打算让王大勇“缓”一下，然后继续“收拾”，不料坐在沙发上的王大勇不但没能“缓”过来，反而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渐渐变成了抽搐，从沙发上滑到了地板上。

两个民警见状又把王大勇拖到沙发上，还骂了他一句“别装蒜”，但很快，王大勇又滑到了地上，而且开始口吐白沫。

三大队民警赶紧向程队长汇报，程队长来到王大勇面前看了看，感觉不妙，让民警把王大勇放平在地上，赶紧通知医院来人。

可惜王大勇没能撑到医生到来。几分钟后，他怪叫了几声，一阵猛烈抽搐，然后便没了气息。

“后来检察院组织的法医鉴定，王大勇死于重度颅脑损伤和肝肾功能衰竭……”老张说。

“他们照王大勇头上‘招呼’的？”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老张无奈地笑了笑，说他也不知道，但估计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警察“上手段”是有技巧的，没人会照死里整。最大的可能，还是王大勇先前在受害人家属那里受的那顿打。

但王大勇是死在公安局的，整个青紫色瘀血的后背也使程队长等人无可辩解。就这样，在王大勇死后第7小时，除了值班的老张外，程队长和整个三大队民警被集体带到了检察院职务犯罪调查科。

“当时，三大队下面有两个中队，加上内勤总共占着四个办公室，那天他们被检察院叫走之前，还跟我说，让我帮忙整理一下办公室，之后回来还得接受局里的内务大检查。我在队里忙活了一天，结果他们一个人都没回来，检察院的人倒是来了几拨。”

望着空荡荡的办公区，老张的心里说不清滋味，后来，连他也被叫去检察院问话。而那些三大队的同事，从此便再也没有以警察的身份出现在办公区。

事发之后，公安局领导和两起入室盗窃案的受害人家属都去检察院求过情，局领导恳请检察院考虑王大勇的案情，对程兵等人从宽处罚，被检察院拒绝了。“8·22案”的受害女孩父母和亲属一干人等，也曾跪在检察院门口，请求免予对程兵等人的刑事处罚，同样也被检察院拒绝了。

“后来还是判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共判了五个，程队长八年，小刘五年半，张海子三年零九个月，老徐最重，十二年，其他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也被纪律处分后‘脱了衣服’。”老张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点了支烟。

当年，程兵等人刑讯逼供致犯罪嫌疑人王大勇死亡一案，在整个公安局乃至全市政法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程兵等五人被判刑后，分管全局刑侦工作的杨副局长也引咎辞职，之后便是全局大规模的文件学习和纪律教育。

王大勇兄弟的入室盗窃、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件被其他大队接手，虽然民警还在全力侦办，但谁也不敢再提“五天破案”这事。

王大勇死了，公安局想尽办法联系他的亲属，甚至派人专程前往王氏兄弟的四川老家，但王大勇的父母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姑姑早年远嫁东北，也已断了联系，找来找去，公安局始终没有找到人。

而王二勇的下落，也成了谜。

4

王大勇至死不肯交代他的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却把强奸并用重物击打女孩头部致其重伤的罪责，全部推到王二勇身上。他或许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按照现行法律，即便抓不到王二勇，王大勇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罪行也无可逃脱。

只是程兵一时莽撞，到头来把自己也套了进去。

“那他当送水工是怎么回事？抓住王二勇，是碰巧还是他计划的？”我问老张。

“碰巧？能碰得这么巧？”老张笑笑说，“人一旦铁了心，没啥做不出来的事，王大勇铁了心不让警察抓王二勇，到死一个字都不说，程队长却是铁了心要抓王二勇，即便不是警察了，他还是要抓！”

王二勇归案后，程兵向办案民警详细讲述了自己出狱之后追踪王二勇的经过，那份有关追踪和抓捕经过的《情况说明》，也被附在了“8·22案”的卷宗之中，被办案民警记在了心里。

“程兵出狱之前，局里也做过打算。他当年入狱的案情比较特殊，又当过那么多年警察，受过专业训练，局里既可怜他的境遇，又担心他在外面走弯路，所以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老张补充说。

程兵入狱后，妻子便和他协议离了婚，宝贝女儿也归女方抚养，出狱后，程兵全部身家就剩下本地的一套房子，其他啥都没有了。领导给程兵介绍了一份在公安局下属的保安公司担任后勤的工作，这样既帮他解决了工作问题，还能让他离公安系统“近一些”，便于管理。

但程兵却拒绝了局里的安排，说自己要出去打工赚钱，局里没办法，说外出可以，但出狱的前五年还得遵守《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定期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谈话，程兵说程序他知道，没有问题。

之后，他便离开了本市，后来社区民警定期叫他回来做谈话记录，他也会回来，问他在哪儿打工，具体做什么工作，也实话实说。有时，程兵也还会问起“8·22案”，社区民警以为他只是好奇，就告诉他还在查。

从2009年至2013年的四年间，程兵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民警说明的打工地点，都在湖南、四川、重庆和贵州一带，工作类型也十分芜杂：摆过夜市，做过搬运工、夜班出租车司机、快递员，甚至还干过网吧保安、小区门卫，等等。

有认识程兵的民警问他，别人打工都去“北上广深”，你打工怎么总往欠发达地区跑？你以前好歹也是个刑警队长，大专学历，你看你净找了些什么工作？

程兵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在公安系统待了很多年，受够了约束和管制，想找个自由点的工作。听他这么说，谁也不好再说什么，更没想到，他去那些地方，只是为了寻找王二勇。

5

程兵究竟如何找到的王二勇，老张给我讲了一个版本，但后来我在其他人的口中，又听到了另外几个版本，有时同事们聚餐时提起程兵，还会争论，他当年追踪王二勇到底用的是什么办法。

那份“8·22案”的卷宗早已入档，我无法看到那天程队长的亲口叙述，只能在梳理了同事们的几个版本之后，大致理出了一条笼统的线索。

程兵很可能在服刑期间，便在狱友中打听过有关王大勇、王二勇盗窃团伙的信息。同是“吃一碗饭”的人，在押的盗窃犯很可能有意或无意中告诉了他。

出狱后，程兵按照线索先去了贵州某市，在当地做了一名快递员，希望借送快递之机，搜集周边住户的信息，但可能没有成功，也可能成功获取了某些新的线索。不管怎样，做了半年“快递老哥”之后，他去了重庆。

在重庆，他做了五个月的夜班出租车司机，每天夜里开车在城里转悠，与坐车的乘客攀谈，用各种方法询问一切自己想了解的事情。

五个月之后，他可能获得了什么新的线索，便辞去了夜班出租车司机的工作，进入重庆一家空调品牌的售后服务部，依旧是开车，但那份工作他只做了两个星期，又辞职去了四川德阳。

程兵在德阳某小区应聘了物业保安，每日认真登记出入人员和车辆，那份工作他做了七个月，几乎掌握了整个小区的住户信息，而后便辞了职。物业经理挽留他说要提他当保安队长，薪水翻倍，但程兵婉拒了物业经理的挽留，又去了湖南益阳。

他在湖南城市学院附近的一家网吧做了六个月的杂工，有时负责打扫卫生，有时负责为客人办理上机充值，有时还充当夜班保安。半年

后，程兵到了长沙，在一家家具城做送货司机，晚上去夜市摆摊。

2011年年底，程兵又一次辞去送货司机的工作，晚上摆夜市，白天送快递，就这样干了近一年后，他第二次去了贵州。

“选择当送水工估计也是程兵权衡一番之后的决定，和以往的其他职业相比，送水工的最大优势就是要‘入户’，程兵身上一直揣着王二勇的照片，只要他出现，化成灰程兵都能认出来。”一位同事告诉我。

当时，程兵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他打听来的小区居民信息，从姓名、年龄、电话到外出时间、经济状况、爱好特长一应俱全。有一次，他的笔记本被水站老板发现，问他记录这些东西做什么，他说是为了更好地向住户推销水站的饮用水。

“程兵也是个人才，他给老板说，记录客户的姓名、年龄是为了接电话时方便称呼对方，记外出时间是为了尽量避免送水上门时家中无人，老板还真信了他，后来王二勇被抓之后，我们找老板做证人材料，他说程兵当送水工的这九个月，他的桶装水销量涨了50%。”另一位同事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干了九个月的送水工之后，程兵最终确定了王二勇的身份，并将他抓获归案。

“程队长花了四年工夫寻找王二勇，当他发现王二勇的行踪后，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当地警方抓人？他当了十六年警察，不会不知道，通知警方会比他自己去找省力得多吧？”我不解。

“这事儿我们后来问过他，他说，他在杨副局长面前立下过‘军令状’，要亲手把王二勇抓住。”同事说。

6

王二勇被抓时，根本不敢相信把自己按倒在地的，是那位曾经多次上门送水，面相和善，还主动跟自己递烟攀谈的送水工“老程”。他更没想到，这位“老程”，就是十一年前因主办自己与哥哥王大勇案件而入狱的“程警官”。

他明白自己当年犯下的事情有多大，也知道哥哥死于刑讯逼供，之后又听说那些参与讯问哥哥的警察全部入了狱。王二勇说，自己很清楚，警方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因此这十一年来，他想尽一切办法四处躲藏。

他改了名字，找人花大价钱办了假身份证，又用假身份娶了妻子，生了儿子，用妻子的名字买了房子。

王二勇不敢再去偷东西，生怕被警察抓住查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不敢喝酒，怕喝醉后说漏嘴，出门不敢坐火车，怕买票时露出马脚，甚至不敢与人争执，担心事情闹大了引来警察。

他四处打工，频繁更换工作，快递员、夜班出租车司机、门卫、小超市理货员、网管，可能程兵干过的工作他都干过。但从不敢长做，更不敢在工作中冒头，只要稍有风声，就会果断逃窜。

王二勇与程兵距离最近的时候，是他在重庆那家空调品牌售后服务部做安装工时。王二勇以前做过空调安装，技术过硬，在公司又任劳任怨地干了一年，公司准备和他签一份五年期的劳动合同，让他第二天把身份证带来。他思考再三，还是担心自己身份暴露，最终找了个借口放弃了这份工作。

而他离职的那天，正是程兵得到线索前往入职的那天。

被捕后，王二勇曾认为案子已过了十一年，且自己当年没被警察当场抓住，因此试图装聋作哑蒙混过关，把责任全部推到哥哥身上。

警方没有再给他“上手段”，而是将各种证据一一摆在他的面前，当看到自己留在受害女孩体内的精斑DNA比对结果时，王二勇彻底崩溃，随即交代了当年的全部作案过程。

2002年8月22日深夜，兄弟二人来到提前选好的作案地点，这家没安防盗网，而且男女主人每天傍晚都会离开家，凌晨才会回来。

晚上11点左右，看楼上其他住户家的灯基本都熄灭了，兄弟二人开始从一楼沿着防盗窗和空调外机攀爬，很快就到了四楼窗口。

那天，受害女孩正好关了空调、打开了窗户通风，不想正好给王大勇兄弟二人入室提供了便利，二人轻易地扒开纱窗，跳入室内。

受害女孩是辖区某中学的寄宿学生，平时在学校住，当天因为身体不适请假回家休息。王大勇兄弟没有料到此时家中会有人，为了赶紧找到财物，翻箱倒柜，动作很大。

他们弄出的声音惊醒了女孩，她睡眼惺忪，以为父母回家找东西，毫无戒备地打开了灯，大家都被吓了一跳。

女孩很快开始尖叫，王大勇一个箭步上前扑倒了女孩，用手捂住她的嘴试图盖住声音。王二勇也急忙上前帮忙，兄弟二人很快把这个17岁尚在病中的女孩捂晕了过去。

他们见女孩晕了，急忙收起偷来的财物准备离开，但出门时，又瞥了一眼倒在地上衣冠不整的女孩，兄弟俩产生了邪念。

然而，就在他们实施性侵的时候，女孩突然醒了，又开始大声呼救，兄弟俩随手抄起地上的物品往女孩头上猛砸，直到女孩不再呼救为止。

至于受害女孩头部那处致命的伤口，十一年前王大勇说是弟弟王二勇干的，十一年后王二勇说是哥哥王大勇干的。击打女孩头部的重物是一个铜制摆件，后经技术勘察，上面布满了王大勇和王二勇二人的指纹，究竟是谁下的死手，却已无从查证。

当然，这并不影响对王二勇的最终量刑。

后记

后来，听说程队长的妻子已经和他复婚，带着女儿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夫妻二人在北京开了一家青少年兴趣班。2018年年初，我到北京出差，曾想联系程队长，一来想向他表示问候，二来也想听他亲口讲一讲当年只身追踪王二勇的经过。

但电话打通后，他与我寒暄了几句，表达了谢意，并没有告诉我他的具体地址，也拒绝见面，同样不愿再跟我谈起往事。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还年轻，做个好警察，办好案子，也保护好自己！”程队长说。挂掉电话后，这句话在我心中不断地重复着。

我也仿佛听到了他登上列车前的那句话：“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2013年9月的一天下午，贵州省某地级市的一所住宅小区内，一名中年的送水工毫无缘由地与一位路过水站的业主发生冲突。没想到，送水工迅速将那位男性业主放倒在地，业主拼命挣扎。

两人的厮打很快引起了周边居民的注意，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将送水工和受伤业主一起带往派出所盘问处置。

在派出所里，送水工很快交代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但随后，警方对受伤业主的取证却持续了整整20个小时。

最终，送水工被无罪释放，受伤业主却在完成了DNA采集比对后被刑事拘留。

一天后，我市警方派人赶到当地，接走了送水工和那名受伤业主。至此，我市2002年“8·22恶性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终于宣布告破，嫌疑人全部被缉拿归案。

2014年年初，“8·22案”宣判，被送水工按倒在地的那名“业主”最终被判处死缓，而那位年近半百的送水工，也终于结束了他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面对民警们的挽留，他微笑着摇摇头，然后收拾好行囊，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以后没什么事，就别联系了。”发车前，送水工对送行的民警说，但他又转过头来补充了一句：“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我之所以当警察，

都是为了她

1

那晚，我和林所来到辖区边缘的一家小旅馆。虽然我们身着便装，但一进门，旅馆老板还是认出了我们，赶忙上前递烟。林所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径直向楼上跑去，我赶忙跟在他身后，老板跟在我身后。

站在312房间的门口，林所示意店老板开门，店老板伸手正要敲门，林所一巴掌把他的手打开，示意他直接用房卡开。老板无奈，从口袋里掏出了房卡，“咔”的一声，门锁开了。

我随即猛地向房门撞去，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出其不意地冲进房间。但完全没想到，我将近170斤的体重，只把门撞开一道不足20公分的缝隙，透过缝隙一看，房间里的电视机柜竟抵在了门后。一股浓烈的麻果香气顺着这道缝隙扑面而来，几乎是在同时，一个光溜溜的身影从床上跃起，跳上窗台，看来是想从窗户跳出去。

我连忙退后几步，用尽力气再次撞向房门。“咚”的一声巨响后，电视机柜又向后退了一段距离，缝隙总算够一个人挤进去了。

此时屋里的那个人已经骑上了窗台。林所冲进房间，大喝一声：“别动！”说着右手从怀中掏出了伸缩警棍。那个人半个身子探在窗户外面，看了看林所，又看了看窗外，大概是觉得三楼确实太高，不敢往外跳。

趁他纠结的当口，我打量了一圈屋内。这是典型的一间四线小城的私人旅社，昏暗的白炽灯，老旧的家具，一名女子裹着棉被倚在床头，眼神迷离。地上散乱地扔着两人的衣服，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做的简易“吸壶”，角落里是两个一次性打火机和几张褶皱的锡箔纸。

林所没有理会床上那个女人，我也不想主动和她说话。

“六子，你个X养的，给老子滚下来！”林所还在跟窗台上的人对峙——六子，42岁，辖区在册吸贩毒人员，也算是林所的“老熟人”。

六子不肯下来，结结巴巴地威胁林所：“你再往前走一步我真跳了……”

林所没理他，反而向前迈了两步，说：“你有胆子就给老子跳！不跳老子一脚把你踹下去！”

六子又看看窗外，𡳞了，从窗台上滑了下来，坐在地上。

在带这对男女回派出所的路上，林所开车，一句话也没说。我把两人铐在一起，锁好车门，坐在他们身边，默默抽烟。

回到派出所，林所把二人交给值夜班的民警老赵看管，让我去后院把讯问室的灯打开，又去把备勤室里的值班同事喊起来做事，自己却上了楼。

老赵让这对男女在大厅墙边蹲下，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也无奈地笑了笑。

2

值班同事在楼下讯问室给两人做笔录材料，我推开所长办公室的门，林所正叼着烟坐在椅子上发呆，我想从他烟盒里掏一支，他却开口骂了我一句：“以后抽烟自己买，别老拿我的！”

我有点尴尬，看来今晚他心情不好。不过，既然烟已经拿出来了，我也不好再放回去，不然他又会说什么“拿都拿了，放回去做什么”。我只能厚着脸皮把烟点着，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陪他一起发呆抽烟。

我知道他心里在烦什么，但又不好点破。坐了一会儿，老赵也上来了，看了眼林所，苦笑着摇摇头，也点燃一支烟，拖了把椅子坐在一旁。

总不能就这么干坐着，我不断向老赵使眼色——他是所里的老民警，林所当年的师父，在弟子和晚辈跟前，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赵微微冲我点了点头，又过了一会儿，估计是组织好了语言，他清了一下嗓子，终于开了口。

“小林，你也想开点儿，工作上的事情，生气是生不完的。”

林所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不说话，闷着头抽烟。

“人各有命，你是个警察，又不是观音菩萨，管得了那么多吗？”老赵继续说。

林所依旧没反应。老赵有点不高兴了，他把烟屁股放到地上踩灭，拾起来扔进林所身边的烟灰缸，然后用手敲了敲林所的桌子：“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最应该关注的是小何（林所的妻子）和儿子才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赵的话似乎终于碰到了关键，林所终于开口了。

“你跟了我五六年，从我徒弟做到我领导，你啥意思我不清楚吗？！”老赵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

“唉……”林所叹了一口气，又把头闷下了。

老赵走回到椅子边，拍了我一下，说：“咱们走，让林所自己清静一会儿。”

那是我跟着林所工作的第二年，作为同一个班上的民警，一周有三天的时间，24小时吃、住、睡都在一起，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我当然知道林所心里在郁闷什么。

让他心烦的，不是那个六子，而是那名和六子一同被抓的女子。

3

这个女子名叫赵晴，曾经差一点儿就成了林所的妻子。

赵晴是本市人，和林所同岁，两人自初中开始便是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又一同考取了省里的师范大学，林所学音乐，赵晴学美术。两人在大学二年级时开始恋爱，多年的老同学，又都是工人家庭出身，知根知底。林所说，他们曾打算大学毕业后一同回本市，找一所中学当老师，然后就结婚。

2002年，两人大学毕业，赵晴如愿考进了本市的一所中学，但林所却没能如愿，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他决定创业，联系了几个武汉的校友，一同开了一家艺术生高考辅导班，跟赵晴被迫分隔两地。

辅导班开起来没多久，赵晴就不顾父母的极度反对，辞去了教职，去武汉陪林所一起创业。

“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苦啊，我借的钱只够在街道口那边租一间小门面房，教学、办公、吃住都在那间屋里，晚上睡觉只能摆开一张单人床，赵晴说我白天累，让我睡床上，她大冬天的自己打地铺……”林所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

赵晴的父母都认为是林所“坑”了自己的女儿，不仅和林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还多次带着亲戚朋友去武汉，要把女儿“绑”回来。一次，赵晴的父亲带着两个亲戚在武汉光谷附近堵到了林所，正要动手，赵晴就骑着电动车赶来，和父亲大闹一场，然后抢走了林所。每次说到这件事，林所总是忍不住掉泪：“那天我坐在电动车后座上搂着她的腰，哭了一路，那时候就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对得住她！”

赵晴的父母终于认命了，他们虽然不想承认女儿和林所的关系，但再也没有找林所一家的麻烦。

林所和赵晴共同努力了两年，培训班出来的第一批学生在高考艺考中的成绩都很不错，还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名校，所以培训班一下就火了，第二年预约报名的学生就有200多人。到了2005年，培训班从一间屋变成了三间屋，最后规模扩大到上下两层楼，还注册了商标。

林所说，自己如果后来不改行当警察的话，照那个发展势头，现在他应该也和武汉那几家知名的艺考培训机构老板一样，成为一名“土豪”了。

“我走的时候，把培训班盘给了当时一同创业的校友，现在人家包了半座楼，开宝马坐奔驰，穿个T恤都是‘范思哲’——你看看我，现在身上最值钱的是这部手机，1800块，公安局发的……”林所总开玩笑地如此自嘲道。

4

林所转来当警察的原因，他很少跟外人提起，但公安局很多同事都知道，他从“林校长”变成“林警官”，正是因为“赵老师”出事了。

“手里有了几个闲钱，交了几个不该交的朋友，就染上了毒品。”从林所断断续续的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赵晴当年出事的经过。

赵晴从小就性格开朗，身边永远不缺朋友，即便在高压力的创业过程中，也在武汉结交下几个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姓刘的中年女子，比赵晴大不少，和她关系尤其好。

这个刘姐是朋友介绍给林所的，她年轻时曾留学国外，拿到了钢琴演奏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某高校艺术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离了职。林所看中了她的海外留学经历，开出高薪，盛情邀请她来培训班教学，刘姐欣然答应。赵晴也把刘姐当作自己的“知心大姐”，经常和她结伴出入。

大概就是这段时间，赵晴通过刘姐接触到了毒品。

“那时候我一是忙，二是没这方面的意识，你说好好的一个大学老师，怎么会放着公职不干，跑出来搞我们这种‘野路子’？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了！”林所后来追悔莫及。

林所不止一次问过赵晴究竟是如何“上道”的，但赵晴一直都说不明白，只说似乎是在某一个瞬间，自己开始对一些东西产生依赖感，有时是红酒，有时是饮料，她自己也曾买过那些让她“依赖”的东西，但后来却发现，只有和刘姐在一起时，那些东西才“起作用”。

林所后来推测，刘姐最初应该是在赵晴的饮品里放了一些“口服液”“快乐粉”之类的东西，等赵晴意识到的时候，早就来不及了。

“虽然那时候我给姓刘的开的工资很高，但肯定是不够她吸毒的，所以她就想把赵晴拉下水。赵晴虽说是老板娘，还管着培训班的财务，但不过就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对这些东西没防备，只要她下了水，姓刘的就可以弄到稳定的毒资了。”林所后来分析说。

2005年7月，高考成绩传来，培训班又一次迎来了大丰收，林所激动地将喜讯告诉赵晴，可赵晴似乎却并不在意。

林所以为赵晴是因为前段时间太忙累的，就想着趁8月闲暇的时候，带她去香港和澳门旅旅游，算是庆祝。林所提了好几次，赵晴才勉强答应了。

赵晴从旅行一开始就有些魂不守舍，两人在香港待了几天，准备去澳门时，赵晴借口身体不舒服，说什么也要回武汉，林所只得提前结束了行程。

可抵达武汉的当晚，赵晴便不知去向。

那天晚上，林所四处找不到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他不断地打电话给培训班的老师们，甚至相熟的学生家长，询问赵晴的去向，但大家都说不知道。林所实在想不出这种天气赵晴能跑去哪里，他一边在凌晨暴雨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一边焦急地等着天亮，好给赵晴父母打电话，问问赵晴是不是回家了。

大约在凌晨4点，林所突然接到了武汉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电话，说赵晴和刘姐因吸食毒品被拘留了，让他去派出所办手续。

林所当时就蒙了——他那时对毒品的印象还停留在影视剧和街道社区的禁毒宣传栏里，根本想象不到，一直陪伴自己的女朋友竟然会染上毒瘾。

原来，那天晚上赵晴一回到武汉便被刘姐叫走了，两人急匆匆地赶往刘姐住的出租房，刘姐打电话叫来了毒贩子，赵晴花钱买了一些毒

品，两人便在出租屋里好好过了一把瘾。不料，这个毒贩早已被便衣盯上，他离开出租屋后没走多远便被抓获，随即供出了赵晴和刘姐，马上，警察便在出租屋里把两个女人抓了现行。

最终，刘姐因多次吸毒被抓，被判强制隔离戒毒，而赵晴因为是初次被抓，拘留执行完毕后，被判社区戒毒。

从拘留所出来之后，赵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没有出门，然后向林所保证，以后绝对不再碰毒品。

赵晴出事之前，两人已经把婚期定在了2006年年底，林所担心赵晴吸毒的事情会给结婚带来未知的阻力，也相信赵晴是一时糊涂，思来想去，还是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双方的父母。

然而，没过几个月，林所几次夜里醒来，都发现赵晴不在床上。开始他没在意，后来才发现，赵晴夜里起身后去的并不是二楼的卫生间，而是一楼的储物间——终于在一个深夜，他将正在吸食毒品的赵晴堵在了那里。赵晴这才向林所承认，自己并没能戒除毒品。

那次林所先是气得暴跳如雷，然后抱着脑袋哭了一宿。

“姓刘的被抓了，但她以前的那些朋友还在，有些是和赵晴认识的，总偷偷联系她，说一起出去玩，赵晴拒绝了几次，但最后还是没忍住，又复吸了。”

5

那次之后，林所通过朋友联系了武汉的一家自愿戒毒医院。虽然这家医院的戒毒价格相当于培训班半年的利润，但林所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赵晴送了进去：一是在他和赵晴看来，公安机关免费的强制隔离戒毒如同蹲监狱一般，让人没有人身自由；二是他不想让赵晴继续在公安机关的违法人员档案上留下记录。

“自愿戒毒”的时间为半年，那年春节，林所对双方父母谎称两人要前往外省做招生宣传，不能回家过节，瞒过了家人。

2006年5月，赵晴终于结束了全部治疗。在离开自愿戒毒医院之前，林所专门找到主治医生，询问以后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主治医师建议切断赵晴与本地毒友圈的联系，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戒毒效果”。

林所几经考虑，决定带赵晴回老家，这样才能让赵晴彻底远离武汉的朋友圈，借此切断她和毒品的联系——他觉得当初赵晴是为了他辞去了老家的教职，这次他也必须陪赵晴回去。

培训班盘了出去，林所拿到了30万的分红，他把20万交给了赵晴的父母，说是两人一起赚的，赵晴父母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商品房，说留给二人结婚用。林所用剩下的10万来块在本地租了一间门面，重新开起了培训班——直到那个时候，他依旧没有把赵晴吸毒的事情告诉双方父母，也没有将婚期推迟。

两人又开始了新的创业，但由于本市没有艺术类高校，已有的几所高中里零星的几个艺术生也都有固定的培训渠道，林所的培训班门可罗雀。

“你那时候真打算跟赵晴结婚？”我问林所。

他想了半天，说那时还是觉得没什么。“人都会犯错，改了就好，如果赵晴之后不再碰毒品了，自己权当以前的事情从没发生过。”

不过，结局又一次让林所失望了。

2006年9月，就在双方家属筹备订婚宴的关口，赵晴却再一次因吸食毒品被本地警方抓获。警方查到了之前赵晴在武汉因吸食毒品被拘留的记录，将赵晴按照“吸食毒品严重成瘾”送去了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期为两年。

“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按说脱离了以前毒友的圈子，不该复吸啊？”我问林所。

林所说，后来他一直在后悔两件事：一是那次在储物间发现赵晴吸毒后没有报警，也就没有查出赵晴的毒品从何而来；二是本市离武汉太近了，赵晴还是被毒友们找上了门。

“那些人像狗皮膏药一样，只要知道你有钱吸毒，就会死缠着你，他们整日除了吸毒也做不了别的事情，自然没什么收入，遇到瘾上来，当然能从武汉跑来找你。”林所恨恨地说。

随着赵晴被“强戒”，她在武汉的前科也瞒不住了。得知真相后，林所父母要求两人立刻分手，赵晴父母则打上门来，说都是林所害了女儿，双方家庭一夜之间反目成仇。

6

培训班老师涉毒，家长更不敢把孩子送来这里了。赵晴被抓后不久，林所的培训班便关门大吉，林所拿着剩下为数不多的钱，重新回到了待业青年的日子。

令林所没想到的是，虽然赵晴已经被送去了“强戒”，但之前她在武汉的那些毒友们，竟三三两两地找到了他——有人打电话打听赵晴的去向，有人自称是赵晴以前的闺蜜，套了半天近乎，不外乎都是找林所借钱；还有人说赵晴以前借了自己的钱，让林所还钱；甚至有毒贩直接找到了林所，说赵晴找他“拿货”没给钱，让林所替赵晴付账。

林所只得报警，警察虽然抓了人，但也对林所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还把林所也带去派出所做了尿检，确认他不吸毒后才允许他离开。

林所没有离开，而是把赵晴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给他做尿检的警察，想问问看赵晴到底还有没有戒毒希望，自己和赵晴还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

那天，他拉着警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警察告诉他，一日吸毒终生戒毒，赵晴不是个例，要想戒毒，需要走的路的确很长。民警劝他好好斟酌一下与赵晴之间的事情，虽然没有点破，但林所自己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林所说自己仍然想帮赵晴戒毒，问警察有没有什么稳妥的办法。警察可能是开玩笑，也可能是出于对林所当时执拗想法的无奈，说了一句:“那你来当警察吧，当了警察就有办法了。”

林所当真了。

2007年6月，经过一年准备，林所通过省考进入了本市公安队伍。公安局本来从他的音乐专业考虑，安排他在政治部宣传部门任职，他却

主动要求去了派出所。一年前给他做尿检的那位警察老赵，后来成了他的师父。

“2008年赵晴结束‘强戒’离开监所的时候，我陪林所去武汉接的她，那天他们两个人在戒毒所门口抱头痛哭……”老赵说道。

林所心中始终惭愧，如果不是当年他与赵晴在武汉创业，如果不是他拍板招了刘姐，如果他平日里对赵晴的关注更多一些，或许赵晴就不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但林所能做的，也只是用警察身份盯紧了赵晴，尽量帮助她摆脱毒品的纠缠和控制，尽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7

林所当了三年社区民警，两次被市局评为“优秀民警”。他帮助吸毒人员戒毒的故事，也曾被市里的媒体报道过。

上任伊始，林所在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网上查询了本辖区内所有涉毒人员的资料，然后对所有在册吸毒人员一一家访，找不到人的便找他们家属，希望家属能配合工作。

他自费印了很多禁毒宣传资料在社区分发，顶着别人的白眼，给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介绍工作。有时，他甚至会买一些米面，去那些揭不开锅的吸毒人员家里做工作、讲道理，甚至还会给那些浑身是病的“老毒么子”送药。

别人办一起吸毒案件只需半天，他却需要很久。“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那时的想法有些幼稚。”林所那时坚信“打击只是办法不是结果”，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那些吸毒人员，哪怕是长期吸毒人员。

上级表扬他的做法，但同事们私下里说起林所的作为，都只是笑笑。师父老赵大概明白他的心思——赵晴的家就在他的管区里，他当社区民警的第二年，就帮赵晴在临街的地方租了一间小门面房，开了一家文具店。

林所那时还没结婚，巡逻经过小店时，都会进去看一眼。有时下班后，还会和赵晴一起去超市购物。

老赵说那时他很不放心，虽然林所和赵晴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赵晴毕竟是有吸毒前科的人员，而林所的身份是警察，他担心林所还和赵晴搅在一起，难免会招来麻烦。

后来我问林所，那时是否仍然还有和赵晴继续在一起的念头。林所叹了口气，点头说有，他计划着，只要赵晴有三四年不再碰毒品，他就

跟赵晴结婚。

赵晴也告诉他说，自己结束“强戒”之后，已经彻底与以前的毒友们划清了界限，不但更换了手机号码，连QQ号码都不再用了。

林所父母明确告诉儿子，坚决不会让赵晴过门；赵晴父母则将女儿吸毒的责任全都归在林所头上，骂他是赵家的“丧门星”；甚至公安局同事们也都说，林所这是在“玩火”。

但林所依旧心怀希望，我行我素。那年他29岁，说，三四年，自己等得起。

但赵晴终究没让他等三四年。2009年3月，赵晴第二次被送强制隔离戒毒。

抓住赵晴的不是本市警方，而是邻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他们在一次专项行动中，将和朋友在KTV包房里正烫吸冰毒的赵晴抓获。经讯问，赵晴在第一次“强戒”后，已经不止一次吸食毒品了。

林所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几近崩溃。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在社区禁毒，省厅颁发的表彰牌匾就挂在警务室大门上，但自己最关心的赵晴，竟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又吸了毒。

他跑去邻市禁毒大队要求参加对赵晴的讯问，被对方以不合程序为由拒绝。不过，在赵晴被送往强戒所之前，邻市禁毒大队破例让林所看了赵晴的笔录材料，并让他和赵晴见了一面。

赵晴在笔录材料里承认，自己自上次“强戒”之后，坚持了半年没有碰过毒品，但后来还是被一个她在强戒所里认识的本地“朋友”拖下了水，并给她提供了购买冰毒的渠道。

林所问赵晴为什么骗他，赵晴平淡地说怕林所伤心。林所又问：你既然怕我伤心，为什么还要去碰毒品？

赵晴说不出来，只是默默流泪。

8

“那东西，那么难戒吗？”刚当警察的时候，我曾问过林所。

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烟瘾是‘1’的话，性瘾大概是‘20’，酒瘾估计是‘100’，毒瘾应该在‘3000’左右——你想想自己戒烟时的决心，乘以3000倍，就是戒毒的难度……”

尤其是冰毒及其副产品，如麻果、K粉之类的新型毒品，比起过去的海洛因，不会再给吸毒者带来强烈依赖感，“上瘾”之时，不会有蚀骨之痛，但吸食后造成的欣快感，却让人流连忘返。

心瘾的戒除是终生的，从毒品中体验过那种欣快感的人，只要还活着，就不会忘记那种感觉，就会有复吸的可能。因此吸毒人员终生都需要用意志力对抗心瘾，一次失败，便前功尽弃。

“就好比，每次的欣快感背后，就是大脑皮层上一个针眼般大小的洞，洞多了，人就疯了……”

从2010年开始，林所对待社区涉毒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重新通过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网更新了本辖区的涉毒人员资料，这次他不再家访，而是直接找人、抓人、尿检、拘留。然后就是让被抓获的吸毒人员举报其他的涉毒人员，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只要有过涉毒前科的人员，他一个也不放过，一次拘留、两次“强戒”，直到涉毒人员再也不敢在他的辖区出现为止。

他协调辖区各单位保卫处和居委会组成了“居民禁毒巡防队”，辖区居民们早就烦透了那些整日偷鸡摸狗的“道友”，一时间，巡防队所到之处，涉毒人员鸡飞狗跳。有些吸了十几年毒品、浑身上下没几副好零件的“老毒么子”，曾经仗着自己“身怀绝症”无法收监，对公安机关的打击不屑一顾，终日以偷盗为生。以前林所给他们送药、做工作的时

候，他们不屑一顾地揶揄：你们警察是拿我们没办法了，开始“顺毛捋”了？到了后来，巡防队一来，他们就开始四处躲藏，甚至有人主动要求重新被收监，躲避追击。

这一年，辖区的涉毒案件先是呈直线上升，后来又呈直线下降，林所也毁誉参半。有人说他工作业绩突出，应当嘉奖，也有人说他做事不遵守纪律。

2011年年底，林所结婚，妻子同样是公安局民警，次年他的儿子出生。

9

2014年11月那晚，我们在吸毒现场抓获了六子和赵晴，经尿检，二人甲基安非他命反应均呈阳性，随后二人供述了当晚在宾馆开房吸食麻果的经过：六子买了毒品麻果，两人在宾馆一起烫吸，吸饱后，两人在宾馆发生了关系，六子付出的代价是另外5颗麻果（市价约300元）。

我进入讯问室，看到六子坐在讯问椅上，屁股下面垫着厚厚的卫生纸。一问才知，他常年患有严重的性病，屁股和大腿上遍布烂疮，久坐会流出黄色脓水，同事怕他弄脏了讯问椅。

“那个女的，瘾大得很嘞！给钱就能上，有‘货’的能包月……”六子知道自己浑身是病，过不了入拘留所前的体检这一关，因而语气中满是无所谓。

电话响了，接起来，是林所，他正从监控里观看审讯过程，让我问六子，都有哪些人平时跟赵晴裹在一起。我转述给六子，他报了几个名字。

我又走进隔壁讯问室，两位同事正在给赵晴做笔录。听了一会儿，跟六子说的差不多，赵晴的语气平淡，像是在叙述别人的事情。

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想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准备离开。手机又响了，还是林所，我以为他也有问题要问赵晴，可他顿了顿，说，拨错了。

那天的审讯持续到凌晨5点结束，等待赵晴的无非还是先拘留再“强戒”。这个结果赵晴早已料到，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反应。临去拘留所时，她小声问我林所在哪里，我回答说：“不该问的别问，管好你自己的事。”

六子以为自己肯定进不了拘留所，坐在讯问室里竟然跟民警说自己上午还“有事”，催促民警快些给他办手续。等同事从公安局法制科报裁回来，告诉六子，处罚结果是“刑事拘留”——这意味着六子将会被判刑。

六子声嘶力竭地抗议，说警察给他“挖坑”、办“冤假错案”，那位报裁的同事冷冷地说：“嫖娼用毒品支付，构成贩卖！”

六子愣在那里，恨得咬牙切齿。

之后我得知，那天深夜法制科值班人员最初裁定的结果的确是治安拘留，但林所打电话叫醒了法制科科长，拿着《刑法》第347条一字一句地对法条，终于让法制科科长改变了主意，通知值班员修改了裁定。

早上6点，办完六子和赵晴的案子，林所拉上我和另外一名同事，把六子交代的其他几个“道友”全部抓回了派出所。

但那晚，林所自始至终都没去讯问室和赵晴见面，也没再跟她说过一句话。

尾声

2018年5月，我已经离开了派出所一段时间。老赵来武汉看儿子，顺带找我吃饭，两人又聊起了赵晴。

老赵说，赵晴疯了，赤身裸体地在街上狂奔，拿砖头在路边砸车玻璃，后来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吸食冰毒的人，最终的归宿就是精神病。

“林所呢？”我问老赵。

“唉！”老赵叹了口气，那天是林所出的警，送赵晴去精神病院前，林所的手按在单警装备上，不住地颤抖。

“那天晚上你林所喝醉了，没回家，住在派出所备勤室里，听同屋的小高说，他抱着被子哭了一夜……”

2014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警务室加班，林所长开着私家车来找我。他没穿警服，让我也换个便装，跟他出去“办点事儿”。

“是那个谁……又来了？”我问他。

林所点头。

“这次要怎么办？”

“公事公办。”

春节的致命酒

前言

从警以来，春节是我最期盼却又最忌惮的日子。

期盼节日的假期和团圆的快乐，又忌惮喧嚣后的一地狼藉。俗话说“过犹不及”，春节期间豪饮宿醉成风，难免引发一些让人唏嘘的悲剧。

时值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特此冒昧分享三个与“春节饮酒”相关的真实警情，以期对正确世风的树立有所提示。

二十四年终得扶正，他倒在庆功宴后的雪地里

2013年腊月二十五，大雪，老雷失踪了。

报案大厅里围着十几号人，老雷的爱人和孩子一遍遍拨打他的电话，一直都是关机。

“你说这大过年的，老雷跑到哪儿去了！”他爱人不住地抱怨，手里反复按下重拨键。

“小年”那天下午，老雷跟老婆孩子打招呼说：“晚上和朋友聚聚，不回来吃饭了。”四点半，他穿好外套离开了家，自此便杳无音信。

“嫂子你别着急，雷哥可能是有别的事儿忙去了，恰好手机也没电了……”一个朋友劝老雷的爱人道。

这个劝慰明显难以奏效：一个工作稳定、家庭美满的中年男人，显然没有理由在寒冬腊月里一声不吭地“忙别的事儿去”。老雷爱人自然不会接受，反而冲那个朋友发起了脾气：“就是你们，大过年的叫着老雷喝喝喝，他要出点事儿，我们这个年还咋过！那天跟你们喝完酒，他去哪儿了？你说啊！”

我这才明白，原来站在报案大厅里的，除了老雷的爱人和孩子外，其余都是那晚与老雷“聚聚”的朋友。

我要过老雷的身份证号，在警务通上输入，系统显示他这两天既未出行，也未住宿。

“亲戚朋友那边你们问过没？”我问老雷的爱人。她双手一摊，说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都说没见过老雷，不然他们也不会兴师动众来派出所报警。

我抬起头，窗外还飘着雪花，路边的积雪已经有些厚度了。“这雪，应该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了吧……”一旁的同事小声嘀咕着，我心里也有种不好的感觉。

“你们喝了多少酒？”我拉过老雷一个还在报案大厅的朋友询问道。

他说十二个人，除了一个不喝酒的司机外，其余十一个人一共喝了六瓶白酒，虽然总量不多，但老雷一人就喝了一斤半。

“他平时酒量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平时能喝半斤。”

“那天为什么喝那么多？”

“高兴啊，那天他可是主角！”

老雷48岁，在市里的一家国企工作，一个月前刚刚当上科长，“小年”那天是他摆的“庆功宴”，地点在辖区的川菜馆，到场的都是老雷身边平时交好的同事朋友。

“席上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我问。老雷朋友摇摇头，说那天老雷就是高兴，特别高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异常。

“他也确实压抑，蹲了二十四年副科，终于把那个‘副’字去掉了，能不畅快一把嘛！”他说。

我笑笑，想来老雷估计也确实如他所说。一般到了老雷这把年龄，干到处级也不稀奇，更何况他年纪轻轻就提了副科。一个位子蹲了二十多年，终于遂愿，也该庆贺一番。

“老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我继续询问。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失踪”，我们满世界翻了几天，最后当事人却大摇大摆地从娱乐场所走了出来。

老雷朋友摇摇头，说老雷平时黄、赌、毒一概不沾，下班准点回家，除了爱喝酒，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他在外面有没有什么仇家或‘不一般’的关系？”我又问。

老雷朋友还是摇头，说这方面他也不太清楚。但以他对老雷过往的了解看，老雷为人平和、讲义气，之前没听说他得罪过谁，生活作风方面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他这快五十的人了，没钱没权的，自己日子都过得委委屈屈，哪还有心思‘札乔子’（搞外遇），说句不好听的，就算他有那心思，也不见得有女人肯跟他……”虽然我问得很隐晦，但老雷朋友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

失踪之前状态正常，生活轨迹基本稳定，无特殊关系或癖好。这样看来，老雷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人了呢?

“会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同事在一旁提醒我。老雷的朋友也听到了这句话，他看看我，眼神中充满焦虑。我当然也想到过这种结果，只是当时不好说出口。

“那天喝完酒之后他是怎么走的？”我接着问。

老雷的朋友说，那天他们从晚上六点开始吃饭，一群人兴致很高，一直喝到晚上十点半左右。之后他和离家近的几个人一同步行回家，老雷因为喝得不少，所以是坐那位没喝酒的朋友的车离开的。

我又找到那位当时开车的朋友，他说他们同车三人将老雷送到住所所在的小区附近，本来想直接把他送上楼，但老雷说自己喝多了，有点晕车，要下车走走。于是三人便放下老雷，目送他在通向小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方才开车离开。

临下车前，其中一位朋友还问老雷：“你行不行？”老雷挥挥手说：“没得问题。”

一切都像以往聚会那样正常，只是这次老雷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你们，跟我来监控室看看。”简单的询问之后，同事指了指老雷的爱人和其中一位朋友，示意他们一起来监控室查一下老雷失踪那晚的录像。

“老雷……不会出什么事吧？”路过接警台，老雷的爱人拉住了我的衣袖。

我不好说什么，只好宽慰她先别着急，看看监控再说。

路面监控最后拍到的，是老雷在离家一百多米的街口下车的影像。画面中的老雷下车后扶着车窗，好像在跟朋友们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冲车子摆摆手，转身走出了监控器拍摄范围。

剩下的路程没有监控，小区门口的监控也没有拍下他进入小区的画面。街口转身的那个背影，成了老雷失踪前的最后影像。

老雷居住的小区位于城市边缘，继续向北跨过国道，就是郊区成片的农田和果园。我考虑了一下，一面安排值班协警继续陪老雷的朋友在所里看监控，一面拉上老雷的爱人和孩子说：“走吧，我们去（小区）后面看看。”

雪一直在下，警车在路上走得有些艰难。开车的同事问老雷爱人，老雷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他爱人点点头。

“他呀，不喝酒什么都好，一喝酒就像换了一个人……”他爱人说，老雷之所以蹲了二十四年的“副科”提不起来，就跟他这喝酒的习性分不开：

1999年，老雷年龄正好，要提正科，党委会都通过了，他约人喝酒提前庆祝，结果把一个同事喝进了医院，差点儿没救过来，公司领导一怒之下取消了他的资格。

2006年，老雷业绩突出，领导有心提携他，已走到了公示这一步，可老雷又因为酒后在厂里耍酒疯，闹到了派出所，领导说影响不好，把他劝退了。

2011年，还是为了提正科这事，老雷说“拉拉关系”，请人喝酒，结果回来的路上掉进沟里把腿摔断了，住了三个月医院，硬生生地错过了竞聘。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就没有当科长的命，这个‘正科’咱不干了。他本来也认了，但这次不知为什么又轮到了他，他说再试一次，还保证说‘红头文件’下来之前绝对不喝了，结果现在科长是当上了，但是你看……”说到这里，老雷爱人突然哭了起来。

我和同事带着老雷的爱人和孩子，在漫天大雪中漫无目的地找了整整一个下午，眼看天已经黑了，只好回了派出所。

调看监控的同事也没有任何收获，所里只好向兄弟单位发了失踪人员协查通报，把老雷的信息挂在公安网上，寄希望于兄弟单位在年关日常的巡逻排查中能有所发现。

老雷的爱人和朋友在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也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公安网上依旧没有消息。

我家在外省，按局里政策可以提前返乡。临走前，我特地去了老雷家一趟，想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线索。

一进屋，只见烟雾缭绕，客厅桌子上供着菩萨，屋门上贴着“灵符”，老雷爱人满眼血丝，好像几天没睡的样子。我问她这是干什么。老雷

爱人说，自己实在没办法了，请了几个算命的，说老雷现在被“魔怔”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让她在家里供上菩萨贴上灵符，为老雷“指路”。

我不好说什么，毕竟这算是家人的一丝希望，便问她外面找得怎么样了。

“他喝酒出点事，受罪的还不是老婆孩子……”老雷爱人叹道，那帮一同喝酒的朋友帮忙找了两天后，看没有什么结果，也就都散了，现在外面只有两个亲戚还在帮忙找。

她问我派出所那边有没有消息，我本想说没有，但看到她和孩子期盼的眼神，有些不忍心，只好斟酌了一下语言，说消息已经放出去了，所里也安排民警专门跟进这事儿，“这种事情我们常遇到，一般当事人最后都平安回来了”。

老雷爱人神情有些放松，招呼我喝水抽烟，我摆摆手说马上走了，晚上要去赶火车。她硬塞给我两个苹果，然后送我到门外，祝我新年快乐。

正月初四，雪终于化了。

新年轮班。早上七点多，我在早点摊上被同事拎上警车，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肉夹馍。

我说大过年的啥事这么急，同事说，赶紧把肉夹馍扔了，出警去。我说大过年的又是么斯（什么）警？同事说死人了，那个失踪的老雷死了。

死亡现场在距离老雷小区向北不到一公里的农田边上。当我赶到现场时，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我拨开人群走进去，看到老雷侧卧在农田排水沟里，身上只穿着秋衣秋裤，没有任何外伤。

其他衣物鞋袜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水沟岸上，手机、钱包和所有贵重物品都在，仿佛人不是躺在水沟里，而是躺在自家温暖的床上。

老雷的爱人哭晕在现场，被120送去了医院。我和同事把老雷的遗体抬上车，送去法医那里尸检。

法医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说老雷是活活冻死的，死亡时间就是“小年”那天的晚上。那晚老雷应是酒后迷了路，跌进了农田的排水沟里，酒精迷醉了他的神经，让他误认为自己回到了家，便脱掉衣服直接睡在了沟里。

我问，这零下七八度的气温不会把他冻醒吗？法医说，他喝了那么多酒，估计在沟里睡了很长时间。等酒劲醒了想爬起来时，可能发现自己已经不行了。

然后，漫天大雪便把他覆盖，直到雪化了一些，遗体才被人发现。

正月初九，老雷爱人来派出所开火化证明，她面色苍白，人整整瘦了一圈。

“节哀吧，大嫂……”我不知道再说点啥。她点点头，说声谢谢。然后问我，那几个同老雷一起喝酒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承担一些责任。我建议她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那几个人，简直狼心狗肺，老雷活着的时候关系那么好，现在出事了，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看看，连追悼会都不露面，生怕被缠上！”她说完，转身离开了派出所，说要去法院告状。

“老雷家这个年，是没法过了。”我说。

“不只是今年，以后年年都没法好好过了。”同事叹了口气。

爱情事业双喜临门，三顿酒后“过年”变“周年”

2015年腊月的一个深夜，我被带班副所长从被窝里“薅”了出来，所里刚接到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一居民在家中非正常死亡，指令出警。

到达现场时，120急救车刚走，死者的一众亲戚坐在客厅沙发上发愣，死者父亲见我们进屋，上来倒水递烟。

客厅的桌子上还撂着没打完的牌局，厨房的地板上放着没来得及处理的餐厨垃圾和几个空酒瓶——这并不太像非正常死亡现场，我先是有点不知所措，但随即明白了。当事人走得太突然，家属应该根本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医院急诊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结论是：酒精中毒合并心肌梗死，死者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具体死因需要公安局法医做进一步尸检。

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在卧室帮助法医拍照留证，客厅里突然传来一声哀号，是死者的外婆，看来是死者家属过了心理应激期。紧接着客厅便人声鼎沸，有人在痛哭，有人在劝慰别人，也有人一边劝慰别人一边痛哭。

死者的父亲相对镇定，法医拿出文书找他签了字，副所长便要我赶紧把遗体搬离现场，然后示意死者父亲上我们的车先去所里。

死者杨波，殁年32岁，未婚，武汉一家网络信息公司的老板兼技术主管，前一天中午刚刚抵达这里，此行本是要回家欢度春节。

“我们家这是‘因福得祸’……”派出所里，父亲老杨低声说。杨波这次回家，带回两个天大的喜讯：一是他的公司年底谈成了一笔生意，获利颇丰，他准备在武汉为父母买一栋复式住宅，已经看好了楼盘，年后拿到对方预付金后便入手；二是杨波准备与谈了四年的女朋友结束

爱情长跑，年后就结婚，两人已经定好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良辰吉日”了。

人生两大喜事接踵而至，当晚，父亲老杨就兴高采烈地宴请了一众亲戚，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大约晚上十点，家宴结束，亲戚们意犹未尽，杨波又拉出了麻将桌，招呼喜欢打麻将的亲戚们一起玩“跑晃”（一种麻将玩法）。

十一点左右，杨波说自己有些胸闷，要出去透口气，亲戚们正全神贯注玩牌，便由他去了。

过了一会儿，杨波从屋外回来，说自己有些累，想先去睡了。老杨看儿子的脸色有点不对，想杨波今天才从武汉开车回来，估计是累了，也没多想便由着儿子去睡了。

凌晨一点，亲戚们看时间不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老杨本来打算叫杨波起来给长辈们道个别，进了卧室却发现儿子的情况不对。

杨波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面色发青，身体冰凉。无论老杨怎么拍打呼唤，始终没有反应。听到卧室里老杨异样的声音，已经走到门口的亲戚们又都折返回来。

众人折腾了一番，见杨波还是没有反应，便打了120。亲戚们还在商量着，如何将体重260斤的杨波搬上救护车，但医生到达现场后做了一番检查，便告知说人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没有去医院抢救的必要了。

老杨立时蒙了，旁边的亲戚也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医生提醒老杨赶紧给公安局打电话，不然杨波的后事不好处理，老杨才木然地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一个大活人，两个小时前还好好地喝酒打牌，怎么说没就没了？他才三十二啊！”老杨这才哭出声来。

据老杨说，杨波的酒量很好，平时一斤酒不成问题。杨波从小爱打篮球，身体素质不错，除了这几年工作压力大、体重长得有点快，从没听说儿子的心脏有问题。

老杨始终不相信儿子会因饮酒而离世，执着地要求我们系统调查杨波死因。我们便找到杨波的公司，在员工们的叙述中，了解了杨波近一个月来的工作和生活轨迹。

杨波的公司规模不大，所有员工加起来不到三十人。杨波既是公司老板，又几乎一力承担着公司技术研发层面的主要工作。那笔生意，杨波前后谈了半年有余，对方是一家北京知名的信息技术企业。本来对方并没看上杨波的公司，是杨波费了很大周折，才得到对方关注。

一个月前，合同谈判进入白热化阶段，杨波一方面要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应酬，办公室的灯几乎通宵达旦亮了一个月。终于，生意在年前敲定。放假前一天中午，杨波组织公司员工召开年会，席上的杨波激动异常，一连干了六大杯白酒，员工们受老板感染，也纷纷举杯痛饮。

酒后，杨波提出请员工们K歌，一群人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KTV，又喝了不少啤酒。晚上，杨波兴致未尽，又把他认为在这笔生意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位员工单独留下来继续喝。

次日，杨波开车赶回老家，中午刚到家便接到发小电话，又招呼他去喝酒聚会。老杨曾劝儿子“晚上家庭聚会，你中午就在家休息一下”，但杨波说自己没问题，还是去了。

老杨不知道儿子中午喝了多少酒，但杨波下午回家后状态还不错，老杨便没多想，晚上就由着儿子继续喝了。

我们找到当天中午与杨波一同参加聚会的同学时，他们已经知道了杨波的离世。也许是担心卷入纠纷，他们有的说杨波中午喝了一杯白酒，有的说喝了一瓶啤酒，还有的说杨波没有喝酒。

但无论如何，杨波是在自家酒宴后出的问题，究竟是哪杯酒导致他的离世，早已无从查证。

杨波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让父亲老杨几乎一夜白头，母亲因受不了打击，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

事后我们得知，杨波的去世使他生前费尽心思谈成的那笔生意付之东流。由于杨波是其中关键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缺少了他项目就无法进行下去。北京的合作方撤回了投资，但鉴于杨波的家庭情况，慰问性地给了老杨一笔钱。

谈了四年的女朋友在杨波去世之后，来他家里看望了几次曾经的“准公公”和“准婆婆”，之后便再没来过。当年十月便跟别人结了婚。

2015年年底，做社区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家访时，我又一次来到杨波家，年关将近，整个社区都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唯独杨波家一片寂静。

开门进屋，正对面客厅桌子上供着杨波的遗像，两边是白色蜡烛，中间是香炉和瓜果，唯独没有白酒。老杨夫妇情绪低沉，有一句没一句地和社区干部说着话。

我劝老杨说儿子走了一年了，你们老两口也要试着走出来了，日子还得继续，快过年了家里布置一下，杨波泉下有知，也不想看父母这副样子。

老杨扭头看看杨波的遗像，眼睛有些发红：“别人家过年，我们家过周年，以后年年都是这样了……”

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他挡酒搭上了命

2016年正月初五清晨，我奉命在市殡仪馆“看守”一具遗体。

彼时，我和同事守着冰柜，死者亲属正在殡仪馆院子里闹得不可开交，殡仪馆工作人员被堵在人群之外。我看看冰柜又看看治安支队抽来的同事，叹口气说，大过年的在殡仪馆蹲着还真是不太好受。

同事也叹了口气，说自己当年在派出所工作时，这种事儿一年一次，“年年到这里过年”。我问他这回又是咋回事儿，他无奈地说：“还能咋地，又是喝酒喝出人命呗。”

中午，外面同事送来两盒速冻水饺，说今天“破五”，在哪儿过都是过。我问他外面处理得怎么样了，他摇摇头，说死者单位来人了，正在和家属谈判，但势头不太好，双方各不相让，估计下午还得守着。

傍晚，我们还在冰柜旁边。外面同事又送来两盒速冻水饺，我心中暗自叫苦，问他外面谈得怎么样了，他说依旧谈不拢，要做好今晚在殡仪馆加班的准备。

“这次到底又是啥事儿？”早上我被上级一个电话叫到了殡仪馆，只知道家属要把遗体抢出去摆到死者单位，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大概是觉得当晚下班的可能性不大，治安支队的同事便给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情。

死者姓王，是本市报社的一名记者。殁年26岁，风华正茂的年龄，父母俱在，本人去年初刚结了婚，妻子当时正怀胎三月。

半个月前，王记者接到了一项采访任务，去外地一处建筑工地采访跨年，要表现出当地工人新年期间放弃休假、加班赶工期的劳动热情。

眼看年关将至，王记者本不太想去。但这次任务是报社的一位主要领导带队，加上自己还是新人，没有拒绝的资本，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采访非常成功，报道以“新年特刊”的形式刊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承建工程的建筑公司总部就在本市，公司老总为答谢报社，在大年初二采访组返回当晚，就接了带队领导和采访记者一起吃饭。

建筑公司老总这边四个人，报社方面是带队领导、社办公室主任、同去采访的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和王记者。宴席上，宾主双方开怀畅饮，八个人一晚喝了八瓶高度白酒。

“一人一斤高度酒，确实有点儿过，王记者就这么……”我问同事。

“这倒不是最吓人的。”同事继续说，“主要是报社这边，带队领导说自己晚上回去还要‘赶二场’，只喝了一杯；办公室主任说这几天自己‘不在状态’，喝了三两，50多岁的老同志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太能喝酒，被劝了半斤。”

“王记者呢？”我追问。

他想了想，说：“三斤。”

我吃了一惊。同事解释说，王记者平时至多喝三瓶啤酒的量，那天喝了三斤白酒，纯属无奈——社长要求王记者帮他“代酒”，以答谢建筑公司老总的热情款待；办公室主任也不断劝王记者，“多搞点，有前途”；而那位老同志是王记者在报社的“师父”，更是觉得让年轻徒弟挡酒无可厚非。结果一来二去，王记者在饭桌上便只剩喝酒。

“真他妈不要脸，自己不愿喝，猛劝别人喝！后来法医做尸检，那孩子胃里什么都没有，全是酒！”同事忍不住骂了一句。

一边是自己的领导，另一边是自己的师父，两边的面子都抹不开，觥筹交错间，王记者醉倒在桌子下面。

如果当时，同席的人能及时将王记者送到医院救治，可能远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可惜，当时同席的人只是招呼服务员，把王记者抬到隔壁包间里休息一下，便继续吃饭，等晚宴结束准备离开时，才想起王记者来。建筑公司老总殷勤地派自己两个跟班去叫醒王记者，准备去搞“二场”，结果两个跟班跑到隔壁包房，发现躺在三个并排椅子上“睡觉”的王记者脸色发青，怎么也叫不醒了。

在场的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慌忙拨打了120，王记者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个小时后，医生说送来太迟了，脑血管破裂，人已经没了。

“那孩子也是‘造业’，听他家里说当时报社建了一栋‘福利房’，没产权的那种。但价格很低，员工们按照工作表现排号入住，他们单位内部抢得厉害。他结婚之后一直没房子，也看上了那栋‘福利房’，按说他业绩蛮好，但不知什么原因排名却蛮靠后，可能是想在酒宴上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吧，所以拼了命地喝。”同事说。

“喝酒也算‘工作表现’吗？”

“嗨，‘表现’这两个字博大精深，好与不好，还不是他领导一句话的事情！”

年前，王记者的父母妻子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大年初三接回家的，却是一纸医院的《死亡通知书》。新年的喜庆戛然而止，他们跑到报社要讨个“说法”。

喝酒喝死了人，报社紧急成立了“应急处理小组”，给出的善后措施是“一次性补偿十万块钱”。王记者的家人显然不能接受，报社的带队领导又说，自己以个人名义再出10万，凑20万息事宁人。

“报社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喝酒喝死了，和报社没有关系，给10万块钱已经是‘本着人道主义’了。”

“那位领导也是害怕，现在上面查得那么紧，他竟然喝酒喝死下属，查下来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同事说。

“那王家人的意思呢？”我问同事。

“他们家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出公差的过程中出的事，必须按照‘工伤死亡’条例办。这样的话，总的赔偿数额在70万左右，而且之后孤儿寡母每月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同事说。

但这一要求是报社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给王记者报备工伤死亡，就意味着他的死因被公之于众。这样一来，不但那位同桌喝酒的带队领导跑不脱，连报社的党政主管都得受处分。

“那我们现在这是干啥？‘助纣为虐’吗？”我跟同事开玩笑。

同事瞪了我一眼，说现在家属要把王记者的遗体抢出来，放到报社大厅里去，报社则要求马上火化，这两样都是我们不允许的。现在的任务是，保证在纪委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哪一方都不能碰王记者的遗体。

“今天中午，公安局已经通知了纪委，估计现在上面已经来人了……”

我和同事一共在市殡仪馆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市纪委全盘接手调查。

最终，王记者的家人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了66万元赔偿，这笔钱由那天与他同席的其余七个人分摊赔付。

那位带队喝酒的报社领导被开除党籍公职，数名报社主管和分管领导被撤职，并受到纪律处分。

但王家人所期望的“工伤死亡”并没有被认定下来，也就意味着孤儿寡母今后不会有每月的生活补贴。消息确认后，王记者的遗孀不顾公婆哀求，执意打掉了腹中胎儿，在一个雨夜离开了王家，从此不知去向。

王记者的老父亲疯了，他多次提着菜刀，满街寻找那天和王记者一起喝酒的人，瞪着通红的眼睛说要砍死他们。

干儿子杀了亲孙子

1

老孔的孙子孔安然出事了。

2016年4月的早晨，9岁的孔安然被几位农民发现蜷缩在318国道边的一片偏僻的油菜花地里，已经死去多时。此前，老孔一家和我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民警已经找了孔安然两天两夜。

老孔一家痛不欲生，孔安然的妈妈更是几次哭晕在太平间。经法医鉴定，孔安然死于机械性窒息。

四天之后，杀害孔安然的凶手张启德被抓获归案。听闻消息，老孔一家先是愕然，之后反复地向派出所民警询问："是不是搞错了？"

他们之所以质疑，是因为凶手的身份特殊：张启德与老孔一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老孔时年58岁，原系辖区某国企财务处处长，2015年年底刚刚退居二线。儿子儿媳在省城做生意，孙子孔安然则跟随老孔生活，在辖区三小读四年级。而此前，张启德与老孔则在同一单位共事近二十年，既是老孔的"铁杆"下属，还是他的"干儿子"。

我只好出示了相关证据，告诉他们张启德已经认罪了。

听我这么说，孔安然的父母当即就跳起来，喊着要去找张启德拼命，同事急忙把他们拉住。老孔则愣在一旁呆若木鸡。半晌，他才缓缓地坐到椅子上，嘴里挤出一句："畜生！畜生啊！"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带我去见见那个畜生！我要他亲口告诉我，为什么要害死安然？！"痛哭之后，老孔在办公室里咆哮。我只能先安抚他的情绪，再试图厘清他与凶手张启德之间的纠葛。

老孔在办公室里足足平静了一个小时，才缓缓开口。

2

1995年，17岁的张启德通过农村招工来到现在的单位干装卸工，而老孔那时任该单位的基层干部。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相识，交谈中，老孔得知张启德是自己的同乡，由此，两人之后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

张启德家境贫寒，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继续读书，碰巧遇上当年单位在附近乡镇招工，才得此机会“进了城”。装卸工虽然辛苦，但毕竟是在离家不远的国有企业上班，张启德对此十分感激。

年轻的张启德干劲十足，与同部门惯于偷懒耍滑的“老油条”们截然不同，他一直干着最重的活，拿着最低的薪水，工作之余，还自行设计制作了几样搬运工具，其中一件当年还被企业评为“技术进步先进奖”，在全厂进行推广。

渐渐地，单位领导也开始关注张启德了，老孔便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张启德的同乡，老孔一直对这位“小老乡”颇为关照，经常打听张启德的表现。1998年，单位岗位调整，老孔升任某分厂副厂长，索性直接把张启德从装卸队调到了自己麾下。

“他那时候工作强度大，那点工资又得拿出一大半给家里，平时连饭都吃不饱。我可怜他家里穷，又是个半大孩子，所以时不时地接济他一下。不客气地说，张启德那三年的饭，基本是在我们家吃的，他和我儿子差不多大，我也几乎把他当个儿子来养！”老孔说。

在老孔手下干了三年，2000年年初，单位出台储备干部选拔制度。张启德有心参与，因为担心自己学历不够而向老孔求助，老孔便建议他学个“自考”。

选择专业时，张启德原本想学机械加工之类的方向。但老孔劝他要想有所发展，就得想办法往机关里混，因此建议他去学财会，张启德欣然同意。

“他刚进厂时很多人瞧不起他，他去上学时又有很多人眼红他。那时候厂里不少职工闹意见，说张启德晚上看书影响白天的工作效率，谁也不愿和他一个班。还有人往上级递举报信、搞‘联名书’，要求单位停发张启德工资，都是我给他顶着。”

经过几年的努力，头脑灵活又肯吃苦的张启德终于拿到了大专学历。毕业那年，老孔正好升任单位财务处领导，作为老孔的“自己人”，张启德便顺理成章地调入财务处。

“后来单位‘减员增效’，把装卸队分流了。和张启德同期进厂的绝大多数装卸工，都只领到万把块的‘下岗’补偿便被打发回家了，很多人直到现在还在四处上访告状，只有张启德调进了财务处，不但保住了饭碗，后来还当了干部。”

避过了“下岗潮”，还从一名最底层的装卸工晋升为一名财务干事，张启德的人生无疑是转了个大弯。这其中当然有他本人的不懈努力，但肯定也少不了老孔的栽培和提携。

张启德当然也没有忘记老孔的恩情，用旁人的话说，那时的张启德对老孔“比亲儿子还孝顺”，有事没事就往老孔家里跑。老孔的独生子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成家、做生意，老孔夫妇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多是张启德照料。

2005年，张启德结婚，邀请老孔担任“主婚人”。婚宴结束后，张启德特意把老孔一家留了下来。在包房里，张启德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磕了三个响头。一是感谢这些年来老孔的“再造之恩”，二是要认老孔做“干爹”，老孔自然一口答应下来。

有了“干儿子”的名分，老孔对张启德的照顾更是不遗余力，张启德在单位自然也是风生水起。

“那时候他干起工作来真是拼命，脑子好用又肯下死力。那些年财务纪律比较松，很多部门的账也走得乱七八糟，但张启德最后总能想办法把账做好，因此很多部门领导和他关系也不错。”老孔说。

进入财务处三年之后，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干爹”的庇护和上级领导的青睐，张启德在岗位竞聘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名科级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3

“那你和张启德是怎么结下怨的？”我问老孔。

老孔顿了顿说：“说实话，我至今都没觉得做过什么对不起张启德的事情，如果硬说有的话，也只能想到他找我借钱的事情。”

2008年，张启德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张孔两家都非常高兴。彼时老孔的孙子孔安然刚刚两岁，老孔还说要给两个孩子定个“娃娃亲”，以后张孔两家也就正式成了一家人，张启德那声“干爹”里的“干”字就能正式去掉。

张启德自然十分愿意。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张启德的女儿被查出患有新生儿重度地中海贫血，本地医院无法救治，送到省城儿童医院诊断后，医生给出的预计治疗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

“医生说孩子的情况很危险，即便救过来，以后的花销也是个无底洞。有人劝他放弃算了，反正两口子都还年轻。可张启德坚持给孩子治病，但他们夫妻俩自身财力很有限，老家的亲戚平时都靠他接济，更没钱借给他。所以他只能来找我借钱，我当时就给他拿了4万块。”

“你帮了他那么大的忙，他应该更加对你感激不尽才是啊……”我问老孔。

“张启德当时确实很感激我，说之后等自己能周转了，一定把钱还我，我当时只是劝他孩子治病要紧，先不谈还钱的事情，他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来，他一直没把钱还给我，老伴也埋怨过我。那时我还怨老伴‘财迷’，跟老伴打了几次嘴仗。”老孔说。

大概从老孔那里借来的4万块钱远不够女儿的医疗费，此后的张启德开始“另辟蹊径”找钱。

“没过多久，上级领导就找我谈话，说张启德私自从单位财务账上支了12万出去……”

“挪用公款？”

“可以这么说吧。当时我又惊又气，急忙把他叫到办公室，质问这笔钱是怎么回事，结果张启德一进屋就给我跪下了，说孩子的治疗费差得太远，借遍了朋友也不够。医院一个劲地催他缴费用，他只好先动了公款，还偷着用了我的签名章……”

“按照法律规定，这笔钱已经达到‘数额巨大’了，而且张启德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上。单位要报案，那样的话张启德肯定完了。没办法，那段时间我只能带着他不停地找领导求情，希望这事儿能够‘内部处理’。后来领导终于松口了，说张启德只要在三个月内能把挪用的12万补上，单位可以不把他移送公安局。”

“他把钱补上了？”

“哼。”老孔冷笑了一声，“他哪里有钱去补这么大个窟窿……”

眼见三个月的时限到期，张启德想尽办法也没能补上窟窿，老孔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又从家中拿出一笔钱，帮张启德先把单位的钱填了。

张启德勉强逃脱了“扭送公安机关”的命运，但科级干部铁定是干不成了，连老孔都受到了牵连。

“不出这事儿的话，我本可以升到副总的位置上，出了这事，我怎么着也得负个领导责任，副总不要想了，只好在财务处长的位置上等退休……”老孔摇摇头说。

4

听老孔这么说，我心中更加不解。

按道理，老孔为张启德担了这么大的事，张启德应该更加感激老孔才对，怎么也不至于走到加害老孔独苗孙子这步田地。

“唉，人心难测啊……”面对我的疑问，老孔也长叹一声。

“如果当初我不帮他，就让单位把他送到公安机关的话，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我不好接他的话，只能继续听他说下去。

“去年三月份的一天，张启德突然找我借钱，开口就是30万……”

张启德出事之后，两家虽然不如以往亲密，但也常来往。但张启德开口就借这么多钱，大家多少都有些诧异。“开始我也很紧张，以为是他女儿的病情又出了什么问题，问他为啥要这么多钱，他含糊其词的，后来经不住我问，他说自己借钱是为了炒股。”

老孔劝张启德不要胡闹，股市有风险，有闲钱的人可以进去尝试一把，但张启德现在这个情况，实在输不起，千万不要去冒这个险。

但张启德执意要借，还说自己已经没退路了。老孔问原因，张启德无奈之下，只得承认自己已经因为炒股欠下了一屁股债，现在早就走投无路了。

“他说了一通什么‘配资’‘爆仓’‘平仓’什么的，我也听不懂，只知道他赔了不少钱在里面。”老孔顿了顿，“上次他挪用公款的事情后，我曾经跟他说过，经济上有困难来找我，不要再去打公家的主意。但那次他开口就借30万去炒股，我又不是开银行的，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另外恰好当时我家里也遇到点事儿需要用钱，便拒绝了他。”老孔说。

张启德没有借到钱，悻悻而归。但从那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不再往老孔家跑，即便在单位也刻意躲着老孔。

看到张启德这个态度，老孔也有些生气。

“钱是我的，借与不借都是我的权利，张启德之前从我这里借钱的时候，我从来都是能给多少给多少，也从来没有催他还过。一次不借，他怎么就这样了？！”

因为这笔钱，两人的关系产生了嫌隙，但老孔还是不太肯相信曾经的“干儿子”会因此恨上自己，更没料到他会伤害自己的亲孙子。

“警官你说，他至于为了这个害死我孙子吗？！”

5

对于老孔的疑问，我也十分不解。带着疑问，我提审了张启德。

挪用公款事件之后，单位撤掉了张启德财务处的科长职务，被“发配”到后勤去管理苗圃。此时，张启德既哀叹命运对自己不公，又痛恨身边人的无情——以前单位那些跟他称兄道弟的各部门头头脑脑，现在纷纷转过头来与他“划清界限”，生怕避之不及。

由于背上了“污点”，此后，无论张启德工作多么努力，都难以再获得领导的好感。任何评优选模活动也都与张启德无缘，甚至连每年全单位每一名职工都有的年终奖，张启德也被减了一半。

既然前途无望，张启德便将目标转向了其他赚钱的门路上。他确实很需要钱，女儿的病就像一个无底洞，未来手术还需要一大笔钱。那几年，张启德疯狂地寻找各种赚钱的机会，他在业余时间卖过汽车、倒过茶叶，尝试了所有能找得到的路子。

终于，在2014年年底，一个看似千载难逢的机遇被张启德发现了。

那年从下半年开始，中国股市大热。无数人涌入其中，梦想着一夜之间改变命运，张启德也加入了炒股的大军。

开始他只投了一点点钱，没过多久便小赚了一笔，这让他十分激动。彼时，网络上通过炒股一夜暴富的神话铺天盖地，张启德觉得自己应该把握住这次机会，“玩个大的”，就此咸鱼翻身。

2015年3月中旬，交际甚广的张启德从“发小”那里得到一个“内幕消息”，说一只“妖股”在连续两天跌停之后将会大涨。他觉得自己赚钱的时机到了，便瞒着妻子将存给女儿的八万块治疗费取了出来。

思来想去，张启德觉得这些本金还是太少，即便赚了也不足以让自己翻身。有人提议他用“场外配资”。出于对“发小”那条“内幕消息”的笃信，张启德便找到了一家配资公司，用女儿的8万块治疗费做保证金，选择了高比例的配资炒股。

没想到，资金进场第一天，那只股票便迎来又一个跌停，高达1比7的配资比例下，张启德巨亏，配资公司通知张启德补缴保证金，不然第二天可能会强制平仓。

张启德惊出了一身冷汗，想到那8万块是女儿的“保命钱”，说什么也不能被平仓。他慌忙四处筹钱，身边朋友全都借了个遍，才勉强凑了几万块补了仓。

可那只股票并没有像“内幕消息”中所说的那样反弹，很快便迎来第四个跌停板，刚刚投进去的几万块又灰飞烟灭。配资公司补缴保证金的电话再度响起，张启德情急之下在小额贷款公司又借出了5万块高利贷，一股脑投进股市继续补仓。

“明知亏成这样还不收手？”我问张启德。

“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就是‘癔症’了。听别人说，炒股票最怕不坚定，‘小跌’的时候跑了，‘大涨’的时候便进不来了。当时我就一门心思地坚信，那只股票肯定会大涨，所以亏成那样还一直挺着。”张启德说。

“万一你等不到那个所谓的‘大涨’呢？”

“我当时顾不上这些了，那么多钱都扔出去了……另外……”

“另外什么？”

“老孔之前跟我说过，经济上有困难可以去找他，他儿子在省城做生意，家里比较有钱……所以……”张启德犹豫了一下。

“所以你就想着最后还有老孔给你‘托底’？”

张启德点点头。

6

然而奇迹依旧没有发生。之后的几天，那只股票虽然没有再度跌停，但接连下降的走势线告诉张启德，他借来的高利贷又亏得只剩零头了。

张启德曾打电话给“发小”问罪，但那位“发小”依然信誓旦旦地对他说：“再坚持一下，有大户进来了，现在只是‘洗牌’，马上就要大涨。”

配资公司补交保证金的电话又一次响起，但张启德这次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但赌徒往往都有“赢跑亏不跑，越亏越不跑”的心理，此时的张启德不但亏完了女儿的治疗费，还背上了十几万债务，因此更不甘心就此放弃。

万般无奈，张启德找到了“干爹”，希望老孔兑现当初的“承诺”，看在自己这个“干儿子”十几年鞍前马后的分儿上，再“帮衬”一把。

然而，这次老孔却回绝了他。之后，无钱补交保证金的张启德绝望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账户被配资公司强制平仓，先前投进去的十几万血本无归。

“他之前一直说，我要是经济上周转不过来就跟他说，要不是有他这句话，我也不敢拿女儿的救命钱去炒股票啊！”

后来，当我问起老孔这句话的意思时，老孔颤抖着声音对我说：“我的意思是孩子治病缺钱的话跟我说，谁说要帮他去炒股票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彻底完了，女儿治病的钱被我输光了，还欠下了那么多外债，连翻身的机会都没得了。而且，这些事情我老婆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那时候连死的心都有了……”张启德说。

这次“配资炒股”让张启德的人生再度坠入深渊，十几万的债务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他更加绝望，但之后发生的事，却让他的绝望逐渐演变成了对老孔的怨恨。

“我被‘平仓’之后，那只股票却不断上涨，从7块一路涨到22块……如果我有那30万，按照之前的计划，现在我不但还清了外债，还可以狂赚一笔，那样孩子的手术费也凑齐了……”

然而，命运对张启德的打击还未结束。给女儿准备的8万块，是张启德夫妇原本打算带女儿去北京做手术的“救命钱”。这笔钱被张启德输了个一干二净，他又不敢对妻子明说，只好把女儿赴京手术的时间一拖再拖，导致女儿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没多久便离开了人世。

在妻子的严厉追问下，张启德只好把自己炒股的事情和盘托出。妻子一怒之下与张启德离了婚。

“辛辛苦苦十几年，一朝回到解放前……”张启德痛苦地低下头。

“借钱这事，老孔借给你是缘分，不借是本分，你女儿的事，分明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更何况，就算老孔给过你承诺，他一时半会儿去哪里给你弄那么多钱？”旁边的同事听到此，忍不住指责起张启德。

“他当时不是没有钱，就是见死不救！”张启德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张启德原本只是怨老孔不该跟自己说大话，但有一次去居委会办事时，却偶然间听到了一个令他火冒三丈的消息：就在2015年，老孔家一次性拿出100多万在省城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准备以后把孙子孔安然的户口迁到省城去，以便就读更好的初中。而买房的时候，正是老孔以“没钱”为由拒绝张启德之后不久。

张启德追问居委会干事此事真假，居委会干事说：“那还有假？老孔过来给孙子办户口迁移的社区证明时亲口说的，还劝我说省城的房价要涨，赶紧趁早买一套，即便不住也是投资……”

这句话成了压垮张启德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当时真的气炸了，脑袋轰的一声。他当初承诺得那么好，自己又明明有钱，为什么见死不救？他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他‘干儿子’，这些年我鞍前马后地孝敬他，比亲儿子都用心……”

从居委会出来，愤怒和绝望让张启德忘掉了多年来老孔对自己的照顾和帮助，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决定报复老孔，就从他最疼爱的孙子身上下手，让他也感受一下失去亲人的痛苦。

尾声

后来，我把张启德的供述大致告诉了老孔一家，虽然语言尽量委婉，但老孔一家还是气得暴跳如雷。老孔更是怒急攻心住进了医院，至今仍未出院。

这场凶杀案便这样了结了。

2017年年初，法院传来消息，张启德涉嫌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坊间对于这起案子议论纷纷，有人指责“干儿子”张启德是“白眼狼”“畜生”“恩将仇报”“心理变态”，有人说“干爹”老孔这是“斗米养恩、担米养仇”。也有人可怜张启德命不好，辛辛苦苦终于要混出头了，孩子摊上这么个要命的病，硬生生地又把他砸了下去。

二十万买来的

重点录取通知书

1

报案人名叫陈桥，44岁，辖区个体工商户，同来的儿子小陈，18岁，市某高中应届毕业生。

陈桥称，儿子今年参加高考，但只考了300多分，勉强能读个专科，他不想让儿子读专科，想方设法四处找门路，看能不能“花点钱”“找找关系”让儿子读个本科。

找来找去，陈桥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叫王杰的人，那人自称是省教育厅某领导的侄子，可以搞来“大学指标”，只要陈桥肯花钱，他就能帮小陈去武汉读个重点大学，而且还是那种免学费、不愁毕业找工作的专业。

听到这里，我暗自摇头，不出所料的话，这应该又是一起典型的“找关系被骗”的案子。

2

按照王杰给陈桥开出的价码，不同的学校需要花费不同的金额：独立学院8万，普通二本12万，重点本科20万。

陈桥选了“重点本科”，他觉得反正都是花钱，不如搞个最好的，可又觉得20万有些高，便跟王杰讨价还价。王杰说，价钱没得商量，想要“指标”的人排着队，晚了就给别人了。

陈桥很犹豫，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一家人省吃俭用得攒好多年。但那个“指标”，又像是悬在眼前的一块肥肉——重点大学，既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又是改变儿子一生命运的机会。

陈桥一时拿不定主意，私下里问了好些人。有人劝他千万别信，这年头骗子多，“高招”现在正规得很，根本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也更不存在“买指标”这种事情，别中了骗子的套路。

但也有人劝他一定要“抓住机会”，说“高招”一直都黑得很，潜规则多了去了，“咱小老百姓能有机会沾点光，那是咱的福气啊，一定不能错过了”！

陈桥犹豫了很久，其间也打听了其他“路子”。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这分数统招本科基本没希望，但可以退一步让孩子读个自考，也是本科，将来也能考研考公务员的。陈桥想了想，还是否定了，“自考，说出去多丢人”。

也有人提议陈桥把儿子送出国，虽然贵点，但好歹可以对外宣称是“留学生”，这总不丢人吧。陈桥心中盘算了一番，出国读书一去好几年，那个花销实在有些难以承受，也只得作罢。

思来想去，陈桥决定赌一把，反正他之前关注的那些坊间流言，无不都是“某某花了多少钱让儿子读了重点大学”“某某家的孩子托关系拿

到了高校‘内部招录’名额”这类故事，万一真被自己遇上了呢?

“300多分花20万上重点大学，这买卖真要做成了你也不亏哈。”一旁那位认识陈桥的同事插嘴说道。

“当初不就是为了帮着孩子‘改变命运’嘛！”陈桥可能没听出我同事话里的意思。

3

按照约定，陈桥先付给王杰4万块订金——这表示，自己已经“预定”了一个“重点大学”指标。王杰要走了儿子小陈的身份信息和高考成绩，说让陈桥在家等消息。

过了几天，王杰就发来几张写有小陈名字的文件图片，文件上面还盖着武汉某高校的公章。王杰告诉陈桥说“预定”已经成功了，小陈的招录走的是学校的“内部通道”，“资料”已经“上报”，让陈桥准备下一笔钱。

王杰口中的“第二笔钱”是8万块，按照约定，陈桥要在收到“领导批复”后打给王杰。转眼就到了同期高考的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陈桥问王杰，自己该给儿子怎么填，王杰说不要走学校的那套填报志愿程序，他给小陈走的是另外一套“专门程序”。

小陈没有去学校填报高考志愿，班主任老师还打电话来家里催过，但被陈桥以“准备出国念书”的理由搪塞了回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王杰说大学招生办那边办得差不多了，让陈桥付“第二笔款”，陈桥把四下筹到的8万块汇过去不久，王杰就发来一张同样盖着公章的“红头文件”，上面是小陈被录取到武汉某重点大学的“领导批复”。

8月上旬开始，同年考生都开始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了，陈桥也时刻关注着儿子上学的消息。他不时上网查询，但一直没找到儿子被录取的信息。对此，王杰给出的解释是，录取小陈走的是“内部通道”，信息肯定不能公开，陈桥自己查肯定是看不到的。另一方面，又提醒陈桥，准备支付“尾款”。

陈桥说，那时他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拖了王杰几天，想着等儿子正式办理了入学手续之后，再把剩下的钱支付给王杰，但王杰却断

然说，必须先付款，不然就不给陈桥办“指标”了。

陈桥终于“硬气”了一回，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办了，让王杰退钱，可王杰却说，之前交的钱也已经“用了”，想退肯定是退不了的。

陈桥无奈，只好就范，把剩下的8万块“尾款”转给了王杰。王杰倒也没有食言，到了8月下旬，就将一份EMS邮件交给了陈桥，说事情已经办好，让陈桥按照通知书上的日期，带着小陈去学校，找一位姓马的学校招生办领导，他会负责安排之后的事情。

王杰又给强调了好几遍，在报到之前，切勿联系那位姓马的领导，也不要走漏风声，不然坏了“规矩”，小陈上学这事儿就黄了，钱也不能退。

连专门“接头”的领导都安排好了，陈桥认为儿子读重点大学基本算是办成了，兴奋之余，还带着儿子去青岛玩了几天。

4

然而，9月7日这天，陈桥兴冲冲地带着儿子去学校报到，却没有联系上王杰口中的那位“马领导”，陈桥在招生办询问时，对方回复说，这里压根儿没有姓马的工作人员。

陈桥又带着儿子去学校统一办理入学登记的地方，却被迎新人员告知，学校2013级新生名单里根本没有小陈的名字，陈桥拿出录取通知书，对方只看了一眼，便一脸严肃地说，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陈桥不相信，学校方面就拿出其他学生的报到材料，事实证明，的确和小陈所持有的不同。学校工作人员同时解释说，小陈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是去年的版本，EMS邮件中的物品也都是假的。

由于事关重大，学校方面又派人专门核实了一下学校高招系统中的记录，确实没有小陈的信息。

于是，陈桥父子在众家长、学生和老师疑惑的目光中，灰溜溜地离开了迎新处。一走出学校大门，陈桥马上就给王杰打电话，但发现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了。

陈桥又给之前介绍他和王杰认识的那个朋友打电话，朋友说自己和王杰也只是几面之缘，没什么深交。陈桥让朋友联系王杰，但朋友也联系不上他。

陈桥感觉大事不妙，但也束手无策，只好打电话给儿子的高中班主任，班主任不明就里，还以为陈桥找他咨询儿子出国读书的事情，上来就问陈桥，你儿子出国的事情办得怎样了?

陈桥只好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把之前托人拿重点大学“指标”的事情简要跟班主任讲了一下，班主任只听了个开头，就断言陈桥被人骗了——他这么多年的从教生涯，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了。

学校也曾在学生高考成绩揭晓后，给学生家长发送过有关防范高招诈骗的警示信息，只可惜，那时候的陈桥一门心思送孩子进重点大学，看了一眼便关掉了。

陈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方面，拿了他20万的王杰不知去向；另一方面，儿子很可能面临没有学上的问题。他问班主任现在“报志愿”还来得及吗？班主任说应该来不及了，绝大多数高校都开学了。

陈桥当场气得暴跳如雷。

5

听完陈桥的讲述，我不禁惊讶于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的生意人，竟然被这样一个拙劣的谎言轻易骗走了这么多钱。

和同事一起给陈桥做受立案材料时，我问他："三次付款，难道就没怀疑过事情的真实性？"

陈桥说，他确实怀疑过，但王杰的一番说辞很快便打消了他的怀疑。

陈桥曾问王杰那些"重点大学"的指标是从何而来的，王杰跟他说：每年省内高校都会给省教育厅几个"指标"，用来招录那些分数不够但想上重点大学的领导子弟——这是省内高校用来和主管部门"搞好关系"的潜规则——当然，并不是每年都有"领导的孩子"需要用到，因此那些"多出来"的"指标"就会被卖掉，而自己正好就是那个负责"卖指标"的中间人。

然后陈桥就信了，他说自己不仅信了，而且那时还很是窃喜——他以为，自己这次终于算是沾了"潜规则的光"。

我又问陈桥，难道一直没怀疑过王杰"省教育厅领导的侄子"的身份吗？陈桥说开始肯定怀疑过，但后来接触了几次，就信了，因为自己认准了王杰的那股"气场"。

他说，自己长期在街面上做生意，也算是"见多识广"，老百姓和"有身份的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陈桥一共与王杰见过三次。第一次见面，陈桥就认定，这不是个普通人。

那天，陈桥在朋友的介绍下与王杰在武汉市区某酒店见面。包间里，王杰不时提起自己和叔叔（即教育厅某领导）之间的关系很是亲近。

那顿饭由王杰点餐，陈桥买单，加上酒水一共花了3000多块。送走王杰，陈桥不但没有心疼，反而兴致很高。他从王杰点菜和聊天的“派头”看出，王杰绝对是个“见过大场面”“常上大席面”的人。

第二次见面在本地，那次陈桥专门请王杰来本地的“虾市”吃虾。那顿饭同样是陈桥买单，一顿“虾宴”又花了将近两千。但陈桥依旧非常高兴，因为王杰给他“细说”了“指标”的事情。

第三顿饭，陈桥便在请客吃饭的同时，带去了4万块钱“订金”和两件飞天茅台。他说一箱送给王杰，另外一箱请王杰“转赠”他的叔叔。

我问他为什么还送茅台酒给王杰，陈桥说当时还以为终于结交了一位“大领导”，想顺带“探个路”，以后难免还有用得到的时候。

6

自从那天开始，王杰就持续失联。我们首先找到的，还是那个介绍王杰给陈桥认识的朋友张某。张某和陈桥是多年的朋友，对于陈桥受骗一事，张某却一脸茫然。

张某是做物流生意的，因生意原因，以前跟王杰有过几面之缘。王杰从事教育培训行业，好像还是一家教辅机构的老板，看起来比较“有背景”。当初张某也是看陈桥为儿子上学的事情着急上火，随口提了一句王杰的名字，没想到陈桥竟然当了真。

谈话中说到陈桥，张某说陈桥脑子很活络，做生意在行，情商高，尤其是人际交往方面，特别有一套，能办成很多别人办不成的事情，这是朋友圈子里大家公认的——大到做生意被工商税务罚了款，小到孩子在学校玩闹和同学置了气，只要遇到事，陈桥总能借助各种“朋友”妥善解决，尤其是三年前他儿子中考，本来分数不够，也是陈桥不知托到了谁的关系，愣是把儿子给塞进去了。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对于陈桥被骗，张某如此解释，“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上当，两年前他就被骗过一次……”

那年，陈桥侄女大学毕业考本市银行，初试没过线，陈桥的二哥认为弟弟“手眼通天”，让他帮忙“找找路子”。于是，陈桥“结交”了一个自称和“市支行领导”关系很好的人，那人承诺可以帮陈桥把侄女“办进”银行，但要价十万块钱。

陈桥向二哥满口保证说，那人和自己是“兄弟伙的”，结果二哥给了钱，那人却跑了，侄女进银行上班的事情更是没谱，为此陈桥兄弟俩闹得很不愉快。

我有些恼火，指责张某说，你明知道陈桥之前上过当，怎么还给他“介绍”王杰？连你自己都跟王杰不熟，怎么敢介绍给朋友认识？

张某先争辩说，当初自己也是好心，陈桥跟他说，自己只是想找人问问高考招生的事情，没提“买指标”的话。况且陈桥又不是“铁脑壳”，没想到他最后竟然真吃了这么大的亏。

后来张某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又说这事儿自己的确也有责任，愿意拿点钱出来补偿陈桥。我说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先配合警方工作吧，抓不到王杰，你自己的干系也撇不清。

7

一个月后，王杰被抓，讯问室里，他承认自己并非什么“教育厅领导的侄子”，那个他口中的“叔叔”也纯属子虚乌有，所有的“内部文件”“录取通知书”，都是伪造的。

甚至，王杰也不是什么“教育培训机构”的老板，只是之前曾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中工作过，担任总经理助理。工作期间，王杰道听途说了一些有关高招“套路”的传闻，不过那时，他也只把这些当成段子。

王杰从那家教育培训机构离职后，一直没找到理想的工作，又染上了赌瘾，在外欠了不少债，才决定用这个办法实施诈骗，当我们将他抓获归案时，他所诈骗的钱财除了一部分还赌债外，其余大部分已经被挥霍殆尽。

陈桥也不是王杰诈骗的唯一受害者。除他之外，本市和本省的其他地市还有多名受害者，都被王杰以“购买重点大学入学指标”为由，骗去了数额不等的财物，因为陈桥被诈骗的金额最高，该起系列诈骗案最终被串并到我们单位办理。

王杰交代称，去年“高招”期间，自己便试图以代办文凭的方法实施诈骗，不过没有成功，为此他甚至专门找人“求教”过。“师父”告诉他，诈骗这事儿要善于制造“噱头”，不然哪个信你？王杰问什么“噱头”最好用，“师父”说，尽量编造一些普通人感兴趣的“权钱交易”“官场黑幕”等，现在人们都信这个。

于是，王杰这才想出了“卖指标”的主意，他将自己伪装成“领导侄子”，没想此举倒真的骗到了不少人。除了现金之外，还有受害人的争相宴请和馈赠礼品，单是名贵烟酒就收了一大堆。

我问王杰这些受害者为何要另外给他送礼，王杰交代的原因和之前陈桥所叙述的相差无几——都是希望在此事之外，结交王杰和他背后

的“教育厅领导叔叔”。

移送看守所前的最后一次讯问中，王杰问我他这案子大概会被判多久，我说：“你干这种事真是缺了大德，这些家庭不但被你骗了钱，很多孩子为此还耽误了正常的高招报名，今年连个学都没得上，你这是毁人家一辈子的行当。我要是法官，至少判你个‘无期’。”

“他们孩子高考考了多少分，能上什么学校，他们自己心里没数吗？”王杰却阴阳怪气地说。

纵然王杰这样不思悔改，法律还是会有公正的判决，因为多起案件共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他最后一共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2013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对父子快步走进派出所。父亲一边打电话一边直奔楼梯口，儿子则背着书包，拉着拉杆箱，在楼下报案大厅站住。

我赶紧伸手拦那位父亲，告诉他二楼办公区有门禁，要报案的话跟我说，要找人的话提前打电话。那人冲我扬了扬手中的电话，说自己是所长的朋友，正在跟所长通话。

我看屏幕显示的号码确实是所长的，又听男人在电话这头，一口一个“大哥”地喊着，很是亲近。值班同事中有认识他的，冲他摆摆手算是打招呼。

看来真是所长的熟人，我便给他开了门禁。不多一会儿，那个男人就又走了下来，所长跟在他身后。

“有事你就报案，又不是不认识我就不给你查。”所长的语气中略有些不满。

男人尴尬地笑了笑，依然打着哈哈说：“陈姐真是我小学同学，我这就给她打个电话……”

男子所说的“陈姐”是所长的妻子，所长听了他的话，脸明显更黑了，撂下一句：“该报案报案，你扯她做什么！”说完扭头回了二楼办公室。

我诧异地看着那个男人，他也看了我一眼，又把自己和所长妻子是小学同学的事情重复一遍。我不便打断他，还是按部就班地问他有什么事情。

男子就把一封EMS邮件放在我面前，说要报案。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武汉某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份新生入学说明和一张缴费银行卡。

我拿出来看了一遍，也没看出什么特别，问他报什么案。男人高声说：“这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他说他被一个叫王杰的人骗去了20万。

一心想当厂长夫人的

临时女工

1

胡翠萍并没有被送去精神病院，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所里就又接到有关她的报警，但这次报警的不是她本人，而是一名社区清洁工。

清洁工说，那天下午她正在小区里收垃圾，胡翠萍突然来到她面前，质问她为什么要“跟踪”自己，是不是“徐厂长”派来的。

清洁工不知道胡翠萍是精神病人，回嘴和她争了几句，胡翠萍竟然捡起花坛里的一块砖头就抡了上来，一边抡一边大喊——“打死你个犯罪团伙的走狗！”

年过五十的清洁工被打得满头是血，一边跑一边呼救，直到闻声而来的小区住户联手夺下胡翠萍手中的砖头，才又把她扭送到了派出所。

老胡又一次被叫到了派出所，处理完赔偿事宜，我问他，上次为什么不送女儿去精神病院，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向我一再保证，这次一定送去。

我问老胡，胡翠萍口中的那个“徐厂长”是谁，老胡愣了一下，只是摆了摆手，撂下句“不说了，丢人”，便换了话题。

2

这一次，胡翠萍的确被送去了市医院精神科。但几天后，精神科就向派出所反映，胡翠萍住院期间依旧存在暴力行为，精神科医护实力不济，不能确保正常治疗，亦无法保障其他病人的安全，因此强烈要求联系胡翠萍家人，将其转诊至沙市或武汉的精神专科医院。

我通知老胡去办理转院手续，老胡嘴上答应，却迟迟不付诸行动。精神科催得紧，我只得直接找到胡翠萍家里，老胡没办法，这才告诉我，专科医院费用很高，家里实在难以负担，不知道能否再跟市医院精神科协调一下。

可市医院精神科态度坚决，老胡又因为费用问题就是不同意转诊，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

思前想后，我突然想到，胡翠萍曾是某厂职工，是有医保的，按规定原单位可以负担医疗费用。我急忙联系胡翠萍原单位保卫处，保卫处也答应派人到派出所处理。

但老胡似乎非常不愿跟女儿原单位的人打交道，办理转院手续时一言不发。按照移送要求，家属需要出人陪同控制，老胡却推说自己心脏不好，让胡翠萍的姐夫跟着去。

我记得胡翠萍在警综平台上的记录是“已婚”，便问：“她丈夫怎么没来？”老胡又摆摆手：“谁知道死哪儿去了！”

我有些诧异，本想在平台上查查胡翠萍丈夫的联系方式把他叫来，却查到一条有关他的“涉警记录”，内容竟是“捉奸”时与人发生打斗。想来夫妻二人关系应该不好，我便暂时打消了叫他来陪同的念头。

作为胡翠萍伤人一案的主办民警，按规定我也需陪同前去。加上单位保卫处的两人，一行五人乘车前往沙市精神医疗康复中心。

一路上，车内的氛围很是怪异，保卫处的两人相互聊天，偶尔和我说几句话；胡翠萍的姐夫只跟我说话。办完转诊手续已是中午，保卫处工作人员和胡翠萍姐夫又分别给我发信息说中午一起吃饭。

我以为两方说的是同一饭馆，进门后却发现只有保卫处的人，问胡翠萍姐夫去哪儿了，他们没明说，只是摆摆手说：“他搞他的，咱搞咱们的。”

我给胡翠萍姐夫打电话叫他过来吃饭，他推说中午约了沙市的朋友，下午也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我有些诧异，隐约觉得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事情。当场也不好强求，只得作罢。

3

厂里保卫处的杨科长以前我们就认识，饭局间，我问他“徐厂长”是谁，胡翠萍为何对他喊打喊杀的。杨科长就咧嘴一笑：“李警官消息蛮灵通的，这事儿都被你知道了。”

“我也只是从胡翠萍的口中听了点皮毛，能说的话你就说说呗。”我也笑道。

杨科长反问我：“胡翠萍家属没跟你说过？”我说没有。

杨科长想了想，说：“这事儿过去好几年了，也没啥不能说的。我就给你说说吧。”

徐厂长原名徐长江，以前是杨科长他们厂的副厂长，2011年因贪污受贿落马，落马前胡翠萍是他的情人。

这倒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胡翠萍和她口中的“犯罪集团头子”是这样一种关系。

“说起胡翠萍，当年也是个很会来事儿的女人，年纪不大，心思却不少，只是没用到正当处……”杨科长颇为感慨。

胡翠萍是1997年进厂，最初在仓库当保管员，只是个临时工。那时胡翠萍非常漂亮，厂里追求她的小伙子很多，但她都没看上。

1999年，胡翠萍嫁给了一名姓韩的车间主任。两人的结合很出乎众人意料，韩主任比胡翠萍大了十七八岁，当时已经快四十了，老婆几年前因车祸去世，是胡翠萍主动追求的他。

厂里当时议论纷纷，都说胡翠萍是看上了韩主任的“干部身份”，为了转正才嫁给他的。对此胡翠萍也不辩解，结婚没多久，胡翠萍的身份果然由临时工转为“家属工”，很快又在丈夫的运作下转成了正式工。

与胡翠萍同期进厂的临时工走的走、辞的辞，只有胡翠萍“修成了正果”，虽然也有人说风凉话，但两个单身男女，一个愿嫁一个愿娶，旁人也说不上什么。

但之后，很快就不太平了。

婚后大约三四年，胡翠萍突然从韩主任所在的车间调到了厂机关政工科，身份也一下由车间工人变为企业政工干部。当大家还在议论韩主任给她“走了谁的门路”时，两个人突然就离了婚。

当时一度有传言，说胡翠萍跟时任厂人事处处长张某混到了一起，至于俩人到底是谁先“勾引”的谁，厂里众说纷纭。很快，传言就被证实——厂里有人在人事处办公室撞见了二人正在亲密。

这个消息当时在厂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原因在于，那时张处长家庭圆满，妻子也在本厂工作，女儿正在厂子弟学校读初中。张处长的妻子很快发现了丈夫的奸情，怒气冲天地找到办公室，与胡翠萍大打出手。

“办公室被砸了个稀巴烂，胡翠萍也被按在地上打，那事儿回去问你师父老宋，当年就是他出的警。”杨科长对我说。

很快，张处长就被厂领导约谈了，但这似乎也并未影响他与胡翠萍之间的关系，2004年，张处长正式和妻子离了婚，不久便和胡翠萍走到了一起。

4

张处长和胡翠萍在一起没多久，韩主任就被气得住了院。

当年杨科长还在厂行政处工作，代表厂里去医院慰问过韩主任。韩主任在病房里痛骂胡翠萍是“婊子”，说自己费尽心思给她转了正，结果却被摆了一道，不但日子没过下去，家里的财产还被胡翠萍分去了不少。

韩主任后来就休了长期病假，听说是肝脏出了问题，去武汉治病了。回来之后也没再上班，不久就办了“病退”。

眼见着韩主任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厂里很多人都开始说胡翠萍是“狐狸精”“不要脸”。有些和韩主任关系好的，或是不怕事的，甚至在公共场合直接把这些话甩到胡翠萍脸上。但胡翠萍似乎也不生气，依旧我行我素，不吵也不闹。

“骂她归骂她，但当时，也有好多人佩服她，甚至眼红她……”杨科长说。

的确，几千人的国企，临时工“仰望”正式工，“车间”向往“办公室”，从临时工到机关干部，是多少人奋斗半生不可得的。胡翠萍靠着两段相隔没多久的婚姻，便达到了很多人一辈子的“终极目标”。

没有人知道胡翠萍心中是怎么想的，她在厂里几乎没有朋友，至少表面看来没人愿意跟她走得太近。

直到胡翠萍正式和张处长结了婚，厂里的传言才渐渐平息。

那几年，胡翠萍在机关政工科的工作也平平淡淡，既没传出过什么“彩头”，也没听说出过什么事故。大伙都知道她是张处长的老婆，

谁都不愿去触这个人事处一把手的“霉头”。当然，单位上有什么好事，同事们也都让着她。

直到2008年，胡翠萍又出事了。

“那时政工科科长内退，位置空了出来，本来都以为会从两名副科长里面选一个出来主持工作——所谓‘主持工作’，实际就是提拔前的试用，不出意外的话，‘主持’个小半年，上级任命就会下来……”

两名副科长都跃跃欲试，但最终结果出来，“主持工作”的竟然是胡翠萍。

“当时厂里人都骂啊，说张处长太过分了，竟然这么明目张胆地提拔自己老婆，还有人去告状，一直告到了市里。”

市里要求厂里做出解释，厂里说胡翠萍工作很优秀，而且只是“主持工作”，并非正式任用。没承想，胡翠萍的工作后来一直没变，过了一段时间，张处长的职务倒由实权部门人事处平调到了后勤物业处。

厂里人都拍手称快，以为张处长被调走，胡翠萍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可直到2011年，三年过去了，机关政工科依旧没有选出科长，还是胡翠萍在“主持工作”。

厂里的传言又出来了，说胡翠萍是因为和副厂长徐长江“关系不正常”，才得以继续在政工科“主持工作”。这事儿，自始至终都是徐长江一手办理的。

“那时候徐长江去省城开会，动不动就让胡翠萍同去，你说领导开会不带厂办（办公室）的人，却总去政工科找人，这肯定不正常吧……”杨科长说。

我也点点头。

5

张处长当然也感觉“不正常”，甚至在厂里刚公布胡翠萍“主持工作”后就着手调查过，为此还闹到了派出所。

“那时我已经调到了保卫处，有天夜里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去‘领人’，我以为是厂里抓了小偷，急忙往派出所赶。结果走到半路又接到派出所电话说不用来了，要‘领’的人已经走了，弄得我云里雾里……”

后来杨科长去派出所办事，才在相熟的民警口中得知，那天晚上，是张处长和徐厂长在吉水苑宾馆里动了手，两人都挂了彩，现场还有一个人，就是胡翠萍。

吉水苑宾馆原是厂招待所，后来才承包出去。厂里在宾馆留了几个豪华包间作为日常接待之用，徐长江是总公司调来的干部，在本地没有家室和固定住所，所以一直住在宾馆的豪华包间。

一般出现涉及吉水苑宾馆的警情，派出所基本会通知厂保卫处协助处理，那天张处长和徐长江在包间里打架，徐长江报了警。派出所看双方都是厂里的人，便通知了保卫处，结果张处长和徐长江闻此，纷纷表示“算了算了”，然后便各自离开了。

那起警情便是我先前查到的“涉警记录”，原来被张处长“捉奸”的人，就是徐厂长。杨科长说，这事被厂里压了下来，除了当事人和他，大概再没别人知道。

之后不久，张处长便由人事处调后勤物业处，杨科长感觉他应该是被整了。

“胡翠萍后来真成了‘厂长夫人’？”

杨科长笑笑：“怎么可能！真成了‘厂长夫人’她会得精神病？”

“捉奸”之后，张处长居住的宿舍区“处长楼”里，常半夜敲敲打打，十分吵闹。邻居告到保卫处，杨科长出面了解情况，才知道原来胡翠萍要跟张处长闹离婚。

“别做梦了，那个姓徐的就是玩你，根本看不上你！”张处长曾当着杨科长的面对胡翠萍怒吼。胡翠萍也不跟他吵，只淡淡地回：“我愿意，你管不着。”

可张处长就是不同意跟胡翠萍离婚，他咽不下当年为娶胡翠萍抛妻弃子的那口气。而且，韩主任的例子就在前面摆着，“我就是拖死你也不让你得逞”！

“其实张处长说得不错，徐长江真的只是和胡翠萍‘玩玩’。”徐长江当年就是走“夫人路线”上位的，他出身河南农村，家中穷困潦倒，兄弟姐妹四人只有他读过书。徐长江大学毕业后分到总公司当办事员，因为“脑袋聪明”“会办事”受到领导青睐，先是当了领导秘书，后来又从领导秘书变成了领导女婿。

老丈人是他的靠山，徐长江根本得罪不起。尽管后来他的确和胡翠萍一直在一起，胡翠萍甚至还为他怀过孩子，但直到徐长江落马，胡翠萍都没能当上“厂长夫人”。

虽然徐长江没像当年张处长那样，公然和胡翠萍出双入对，但自此之后，无论他去外地“出差”还是“疗养”，随行人员里永远不会少了胡翠萍的名字。

“厂里没人说什么吗？”我问杨科长。

杨科长说，当年徐长江在厂里“官威”很大，无人敢惹。虽然只是“常务副厂长”，但靠着自己丈人家的背景，根本不把厂长和书记放在眼里。

他和胡翠萍两人的事情厂里人尽皆知，但谁也不敢乱说。毕竟，连憋了一肚子火气的张处长也只能忍气吞声，做个“缩头乌龟”。

只是，大概因为市里过问过厂政工科提拔干部的事情，徐长江有所忌惮，才一直没有正式将胡翠萍安排到科长的位置上，但厂里都知道胡翠萍和徐长江的关系，她在政工科，就是一个“不挂名的科长”。

除此以外，每年的评优选模，也总少不了胡翠萍的名字，“指标房”之类的优惠，胡翠萍更是信手拈来。

“那几年她家也算是风光过了，逢年过节别人送给徐厂长的东西，转头就能在胡翠萍家看到，厂里有部顶配的奥迪A6，原是配给接待办用的，后来几乎成了胡翠萍的私家车，经常有人看到胡翠萍开着去逛超市……”

“那她为什么现在会恨徐长江，还要‘举报’他呢？”我接着问杨科长。杨科长哼了一声，说：“还能为啥？自恃聪明的人被更聪明的人给玩了呗！”

6

按照胡翠萍之前的“办事风格”，她搭上徐长江总是要获得点什么的。但事实上，从2008年胡翠萍与徐长江的关系曝光，至2012年徐长江落马，胡翠萍与徐长江做了四年“地下夫妻”，明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却啥“实惠”都没捞着。

“政工科科长这事儿就不提了，那几年厂里效益好，胡翠萍曾想把自己的哥哥姐姐都安排进来，她找到继任的人事处处长，处长以为是徐厂长的意思，费了好大的劲，还弄了一个么斯‘人才引进’，你说那不是笑话吗？事情马上就要办好了，徐长江一句‘影响不好’就给否了。”

“2009年，厂里有几项外包业务和原来的承包商合同到期，胡翠萍眼红利润，想让自己家人办个公司承包下来，又被徐长江否了，说要公开招投标，结果直到徐长江落马牵扯出来，大家才知道当时‘招标’来的承包商是徐长江的妻弟……”

“既然这样，胡翠萍干吗还当徐长江的‘地下情人’？她图什么啊？”

杨科长又笑笑：“这徐长江鸡贼得很哪！”

一方面，他在厂里凡事都给胡翠萍撑腰，厂里上上下下没人敢惹他这位“小媳妇”。曾经有位不怕事的中层干部，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批评过胡翠萍，结果没过几天就被徐长江找茬儿“处分”了。

另一方面，徐长江还放了300多万在胡翠萍那儿，说这些钱都是“保证金”——如果以后不能和胡翠萍结婚，钱都是她的。

然而，2012年徐长江案发，那300万查实，全是贿款。检察院先是委托厂里找胡翠萍要钱，胡翠萍还不知情，硬说钱是自己的。

“她一个月工资5000多块，上哪儿弄300多万的来源证明？徐长江开始也不承认那笔钱，后来又说是胡翠萍私自替他收的，想把锅甩给她。”

检察院当然不信，亲自找胡翠萍，出示了那笔钱的真实来源，还告诉她不交出来，就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徐长江并处。银行卡的确在胡翠萍手里，检察院带胡翠萍去银行查，她才发现那笔钱自己根本动不了。

那张卡的户主名叫“高虎”，是徐长江从网上买来的“黑卡”，胡翠萍虽然有卡密，但徐长江设置了取款短信验证，验证码也在自己手机上。换言之，未经徐长江同意，胡翠萍一分钱也取不出来。

一向镇定的胡翠萍，那次是真被气得进了医院。

7

徐长江在胡翠萍身上花了多少钱，杨科长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后来厂里人推测，很可能一分钱都没有花。因为徐长江和胡翠萍做“地下夫妻”的那几年，所有“便利”和“优惠”都是徐长江挪用厂里资源给她的。

而且案发后，胡翠萍的父亲老胡还主动拿了十几万出来，说是“弥补厂里的损失”，其意只在于帮女儿摆脱或减轻罪行，毕竟全厂都知道，那四年胡翠萍和徐长江是“地下夫妻”，难免被检察院查到头上。

好在后来，胡翠萍也对徐长江等人进行了举报，提供了一些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线索，这才得以幸免。

“说起来她也称得上‘可怜’，白跟了徐长江四年，末了啥啥没捞着不说，还把自己给毁了。”杨科长又感叹道。

“后来呢？”

“后来，听说她又回去找那个张处长，张处长自然不待见她，也要跟她离婚。要不是胡翠萍疯了，这婚估计也就离成了。”

“她是怎么疯的？”

“徐长江被双规后，法院虽然没判胡翠萍，但厂里还是要处理她，上级曾经派人找她谈话，意思是让她自己辞职算了，但她不肯。”

于是，厂里便把她从政工科“主持工作”一撸到底，又重新成了个仓库保管员。没了保护伞，以前看她不顺眼或和她有“梁子”的人纷纷上门找茬。张处长的前妻，那个曾经把胡翠萍按在地上打、后来又被胡翠萍取而代之的胖女人，多次到仓库里“收拾”胡翠萍，一次杨科长带保卫处干事去拉架，还挨了胖女人几巴掌。

“怎么说呢，以前胡翠萍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从韩主任到张处长，多少人明里暗里骂她，她都不当回事。但徐长江这事儿估计对她刺激太大，大概是‘信仰’垮了，感觉以后再没希望了吧……”杨科长说。

胡翠萍重新回到了起点，不久之后精神就有些不正常了，先是没事自言自语，后来还有几次，非要跑到政工科说要“主持工作”，再后来就在厂里喊打喊杀。厂里没办法，只好给她放了长期病假。

再往后，就是我们见到的样子了。

杨科长的讲述令我唏嘘不已，但我始终还抱有一丝怀疑：胡翠萍会不会是因举报徐长江团伙遭到报复，从而导致精神失常的?

2014年年中，我在一次家访时试探过老胡，他给我讲述的胡翠萍之前的经历，基本和杨科长所说的差不多，只是因为立场不同，对一些事情的解读不同罢了。

老胡否认了有人对女儿实施过报复，只是愤然怒斥徐长江是个“浑蛋”。

老胡说，女儿当年真的是抱着嫁给徐长江的心思。徐长江也曾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爱的是胡翠萍，只是眼前还得靠丈人的关系调回总公司升职。

徐长江承诺，只要自己“调回总公司”，一定会跟妻子离婚，然后把胡翠萍带走。“她就是信了他的话，才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老胡一直说女儿是被“骗了”，从姓韩的、姓张的到姓徐的，一个个都是看女儿年轻漂亮又没有“背景”，欺骗女儿的感情。

我实在没忍住，说了句：“无论姓韩的还是姓张的，都曾正儿八经做过你的女婿……”

话虽没点破，但双方都明白什么意思，老胡看了看我，有些恼火地说：“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做什么！”

之后他便拒绝再跟我谈起这件事。

2014年年初，我第一次见到胡翠萍。

那天我值班，一名女子来派出所报案，上来就把一支录音笔拍在我面前，说报案过程她要录音。

我诧异地看着她，然后指了指头顶上的监控器，说报案大厅里有同步录音录像设备，之后需要的话可以来调，不用自带录音笔。

女子轻蔑地瞥了我一眼说："谁知道你跟谁是一伙的！"我被她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好有同事路过看到她，急忙招呼我过去。

走到一旁，同事才悄悄说这个女人叫胡翠萍，是一名精神病人，以前一犯病就来派出所"报案"。今天估计又犯病了，他现在就去联系胡翠萍的家属来派出所接人，让我想办法稳住她。

回到报案大厅，我问她报什么案。

只见胡翠萍小心翼翼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东西说："这就是证据。我要举报前单位徐厂长贪污受贿。"

打开包裹，里面只有一沓旧报纸和几份超市的宣传单页——看来她的精神的确不太正常。我在警综平台里输入胡翠萍的名字，照片确实是她，页面上也显示她是在册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瞥了一眼远处的同事，他正在打电话，还不住地给我递眼色，示意我赶快继续。我给胡翠萍倒了杯水，让她说说"举报"的事。胡翠萍接过纸杯说了声谢谢，才开始继续。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胡翠萍一直语无伦次，"徐厂长""张处长""贪污受贿""玩弄妇女"，几个词反反复复，说到激动处，还会喊打喊杀。

为了拖住她，我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接着话，拿着笔假装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二十分钟后，一群人走进派出所。两个男人一言不发，抱住胡翠萍就要往报案大厅外面拖，我急忙喝止，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人群中的一位老者掏出身份证，说自己是胡翠萍的父亲，拖她的分别是她的哥哥和姐夫。我问老胡要把女儿带去哪儿，老胡叹了口气："还能去哪里，先回家，控制不住就去精神病医院。"

胡翠萍拼命挣扎、大声喊叫，最终还是被拖出了派出所，塞进了一辆小汽车，一行人绝尘而去。

儿子不能走我的老路

1

2013年7月的一个下午，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一位自称叫王磊的年轻人称，自己正在被两车人追杀。民警出警后找了半天，并没发现“追杀”他的两车人，反倒觉得王磊的精神状态有些不正常。

经验丰富的同事立即将王磊带回派出所尿检，果然，甲基安非他命试板呈阳性反应。经审讯，王磊承认自己中午刚刚吸食了麻果。

按程序规定，王磊被判拘留十天。在移送拘留所之前，同事拿着《治安处罚家属告知单》问王磊，要不要通知家属，王磊说不要。

从警综平台的人口信息记录来看，王磊不过二十出头，按照法律规定已属成年人，本不需强制通知亲属。但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我觉得他年纪轻轻、又是第一次被抓，也许还有得救，决定还是通知一下他父母。

按照王磊手机通讯录里“爸爸”的号码打过去，没多久，王磊的父亲就火急火燎地赶到了派出所。一见此人，民警们都大跌眼镜——他是我们的“老熟人”，也是一名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王占林。

这个王占林，单是我一个人就抓过他不下五回，他还曾被送去强制戒毒一次，在场的老民警里有好几位都是从年轻时就开始跟他打交道了。

一见是王占林，一位民警略带轻蔑地说：“你这啊，就是‘白粉爸爸麻果儿’，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儿啊！”

王占林并没有生气，只装作没听到那位民警的话，一个劲儿问我王磊目前是什么情况。

毕竟这次是以嫌疑人亲属的身份把他叫来派出所的，我耐着性子把王磊涉毒的事情大致讲给了他。听完我的讲述，王占林提出要见一下儿子。我把他带进讯问室，王磊抬头一看父亲来了，就冲我大声嚷嚷：“不是说了不通知家属吗！”

王占林冲上去就给了儿子狠狠一记耳光，还要再扇第二下时，我急忙把他拉住，告诉他讯问室不是父亲教育儿子的地方。

王占林看起来气得不轻，浑身抖着，用手指着王磊的鼻子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老子辛辛苦苦把你养大送你上学，你他娘的别的不学，学吸麻果！”

之后，王占林又说了好多教训的话，听着倒有些耳熟，仔细一想，竟是以前他被抓时，我们派出所民警教育他的话。

王磊则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嘴里喃喃地说着：“你个‘老毒么子’还好意思说我？”听闻此言，王占林虽被我强拽着，还是奋力挣扎着想上前继续收拾儿子，我急忙把他带出了讯问室。

我请同事尽快让王占林在家属告知单上签字，然后抓紧时间把王磊送去了拘留所。

等我们在拘留所办完王磊入监的手续准备离开时，竟又在拘留所门口遇到了王占林。我们本以为他是追儿子追到了拘留所，但仔细一打量，却发现他手上竟也戴着手铐。

我正在诧异，送王占林来的同事告诉我，处理完王磊的事情后，他们顺便对王占林也做了一次例行尿检，结果他的检测结果也呈阳性。一审才知，王占林几天前也吸了毒。

我看了王占林一眼，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的脸上也有些尴尬，没主动开口，随即便被同行民警带进了拘留所。

在返回派出所的路上，同事有些戏谑地说：“不知这对父子在拘留所里见面，会是个什么场景。”

2

王占林，时年51岁，两劳释放人员，无业。

他算得上是本地较早一批染上毒品的人员。1989年，27岁的王占林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判入狱七年，1996年刑满出狱后不久，就在前狱友的怂恿下染上了毒瘾，先是注射海洛因，后来吸食冰毒、麻果、K粉，其间还涉嫌一些盗窃、诈骗案件，他在公安机关的违法档案，摞起来比我都高。

不久之前，我还从辖区一家网吧厕所里把“溜完冰”的王占林拎回过派出所一次，可他竟然在讯问室里跟我熬了整整20个小时都不去做尿检，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把他拖到医院强行抽了血才算完事。

“他家也算‘后继有人’了，真没想到，那玩意儿竟然还遗传！”同事也无可奈何地说。

一周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接通后对方开口就说，自己是王占林，有点事情想和我见面聊聊。

我有些吃惊——王占林属于那种“不太老实”的吸毒人员，这些年，他受公安机关打击的次数太多，对抗警察的经验很是丰富，每次他的案子都会搞得民警们心力交瘁。在片区里的吸毒人员中，王占林是出了名的难抓，经常几个月不见踪影。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主动找王占林，抓他时，没有一次不和我们玩猫鼠游戏的，没想到这次他竟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要见面，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说：“你直接来派出所找我就行。”

王占林不同意，说一来派出所肯定就“走不了”了，他强调，这次他确实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而且“不能再被拘留了”。

我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很意外，考虑了一番，同意我去跟王占林见面，但为了安全起见，还安排了另外两名同事着便装在外围照应，情况不对马上增援。

又一次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王占林约我见面的地方，竟然是辖区内的一家大排档，而且，他竟要请我吃饭。

见了面，王占林一脸抱歉地说，自己没什么钱，没法请我吃别的，请我千万不要嫌弃。

他这么一搞，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说："你有事说事，坐会儿可以，请吃饭就免了。"

王占林点了一桌子菜，还让店家拿了两瓶"歪脖郎"酒，大排档的酒菜虽然便宜，但这一桌子怎么也得两百多块，我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只抽了两支烟，喝了半杯酒，几乎没动筷子。

在我的不断追问下，王占林扭扭捏捏，终于说出了此次请我吃饭的目的："警官，你别误会，我就是想请你帮一下王磊，他不是个坏孩子，现在还有得救。"

没想到，一个多年和警察"斗智斗勇"的"老毒么子"，竟是为了这件事找我。我不知道他想让我如何"帮"他儿子，眼下王磊十天的拘留期未满，难道让我去拘留所把王磊提前放了？

王占林说当然不是，他是想让我给王磊办"强戒"。

按照程序，王磊是初犯，刑满后应该实行社区戒毒，再次吸毒被抓才会被送去"强戒"，此前被送去很多次"强戒"的王占林，不会不知道这个程序。我问他为什么要送儿子去，他说，社区戒毒没效果，"一定要让儿子'强戒'"。

吸毒的父亲请警察吃饭，要求送吸毒的儿子去“强戒”，我不仅是头一次遇到，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既然是这种事情，我也没必要再考虑什么安全问题，于是就把外围照应的两个同事也叫进了大排档，大家一同坐下来，商量看有没有可行性。

第二天，我们按照王占林的要求，向上级提出了对王磊进行“强戒”的申请，但并没有得到批准，王磊最终还是被判定为执行社区戒毒。

王占林知道结果后十分生气，说这样会害了王磊的。可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告诉王占林，真要关心儿子的话，自己先把毒戒了吧，然后对儿子盯得紧一点。

3

此后，王占林确实开始格外注意儿子的行踪了，好多次给我打电话，说王磊又跟哪些疑似涉毒的人员一同出去了，我出警核实过几次，也抓回来好几个人，好在并没发现王磊有再次吸毒的嫌疑。

但对于自己戒毒，王占林只说确实试过很多次，“真戒不掉”。

“再戒不掉，到最后就是个死啊！”我叹了口气。

“说句不该说的，警官，那东西我搞了十几年，能戒早戒了。到如今，我戒不掉，也不想戒了，你看，我现在甲肝乙肝丙肝‘三位一体’，还有梅毒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说不定哪天就死了，还戒它干吗？”王占林也叹了口气。

“都是吸毒之后得的？”我接着问。

王占林苦笑着点点头：“那还有假？当年玩海洛因，七八个人共用一个针管，染不上病才怪！”

“你从本心里试过戒掉吗？”我问。“一日吸毒终生戒毒”这句口号不是说着玩儿的，自己本心不想戒，外界力量再强也没有用。

王占林说，他在没得那么多病之前，曾有好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戒毒。当时他父亲还活着，王占林就让父亲把他绑在家中卧室的暖气管道上，无论之后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把他放开。那次，王占林被父亲绑了九天十夜，其间毒瘾发作了很多次，都被他扛过去了。后来当父亲开门把他放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虚脱了，站都站不起来。

“后来还是失败了？”

“是的，当时戒了两个月，以为自己真的戒了，有次朋友聚会，喝了不少酒，一个以前的毒友说，‘没有瘾才是真戒了’，又让我吸了一

次，我跟他打赌自己肯定没有瘾了，就仗着酒劲吸了一口，就那一口，唉……”

后来，那个引诱他复吸的毒友死于海洛因注射过量，王占林说，等他们去到那人的家里时，看见他的尸体像麻花一样扭曲在出租屋的地板上，身上沾满了排泄物，恶心得王占林几天没吃下饭去。

但毒品，他终究还是没能戒掉。“我就后悔，当年我第一次搞毒被抓，公安局就要送我去‘强戒’，我吞了鞋钉没去成，如果那次我去了，很可能那时就真的戒了！现在，唉……”

王占林的话没说完，我知道，他想说，现在即便他想去“强戒”，戒毒所也不要他了——他一身的病，戒毒所也担心他哪天毒瘾犯了横死在里面，所以后来一直拒收，让他先去治病。

聊到最后，王占林依旧对没能送儿子去“强戒”的事耿耿于怀。我劝他别想太多，平时看好儿子，不去“强戒”也一样能戒掉。

王占林苦笑一声：“难啊！”

4

谁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13年年底，王磊再次因吸毒被抓。

那天警方突查辖区一家KTV时，把在包厢里抱着自制吸壶吸食麻果的王磊抓了个正着。和他一同被抓的，还有之前被王占林举报过的几个毒友。

王磊虽对自己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可对于毒品的来源却缄口不言。我们对此都感到可恨又可悲——“道友”圈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供出毒源，以后所有毒贩都不会再卖给他毒品。换句话说，一个吸毒的人若死活不供出毒源，也就意味着他根本没想真正戒毒。

得到消息的王占林暴跳如雷，他说他一直没放松对儿子的监控，可没想到王磊还是又吸上了。我说这次王磊够得上去“强戒”了，到时你作为家属签个字吧。

王占林漠然地点点头，脸色很难看。

王磊因吸毒被公安机关处理之后，王占林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王磊不是个坏孩子，现在只不过“年轻走了些弯路”，“现在救的话，是能救过来的”。

“你别看我是这个样子，但磊子随他妈，和我不一样……”王占林告诉我，王磊的母亲是大学生，有文化，王磊从小学习成绩就好，中学时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数比赛。“服刑之后，老婆就和我离了婚，磊子最初是判给他妈的，等我出狱的时候，他妈已经改嫁了，继父不待见他，我就把他接到身边来了……”

王磊初中读的还是重点学校，那时王占林也不像现在这么潦倒，在儿子身上也舍得花钱。王占林从没在生活上亏待过王磊，别人家孩子有

的东西，他都会尽量满足儿子。

“这几年，我毒瘾越来越大，身体也逐渐不行了，才忽略了管教……”王占林叹气。

王磊读了一年大学就退学不读了，因为长得一表人才，他很快就在本地一家娱乐场所找到了工作，可能是耳濡目染了别人的吸毒行为，所以跟着学会了。

“我是你们口中的‘老毒么子’，我自己是没救了，但我也知道，刚开始吸毒还能戒，越往后越难，你们警察有办法，所以求你帮他一下……”王占林的话题又绕了回来。

我暗自叹息：是啊，我们有办法，但我们当年在你身上用尽了办法，不也没能让你戒毒吗?

最终，这次王磊因吸食毒品严重成瘾，被判“强戒”两年。

2015年5月，王磊因戒毒成功，且在监所内表现良好，提前结束“强戒”回了家。

我抽空专门去见了王磊一面，告诫他：既然戒了，就不要再沾了，赶紧找个工作，过正常人的日子。

王磊不住地点头，说自己找了份送快递的工作，每天都有事做，绝对不再碰毒品了。

“以前的那些狐朋狗友也别再联系了，不然他们还会拉你下水。”

王磊继续点头道：“不联系不联系，电话号码都删了。”

此后，我的确常在路边看到骑着电动车驮着快递包裹的王磊，虽然工作辛苦，但他还是比吸毒被抓时胖了不少，皮肤也晒得黑黢黢的，看起来很健康。

王占林依旧在吸毒，我像以前一样，不断从日租房、网吧厕所、公共卫生间甚至垃圾站的犄角旮旯里把他揪出来送去拘留。但对于让他戒毒的事，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不抱希望了。我和王占林之间也没再谈过关于戒毒的问题。他吸毒我抓人，是死是活，是他自己的事情。

至少在2015年10月之前，一直是这个样子。

5

2015年10月，王磊第三次因吸毒被抓。当初我一语成谶，他真的又被以前的毒友拉下了水。

“不是说了不再联系吗？怎么又和他们裹到一起了？”我语气平淡。按照此前多少人的经验，两次被抓、一次“强戒”依旧戒不了毒的，这人的结局基本也就定型了。

“咱这儿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朋友，人家找上门来，我也不好一概不见，结果聊着聊着，就又裹在一起了……”王磊低着头说。

我懒得再跟他说什么，只是按照程序要求，一步一步处理他的事情。

“我们以为他戒了，也没想着找他吸毒，就是一块玩的时候自己瘾上来了想搞一口，磊子说自己也试一下看是不是真没瘾了，结果……”王磊的毒友这样说。

这几乎就是王占林给我讲述的他当年戒毒失败故事的翻版，我不予置评，把原话转述给了王占林听。

“都他妈的放屁！”王占林说，他吸了十几年毒，见过的“道友”比见过的正常人还多，“磊子是他们这群人中唯一有工作、有收入的人，把磊子拉下水，这帮人才能搞到毒资！”

“那帮人为了能搞点钱‘买货’，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当初就是被那帮朋友害的，没想到一代传一代，现在又来害我儿子！”王占林几乎气得跳脚。

“警官，再帮他一次吧，求你了！”

我反问他：“怎么帮？‘强戒’也送过了，没有用啊。”

王占林沉默了。半晌，他抬起头，问我，卖给王磊毒品的人抓住没有？

我说，你儿子这帮人谁都不说，原因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想必也清楚。

王占林再度沉默，我把他撂在原地，转身继续去处理他儿子一干人等的事情了。

两天后的一个夜里，王占林又给我打电话，还是那句话，请我再帮王磊一次。我有些不耐烦，问他怎么帮？他好像下了很大决心，沉默了片刻对我说："卖毒品的人，我来查。"

听他这么说，我几乎从备勤室的床上弹了起来——王占林是本地"道友"圈里的"鼻祖"，他认识的毒贩可不止十个八个，如果他肯转头给警方做事，本地的毒圈几乎可以被连根拔起。以前我们不是没动过这方面的心思，但王占林从不配合，不是闭口不言，就是乱指一气，我们用尽了办法也不成功，只好再寻他人。

"但我有个要求，警官。"

"只要不违反法律，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要钱？要政策？我尽一切努力去帮你争取。"

"钱？政策？这些对我来说还有什么用？我什么都不要，完事之后，让王磊离开本地，再帮他找份工作。"

这个要求不过分，我答应了他。

6

2015年10月17日的凌晨，我和同事在办公室里等来了王占林。三个小时里，他向我们完整提供了他所知道的整个地区数条毒品供应线，从源头到“零售商”一应俱全，一些吸贩毒人员隐秘藏身之处，也被他悉数曝出。

我们立即上报市局经侦禁毒支队，支队在研判和试探之后，确定其中绝大多数情报真实可靠，随即召集警力成立专班进行处置，同时联系周边县市兄弟单位配合。专班七个小组分头行动，至10月25日凌晨时分，除需要继续经营的线索外，其他线索全部落地，大量涉毒人员被抓获归案。

王占林在案件的侦办过程中也立下了大功，他不但提供了线索，还打电话找那些他曾打过交道的吸贩毒人员打探消息，有时甚至直接带我们前往现场抓捕。

开始时我很高兴，以为他为警方做事尽心尽力，合作的态度极好，但越往后越觉得不对劲：一些明显需要他回避甚至隐瞒身份的时候，他都坚持要露面，民警出于保护举报人安全的考虑，要求他不要暴露身份，他却只是笑着说：“你们以前不是一直问我谁在搞毒吗，怎么现在又让我低调？”

有其他“特情”找到我问：“王占林疯了吗？”

我问怎么了，他们说，王占林不但对外宣称是他举报了那些涉毒人员，还大肆宣扬自己是王磊的父亲，以后谁让王磊沾毒，他就跟谁玩命。“以后别说卖给王磊毒品，那帮‘道友’从监狱出来，不报复他父子俩才怪！”

我越想越不对，拉着王占林劝他：“你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毒品案件警方有系统的规划，你这样在外大张旗鼓宣扬自己给警察当‘特

情’，不是平白无故给自己惹麻烦吗？”

“惹麻烦？只要他们不拉着王磊吸毒，我就没麻烦！”王占林面色坚决，“我去打听了，没人承认卖给王磊毒品，但那帮人的嘴里怎么会有实话？既然没人承认，那就大家一起吧！”

我隐约明白了王占林不避嫌、不隐瞒的目的，也许他就是想通过这种不要命的方式，彻底割裂王磊与本地的“道友”们的关系。

由于已经有过一次“强戒”记录，再度复吸的王磊第二次被送去“强戒”，时间仍然是两年。

王磊被送走之后，王占林也不见了踪影。我打电话找他，他说“事搞大了”，要去外地避一下。我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但像他这种“老毒么子”，根本离不开本地的毒友圈，跑去外地了没地方买毒品，比杀了他还难受。

我劝他尽量不要离开我的辖区，那样我还有办法为他提供必要的保护，但王占林拒绝了。只是提醒我说，别忘了当初他同意帮我办毒品案件的时候，我答应过他的事情。

我说忘不了，王磊这次“强戒”一出来，我马上兑现承诺。

7

可我没想到，在2016年3月，王占林死了。

带班出警的副所长把王占林尸体的照片发给我时，我吃了一惊：他蜷缩在318国道边的一个废弃房屋里，身边只有一块肮脏的草席，衣服上沾满了排泄物，面部表情扭曲痛苦。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报复杀人，但副所长告诉我，法医鉴定报告已经出来，王占林死于注射毒品过量。

“给他提供毒品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是个外地的，他说王占林买了不少，说自己得罪了本地毒贩，平时买不到货，估计王占林长期没毒吸，好不容易拿到货，一次性全用了……”副所长告诉我。

“唉，他最终没能逃过死于毒品的命运……”我叹了口气。

“他就是不死于注射毒品过量，也没多久活头了，尸检的时候法医在他肝脏上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肿瘤，像他这种甲乙丙肝‘三位一体’的人，肝癌是难免的……”副所长说。

王占林的葬礼悄无声息。当时王磊还在接受“强戒”，不可能出来筹办；他的前妻早已改嫁他人，更不可能出面；他在本地虽有几个亲戚，但早就已经不再走动。我想着自己还欠他一个承诺，于是帮他料理了后事。

2017年年底，王磊第二次结束“强戒”回家后，我把王占林的骨灰交给了他，并把王占林之前的所作所为全都讲给了王磊听。

王磊听完很久没有说话，我问他之后如何打算，他说有朋友联系他，说本地有个工作机会，他想试试。

我一听他说“朋友”二字就头疼。我说：“你爸死之前，让你从戒毒所出来马上离开本地，和你的那些‘朋友’彻底决裂，你听不听？”

“不走行不行？”王磊问我。

“你看着办吧，你爸之前已经把周围所有涉毒人员得罪了个遍，你要不怕人身报复，或者还想复吸，你就留在这儿。”

王磊想了想，说：“那就走吧。”

“是男人说话算话，走了就走了，这辈子不要再回来，如果以后再让我在本地见到你，别怪到时我下手黑。”

王磊点点头，说：“行，永远不再碰毒品，永远不再回来。”

听他这么说，我拿起电话，打给在外省开酒店的亲戚，请他帮忙给王磊提供了一份工作。

尾声

送王磊上火车之前，他问我为什么信他父亲，他说王占林这一生大半辈子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不蹲监狱的时候，就四处盗窃吸毒，是个“彻头彻尾的渣子”。

他还说，自己之前染上毒品，很大程度上就是跟王占林有关，如果不是他这个当爹的“上梁不正”，他也不会“下梁歪”。

我说，你别这样说你父亲，没错，王占林是个“渣子”，但他也是好父亲，至少在我眼中是。

十七年了，

到底是谁在害我

1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连老师都敢打，同学自然不在话下。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至于“不怕事”，刘德更是名副其实，刚转学来，他就因在校内打架被处理了，据说当时政教处副主任在办公室打了他一拳，他便立刻对副主任叫嚣，说要“办了”副主任。三天后，当升旗仪式结束时，一向严厉的政教处副主任竟当着全校学生的面宣读了自己的“检查”，自我批评“教育方式不当，体罚学生”，当众向刘德认错——那天之后，政教处副主任就辞职了。

师生们开始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虽然学校后来出面辟谣，称政教处副主任辞职纯属个人原因，但从此之后，即便刘德依旧在学校耀武扬威，也很少再传出他受到处分的消息了。

那时，谢江经常在放学后看到刘德和一群“兄弟”在学校门口的小卖店“聚会”，有时也会听说某位同学因为得罪了刘德在放学后被“收拾”了——所谓“得罪”，可能仅仅是与刘德相遇时的一个“不够尊重”的眼神，或是传到刘德一伙耳中的莫须有的一句“坏话”。

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因为家离学校很远，他每天中午都会在校外小吃街买饭，有时会与在此“聚会”的刘德一伙人相遇。谢江说，他一直很小心，生怕自己哪个动作或眼神被刘德一伙误会，给自己带来一场无妄之灾。

可惜，谢江还是惹到了刘德。

2

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这本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当时谢江正琢磨着自己中午要买些什么吃，并没有在意校领导之后的动作。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

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说跟刘德说这话的同学，是刘德的一个“铁杆”，刘德一伙在被校领导和警察堵住前，就是在车上等这家伙，他和校领导同行时，这个同学就走在自己后面。这家伙信誓旦旦地告诉刘德，自己亲耳听到谢江跟校领导的对话中有“刘德”“打架”等词汇。

那天中午午休时来谢江班里四处张望的陌生学生，全是刘德派来核实谢江身份的，他们不但知道了谢江的姓名、班级，连他父母的情况、家庭住址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传说连刘德表哥也一度放话出来，要让谢江“读不下去”，因为他害自己的“兄弟”被警察抓了。

3

“你向学校和家长求助过吗？”我问谢江。

“求助过……”谢江虽然承认了，但脸上却满是愤怒。

他想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自己并没有举报他。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儿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这让谢江十分愤怒，但在班主任和校领导面前又有口难辩。

后来，谢江质问同桌，为什么在校领导和班主任面前撒谎？同桌不满地对谢江说：“你是因为‘举报’得罪了‘扛把子’，现在又让我去校领导那里‘举报’他，这不明摆着要拉我下水吗？”

转头来，同桌生怕自己被谢江拉去校领导办公室的事被刘德一伙“误会”，又跑去跟刘德一伙报告说，谢江又一次在校领导办公室“举报”了他们。

那天下午，因为没有从谢江同桌嘴里得到刘德计划报复谢江的“证词”，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之后，谢江便被校领导打发出了办公室。

“你班主任呢？她也不信你？”我接着问谢江。

谢江说，班主任倒是没说不信，但也只是跟他说：“既然校领导都这么说了，你就放心上课吧。学校会保护你的，如果还是担心被打，可以通知自己父母放学之后过来接一下。”

谢江也想让父母来接自己放学，但不知该怎么开口——母亲每天晚上9点钟下班，工作地点离中学很远；同母异父的弟弟是下午5点钟放学，开夜班出租车的继父一般都是将出租车交接班的地点定在弟弟学校附近，这样每天接班后的第一趟“活儿”就是接弟弟回家。

继父虽然也曾跟谢江说放学后可以给他打电话来接，但谢江晚上放学的时间是8点半，正是出租车“活儿好”的时候。他以前也给继父打过电话来接自己，继父人虽然来了，但脸色明显不好看。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电话接通之后，谢江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

的“大活儿”，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儿”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4

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承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谢江吓了一跳——这几个人都是平时和刘德关系密切的学生，他经常见他们聚在一起。谢江转头就往学校跑去，但被他们拦住了。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谢江说，被拉进小胡同的那一刻，他就感觉自己“完了”。

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

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你当时伤得重吗？”我问谢江。

“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发现门牙断了一颗，槽牙断了一颗，鼻子破了，右耳耳膜穿孔，身上被打得多处瘀血……”

我心中算着伤情，想一群平均年龄十六七岁的孩子，对自己的同学下手竟然如此狠毒：“警察当时怎么处理的？”

“当时事情闹得蛮大……”谢江说，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三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班主任见到谢江的母亲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匆匆打了个招呼，便跟随警察进了办公室。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在谢江的记忆中，那晚过得漫长又混乱。派出所值班大厅里不断有人来往走动，其中不乏在小胡同里殴打他的学生及其家长：有人走到他跟前来表示歉意，问他“还疼不疼”；有人只是瞥他一眼，一句话也不说；还有人就像没看到他一样，径直从他身边走过。

但那晚谢江很安心，他觉得派出所出面了，校领导来了，那些打他的人也都被抓进了派出所，自己之后就可以继续安心读书了。渐渐地，困意袭来，他便躺在值班大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谢江坐在那里看《调解协议书》，上面写着："刘德等八人向谢江赔礼道歉并赔偿谢江医药费、营养费共计2.5万元，并保证今后不再骚扰谢江，双方今后也不再因此事发生纠纷……"落款处，密密麻麻的，全是殴打他的学生以及他们家长的签名和手印。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就这么结束了？"我问谢江。

谢江无奈地"嗯"了一声。他说，当时16岁的他并不能完全明白那份《调解协议书》意味着什么，但他依旧觉得，自己挨打这件事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5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除了刘德表哥，其余所有参与殴打谢江的人都是中学生，必须通知校方——正是因为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涉事学生家长也不想警方按程序处理自己的孩子，派出所也不想和学校闹得太僵——毕竟相邻不远，彼此之间平时也少不了各种交流合作。于是，学校领导又给谢江母亲做工作，先是“承诺”一定严肃处理涉案学生，又“善意”地劝说道：“谢江还在学校读书，明年就要高考了，这事儿闹大了对双方都不好……”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刘德的那个表哥呢？他不是在校学生，也不属于未成年人，他扇你那几鞋跟怎么算的？”我追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好像也没处理，刘德的家人找了关系，那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德一伙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处理？”谢江冷笑了一声。

很快地，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从字面上看，“留校察看”的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处分，距离“开除学籍”仅一步之遥。但对刘德来说，这又是一个极轻的处分——此前，他因为打架斗殴早就背着两个“留校察看”，却始终也没能变为“开除学籍”，这反而成了他恐吓同学的资本。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6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谢江说，母亲把校领导告到教育局后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

一次广播操结束后，校领导专门到讲话台上，愤怒地告诉同学们，这次全市的教学评估中，学校没能拿到好成绩，就是因为“有些同学自私自利，自己在学校处理不好同学关系，还唆使家长去教育局诬告学校，给学校荣誉抹黑”。

对此，校领导要求，各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召开家长会，“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所有学生家长必须参加”。

谢江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母亲去教育局告状的事情，纷纷向谢江侧目。很快，谢江在班里就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谢江告诉我，那天他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学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就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由于怕引起误会，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继父还对谢江

说：“同学之间在学校发生矛盾很正常，谁上学的时候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只要对方不再招惹你，这事就这样吧，不要搞得一家人都不安生。”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谢江只得答应了继父。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放学专门派人陪他回家，但都没有遇到“传

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一次，当谢江又去政教处举报自己受到刘德威胁时，政教处的老师黑着脸对他说：“谢江你有完没完了？不想读就算了！不就是和同学发生点摩擦吗？这都多长时间了你还没完没了，之前你妈去教育局，告没了学校的优秀奖，现在你还要把学校翻过来吗？！”

谢江被骂呆在那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谢江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你尝试过不理会那些威胁吗？你没觉得那是刘德一伙给你做的‘局’吗？”我问谢江。

谢江点头，说想过。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经过努力，他的成绩有所上升，虽然距离之前的最好成绩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他相信自己就这样努力下去，最终还是能够考上理想大学的。

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7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刘德当时不在本市——他家里已经给他安排好出国留学的事宜，案发前半个月，人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警方派人去了省城，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刘德父亲对民警上门更是十分不满，要求他们“做事要讲证据”，不要“听风就是雨”。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

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的”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等到2006年，谢江精神状态逐渐稳定，家里又给他找了几份工作，还是都做不长；2008年，谢江因精神问题屡次相亲失败，备受打击；2009年，刘德婚礼，回本市宴请亲友，谢江从以前同学口中得知了消息后，这才开始重新关注起刘德的动向。

这一年，谢江家人也打算从湖南给谢江买个媳妇，因此再次状告学校索要赔偿，但学校的回复仍与此前相同。咨询律师后，谢江家人得

知，即便胜诉，所得赔偿款项也不会太高，因而又撤了诉。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8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虽然刘德是此案的受害者，但我对他的印象实在不太好，采集笔录时也难免带着些情绪。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我又问他和谢江关系如何，他笑笑，说："谢江之前应该都给你们说过了吧？"

我说："他说归他说，你说归你说。你如果愿意的话，咱就都按他说的为准，你就啥也甭说了。"

同事给我使眼色，示意我这是受害人，让我注意态度。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心中冷笑，想刘德这家伙着实可气，明显知道谢江恨他的原因，却在警察面前故作姿态。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二十年。"

"这事换谁谁也忘不了，十六七岁的年纪，心怀梦想，成绩优异，最后却因为你们干的好事落得现在这个下场，你倒是自在，当年的'面

子’也有了，‘仇人’也被你整疯了，最后拍拍屁股到国外读书了，回来还当上了‘储备干部’，有妻有子、生活幸福，可是……”

同事在病床下面踹了我一脚，我强忍着闭上了嘴。

没想到刘德却没有生气，语气反而十分平和地说：“当年我是过分了，那时确实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那个年纪，很多事情说懂也懂，说不懂也不懂，只想着谢江举报了自己，自己要出口气，没想到事情最后会发展成这副样子……”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刘德解释说，自己那段时间正忙着办理出国读书的手续，根本没有工夫去谋划那件事。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八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

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黄斌现在在哪儿？”我问刘德。

“很多年没见了，几年前听表哥说黄斌因故意伤害被判了重刑，现在应该还在哪个监狱服刑吧。”刘德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做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儿，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了。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那时黄斌正好因为涉嫌重伤害被警方处理，但因身体原因“取保”在家。黄斌承认了当年报复殴打谢江的事情，黄斌父母担心这事儿闹出去再给儿子加刑，所以提出给谢家五万块钱，让他们放弃追究，谢江父母当时没同意。

根据刘德的说法，当时谢江父母要求的赔偿金额大概在20万，但黄斌犯下的那起重伤害案需要赔给受害者一大笔钱，黄家拿不出另外的钱来赔给谢家。此后，黄、谢两家就一直扯不清楚，后来黄家索性不赔了，让谢江父母去找警察，“大不了让黄斌多蹲几年”。

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刘德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

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也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

9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刘德的父母不相信谢江有精神病，认为他捅伤刘德一事是“有预谋的”，谢江父母依旧坚称谢江有精神病。案情重大，公安机关组织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是：谢江确实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但犯案时并未发病，因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本以为此案就此了结，但不久之后，刘德父母却又找到了我。他们说，谢家只在刘德入院当天缴纳了1万元住院费，之后便拒绝再拿钱出来。刘德的妻子和母亲让我找谢江父母催缴医药费，我给谢江家打电话，谢江继父却说，之前刘德家“欠”他们家5万块钱，“就从那个钱里扣”。

我问他，刘德父母什么时候“欠”的5万块钱，谢江继父让我去问刘德父母，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又给谢江母亲打电话，告知她，积极赔偿是对方达成谅解的前提，希望她为了儿子的刑期认真考虑一下。谢江母亲很着急，但也很为难，说家里的钱都在丈夫手里，之前刚给小儿子在省城贷款买了房子，刘德被刺一案刚发生，丈夫便把家中所有存款都拿出去，提前还了房贷。

我只好原话转达给刘德父母，他们向我抱怨说对方这样做“纯属无赖”。

可我也只能告诉他们，警方只能追究谢江的刑事责任，至于民事赔偿，也只能以后聘请律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了。

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跟着民警乖乖钻进了警车里，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受害人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嫌疑人家属倒是先想着推卸责任，同事忍不住怼了他一句：“哪条法律告诉你精神病人不负法律责任？”

谢江继父便把手机伸到我们面前，说这是网上说的。

我懒得看他的手机，只告诉他：谢江是否负刑事责任，要通过司法鉴定判断，另外，不管他负不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都跑不脱，“你们赶紧派人去医院，给受害者交一下医疗费，这对他以后的量刑有好处”。

谢江继父愣了一下，问我什么是民事责任。我说就是赔钱：“把人捅成这样，医药费和之后的赔偿都不是小数，你们抓紧去筹钱。”

他还想拉住我说些什么，但同事在办公室里有事喊我，我便冲他摆了摆手，说：“你提前去给谢江找个律师吧，以后用得上。”

我的精神病女儿，

以后就指望你了

1

2016年2月的一天，彭中时呆呆地站在马路边，怀里抱着几件衣服，脚边扔着一条毛毯。

他的妻子杜英此刻正全身赤裸着，一边喊叫着一边在车流中穿梭。所到之处，全是尖锐的刹车声和急促的喇叭声。被逼停的司机降下车窗，冲她怒吼着："想死啊，傻X！"

我和同事在车流中追逐杜英，情况危急，我喊彭中时一起追，可他就像听不到我的声音一样，依旧呆立在那里。

五分钟后，杜英迎面扑倒在一辆被她逼停的SUV上，用力地拍打着发动机盖。司机从车里下来，又愤怒又惊慌，想去拉扯杜英，却又不敢靠近，看到我们过去，赶紧连声说自己车早就停了，是她自己扑上来的。

同事冲司机摆摆手，示意他这并非交通事故。然后一边按住杜英，一边回头找彭中时，见他还站在路边，同事就朝他怒吼："站在那里看热闹哪！快把毯子拿过来！"

彭中时这才反应过来，俯身去捡毯子。刚把毯子捡起来，怀里抱着的衣服又掉了一地，再伸手去捡衣服，毯子却又掉了。

"别管衣服了，赶紧先把毯子拿过来！"我也忍不住朝他喊。

我和同事一人按着杜英的一条胳膊，把她控制在那辆SUV的发动机盖上。杜英一边嘶吼着一边扭头冲我们吐口水。我扭头看彭中时，他还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往我们这边走，又冲他吼道："快一点！"

彭中时这才跑了两步。

我们把杜英暂时控制在派出所的醒酒室里，等待送往精神病院。

“你他娘的以后能不能动作快点？！”同事一边在受伤的手背上擦酒精一边训斥彭中时。刚才在大街上，他的右手被杜英狠狠咬了一口。

彭中时默默地点点头，也不说话。他的目光有些呆滞，顿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怎么办？”

“怎么办？送精神病院啊怎么办！”我心里也憋着火，就因为刚刚彭中时的磨叽，我被杜英吐了一脸口水。

“没钱。”彭中时撂下一句。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我们不是头一次打交道了。

杜英是辖区在册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一犯病就在街上裸奔，时不时还会出手打人，平均一年要送三次精神病院。三个月前我就出过一次警，也是送杜英去精神病院，那次彭中时同样说没钱，做了一下午工作才把他说通。

“这次你们啥也别说了，必须让她娘家出钱，我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上次送医院的钱还是我借的，到现在都没还……”

我只好打电话给杜英的父亲，杜英的老父亲在电话里颤颤巍巍地对我说，现在彭中时是杜英的丈夫，也是“法定监护人”，他出这钱没道理。好说歹说个把小时，杜英父亲才同意拿钱，但也只答应出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让彭中时自己想办法。

临挂电话前，杜英父亲指责彭中时现在就是“卸磨杀驴”，我手机开的免提，彭中时听到了，激动地冲过来朝电话大喊：“老X玩意儿你一早就给我‘做笼子’……”我急忙制止，赶紧挂了线。

就算只出一半钱，彭中时也不肯。杜英父亲更是拒绝再与警方交涉，我们只好试着联系杜英的其他亲属。直到当天晚上，杜英的姐姐才同意赶过来，为妹妹交了另外一半医疗费。

杜英这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2

彭中时54岁，是厂里行政科的“退休”科长——按理来说，他远不够退休年龄，之所以提前“退休”，也是因为杜英。

和那些后天吸毒致幻的病人不同，杜英的精神病是先天的，发病很早。有上了年纪的同事说，杜英20多岁时就发过病，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这些年，只要是在派出所工作过的民警，或多或少都和彭中时夫妻打过交道。

夫妻俩没有孩子。彭中时说刚结婚时，他们也曾想要个孩子，但杜英一直没怀上，后来，杜英发病越来越频繁，便没法再怀孩子了。医生也说，杜英的病可能会遗传，建议他们放弃要孩子的想法。

彭中时的家在小区靠近马路边的一栋六层公房里，二人本来住在六楼，2004年，杜英在家中犯病后爬出了阳台，差点儿坠楼，后来彭中时就和单位领导申请换了房，搬到了一楼。

每次清查辖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时，我都要去彭中时家。他家永远亮着一盏昏暗的白炽灯，零星几样老旧家具，除了一台旧式绿皮冰箱外，几乎没有任何家用电器。

2011年，我刚接手社区时，第一次去彭中时家，问起他家的生活状况。彭中时无奈地回答我：“都砸了，还谈什么‘状况’……”大到以前家里置办的电视机、影碟机、洗衣机、空调，小到窗玻璃、锅碗瓢盆、茶杯暖瓶，只要杜英一发病，这些东西便都难逃厄运。

“冰箱还是结婚时买的，用了20多年了，夏天漏水冬天漏电，但就是抗砸，结实。”彭中时指着嗡嗡作响的电冰箱自嘲道。电冰箱上伤痕累累，一侧底座的腿断了，垫着厚厚的纸壳子。

“这么多年都没有起色吗？”我问彭中时。

他摇摇头，说“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家睡觉，坏的时候就跑出去打人、裸奔。

“她这病是遗传性的，天生的，没得治……”彭中时告诉我，杜英的小姨当年也是精神病，和她现在一模一样，不过十年前掉进河里淹死了。

“结婚时知道这件事吗？”我又问。

他顿了顿，说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怎么可能和她结婚？”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听他这么说很不解，又问他，既然杜英家婚前隐瞒了她有精神病的事实，婚后发现了为什么不离婚？彭中时当时并没有直接作答，只是笑了笑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我被他这话打动了。从那之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尽力帮助彭中时。有几次杜英深夜跑丢，我就开着车带着彭中时四处找人。有时送杜英去精神病院，彭中时说自己钱凑不够，我还给他垫过几次治疗费，前后大概有四五千块。

3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关于杜英，彭中时对我说的话并不都是真的。

2012年8月，我去居委会办事，大家聊起了彭中时，我感慨说这些年他真是不容易，放一般人身上早就离婚了，“真是个好男人”。

居委会的干事听完就笑了：“你怎么知道彭中时没想过离婚？他光来居委会开证明就不下三次，要求居委会证明他和杜英的夫妻关系已经破裂，他好拿着证明去协议离婚。”

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看我不信，居委会干事翻了半天，找出一张纸递给我，说这是以前彭中时留在居委会的证明复印件，后来因为不符合规定，再没给他开过。

“两口子都正常才能协议离婚，像他这种老婆是精神病的，协议不了。”干事告诉我，杜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规定不能协议离婚，只能走法院诉讼。

“那他去过法院没？”我问干事。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应该是去过吧，当时看他离婚的态度还是蛮坚定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得替彭中时打了个圆场：“毕竟婚前不知道妻子患病，结婚后又照顾了这么多年，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

“他不知道杜英以前有精神病？”干事反问了我一句，瞪大了眼睛，“他彭中时跟你说结婚前他不知道？”

我被她问得有些蒙，只好点点头，干事意味深长地笑了。

“结婚前他知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这我们不清楚，但他肯定知道杜英的爹是谁。”干事撂下这么一句便走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杜英父亲的名字输入警综平台，页面中的杜英父亲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时年72岁，还有一个67岁的老伴。

我问身边值班的同事，杜英的父亲是谁。

“是谁？杜英他爹呗！”

这话等于没说。

2013年3月，杜英的父亲报警，称女婿彭中时来家里闹事，还是因为杜英医疗费用的问题。我和师父出警处置之后，我又问师父，这老头到底是谁?

师父是局里的老民警，从警近三十年，跟彭中时一家至少打了二十年的交道。

“杜英他爹？杜书记啊。”师父回答。

“哪儿的书记？”我问。

“XX厂，不过早就退休了，你问这个干啥？”

我就把那次和居委会干事的对话讲给师父听，师父听完，也笑了笑说，彭中时和杜英这个事儿，确实有些复杂。

4

1983年，杜英23岁，曾谈过一场人尽皆知的恋爱——当时，她的男朋友是邻市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两人是中学同学。

那时杜英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只是脾气比较大，喜欢发火。之前谈过几任男朋友，都受不了她的脾气。但在周围人看来，这也是正常现象，毕竟父亲是厂里一把手，“长公主”有点脾气是可以理解的。

杜英高中毕业后便被安排进父亲的厂里上班，公安局局长的儿子退伍后也分到了这个厂里。两人同在一个科室，每天一起工作，两人父亲的职级也基本相同——在外人看来，这可是一桩“强强联合”、门当户对的好姻缘。

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时，杜英的“准公公”却突然叫停了这门婚事。没过多久，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便和别的姑娘结了婚，并很快调走了。为此，杜英气得一个月都没来上班。

没人知道两人分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只知道两家当时还为此大动干戈。甚至两个单位之间日常的业务往来，多少都因为两位一把手的“不和”而受了影响。

后来，就有人风传，公安局局长之所以叫停这门婚事，是因为他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杜英的家庭情况，杜英的二姨和小姨都患有精神疾病，杜英母亲虽未患病，但也精神暴躁。局长是老刑侦出身，看人颇有一套，第一次见杜英时，就觉得她“有问题”，很担心病情会遗传，便强令儿子和杜英分了手。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了“杜英一家都有精神病，会遗传，坚决不能碰”，以前那些和杜英处过对象的男人纷纷暗自庆幸，从那时起，就再没人敢给杜英介绍对象了。

这话传到杜英耳朵里，她又羞又气，去公安局局长家闹过很多次，但都于事无补。等局长儿子结婚后不久，杜英就真的发病了。

“杜英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原本，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人不一定都会发病，但会有潜在的危险，一旦出现强烈刺激引发自我暗示，十有八九就会发病。”师父解释说。

“那彭中时呢？他和杜英结婚，难道不知道杜英的情况吗？”我好奇地问。

“他呀，唉……”师父也叹了口气，欲言又止，“有些路既然是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也得走下去啊。”

5

师父和彭中时年纪相仿，他说当年自己差点儿和彭中时做了同事。

师父以前在农场开大货车，1983年全国严打时被抽调到公安局，等严打结束，师父便留在了公安局工作。当年，彭中时是杜英父亲厂子保卫科的临时工，同样也被抽调来到公安局帮忙。

“当时公安局人手不足，又怕抽过来帮忙的人不肯出力，所以上级就放出话来，所有抽来帮忙的人，无论在原单位是正式工、家属工还是临时工，只要表现好，都有可能留在公安局工作，局机关两个名额，每个派出所一个名额。”

这话如同一剂鸡血，一时间，所有被抽调来的人都干劲儿十足。尤其像彭中时这样的临时工——他本来在原单位转正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要进了公安局，哪怕只是做一名“工勤人员”，铁饭碗也算是抱稳了。

“当时，彭中时铆足了劲儿要在公安局转正，是我们那批抽调来的人中工作最积极、表现最好的。”师父说，“本来我这个名额应该是他的。”

等到1984年年底，彭中时确实获得了留在公安局工作的机会。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放弃了，公安局找他谈话，他却主动要求回以前的单位。周围的人都为彭中时感到惋惜，甚至有人背地里骂他傻——放着公安局铁饭碗不端，偏要回去企业保卫处干临时工。

师父那时和彭中时的关系不错，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干临时工，说就这么走了多可惜。彭中时也没多解释，只说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工作。

但谁都没想到，彭中时回原单位后不久，便抹去了身份上的“临时工”三个字，成了一名“全民所有制职工”。

大家这才明白彭中时拒绝留在公安局工作的原因——那个年代还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国企与政府机关都是“铁饭碗”，但在效益好的国企，职工每月、每季度、每年都有各种奖金，政府机关却只有固定工资。

人们又开始纷纷感叹彭中时本事大、路子广、做人低调。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还调了部门，这要没有“通天的本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师父跑去问彭中时怎么做到的，但他仍是一个字都不肯透露，以至于有段时间师父觉得他很“不江湖”。等严打结束，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纷纷返回原工作单位，师父和彭中时的联系慢慢也就断了。后来，他只是听说彭中时在单位混得很不错，已经当上了部门领导。

到1993年年初，已经转为派出所民警的师父接到一起警情，才又和彭中时见了面。

“那天辖区一家单位报警，说有个女的无缘无故在他们单位门口骂人，见一个骂一个，单位保卫科赶都赶不走，所以报了警，我们到现场处置，根本没法交流，怀疑是精神病人，就找那个女人的家属来，结果来的竟然是彭中时。”师父说。

那时师父才知道，原来彭中时和杜英已结婚七年了。

6

直到很多年之后，彭中时才向师父承认，当年之所以他能“转正”，就是因为他和杜书记做了一笔“交易”——那时候，他已被杜英的情况折磨得焦头烂额了。

彭中时17岁那年从本市周边农村招工进城，一直在厂里保卫科做临时工，主要负责夜里在厂区巡逻，那些正式工不愿做的、出力不一定讨好的工作，全都由他来做。彭中时工作很认真，领导也很欣赏他，多次给他打气，称但凡厂里临时工有转正的机会，他肯定排第一位。

彭中时当然想转正，除了眼馋正式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要是能够进城工作并捧上铁饭碗，就能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只是，彭中时在保卫处干了快五年，也一直没有等到转正的机会。在被抽调去公安局之前，厂里有同事好心劝他，这样干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趁着年轻，赶紧自己想想办法：“你也不看看，厂里多少家属工都在等着转正，里面有多少是科室和厂领导的亲戚，你一个临时工，没技术没学历，在这儿又无根无基的，什么时候能轮到你？”

这几乎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也就是这一年，杜英发病了。

女儿的发病在杜书记看来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多年来，他一直担心女儿像自己的两个妻妹一样，因此杜英高中毕业后，他就把她直接安排进自己的工作单位，想着女儿离自己近一点儿，自己能顾得上，只要将来结了婚，自己的担心便能卸了大半。

没想到，女儿的一场恋爱让自己先前的计划付诸东流，现在婚没结成不说，女儿也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这么说，当年是杜书记骗了彭中时？”我问师父。

“现在想想，也不完全是吧……”师父说。

彭中时自己也跟师父说过，杜书记原本看不上他，但他却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杜英。当年正是他自己主动向杜书记表达意愿的。

当时彭中时在老家有个未婚妻，是村里媒人给他介绍的，一直没结婚。彭中时原本打算先在厂里转正，然后把未婚妻调进来做家属工，但是后来，彭中时虽然转了正，却做了杜书记的女婿，老家的未婚妻来厂里找他，他就躲着不见。

师父还记得，那次严打，彭中时被抽调到派出所后，管第二人民医院那块地，负责街面巡逻。他总是时不时就“巡”到医院里去了，大家问他，他只说家里有亲戚在二院住院。

后来师父才知道，当时住院的并不是彭中时的“亲戚”，而是杜英，就住在二院精神科。

“可能那个时候彭中时就有所打算吧。”师父说。

“他没想过和患有精神病的杜英结婚意味着什么吗？”

“后来这事儿‘穿’了，彭中时才说了实话——他有个哥哥，在老家务农，当年哥哥帮他出主意，让他娶了杜英，杜书记肯定会帮他解决转正问题，不然的话，他终究就是个‘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被单位扫地出门。”

“可是杜英已经发病了啊，和她结婚，以后怎么办？”

“彭中时的哥哥说很好办，结婚之后转了正，找个机会调到其他单位去，杜书记就管不着了，到时再离婚就是了。哪怕离不了婚，还可以把杜英送回老家来，他负责看着。”师父说。

彭中时认为自己的哥哥不会害自己，这个办法虽然有些缺德，但对于改变自己境遇而言，的确是个好办法。但彭中时不知道的是，哥哥之所以给他出这个主意，就是为了让他通过转正拿到城市户口——按照老家的规矩，如果他拿到了城市户口，便失去了家里老房子的继承权。与杜英结婚之后，当不堪妻子精神病折磨的彭中时准备按照当年哥哥的提议，将杜英送回老家时，哥哥却以“嫂子要喝（农）药”为由拒绝了他。同样，阅人无数的杜书记直到退休，也没让彭中时“调走后离婚”的算盘打响。

“按照法律规定，杜英是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暂时不能结婚，但杜书记找了关系，还是给他们办了结婚手续。”师父说，当时，杜家迟迟不愿承认杜英得了精神病，只说她就是受了刺激，一直拖到彭中时和杜英结婚之后的1990年，杜英才第一次去做了精神鉴定。

杜书记的算盘是，只要结了婚，彭中时便成了杜英的法定监护人，只要确保自己退休之前两人别离婚就好——等自己退了休，彭中时再提离婚，他就可以以自己“无监护能力”为由拒绝。虽然这样做有些坑人，但为了自己百年之后女儿能有个归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两家就这样相互算计呗。”师父笑笑说。

7

1998年，杜书记退二线，临退休前两年，把女婿彭中时扶上了行政科科长的位置，算是给女儿一个保障。

杜英的病情并没有多少改观，还是经常犯病，犯病后有时打人、有时在街上乱跑。彭中时虽然照看着，但早已是人心思变。

“老丈人退休之后，彭中时找过一些单位想调动工作，甚至还来过公安局。”师父说，杜书记虽然退了休，但在本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单位的领导既不想得罪杜书记，又不愿调一个家里有负担、无法专心工作的中年干部来自己单位，所以彭中时一直没能成功。

“彭中时也来找过我打听过精神病人离婚的事情，我虽然比较恶心他的为人，但还是帮他问了，很遗憾，像他这种情况的确有些难度……”

2000年左右，彭中时以“婚前不知杜英患有精神病，要求判决离婚”为由，将杜家告上了法庭，因为那时他已经确定，自己与杜英协议离婚无望，只能走诉讼离婚的路子。

一审法院先进行了调解，彭中时愿意把夫妻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给杜英，以换取和杜英离婚，但杜家没有同意。彭中时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离婚，但因离婚后杜英找不到有效监护人，法院并没有判决离婚。彭中时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也没支持他的离婚请求。

日子还要继续过，但经过这一系列风波，彭中时与杜家已是剑拔弩张，彻底撕破了脸皮。彭中时说是杜家吃定了他，要毁了他的一生。杜英的父亲则称彭中时丧尽良心，靠杜家上位，目的达成便要“甩坨子”，“纯粹就是过河拆桥”。

最无辜的只有杜英，由于丈夫与娘家闹得不可开交，她的日常看护一直是个大问题。有时候连按时吃药都保证不了，以致发病越来越频繁。

“后来彭中时有些事做得过分了，还差点儿把自己‘折进去’。”师父说。

2004年，彭中时见离婚无望，索性不再回家，在外过上了“家外有家”的生活，将杜英一人丢在小区的住所里。结果那年四月份，被独自锁在家里的杜英攀上六楼阳台企图出门，差点儿坠了楼。

公安机关找彭中时谈话，彭中时拒绝见面，公安机关只好联系彭中时所在单位，让他们向彭中时转述，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涉嫌重婚罪和遗弃罪。

见不管不行，彭中时只好搬回家继续和杜英过日子，但他又想了一些别的“点子”。

“不知道谁跟他说的，精神病人触犯刑法后会被强制送医，费用由政府承担。2005年年关前后，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给杜英完全停了药，结果杜英犯病，上街打了人，对方轻伤。警察出警之后确实给她强制送医了，但彭中时却发现，自己作为法定监护人，还要负责赔偿受害者损失……”

“杜英娘家那边呢？杜英总归是他们的女儿，也不能就这么坐视彭中时乱来吧？”我问师父。

“杜书记说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己现在也确实无能为力了，一是自己的大妻妹因为有病一生未嫁，岳父母过世后自己和妻子还要负责照顾大妻妹；二是自己和老伴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确实没能力再把杜英接回家了。”师父无奈地摇摇头。

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甚至杜书记以前所在单位的退休办都去杜家做过工作，但杜书记那边也是铁了心吃定彭中时了，只说除非有人主动承担杜英的监护义务，不然谁说也没用。

“我跟这家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社区归你管了，他家的事儿，唉……”师父最后又叹了口气。

8

2015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公安局要求重新汇总辖区在册精神病人的情况。当时，杜英精神状态已经极不稳定，我找彭中时要求他加强看护，但彭中时却说自己最近肝脏出了问题，要去武汉住院，照顾不了妻子。

无奈，我只好又去找杜书记。

在杜家，我一提到彭中时，杜书记便忍不住开口骂了起来。言语中倒也不避讳，直说自己当年看走了眼，本以为彭中时是个踏实厚道的人，自己帮他转了正，提了干，想给女儿留个可靠的托付，没想到他竟是这种人。

“彭中时现在对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这纯属放屁！那时候杜英有病这事儿，全厂都知道，就瞒着他一个？结婚之前我还问过他，他说么斯一直就暗恋杜英，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之后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杜英这病好好控制的话，根本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因为彭中时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压根儿不想好好给杜英治，她才走到现在这个境地……

“他彭中时当年就是个看大门的临时工，要不是我帮他，他这辈子也就能看个大门了，全厂三百多号临时工，凭什么让他转正？凭什么！”

杜书记骂得停不下来，我几次想插嘴打断都没能成功，只好耐着性子继续听他说。直到他终于说累了，我才试着问了一句：“如果当时没有彭中时的主动追求，你打算怎么处理杜英的事情？”

杜书记愣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而彭中时那边，同样也是一腔怨气。

2015年6月，看护杜英四个月的杜书记找到派出所，说杜英在家犯了病，要求我把彭中时“找出来”送杜英去医院。

我联系彭中时，他先说自己在武汉治病，又说自己在长沙办事，所里有同事恰好当天过早（吃早饭）时遇到过彭中时，拆穿了他的谎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才不情不愿地来了派出所。

从精神病院返程的路上，彭中时又开始诉说自己这些年来看护杜英的不易，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直到他把话引到警察头上：“你们警察每次也就跟着送送，从来不说帮助解决一下费用什么的。”

我开始没搭理他，但开车的同事没忍住，和他吵了几句。彭中时一直不住嘴，我也火大，便问他之前送杜英去医院时帮他垫付的几千块钱什么时候还我。

彭中时不吭声了，半天没说话。

同事说：“那是李警官自己的钱，帮忙还帮出仇人来了？彭中时你也是每月有工资的人，至于这样嘛。”

彭中时叹了口气，又抱怨起来：“还不都是杜英害的，早知道家里有个精神病人是这种情况，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我索性把他和杜英以及杜书记当年的事情挑明了，原以为他要辩解一番，不承想彭中时并没洗白自己，只是低着头说，自己这些年已经为杜家做了很多事，足以报答当年杜书记对他的“栽培”了。

“我现在就是后悔啊，为了个么X‘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娶了他家闺女，结果把这辈子都搭进去了……”彭中时又开始絮叨个没完。

他说，自己的“仕途”就止步于杜书记退休——他34岁当上行政科科长，此后再未升迁。一是由于背后的“大树”退休了，二是因为妻子杜英的病始终让他无法专心工作，动不动就要请假陪护，单位几任领导对他都有意见。

2008年，厂里实行“干部竞聘”，46岁的彭中时落选了。领导找他谈话，安慰他说：“这些年一手抓行政科工作，一手抓家属病情，着实辛苦，退下来也是好事，一方面给单位年轻人一个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专心给妻子治病。”

从此之后，彭中时几乎就成了单位的“编外人员”，开始时彭中时还耍脾气不去上班，领导打过几次电话之后，就再也没人主动找他了。他的收入也只剩下基本工资，单位的各种奖金、补贴、福利都和他无缘了。

彭中时说，当年厂里有些和他一样的临时工，后来看转正无望，纷纷另谋了出路，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做点小生意，现在大多家庭和睦、有车有房，其中有几个还发了财，举家搬到武汉去了。现在看看自己，“要啥没啥，连个孩子也没有，以后自己老了，谁来送终”？

“你看，我留在厂里干了五年保卫科，结果走了的人都发了财；当年我把留在公安局的名额让给老宋（我师父），结果后来他赶上了‘公安改革’，从开大车的司机变成了公务员，‘金饭碗’！老家那个女的，后来听说嫁了个有钱的，生了俩孩子，在荆州做买卖；就我，娶了个领导闺女，本以为能搭上顺风车，结果赔上了半辈子……”

彭中时说自己也无数次动过“一走了之”的念头，但思来想去，又怕真的背上一个“遗弃罪”坐牢，那样的话，原单位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开除，连现在每月那点儿基本工资和以后的退休金都没了。

“你当年也有机会来公安局工作，如果你过来了，现在铁饭碗也端上了，也不用这么麻烦了不是？”同事说。

“那时还不是杜老头撺掇的？他说杜英的病就是那个公安局局长给弄出来的，我要是去了公安局工作，这辈子也别想进他家门……”彭中时说。

“你他娘的非得贴着他吗？你来了公安局他还能管得到你？”

“那个……”彭中时可能还有话要说，但半天没有说下去，之后便沉默了。

尾声

2018年年初，师父退休。那时我已离开派出所，回去参加师父的退休宴，哪知去酒店的路上，竟又遇到了杜英在街上犯病，原单位的同事小顾和老杨正在处置，彭中时依旧在一旁呆立着。

下车帮了一下忙，又回到车上，师父冲我打趣说："我还以为你也会跟他家打上20年交道呢，没想你走得倒是快。"

"你走了有我，我走了有小顾，哪天小顾走了还会有别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份工作，但对彭中时来说……"几年过去了，我忽然有些可怜他的境遇。

"路都是自己选的，咬着牙也得往前走不是？"师父说。

我有铁饭碗，

谁要去打工

1

去年年初，母亲回厂里领退休员工的春节福利，说看到了厂里公告栏上的讣告，上面写着：

我厂职工赵XX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X日在省肿瘤医院去世。遵家属意愿，丧事从简，定于2月X日在XX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有意参加者请联系厂工会……

我们是在前一年10月得知小赵叔叔肝癌确诊的消息的，没想到仅仅过了三个月，他便去了，人才52岁。

原本我们打算坐厂里的班车一起去殡仪馆送小赵叔叔最后一程，但临行前夜，工会的人给母亲打来电话，说报名前去的人太少，厂里不派车了，让我们自行前往。

母亲向父亲抱怨了几句厂里人情淡薄，不该这样对待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职工。父亲也跟着叹气。

小赵叔叔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一个很小的告别厅里，稀稀拉拉几个花圈靠在墙边。

我看到母亲以前的几个同事，都是从前一起住在家属院里的，母亲指着其中一个给我说，那人已经当上了厂里的领导。几个人站在告别大厅外的台阶上抽烟，看到我们过来，有人向母亲打招呼，寒暄两句“孩子这么大了啊”“退休之后还好吧”之类的套话。

母亲埋怨了那位领导几句，说小赵叔叔毕竟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现在人没了，偌大个厂子就来这几个人，把告别仪式搞得如此寒酸。

领导无奈地笑笑，说这有啥办法，大过年的都不愿来这种地方，他自己家亲戚都没来几个。况且厂里的年轻人和他也没啥交情，上了年纪

的和他关系又不好，就现在这几位，还是被硬拉来帮忙的。

我环顾周围，相比另外几个告别厅前的熙熙攘攘，这偏厅显得尤其冷清。玻璃棺旁边有一个女孩儿，胳膊上带着黑纱，应是小赵叔叔的闺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看到其他戴孝的人。

“唉，其实现在想想，他这辈子也真是可怜……”身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出来通知说告别仪式的时间差不多了，领导踩灭了烟头，发出一句感叹。

2

我很小便认识小赵叔叔。

1982年，16岁的他就进了厂，先干搬运，后来在车间当学徒工，成了我母亲的同事，也是我母亲在车间带的“徒弟”之一。他小我母亲4岁，一直喊母亲“李姐”。

那时厂里住房很紧张，我们家一直排不上单元房，只能在厂宿舍的“单身楼”里周转，小赵叔叔结婚前也一直住在那里，我家跟他做了好几年的邻居，父亲常把他叫来一起吃饭喝酒。因为关系处得好，平素遇事便少不了相互帮忙。

小赵叔叔的老家在远郊乡下，有很多亲戚。他家里很穷，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常年养病在家。可在他们家亲戚看来，他作为家里唯一一个“迈出农门”进城挣工资的人，相比在老家靠天吃饭的人，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此，他不仅要负担父亲治病的全部费用，还得应付有事没事就来省城的老家亲戚。

小赵叔叔的亲戚，经常一来就是一大家子，有时还会长住，餐具、椅子不够用了，就来我家借。我依稀记得，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侄子曾来省城治病，一家三口在他的小屋里实在住不开，便让侄子借住在我家，和我在一张小床上足足挤了半个月的光景。

这些亲戚吃了住了，有时还要“借”点东西回去。小赵叔叔好面子，觉得自己是“工人”，拿“非农户口”，是同辈人中最有出息的，也不好意思拒绝。可那时，他自己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厂里也没几个熟人，只能跟我母亲开口。我母亲时常劝他：你本就工资不高，哪里经得起老家人隔三岔五来“打秋风”？他却不以为意。

而我父母麻烦小赵叔叔，主要是因为我。

那时我年纪尚小，家里老人去世又早，父母收入有限，也请不起保姆，每到幼儿园放假时，我便成了“留守儿童”。

母亲担心我一人在家中惹祸，只好上班时把我也带去厂里，可又不放心让我独自在堆满各种钢铁物件的车间里待着，每隔一会儿就要过来看看我。车间领导为了此事，几次点名批评母亲工作时开小差。

后来一次开会时，领导又因我在车间乱跑，当众训斥母亲，还说要扣发母亲当月奖金。母亲很生气，但又说不出什么，没想到小赵叔叔却站出来顶撞了领导：“你儿子放假也被带到办公室里，还把钢笔水泼到新制的图纸上造成工期延误，是不是该一起扣工资？”

领导无言以对，最终也没好意思扣发母亲的奖金。但事后领导私下找母亲说，把我放在车间，违反制度是小事，关键是安全没法保证——车间里都是铁家伙，万一不小心伤到了孩子，责任算谁的？

可母亲真是没办法。领导只好叹了口气，说：“那你只能自己小心了，出了事情厂里可负不了这个责。”

后来，还是小赵叔叔主动找到我母亲，说把我交给他带着。母亲说，这可不行，你也得上班，哪里忙得过来？况且被领导知道了，会扣你工资的。小赵叔叔却说不要紧，反正自己一直干学徒工，也没多少事情要做，况且学徒工干多干少都是那点工资，“怕领导个球”！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小赵叔叔的小跟班。开始是在厂里跟着他，后来幼儿园开学了，他也会接送我，有时我父母下班晚，他还会带我去不远处的公园玩。

时间久了，厂里的同事都跟我母亲开玩笑说：你必须负责给小赵介绍对象，不然他整天带着你儿子出去，人家女同志都以为那是他儿子，不敢和他处了，这样下去，不得打一辈子光棍？母亲笑着说没问题，还让小赵叔叔多留心，说只要相中了谁，她就负责去说媒。

3

我5岁那年，母亲践行了她说媒的承诺。女方是刚分进车间不久的女工小刘，听说还是个大专生。

那时小赵叔叔也结束了三年的“学徒”生涯，正式被分配到“下料”工段工作。论长相，正当年的他一表人才，身材魁梧，经常戴着墨镜，骑着一辆嘉陵摩托，像极了电视里的明星。

我母亲为了保险起见，把小赵叔叔的家庭情况全部告诉了小刘阿姨，小刘阿姨说不要紧，都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孩子，只要他人好、肯上进，她都可以接受。

很快两人就举办了婚礼，厂里去了一大群人，酒席上，小赵叔叔带着小刘阿姨向我母亲敬酒，换了个大玻璃杯，一饮而尽，说，我有两个哥哥，就是没有姐姐，李姐就是我亲姐姐，以后你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母亲也很高兴，让小赵叔叔结婚之后赶紧要孩子，“小子（指我）明年就上学了，不需要那么操心了”，到时可以帮他带孩子，“小赵你自个儿也好好工作，争取当上领导，我这当姐的也沾沾光”。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满面红光，一个劲儿点头说：姐你放心，绝对不让你失望！

那时我家已经从单身楼搬走，小赵叔叔结婚后也从厂里分得一室一厅。但我们两家的走动并未因此减少。婚后一年，小赵叔叔就有了个女儿，节假日时，我们两家还会常常聚在一起。小赵叔叔经常给我买礼物，有些玩具父母不给我买，我就偷偷告诉小赵叔叔，过不了多久，他准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来送给我。

我找出的那张与小赵叔叔一家的合影，是1995年大年初五两家人一起去公园游玩时的留念。照片上，小刘阿姨抱着两岁的女儿，依偎在小赵叔叔怀中，小赵叔叔帅气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你看那时多好，那年春节前，你爸和你赵叔还一起去家电城搬了两台21英寸彩电回来，咱两家成了家属院里为数不多的看上大彩电的人家，你赵叔还和你爸商量，过一年再一起去买两台电冰箱……”母亲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4

可惜，买冰箱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1995年年初，国家取消了对母亲他们工厂的扶持政策，本就效益一般的厂子一夜之间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还未到年底，已经有“破产改制”的风声在厂里流传。

1996年春节，厂里已经发不出奖金，购置电冰箱的计划被迫推迟。小赵叔叔再来我家时，大人们聊天的内容也从“买冰箱”“换洗衣机”变成了“裁员”“减福利”“降工资”，家里充斥着压抑和不安。

“那时候谁也想象不到，两千多人的大厂，三十多年历史，没了国家政策，一年之内说垮就垮了。”母亲说。

1996年7月，母亲收到了厂里的“息岗通知”，虽然领导开“散伙会”时信誓旦旦地说：“企业只是‘改制’，短则数月，长则不过两年，肯定会成功的。大家要沉住气，到时不但能回来上班，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还会提高！”但台下工人们的脸上却依旧布满了疑惑、忧虑甚至怒火。

小赵叔叔早我母亲三个月接到“息岗通知”，“光荣”成为第一批为企业“轻装前进”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进个人”。记得那天在酒桌上，他当着两家人的面，将临走前厂里发给他的“先进”奖状撕得粉碎，然后痛骂厂领导“不是东西”：“我‘下力’时，他坐在办公室里，口口声声夸我干得好，骗我使劲儿干，现在遇到改制，他依旧在办公室里，以前的好话绝口不提，大笔一挥就让我息岗。凭什么？王八蛋！”

我父亲问他今后的打算，他气呼呼地“哼”了一声，说，有啥打算？咱是正儿八经国企职工，不是“大集体”，也不是“临时工”，只要不坐牢，谁也不能把咱开除，“领导不是说了，改制完了还要叫咱回去上班吗？我就等着，权当给自己放个长假休息休息了”。

我父亲劝他还是做好两手准备：“改制时间短还好，万一真拖个两三年，怎么办？又万一，改制虽然成功了，新领导不让你回去，你又能咋办？”

想不到这句话激怒了小赵叔叔，他“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烟灰缸都震到了地上摔碎了——

“他敢！到时看我不干死他全家！”

1997年年初，久等“回厂上班”的消息不至，我母亲和几个同样息岗的老同事开始琢磨着找点事情做。

“一个月100多块钱的下岗补贴，你爸单位那边情况也不乐观，你又要上学，处处需要钱，不想点办法不行啊……”后来，母亲回忆道。

于是，我母亲和几个同事一起去西市场批发了一些袜子、毛巾、内衣，趁晚上拖到宿舍区外面的夜市上卖。夜市原址曾是周围几个国营工厂共同兴建的“职工俱乐部”，以前有舞厅、卡拉OK和小电影院，后来企业纷纷倒闭、破产、改制，俱乐部无以为继，职工们更没钱去消遣，逐渐变成了小摊贩的聚集地。

夜市上，我母亲常遇见同样息岗在家、出来摆摊的老同事们。有些人就算不认识，稍一搭话，回答无外乎是“肉联厂的”“酒精总厂的”“造纸公司的”，再一深聊，大家说的也都差不多：“唉，没办法呢，单位不行了，咱还得过日子，混口饭呗……”

小赵叔叔会开车，息岗之后小刘阿姨就劝他出去跑出租，他不愿去；我母亲也劝小赵叔叔和她一起干，小赵叔叔只说需要进货了就叫他，随叫随到，但就是不愿一起卖货。我母亲的老同事揽到给饭店送菜的活，通过母亲联系小赵叔叔，说想一起搞，算他一份钱，但小赵叔叔仍旧对此嗤之以鼻。

一开始，我母亲以为小赵叔叔另有打算，便也没再多问。可一次和我父亲酒过三巡后，小赵叔叔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他之所以不参与，是因为我母亲他们在外找的这些活计，在他眼里统统都是“闲篇子”。

“那是些什么工作？摆摊？卖袜子？倒腾蔬菜？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我还连续三年是厂里的‘优秀职工’，很快要提干的，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丢人！”他伸出三根手指头，先冲我父亲挥舞几下，又冲坐在一旁看电视的我比画。

“闲篇子？人家闲篇子能挣钱养家，你倒不是闲篇子，拿钱回来啊！”小刘阿姨气得摔门而去。

5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的婚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9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他们突然离了婚。我父母怎么都不肯跟我细讲他们离婚的原因，我也就再没见过小刘阿姨和他们的女儿。

那段时间小赵叔叔几乎天天来找我父亲喝酒，我在他醉酒后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听出，小刘阿姨从厂子的车间去了厂办子弟学校当了老师后，就看不上他了，“傍”上了学校的领导，把他甩了。

小赵叔叔时常醉酒后趴在我家餐桌上痛哭。一边哭一边对我父母抱怨说：“当初那个女人口口声声说不嫌弃我的家世，要跟我过一辈子，结果到底还是嫌我穷，为了能‘上位’，去给校领导当小三，把我甩了不说，还把我女儿也带走了……”

有时他还会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瞪着通红的眼睛，拍着桌子冲我喊：“小子，你给我记住一句话：女人就是狗，谁有本事谁牵走！”

我父亲就急忙把我推走，然后吼小赵叔叔，让他别在孩子跟前胡说八道。我虽听得云里雾里，但因为从小就跟小赵叔叔亲近，那时只觉得小刘阿姨真不是个好女人。

等我上了六年级，想不到竟然又见到了小刘阿姨——那年学校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老师正是她。

小刘阿姨当然还记得我，对我也十分照顾，但我却对她满怀着恨意。为了报复她，我总是在英语课上故意扰乱课堂秩序，给她找麻烦。终于有一次，我因为带头起哄，被她叫起来批评，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了她一句“二奶”。她被气哭了，我很快被学校请了家长。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往死里打了一顿。然后她打电话给小赵叔叔，在电话里把他也狠狠骂了一顿。

从那之后，小赵叔叔很久都没再来我家，我母亲也没有主动叫他来。有时我父亲一个人无聊，想叫小赵叔叔过来喝一杯，母亲就会无缘由地吼父亲说：吃饱了撑的，没朋友了吗？偏要叫他来？

很久之后，母亲才告诉我她那么生气的原因。

那天在学校，说完我的事情，小刘阿姨专门找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与小赵叔叔离婚的原因告诉了母亲。

早在结婚前，小刘阿姨就是车间唯一的大专生，她不甘心一辈子混在车间，婚后第二年便报了电大，一边上班一边考专升本，连怀孕期间都没停下学习。拿到了本科学历后，因为厂里的子弟学校正好缺英语老师，她学的又是英语专业，便调来当了老师。

厂子破产改制，子弟学校也被移交给了地方教育局，小刘阿姨转为了事业编制，工资一涨再涨。而小赵叔叔却迟迟没有等来厂里“回去上班”的通知，每月100多元的“息岗补助”让他在家里实在抬不起头来。他其实是个很好面子的人，因为这事，更是成天借酒消愁。

后来，小赵叔叔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小刘阿姨受学校领导“照顾”的传闻，更是怒上心头，酗酒成瘾，每天不到中午便呼朋唤友，从午饭喝到傍晚，然后换一家再喝。晚上喝醉回家就找茬跟小刘阿姨吵架，只说让她别在学校干了。中间有几次两人还动了手，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小刘阿姨这才生出了离婚的念头。

小刘阿姨对我母亲说，她并没有像传言中那样“傍上了校领导”，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小赵叔叔的不争气让她实在气不过：“息岗两三年了，别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摆夜市、跑出租，有的干脆趁年轻辞职南下或北上打工。而他成天就知道喝酒骂领导，或是拿老婆孩子出气。”

离婚时，两人都不过三十出头，学校也有不少人给小刘阿姨做媒，她都没答应。她说只要小赵叔叔改了酗酒的毛病，出去找份能养家的工作，她就带着女儿回去跟小赵叔叔复婚。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离开便去找了小赵叔叔，给他转达小刘阿姨的想法。本以为小赵叔叔听了会幡然醒悟，没想到他竟瞪着醉醺醺的眼睛冲我母亲骂道：“那个贱女人被领导玩够了，甩了，这才回来找我，我是好马，绝不吃回头草！”

当时屋子里还有几个小赵叔叔的酒友，一群人借着酒劲儿起哄，问我母亲到底收了小刘阿姨多少好处。我母亲一怒之下摔门走了。

小刘阿姨等了小赵叔叔四年，直到我初二那年，她才彻底心灰意懒，嫁给了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从此与我家断了联系。

6

多年之后，母亲跟我回忆起小赵叔叔的往事时，时而埋怨小赵叔叔“不思进取”和“大男子主义”，说他抱着“国营大厂职工”的名头死要面子，时而又感叹，如果小赵叔叔早生三十年，没遇到国企改革那该多好。

“你赵叔叔是个很好的人，做人实在，干活肯‘下力’，但是有一点不好，懒！”这句话母亲常挂在嘴边。小时候我不明白，一次课上老师让用“但是”造句，我就把这句话学给老师听。老师说我的逻辑不对，既然“干活肯‘下力’”，怎么还会“懒”呢？我回家问母亲，母亲说，你赵叔叔的“懒”不是不肯下力气的“懒”，而是不肯动脑子的“懒”。

小赵叔叔初中只读了一年便没再念了，他说自己是榆木脑袋，一看书就心烦。刚上班时，他凭着年轻人的一身蛮力做活，领导觉得他又实在又肯吃苦，有心提携他，先是连续三年给他评了“优秀职工”、年年发奖状，后来又把他从搬运队调到了车间，想让他学点技术，留待以后慢慢培养。

但小赵叔叔就是不愿学技术，说自己学不会。厂里办的培训班他总逃课，有一次厂里送青年职工去青岛学习，为期五天，他只待了半天便不见了人影，领导骂他，他就说，别人学会了就行，学会了指挥他干，他绝对干得好。

我母亲给小赵叔叔当师父时，曾教他开“行车”（装在厂房或厂区上空，可以移动的起重机械。又称天车、航车），小赵叔叔倒是不怕车厢里冬冷夏热，就怕我母亲给他讲解操作规程：“就那几个‘把子’，知道前后左右上下不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啥？”

结果等他第一次自己上手操作，行车直接就撞到了车间墙上，撞坏了限速器，被厂里罚了2000块钱，勒令转岗。

“别人干学徒工，大多一年就能出徒，你赵叔却足足干了三年，为啥？他到死都看不懂图纸，别人不指挥他，他就干不了活。他说自己学历低学不会，可是和他一起干‘下料’的小吴，小学毕业就进了厂，人家就是自己学，看书、找技术员问，当年就出了徒，活干得不比老职工差，人家能学他怎么就不能学？”

长此以往，小赵叔叔的一身蛮力，不仅无法抵消技术上的无知，反而常给自己惹麻烦。

“有一年车间赶一批急件，按件数给奖金，你赵叔主动请缨，自己一人干了一宿，搞出来200多个。领导起初很高兴，想奖励他，结果技术员一看就急了，原来他根本没看懂图纸，200多个件全干错了……”后来，小赵叔叔不但没拿到奖励，还被领导罚了款，他为此跟车间闹了半个月，到头来还是只能乖乖认罚。

每次我母亲劝他学点技术，他就反过来呛我母亲：“咱这可是铁饭碗，到点儿他们就得给咱发工资，我技术不好又不是不干活，厂里还能把我开除了不成？”

“国营大厂以前确实是个‘铁饭碗’，只要你不被判刑，可以在厂里混一辈子。这个干不了可以干那个，都干不了还可以去后勤蹲着，工资照拿。你赵叔当年认死了这一点，结果最后还真就死在了这上面……”

正如我母亲说的，当国企改革大潮到来、厂子要“轻装前进，渡过难关”时，小赵叔叔顺理成章成了第一批息岗的人。即便他心里依旧“以厂为家”，但厂子早已容不下他了。

7

老厂子1998年完成了破产改制后，包括我母亲在内，以前息岗的工人大多又陆续被召回到了厂里工作，小赵叔叔虽然迟迟没有接到厂里召回的通知，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厂里的人”，坚定不移。

“当年你赵叔叔虽然息岗在家，但我们还是能时不时在厂里见到他。”母亲说，小赵叔叔去厂里就两件事，一是去找领导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二是去厂门口的公告栏，看厂里近期有什么集体活动。

开始时，领导还是笑眯眯地应付他，说改制还未结束，等有消息了肯定第一个通知他。后来他去的次数多了，领导逐渐不耐烦，有时避而不见，有时两三句话打发了他。

按惯例，每年年底厂里要开职工大会，即便在改制的日子里，厂里也会把所剩无几的“留岗”职工召集起来开会。那时候，小赵叔叔会不请自来，坐在开会的大礼堂里，还专挑靠前的位置坐。每次总公司来的领导让职工发言时，他都会站起来，说自己代表为企业“轻装前行”而息岗在家的职工们提个问题：厂子何时能够完成改制，让大家回来上班？

最初不明所以的大领导以为小赵叔叔真的是“息岗职工代表”，便一本正经地跟他讲解“当前改制的进度”“改制中遇到的困难”或者“企业针对息岗职工的政策”，但后来知道他所“代表”的完全是他个人，便很生气，直接把他赶出了会场。

小赵叔叔气得站在大礼堂门口骂娘，说自己虽然息岗在家，但没被厂子开除，还是厂里的职工，凭什么不能参加职工大会？是不是厂里准备悄无声息地“把息岗在家的职工当大鼻涕甩了”？

他的话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期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和他同样息岗的职工也去厂里跟他一起“讨说法”，以至于厂里不得不专门把“职工大会”改为“在岗职工大会”。

“他这样做，也相当于帮助同样息岗的职工向厂里施压，应该会有人买他的好，不至于去世的时候那么冷清啊？”我这样问母亲。

母亲说，当时确实有人觉得小赵叔叔“仗义执言”，和他走得挺近，但后来因为一件事，却让厂里的人多少埋怨上了他。

1999年，小赵叔叔一次醉酒后和别人打了一架，派出所出警后把他抓了，在做笔录材料时，民警问他平时做什么，他酒还没醒，迷迷糊糊地说“在家闲着”，民警就在“职业”一栏里写了“无业”。

不想在最后的当事人签字捺印环节，醒酒后的小赵叔叔看到了“无业”二字，非常不满，说自己是XX厂的职工，不是无业，还要民警带他回家拿以前厂里发给他的工作证。“职业”不是什么重要信息，民警懒得跟他跑，便给他改成了“XX厂XX车间职工”。

对于民警来说，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信息。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兼并了厂子的上级总公司对下级分厂有一个考核指标，叫作“治安稳定奖”。按照总公司的管理章程，下属分厂如果全年内无任何职工因违法犯罪被警方处理，年底便能获得一笔奖金，分发到个人，领导干部可以拿到几千元，一般职工每人也有几百元。

而小赵叔叔，是那年整个厂子里唯一因违法被警方处理的人。年底，当全厂干部职工都在眼巴巴盼着这笔奖金的时候，总公司突然下达通知：“据举报，XX厂职工赵XX在1999年X月X日违法被警方拘留，经总公司核实，取消该分厂治安稳定奖的评选资格。”

母亲说，后来在全厂职工的要求下，厂领导去总公司说明情况，但总公司领导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厂领导哑口无言：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他做的事情你们就要担责。

这明显是总公司不想给分厂发放奖金的托词，但小赵叔叔却记住了总公司领导的前一句话——“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他很高兴，逢人便说还是总公司的领导觉悟高，还记得他。

但全厂职工却记住了后一句话。

“现在看几百块钱不多，但那时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很多人已经计划好年前用这笔钱干点什么，结果因为你赵叔叔，计划全落空了……”母亲说。

当时厂里骂声一片，有人甚至说要“收拾”小赵叔叔，从那以后，便没有人愿意和小赵叔叔走近了。

8

也是在1999年，我父亲也在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创业。那年是小赵叔叔息岗在家的第三年，他每月仍旧拿着微薄的补贴，偶尔打些零工，日子已经有些难以为继了。

我父亲身边缺少人手，便问小赵叔叔愿不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干，小赵叔叔同意了。

父亲是搞技术出身，创业做的也还是技术类工作。我母亲有些担心，怕小赵叔叔干不了，父亲却说没关系："我可以带着他，慢慢学。"

但我父亲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2000年刚过，他就和小赵叔叔大吵了一架，吵到两人差点儿动手干仗，最后小赵叔叔拂袖而去，说再也不跟我父亲打交道。

提起那次吵架，父亲只是对我叹气，说自己真的想帮一下小赵叔叔，但最后却帮出了仇人："教什么都不愿意学！一个很简单的活，我给他演示了八遍，每一遍他都看两眼就说会了，然后给我搞得一塌糊涂……"

小赵叔叔依旧喜欢喝酒，却不再找我父亲喝。在酒桌上，他经常向酒友抱怨，说自己当年好歹是国营大厂的正式职工，一天工作八小时，一周工作五天，工资到点就发，"现在可好，变成给私人老板干活的打工仔了"，经常加班加点不说，还要时不时看老板脸色，"想起来窝囊得很"。

这话传到了我父亲耳朵里，他生气极了。我父亲觉得自己开给小赵叔叔的工资已经很"够分量"，远超过小赵叔叔为自己创造的价值，于是就找小赵叔叔谈了次话。不想小赵叔叔火气更大，借着酒劲和我父亲大吵了一架，新账旧账全翻了出来。

“一天工程上出了事，我带他去抢修，提前一晚通知的他，他第二天中午才来，酒都没醒。到了施工现场，我和带去的工人都在干活，就他在一旁抽烟看戏，回来之后我说了他几句，没想到他脾气比我都大！”

小赵叔叔则说，那天是周末，本该休息，天又下大雪，什么事情不能等到工作日解决?

“按他那说法，他是大厂职工，周末不出工，下雪要休息——我还是立过功的军转干部呢！身份不如他？有单位的时候啥都好说，现在自己出来谋生计，谁管你以前是干啥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还谈什么福利待遇！”

吵完这一架，小赵叔叔就撂挑子不干了。

当晚，我父亲在家跟母亲感叹说：“都是国企出来的，其实我心里很理解他，年轻时靠力气吃饭，不求上进也无所谓，厂子不垮咱就有饭吃。结果年纪大了，力气也用得差不多了，准备享受胜利果实了，厂子却突然垮了。回头看看，才发现自己啥都不会。但习惯已经养成了，再让你重新开始，难啊……”

9

时间再往后，当年息岗后离开厂子的职工，有人创业当了老板，有人炒股发了财，还有人跑货运开了物流公司。我父亲下海后赚到的钱虽不算多，但维持家庭开销后也能少有结余。

可是在小赵叔叔眼里，我们全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坏人。

直到2003年，息岗五年后的小赵叔叔才得到了“回厂上班”的通知。听我母亲说，那还是街道办与原单位反复交涉后的结果——因为小赵叔叔被查出了肝病，需要医保，可只有上班才有收入和医保，否则他连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只是，小赵叔叔人虽然回去了，但厂里却没有让他再回车间，而是让他在保卫处挂了一个名，平时就在家属区当保安巡逻。

和我父亲闹僵后，小赵叔叔跟我也没那么亲近了。后来我们家搬离了厂子家属院，大家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偶尔回去办事见到他，他也不再喊我“小么子”，而是叫我“小资本家”了。他老得很快，年轻时精壮挺拔的小伙已成了一个接近300斤的谢顶胖子，骑在一台小电动车上，几乎把车身压垮。

他会留我在他的门卫室里吃饭，还依旧喜欢喝酒，两杯酒下肚，拍着胸膛向我炫耀说，现在全家属区一共有12名保安，只有他是保卫处的“正式编制”，其他都是厂里雇来的临时工。

可我却慢慢不愿再和他聊天了，因为无论聊什么，最终都会绕回到同一个话题——国营大厂当年为什么会垮？“就是因为像你父亲这样没有集体观念的人太多，才搞垮的。”

小赵叔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以前什么人才当“个体户”？都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找不到正经工作的人走投无路了才去当，结果现在反而

这帮人赚钱了、出息了，没人肯在厂里“下力”，最后厂子垮了，他们这些为厂子奉献了青春的人都被扔到了街上，让人笑话。

有几次我忍不住和他争了几句，他争不过，便气呼呼地说：“要再来次运动，你们这些人都是‘小狗崽子’，要被送去大西北劳教的！”

我把这些话讲给母亲，母亲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以后也别和他争这个。我问母亲：“小赵叔叔以前一直在车间，怎么就去当保安了？”

母亲苦笑说：“如今，你赵叔除了保安还能干啥？改制后厂里上了自动化生产线，全是电子设备，电脑上操作，连行车都用遥控器了。回厂之后他不是没去找过领导，领导也让他学了三个月，可他就是学不会。”

“大家都是培训考证，没有资格证就不能操作。现在‘下料’用的都是机械臂，他力气再大能有机械臂大？”母亲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厂里都是绩效考核制，哪个部门都不想养闲人，他能去当保安不错了，过几年，厂里的后勤一旦交给地方物业公司，他恐怕连保安都没得当了。

大学毕业前，我又见了一次小赵叔叔。他问我想好去哪儿工作没有，我说还没，他说：“厂里有政策，正式职工的子女如果有本科学历，可以优先进厂工作，你妈也快退休了，赶紧去厂里找领导活动活动。”

他把“正式”二字说得很重，还劝我不要过于看重自己的学历，“现在想进厂工作，要么当兵，退役后父母一方单位无条件接收；要么接班，享受大国企在职职工子女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至于学历，“能有啥用？硕士博士也不一定能进得来”！

我说想趁年轻出去看看，读书也好、工作也罢，不想再走父母的老路。他就说我“没出息”“不识时务”，“以后可是要吃苦头的”。

后来听说我当了警察，他的态度又变了，说我真听他的话，捧上了“金饭碗”，这辈子不用愁了。再后来当他听我母亲说我回高校继续深造时，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说，这孩子废了，“脑袋被门夹了”。

再然后，我就收到了他患病的消息。

10

其实这些年，我家和小赵叔叔已经渐行渐远。

2013年年末的一个深夜，我正在派出所值班，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赶忙接起来。母亲在电话里说，赵叔叔因为殴打他人和故意损毁财物被辖区派出所抓了。

那天晚上，小赵叔叔在保安室里喝了酒，要去单位领导家里“讨说法”，两个同事阻拦他，他不但打伤了两位同事，还将保安室砸了个稀巴烂。派出所民警从警综平台上查到了小刘阿姨的电话，打通电话，小刘阿姨却不管，只把我家座机号码给了警察，让警察找我们。

电话是我父亲接的，他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和母亲连夜去了派出所。他们在派出所并没见到小赵叔叔，向民警询问情况，民警说小赵叔叔砸玻璃的时候自己也被割伤了，现在正在医院急救，两个被他打伤的保安同事倒无大碍，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休息了。

我父母刚松了口气，民警又说，小赵叔叔砸坏的保安室监控设备很贵，他可能要被刑拘。母亲听罢，急忙给我打电话，想问一下这种事情派出所会怎么处理。我想了想说，单位追究的话他肯定要去坐牢，不追究的话赔点钱做个检讨也就算了。“你都退休了，就别管这事儿了，联系一下保卫处的领导，交给他们去办吧。”

我实在不想父母再为这个人操心了。

那晚，小赵叔叔之所以要去找单位领导“讨说法”，是因为当天上午他得到消息，小区居民和保安同事多次举报他上班时间在保安室里酗酒，他4000块钱的年终奖金可能不保。

他当天下午便去找了保卫处领导，要求领导“给他一个说法”，领导拿出条例说，“上班期间违反规定喝酒”按照规矩就是要处罚。小赵叔叔又跟领导拿“我是全民所有制职工”说事，领导说，扣发奖金已经是看在企业老职工的面子上了，换了其他人，直接就要被开除的。

小赵叔叔越想越气，当天晚上又在保安室里喝醉了，借着酒劲搞出了之后的事端。

我父亲又去了趟医院帮小赵叔叔垫了3000块钱的医药费，小赵叔叔说发了工资马上就还。父亲表面上劝他不用着急，先把伤养好，心里却明白：这事儿厂里真追究起来，谁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领到下个月的工资了。

小赵叔叔没有去坐牢，只是被保卫处除了名。母亲说，那3000块钱医药费他后来还了，还钱那天他又来我家想找我父亲喝酒，我父亲没跟他喝。

当然，即使没喝酒，小赵叔叔还是在我家抱怨了一通，他说现在改制改得厂里的人就认钱，动不动就“罚款”“扣奖金”，他在厂里这么多年，年轻时任劳任怨，现在年纪大了，养养老怎么了？工资低不说，还没人给他面子，不就是喝点酒嘛，领导给他“上纲上线”……

我父母实在没有耐心听他抱怨，便找了个托词，把他打发走了。

后来我问父母，那晚即便前妻小刘阿姨不管，可小赵叔叔有那么多亲戚，也没道理找你们啊。父亲说，其实那晚派出所联系了很多人，但一听是他喝酒闹事，都说不管，其中包括小赵叔叔老家的亲戚，后来说赔钱的时候，更是没人出面了。

我父母也是事后才知道，其实他家里的那些亲戚早就不再和他走动了，那个小时候曾在我家借住过半个月的侄子，就在家属院的邻街和

小赵叔叔的大哥开着一家火锅店，但他们也躲着小赵叔叔好多年了。有时在街上遇到，最多也就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

“当年厂子效益好的时候，小赵老家的亲戚隔三岔五就要上他这儿来，有时在单身楼上找不到他，还找到车间去，你看现在……”母亲有些唏嘘。

新年过后，小赵叔叔的骨灰被他的女儿送回了老家，那张贴在厂门口公告栏上的讣告，很快就被别的通知覆盖了。

春节前，老家某著名公园办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公园的老照片。我想起家中有几张公园旧照，便想拉着母亲一起找一找，让他们也去参加活动。

“这不是咱和小赵叔叔一家吗？”我翻出一张照片，问母亲。

“是啊，那时多好，唉……”母亲也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叹了口气。

照片上高大帅气的小赵叔叔，刚刚去世一年。

民警深蓝之

人间赌场连载

死在赌局上的拆迁户

1

2013年年底，公安局接到举报称有一伙人在野外搭窝棚聚赌，等我们冲进现场时，赌徒们立刻像一群受惊的麻雀一样四散奔逃。赌场内一片狼藉，扑克牌、色子、饮料和各种吃食散落一地。

一个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没有像其他赌徒一样逃窜，而是依旧在赌桌前，慌乱地收拾着面前的东西。

未等他收拾完，同事已经上前把他按住，男人一边挣扎，一边嚷嚷着“等一下”，好让他把赢的钱先装起来。

我还从没见过在这当口还忙着收钱的赌徒，感到有些好笑，于是便走上前去，拍了拍男人，说：“你别忙活了，这些钱都是赌资，最后免不了被没收，落不到你口袋里的。”

男人吃惊地看着我问：“一点都不留？”

我点点头。男人四下看了看，猛地抽出一沓钱塞给我说：“通融一下……”

我笑着指了指肩膀上的执法记录仪，说：“全程录音录像，你别指望了。”

男人的脸上满是失望，很不情愿地被同事带到墙边蹲下。民警在桌边拍照、记录固定证据，而男人的眼睛始终没离开桌上的那堆钱。

回派出所的路上，男人一直在车上小声骂人。虽然听不清他骂些什么，但我心里明白，他是心疼桌上那堆刚刚赢到却没来得及收起来的现金——那一堆百元大钞，足有好几万。

那次行动，我们一共抓了17名赌徒，当场查获的赌资将近百万。组织者被判刑，一众赌徒也根据参赌情节的不同，分别被治安拘留或刑事

拘留。

那个男人人称老马，询问室里，别人都在极力辩解自己“没带多少钱，只是玩玩”的时候，老马却使劲儿在向民警证明，当时面前的那堆钞票“都是自己的”。

那天他带了两万赌本，赢了不到三万。结案时，老马不仅没有得到那笔“横财”，还给自己换来一场牢狱之灾。

出狱之后，老马经常给我打电话，说要公安局把那笔钱“还给他”：“网上不是说罚了就不‘蹲局子’，‘蹲局子’就不罚吗？我蹲了局子，你们为什么不把钱退给我？！”

我只好跟他解释：赌桌上的钱无论是赌本还是赢来的钱，都属于赌资，按照法律规定，已经罚没并上缴国库，没有“退给他”这一说。

老马见在电话里跟我磨叽没有效果，又退而求其次，说赢的钱不要了，只把本钱退给他就好。我还是说不行，他气得直用当地方言骂娘。

后来，他又跑到省厅去申请复议，但结果还是一样没能要回钱来。硬的不行，老马只好改用软的，隔三岔五打电话求我：

“警官你看，我打工也不容易，在外一年也挣不了三五万，你们这一下搞得我一年都白干了，求你多少退我一点好不好……”

“我老婆问我要钱，说没有钱她就不跟我过了，你就退给我一点吧……”

最后，他干脆跑到派出所门口天天等着我，我去哪里他便跟去哪里，只要有机会拦下我就是一通好话求情，领导开玩笑说：“小李你从哪儿找了这么个跟班？”

我都要被他气笑了。

2

老马是本地人，50多岁，高高瘦瘦，一直在外地打工，没有特殊情况，每年只有春节才回来。

离上一次“血本无归”没几个月，2014年春节的时候，老马又被我抓住一次。那天，他和几个牌友躲在一间饭店包厢里玩“翻撇”（一种赌博形式）。我刚进屋，就被老马一眼认出，他表情错愕，怔怔地看了我很久，手里的牌都忘了丢。

在派出所讯问室里，老马又冲我嚷嚷，说我是“扫把星”，他今天输了不少，刚刚“来火”（转运）开始赢钱，就又被我“戳了局”。同事听他说得不像话，吼了他一顿，他才悻悻地闭上了嘴巴。

同样的处理程序，一桌赌资都被没收，然后是十天的治安拘留。那次，老马又损失了大概两三万，不过这一次，老马没有再找我说退钱，只是私下里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黑皮狗子”。

老马的家在我管片的边缘、国道旁的一片城乡接合部里。我去过他的住处，那是一个破败的院子，不大，屋顶上已经长了草。院子是老马岳父母传给他们夫妻的，几十年没有变过样子。岳父母去世后，老马和妻子在外打工，便把院子租了出去。过年时，租户退租回家，老马妻子为了不空着房子，便又短租给了附近养殖场看牲口的留守工人，老马一家和他们挤在一起，院里堆满了各种东西，充斥着各种味道。

老马家的房子在附近属于破败得比较显眼的，连同村“五保户”的房子都比他的好。不熟悉老马的人以为他家里很穷，但熟悉老马的人说，他其实是一个蛮能干的人。

老马给旁人留下的印象是“做起活来肯下力，手底下也精巧”。朋友说他年轻时南下广东做服装箱包，后来跟着建筑队北上盖大楼，深得老

板的赏识，其实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但就是留不住——全赌出去了。

“他这家伙，就不能回老家过年，一回来就赌，一赌就输。只有一年工地上忙没有回家，才终于攒了一笔钱。但没想到第二年回家，又输进去了。”

老马的妻子和他一起在外打工，提起老马，语气可怜中带着抱怨。她说与丈夫在外打工赚钱很辛苦，日常生活也很节约，有时甚至可以称得上抠门：

“只要有钱挣，真是什么活都干，也不管什么危不危险、累不累，经常在工地上和那帮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抢活干……

“2008年，他在工地上伤了腿，包工头带他去医院，结果他对人说把医药费折现给他就行。包工头没法子，给了他两万块钱，他也没去看病，拖着伤腿换了一个地方接着干，到现在走路还是一瘸一拐……

“他在夜市上买双袜子能跟人砍半小时的价，衣服破了补了又补就是舍不得扔，生了病五毛钱一粒的感冒药都不舍得买，每次都是硬扛……”

日常生活异常节俭的老马，与牌桌上一掷千金的老马，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

挣得多花得少，一年到头自然能攒下一笔钱。每年年底回家时，老马的银行卡上基本都会有几万块存款。妻子说，那是老马一年到头最得意的时候，坐在返乡火车上，都会看着手机上的银行卡余额短信乐个不停。

但每年老马也就高兴那么一会儿，因为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在牌桌上瞪着被香烟熏得通红的双眼，看着这笔钱一沓一沓地装进别人的口袋。

我跟老马妻子说，你是他老婆，这钱是你们家的财产，他这么好赌，你也管管她呀。老马妻子则苦着脸说，多少年了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年轻时吵也吵过了，打也打过了，都这把年纪了难道还为这个离婚不成？

一次，我劝老马说，你五十多的人了，打工在外走南闯北经过不少事儿，也应该知道有句话叫“不赌为赢”，辛辛苦苦干一年，好不容易挣点钱，平时连片感冒药都不舍得买，一回来过年在牌桌上半天输个干净，竹篮打水一场空，何苦呢？

老马可能觉得被我这个和他儿子差不多大的年轻民警“教育”，脸面上挂不住，犟着脾气说：“我愿意！钱是我挣的，怎么花是我的事儿，要不是这两次被你抓住，我不知道能赢多少！”

我有些生气，冷笑了一声，说：“老马那咱走着瞧，在我片区，你只要还上牌桌，我就盯着你搞。”

3

老马属于村里出去打工早的那批人，是村民们口中“有本事”“赚到钱”的那群人中的一个。与他同一年代出门打工的村民，现在有的在村里起了高屋大院，有的在市里买车买房，甚至有人回乡之后做小生意当起了老板，只有老马，这么多年生活依旧没有什么起色。

老马有一儿一女，女儿几年前嫁到了外地，过年也不怎么回来，听说和老马关系不太好，原因还是他好赌——当年女儿结婚时，老马没钱置办嫁妆，男方送来了几万块彩礼钱，老马本来答应用这笔钱给女儿买辆车当陪嫁，结果却在赌桌上输了个精光，搞得女儿在婆家一直抬不起头来。

儿子小马在北京打工，还没结婚，也是过年才回老家。说起父亲，小马同样一脸的无奈：“你说，我们一家三口都在打工，按说，即便发不了财，日子也应该过得去，和我们一同出去（打工）的人家，至少已经在老家盖了新房子，我爸年年说‘明年赚钱造房子’，年年到了关口都没有钱，我说我出钱来造吧，我爸又生气。”

在当地，父亲给成年后的儿子盖一栋像样的婚房，是几辈子不变的“规矩”，但凡在村里有点“体面”的人，都会竭尽所能地履行这个“义务”。

和老马聊得多了，我知道他也急在心里，他总是不住地哀叹自己时运不济，混了大半辈子，到现在也没能给儿子盖个婚房，导致儿子至今没娶媳妇。

但老马也总反复跟我念叨几个故事：

“2002年，我在北京工地干木工，和我一起做活儿的那个小胡，一年开了三万块工钱，临走那天晚上和工友们打牌，一晚上又赢了三万块，人家当年带着六万多回的家……

“2007年，我在西安干工地，一个叫‘红狗’的家伙，一直和我在一起，说是挣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后来有一年就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那年过年在老家打牌，一个春节就把盖房子的钱赢够了……

“2010年，同村的张军打工回来，在火车站用两块钱买了一注彩票，结果中了十几万，一下在村里就扬眉吐气了……”

他也想着学那几位工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靠着节日里的一手好牌，改变多年窘迫的境遇。老马也学张军买过彩票，但后来发现中“十几万”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便把目光放在了牌桌上。

原本过年期间牌局就多，外出辛苦一年的村民们大多手中有些积蓄，又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大都呼朋唤友相聚在牌桌前。当然，也有一些人更希望通过自己“豪迈”的牌风，向周围人证明自己这一年“赚了不少”。

节日的牌局在老马眼里，既是“证明自己”的“场面”，又是发家致富的“机会”。但村民们说，其实他们不太敢跟老马同桌打牌：一是老马“玩得大”，动不动就是50块、100块“起底”，有时一局输赢几百上千，“都是朋友，赢他钱的时候蛮不好意思，输给他钱的时候心里疼得像是割去块肉”；二是老马的牌局持续时间太长，“要么自己带的钱输光，要么把别人带的钱赢光，不然他绝不下桌”。

后来连亲戚朋友都不怎么跟老马打牌了，老马也觉得村里的牌局打得不过瘾，便开始四处搜罗参加一些野地里的非法赌局，时间一长，一些以赌博为业的人开始主动招呼老马。亲朋同乡之间的牌局多少还有个限度，大家看在相识的分儿上，一般也不会玩得太过，但野地里的赌桌上都是奔着发财来的陌生人，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也寻常可见。

赌场上的庄家们为了赚钱，往往不择手段。2010年年底的一天，老马的“火”特别好，赢了庄家将近10万块钱，结果“开课”的“校长”指使马

仔，以老马“耍诈”为由，将他打了一顿，然后扔到了几公里外的水沟里，他身上带的钱也被赌场“没收”。

就这样，一年辛苦攒下的几万块钱，永远也经不住老马返乡后的几日冲动。连老马也承认，自己也曾赢到过钱，但却根本“守不住”，往往钱在手里还没攥热，便又输了出去，年年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4

2015年春节，老马提前一个多月回到了老家，走起路来器宇轩昂，一看就是又有钱了的样子。

原来，2014年年末，市里下达的“次年旧城改造规划”中，老马家的院子被划进了新城区建设的规划图纸中，按照往年经验，他应该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拆迁补偿。

年底和拆迁关口都是辖区赌风猖獗的时候，以往也并非没有过居民输光存款和拆迁补偿后走上绝路的案例。因此那年年底，局里下文件，要求各派出所严厉打击辖区赌博之风，对那些有过滥赌前科的人，民警必须提前做好工作。

明知道老马烦我，我还是去找了他一次。站在老马家的院子里，我说老马这回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老房子拆迁，按照目前政策，差不多能在市里分你三套商品房，你和老婆住一套，儿子结婚用一套，还能留下一套租出去赚租金：“今年可别赌了，好好规划一下你的钱该怎么花吧！”

有了好消息，老马的儿子和女儿自然都回家来过年，老马破天荒地买了一套体面的新衣服，笑意全写在脸上。听我说话，老马一个劲儿点头，说以前打牌是想借着“火”好赢点儿钱，一步到位把房子、儿媳妇都搞定，“现在房子有了还打个么斯牌！”

说完，老马头一次塞给我一包烟，我一看，是45元的黄鹤楼硬珍品，心想，老马这回真是发财了——要知道，以前他抽的烟从未超过5块钱，每次把他带到派出所，都是他找我要烟抽。

临走时，老马妻子送我出门，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嘱咐她这段时间看好老马，眼看一大笔补偿款年后就要到位，一家人境遇可能就此改变，千万别出乐极生悲的事情。

老马妻子点点头，说今年打工赚的钱大部分在她手里，只给老马留了一点儿零花。儿子女儿也交代了周围的亲戚朋友，今年绝不能跟老马一起打牌，不然老马输多少他们就去要回多少。

我这才点点头，离开了老马家。

后来的日子里，派出所按要求组织辖区扫赌，我也确实没有再抓到过老马。同事纳闷说今年在牌桌上怎么没见到老马，我还为他辩解，说老马赌钱是为了赚钱翻盖房子，现在新房子已近在眼前，干吗还要赌?

同事却一脸不屑："小李你有时简直单纯得不像个警察，我这么跟你说，老赌棍改不了的，老马今年肯定还会赌，而且会玩得更大，你信不信？"

我不信。

同事说："那咱打个赌吧，就赌半个月的早餐，肉夹馍配羊肉汤！"

5

那年进了腊月，辖区小广场边的岔路口旁，经常停着一辆破旧的中巴车，挡风玻璃上挂着“XX市—XX县”的牌子，像是一辆等客的县际客运车辆。

起初我没怎么注意这辆车，有几次看到老马一瘸一拐地上了车，我以为他年前要去邻县走亲戚，还跟他打招呼，他却哼哼唧唧地扭头就走。

我没当回事，但没过多久，市运管办的执法人员就找到交警队和派出所来，说怀疑那台车有问题，因为本地运管办的档案里并没有那台车的资料。运管办还说，最近街面上传出风声，说那台车是隔壁县一个地下赌场专门来我市拉客的套牌车，因此运管办要求与交警队、派出所搞一次联合执法，把那台车找出来，查个明白。

我忽然想起老马匆匆上车和见了我扭头便走的样子，心中暗叫不妙——不单是心疼自己要请同事吃半个月肉夹馍配羊肉汤，更要命的是，按照以往经验，这种拉客赌博的“场子”一般都是“杀鸭子”式的——赌局大不说，而且只要赌客进去了，基本不输光不会出来。此外，“场子”里面一般配套有“放码”的人，即便赌客输光手里的现金，还可以当场借高利贷。

就老马那性格，估计这一去就凶多吉少了。

果然，市局治安支队接到通报还在调配警力，辖区医院急诊科的电话就打到了110指挥中心。那天，我接警赶到医院，保卫科的干事对我说：“一辆面包车送来一个男的，说是犯病了要抢救，急诊医生上去一看，人都已经僵了，还救个毛线，转头想找那辆面包车，却发现它跑了。”

“送来的人呢？”

“还在急诊室躺着呢！”

我随保卫干事走进急诊室，掀开白布单，一眼认出了老马。

送老马来的那台面包车用的是真牌照，我们顺线追踪，案子很快就破了。在邻县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开设赌场的一干人等被抓获归案。经讯问得知，开设赌场的老板知道年关将近，很多外出打工返乡的村民手里攒了一年的钱，数额不少，加上年后我市有几个行政村要拆迁，很多村民会发一笔“横财”，因此铤而走险，组织了一批人开起了赌场。

坐在讯问室里的赌场老板承认，老马确实是倒在他的“场子”里的，他知道老马家离这儿不远，怕给自己惹是非，便派赌场“马仔”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抢救，又因为怕警察追查，一听说老马死了，赶紧让“马仔”溜走了。

法医鉴定说老马以前有心脏病史，死因是心脏骤停，估计是死前受了很大的刺激。我问赌场老板怎么回事，他交代说，自己只知道老马那天十分亢奋，最后一把“梭哈”，输得不轻。

后来抓获的其他同场赌徒笔录，也印证了赌场老板的说法。

出事之前，老马已在赌场里熬了三天三夜，先是输光了带去的现金，然后找“放码”的人借高利贷，要用那三套拆迁后的回迁房做抵押。“放码”的人知道年后拆迁的消息，也明白老马现在的“身价”，二话不说把钱放给了他。

老马拿到钱继续上桌，开始赢回了一些，但后来却一直输。眼看三套房还剩一套，老马心里开始鼓噪。最后一局，他可能感觉自己手中的牌不错，急于“赶本”，索性把桌上的钱一把“推了”。

“那局他要是赢了，不仅三套房全回来了，还能再赚辆好车！”

然而，开牌之后，老马却一头栽在了牌桌上。

“他本来觉得自己稳赢，没想到牌就差了一点点，结果全完了。”

我拿着做好的笔录让赌徒看一下，签字捺印。他看到笔录抬头上写的讯问民警姓名时，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就是李警官？”赌徒问我。

我有些诧异，不知他问这个做什么，点点头，把警官证亮给他看。

“嗨！老马最后那把推牌之前还说呢，这会儿可千万别遇到那个‘黑皮狗子’李XX来抓赌。之前邪了门，自己以前几次要赢钱了都被李XX‘戳了局’，这会儿要是再遇到他，自己可是‘掉得大’（亏大了）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冷笑一声，不再搭理他，开始心疼输给同事的那半个月早餐。

我被发小坑了一百万

2008年7月，17岁的高中生梁冰被人杀死后抛尸在稻田里，案发当天，杀害梁冰的凶手杨平便被缉拿归案，他被捕时，说自己压根儿没想跑。

45岁的杨平称，案件事出原因是梁冰之父梁德江骗取了他上百万的财产后不知去向，他本想控制梁冰，逼问出梁德江的去向，不料在控制过程中却失手致其死亡。

一周后，梁德江被警方缉拿归案，对自己诈骗一事供认不讳。次年4月，杨平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法院判处死缓，梁德江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14年11月，我偶然接触到这个案子，便向同事询问当年的案情，亲历过那起案件的同事在值班室给我讲述了经过。

1

事情得从梁德江和杨平的关系说起。

梁杨两家是世交，从父辈起便在一个单位共事，两家住得也很近。梁德江和杨平年龄相仿，同年上学，同年入读技校，又同年进厂上班，在同一个车间做了十几年同事。身为发小，杨平结婚时是梁德江做的伴郎。2000年前后，梁德江买断工龄后离开单位，在市里盘下了一家店面卖羊蝎子火锅，杨平不仅资助了他3万块钱，还借着自己在单位行政科工作的便利，给梁德江拉去了不少客源。

除了餐饮，梁德江还在火锅店后院包间里放了一些自动麻将机，用来招揽客人。开始时梁德江曾提议把麻将机的“服务费”算作杨平的“红利”，杨平并没接受：“你开店借了外面不少钱，还是先回本还了外债，咱兄弟之间不着急。”

不过，三年之后，梁德江的火锅店还是关张了，清完店面，梁德江交给杨平1万块钱，说自己这次赔了不少钱，现在暂时只有这么多，让杨平先拿着，剩下的钱自己再想办法。

杨平没有收那钱，对梁德江说：“你店子倒了现在也没个生计，钱先拿着应个急吧。”当时梁德江的确有些捉襟见肘，听杨平这么说，便拿着这1万块钱去了外地，说是出去闯闯，看外面有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梁德江这一走便是四年多，其间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和妻子办离婚手续，另外一次是老母亲去世——每次都是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

梁德江刚离家时，儿子梁冰跟母亲生活，梁德江离婚之后，梁冰便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奶奶去世，爷爷身体也不好，梁冰的生活便出

了问题。梁德江饭店垮掉后，家里的亲戚基本都不走动了，那些年，全靠杨平一直帮他照应着父亲和儿子。

按理说做生意难免有赔有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梁家的亲戚为此断了联系，我不太理解。

同事解释说：其实，那时候梁德江外出“找赚钱机会”是假，躲债是真。他开火锅店没能攒下钱，反而背了一大笔债务，债主经常闹上门，找不到梁德江，便去找他家亲戚，亲戚们不堪其扰，便纷纷和梁德江一家划清了界限。

“咱这儿做别的我不敢说，但开饭店基本是赚的。羊蝎子火锅成本不算高，另外不是还有杨平给他在公家单位拉客源嘛，梁德江怎么会欠下那么多钱？”我还是不解。

同事叹了口气：“还记得刚才我给你说的梁德江在饭店后院放自动麻将机的事情吗？事情就出在这些麻将机上。”

2

本地人在饭店等人或等菜时，喜欢先“凑一桌”麻将，吃完饭若没“第二场”，也喜欢再来几圈麻将。大家也习惯到饭店包间里打麻将，一来包间安静，二来玩到饭点可以直接吃饭。

梁德江抓住了本地人这个习惯，安置那些麻将机本也是为吃饭的客人免费使用，只打牌不吃饭的客人，则一小时收10块钱“茶水费”。

但渐渐地，麻烦就来了。

本地人玩麻将的打法叫“跑晃”，经常换人。起初，生意不忙的时候，本身也喜欢打牌的梁德江也会上手玩几局。奔着吃饭来的客人，牌桌上基本都是一起来的熟人，很少缺人，因此梁德江参与的大部分牌局，牌桌上都是只奔着打牌来的家伙，里面既有来消遣的普通人，也有一些职业赌徒——赌徒们觉得火锅店包间比麻将馆更“安全”，门一关，打多大“底”自己说了算，即便偶尔遇到警察“临检”，还可以推说自己是来吃饭的。

梁德江渐渐和这些赌徒玩到了一起，先是麻将、“斗地主”、“跑得快”，再后来就是“翻撇”“斗牛”“诈金花”。没多久，梁德江便基本不再过问店里的生意，早上一开门，便钻进自家包间里，一心一意赌博。

“他一开始先输‘茶水费’，之后输饭钱——吃饭免单，再后来便真金白银地输。”同事说，“现钱不够的时候，就让牌友们去前台拿东西顶账。据他自己说，前后一共输了十几万，这还只是现钱，给人免单的饭钱和被人拿走的烟酒就更算不过来了……”

梁德江的妻子平时在厂里上班，全然不知丈夫在店里赌博的事情，直到后来发现账上的钱越来越少，最后连家里的存款也都无故减少，才

觉得不对劲——火锅店一直以来几乎每晚都宾客盈门，怎么会越干越亏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德江的妻子来店里找丈夫，方才发现了赌博的秘密。为此，妻子和梁德江大吵了一架，梁德江也当场承诺不再参赌，妻子控制了家里的“财政大权”，之后才消停了几个月。

可火锅店后院的牌局还是天天开，梁德江在前院心痒难耐，最后还是耐不住性子，没事儿便跑到后院“看牌”。手里没钱，也不能上桌，牌瘾上来，他只能在一旁急得抓耳挠腮。

牌友笑他“大老爷们治不了自己媳妇”，也有人给他出主意，说牌桌上不必全付现钱，都是“兄弟伙的”，可“赊”、可“借”。

“‘赊’就是在牌局上打‘现金条’，一张条子1000块，先欠着，等有了钱再还。‘借’就是找放码的人借高利贷，这些职业赌徒大多认识一些放码的人，一个电话就能拿到钱。”同事解释说。

说回来，也就是因为梁德江的火锅店在那里，所以赌徒们并不怕他跑路不还钱，才纷纷给他提供“门路”。

就这样，梁德江又被拉回了牌桌。

3

“按说梁德江在自己的地头上打牌，应该也算是个‘庄家’，结果却输得一塌糊涂，这‘庄家’当得也是有性格啊。”我笑道。

“他算个屁‘庄家’，就是一傻X！”同事说，梁德江的牌友里有几个以赌博为业的家伙，从梁德江重新坐到牌桌上起，他们便认定，这个人“有的搞”，于是便开始想方设法给梁德江“做笼子”。

之后的牌局上，梁德江一直输多赢少，即便有时赢了，过不了几局便又输了回去。为了“赶本”，梁德江先是偷偷找亲戚朋友借钱，后来实在借不到，便在牌桌上打“现金条”、借“码钱”。

“前后又借了十几万吧，后来越输越多，他也彻底没心思管生意了。之前还只是在饭店包间里打，后来饭店被人举报涉赌，派出所抓了几次，没收了麻将机，梁德江便开始跟人跑出去玩。”

到2003年10月，梁德江的火锅店彻底维持不下去了。店面一垮，债主们便纷纷找上门来，其中有以前借给他钱的亲戚，但更多的都是赌博时放贷给他的人。

牌桌上永远翻脸不认人，不论梁德江如何承诺自己有了钱一定还，牌友们仍旧不依不饶，走马灯一样上门讨债。“当时派出所出他家的警比吃饭还勤，有时是家里玻璃被砸，有时是门上被泼油漆，有时是家里电线被剪断。虽然抓了一批，但该来还是来。”

后来梁德江没办法，只好去了外地，名为赚钱实为躲债。他走后第二年，不堪债主骚扰的妻子便和他离了婚。

梁德江在外躲债这四年，没人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甚至连他的父母都不知道他的行踪。找不到梁德江本人，债主们便继续骚扰一切曾经和他有关系的人，甚至连“发小”杨平也受到骚扰，梁德江

的母亲最终在这种日常的惊恐和对儿子的思念中郁郁寡欢，黯然离世。

在他人间蒸发的时间里，当年的牌友和放贷人，有的在之后的严打中落网，有的慑于公安机关的压力外逃，剩余的也只能逢年过节悄悄去梁德江父亲那里窥视一下，看他有没有悄悄回来——其实也没抱什么希望。

谁都没想到，当四年后梁德江重新回来时，他已经俨然换了另一副模样。

4

2007年年底，梁德江回来了，很快便被消息灵通的债主发现。债主们闻讯拿着欠条纷纷而至，本以为梁德江会继续耍赖，但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拿出钱来，当场清了一部分债务，并承诺剩下的很快就还。

从那时起，关于梁德江的传闻便层出不穷：有人说他在外地做工程发了财，有人说他在外地做生意赚了钱，甚至有人猜测他是买彩票中了奖。

对于这些传闻，梁德江一概不予回应。

送走债主之后，他专门带着5万块钱来到杨平家，说其中3万是以前杨平借给他开火锅店的本金，另外两万是这几年的利息。

杨平很高兴，一是发小终于平安回来了，二是之前原以为打了水漂的钱也回来了。那天梁德江还请杨平一家去市里最好的饭店吃饭，感谢在他离家这些年里杨平对他家人的照顾。

当时杨平的日子不过是小康有余，杨平夫妻俩在同一家单位上班，杨平是个中层干部，单位效益还不错。杨平的女儿还在本地中学读高二时，夫妻俩就已在武汉市贷款买了房，为女儿今后去武汉发展提前做好了准备。

即便如此，杨平仍对梁德江的境遇十分好奇。在吃饭时，杨平问起梁德江，是从哪儿寻到的“财路”？梁德江只是神秘地笑笑，并没有当场告诉他。杨平也不再多问，大家在推杯换盏中热热闹闹地吃完了那顿饭。

“后来杨平说，当时他很想知道梁德江的‘财路’，因为他虽然眼前不缺钱，但心头也有一件烦心事……”同事说。

杨平的女儿学习成绩一般，想考上武汉的好大学还有些难度，眼看要读高三了，杨平夫妻二人盘算着，如果女儿考不上武汉的好学校，干脆直接送出国去。可那样的话，需要一大笔开支，所以那段时间，杨平一直在琢磨去哪儿再弄点“外快”。因此，酒席上，杨平多少也暗示梁德江能否也带带自己。

“梁德江告诉他了？”我问同事。

同事点点头。

几天之后，梁德江又专程找了一次杨平，真给他带来了一条“赚钱”的门路。杨平当时很高兴，觉得梁德江够意思，发了财也没忘了兄弟情义。

但令杨平没有想到的是，他眼中“知恩图报”的“好兄弟”，却给他设下了一个致命的圈套。

5

梁德江直截了当地告诉杨平，自己在外省做的“投资”，就是拿出钱来给到赌场“放码”的人手里，由他们出面放给来打牌但输光了钱的人，后面由“放码”的人负责追债，“利息”双方分成。

杨平一听是这种“财路”，连连摇头，说：“这哪是什么‘投资’？不就是去赌场放贷嘛，赌场里那帮人复杂得很，咱老百姓哪儿敢和他们打交道！”

梁德江说，一般人确实不敢和赌场打交道，但他之所以敢，是因为认识一个专门在赌场放码的“生死之交”，但具体是怎么个“生死之交”法，梁德江说以后有机会再跟杨平解释。

梁德江又说，自己现在大概“投了二十几万”，杨平问他为什么不先把身上背的债清了，梁德江却说，欠债不着急，这个“投资”很有赚头，到时候，单是用那二十几万的“收益”就够清账的。

按照梁德江的说法，假如把1万块交给放码的人，“砍头息”2000归赌场，借贷者实收8000元，一周后归还15000，放码者和杨平各分2500。如果投的钱多，这个分成比例双方还能商量。

杨平听说过赌场高利贷利息高，但没想到会高到这种地步：“这样算的话，一个月本金不就翻番了？”

梁德江连连说是——所以他现在才不急着拿“本金”还债。

杨平又担心这种“投资”涉嫌违法，梁德江就解释说，人家搞“投资”的人早就把法律条款研究得炉火纯青，这个就是单纯的借贷生意，把钱借给“放码”的人，就像借给做生意的人一样，是同样的性质：“真要是有人来查，就说自己只是把钱借出去了，不知道对方具体做什么，这样就不怕违法了。”

梁德江又说，退一万步，即便“有可能违法”，这个收益率也值得杨平“搏一把”，现在外面讲究的是“高风险高回报”：“存银行倒是不违法，但那点利息能顶什么用啊？”

见杨平还是有所顾虑，梁德江就提议找机会带他去和自己熟悉的“放码大哥”见个面，到时如果杨平觉得人可信，可以先拿点“小钱”出来试试。

那天杨平最终没表态，含含糊糊送走了梁德江后，自己在家考虑了一整夜。但几天后，当梁德江打电话通知杨平一起和“放码大哥”吃饭时，杨平还是去了。

6

在饭店门口，杨平见到了梁德江口中的“放码大哥”，他的衣着和座驾无声地展示着雄厚的“财力”；酒席上，“放码大哥”自称姓唐，听口音是四川人，言语中时时透露着自己的“势力”和“关系网”。“唐大哥”也说自己和梁德江是“生死之交”，所以“梁德江的好兄弟就是我的好兄弟”。那晚杨平也一直在说客套话，双方自始至终没有谈“投资”的事情。

酒足饭饱后各自散去，之后的几天梁德江都没再联系杨平，反倒是杨平自己有些坐不住了，主动打电话找了梁德江。

梁德江好像明白杨平的心思，在电话里直接把话点破了，杨平也就不再遮掩，说自己想了想，觉得这个“投资”可以试试。梁德江问杨平打算投多少，杨平说先拿1万块钱试一下。梁德江有些为难，说现在找“唐大哥”的人很多，一般10万起步，但他可以帮杨平去说一下，让杨平等消息。

又过了两天，梁德江告诉杨平，看他的面子，“唐大哥”最后同意了。之后他给了杨平一个银行账户，让杨平把钱转过去，又要了杨平的银行账户，说过后会把“本金”和“收益”给杨平打回来。

杨平后来跟我的同事说，自己当时也就是抱着“真的赚个零花钱，假的买个教训”的心态，给“唐大哥”的账户转了1万块钱。一周之后，他就接到“唐大哥”的电话，说这笔钱已经连本带息收回来了，问他还要不要继续做。

杨平心中有些忐忑，说自己“先不做了”。很快，1万块本金和2500块利息便回到了他的账户里。

杨平先是一阵惊喜，但同时也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提现，因此过了几天又跟梁德江说自己改了主意，还想继续“投资”。梁德江也没说

什么，只是让他把钱再打回“唐大哥”账户里，杨平照做。

之后的一个月，杨平每周都能收到2500元的“利息”，当账户里的“利息”达到1万块时，他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兴高采烈地打电话给梁德江，说想摆酒答谢他和“唐大哥”给自己提供了这条“财路”。

梁德江说“唐大哥”这段时间在外面有“业务”来不了，他和杨平都是“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吃饭就不必了。

杨平又说，自己还想“加码——加到10万”。

几天后，梁德江回复杨平说，“唐大哥”同意了。

7

杨平很快又将9万块打进“唐大哥”的账户里，一个月后，他的账户里多出了10万块钱。

“杨平做事十分谨慎，开始时他也提心吊胆，担心梁德江和‘唐大哥’那边有什么差池，因此当那10万块钱‘利息’到账之后，他又把‘本金’提了出来。”同事说。

提现过程异常顺利，当杨平说出提本金的要求后，很快收到了银行短信，显示20万全部回到了他的账户。

这下杨平彻底对梁德江和“唐大哥”深信不疑。没过多久，大概是2008年3月，杨平联系梁德江，说自己打算“继续投资，本金20万”，但梁德江却拒绝了。

这大大出乎杨平的意料，他问原因，梁德江说现在“唐大哥”那边“生意”做得很大，为了“规避风险”，50万以下的“投资”都不再涉足。梁德江还隐晦地表示，之前两次，“唐大哥”都是看在杨平和自己的关系分儿上给杨平“破了例”，但杨平的做法却让“唐大哥”感觉杨平不相信自己，没把他当“兄弟”。

杨平赶紧向梁德江道歉，说自己平时谨慎惯了，不是怀疑“唐大哥”，让梁德江帮自己去解释一下。

“那个时候，杨平其实已经‘着道’了，他对梁德江说，如果‘唐大哥’同意继续给自己做‘投资’，他愿意接受规则，拿50万出来。”同事说。

这时梁德江劝杨平说，如果真的相信自己和“唐大哥”，“不如一次性拿一笔大的，赚够算了，省得以后再提心吊胆”。

恰好那时，杨平女儿的“二模”成绩很不理想，杨平夫妇送女儿出国读书的念头也变得越发强烈。女儿留学的理想国家是英国，大学期间的各种花销总共加起来，大概需要100多万。杨平算了一下家里的存款，远不够女儿的留学费用——武汉那套尚在还贷的房子加上家里股票基金之类的理财产品，全卖了的话倒也能勉强够数——但那样的话，今后一家人的生活便捉襟见肘。

最后，杨平也觉得梁德江建议的“一竿子买卖”挺好，按照他们之前给出的“收益率”，100万放一个月就能翻一番，而且金额高了“收益率”还能谈。于是他狠了狠心，跟梁德江说自己决定这次就投100万。听说杨平要把全部身家拿出来做“投资”，梁德江劝他再考虑考虑。但杨平说不用考虑了，女儿留学这事儿能不能成，就看这笔“投资”了。

梁德江不久就回复杨平说，“唐大哥”同意了，而且“收益率”给他涨到30%，也就是说，本息收益将高达220万——不仅女儿的学费解决了，杨平还能落下一大笔钱。但同时，梁德江也告诉杨平，一次性投入100万，虽然“收益率”上涨，但利息和本金的回款速度可能要慢一些，毕竟催要百万债务“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完的”。

杨平问回款速度会有多慢？梁德江说：“利息大概半月一结吧。”

杨平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手中的股票基金全部卖掉，把武汉的房子抵押出去，凑够100万，打进了“唐大哥”的账户。

8

“杨平的家人知不知道他做这种‘投资’？”我问同事。

“知道，杨平拿这么大笔钱出来肯定会惊动家人。第二次加码那9万块钱时，杨平的老婆就出面阻止过。”

自从梁德江赌垮了饭店之后，杨平的妻子一直对梁德江的印象不好，她觉得赌徒的嘴里没实话，即便是“发小”，如今沾了赌，丈夫也理应和他拉开距离甚至划清界限。

“但人性的弱点就在于经受不住现实的诱惑，谁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但当真金白银摆在面前时，之前的一切怀疑和恐惧都会烟消云散。”同事叹了一口气。

第二次回款，杨平账户上的20万余额彻底打消了妻子心中的疑虑，梁德江在她眼中，也从一个满嘴谎言的赌徒变成了一个“知恩图报”的好人。

2008年4月1日，杨平向“唐大哥”账户里打进100万“投资款”，按照约定，当月15日，他应该收到第一笔两期合计60万的“利息”。

4月6日，杨平还跟梁德江通过电话，旁敲侧击地问他“回款”有没有问题，梁德江信誓旦旦地说让杨平放心，“等着收钱就行”。

4月15日那天，杨平不停地查询银行账户，却迟迟没有等到那笔钱。他着急起来，打电话给梁德江，才发现手机已经打不通了。杨平又慌忙跑去梁德江的老父亲家里，却发现老人和梁冰也在四处寻找梁德江——原来杨平并不是唯一通过梁德江“投资”的人，在梁家，他见到了四五位和他一样境遇的人，只是金额没有他多。

杨平想都不敢想自己是被骗了，也不敢跟妻子说联系不上梁德江。直到那一刻，他仍自我安慰说，梁德江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没来得及跟自己联系。他疯狂地拨打梁德江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又把“投资”原委告诉梁德江父亲，老人也只是绝望地告诉他，自己确实找不到儿子，而且他自己也是不久前才知道，“家里的房子都被梁德江抵押出去了”。

杨平报了警，他跟警察说自己借给梁德江一大笔钱，现在找不到梁德江了，警察问他借款细节，杨平担心自己借钱给人在赌场“放码”会触犯法律，隐瞒了实情。警察不知内情，只能告诉他，公安机关不涉足借贷关系，建议他去法院直接起诉。

时间一天天过去，妻子不断追问杨平那笔“投资”怎么样了，杨平又急又气，但又束手无策。

整整两个月，梁德江都没再联系过杨平，杨平的账户也没有收到过一分钱“利息”。杨平终于面对现实，承认自己被“好兄弟”骗了，工作几十年的全部身家都没了。

“杨平归案之后说，他那段时间一边寻找梁德江，一边找律师打听去法院起诉的事情，律师也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照以往经验，就算找到人，他的钱应该已经被梁德江骗走挥霍了……”同事说。

女儿的留学成了泡影，武汉的房子抵押期满无钱赎回，老婆开始与杨平无休止地争吵。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杨平的怒火与羞愤无处发泄，怎么也想不通曾和自己亲如兄弟又受过自己慷慨照应的梁德江为何会欺骗自己。他想到了梁德江的儿子梁冰，他见过梁德江有两部手机，还记得梁冰曾给梁德江另一部手机打过电话，因此杨平坚信梁冰手里有能够联系上梁德江的办法。

杨平找过梁德江父亲，但梁德江父亲坚称孙子也联系不上梁德江。

最终，杨平在学校门口带走了刚刚放学的梁冰……

9

梁德江归案后，承认了自己伙同他人诈骗杨平的全部经过。

在外出的四年里，梁德江确实找过很多赚钱门路，他在江苏干过流水线工人，在福建倒卖过茶叶，在河南干过工地，甚至被骗去广西做过传销。

但这些也只能让梁德江一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他太想发财了，但凡手里有一点钱，不是寻找当地的赌场，就是疯狂购买彩票，总是妄图以小博大咸鱼翻身，却发现自己始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006年6月，梁德江在外省一家地下赌场欠下了6万块钱的高利贷，赌场马仔把他带到当地一条河边，声称不还钱就活埋了他。梁德江惊恐万分，苦苦哀求对方只要放自己一条生路，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其实赌场当时也只是吓唬梁德江一下，并没想过为了6万块背一条人命。听梁德江这么说，不但“放了他一条生路”，还给他“介绍”了一个还债的门路——地下赌场老板让梁德江在赌场里当“托儿”，配合赌场，给一些有钱又嗜赌如命的赌客“做笼子”。骗来的钱赌场给梁德江分账，用来偿还高利贷。

梁德江没得选，答应了赌场。他的任务是先在赌桌上骗人，之后再“劝说”赌徒在赌场里借“码钱”。在这个过程中，梁德江结识了赌场“放码”人的“马仔”，也就是后来的“唐大哥”。

梁德江跟着“唐大哥”一伙在赌场“放码”，还曾当场被当地警方端掉、被判入狱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两人都不是主犯，刑期较短。

刑满释放后，两人又混到了一起，都没有谋生的路子，又都抱着发财的念头，便决定依靠之前的“经验优势”。

梁德江回到老家，抵押了父亲的房子，弄了一笔“启动资金”，同时四处寻觅诈骗对象。

他先还了一部分欠款，让人们觉得他在外面确实找到了财路，又花钱给“唐大哥”租了一辆“座驾”，专门用来在诈骗对象面前充门面……根本没有所谓的“赌场”，也没有所谓的“投资”，一切都是梁德江编造出来的谎言。

但此举确实唬住了一些人，并获取了这些人的信任，包括他的“发小”杨平。梁德江归案后交代，从杨平那儿骗走的100万，基本已经被他和“唐大哥”挥霍一空。

“梁德江怎么对杨平下得去手？！”我感叹道。

“梁德江说，他一开始也没想‘搞’杨平，毕竟顾忌两人以前的关系，但后来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诈骗对象，又得知了杨平的经济状况，便决定对杨平下手……”

“可杨平之前毕竟帮过他啊！”

“决定干这行的人，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再说，这种事情基本就是‘杀熟’，越是熟人越好获取信任，换作别人，梁德江也不会骗到那么多钱。”

被丈夫砸死的赌徒妻子

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早上，辖区医院发生一起医患纠纷。

据报案家属称，患者王琴前一天夜晚在家中不慎摔伤头部，被丈夫刘清送往医院救治。可当王琴亲属第二天一早赶到医院时，却被院方告知，王琴已经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

王琴亲属一时难以接受，坚持认为是医院在救治过程中存在过错，要求医疗事故赔偿。市卫计委立即介入调查，却发现王琴头部的伤情十分可疑，于是再次向警方报了案。

经法医初步勘察判断，王琴头部的伤情的确不是摔伤，而是外力击打所致。那一天，我与同事出警，控制了王琴受伤当晚唯一的在场人——她的丈夫刘清。

经审讯，刘清对殴打妻子并致其重伤的事实供认不讳。

而这，却并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家暴案件。

1

刘清时年35岁，企业职工，常年在外省项目部工作，只有春节才回乡过年，案发时他刚刚返乡第四天。

刘清身材高大，在讯问室里一直瑟瑟发抖。面对民警的讯问，他并没有做过多辩解，便承认了案发经过。

当晚，刘清因王琴签下的几张欠条，和她发生了争执。两人先是争吵，继而动手互殴，最后，暴怒之下的刘清用家中茶几上的铜制摆件击打了王琴的头部，致其当场昏迷。等他回过神来，才匆匆将王琴送往医院救治。

为了防止医生报警，刘清谎称妻子是“跌倒”所致，也未敢告知王琴亲属其受伤的真正原因，直至法医介入，才使他的罪行暴露。

讯问期间，我总觉得“王琴”这个名字越听越熟悉。翻阅警综平台，才发现自己先前确实和她打过交道。

那是2013年8月，派出所接到举报称，辖区麻将馆里有人赌博，我和同事出警将一行人逮了个正着，王琴就是其中之一。

在现场调查过程中，虽然民警三令五申现场人员不要乱动，但王琴还是偷偷闪身进了麻将馆的洗手间，一出门就被拦了下来，我们问她这当口去洗手间做什么，她推说自己内急。

出于经验，我和一名女同事便带着王琴返回洗手间，果然，从抽水马桶的水箱里找出了用塑料袋包好的一沓现金，大概有七八千块。

通常，不少赌客都会在警察临检时把钱藏起来。他们普遍认为，只要身上带的现金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赌博认定标准，自己的行为就只能被

定性为“带彩娱乐”，从而逃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裁；等警察走了，再摸回去把钱拿走就行。

我问王琴这些钱是不是她藏的，王琴坚决地摇摇头；问在场的赌客，也没人承认；把麻将馆老板单独叫来问话，更是一概不知。

于是，我们只能把那笔钱拍了照，当作固定证据，准备带回所里等待法制科处置。但就在我们准备带离赌客们的时候，王琴却突然拉住我，说钱是自己的。

我拿着执法仪给她看录像回放，问她刚才为什么说谎，王琴支支吾吾。等我要修改现场笔录，把这笔钱算到她赌资里的时候，她却又一次改口，说，钱是她的不假，但并不是她的赌资，而是她拿来借给同桌牌友杨姐的。

再把杨姐叫过来问话，杨姐矢口否认这笔钱是自己找王琴借的，转身就跟王琴对骂起来，气急败坏地骂她是“栽赃”“太缺德了”。

好在当时有警察拦着，两人才没动起手来。

等到了派出所，王琴才不情不愿地承认说，当时她说那笔钱是借给杨姐的，一来是为了钱不被认定为她的赌资，二来还指望着，如果那笔钱被我们认定是杨姐“借的”，即便没收了，杨姐之后也得还她。

“看来你也是‘老油条’了啊，连我们的办案流程都摸清了！”我质询她。

王琴没说话。

警综平台上有关王琴的记录还不少，全是因为涉赌被处理的。我问她：“这么个玩法，家里人不管吗？”

王琴还是没说话。

那笔钱最终被认定为王琴的赌资，被公安机关依法收缴。王琴本人也因涉赌被派出所治安拘留五天。

移送拘留所前，我问王琴要不要通知亲属，王琴说不。

我当时就想见见她丈夫，但王琴说，自己的丈夫常年在外地“会战”，来不了。我记得一旁的同事还插话说：“老公在外地辛苦赚钱，你就在家使劲打牌，不怕你老公回来找你算账吗？”

王琴就一直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2

根据刘清的交代，两人动手打架的原因，正是源于王琴赌博。刘清和王琴七年前通过熟人介绍认识并结婚，那时，王琴看中了刘清国企职工的身份，工作稳定；刘清则看中了王琴相貌清秀，为人踏实。结婚第二年，两人就有了儿子。

婚后的几年，夫妻俩琴瑟和谐，刘清在单位上班，王琴在家中带孩子，刘清的工资基本可以应付家里的生活开支，二人还贷款买了一辆小轿车。

儿子日渐长大，花销也在不断增长，家里经济上不免有些捉襟见肘。2011年年底，单位有外派工作的机会，刘清便和王琴商量，想报名参加。

“当时她还不太愿意，我们两口子那时感情很好，她舍不得我一走一年……”刘清说。

王琴婚后一直在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刘清的工资虽然暂时可以支撑，但想到以后随着孩子的成长，各类花销肯定会渐渐增大，迫于经济压力王琴只能同意了。

2012年年初，刘清便跟着单位外派的队伍离开了家。

刘清外派的项目部距离老家几千公里，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休假的机会，夫妻二人的日常交流只能靠刘清晚上下班后的电话和视频。

开始的半年，夫妻俩几乎每晚都要联系，刘清会讲讲自己工作中的见闻趣事，王琴则会“汇报”一下家中情况。

当时刘清的同事还跟他开玩笑：“跑出老家千把公里了，脖子还被老婆牵着。”刘清听了就光是笑，脸上堆满了幸福。

大约从2012年8月开始，刘清渐渐感觉出了妻子的异样。

“以前，我们几乎天天晚上视频，但差不多从那时开始，我晚上给她发视频总接不起来，打电话聊不上几句，她就说有事要挂，先是偶尔几次，后来就越来越频繁……”

家中亲戚给刘清打电话，旁敲侧击地说，王琴晚上总是把孩子丢到亲戚家，自己一个人跑出去，一去就是一晚上。刘清问亲戚王琴去哪儿了，亲戚们都说不知道。

刘清心中疑惑，便直接向妻子询问。王琴倒也没瞒他，说自己在家中带孩子实在无聊，晚上被几个朋友约着一起打麻将去了。

刘清当时也没在意，只是随口交代了两句：“玩玩就行，别打得太大。”王琴让刘清不用担心，说都是朋友攒局，只打“1块钱（底）”的。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王琴开始时不时在聊天中告诉刘清，说自己“火太好，昨晚赢了1000”，又或者“今天手顺，又赢了300”。

刘清起初有些担心，尽管王琴跟他说的都是“赢钱”，但他从赢钱的金额上意识到，妻子的牌局已经越来越大了。

刘清也问过妻子在牌场上输了多少，王琴就总是说自己“牌火正”，只是偶尔输一点，有时是不输不赢，“总体算下来，肯定还是赢的多”。

王琴还一个劲地安慰丈夫说“自己心里有数”，感觉“火好”的时候就多玩会儿，感觉“火不好”就不玩儿，平时输赢都有“计划”，绝对不会有问题。

“都有‘打牌计划’了，你还觉得王琴打牌只是为了‘解闷’吗？”我问刘清。

刘清低着头，没回答我。但他的态度很明显——听妻子这么说了之后，他不仅没有因妻子打牌的事再纠结，还劝王琴把打牌赢来的钱存起来，“等年底置个大件”。

此后，再有亲戚给刘清打电话，说王琴不管孩子总往牌场上跑时，刘清不但不再当回事儿，甚至还在心里觉得，妻子隐隐有些“赌神”的影子——“打一晚上牌比自己上一天班赚得都多！”

没多久，家中的亲戚也不再跟他说王琴打牌的事情了。

3

然而，等2013年春节前刘清回到家时，却发现情况有点儿不对。

他算着当年自己工资加奖金一共发了9万多块，准备一次性把买车的贷款还了，但王琴先是推说“不着急不着急”，后来被问急说漏了嘴，刘清才知道，其中的5万多块都被她在麻将桌上输光了。

“你不是一直说你在赢钱吗？那5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刘清气得暴跳如雷，不停地质问妻子。王琴也一脸黯淡，说自己之前分明记得赢多输少，也不知道怎么就亏了那么多。

刘清甚至怀疑过妻子是不是在外面“有情况”，还特意“调查”了一番，但确实没发现妻子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就是单纯的赌博。

后来，我和一位老民警聊到此案，老民警笑笑说：“老话讲‘久赌必输’，就是这个道理。当第一次输了100块时，你会觉得这是个‘大钱’，能记住，但当你输过1万块后，再输100块，你不但不觉得是个大钱，反而会有些庆幸。就这样，钱就一点一点输没了。”

想想的确是这个道理。

5万块钱确实已经输出去了，刘清和王琴两人也没办法，只得一家人一起，过了一个别别扭扭的春节。节后，刘清还要继续前往外省工地上班，但妻子的情况又着实令他放心不下。

王琴信誓旦旦地向刘清保证说，“自己以后坚决不打了”。但牌瘾这东西染上容易戒掉难，从王琴输在牌桌上的数额以及和亲戚朋友的聊天中，刘清怀疑妻子已经上瘾了。他本打算放弃外派的机会，在家监督妻子，但后来并没有付诸行动。

究其原因，刘清解释说，自己选择外派是和单位签过一个五年协议的，如果第二年不去了，就相当于毁约，得交万把块钱的违约金。

刘清舍不得那笔钱，妻子也一个劲儿承诺，自己绝不打牌了，还当场写下了保证书。刘清思量再三，第二年还是出去了。

“早料到走到今天这步，别说1万，哪怕让我交5万的违约金，我也要坚决留在家里……”刘清低着头，语气中满满都是悔恨。

4

2013年全年，刘清一直密切关注着妻子在家中的情况。除了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视频，他还不时地让妻子查一下工资卡余额并截图发给他。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晚上的视频妻子随叫随到，工资卡的余额也在逐渐增多。这一年临回家前，刘清又让妻子发了一次余额截图，上面显示，又攒了大约8万块钱，他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家，打算用这笔钱置办几样“大件”。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前脚回到家，本地寄卖行的蒋老板后脚就登了门，见面开口就问刘清，他家的车还要不要了——原来，之前王琴把车押在寄卖行抵了3万块钱，“还要车的话年前赶紧凑钱”。

刘清当时就蒙了，他火急火燎地叫来妻子询问，王琴先是左推右拖，最后实在不得以，才承认自己确实把车押给了蒋老板，而钱则全被她用来打牌了。

不仅如此，在刘清离家的这一年里，王琴不但没有履行“再不打牌”的承诺，反而变本加厉，一口气把家中存款和刘清工资卡上的几万块钱输了个一干二净。

“她说在家里无聊，除了打牌也不会干别的，打着打着就玩大了，越输越怕也越想‘赶本’，结果‘本’越赶越大，后来就真的还不上了……”

“你们不是经常在晚上视频，还转发银行卡余额吗？”我问刘清。

这个问题像是戳到了刘清的痛处，他一下子抬高了声音，说这一年妻子确实晚上不去打牌了，但也就是晚上视频的那段时间才在家里。

和王琴一起打牌的人，开始是她的一些朋友，后来，王琴觉得只跟朋友打牌“没什么意思”，就开始“赶”起外面的“场子”来。有时是街边的棋牌室，有时是去一些人开的“私局”。每局的“起底”也逐渐变成了50元、100元，一局输赢便是成百上千。

而至于发给刘清的那些截图，也全是假的。王琴后来才承认，每次截图，她都是从棋牌室老板娘那里借钱出来存到刘清的卡上，截好图发给刘清之后，再把钱取出来还给人家——这样搞一次，还得付给棋牌室老板娘200元的“手续费”。

“王琴这一年一共输掉了多少钱？”

刘清想了半天，才说：“太多了，现在单是我知道的就有几十万，不知道的还不晓得有多少。”

刘清原本还不知道妻子在外欠了多少钱。就在事发之前的当天下午，几个小额贷款公司的“马仔”来家里催债，好不容易才把人打发走了后，刘清把妻子叫过来，让她交代到底在外面还欠着多少钱。

王琴眼看已经瞒不过去了，只好把欠款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刘清——“光本金就有23万啊，很多是外面的贷款。我不吃不喝再外派三年，才刚够给她还本金的，可是还有高得吓人的利息……”

刘清工资每个月不到9000块，6000多块的月薪，加上2500元的“出省费”，全都打在妻子的卡上。

“你也算是好男人啊，明知老婆在家打牌打得大，你还把工资如数上交。”

刘清摇摇头，十分无奈地说，毕竟夫妻一场，还不至于像防贼一样防着妻子：“之前也有相熟的朋友劝我把网银收过来，不时查查卡上的余额。可我怕那样做伤了她的心啊！”

何况，工资打到妻子的卡上，这是单位的规定，他也没办法。刘清所在单位的确有这样一条规定：所有外派职工的工资都发放在直系亲属名下的银行卡上，密码由亲属设定，每月发工资时，需要亲属带着银行卡到单位财务处现场转账。

单位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考虑：以往外派职工常常在工作之余聚众赌博，有人一晚就能输光全年工资，年底回家时，两口子为此打架闹离婚的比比皆是。后来单位便想到了这个办法，工资直接交给家人，外派职工每月只能领取其中的1000元作为日常花销。

但没想到，防住了那头，却没能防住这头。

那天下午，当刘清知道自己不但身无分文，还在外欠下巨额债务之后，越想越气。他不停地数落妻子，一开始王琴还默不作声，后来忍不住还了几句嘴，一下点燃了刘清的怒气，很快就发展成了打斗……

5

在讯问中，刘清说家中抽屉里还有妻子签下的借条，所里派人去找，确实找到了一些。但如今王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无法向我们证实，这些借条背后的二十几万现金是否真如她的丈夫所说，全被她拿去输光在麻将桌上。

为了进一步核实刘清的说法，我们只好找到王琴的亲属，去她曾经常出没的几家棋牌室调查。

从王琴2012年迷上打牌开始，她的儿子刘宇轩就一直放在娘家由父母帮忙照看。在王琴娘家，我们见到了6岁的刘宇轩，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爸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们了解情况期间，孩子就一直在院子里快乐地玩耍。

王琴的父母没有向我们透露有关王琴打牌的详细情况，只是老泪纵横地一再要求我们要严惩刘清。不过我们离开时，王琴的嫂子却悄悄地跟出门外，问我们：之前王琴以“还车贷”为名从她丈夫手里拿走的3万块钱，照现在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拿回来？

我说，这个恐怕需要到法院去起诉，王琴嫂子便有些生气，嘴里一直小声地咒骂着。

我借机问她知不知道王琴在外赌博的事情，王琴嫂子顺口说：“怎么会不知道，她来借钱的时候寻死觅活，连孩子脖子上、手腕上的金坠子都拿走卖了……”

我拉住她想再了解一些具体情况，但她却似乎想到了什么，借口自己知道得不多，便匆匆离开。

我和同事又前往辖区一些棋牌室，刘清和王琴的事情在小城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因而绝大多数棋牌室老板都不肯承认王琴是在自己的店

里输光了家产，顶多含糊其词地说，王琴经常来玩，他们只不过就是收点“服务费”，输赢都是同桌牌友的事情。

那位曾经每月借款给王琴忽悠刘清的棋牌室老板娘，因为转账记录抹不去，被我们找到并带回了派出所。她看实在逃不过，才向我们交代了王琴在棋牌室的一些情况。

“她经常来，玩得是蛮大的……”老板娘说，她曾听说王琴有一次，一个下午输了1万多，同桌赢钱牌友激动得难以自持，当场给了棋牌室服务员200元“小费”。

同事问老板娘，为什么借钱给王琴“充数”？她说因为王琴经常光顾，所以和她关系挺近，她知道王琴在自己店里输了不少钱，担心王琴老公知道了来找自己麻烦。

更重要的是，王琴还答应她，“每次无论借多少都付给她200块钱报酬”，老板娘知道王琴是本地人，父母孩子都在，也不怕她跑了，便同意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问老板娘：“你难道不怕王琴这事儿最终败露了，刘清来找你算总账吗？”老板娘有些哭笑不得，说自己有时也盼着王琴把钱赢回来：“只要还在打，哪有总输不赢的！”

“你倒跟我仔细说说，最后有赢回来的吗？”同事在旁问她。

她想了半天，没能举出几个“赢回来”的例子，反而在同事的提示下，说了好几个打牌打到妻离子散的客人。

“不瞒你说警官，每到过年前，我都过得提心吊胆。”末了，老板娘反而也抱怨了起来。

我问原因，她说本地像王琴这样的留守妇女特别多，平时没啥爱好，就是喜欢在棋牌室里“垒长城”，虽然大多数人日常的输赢不大，但一

年下来也都是个不小的数字。

丈夫赚钱打回家，妻子闲来无事就在外打牌，年底丈夫回家想看看一年存了多少，才发现钱都被妻子输光了。然后，基本就都是争吵、打架，也有一些妻子输钱输过分的丈夫，会直接闹到棋牌室来。

“这几天我还担心王琴的老公来店里闹呢，结果没想到……”

尾声

由于王琴的重伤，刘清和王琴两家亲属很快就反目了。

移送刘清前往看守所之前，他提出想要见儿子一面。我们联系上了王琴的亲属，但他们严词拒绝让刘宇轩与刘清见面。

我本想再去做一下王琴亲属的工作，但同事拉住我说，不见也好，但愿王家人能把刘清和王琴的事情向孩子瞒下来。这么小的孩子，父母出了这样的事，以后的路就太难走了。

半个月后，王琴的亲属经过商议，决定接受王琴脑死亡的现实，放弃治疗。

“两级医院给出的结论都是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每天的维持费用需要四五百，他们家已经没有积蓄了，亲戚们觉得这是个无底洞，都不愿出钱，最后只能放弃了。”同事对我说。

没多久，刘清便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检察院批捕了。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刑期。

为人师表，

躲不过网赌陷阱

2018年4月，我在武汉光谷遇到了刘毅。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外卖工作服，戴着头盔，提着一兜餐食迎面向我走来。我最初还不敢确认，犹豫了一下，喊了一声“刘老师”，他看向我：“李……李警官？”

还真的是刘毅。他止住脚步看着我，脸上有些惊喜，也有些尴尬，半天才生硬地挤出“好久不见”四个字。

“确实好久没见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两年多了，你最近还好吧？”我问他。

刘毅点头说：“好着呢。”又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也挺好。

我还想说点别的，刘毅却抬一抬手中的外卖，意思是还得赶着去送餐。

“行，那闲了咱回头联系，我电话没变。”我拍拍他的肩膀。

刘毅答了声“没问题”就匆匆而去。望着那个米黄色的身影渐行渐远，直到转入临街一家商铺消失不见了，我才扭过头来。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刘毅。

我们曾是朋友，两年前，他还是个领财政工资的老师，有一天，忽然就莫名消失了。再次遇见，竟成了风尘仆仆的外卖小哥。

本以为和刘毅就这样“擦肩而过”了，但一周后的一天下午，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李警官，今晚上方便不？我是刘毅，方便的话咱一起聚聚？”

我有些惊喜，赶紧问他在哪儿见面。

“你定地方吧李警官，我去找你，我一个送外卖的，哪儿都熟。”

1

晚上，我和刘毅约在了雄楚大街的一家餐馆。坐定后，我问刘毅喝什么酒，刘毅说："还是老样子吧，大白牛。"

服务员没听懂，我笑笑，向服务员解释说就是白瓶的牛栏山二锅头。

两年前最后一次和刘毅吃饭时，他点的也是这酒，那天他似乎有什么心事，一言不发地喝完了一整瓶酒。饭后我把他送到小区门口，想送他上楼，他却摆手连说不用，"自己没得问题"。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天喝完酒后，他便不知所踪，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刘毅的消失毫无征兆，似乎也毫无理由。那段时间，他的家人、工作单位都在拼命找他，但他却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后来，家人一度怀疑刘毅死了，甚至经常跑到派出所来询问近期此地是否发现过"无名尸"。

直到不久后，一批自称是刘毅"债主"的人找上门来，大家才知道，和刘毅一起消失的，原来还有接近100万的巨额债务。

眼前的刘毅换下了米黄色的工装，穿着一件白色长袖衬衣，瘦削的脸庞配上那副银白色镜架的近视镜，给人的印象依然是一名中学教师。

"刘老师，你跑哪儿去了？好多人跑到派出所来找你啊。"我打趣道。

"说来话长了……"刘毅点了支烟，又递给我一支。他顿了顿，好像想到了什么，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李警官，那次……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我嘿嘿笑了一下："四下里找你这事儿就不谈了，你和我吃完饭就失踪了，我能逃得了干系？先是你的家属、工作单位、公安局纪检部

门，后来还有你的债主们，走马灯似的找我，差点儿没把我烦死。”

我并没有跟他开玩笑，失踪之初，刘毅的亲属和单位领导知道我和他是朋友，失踪前一天还是和我一起吃的晚餐，认为我一定知道他去了哪里，因而不断地找我询问。

“你老婆几次跪在我面前，非让我告诉她你出了什么事，去了哪里。你说你去了哪里？”

后来实在找不到人，只能按照失踪人口立了案，公安局督察支队和纪检部门，甚至市检察院都来找到我，怀疑我在刘毅失踪一事中扮演了某种不光彩的角色，甚至其中有什么阴谋。

最后，刘毅背债的消息传出来，连债主都找到我，又向上级部门举报我，认为是我教唆了他的潜逃。

可刘毅确实什么都没告诉我。面对各方的质问，我只能一再解释。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太对不起了李警官，没想到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刘毅不断地向我道歉。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我也懒得再说他什么，只是问他现在家里知不知道他的下落。刘毅说知道了，他去年年初回的家，那笔债家里已经替他还清了。

“家里条件也是蛮好的嘛，一百来万，说还就还了，你说你当初为啥还要跑呢？”我调侃刘毅。

但他沮丧地说，失踪一年后，学校将他除了名，家里是卖了两套房才凑够的钱，现在自己离了婚，在武汉送外卖，父亲也跟他来了武汉，一家人租住在一套两居室里。

“李警官，别叫我刘老师了，我早就不是老师了，也配不上‘老师’这个称呼啊……”

2

刘毅大我五岁，大学学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我之前工作的那座城市一所中职学校的班主任老师。

那天，他带着两个学生来派出所报案，正好是我值班，接待了他们。

刘毅说，这两名学生放学之后多次遭到一伙人的殴打，我问缘由，两名学生支支吾吾地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是因为两人在外面欠了债，那帮人是来找他们要钱的。

我问他们欠了多少，两人一个说2万，一个说5万。我有些吃惊，两个未成年的学生怎么能在外面欠这么多钱?

这时，刘毅拿出两部手机递给我，说："你看一下上网记录就知道了。"

我打开上网记录，密密麻麻的浏览痕迹，全都指向同一个网站。原来两人是在网上玩"百家乐"——其实就是网络赌博。

"手机是在课堂上收的，当时两人正躲在教室后排聚精会神地玩着呢。"刘毅说。

两名学生很快承认了自己参与网赌的事情，他们输光了手里的钱，又不敢跟家里说，找人在外面借钱想要翻本，结果借来的钱也很快输光了。还款期到了，两人拿不出钱来还，就被放贷的人找到了学校。

我通知了学生家长，又通过两名学生的叙述，抓了先给他们"放码"、又找他们逼债的团伙。至于那个赌博网站，则由网安部门接手处理，后来被串并到其他类似案件中，一同打击掉了。

虽然案子很快解决了，但刘毅又来找我，说他通过后期了解，得知在校学生中参与网赌的并非只有那两名学生，希望派出所能够出面在学

校办一场有关“防范网络赌博”的教育活动。

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就把他的想法汇报了上去。公安局很重视，索性就以刘毅所在学校为基地，在全市大中专学生中开展了一次“远离网络赌博”的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我主要负责收集和整理各种案件资料，刘毅也一直忙前忙后，负责协调整个活动的举办，他还上台发了言。我们就是这时候逐渐熟悉起来的。

那时刘毅家就住我派出所辖区内的“世纪小区”，他父母都是本市退休教师，妻子姓高，也是那所中职学校的教师，他俩有一个4岁的儿子，长得白白胖胖很是可爱。

我一个单身汉，那段时间下班没事，经常去找刘毅吃饭，或是约他出来喝酒聊天。高老师也不生气，还常说刘毅交个警察朋友挺好的，让我平时多“教教他”，也能让他“多长点心眼”。

女主人的“不撵之恩”让我连连点头答应，还开玩笑说咱是“同行”，老师和警察都是“搞教育”的，只不过阶段和对象不同，你这儿教育好了就省了我这儿的麻烦。

后来我也确实跟刘毅聊了不少工作上遇到的事情，他也常说“受教受教”。后来想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害了他。

3

“你那年到底为啥要跑？真的是因为欠债？”酒过三巡，我问刘毅，他点点头。

我又问他怎么会欠那么多钱，刘毅叹了一口气：“还能为啥，赌博呗！”

其实在得知刘毅欠了近百万债务后，我就怀疑他可能染上了赌博，只是有些地方一直想不通：“当年我跟你聊了那么多赌博赌到家破人亡的案子，咱俩还一起参加了那次的专题教育，最后你咋自己还着道了呢？”

“其实有段时间我挺恨你的，李警官。”刘毅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冒出这么一句，说完他又笑了，“不过后来想想，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你知道那么多，你怎么没出事，反倒是我出事了。”

刘毅说得我云里雾里，我忍不住怼他：“我是逼你赌了还是帮你跑（路）了，你还要恨我？”

刘毅端了端酒杯，问我：“你记不记得之前咱俩一起处理的那两个学生赌博的案子，还有后来你跟我讲的王小江赌博的事情？”

那两个学生网赌的案子我当然记得，至于“王小江”，我好像之前是跟刘毅聊起过这个人。这人以前也住在世纪小区，后来赌博不但输光了家当，还把自己搞成了精神病。

“就是那两件事，让我陷进去了……”刘毅说。

王小江当年玩的也是“百家乐”网赌，我应该也是在处理那起学生网赌案时和刘毅聊到的。没想到，刘毅抓住的，是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细节。

我跟他说，王小江玩百家乐最高赢到过30万，那两个学生同样最高赢到过八九万。但俗话说“久赌必输”，他们赢的钱最终还是都还给了网赌的“庄家”，而且是连本带息。

“我当时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念头，觉得他们都是因为太贪，如果见好就收，估计不但赔不了钱，还能大赚一笔。他们输钱，是因为自控力太弱。”刘毅说。

刘毅自认为是一个自控力超强的人，他父母从小就在培养他的自控力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所以，后来我也鬼使神差地从网上找到一个玩‘百家乐’的赌博网站，无聊的时候就充点小钱进去玩玩……”

刘毅自控力真是不错，每次就充100元进去，20元一局的投注，赢到300就提现，输光了也不再继续充值，这样小打小闹地玩了几个月，好像算下来真赚了一点。这笔小钱虽然没让刘毅发财，但却让他更加相信自己的“自控力”。

“2015年年初，我准备买车，家里凑了16万，想买雪铁龙的C4L，可我看中了奥迪A4，但要30多万，又不想贷款，所以到处想办法筹钱……”刘毅说。

刘毅筹钱的过程不太顺利，但最终还是勉强凑够了数，不过等他来到4S店时，却被告知之前看中的那款车型已经售罄，要买的话需要等三个月，当时店里还有一款配置稍高的，价钱要贵3万多。

刘毅失望而归，但走出4S店大门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自己平时玩的百家乐，100块钱运气好时可以赢200块，那用1万块钱做本，不就可以赢到2万吗？于是，刘毅没有回家，而是在路边找了一家快餐店坐下，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不过那天刘毅的运气不好，他充进平台的1万块钱很快就输光了。

“一开始都是200的注，但输多赢少，输了4000多块的时候，心里就有些着急了，想赶紧翻本，注也下得大了，先是500块一注，后来1000块一注，最后一局还剩3000块钱的时候，我一把‘梭哈’了。”刘毅说。

结果他还是输了，前后仅用了20分钟，刘毅的1万块钱便烟消云散。

“当时输得不服气啊，就又转了1万块钱到赌博平台里，很快，第二个1万块钱也输光了。”

刘毅不服气，继续往里充钱，一张银行卡到了限额，他就换张卡继续充。那天下午，刘毅在4S店旁的快餐店里坐了三个小时，直到妻子打电话问他车买得怎么样了，才猛然清醒过来。

那时，他已经输了将近7万块钱了。

4

刘毅说，当他关上网页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30万购车款转眼就剩23万了，刘毅懊恼不已，狠狠扇了自己几个大耳刮子。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后悔啊，我长这么大都没那么后悔过！”刘毅说。

回到家中，妻子问他买车的情况，刘毅推说想买的那款没货了，自己交了7万块定金，3个月之后取车。妻子兴高采烈地相信了他。

那天晚上，刘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输掉的7万块钱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1万有这么厚一沓，7万大概有这么厚一摞吧……”刘毅用手比画给我看，那时他和妻子的月薪加起来只有八九千，7万块，他们要攒一年。

刘毅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输，之前充100块的时候，经常赢两三倍，怎么一下重注就输这么惨。思来想去，刘毅觉得还是自己心态有问题，以前百八十块钱没当回事，输了就输了，现在下注金额高，一输就想下重注“赶本”，乱了“节奏”。

刘毅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个道理，大概到了凌晨，他索性来到了客厅，又一次掏出手机。“反正已经输了7万块了，我就不信自己‘火’这么背！”

网赌平台24小时营业，刘毅一次性往账号里充了3万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乱了节奏”，赢了就赢了，只要“回本”就收，输了，这辈子绝不再碰网赌。

然而，清晨当他妻子醒来时，发现刘毅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她惊奇地问刘毅怎么这么早起床，刘毅瞪着通红的眼睛说，“失眠了，在沙发上坐会儿”。

那一晚，他的“节奏”没能帮上忙，而且这次他输得更彻底，一夜之间，剩余的23万一分都不剩了。

“你当时咋想的？一直输还不停手？”我问刘毅。

刘毅说也不是一直输，中途也赢过，其中最高用3万打出过12万，不但“赶了本”，而且还倒赚了5万。但最后还是没守住，先是输光了赢来的钱，后来连3万块的本钱也输完了。

“然后我就下决心，下次再打到‘回本’，绝对收手，可惜再也没有回过本，后来连银行卡里剩下的钱也输光了……哎。”刘毅长叹一声，呷了一口酒。

买车的钱没了，刘毅没法跟家人交代。虽然妻子也没问过，但难保哪天纸包不住火。

可是手里的钱都输光了，之前的朋友也借遍了，自己去哪儿再弄30万呢？

刘毅想到了信用卡。

那段时间，刘毅一口气办了三张信用卡，因为是在编教师，银行授予的额度还不错，三张卡加起来大概有接近10万的信用额度。但信用卡申办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尽快凑够买车的钱，他又想到了小额贷款。

他通过熟人找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凭借熟人和自己本市教师的身份，贷到了10万块钱，付了奥迪车的首付，回家骗妻子说是全款。

到了小额贷款还款的时候，刘毅又在熟人的“点拨”下，把奥迪车抵押给了另外一家小贷公司，拿到一笔钱还给了第一家小贷公司。

等到第二家小贷公司需要还款时，刘毅的信用卡到了，他在网上找人“套现”拿到了一笔钱，又找到第三家小贷公司贷了一笔钱，把第二笔钱还上。

家人并没有发现刘毅在“以贷还贷”，但他自己心里清楚，三家小贷公司滚一圈，最初的10万块钱已经连本带利滚到了30多万。

刘毅发现，如果这样下去，自己不久便会倾家荡产。但第三家小贷公司的还款时间越来越近，他又根本没有其他筹款的途径。

他只得继续四处筹款，无论是市面上的小贷公司、手机里的贷款软件，还是地下高利贷，多则三五万，少则一两千，只要能借到钱的地方，他都试过了。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多，终于，2015年7月，眼看着需要归还的各类贷款本金和利息已经高达近百万，刘毅终于再也无力偿还。

“一直瞒着家里吗？”我问刘毅。他点头，说那时他不想跟家人坦白，因为自己从小就是父母眼里的“好孩子”，结婚之后是妻子眼里的“好丈夫”，在单位是领导和学生眼里的“好老师”，他不想毁掉自己在众人心里的形象。

“但10万块钱债务，半年时间，怎么也滚不到60多万啊？”我质疑刘毅的说法。

他苦笑一下，说单是债务确实滚不到那么多，也就是三四十万吧，其余的钱，是他输出去的。

“那时你还在赌？”

“嗯。”

5

用3万块打到12万的记忆，从那天夜里之后，一直刺激着刘毅。他觉得自己只要不贪心，终归会把输了的钱赢回来。而且也只有继续赌，才有可能筹到足够的钱，“那时候我只要手里还剩点钱，就想着去赶本”。

但毫无悬念，刘毅的“本”越赶越大，终于彻底还不上了。

“百家乐就是买‘庄闲或庄赢’，二选一的选择题，网上有人说策略，一局买不中下局就翻倍买，再不中继续翻倍，但我还是买哪个哪个不中，后来索性翻倍‘守号’，结果呢，我守‘庄赢’，它能连续给我开20局‘闲’！”

究竟是赌博网站故意作弊，还是刘毅自己的心理暗示，这些都已经无从考证。但刘毅说，他“跑路”前的最后一次赌博，的确是被网站“黑了”。

那次刘毅的学校补发了一笔钱，大概有3万多。他又借了大概4万块的高利贷，准备再搏一把。

这一次，刘毅运气好得出奇，几乎买什么中什么，7万本金不久便成了10万。他觉得自己终于“来火”了，于是开始下重注，但依旧是赢。

“想不到吧，那天我从中午吃过饭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1点，账上已经赢了90多万，差不多能把我之前的债务冲抵掉了。”刘毅有些沉醉，“那次我没再冲动，想起了之前这半年的焦虑生活，我决定‘见好就收’吧，过回正常日子。”

“但是呢，又没忍住？还想赚更多，然后又输光了？”我笑着调侃，因为那是赌徒们一贯的做法。

刘毅摇摇头说：“之后的事情你更想不到……”

刘毅的确没有继续赌，他选择了提现，但那笔赢来的巨款却始终没有打进他的银行账户——先是网页提示“提现审核中”，后来他的账号被强制下线，再后来就一直登陆不进去了。

“我打网页上的客服电话，打不通，网页上有QQ号，我加了好友，一说这事儿对方就把我拉黑，后来上百度‘戒赌吧’发帖子提问，才明白自己被网站‘黑’了……”

此外，对于之前自己玩“百家乐”连输20局“闲”的经历，网友们告诉他，网赌网站结果在后台都是可调的，看你守号就故意不出，输死你。

“那时我才明白，网赌，就是一场骗局啊。你不赌的时候让你小赢上当，你赌的时候‘做笼子’让你大输，等你侥幸赢的钱多了，就改掉你的账号密码，黑掉你的钱……”

刘毅长叹一声，然后一口把杯子里的酒喝完。

我递给他一支烟问道：“然后呢，没想着报警？”

“怎么没想过，我想了很久，还约你吃了顿饭……”

但刘毅上网查了相关信息，赌博网站基本是在国外开办的，国内追查起来十分困难，他的钱被追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参加网赌本身就涉嫌违法，弄不好钱追不回来，自己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所以最后，刘毅虽然把我约出来吃了饭，但心里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选择了“跑路”。

他一共逃了1年10个月12天，从本市跑到武汉，又到了长沙，最后落脚在深圳。

“当时我想过关去澳门，因为那个网站名字就叫‘澳门XX娱乐’，我要到澳门去找他们要钱，但后来钱花完了，澳门没去成，反正家是回不去了，就在深圳龙华找了个工作，想攒点钱再去澳门。后来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让我别去澳门了，都是假的，网站乱起的名字，去了也找不到，找到钱也拿不回来……”

既去不了澳门，也不敢回家，刘毅索性留在了深圳龙华，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

“之后为什么回来了？”我接着问刘毅。

他深吸一口香烟：“我那个朋友死了……”

刘毅在深圳龙华认识的那个朋友名叫小正，据说以前在江西老家是一名公务员，本来家庭美满，后来也是因为迷上了网络“黑彩”，不但输光了身家，还在外面欠了几百万债务，父母和他断绝关系，妻子和他离婚，工作也丢了，同样是独自一人跑到深圳躲债。

因为同命相怜，刘毅和小正成了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怀念以前在家的日子。小正常劝刘毅趁早回家，否则时间越长越回不去。刘毅也想回家，但不知如何面对回家后的结果。

小正身体不好，经常面色苍白，说自己心脏不舒服，刘毅常劝他去医院看病，但小正身无分文，连身份证都卖了，只能在出租屋里硬扛。

2017年4月，小正心脏病发作，死在了出租屋里，看着殡仪馆的工人把小正的遗体抬走，刘毅心里有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公安局叫刘毅去了解情况，刘毅却发现自己竟然连小正的全名都不知道。公安局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小正的真名，发了认尸通知。小正的一个亲戚来了，领走了小正的骨灰，但听说，离开公安局没多远，就找了个水沟连骨灰带盒子全扔了。

刘毅说：“我真怕自己最后也落得个和他一样的下场……”

6

小正死后两个月，刘毅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可能因为痛苦太深，他没有告诉我回家之后经历了什么，但从他的现状看来，那应该是一段极其愧疚，却又有些许安宁的日子。

刘毅只是说，当把一切坦白时，自己的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因为再也不用每天编造各种谎言，也不用每天数着还款日期心中打战。

房子卖了，车子卖了，妻子带着儿子走了，父子两代人的积蓄都替他还了债。本应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父母，也因他不得不远走他乡，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说到这里，刘毅摘下眼镜，擦了擦眼泪。

“工作呢？没跟单位商量一下，看是否还有余地？”

“没商量，我没再去找学校，我不配再当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以前的学生和同事。另外，我得还债，争取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再给他们买套房子，还有我儿子，虽然离了婚，但我得养他，送外卖虽说累点，但只要肯下力气，挣得也多！”

除了送外卖，刘毅还干着几份其他兼职，每天起早贪黑，每月大概也能有接近两万的收入。

那晚我和刘毅聊到餐馆打烊才结账离开。

地铁和他来时乘坐的公交车早已下班停运，我说夜深了给他叫辆“快车”，他又摆摆手，说饭是我请的，不能再让我请他坐车了。

我说那好，你自己叫吧，但刘毅却刷开了路边的一辆共享单车，说吃得太多，骑车“消消食”。

我知道他住的地方不近，骑单车是为了省钱，但也只能挥挥手，让他路上注意安全。

每个人都知道“十赌九输”“十赌九骗”的道理，但当身入赌局时，却又总认为自己也许会是那少数的幸运儿。

赌博案件是公安机关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工作的这些年，我还从没见过“幸运儿”。

“牌九推倒的是良知，色子扔出的是灵魂。”当把身家性命押在赌桌上的那一刻，良知、灵魂甚至人性都无从谈起了。


深蓝的故事
深蓝的故事 3
未终局
The Story of Shen Lan III
深蓝——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COPYRIGHT

书名：深蓝的故事3：未终局

作者：深蓝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ISBN：9787513347709

字数：153千字

本书由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言

我只是生活的记录者，试图还原它本来的样子

文/深蓝

2021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2016年11月21日，我给“网易人间”投出了第一篇稿件。时光荏苒，一晃已经过去整整五年。

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足以改变很多人和很多事。往前数的两个五年里，第一个“五年”，我从学生变成了警察，那一年我25岁，一脸懵懂地走进公安局；第二个“五年”，30岁的我带着满脑子问号离开了公安局，又从警察做回了学生。

记得写第一篇故事时，我坐在派出所的备勤室里，满脑子愤懑和不解，还有一丝赌气的成分。那时我有太多的看不惯，总觉得生活不该是这个样子，工作也不该是这个样子，至少我所面对的人与事不该是这个样子。

在那个二十出头的年纪里，我总想找个人吐槽一番，又想按照自己的认识去改造这个世界。但也是因为当时我二十啷当岁，我的吐槽干枯而单调。最终也发现，能够被改造的似乎只有自己的世界观。

第一次跟网易人间主编沈燕妮老师见面，是在济南的一家咖啡馆，那时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回学校继续深造。她引用了尼采的那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凝视着你。

那一刻我似乎突然理解了一件事——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我收到了博士录取通知书，我的探组搭档转行去机关做了文职。此前他一直在重

案队，后来说想换个环境，“修复”一下自己的三观——是啊，与恶龙缠斗过久，或许担心自身亦成为恶龙吧。

五年里，“深蓝的故事”系列前后写了三十余万字，从最初的激动到后来的平静，似乎写作也是在帮助我完成一次情绪的疗愈。不得不说，文字是最好的自我调节工具，也是认清自己、认清生活的最好方式。

五年里，我一直与以前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我知道他们在看“网易·人间”和《深蓝的故事》。有时他们会突然把《深蓝的故事》中某个故事发给我，说自己工作中遇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之后又说：“如果不是故事写的早，我还以为你写的是他（她）们。”

生活似乎总在轮回中不断重复，无论是亲历者还是记录者，总能在某些瞬间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2020年国庆节后，一对来自湖南某地的中年夫妇突然找到我。我十分惊讶，见面后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男人说他先在网上发布了悬赏问题，又通过我在文章中透露出的信息确定了就读学校，再通过学校拿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他的话让我目瞪口呆。

但更让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我看了你写的一个故事，遇到了跟你故事里一样的事情。”

他从包里掏出手机，指着屏幕上一篇名为《被毒虫男友拖下水的女大学生》的文章对我说：“我女儿现在跟故事里的这个姑娘一模一样，我怕她最后也会是同样的结局，求你帮我……”

之后，夫妻二人跟我讲了女儿被“男友”引诱染上毒品的事情。几乎是同样的身份、同样的场景和同样的剧情。听他讲完后，我差点以为是故事里的那个“常小斌”再度出现并故技重施。

我问他们需要我做什么，夫妇俩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帮他们找到那个引诱女儿吸毒的男子，二是亲口把故事里的事讲给他们的女儿。

我答应了，跟他们去了湖南。在那个县城的街巷里陪他们穿梭了五天，终于在一家日租房楼下堵住了两人的女儿和她的“男友”。一番纠缠后，“男友”逃脱，而女孩的神态和身上散发出的特殊气味让一切无可辩驳。我知趣地站在远处，因为一切都似曾相识。

一小时后，男人过来向我致谢。我问他打算如何处理，要不要报警。听到“报警”二字时，他又犹豫了，说女儿还在上大学，“报警”不知会给女儿带来何种后果。眼下，只求我满足之前他的第二个请求，至于之后，他还需要跟妻子商量。

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了。

去车站的路上，男人似乎再度犹豫。他问我，书中那个故事里，因为家人没有报警，没能抓到吸毒的“男友”，女孩也没能戒毒，同样的悲剧会不会在自家重演?

其实，他很清楚答案，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后来男人报了警。

最后一次通话时，他说是因为自己梦见了故事结尾的那个场景——女儿戒毒失败，留下一张字条后离家出走，而他和妻子则在歇斯底里中束手无策。

“我看到了结局，我不想要那个结局！”他说。

生活的表面是有温度的，但底层逻辑里却刻满了冰冷的规则。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善恶终有报，人间好轮回。

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者。不把写出的故事当成文学作品，也就不能用文学化的语言渲染情节。那些故事对我们来说只是故事，但对亲历的人来说则全是事故。

从悲剧中汲取生活的教训，前提是尊重悲剧、尊重生活、尊重规则。

我能做到的，只是还原它们本来的样子。

老公，你就是我用青春投资的未来

1

2017年12月，罗老师的追悼会在市殡仪馆举行，我和学校代表一起来送罗老师最后一程。

陈校长在追悼会上发了言。罗老师是他早年培养出的硕士生，外出读博士毕业后回校任教至今。多年的师生情谊，让陈校长几度哽咽。罗老师躺在告别大厅的玻璃棺材里，哀乐之下，一众人在遗体旁缓缓绕行。“年纪轻轻，可惜了……”一同前来的教师中有人发出感叹，几位与罗老师生前相熟的同事都抹着眼泪。

罗老师1977年出生，去世时刚满40岁，正值年富力强，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孩子刚上小学三年级，也有老人需要赡养，一家人的负担都在他肩上，如此匆匆离世实在令人惋惜。听说出事前的深夜，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加班做课题，凌晨两点左右突发心梗。因为深夜学院办公楼只有他一人，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人发现。

罗老师与我的硕导是忘年交。我博士入学第一天，导师们带我去吃饭。我在饭桌上照例喊他“罗老师”，他摆摆手，说现在我是陈校长的博士了，我和他就算正儿八经的师兄弟，以后私人场合喊他“师兄”就行。

我和他算是半个老乡，罗老师的老家在河南边上一个与山东搭界的镇子上。他说自己的母亲是从山东嫁过去的，他也是在山东读的小学和初中，因此应该算是半个河南人、半个山东人。有次我跟他开玩笑，问他“认哪边”。他笑着说两边都可以，山东老乡稳当实在，领导器重；河南老乡能吃苦，这些年学校很多重大课题都是他们在做。

这些年，他也的确继承了两地的优点：作为学校教师中的少壮派，无论科研还是教学，他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学生、领导和同事们对他的

风评也一直很高。2013年，罗老师被破格评上了副教授，眼下又在准备冲击“正高”职称，前途一片光明。

追悼会结束后，罗老师的家属继续处理后续事宜，我则与老师们一起乘车返回。路上，有人翻出罗老师以前上课时拍摄的视频，讲台上的他意气风发、侃侃而谈。

“刘老师也真是可怜，今天在追悼会上哭晕了两次。”我忍不住感慨——刘老师是罗老师的妻子，也在学校工作。虽不教学，但我们平时还是习惯称她“刘老师”。

我身旁的老师表情却很复杂，半晌才说了一句：“她的好日子也快结束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去学校行政楼找陈校长签字，在办公室门口与刘老师撞了个满怀。她眼睛通红，脸上挂着泪水，刚从办公室摔门出来。

我向她问好，她认识我，却没有理我，瞟了我一眼便走了。我推门进去，见陈校长也是一副怒气未消的样子，忙问出了什么事。

陈校长先是教训了我一句：“搞好自己的学习，不干你的事别乱打听。”但转身拿东西时却又说了一句：“人这辈子得知足，是你的谁也拿不走，不是你的你也要不来。”

我明白，他是话里有话。

罗老师是陈校长当年的得意门生，博士毕业后也是陈校长看中了他的科研能力，特意打破学校教师引进需有“国外学术经历”的限制，坚持录用了他，还帮他解决了妻子的工作问题。

作为罗老师的遗孀，这段时间刘老师一直希望学校能看在亡夫的面子上，给她一个“事业编制”，并把自己原有岗位“人事代理”这四个字抹

掉。陈校长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手里有这个权力，又是罗老师当年的硕导，在外人看来，于情于理也该帮这个忙。为此，刘老师来找过陈校长很多次，有时还会打断我们上课。

可陈校长却死咬着不松口，就是不给刘老师“转正”。

刘老师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大家在背地里也议论说，“动动笔”的事情，陈校长何必较这个真儿。

可陈校长就是“较了这个真儿”，不但坚持己见，连学校有其他领导在会上提出相关“建议”时，他也会带头否决。以至于后来刘老师几次在学校停车场堵他，要“给自己讨个说法”。

大家都传言说，陈校长对刘老师多有不满，甚至将爱徒的英年早逝也归咎于刘老师。但陈校长本人并未对我们讲起过这些。

2

读硕士时，罗老师是我的公共课教师。第一次上课，他在自我介绍时便提到了他的妻子。后来的不同场合里，他也经常把自己和妻子的爱情故事挂在嘴边。这么多年他总是说，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最感谢的人便是他的妻子。

罗老师1998年毕业于河南某大学，与刘老师是大学同学。两人从大一便开始恋爱，感情一直很好。毕业前，罗老师报考了我校的硕士研究生，打算继续深造。而刘老师读的是专科，早他一年毕业，毕业当年便在河南当地参加了工作。

罗老师第一年考研失利，决定“二战”。复习的那一年里，他没有任何收入，全靠刘老师资助。一年的努力后，罗老师终于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打好行囊来到武汉。刘老师也辞去在河南的工作跟随而来。

平日罗老师在学校读书，刘老师则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份工作。

每每讲到此处，罗老师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当年虽然考取了“公费研究生”，但生活费却没有着落。他的家庭负担很重，父亲患病失去工作能力，母亲在家务农支撑着3个孩子读书和生活。原本第一次考研失利后，全家人一再劝说他赶快参加工作给家里减轻负担，他自己也数次动摇。唯独刘老师坚定地支持他的学术梦想，主动提出资助他读书。

3年硕士，为了让罗老师在学校安心读书，刘老师先后换了很多份工作，挣来的钱绝大部分都给了罗老师，自己能省则省。

“20岁出头，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别人都是被爸妈、男朋友宠着护着，要啥有啥，想啥买啥，但你们刘老师却使劲‘克扣’自己。我读硕士那3年，她的衣服、化妆品全是在学校后街的小店里解决的。我用

钱的时候，她却从来不说一个‘不’字……”罗老师讲述的时候，眼睛里都噙着泪水。

刘老师年轻时很漂亮，即便穿的用的都是学校后街的“三无产品”，依旧难以掩盖她的美丽。罗老师说，当时刘老师打工的一家公司老板的儿子相中了她，拼命追了大半年，给她许下了“有车有房未来老板娘”的承诺。可刘老师根本不为所动，甚至连老板儿子送给她的那些礼物，都被她想办法换成钱，又都给了罗老师。

罗老师以优异的成绩硕士毕业后，在陈校长建议下，当年便考取了南京某高校的博士研究生。但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罗老师再一次犹豫了——那时他的家境已经更为摇摇欲坠了。

2002年，罗老师的母亲积劳成疾，在一次入院就诊时被查出罹患重疾。那时他的两个弟弟都还在读书，母亲在电话里哭着对罗老师说：“不要再读了……你爹卧床不起，家里实在支撑不住了，赶紧找个工作赚钱吧……已经读完硕士了，出来工作足够了。”

接到母亲电话的那晚，罗老师彻夜未眠。那张博士录取通知书就放在刘老师出租屋的桌子上，罗老师把它反复拿起又放下。

“咱这种专业，不像理工科，学成了出门就能找到赚钱的工作。哪怕就是毕了业，以后也要熬资历，可能得坐好多年的冷板凳。靠读书赚钱，那时想都不敢想啊！”后来有一次罗老师对我说。

第二天凌晨时分，罗老师终于下定决心，把录取通知书折了几折扔进了垃圾筐。然后离开出租屋去了附近网吧，想去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

天亮之后，当罗老师回到出租屋时，刘老师已经醒了，正盘腿坐在床上，手里拿着昨晚那份从垃圾筐里拣出来的录取通知书，脸上挂着泪

水。一见罗老师就对他说："能读、想读就继续读吧，有我呢，我可以继续赚钱帮你……"

罗老师说，那一刻他羞愧得想从8楼的出租屋窗户跳下去——同龄的女孩子还在攀比谁的男朋友送了更贵重的礼物，谁的婚礼要去国外举行，谁的未婚夫在市区买了大房子，而自己的女朋友，苦等3年，还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来供养自己。

"她家也不是那种很有钱的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兄弟在读书。她的父母根本不会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我读研那几年，她也是一直瞒着家里……"

那天，两人在出租房里抱头痛哭。罗老师一直对刘老师说"对不起"，说自己不但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反倒不断地给她增加负担，未来也不知道在哪里，要不就算了吧。两人就此分手，自己欠刘老师的，以后会加倍偿还。

刘老师听完，扇了罗老师一个耳光。

3

罗老师在南京读了3年博士，刘老师又像当年从河南去武汉一样，跟着罗老师去了南京，找了一份工作，继续资助着男朋友的学业。

“那时我在学校读博，每月只有500块钱生活补贴，刚够一个人吃饭。她开始在学校附近找了份工作，每月不到3000块钱的工资，后来为了多赚一点，换去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虽然每月多了800块钱，但每天上下班要多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

博二那年，罗老师在校外培训机构找了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按课时给钱，每月大概1000元的收入。干了半年，攒下了6000元钱。他把钱分成3份：2000元寄回家去，2000元交给刘老师，最后的2000元，买了台三星手机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刘老师。

罗老师说那是他读书期间送给刘老师最贵重的礼物。那晚，刘老师抱着手机哭得一塌糊涂。罗老师把刘老师揽在怀里，说自己以后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兼职，就不用她像以前那样辛苦了。刘老师却坚持把手机还给了罗老师，让他以后还是安心学习，上学期间不要想着赚钱，“你肯定要赚钱的，但不是现在，我不稀罕你这时候耽误读书的时间出去赚钱送我手机，我要的是未来，懂吗？”

自那时起，这句“我要的是未来”深深印在了罗老师脑海里。

最后刘老师还是收下了那台手机，一直用到两人结婚前。而给她的那2000元钱，后来也被她以罗老师的名义打给了罗老师的弟弟——那年他弟弟在河南读大学，虽然学校有助学贷款抵掉了学费，但其他费用依旧需要家里四处筹措。

“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以她的个人条件，完全可以趁年轻找个各方面都远比我好的男人，结婚、买房、生孩子、过好日子，但她却一直守着我，守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罗老师说，刘老师不是不向往那种富足的生活，只是不愿给他压力。身边同龄的女孩子都在关注结婚、买房、买车，刘老师也偷偷关注过房市，但两人都很清楚，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买房结婚依旧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直到2005年之前，刘老师一直都瞒着自己的家人与罗老师交往。她骗父母说，自己从武汉“调动”到南京，是因为“业务能力突出，被公司派至南京负责新市场的开拓”。

但她父母担忧的是，眼见着女儿就奔着30岁去了，却从没听她说过谈恋爱的事情。在老家帮她物色过几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小伙子，据说其中一位还是他们县里某领导的儿子，一见刘老师的照片就喜欢得不行，甚至还说，反正自己也是做生意，“愿意回老家就回来，不愿回老家两人以后一起在南京发展也行”。

可刘老师都拒绝了，只推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考虑婚恋问题。开始父母还由着她，等到2005年3月，刘老师的父母找到了南京，才终于发现了女儿的秘密。

既然如此，刘老师只得向父母承认，罗老师是在读博士，两人从武汉到南京，已经谈了多年恋爱，但对罗老师的家庭情况以及这些年来一直资助罗老师读书的事闭口不提。

起初，刘老师的父母对罗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但随后问起罗老师的家庭情况时，虽然刘老师不断给他使眼色、打圆场，但罗老师依然不想欺骗老人。没说几句，就连同这些年来一直接受刘老师资助的事情，全摊牌了。

刘老师的父母当场目瞪口呆，勉强忍耐着回到老家，随后马上就在电话里与女儿翻了脸。先是把刘老师臭骂了一顿，然后就勒令她跟罗老师分手，马上。

刘老师的父亲说：“这些年你在外工作，没给过家里一分钱。父母也没多问，就想着你能在外地生活得宽松一些。前年家里修房子差两万块钱，问你拿一点，你说没钱；去年你妈去郑州住院，想让你回来陪陪，你说要上班没时间；今年你弟弟考上大学想买台电脑，想让姐姐‘贴补’一点，你说‘不凑手’，一分钱没给——现在才知道，原来你的人和钱都‘倒贴’给了一个穷小子！”

父亲问刘老师“图什么”，刘老师说自己什么都不图，就是看上了他稳重、实在、执着。父亲问她有没有考虑过跟着罗老师以后日子会有多难，刘老师说，她自己愿意。

母亲心疼女儿这些年日子过得辛苦，劝她不要犯傻，还是找个条件好的嫁了吧。罗老师这样的，现在连工作在哪儿都说不定，怎么敢在他身上有所指望？刘老师却说：“我不在乎，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给我一个未来。”

4

2006年4月，刘老师瞒着父母与罗老师结了婚，婚房就是学校分给罗老师的博士生宿舍。

没有典礼，没有宴席，甚至没有双方亲友的祝福。那时罗老师正忙于自己的毕业答辩。两人领了结婚证之后，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饭店请了几位同学同事，算是婚礼。

得知女儿私自成婚的消息，刘老师的父亲直接闹到了学校。他先去找了罗老师的博导，要求学校给他个说法，又去了学校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报案说自己的女儿被罗老师“骗婚”。

罗老师的博导劝老人家要“往长远里看”，而派出所在了解情况后，也表示罗老师和刘老师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合，没有违反任何现行法律。派出所对此事也是无能为力。

老人气得叫来了老家的亲戚，要教训罗老师。好在学校提前发现了苗头，和派出所一起及时将事态平息。

最后，老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放话给罗老师，只要自己还活着，就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

刘老师的父亲的确说到做到，女儿结婚后的前3年，他一直不认罗老师这个女婿。逢年过节罗老师陪刘老师回娘家，从来见不到岳父。岳母虽然会露面，但也对女婿没有好脸。甚至连读大学的小舅子，对自己的姐夫也如仇人一般，言语中充满了蔑视与挑衅。

罗老师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的处境后，东挪西凑了3万块钱，拖着病体来到刘老师的娘家，想替儿子“说和”一下。但刘老师的父亲直接将钱扔出了屋外，让她“别费心思”了。等到2008年，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刘老师的娘家人也没一个来探望。

讲起这些往事，罗老师时常忍不住心酸，说那时在岳父一家人的眼中，自己就是一个“用手段把女儿弄得五迷三道”的骗子。

直到2009年，两家人的关系方才缓和——原因很简单，那年罗老师终于买了房。

那是一套二手房，总价40多万，他交了十几万的首付——这里面包括他和刘老师婚后3年所有的存款，信用卡套现出来的一部分，还有从同事手里借来的钱。

有了这套房子，罗老师对刘老师和岳父岳母总算是有了一点交代。我去过那套房子，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里。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老房主留下了旧家具和几样简单的家电，整个房子被罗老师夫妇布置得井井有条。

“好的起点就是成功的一半”，那时的罗老师非常欣喜。他感谢妻子、感谢学校、感谢所有的一切，因为自己从没想过能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根发芽。

买房之后，岳父岳母第一次来到了他们家。岳父虽然嘴上还是有些不忿，但第一次和女婿喝了酒。爷俩儿干了一瓶12年的“白云边”。

那时候，我由衷地敬佩罗老师。他2006年底回校入职，每月工资只有4000多块，而那时学校附近的楼盘均价在7000块左右——想想自己，参加工作3年后，工资卡上的存款也不过刚够在武汉买个卫生间。

按照罗老师的做法，他每月连同房贷、信用卡至少要还四五千块，正好就是他那时的工资总数，而他老家的父母还需要贴补。我问他：“工资都还贷款了，生活怎么办？”他笑笑说：“还能怎么办，‘开源节流’呗。”

所谓“开源”，就是在校外寻找兼职——虽然学校给青年教师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很重，但他还是私下找到了一家培训机构，每天晚上出去上课，每月有两三千块的额外收入。

虽然操劳，但罗老师总说，那段日子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步入了正轨，一切也都有了希望。

5

2012年中旬，我回校参加一位教授八十大寿的生日宴时，得知罗老师买车了——在酒店吃完饭，我和硕导在楼下等出租车，罗老师开着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们跟前，请我们上他的车，说送我俩回去。

那天他没喝酒，但看上去依旧红光满面。硕导坐在副驾上和罗老师聊天。我坐在后排，浓浓的新车味道扑鼻而来。

罗老师说，这车总价14万，他贷了8万多，每月还2000多。硕导就开玩笑，你家离学校走路不过10分钟，买这玩意干啥？罗老师说："人家都有，咱不也得搞一个？"

罗老师又说，他最近又在外面的出版公司接了一个编写教辅资料的私活，想邀请硕导一起做。硕导说他知道，出版公司给的酬劳虽然不错，但时间太紧。之前也有人找过他，他没接。然后又劝罗老师悠着点，学校的事情已经够忙了，他本来就在外干着兼职，哪还有时间再接这种活？

罗老师叹了口气，说没办法了，自己已经收了出版公司的预付款，不然这辆车的首付哪儿来的？

硕导转而又埋怨他这车买得没有必要，那钱留着干啥也比买车强。罗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这是老婆和岳父母强烈要求的。儿子上幼儿园了，"别人家孩子都是车接车送，自己儿子天天坐公交，说不过去"。

硕导有些不解，说学校的附属幼儿园不就在家属院里么，怎么还要坐公交？

罗老师说，他儿子去了一家有名的"国际双语幼儿园"，离家很远。这是刘老师决定的，说以后要把儿子送去国外读书，从小要打好基础。

硕导没再接话，只是下车时拍了拍罗老师的肩膀，说了句："小伙子，加油吧。"

送硕导上楼时，我问他罗老师儿子上的那个"国际双语幼儿园"名字这么唬人，收费应该不低吧。硕导笑了笑，说具体多少钱他不知道，"但凭现在公安局开给你的工资，应该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罗老师的生活很节俭。

那时候，我每隔两三个月能见他一面，每次他都穿着一件同样的衣服，夏天是白色T恤，冬天是灰色羽绒服。2014年一次吃饭时，他听说公安局发给我很多衣服，自己穿不完，便让我给他几件没有"警察"标识的。我问他干啥用，他说在家打扫卫生时穿。

我给了他两套没有标识的作训服，冬夏各一套，没想到自此之后再见面，他便一直穿着这两套衣服不脱。硕导跟他开玩笑说，你堂堂一个副教授，弄得跟学校保安似的。罗老师却笑着说，这衣服跟保安制服不一样，纯棉的，穿着舒服不说，还耐脏。

硕导私下里跟我叹气，说不知你罗老师两口子着什么急，好好的日子非要过成这样。不久前，罗老师又来找硕导借钱了，一开口就是10万——刘老师不知从哪里听到的风声说武汉的房价马上将有一轮暴涨，最近学校里不少同事都在想办法凑钱买新房。和刘老师要好的一位学校老师已经看好了楼盘，约刘老师一起"团购"。

那是2015年上半年，当时罗老师身上的房贷、车贷、信用卡都还没有还完。孩子上学要钱，每月还要资助双方父母，实在拿不出闲钱。但刘老师对于买新房的态度非常坚决，无奈之下，罗老师只好找身边要好的同事朋友借钱。

硕导建议他不要再给自己平添压力，即便付得起首付，后期的还款也会让他喘不过气来。罗老师说，自己又接了一份私活，现在还有

个“副教授”的名头，外面给的钱也多，还款应该没什么问题。

硕导见劝不动，便又建议他，真要买新房，就把现在住的那套二手房卖掉，不然供两套房子谁能受得了？但罗老师说，刘老师不愿意，说是要留着以后涨价再卖，而且以后他们的父母来武汉养老，也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硕导有些恼火，说你老婆怎么想什么是什么，她不看看你们的经济情况吗。约她“团购”新房的那个老师，父母以前都在政府机关上班，老公还是做生意的。人家父母都能给资助，你家能吗？你想累死自己吗？

罗老师却说，刘老师也在外面找了兼职，她说趁年轻的时候拼一把，“房子是保值的，好日子在后面”。

罗老师最终还是买了那套新房。硕导借给他8万块，陈校长也借给了他一些。加上身边同事、朋友和信用卡套现的钱，终于勉强凑够了第二套房的首付。

交房那天，罗老师请大家吃饭，我也去了。席上，刘老师问我在武汉有没有买房，我说没有，“之前存款还能在武汉买个厕所，现在估计只能买马桶了”。

刘老师笑着说，你是公务员，很好贷款，赶紧跟家里要钱付首付，不要把钱都“胡花”了。不然以后真的连马桶都买不起了，看你怎么娶老婆。

我开玩笑说，罗老师当年只有南京的一间博士生寝室，你不也嫁给他了？刘老师嗔怒地看了罗老师一眼，转而对我说：“现在女孩子哪有我那时的眼光？你连马桶都买不起，看有人嫁给你不？”

大家都笑了，罗老师也在笑，但我从他的脸上，却分明看出了疲惫和无奈。

6

时间又过了两年。罗老师39岁时，在外人眼中无疑是一个成功者。

在校内，他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没的说，承担着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课题项目，名字常年出现在学校优秀教师公告栏上。

在校外，他时常受邀开办讲座，名片上除了“××大学副教授”外，还有一连串的头衔——“××大学客座教授”“××公司顾问”“××协会理事长”，这些头衔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据说他外出一次两小时的讲座，就能拿到5000块以上的酬劳。

一次，我为考博去找他，拿着一本书问他应该着重看哪些内容。他看了一眼参考书封面，就告诉我：“这本不用看，写得不好。”我问他为啥不好，他说，这本书就是他写的，书里的观点都是四处摘抄的。我说这书封面上的作者名字不是你呀。他说这是他受人所托“代笔”的，那人出书是为了评职称，他则只是为了赚一笔稿酬。

我问他写这么一本书能赚多少钱，他说没多少，一万多点。

我说您也不像缺这点钱的人啊，怎么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他只是笑笑，没再说话。

那时候，罗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眼见着每况愈下了：以前一头浓密的黑发成了“地中海”；时常咳嗽，他说是因为平时太累、吸烟太多的缘故；走几步就喘，满头大汗，大伙坐车去饭店的路上他都会睡着，醒来后又说不好意思，自己昨晚忙到凌晨4点多。

但在饭局上，他却很亢奋。两杯酒下肚，说还是刘老师眼光毒辣，第二套房买了之后，武汉房价真的又暴涨了一轮。2015年买的那套房子现在已经翻了番，按照现在的房价，他至少能赚100多万。

有人劝他趁房价高赶紧卖一套，这样不但能少些压力，还能把以前的贷款清了。罗老师却摇摇头，说卖了住哪儿？买了新房后，妻子把岳父岳母接到武汉来养老了，就住在以前那套二手房里。

硕导借机问罗老师他自己的父母怎么样了，他说父亲前些年已经离世，母亲现在在武汉治病，一个弟弟帮忙照顾着，但以后估计还是自己的事。

他叹了口气又说，两个弟弟都不成器，一直在外打工，小弟连婚都没结，根本无力照顾母亲。他是家中长子，又是学历最高、最有出息的，以前为了读书，没能给家人做什么贡献，现在有能力了，得负担起来。

我说你这边的房子够大，把老太太接过来不就行了？罗老师却苦笑着摇摇头："你是还没结婚，不知道家里的事情有时比外面更复杂。"

那天，罗老师没给我解释"更复杂"的意思，后来还是在陈校长的口中，我才大概知道了罗老师说那句话的原因。

2017年初，罗老师找到了陈校长，想"走后门"申请学校家属院的"指标房"。

陈校长很生气，因为按照政策规定，罗老师在武汉已经购有两套住房，根本没有资格再申请学校专门给无房教师的"指标房"。陈校长埋怨罗老师说，当初买房时劝过你再等等，也说了学校对新进教师有住房待遇，房子已经空出来了，只是政策暂时没有出来，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就会有"指标房"，但你偏沉不住气，非要自己买。

罗老师则苦着脸说，当时实在是不买不行，刘老师一直在催他，两人几乎天天为了房子的事情吵架。而这次他来"走后门"的原因，是刘老师不让患病的婆婆跟自己一家同住，让他"有本事再去搞套房子"。于

是他就想到了学校的“指标房”——虽然没有产权，但2000块钱一平，只有校外房价的1/10。

陈校长很生气，拒绝给自己的弟子“开后门”，并直接告诉罗老师管好自己的老婆，“人的欲求是没有尽头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并非是罗老师第一次找陈校长“开后门”，就在跑“指标房”不久之前，他还找过陈校长，求他给刘老师办一个“正式编制”。刘老师当年以大专学历进入学校工作，本来就是陈校长帮忙的。随着学校竞聘上岗政策的日渐严格，她越发感觉到自己“人事代理事业编制”的岗位不稳，于是要求罗老师帮她上下打点，想办法去掉“人事代理”4个字。

但无论是“转正”还是“要房”，陈校长都没有满足自己的得意弟子。罗老师没办法，只能暂时租房，将出院后的母亲安置下来。

7

最后一次与罗老师吃饭是在2017年10月，那次他借口为我“回归母校”接风，把我的硕导和另外几位要好的老师约在一起。

那天他的状态十分低沉。服务员送上菜单，他看也不看直接扔给我，让我想吃什么就点，自己却点了一根烟，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再买一套房，但自己确实已经负担不起；要么跳槽，去一个能给自己更好待遇的学校。

这其中的第二条路是刘老师给他“找”的：当时市里另一所高校为建设“双一流”，出台了“人才引进”制度，按照罗老师的条件，完全可以拿到不菲的“安家费”或市内的一套住房；另外，那所高校还承诺解决配偶的“事业编制”。陈校长已经同意他“跳槽”，但前提是，必须先把所承担的本校课题结题。

在座的各位老师纷纷劝他不要冲动，有人说，“这就是陈校长不想让你走，2年期限的课题，5个月你怎么完得成？”也有人说，“你再跟刘老师沟通一下，事业编虽然重要，但一家人没必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罗老师却苦着脸说，家里那边已经没得商量了，自己前几天为了这事已经跟刘老师吵过一架了，他一时生气说这样下去两人怕是过不下去了。刘老师闻此，转身就去厨房拿着菜刀喊着要自杀，说自己当年瞎了眼，大好青春，节衣缩食，供了他这么个白眼狼，早知现在，当初就该去跟那个富二代当个阔太太。

一说到过去，罗老师就 㞞了，他开始给刘老师道歉，求她给自己一段时间考虑。

一位与罗老师关系很好的同事实在没忍住，说：“你老婆过分了，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个什么鬼样子？40岁的人，看上去比陈校长还沧

桑，你参加工作几年？满打满算11年，房子买了一套又一套，车子刚还完贷款又换一辆——现在把她父母接到武汉来了，还要再帮她换工作，这样下去还有完吗？她当年供你读书确实让人感动，但现在看来，她那是在找长期饭票，而当下则是杀鸡取卵！”

以前罗老师绝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说刘老师的不是，但那次不知是真的累了，还是看在多年好友的分上不好翻脸，只是低头抽烟，没有和那位同事计较。

整个饭局上，罗老师只是闷头喝酒，很快就醉得不省人事。散席后，大家一起送他回了家。回来的路上在众人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前些年刘老师的弟弟结婚，岳父让罗老师拿了12万彩礼钱，去年刘老师要换车，罗老师又贷款买了一辆小30万的MINI Cooper。

刘老师现在是学校里有名的“精致女人”，戴着3万块的表，拎着5万块的包，不时与她的“好闺蜜”们去香港走一圈。而罗老师依旧不时穿着我当初送给他的那两套作训服，出现在校园里。

“人家的日子有人家的过法，你们当着学生辈的面扯老师的家事做什么！”硕导顾忌我在车上，回头让那几位年轻老师说话注意场合。

老师们不再议论，但送硕导上楼时，硕导却又专门转头对我说：“以后娶媳妇，眼睛要擦亮些。”

8

罗老师离世那晚，他正在加班忙着给手里的课题结题。他那段时间几近癫狂，因为那所承诺给他房子，并给刘老师解决事业编制的高校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年后若不能办理调动手续，他们将放弃对罗老师的引进。

陈校长又给他做了几次思想工作，劝他不要着急，在学校好好干，评上“正高”职称后收入和待遇自然会更上一层楼，到时房子也就有了其他解决途径。即便想走，那时与新单位谈判的筹码也会大很多。

罗老师说自己实在等不了了，再不走，妻子就要跟自己离婚了。

陈校长看他真是可怜，只能叹了口气，同意他把项目移交出去，赶紧去新单位报到。罗老师嘴上答应了，项目却依旧在做。陈校长很是诧异，反复询问下，罗老师这才说了实话——那笔项目的经费他已经套出来花了，因为刘老师“要用”。

那次，陈校长一怒之下，差点把罗老师交去纪委，最后还是看在师徒一场的分上，自掏腰包给爱徒平了账。

罗老师万分感谢，承诺一定会给陈校长一个交代，不料仅仅几天之后，他就因过度劳累引发心梗，在凌晨的办公室里离世。

与学校反复交涉后，刘老师看确实无法“转正”，便索性于2018年年中辞了职，把孩子交给父母，自己去了外地。

有人说她去了南京，有人说她去了深圳，还有人说打开她的朋友圈，里面全是面膜和护肤品的广告，可能是做了微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后来我问硕导。

硕导沉思着摇摇头，说，也许只有罗老师和她自己知道吧。

除夕夜，我提着饺子奔赴抓捕前线

1

2016年2月7日，除夕。傍晚5点，我突然接到上级电话，辖区突发恶性案件，嫌疑人周某因赌债纠纷致一死一伤后潜逃，且扬言要继续报复其他人。上级要我订最近一班列车回到岗位，务必在第二天中午前与同事集结。

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多问，赶紧用手机查询时间合适的列车，然后订了最近一班返程车次，但距离发车时间，只剩一个小时了。

年夜饭是无论如何都赶不及吃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告诉母亲我马上就要走。母亲很吃惊，手里的餐具还来不及放下，愣在原地，问家离单位那么远也要回去？我说没办法，命案为大，嫌疑人情况只有我了解，不回去不行。

母亲赶紧喊父亲，父亲从厨房钻出来，听说我马上要走也吃了一惊。我又解释了几句，父亲便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说这会儿菜还没做好，但饺子已经包好了，他现在就去煮，吃完再走。说完又钻进厨房。

从家到火车站，平时打车也要半小时，眼下大年夜，还不知能否叫上车。我本想说，怕是饺子也来不及吃了，还得去火车站取票，但还没开口，手机就又响了——现场的同事打电话过来询问嫌疑人的社会关系，他们正在布置搜捕。

我只好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和同事讲电话，母亲赶忙过来接手，让我去一边坐着说。

嫌疑人周某是我的“老熟人”。他曾是市里一家企业的基层干部，8年前因职务犯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成为我负责辖区的“重点人口”。

入狱前，周某曾“风光”过好几年，是外人眼中衣着光鲜的“周大哥”，同事口中一言九鼎的“周科长”；入狱后，周某不仅被原单位开除了公职，妻子也带着儿子和大部分财产远走他乡。这些年，周某一直在向我传达自己想要“东山再起”的念头——他在本地搞过小工厂，去省城开过饭店，还去云南倒过玉石——但许是运气不好，生意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把他离婚后分到的为数不多的财产赔了个精光。

再往后，周某开始流连于赌场，其间我拘留过他几次，但毫无效果。同事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月前，一位韩姓赌徒约周某“合作”赚钱，周某听信后，在外借了高利贷与韩某在赌场“坐庄”，不料韩某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蒙骗周某。两人“坐庄”一个月后，周某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把借来的高利贷赔得一干二净。

年前，终于发觉端倪的周某找到韩某，在其逼迫下，韩某承认了自己与吕某、张某二人合伙给周某“做笼子”的事情，但此时，钱财已被三人挥霍一空。周某一怒之下捅伤了韩某，并在邻县一家饭店包间内将吕某杀死。潜逃时，周某随身携带凶器，警方高度怀疑，他要继续寻找张某报仇。

如此持械潜逃且去向不明的举动极度危险，同事不断向我解释说，眼下大家都回岗备勤了，若非情况紧急，绝不会大年夜叫我回去。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能托他转告领导，马上出发，一定按时到达。

10分钟后，电话收线，我起身想去继续收拾行李，但母亲已经把装好的行李箱推到了门口，父亲也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饺子好了，抓紧吃点，你最喜欢的韭菜肉馅……”父亲说。

我看了看时间，确实来不及坐下吃了，想开口，但父亲的表情非常复杂。想起自己去年也因为值班没能在家陪他们过年，实在不知该怎么说。

父亲见我站着不动，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叹了口气，说时间确实来不及的话，那就带一些在路上吃吧。“老家讲究这个，一年到头，在外的人总得吃顿家里的饺子。”说完，他又一次回了厨房，再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装满饺子的保温桶。

车已经到了楼下，我接过保温桶，想跟父母再说几句话，反而不知该说什么了。父亲笑了笑，把一小瓶白酒塞到我手里，说路上吃饺子的时候喝，“快去吧。饺子酒饺子酒，越喝越有……”

2

大年夜，路上非常空旷。司机开得飞快，说接到我这单纯属意外，本来自己赶着回家吃年饭，不料忘了退出网约车系统，被“强行”派了单。他问我为什么大年夜要去火车站，我说我是警察，刚接到返程命令。他叹了口气，从扶手箱里掏出烟来递给我，说想抽烟的话在车上抽就行，他送完我就不接新单了。

一路上手机频繁响起，不断有同事打电话来询问各种情况——刑侦同事找我了解周某在本地的关系网，比如他可能会投靠的关系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网安和技侦同事也发现了一些可疑信息，找我核实相关线索。眼看发车时间临近，我趁同事电话的间隙，给在铁路公安的同学张龙打了个电话，请他帮我协调一下取票和进站时间。

彼此都是警察，对于除夕突然返岗，张龙并没表现出太多惊讶，只是让我放心。

到火车站时，张龙已经全副武装、开着巡逻电瓶车在站前广场等我了。上了电瓶车，我才知道原来当晚恰好是他值主班。他说大年夜我坐的那趟列车没多少乘客，他联系了跟车乘警沈警官，托他帮我找了个空铺位，至少晚上可以睡一觉。

我和张龙是高中同桌，关系铁到生锈。他小我一岁，警校毕业后进了铁路公安，一直在站前派出所上班，年前刚刚结婚。当时他给我发了请帖，但紧接着就说：“礼金到了就行，人就别来了。”这话放在外人那里有些不中听，但做我们这行的，心里都清楚话里透出的体贴。

那时我正在忙一起专案，确实不可能参加他的婚礼。本来我俩还约着，年初三晚上一起吃饭叙旧，却因这个突发事件，提前见了面。

我跟张龙开玩笑，“你也点儿够背啊，都算单位的老杆子了，刚结婚就在值班室过年，弟妹不骂你？”张龙哈哈一笑，说自己本来也有点

憋屈，但接到我电话，心情一下就好了，他这在值班室过年的，总好过我这在车厢里还过不上年的。

我作势捶了他一拳，张龙没躲，问了我几句案子上的事情，我拣能讲的给他说了几句。末了，张龙嘱咐我注意安全，“挑年三十犯案子的家伙八成是个亡命徒”。

张龙跟我一起上了列车站台，沈警官正在站台上执勤。沈警官50多岁的年纪，二级警督，执勤帽下面露出的鬓角已经花白。寒暄了几句，便准备接我上车。这时，张龙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跺脚，说自己忘了点事，让我等他一下，说完转身就跑。

我给沈警官递烟，他摆手说自己执勤，不方便，说知道我在哪个车厢，一会儿开车了去找我。我站在车厢前一边抽烟一边等张龙回来。手里的保温桶沉甸甸的，想来父亲至少给我装了2斤水饺。估计张龙值班也没得吃，正打算等他回来分他一半。左等右等不见人，我给张龙打电话，他那边显示正在通话。我看开车时间差不多了，丢掉烟头进了车厢。没多久，列车员就把车门关了。又过了几分钟，列车“吭哧”一声，看样子是准备出发了。

突然，我看到窗外一个硕大的身躯张牙舞爪地跑过来——张龙一米九几的个头实在显眼，手里还拎着个袋子。等他跑到近前，列车已经缓缓动了起来。张龙使劲用手敲窗玻璃，我急忙开窗，他一下把袋子塞了进来，一边跟着列车向前跑着，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你弟妹下午送过来的饺子，韭菜馅的，大过年的，你路上垫一下……”

3

列车向南疾驰，大年夜的车厢里确实没几个人。窗外的天空中炸开朵朵烟花，我坐在座位上，想起了上午买来本打算年饭前放的鞭炮，又想起送我出门时父母的眼神，再看看眼前小桌板上的两份水饺，心里忍不住有些感伤。

刑警大队的电话还是隔一会儿一个。电话里，同事刚哥问我车次和抵达省城的大致时间，说局里抽调了40多名民警，成立了案件专班，一共分了5个探组，我所在的探组，探长是毛哥，他带的一组人今晚已经前往省城搜捕了。

刚哥让我下火车后直接联系毛哥，他会去接我。我想起年前毛哥的老婆生二胎，现在应该还住着院呢，便问刚哥他不是在医院陪床吗？刚哥叹了口气说，连你这在外省的都被叫回来了，能跑得了他？

最后，刚哥嘱咐我，见面后千万别跟毛哥提嫂子生二胎的事儿。毛哥正在气头上，刚才他俩通电话的时候，毛哥说要把那人“剁成饺子馅”。

晚上7点半左右，沈警官大概完成了一轮巡查，来到卧铺车厢。看我面前的两份饺子都没有动，招呼我跟他去餐车。

我顺手提上水饺跟沈警官走，沈警官说他那儿有饺子，但我执意要把父母和张龙送我的水饺带上。两人摇摇晃晃穿过四五节车厢，沈警官的两位同事和一位阿姨正在餐桌旁等待。

我跟他们打了招呼，彼此简单做了自我介绍。除沈警官外，年纪和我相仿的是刘警官，胖乎乎的，一笑脸上就有两个酒窝；年轻一些的是刚入职的小陈，还在实习期；阿姨姓王，是沈警官的爱人，50多岁的样子，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几人面前的铁饭盒里都有饺子，另外桌上还摆着几个菜，炸藕合、炖排骨、木须肉和西红柿炒蛋。沈警官说这

些菜都是王阿姨在家做好带上车的，饺子是鲅鱼馅，王阿姨亲手包的，让我别客气，放开吃就行。

我有些不好意思，也把带来的水饺打开放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聊，很快熟悉起来。刘警官比我大一岁，当警察第7年，这是在火车上过的第3个除夕；小陈去年6月刚刚大学毕业，长得很秀气。大概是头一回在火车上过年，还有些不太适应，话也不多，只顾闷头吃饭，偶尔掏出手机发几条信息。刘警官就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在给女朋友发消息。小陈不置可否，脸上满是羞涩。

沈警官问了一下我的情况，案情方面我暂时不好多说，只能大概讲了讲。沈警官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干咱们这行的，得适应这种工作节奏。“旧社会有句话讲，过年过年，地主过年，老百姓过关。现如今放在我们身上，就是老百姓过年，警察过关啊。”

大家都笑了，我也无奈地笑了笑。沈警官提议刘警官和小陈一起敬我这个“远方的战友”一杯，大家纷纷举起了桌上的保温杯。王阿姨忽然说：“大过年的，你们上班不能动酒，但小李（指我）今天又不在岗位上，他可以喝点啊？”

沈警官马上站起来，问餐车乘务员买酒。我忙说自己有，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我的一小瓶白酒。刘警官把酒凑在鼻孔边，使劲儿嗅了嗅，说自己也想来一口，被起身去拿杯子的沈警官听见了，故作生气地训了他一句。刘警官就笑嘻嘻地给我倒满，说这点酒哪够他喝。

酒过三巡，我问沈警官跑车怎么还带着家属。沈警官说，自己的儿子也是警察，在外地上班，今年过年回不了家。自己在车上过除夕，王阿姨不愿一个人在家，索性买了一张车票，陪沈警官一同在车上过年。

我又问沈警官，这是在列车上过的第几个除夕。沈警官想了一会儿，说太多记不清了，自己当了30多年铁警，在车上过的除夕，总有十七

八个了吧。

我举起酒杯，表示要敬“老前辈”。沈警官笑着用保温杯跟我碰了碰，说现在自己已经习惯在车上过年了，在家过年反而觉得别扭。刘警官就在旁边一脸坏笑，说沈叔你就讲讲自己年轻时为啥非要在火车上过年的事情呗！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才得知王阿姨退休前也在铁路部门工作，年轻时是列车上的乘务员。30多年前，两人在一班除夕夜的列车上相识，后相恋结婚。由于夫妻经常有一方要在列车上跨年，另一方索性也就主动申请值除夕夜的班儿了。尤其是前些年，儿子也去外地当了警察，过年回不了家的时候，沈警官夫妇总感觉在家过年少了点什么，索性直接回到车上，找寻“年轻时的感觉”。

“所以我说在家过年反而觉得别扭嘛，有家人的地方才叫家，一个人搁家蹲着，那有啥意思？”沈警官哈哈笑着，把保温杯里的花茶一饮而尽。

4

晚上9点，桌上的菜和水饺被大伙扫荡干净。沈警官问我们吃饱没，没吃饱的话餐车还有菜可以加，平时饿肚子没事，年饭一定得吃饱。大家都笑着说饱了，刘警官更是捂着肚子说饺子已经填到喉咙。

我和大伙告辞，几人相互留了联系方式，约好之后有时间再聚。大概是酒精的缘故，刚上车时的伤感不见了。我躺在铺位上睡不着，掏出手机看，发现单位的两个微信群里十分热闹：一个微信群里，有人发拜年祝福，还有几位同事在群里撒红包，大家都嘻嘻笑笑；另一个群里，同事们还在四处搜捕嫌疑人周某，不时相互交流几句现场情况。有文字也有语音，有时还伴有纷乱嘈杂的背景音，气氛十分紧张。新年的喜庆与搜捕的紧张相互穿插，有种时空交错的怪诞感。

周某还没有找到。一组民警在搜查旅馆时，偶然发现有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在群里请示领导如何处理。领导指令将卖淫嫖娼一事移交辖区派出所处置，专班民警继续搜捕周某；另一边，寻找张某的一组民警已抵达其住处。听闻周某对韩某、吕某的报复行为后，张某妻子叫回了藏匿的丈夫，民警随即对张某采取了强制措施；刚哥一组正在驱车前往邻市的路上，嫌疑人周某近期与住在邻市的舅舅有过频繁通话，刚哥等人前去排查。

毛哥在群里找我，又嘱咐我在车上好好睡一觉，养好精神，这次任务重，回去之后有的忙。让我下车之后马上给他打电话，不要乱跑，他会在出站口等我。

早上6点半，我被刘警官叫醒，问我昨晚睡得如何，我说一切都好。问他休息得怎样，他说大致还好，只是凌晨时遇到一起警情，已经处理完毕了。

两人又聊了几句，车到站了，刘警官和小陈送我下车。我说想跟沈警官打个招呼，刘警官说昨天夜里沈警官处理警情到后半夜才睡，这会儿还没醒，就不来送我了。分别前，刘警官嘱咐我搞案子注意安全，下次休假回家时记得给他打电话，到时他约上沈警官、小陈和张龙，大家一起吃饭。

目送列车缓缓启动远去，我拨通了毛哥的电话，拉起行李匆匆往站外走。

大年初一的清晨，火车站有些冷清，站前广场显得十分空旷。进出站的人少了很多，一些临街商户也已关门歇业。周围三三两两的行人拖着重重的行李，步履匆匆，但脸上大多洋溢着过节的喜悦。

我按照之前跟毛哥的约定走到广场尽头，看到了正在闪灯的警车。坐进车里，我赶紧询问案子的事情，毛哥却从后座拿过一个塑料饭盒，让我先吃点东西，案子上的事情，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讲。接过饭盒，竟然也是饺子。

我记得毛哥平时不爱吃饺子，去年过年，大伙在所里包饺子，毛哥就自己跑到备勤室煮面吃。

我问毛哥怎么突然换口味了，毛哥哂笑着，说估摸我坐了一夜火车，早上还没吃饭，本来想找个地方买些早点，但找了一路也没发现还在营业的餐馆，这才想起今天是大年初一。饺子是他在便利店买的速冻水饺，便利店服务员小哥帮忙煮的。“你们北方年饭流行吃饺子，按你昨晚上车的时间，估计你也没赶上家里的饺子，这速冻水饺的味道肯定不如家里做的好吃，但总归是那么个意思，赶紧趁热吃了吧。”

我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一下忘了昨晚刚哥的嘱咐，问起了毛哥嫂子生二胎的情况。话一出口才想起来，有些后悔，但毛哥并没有发脾气，只是叹了口气，说自己连夜把父母从家中接到了医院，现在妻子

情况还好。估计案子搞完了，孩子也差不多生下来了，到时一同去家里做客，他还要拜托我帮他给孩子想个“有内涵”的名字。

速冻水饺是香菇肉馅的，无论个头还是味道，确实不如家里父母包的，更没法跟沈警官带去的鲅鱼馅饺子相提并论。但毛哥十分体贴地买了一盒老干妈辣椒酱，我风卷残云地消灭了这一盒水饺。毛哥看了看空饭盒，没忍住念了句“真他娘的能吃”。

和毛哥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随口问了句他的大儿子谁在照顾，毛哥却冒出一句“不知道”。我有些吃惊，说你这爹咋当的？毛哥也愣住了，这才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让我用他的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大儿子今天怎么安排。好在家人告诉他，大儿子一早就被送去了小姨家，毛哥才放下心来。

毛哥继续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交代今天要做的事情。他说嫌疑人周某在汉阳有一个以前关系密切的狱友，周某开饭店时曾得到过那名狱友的帮助。有情报表明周某潜逃后可能会投奔这名狱友，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找到并核查这名狱友的情况。另外，周某与前妻之间也因离婚财产分割问题存在矛盾，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要报复前妻。周某此次犯案后情绪激动，不排除其对前妻实施报复的可能，因此我们还要去寻找并保护周某前妻，防止发生连环杀人案。

说话间，毛哥连着抽烟，一个接一个地嚼着槟榔，看起来是在强打精神。我问他是不是昨夜没睡，他点点头，说前天夜里在医院陪护，也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路过一个路口，我让毛哥停车，和他交换了驾乘位置。距离我们要去的地方大概还有40分钟车程，我让毛哥赶紧抽空睡会儿。他没有反对，把副驾驶的座位放平躺了下去。不过一分钟，鼾声就从我耳边传来。

5

2016年大年初三，经过持续奋战，嫌疑人周某终于被抓获归案。被捕时，民警在他身上找到了杀害和重伤韩某、吕某的凶器。

据周某交代，自己的目标的确是张某以及前妻。

周某落案后，专班马上展开讯问工作。由于受害人韩某、张某等人此前涉嫌开设赌场罪、聚众赌博罪等相关罪行，多起案件的侦办工作需要同时进行。刚从外地返回的专班民警随即投入后续工作之中。

大年初五，公安机关针对周某故意杀人案的主要讯问流程结束，周某被移送看守所等待随后的司法程序。虽然我们还需继续办理韩某等人所涉嫌的开设赌场、聚众赌博、诈骗等案件，但命案已破，大家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忙碌过后的疲惫感连番袭来，距年假结束也只有两天了。同事们开始讨论仅剩的这两天假期该如何度过。有人说要回家陪陪父母，有人说要带孩子出去玩两天，还有人说家里很多事情耽误了，得回去处理。但大多数同事都表示，剩下的两天只想睡觉，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因为离家远，上级特批给了我4天假，让我回家补休春节假期。我高高兴兴地给父母打了电话，又订了一张第二天回家的机票。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公安局突然召集专班民警傍晚集结。大家不明就里，以为案件出现了新的变故，神情紧张地凑在一起打听怎么回事。可惜没人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几位派出所和支大队主官也默不作声，只让我们等待命令即可。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些许沮丧，按照往常经验，不是老案子出了问题，就是又来了新案子。

临近傍晚，公安局机关大会议室，很多人在吸烟，屋里很快变得乌烟瘴气。大家纷纷推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但讨论半天也没结果，最后

也只好就这么各怀心事地坐着。等到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来到现场，一脸严肃，我心里暗叫不好，自己订的那张机票，八成又要泡汤了。

会议室的所有人都在默默等待他布置新任务。副局长先是针对之前的案子讲了几句官话，又说今晚任务重大，谁也不准请假，之后就让我们跟他走。大家机械地跟他离开会议室，不料他竟把我们领到了机关大院的警官食堂二楼。

现场情况令所有人吃惊，二楼大厅的三张桌子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水饺。副局长说，今天叫大家过来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新的任务。这次除夕发案，大年夜被拎出来做事，大家都没能在家过年，有些同志这几天甚至连口热饭都没能吃上。现在案子忙得差不多了，今天“破五”，年还不算过完，今晚局里给大家补过除夕。饺子有四种口味——韭菜肉、芹菜肉、韭菜鸡蛋和三鲜馅，都是食堂职工和几位民警家属亲手包的，不但管饱，觉得好吃还可以带回家去。

之前几位面对民警询问默不作声的支大队领导一下笑了起来，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早憋得难受了。大家随即一哄而上，食堂里洋溢着新年的欢乐气氛。

一个好孩子的黑社会大哥之路

1

陈超是我的发小，我们两人一起在厂大院长大，同一年上学，直到初中毕业都一直是同班。我母亲和陈超的母亲刘阿姨是同车间的同事，父亲和陈叔叔又都是搞电力出身，两家走动非常频繁。

陈超个头比我高，胖墩墩的，始终坐在班里最后一排。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尤其擅长数学，小学时就被学校选拔参加奥数竞赛。我们平时一起上下学，周末一起去新华书店看书，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几乎形影不离。

当年男生们常玩“骑马打仗”，两人一组，一个背着一个，往对手身上贴贴纸。我和陈超一直是“黄金搭档”——他力气大，跑得快，我俩一度“战无不胜”。有段时间我爬墙扭伤了脚，陈超每天都背我上下学，时间久了母亲不好意思，托人从北京买了一套进口文具送给陈超，刘阿姨收了文具也觉得不好意思，赶在我生日时又送了我一辆自行车。

1996年，厂子破产改制，母亲选择等待改制结束后进入新厂子上班，刘阿姨则买断工龄后做起了专业股民。几乎在同一时期，陈叔叔被派往国外援助建设电力工程项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陈超一直在我家吃午饭。

很快，陈超家的经济条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超有了自己的电脑，身上的衣服也逐渐变成了时下流行的品牌。等2000年升初中时，陈超家已在市里买了商品房，我家也搬出了大院。

当然，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两家的友谊——我和陈超依旧形影不离，刘阿姨也经常邀请我和母亲去他们的新家过周末。母亲和刘阿姨聊天，陈超则带我打电脑游戏。

那时候，“古惑仔”风靡全国，初中校门口也常有身着奇装异服的“不良少年”。有的是本校学生，有的是本校学生的外校朋友，还有一些

社会青年。每天，他们都在放学时聚集在一起，用挑衅的目光扫视路过的学生，也偶有传闻称某位同学放学路上被人拦住，或被打伤，或被“借”了钱。

学校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学生跟校外人员，尤其是不良少年们来往，但实际效果相当有限。一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劝退或开除学生，“留校察看”的处分对坏学生几乎没有威慑力；二来大部分针对学生的不法事件都发生在放学之后，学校既鞭长莫及又不想多管闲事。

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大”名叫张平，与我和陈超同届，剃着光头。张平能当“老大”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小学读的是武校，“打架特别厉害”；二是因为他有个哥哥名叫张龙，从我们学校毕业后，在隔壁三职专上学，经常带着他的“朋友们”来学校帮张平收拾“不服气”的同学。

听母亲说，张平与张龙的父亲以前也是厂里的职工，1993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刑，出狱后成了附近有名的流氓头子。母亲还再三告诫我，既不要跟张平走得太近，也不要和他发生矛盾，如果遇到麻烦，要马上告诉她。

那时候，瘦小的我自然不敢靠近张平。

张平最喜欢的就是找同学“借”东西，无论是衣服、书包，还是文具、自行车，只要被他看上了，总会用各种方法“借”过来。他身边还有几个和他一样把头发剃得很短的“小弟”，自称“光头党”，经常收拾那些不肯“借”东西给他们的同学。一次我放学经过铁路桥下的涵洞，正好遇到“光头党”在殴打隔壁班的一名同学。事后听说，只是因为那名同学新买的手表被张平看上不愿“借”而已。

陈超同样跟张平没有任何交集。虽然他身高已经突破一米八，体重也飙升到一百七八十斤，看上去很“不好惹”，但却依旧是个胆小老实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每天都把“好好学英语”“将来要出国读金融”挂在嘴边。

只是没想到，张平和“光头党”还是找上了陈超。

2

最先给陈超带来麻烦的是一件外套。

一天，陈超穿了一件新外套来学校，立即在同学间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因为那年冬天，电视台和市里几个大商场楼体上全是这件外套的广告，价格同样令人咋舌。

下课后，很多同学围着陈超看他的外套。有人问起价格，陈超也毫不避讳。我也无不羡慕地问他什么时候买的，他说是陈叔叔过年回国休假给他买的。我也想试一试“过把瘾”，可对我一向十分大方的陈超却面露难色，说刘阿姨特别交代过，绝不能借给别人，我当然可以穿，但放学时必须还给他。

听他这么说，我便没好意思再提。之后的几天，除上下学路上外，陈超一直把外套叠放在纸袋中。北方的冬天很长，教室里的暖气时好时坏，但陈超宁愿冷着也不肯在教室穿上外套。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如此，他却私下里告诉我，他其实也是怕这件外套被张平和“光头党”看上。

果然，不久后，外套还是被张平一伙“借”去了。

“光头党”来找陈超那天我也在场，一个比陈超矮一头的男生嚣张地看着他，说：“平哥有点事，借你衣服穿两天，你没意见吧？”陈超不想借，但又不敢直接拒绝，只说天气冷，自己只有这一件外套。我也帮陈超圆场，说他个头大，衣服尺码也大。但话音未落，那个男生却突然转向我：“你是哪儿来的？关你屁事？不想挨揍的话滚一边去。”

外套很快就被拿走了，不久之后就穿在了张平身上。陈超以“天气冷”为由偷偷找张平索要过几次，张平的“小弟”给了他一件褐色外套，说：“平哥跟你交换。”

但那件褐色外套也是张平之前从其他同学身上“借”来的，陈超只穿了半天，便被真正的主人要了回去。

外套被“借”走没多久，刘阿姨就找到了学校。那天下午，我也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给陈超“做证”。当天陈超拿回了自己的外套，张平也当着老师的面给陈超道了歉。

我和陈超都以为，张平一伙一定会受到学校处分，教导主任也跟刘阿姨承诺说，一定严肃处理此事。但后来这件事却一直没有结果，张平和“光头党”依旧在学校耀武扬威。我问陈超，他说学校后来又跟他妈说，这事儿没法处理——外套是张平“借”去的，没说不还。

“那几个人身上穿的戴的很多都是从其他同学那里‘借’的，这个老师不管吗？”

陈超说老师的说法是，如果有其他同学向学校反映情况的话，学校会处理，但那些与他的衣服被“借”是两码事。而且老师也批评了他，说不该穿这么贵的衣服来学校，“给你和学校双方都添麻烦”。

“我以后不在学校穿那件衣服就是了。”陈超最后有些无奈地说了一句。

然而，这件事还没完。

几天后的放学路上，我和陈超走到铁路桥附近，被几个社会青年拦住，对方不由分说便动手打我们。我挨了两拳后从地上捡起了砖头和他们对打，边打边喊陈超快跑，还趁机拽了他一把。但陈超却一直呆立在那里，既不还手也不跑，任凭一个比他矮一头的男孩扇他耳光，不管我怎么叫都没反应。

到家后我把我俩挨打和外套的事讲给了父母。母亲也觉得学校处理措施不当，当即给刘阿姨打了电话，还建议她第二天一起去学校反映情况。可刘阿姨那边却不置可否，母亲还有些不开心。

第二天早上，父亲送我去了学校。在班里见到陈超，我问他昨天下午怎么样，他只说没事。又问他那些人是谁，为啥要打我们，陈超说跟张平有关。我再问别的，他就不再答话了。

那天父亲去找了班主任老师，但老师说事情发生在放学之后，又是在校外，学校管不了。更何况我也不能确定那几个人是本校学生，建议父亲去派出所报案。父亲没有去派出所，但之后的半个月一直坚持陪我上下学。

3

那时候，陈超的家庭条件比绝大多数同学都要好很多。他书包里的文具一水进口货，一支钢笔便六七百块；骑着一辆3000多块的自行车，是陈叔叔从国外带回来的；脚上穿的那双篮球鞋，据说也价值不菲。在我们每天只有三五块饭费时，陈超的书包侧兜里就卷着百十来块零花钱。

学校从初二开始安排学生晚上6点上晚自习，下午放学后，大家都在学校附近吃饭。每次陈超从兜里把那一卷钱掏出来时，都会引起周围人的关注。当然，其中包括那些每天聚集在小卖店门口的不良少年。经常有人充满戏谑地冲他说，“胖子，这么多钱，请哥哥喝瓶水呗？”遇到这种情况，陈超总会默然答应。

虽然很快他也不带着一整卷钱去小卖店了，但不良少年们依旧会让他“请客买水”。名义上是“买水”，但实际吃喝都由他来买单。甚至有一次，两个不良少年从小卖店拿走了百把块钱的商品，都让店老板“挂”在了陈超名下。放学后店老板拦住我俩，让陈超“结账”。几句争执过后，陈超竟又付了钱。

我以为这只是偶尔为之，直到有一天，陈超悄悄问我，能不能帮他把自己的松下随身听卖掉。之后的一个周末，我陪他去电子市场卖了随身听，又听他咨询起收电子词典的价格。

回家路上，我问陈超为啥要卖掉这些东西，陈超说自己欠了校门口小卖店一些钱，店老板要他还账——原来那时候，校门口的不良少年已经发展到所有消费都“挂”在陈超名下了。店老板已经多次找他，说再不“结账”就去跟他父母和学校要钱。

我很吃惊，让他把这些事情告诉老师。陈超却说，之前那次挨打，就是因为他把张平找他“借”衣服的事情告诉了家长和学校。现在那帮人

找自己“买单”的钱还能承受得起，所以不想再给自己惹麻烦。

虽然陈超再三恳求我帮他保密，但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通知了刘阿姨，刘阿姨又找到了学校，我也又一次给陈超做了“见证人”。

一行人去了校门口的小卖店，老板说平时陈超经常在他店里“招待”那些不良少年，以为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当不良少年们要求把账“挂”在陈超名下时，他便同意了，前后加起来竟然有几千块。

刘阿姨原本坚持要报警，但最后还是在学校的劝说下放弃了。

在学校的协调下，店老板答应不再找陈超“要账”，但之前陈超已经付给他的那些钱不退。争执再三，双方最终接受了这个结果。回家路上，刘阿姨狠狠打了陈超一记耳光。

“那个小卖店就是你们学校教政治的马老师她老公开的，怪不得不让你刘阿姨报警……”母亲说，自己之前也劝过刘阿姨，不要让陈超在钱这方面太“显眼”。但刘阿姨却说，这跟陈超穿什么衣服带多少钱没关系，肯定是陈超跟那些坏孩子平时就有来往，“不然学校那么多学生，其中也不乏比陈超还有钱的，坏孩子们为什么不找他们，偏找上陈超？”

刘阿姨这样说，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说让我以后注意跟陈超的距离。她担心刘阿姨的这种想法会给陈超带来麻烦，也担心我跟陈超走得太近，也会惹祸上身。

果然，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又看到陈超被几个社会青年拉进铁路桥下的涵洞里。

陈超被几个人围在中间，其中领头的是张平的哥哥张龙。他穿一件花衬衫，正在扇陈超耳光。听他们的对话，应该是张龙之前让陈超每周

交100元“保护费”，陈超最近一次没有交上，所以被拉到这里接受“教育”。

我急忙跑去附近电话亭给刘阿姨打电话。等刘阿姨赶到时，张龙等人已经散了。刘阿姨带我和陈超去了警务室。民警不在，一名治安员接待了我们。陈超向治安员讲述了自己在涵洞里遭遇勒索“保护费”并被殴打的情况。治安员做了记录，让我们回去等消息。

我告诉治安员，带头勒索陈超的人是三职专学生张龙。治安员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显得有些不耐烦，说他知道了，会给民警汇报，之后打发我们离开了警务室。

此事也一直没有下文。不久后，我在学校门口见过张龙。他依旧穿着那件花衬衫，身边站着几个跟他同样打扮的社会青年。

我问过陈超，一共被张龙要去了多少“保护费”，陈超说前后有上千块，自己的电子词典和卡西欧手表也被张龙“借”去了。手表一直戴在张龙手上，但电子词典不知去向。他不敢跟张龙要，更不敢跟刘阿姨说，因为刘阿姨会骂他。

“我妈总是说，我不去招惹他们，他们会来找我吗？可你也看到了，我哪里主动招惹他们了？”陈超实在很委屈。

4

虽然陈超在学校越来越低调，也更少言寡语了，甚至再不去学校门口的小卖店了，但这一切并不能让“光头党”放过他。张平一伙似乎认定陈超身上有“油水”可捞，而且之前一系列事情的处理，可能也给张平等人放出了错误信号。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开除学生，不然就是犯法！”这句之前学校老师给刘阿姨的说辞不知怎么被张平听去了，之后就一直以此为由叫嚣。

“傻超，你牛逼就让学校开除我呀，反正这学我也不想上了。但你小心点，就算学校把我开除了，我照样每天在学校门口等着你，到时打不死你！”一次，张平被陈超举报后去办公室接受谈话，出门时正好遇到我和陈超。他恶狠狠地继续威胁陈超，全然不顾往来的老师和同学。陈超则被吓得脸色苍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张平时常派“小弟”在陈超放学必经的路上等着，如果陈超不给钱或钱给少了，等待陈超的就是千奇百怪的折磨——有时逼他在厕所茅坑里“罚站”；有时让他站在教室后排的垃圾桶里，一边往他头上浇凉水一边逼他唱歌；更有甚者，他们会将粉笔磨成粉末兑水让陈超喝下去。

一天放学后，我回教室拿课本，正碰到“光头党”逼陈超脱光衣服在垃圾桶里唱歌。当时陈超满脸泪水，硬撑着不肯脱衣服。我上前制止，随即就被“光头党”按在两排课桌之间。张平阴笑着说：“听说之前你在警务室举报过我哥？你小心点，弄完他就轮到你。”

这话让我很吃惊，虽然张平没说他是从哪儿“听说”的，但当时警务室里只有我、陈超和刘阿姨三人。除了陈超本人，我想不出还有谁会把那件事告诉张平。

后来我一度认为是陈超“出卖”了我，也开始跟他“保持距离”。

5

2002年夏天，陈超就出事了。

7月初，期末考试刚结束。暑假前，我和陈超正在打篮球，张平与“光头党”也来到球场，要和我们“打比赛”。大家都想走，可张平他们还是拦下了陈超。

与其说是“篮球比赛”，不如说是张平一伙在欺负陈超——他们运球时故意把陈超撞倒，抢球时又借机靠近陈超，顺势踹他一脚或扇他一个耳光。挨了几记黑手后，陈超借口自己扭伤了脚要回家，张平等人却不依不饶，要求他必须继续打下去。

陈超坚决不肯再玩，拒绝的态度强硬了些。张平索性撕破了脸，指示一起打球的“小弟”去厕所弄了一摊污物摆在陈超面前，让他跪下“吃一口”，“吃一口就可以回家”。

大庭广众下，陈超被张平一伙团团围住，呆呆地杵在那里，不时望向不远处的我。我心里很清楚，他希望我能帮他解围。但我没有动，一来心里还在气他之前“出卖”我，二来我和身边的同学，谁也没有跟张平一伙正面对抗的胆量。我让身边的同学去喊老师，但大家都没动。我犹豫再三，转身向教学楼方向跑去。

不料刚跑出两步，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紧接着有人四散奔逃。我赶紧回头——两个“光头党”蹲在地上，陈超在追张平，手里还拿着刀。陈超很快被闻声而来的保安和老师抓住，两个受伤的学生也被送往医院。

事后据学校和派出所调查，就在我转身离开的片刻，一个“光头党”突然捡起地上的污物盖在了陈超脸上。陈超愣了一下，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水果刀——那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磨得很锋利，一直被陈超揣在兜里——好在伤者也都无大碍。

整个暑假，陈超家都在处理这件事。母亲跟我说，在学校和派出所的协调下，刘阿姨赔了两名受伤学生家一笔钱，算作对方不再追究陈超责任的前提。

假期我见过陈超两次，他一直很沉默，没有怪我那天不帮他解围，也没有多说自己伤人的事情。

暑假过后，陈超就转去了隔壁63中学。再往后，我俩的联系更少了，只是偶尔打个电话。中考后，我去了城郊的寄宿高中，两个人就此断了联系。偶尔向母亲问起陈超，母亲只是让我好好学习，别再跟陈超来往，也别再打听他的消息。

再次听到陈超的名字已是2007年。

高考结束后，我回工厂家属院的房子拿东西。中午吃饭时听几个子弟学校的学生在小饭馆里议论，“超哥真厉害啊，上次他在××茶楼门前和人打架，喊了一面包车人来，都拎着钢管……”看他们的打扮，颇有当年校门口“不良少年”的气质。

我问其中一个学生，“超哥”大名叫什么。他瞥了我一眼，说：“陈超啊，这你都不知道？”

回家后，我问母亲陈超到底什么情况。母亲叹了口气，说转学后陈超就跟一群坏学生混到了一起，高中没考上，去了一所职专。但职专也只读了一年，就因为打架被开除了。之后就一直在外惹是生非。

“刘阿姨和陈叔叔呢？不管他吗？”

“早离了。陈叔叔在国外援建时有了婚外情，刘阿姨在舞厅跳舞时也认识了一个男舞伴，也难怪当年不怎么上心陈超的事情。现在可好，回头再看儿子，急得头发都白了。”

我有些唏嘘，说以前我和陈超一起考奥数，他总说以后要学金融，当老板赚大钱。母亲却摇头，说他现在这样子下去，迟早到监狱里去学金融。

6

往后几年，我偶尔也会听到有关陈超的消息，有的说他也成了街头混混，有的说他已经成了“黑社会”，领着和他一样文龙画虎的人去“收账”。我一直没再见过他，实在想象不出当年那个腼腆的大男孩文龙画虎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直到2014年，我才终于又见到了他。陈超个头没再长高，但瘦了下来，也明显不再是12年前那个腼腆的男孩了，言谈举止间满是“江湖气”。

饭桌上，他说自己在一家“金融公司”上班。我有些惊讶，有同学马上恭维说，“陈总谦虚了，不是上班，是当老板啊！”我更加惊讶了。

时隔多年重新相聚，陈超很高兴。晚饭结束后，主动提出“搞个二场”，拉我去了一家室内烧烤。老板一口一个“超哥”喊着。旁边桌上也有人认识他，过来敬酒，陈超熟练地应付着。看着他的样子，我又想起当年那个背着我玩“骑马打仗”的小胖子，着实无法将两个形象联系起来。

等陈超终于坐定，我笑着说：“你在街面混得可以啊，我当社区民警那会儿出来吃饭都没这待遇。”陈超笑着说是碰巧而已。

“当年咱去警务室举报张龙这事儿，不是我出卖的你。后来我在学校门卫室里见到过那天接待咱们的那个治安员，当时他正跟张平的爹在门卫室里间勾肩搭背地喝酒……”陈超首先提了这件事。我说这都多少年过去了，你咋还记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他却说自己现在是个“社会人”，得恩怨分明。

我问起他的“金融公司”，陈超笑着说：“什么狗屁金融公司，名字叫金融外包服务公司，别人不懂情有可原，你是警察不会不懂，其实就是讨债公司，帮人收账的。”

我恍然大悟，哂笑着说：“你这也算是实现小时候的理想了。”

陈超却有些怅然，说如果当初不是张平和“光头党”，自己现在应该也大学毕业，去真正的“金融公司”上班了。

我随口问陈超，张平现在在干啥？陈超笑了笑，说张平跟他哥张龙都在自己的“金融公司”上班，负责带队外出讨债。

我又是一惊，问他咋想的，不恨张平兄弟俩吗？陈超又笑了，“那哥俩现在给我挣钱，为啥要恨他们？”

“不过你说起恨，我确实有，但不完全是针对他俩的……以前我是个很守规矩的人，但凡学校公开的纪律，我没有不遵守的。我以为只要我守规矩，规矩就会保护我，但谁知现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可能是我之前的哪句话触动到了他，也可能只是酒喝得有些上头，陈超开始絮叨起来。

陈超说，当年张平和“光头党”找他麻烦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找老师，但没有成功。又想到告诉家长，但刘阿姨始终把“全校那么多学生，他们怎么就找上你”这句话挂在嘴边。最后不得已报了警，警察却认为学校里的事情应该由学校解决，转了一圈又回到学校手里。

“我以前的学习成绩你是知道的，不奢谈重点中学，考市里好一点的高中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超说，自己从小就希望能像他爸一样做一名“工程师”，可以去世界各地，即便后来转学去了63中学，他依旧怀着同样的理想。

“伤人的事情之后，我本打算转去一所远一些的学校重新开始，比如19中，但我妈不同意，她觉得没必要，况且19中在西郊，去那儿上学她每天要接送我……”说到这里，陈超的神情有些复杂。

由于两所学校相隔不远，陈超一入学，张龙就找上门，说周围几所学校都“归他管”，不要以为转了学就万事大吉。以前要交的“保护费”之后依旧要交，而且因为陈超拿刀“威胁”了张平，还得额外拿出更多的钱。

陈超又把自己的遭遇报告了老师，但学校给出的答复与之前的初中差不多。陈超再给母亲讲，这次换来的却是刘阿姨的暴怒。

“我妈说，你说在学校受欺负，我去找了你们老师，你说要转学，我也给你转了学，现在你又说那帮人还缠着你。一直都是你在说别人，但你就不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

陈超说，他确实找不出原因，自己只想安心读书，但张龙和张平兄弟二人却始终像不散的阴魂般缠着他，他做梦都会梦到自己被张平和张龙二人围着打。

“既然我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吧。”

7

2003年4月，16岁的陈超与张龙等人在铁路桥下打了一架，陈超一直记得那个时间，他说自己的转变就从那时开始——

那次打斗中陈超以一敌五，起初他很胆怯，但当把张龙兄弟打得头破血流之后，另外3个跟张龙一起找他收了大半年“保护费”的家伙撒腿便跑，陈超拎着砖头追了很远也没追上。之后张龙扬言报复陈超，但陈超不再害怕，反而主动去找张龙，每次找到都又是一场互殴。

“那时候我也看明白了，什么‘光头党’，什么‘扛把子’，就是个不务正业的街痞。身边也是一群唯利是图的狗腿子，要啥没啥还欺软怕硬。”和张龙硬扛之后，陈超索性放弃了学习，一门心思对付他们。书包里常年装着砖头和甩棍，有时还装着一把餐刀。

因为敢跟张平一伙对打，陈超在周围几所学校一下出了名，开始有人喊他“超哥”。因为不再给张龙一伙交“保护费”，陈超手里的钱又多了起来。他说那时刘阿姨每月给他的零花钱有四五百块，差不多顶一个普通职工的月薪。他就用来请那些帮他打架的不良少年吃喝玩乐，身边喊他“超哥”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跟着张平打我，完事后张平请他们喝可乐吃麻辣串；跟着我打张平兄弟俩，完事后我请他们吃烧烤喝啤酒唱歌，还给充游戏点卡。只要脑袋没坑，就知道该跟谁混。”说到这里，陈超笑了起来。

“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学生”的条款同样对陈超适用。之前中学拿张平没有办法，后来63中照样拿陈超没有办法。请家长、开会批评，陈超享受过当年张平的所有“待遇”，但也获得了与张平一样的结果。

至于之后如何开了那家“金融外包服务”公司，陈超却不愿跟我多谈。他说眼下我们毕竟身份不同，有些事情挺敏感的，说出来对大家都不

好。我也没再多问，只是还是好奇，为何张龙和张平兄弟俩现在成了他的“马仔”。

“还能有啥？这年头做流氓能当饭吃吗？”陈超说。

当年，张龙和张平的父亲是街面上叫得上名的地痞头目，但后来因为中风在家里躺着，靠低保生活。2008年，张龙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两年，出狱后也老实了。张平去技校学计算机，在校期间还当“扛把子”，最后风光了一把。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做了几年网吧网管。

“该读书时不读书，‘扛把子’得先扛得起自己那一日三餐吧？连饭都吃不上了，还扛个屁‘把子’，去超市扛水还差不多！”陈超说，张龙和张平兄弟二人来他的“金融公司”上班前，确实都在附近一家超市上班，张龙当“保全”，张平干“损管”。陈超是去超市“做业务”时遇到的兄弟二人，干脆招到了自己麾下。

“前两年我在公司经常骂他俩，喊张龙‘傻虫’，张平‘傻平’，一点小毛病张口就骂，但这俩人都乐和地听着，从来不敢还嘴。为啥？在我这儿比在超市挣得多啊！这两年我也不骂他们了，想想大家都可怜，可怜我当年遇到他俩，也可怜他俩现在落得这个境遇……”

那顿烧烤吃到最后，陈超喝多了，分别时我给他叫了的士。上车前，陈超突然一本正经地问我，自己有没有可能再去读个大学，说好像社会上有个什么成人高考，他想去正儿八经学个“金融”。

看到他袖口露出的文身，我刚想和他开个玩笑，陈超却突然打了自己一下，嘟囔了一句，“想什么呢，脑子有坑”。

尾声

2018年5月，陈超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妨碍执行职务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等数十条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1年。

距此一年前，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风险临近，他曾找过我，向我咨询脱险办法。我当时尚不知道陈超犯下的罪行如此之多，以为他只是经常打些擦边球，对全国正在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心有余悸而已。我劝他低调行事，不要再做钻法律空子的事情，尤其要删去朋友圈里那些跟文龙画虎人士的合影。

陈超的确照做了。之后他的朋友圈风貌大改，全都是与妻子在香港旅行、带儿子逛商场的照片，偶尔还会分享几个颇有文艺气息的网页链接，陈超也俨然成了一位居家好男人。

几个月后，陈超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他的妻子找到我，问在本地警界有没有“熟人”，她想把陈超“捞”出来。我问陈超犯了什么事，她支支吾吾不明说，只说是早年出的一点事情，当年已经“压”下去了，现在又被人提了出来。

我说自己恐怕没有“捞人”的本事，但可以帮你问问陈超在“里面”的情况，但陈超妻子说了声“不用”便走了。我想可能她还急着找其他人想办法。

再之后，就没有陈超的消息了。

我的确找朋友问过陈超的案子，他们都说知道，但不让我打听，更别多管闲事。从朋友的欲言又止中，我感觉出陈超惹下的麻烦恐怕并非只是他之前跟我说的那些。于是往后的日子里，我也没再问过他的事情。

“小超子呢？听说‘进去’了？”前段时间，母亲突然提起陈超。

我点点头，说已经判了，涉黑，11年。

“唉，以前是个多好的孩子……”母亲叹了口气，“你小时候的自行车还是他妈送的呢……”

抓住那个跟踪厂花的流氓

1

当天下午，我和朱警官把赵金柱送往精神病院。临走前问陈志，被砸的那几下要不要紧，用不用去医院看看。陈志说不用，身上衣服厚，砖头没伤到肉；手上也只擦破了皮，自己回去包扎一下就行。

陈志提出想跟我们一起送赵金柱去精神病医院，朱警官要开车，他怕我一个人在后面控制不了。陈志又说自己当保卫处处长时经常处理赵金柱的事，“别看这人瘦，发起病来一股子蛮力”。

我和朱警官谢绝了，一是赵金柱此次发病就是因为陈志，两人不方便同车；二是陈志已年过六旬，能不能帮上忙还在其次，万一赵金柱闹起来再伤了他，我们也担待不起。

眼看跟车无望，陈志只好作罢，但发车前，又悄悄往我手里塞了两包“黄鹤楼”。我推辞不要，陈志面露难色，说如果赵金柱在路上又发病，麻烦我“控制好力度，别伤了他”。

我有些诧异，不知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驾驶位上的朱警官转过头说：“这事我们心里手里都有数，老陈你赶紧回去吧。以后少让赵金柱看到你，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车子发动了，陈志把两包烟从窗口扔进来，说了句“他也是可怜，照顾一下”便扭头走了。

那年，朱警官已临近退休，放在其他单位，已经可以“内退二线”了，无奈公安局警力不足，朱警官肩负一个社区的警务工作，年纪大了难免有些事照应不过来。上级便让相邻警区的我帮他分担一部分——其中就有需要重点关注的赵金柱。

与其他有暴力倾向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发病时“无差别打击”不同，赵金柱每次发病，矛头只针对一个群体——机械厂保卫处的工作人员，

其中前任处长陈志尤其“重点照顾”。

我对赵金柱的情况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武汉人，年轻时招工来到我市机械厂。30岁那年赶上“严打”，因流氓罪坐了几年牢，出狱之后精神就出了问题。单是赵金柱发病追打陈志的警情，我就处理过很多起。有次我实在忍不住，问朱警官，赵金柱跟陈志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朱警官说，1996年严打，赵金柱就是被陈志带人扭送到派出所的，后来判了7年。从此，赵金柱就记恨上了陈志。

我说赵金柱这明显属于“打击报复”了，为什么不法办他?

朱警官叹了口气，说不是不想法办，而是根本没法“法办”。一来赵金柱已经得了精神病，追打报复属于“病态行为”，按规定只能送医；二来当年赵金柱被判刑的事情，确实有些复杂，“现在看来，很难说是什么性质”。

朱警官话中有话，但更让我不解的是，受害者陈志一直以来的做派——被“打击报复”了十几年，陈志却自始至终对赵金柱照顾有加。不但逢年过节登门看望、送米送油，前几年还给赵金柱谋了一个看大门的差事，甚至连赵金柱的低保，都是陈志一手帮忙操办的。

不过，赵金柱似乎并不领情，两人在街上相遇，赵金柱轻则朝陈志吐口水；稍受刺激，就大打出手。自打他得知陈志住哪儿后，陈志家的阳台玻璃每年都要换好几次——即便这样，陈志也不怎么跟赵金柱计较，甚至多数时候不会主动报警。

“这陈志以前是不是做过啥对不住赵金柱的事儿啊? 不然怎么那么能忍。”我问朱警官。朱警官笑笑，说或许吧，“他俩的事儿啊，外人真不好评价”。

“不会是因为当年抓赵金柱坐牢这事儿吧？”我问。朱警官点点头，说差不多。

“冤假错案？”我脱口而出。朱警官说算不上，当年陈志抓赵金柱没错。法院判赵金柱也没错。

我愈加不解了，“那陈志有啥对不住赵金柱的？”

“此话说来长喽……”朱警官点了一支烟，“听说过‘靶场女尸案’吗？”

“听过，你破的嘛，还拿了奖。”

朱警官又笑，但沉思了一会儿却说：“其实应该算是陈志破的。当年赵金柱也是因为那个死者被判的刑……”

我更糊涂了，在我的再三恳求下，朱警官讲了整个故事的经过。

2

1996年5月下旬的一天，时任机械厂公安科科长的陈志接到本厂女工王艳的举报，称最近自己下夜班的路上多次被人尾随，怀疑是本厂青工赵金柱所为。陈志马上派人找赵金柱了解情况，赵金柱当即否认。

因为仅仅是“尾随”，且没有证据，陈志只能带着公安科职工在厂西那条王艳下班的必经路上转悠了一周，一无所获，便只当是女职工多心，安慰了几句就作罢。

但没过多久，王艳再次找陈志，说尾随她的人又出现了，就是赵金柱。此外，王艳还说，厂里有人看到赵金柱把她的照片放在内裤里，十分恶心。陈志有些恼火，一边劝王艳不要担心，一边安排人手继续调查。

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公安科职工现场抓获了尾随王艳的赵金柱。赵金柱被带到公安科，解释说自己是听说王艳最近下班被“流氓”尾随，不放心，所以来“暗中保护”她。

大家都对赵金柱的说辞嗤之以鼻，陈志更是直接开骂，说他“贼喊捉贼”。但赵金柱毫不示弱，与陈志吵了起来。

其实，陈志不想把事情闹大，毕竟都是厂里的职工，说出去对厂子也不好。陈志让赵金柱写份检讨，并上交王艳的照片，此事便可作罢。但赵金柱却一再坚称自己是“暗中保护”王艳的，更没偷过照片。双方话不投机，赵金柱张口就骂……

“赵金柱这家伙，毁就毁在他这张嘴上。”朱警官解释道。

赵金柱时年29岁，在厂里工作10年，绰号“铁脑壳”——在旁人眼里，赵金柱一直有些古怪，平时独来独往，没结婚也没女朋友；下班后哪

都不去，就把自己反锁在单身宿舍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跟人接近，也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按理说，赵金柱当时的行为只是有些孤僻，不至于得罪旁人，但他还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嘴巴臭”。他轻易不与人交流，却常因一点小事跟人发生口角。无论是领导、同事还是门卫，赵金柱都一视同仁，入厂多年，厂里没被他骂过的人屈指可数。

厂区门卫归公安科管，陈志自然也被赵金柱骂过。那天赵金柱骂得更狠了，陈志一下上了火，不再想“小事化了”，便让陶运来和胡斌立即去赵金柱宿舍找那张照片，找到之后全厂通报。

令陈志失望的是，陶运来和胡斌把赵金柱宿舍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王艳照片。但“意外收获”了一个同样敏感的东西——赵金柱的日记——这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一本“黄色小说”。赵金柱把自己意淫同厂年轻女工的内容全部写进日记本，前后涉及十几人。

“我没看过那本日记，但据传言，里面的内容‘不堪入目’。后来他的日记内容被传开了，那些被日记提到名字的女工羞愤不已，有人找领导告状，有人跑去市公安局报案……”朱警官说。

尤其是王艳，赵金柱在日记里着重提到她，还称她为“老婆”。

赵金柱此前确实追求过王艳，但王艳年轻漂亮，一直是机械厂的“厂花”，根本看不上赵金柱。日记内容泄露后，有人在王艳背后议论，她既羞又恼，多次找厂领导“讨公道”。

“这事儿也不至于判他7年呀？”我问朱警官。朱警官说确实“不至于”，但之后赵金柱做了一件事，就“至于”了。

3

赵金柱成了厂里的笑料和公敌。男同事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女同事则拒绝跟他有任何接触，迎面遇上都要躲开好远。日记中提到的女同事中，有人已婚或有了男朋友，他们也纷纷扬言要好好教训一下赵金柱。一时间，厂里闹闹哄哄的，一度影响了日常工作进度。

为了安抚职工情绪，当时的厂领导专门为此事开了会，但他们也很为难。一方面，他们巴不得开除“刺头”赵金柱；但另一方面，赵金柱的行为又完全够不上违纪，甚至说他本身也是一名受害者——日记内容属于个人隐私，却被公安科泄露出去，厂里是不可能因为“思想龌龊”而开除他的。

“但这件事坏就坏在赵金柱平素风评太差，厂里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想借着这件事看他的笑话。”朱警官说。

1996年7月，赵金柱经历了两个月的压抑、愤怒和委屈之后，再也忍耐不住了。7月16日下午，他对一位嘲笑他的同事大打出手，被人拉开后，赵金柱怒气未消，直接跑去隔壁车间找到王艳。

据赵金柱事后交代，那天下午，他去找王艳的目的就是想跟她当面对质。他已听说，就是王艳举报他“跟踪尾随、图谋不轨”的。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赵金柱一怒之下要打王艳，虽然被人拉开，但拉扯的过程中，赵金柱扯破了王艳的上衣并喊出了那句最终把他送进监狱的话——“臭婊子，我要当众强奸你！”

现场围观的人都听到了这句怒吼，也看到了王艳被扯开的上衣。事后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至少7人在笔录中证实了这句话的存在。

“如果放到现在，赵金柱的行为很可能就是个‘寻衅滋事’，但那时候不一样，要知道，1996年7月，全国‘严打’正搞得激烈……”朱警官说。

赵金柱打死也没想到，自己的那句话在当时有多要命。后来他说，本以为最多就是被开除而已，没承想，法院直接给他定了一个“流氓罪”，“公共场所强奸妇女未遂”，有期徒刑7年。

收到赵金柱的判决结果时，连陈志都蒙了。但事已至此，陈志也不便多说什么。厂里有人吃惊不已，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议论纷纷。

陈志私下找朋友问过赵金柱的量刑。“幸亏这次不比1983年严打，否则赵金柱够得上枪毙了。”朋友回答他。

“这就是陈志感觉对不住赵金柱的原因？”

朱警官点点头，说老陈本来只想教育一下赵金柱，一方面给厂里的职工们一个交代，另一方面也治治他的臭脾气，没承想竟然是这个结果。而且，直到赵金柱入狱后，陈志才第一次了解了赵金柱的家庭状况，更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赵金柱父母早亡，从小就辗转在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之间讨生活。那时哥哥姐姐皆已成家，对赵金柱都不太好。磕磕绊绊读完中专，赵金柱索性借分配招工之机离开武汉，想在这里安身立命。

单论工作能力，赵金柱工作10年，从未出过差错，每年的考评都是“优秀”和“车间骨干”。如果不是性格问题，恐怕早就当上车间领导了。

入狱后，厂里照例要开除赵金柱的公职。办手续时，赵金柱的车间主任呛了陈志几句，他直言道：这件事的罪魁祸首不是赵金柱，而是陈志的人——如果不是他们把赵金柱私人日记里的东西散播出来，哪会有后面的事，他们侵犯了赵金柱隐私，还把人家“逼上梁山”，按理也得坐牢。

陈志吃了瘪，回去越想越气，骂了陶运来和胡斌一顿，还扣了两人半年的奖金，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原本，陈志还想等赵金柱出狱之后

想办法“照顾”他一下，但赵金柱本就性格偏执，心里又气不过，未等服刑期满便出了精神问题。

“赵金柱出狱之后，陈志帮他办了低保，算是解决了他吃饭的问题，又协调了医保方面的事情，算是解决了治病的问题，逢年过节也会送点东西。但赵金柱一直不领他的情，只要犯了病必然要去找他麻烦。我和陈志打了二十几年交道，有时候也劝他算了吧，但陈志总说是自己对不住赵金柱……”朱警官叹了口气。

于情于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至于。便问朱警官：“这个‘对不住’到底是啥意思？难道当年不该抓赵金柱吗？尾随王艳、撕扯了她的衣服，还说了那句‘我要当众强奸你’，陈志作为公安科科长，处理赵金柱也是他分内之事，有啥对不住的？难道当年应该坐视不管吗？”

我真心觉得，如果是因为泄露日记那事，陈志确实有领导责任，但罪魁祸首也是陶运来和胡斌。陈志当年没有处置二人，现在却不断说“对不住”赵金柱，的确有些惺惺作态。至于赵金柱入狱后得精神病一事，看似也不是陈志的问题。

听我这么说，朱警官微微点头，但他沉默了片刻转而又说，在“3·21专案”侦破之前，我跟你是相同的看法。

“3·21专案？”我有些不解。

“嗯，就是靶场女尸案。”

4

“靶场女尸案”是我市1997年3月发生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受害者正是第二机械厂女工王艳——此前，我没能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1997年1月17日凌晨，24岁的王艳在下夜班之后失联，单位和家属百般寻找未果，遂报了警，警方也没找到王艳。直到3月21日上午，王艳的尸骸在铁厂武装部早已荒废的靶场杂物房内被发现。

这间杂物房位于废弃靶场西南角的深处，地处偏僻，人迹罕至，里面堆满了单位机关淘汰的废旧家具。那年年初，杂物房塌了，铁厂决定直接用铲车把废墟推平。不料铲车作业时，却意外在瓦砾中发现了一具腐败女尸。后经警方辨认，死者正是失联的机械厂女工王艳。

被发现时，王艳的双手被绑在一个联邦椅上。经法医鉴定，她死于颈部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在两个月以上，且从她裸露的下身和被丢在一旁的女士内衣判断，生前可能遭受过性侵。

市局成立了“3·21案”专班，但由于死亡时间长且杂物房已垮塌，案发现场已难以找到对破案有用的线索。虽然在尸骸辨认过程中，痛不欲生的王艳父母向警方提供了一条信息——女儿脖子上一直佩戴的一条黄金项链不见了，但当时这一信息对于破案的帮助极其有限。

“当年不像现在，发了案子调监控，查轨迹，实在不行还能上技侦。当时我们啥也没有，法医也帮不上太多忙，只能寄希望于走访摸排。”那时候，朱警官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骨干民警，全程参与了专案调查。

王艳是本市人，上面还有一个姐姐，父母都是退休职工。一家人既没有仇家，也没有外债。

18岁高中毕业后，王艳在家待业一年。父亲退休后，她接班进入机械厂工作。因为长相姣好，身边有不少追求者，既有本厂同事，也有外单位职工。王艳的择偶标准较高，一直没有确定关系的男朋友，社会交往关系也很简单，平时她与父母同住，除了跟几个同学、同事有来往，基本没有其他关系了。

警方将“3·21专案”定性重大奸杀案，但凶手究竟是“见色起意”还是预谋已久，却实难判断。王艳的遇害现场与她下夜班走的那条路相距不远，但武装部靶场常年封闭，坍塌的杂物房之前也一直上着锁，民警现场勘查后，发现两处门锁也是完好的——王艳究竟是如何进到杂物间的?

朱警官等人首先将目标指向了铁厂。

警方在铁厂摸排调查了一个多月，对全厂600多名员工进行问话，尤其是负责管理武装部靶场、有机会接触到靶场和杂物房钥匙的职工及其男性亲属，全部被列为“重点对象”。但始终未能找到嫌疑人。

与此同时，警方也在陈志等人的协助下对机械厂职工进行了排查，尤其是追求过或正在追求王艳的男职工们。

“之前赵金柱的事情对王艳刺激不小，那个年代嘛，大家思想都还保守。当时厂里还放了她一周假。回来上班后，王艳精神状态依旧不太好，厂里有小半年时间都没安排她上晚班。1月16日是她的第三个晚班，没想到还是出事了。”朱警官说。

当时，王艳失踪一事在机械厂内引起了很大风波。有人说王艳和市里的某位领导儿子“私奔了”，有人说王艳被武汉的一个大款“包养了”，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过年时看到王艳挺着大肚子，“未婚先孕在家养胎呢”。

“这女人漂亮了，身上是非也多。王艳失踪后，厂里那几个追求她的男职工隔三岔五去她家晃悠，说是帮着找人，其实一来想打探些消息，二来想给王艳父母留个好印象。但后来王艳死了，一个个生怕被人怀疑，再也不敢去她家了。”

陈志实在想不通，在他的印象中，唯一有可能威胁到王艳的人就是赵金柱了。他向经办此案的民警讲述了此前赵金柱的事，警方还派人专程去监狱核实情况，确定赵金柱一直在服刑。

3个多月过去，警方一无所获，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专案组逐渐把侦查重点移向社会，开始调查一些曾有过流氓前科的人员，其间也传唤甚至抓捕过一些嫌疑人，但后经调查，都排除了杀害王艳的可能。

“该查的都查了，确实破案条件不足。后来我们也灰心了，说句不好听的，就那时我们手里的证据，即便抓到犯罪嫌疑人也很难给他定罪……”朱警官顿了一下又说，“至于王艳父母说的那条金项链，王艳姐姐脖子上有一条一模一样的，当年我们也试图在那上面做些文章，但没有成功，后来案子就只能暂时挂起来了。”

1997年秋天，王艳的遗骸被亲属火化，“3·21专案”的侦办工作已在事实上宣告失败。案件被列入公安局“在侦卷宗”中。警方把案情和遇到的困难如实告知了王艳的亲属，亲属的抵触情绪很大，但最终还是表示理解。

起初，王艳的父母会不时来公安局询问一下，女儿的案件有无进展，再往后，就越来越少了。到了2003年，王艳的姐姐调去武汉工作，把父母也带去了，之后便再没来过。

“3·21专案”成了我市公安局的一桩悬案。

5

“案子最后是怎么破的呢？”我继续追问。朱警官笑了笑，说陈志这家伙，也是个有趣的人。

陈志1950年生，个子不高，但很精神，当过几年兵。1973年转业到机械厂后一直在保卫部门工作，虽不是公安科班出身，但常年从事治保工作，经验也很丰富。

陈志做人做事很“江湖”——在厂里大大咧咧，既跟厂领导称兄道弟，又能和普通职工玩到一起，人缘很好。

当然，除了性格外，这也跟陈志的家庭出身有关。陈志父亲退休前曾是市里的一位重要领导，兄弟姐妹也多在政府机关任职，机械厂领导“见人下菜”，陈志自然过得舒服。

陈志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当一名警察——当年转业时他本来想去公安局工作，但他父亲觉得国企也是铁饭碗，还比政府机关多一份企业奖金，因此强行把他转到了机械厂。为了让自己更像公安，陈志甚至给公安科职工统一配发了“警服”，虽然没有肩章和领花，但乍眼一看，跟派出所民警的“89式”也没什么区别。陈志经常自嘲：“地方公安才是真警察，企业公安科就像‘二鬼子’。”为此他还挨过不少厂领导的骂。

“那时候，国企公安科的执法权限也不明确，说是没有‘刑事侦查权’，只能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处理一些本厂区域内小偷小摸的案子，但有些案子明显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他们还是关起门来自己搞。那时辖区派出所警力不足，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朱警官说。

2002年，我市进行公安机关体制改革，原属各国有单位的公安处、公安科统一由企业公安归并为行政公安，与原单位脱离从属关系。按要

求，机械厂公安科改为保卫处，原有人员可以选择离开企业加入公安机关，或是留在原单位保卫处工作。

所有人都以为，一心向往公安工作的陈志肯定会正式加入市公安局，连市公安局也已做好了接收他的人事关系准备。但最后时刻，陈志却出乎意料地选择留在保卫处。

朱警官对陈志的选择表示理解，因为在朱警官看来，当时机械厂属于明星企业，经济效益很好。作为中层干部，陈志除工资以外，每年还能拿到数量可观的奖金。那时，两人早已相熟，朱警官还揶揄过陈志，说他“之前天天说羡慕地方公安，企业公安科都是‘二鬼子’。现在有机会‘转正’了，自己却舍不得那点奖金了”。陈志听了只是笑，笑完又叹了口气，却也不说别的。

就这样，陈志成为转制后第一任保卫处处长。又过了两年，朱警官也因身体问题从刑警支队调入辖区派出所，正好负责机械厂所在的片区，两人再度成为工作伙伴。

再度相会，陈志在家炒了一桌好菜，专门拿出一瓶好酒款待朱警官。也是那天，朱警官才知道，陈志居然还在关注“3·21专案”，而且还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3·21专案”案发时，陈志一度雄心勃勃：以前自己处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次发了大案，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

那段时间，陈志接连半个月不着家，吃住在公安科办公室。其他职工也在他的带领下日日枕戈待旦，恨不得马上把凶手翻出来。但最终仍未能如愿。

警方撤离后，公安科恢复正常工作。陈志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带着自己的两个“铁杆”陶运来和胡斌借酒消愁。

一次，胡斌在酒桌上跟陈志提起了一个有关赵金柱的细节。胡斌说，抓到赵金柱当晚，赵金柱曾坚称自己是为了“保护王艳”才跟踪她，还说自己看到过尾随王艳的人。当时大家都不信，可案子搞到现在，会不会真的是当初搞错了？

陈志沉默了。其实王艳出事后，他也想到了赵金柱当时说过的话。

王艳下班回家，要经过机械厂西侧的一条土路，右手边是厂围墙，左手边是城郊高场村的农田，道路尽头是省道延伸出来的一条分支路。王艳回家大概要走25分钟，除了围墙附近的路上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剩余路段皆是一片漆黑，王艳会随身携带一个手电筒照明。

赵金柱“保护”过王艳几次。除去被公安科抓住的那次，有两次确实看到了一个人，身材跟他差不多，在路灯附近看不到，一走到没有路灯的路段，那人就突然出现了。

赵金柱是为了“暗中保护王艳”而不开手电，而那个男人不知为何也不开手电，3人相隔不远，在漆黑的路上行走，赵金柱走在最后。偶尔有车路过，赵金柱通过车灯看到前面的男人穿着一套机械厂的工装，斜背一个帆布包，跟自己的打扮几乎一模一样。

“王艳回家的最后一段路有路灯，但赵金柱说走到那段路时，前面的男人又突然不见了。陈志当时认为赵金柱在‘掰（骗）’他，哪有突然出现又突然不见的人？还跟赵金柱穿一样的衣服？公安科其他人也不信，认定赵金柱在编故事。”朱警官说。

王艳遇害后，陈志起初还很犹豫，要不要跟警察说明这个情况。因为第一次接到王艳举报后，他曾带着陶运来和胡斌二人在王艳下班路上“蹲守”过一段时间，从未发现赵金柱口中的那个男人。况且赵金柱说这话时，公安科所有人都认为他在撒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假如赵金柱说的是真话，那这个男人就真的很可疑。但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公安科一开始就冤枉赵金柱了？胡斌建议陈志再找赵金柱聊聊。陈志也有这个想法，但那时赵金柱已在监狱服刑，陈志与他非亲非故，不可能见到他。

“作为机械厂公安科科长，陈志为何没有在警方调查时告知这一情况，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听到这里，我打断了朱警官。

“我后来问过陈志，”朱警官解释说，“他当时心里还是很犹豫。那天与胡斌吃完饭后，陈志又找陶运来商量。与胡斌相反，陶运来坚称赵金柱那晚就是‘贼喊捉贼’，赵金柱耍流氓这事已是板上钉钉，现在把‘当初他用来蒙混过关的话’讲给警察，不就是扰乱警方工作吗？”

更何况陈志自己也有私心：虽然赵金柱是因为“流氓罪”被抓进监狱的，但万一最初尾随王艳一事真不是赵金柱干的，那他和机械厂公安科恐怕也逃不过要承担责任。

犹豫再三，陈志当时便隐瞒了这个信息。

“那为什么又给你讲？”

“因为他开始怀疑到一个人身上了。”朱警官说。

6

陈志怀疑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曾经的下属、保卫处消防科科长陶运来。之所以怀疑他，是因为几件事：

大概是1999年10月的一天，机械厂的黄师傅在传达室用煤气炉烧了一壶水，中途出门解手不慎把自己反锁在屋外。传达室装了防盗门，窗户上焊了拇指粗的铁栏杆。黄师傅急得抓耳挠腮，只得去隔壁公安科办公室求助。

那天陈志不在，是陶运来负责值班。后来黄师傅说，陶运来只用了一根铁丝便捅开了传达室的防盗门。可当陈志问起时，陶运来坚持说他只是把手伸进纱网一掏便把锁打开了。

这不是什么大事，陈志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次黄师傅又把钥匙锁在屋里，来找陶运来求助。那天陶运来刚好不在，陈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把锁打开，最后只能说，要不就锯窗棂吧。

黄师傅不愿意，这样干他会被厂里罚款，他一个劲儿地要陈志把陶运来找来帮忙。陈志没搭理他，窗棂还是锯了，黄师傅果真被罚了款。为此，黄师傅有一个月不愿搭理陈志。

陈志找了个机会向黄师傅主动示好，又请他在厂附近的小酒馆喝了顿酒。谈到开锁，黄师傅夸陶运来很有本事，“就是把那根铁丝弯了几弯，伸进锁头里挠了挠，然后‘咔吧’一声，锁就开了……”

陈志说不可能，陶运来跟自己共事快十年，真有这本事自己能不知道？退一步说，真有这本事，他还用在厂里干治保？这是陈志的一句玩笑话，但黄师傅说，陶运来的叔叔是城里“兴旺开锁”的老板，技术没的说，都是亲戚，陶运来难道就不会跟他叔学点什么？

这句话差不多说服了陈志，但电光石火间，陈志却想到了另外两样东西。那就是“3·21专案”中铁厂武装部靶场和杂物房那两把没有被破坏的锁头。

当年，那两把完好的锁头确实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除了彻查有钥匙的员工及男性家属，案发之初，警方也怀疑过技术开锁，对城里会开锁的人员进行过地毯式普查，其中也包括“兴旺开锁”的老板，但同样一无所获。

“陈志怀疑陶运来还有两重原因，一是陶运来的身形和赵金柱的确差不多，在光线不好的地方穿上工装，从背后看很难分清两人；二是陶运来当年也追求过王艳，但王艳没同意。这事陈志知道，还劝陶运来‘找媳妇目标实际些’。”朱警官说。

2002年胡斌调走，临走前陈志和陶运来请他吃饭，又谈及此事。趁饭后陶运来去买单的工夫，胡斌悄悄跟陈志说，当年案发时，陶运来曾多次嘱咐他不要向外人提自己之前也追求过王艳的事，担心节外生枝。当时陈志酒后脑袋发蒙，加上本就知道，便没把胡斌的话放在心上。

等第二天酒醒后，陈志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打电话问胡斌，为啥要告诉他这件事。胡斌却在一旁打着哈哈，说自己没别的意思，酒喝多了，随口一说。

当年，警方对所有追求过王艳的机械厂男性职工都进行过普查，但没有查到陶运来的头上。案子挂起来之后，陈志也关注过一些人，但同样没有关注到陶运来。对于这一切，陈志说是他的原因——从一开始，他就根本没考虑过自己身边的人会有嫌疑，况且公安科配合警方查案时，陶运来也一直在忙前忙后。

很快，陈志又想起一个细节。

早在1996年5月王艳第一次举报被人尾随时，陈志曾查过本厂各车间的夜班排班表；1997年1月17日王艳失踪时，他也给警方提供过夜班排班表；后来自己在厂里调查时，也整理过与王艳同上夜班的人员名单。虽然这些名单上的人除了当年的赵金柱外，都被排除了嫌疑，但那时陈志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自己在整理全厂职工夜班时间表时，唯独忘了自己所在的公安科。

他马上去找当年公安科的值班记录，翻到一半才突然想起，陶运来当年是住在公安科值班室的。

此前，陶运来一直住叔叔家。1994年陶运来堂哥结婚后，他向厂里申请单身宿舍，但厂里宿舍不够。后来在陈志协调下公安科腾出一间办公用房，一来解决陶运来的住宿问题，二来相当于给公安科增加一个夜间值班“常备力量”，双方皆大欢喜。

陈志越想越觉得陶运来可疑，可一时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陶运来与王艳被害一案有关的直接证据。

“那他为什么不趁早把这些怀疑告诉公安机关？他和陶运来是同事，有些话问不出口，但警察不存在这些麻烦呀？”我问。

朱警官叹了口气，说就是因为陈志觉得警察做事单刀直入，陶运来又是他的同事，他不方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通知警察。的确，陈志后来也承认，他这辈子做错过两件事，一是赵金柱的案子办得太急，二是陶运来的案子想得太多。

“那2004年，陈志又为啥把这件事讲给你？是因为他找到了什么直接证据吗？”

朱警官点了点头。

7

2004年，赵金柱出狱了，但精神上明显出了问题。陈志去看他，想跟他聊当年的事。但赵金柱讲不了几句就“激动”起来，一激动就对陈志喊打喊杀，完全没法正常交流。后来一度发展到只要看到陈志，就会发脾气打人。

陈志觉得赵金柱可能还在记恨自己，希望朱警官能够跟赵金柱谈谈，把之前的事情弄明白。而且，作为此前参与侦办专案的骨干刑警，破掉这起“在侦案件”是朱警官的职责，给本单位遇害职工昭雪也是他作为保卫处处长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陶运来要辞职了——当时，陶运来因学历问题没有资格转制为行政公安，加上前一年他刚结婚，女方父母在外地做买卖，他便准备辞职去投奔岳父母——陶运来找陈志提辞职，陈志没有理由拦着，但又担心陶运来走后王艳的案子彻底断了线索，只能来找朱警官商量对策。

那天，朱警官没有给陈志提供“对策”，他建议陈志直接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汇报。但陈志很犹豫，说一旦刑侦支队介入，免不了要找陶运来了解情况，万一自己搞错了，不好做人。陈志希望先跟朱警官合作，等有了结果再上报不迟。

在陈志的再三劝说下，朱警官无奈同意了。回去想了一夜，朱警官感觉确实有必要查一下陶运来。案子搁置8年了，“挂着也是挂着，不如死马当成活马试一下”。第二天，两人就想出了一个对策。

2004年国庆过后，朱警官来到机械厂保卫处办公室，找陈志聊一些业务上的事情。中午，陈志提议请朱警官吃饭，让陶运来作陪。陶运来推说自己手头有事，但陈志让他一定得去，说朱警官还要交代一些消防方面的事。

酒过三巡，陈志把话题引到了“3·21专案”上，随口问朱警官，那起案子有没有新进展。朱警官故作惊讶地说：“陈处长消息真灵通，案子确实有了些变化，省厅上了新的DNA检测设备，重新检验了当年从王艳身体、衣物及现场发现的其他物品，说是有了新发现，准备重启调查。”

朱警官又压低声音，跟陈志和陶运来说，年后市公安局会组织一轮新的DNA筛查，铁厂和机械厂都在其中。让二人提前有个准备，把需要筛查的人员名单汇总一下，而且此事一定要保密。

朱警官说了谎。当时省厅更新了法医检测设备，市局也确实申请重新检测当年王艳一案留下的物证，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仍旧一无所获。说话的过程中，朱警官一直用余光观察陶运来，但他似乎没有什么特殊反应。

散席之后，陈志感到既庆幸又失落。庆幸的是陶运来反应正常，之前幸亏没有大张旗鼓调查他；失落的是如果陶运来没有嫌疑，自己之前费尽心思找的那些所谓“线索”，都成了子虚乌有的事。

陈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朱警官，但朱警官却让他别着急，慢慢来。

果不其然，2005年2月初，陶运来突然失踪了。年关将近，平时单位事情不多，陈志便每天在办公室坐坐，然后出门找地方置办年货。放假前一天，厂里照例组织召开安全动员大会，陶运来作为负责消防工作的科长需要上会发言，可办公室干事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干事找到陈志，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有两三天没见过陶运来了。找到陶运来妻子一问才得知，两天前陶运来跟妻子说厂里有急事派他去甘肃出差，不能在家过年，之后便匆匆离开了。

陶妻还在电话里埋怨厂领导不近人情，大过年派职工去外地出差。陈志心里“咯噔”一下——作为保卫处职工，陶运来没有任何需要出差的

业务。他挂了电话，赶紧找朱警官。

8

“陶运来这事儿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前陈志观察了他3个月，都没发现任何异常，可年前突然出走，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朱警官说。

两人很快碰了头。陈志想了半天，说元旦过后他让陶运来整理过一份保卫处人员名单，包括从1996年开始在保卫处前身公安科工作的人员。陶运来问陈志做什么用，陈志说，就是上次饭桌上朱警官讲的年后DNA普查的事。陶运来当时只笑着问了一句，“这次连‘自己人’都不放过？”陈志说这是公安局的要求，保卫处人也不多，照办就是了。

不久之后，陈志拿到了名单，没什么问题。交名单那天，陶运来还问陈志，胡斌两年前调走了，用不用把他算上。这本来就是“做戏”，陈志随口说了句“走了的就不用统计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让朱警官和陈志弄不明白的是，如果陶运来真有问题，那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该逃走，如果没问题，就该心平气和地留下。时隔一个月突然出走，这算是哪门子事情?

反复确定陶运来已经失联后，朱警官将此事向上级做了汇报。

市局刑侦支队研判案情后产生了分歧，一方面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陶运来与1997年“3·21专案”有关，即便抓住陶运来，警方也没有把握核实案情；但另一方面，如果事实真如陈志先前所说，那么陶运来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不能置之不理。最终，市局决定先把陶运来的去向找出来。

协查通报发出的同时，朱警官和陈志前往陶运来的住处，找他妻子了解情况。

对于丈夫的突然外出，陶妻也一脸茫然。朱警官问她最后一次跟陶运来取得联系的时间，陶妻称陶运来离家当晚两人曾打过电话，但陶运

来说信号不好，讲了两句便挂了，之后再没打通过。

陶运来此次出走只带了一些衣物，经过仔细盘问，陶妻还是想起了一些细节。她说近一个月来丈夫似乎丢了什么东西，常常有意无意在家翻找。但自己想帮忙找时，丈夫又说："没事，没找东西。"

陶妻的说法引起了朱警官的注意。反复研判后，他怀疑陶运来很有可能是在找王艳遇害时丢失的那条金项链。向上级汇报后，朱警官带人对陶运来家进行了全方位搜查，果真在床下衣物箱内一件多年未穿过的毛衣内侧找到了那条金项链。

"陶运来妻子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条项链，但经过受害者家属辨认和技术检测，与王艳姐姐戴的那条的确是同款……"朱警官说。

2005年6月，陶运来在内蒙古赤峰被抓获归案。审讯过程中，那条金项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证据，陶运来交代了1997年初奸杀王艳的全部作案经过。

早在1996年初，陶运来便计划"报复"王艳。原因很简单，他追求王艳，王艳不但拒绝，还"伤害了我的自尊"。

1995年，陶运来23岁，工作稳定后很想结婚。按照当时机械厂规定，职工只有结婚了才有资格在家属区分得住房。那时陶运来住在公安科值班室，早就厌倦了睡到一半被叫起来加班的生活。

在王艳之前，陶运来还追求过两名机械厂女工，但都没有结果。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陶运来是外地农村的，当年厂里的女职工都想找个本地婆家，最好还是双职工家庭，这样父母双方都有退休金，还能帮着照看孩子。陶运来离这些条件太远了。

追求王艳时，陶运来没抱太大希望，只是抱着"广撒网"的目的向王艳发起了爱情攻势。1995年底，他把一些老家的土特产和一封情书托人交给了王艳。

然而，陶运来并没等到王艳的回复。所托之人还说，王艳当时就把他送的礼物和情书一并扔了，还加了句："连陶运来这号人都敢想我的好事，他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陶运来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恨得要命。

起初，陶运来也没打算把王艳怎么样，只是想找个机会捉弄她一下，比如在下班路上尾随她，趁她不备搞些恶作剧吓她一番之类的。因担心时隔太近会被王艳猜到，陶运来的"恶作剧"一直等到1996年5月才开始。

陶运来喜欢躲在没有路灯的地方，看王艳出现后便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保持着看得见却看不清的距离，等王艳快到家时再躲起来，好让她兀自紧张一番。

尾随了几次，王艳确实被吓到了。事情闹到公安科，陶运来也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发现，王艳一口咬定了赵金柱，这让陶运来兴奋极了。

陶运来一直跟赵金柱不对付，两人曾因琐事打过架。这次误打误撞扯上了赵金柱，真是求之不得。之后，他在赵金柱宿舍发现了日记，也是毫不犹豫地就把内容泄露了出去。

事情的发展让陶运来很满意，他像看戏一样目睹了王艳的彷徨紧张和赵金柱因"流氓罪"被判刑7年的全过程，心里只觉得两人都是"活该"。

"既然'仇'都报了，他为何还要奸杀王艳？"我问朱警官。

"他说也是因为那本日记的缘故。"朱警官说。

9

赵金柱入狱后，一切看似已经尘埃落定，但有个念头却在陶运来的心里生根发芽。

“陶运来交代说，赵金柱真是个人才，写的日记比摊上卖的黄色小说还好看……”那晚，在赵金柱宿舍读完那本“意淫”日记后，陶运来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尤其赵金柱杜撰自己与王艳云雨的细节，反复抓挠着他的心。

1997年1月16日，陶运来值夜班（职工夜班时间为15:00–23:00，公安科夜班时间为23:00–6:00）。那天傍晚，他在邻县和朋友喝过酒，又被拉进一家录像厅看了黄色录像。在回单位值班路上，迎面碰上了提前下夜班的王艳，陶运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尾随并强奸了王艳。

完事之后，陶运来感到十分恐惧，他在公安科工作，很清楚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行动还未结束。之前赵金柱只是撕扯了王艳的上衣，并说了一句“我要当众强奸你”，便被判了7年，自己这种行径弄不好是要挨枪子的。

陶运来开始恳求王艳原谅，并不断重复自己是因为“爱而不得”才出此下策。但王艳可能还未从恐惧和羞耻中回过神来，一句话也不说，愣愣地看着陶运来。两人僵持了十几分钟，陶运来心乱如麻，决定先把王艳“藏起来”。

王艳从未经历过这种事，像个木偶一样被陶运来摆布。陶运来挟持她去了武装部靶场，麻利地捅开了门锁，转了一圈找到杂物房，把她推了进去。

两人又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王艳依旧一言不发，陶运来逐渐焦躁了起来。大概到凌晨2点，王艳似乎缓过劲来，开始挣扎呼救，毫不理会陶运来求她原谅的说辞。终于，陶运来觉得如果放走王艳，等待自己

的必将是牢狱之灾甚至是挨枪子的结局，于是他心一横，再次强奸了王艳，并将其掐死。

干完一切，陶运来准备离开，他担心王艳没死透，醒来跑掉，便找了根绳子将王艳的双手绑在一把断了腿的联邦椅上。临走前，他瞥见王艳脖子上戴的金项链，觉得应该值些钱，便一把扯下来揣进了兜里。

陶运来回到值班室时已是1月17日凌晨4点，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同事就来接班了。

1月17日上午，王艳的父母因女儿一夜未归来厂里找人，陶运来还负责接待他们。后来辖区派出所和厂公安科组织人手寻找王艳去向，几次路过铁厂武装部靶场，其中有一次众人甚至走了进去，但也只是在场地上看了一圈便走了。

陶运来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半月，一直没有听到王艳被人发现的消息。他很想再去杂物房看看情况，但既不敢看王艳的死状，又担心被人发现，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1997年3月21日，王艳尸体被发现后，陶运来又紧张了一段时间，尤其是警方开始调查职工时，陶运来一度想逃跑。但后来听陈志说那间杂物房塌了，王艳被发现时死亡时间太长，警方没能找到有效线索后，又再次放下心来——作为公安科的一员，他可以第一时间获得警方的侦查消息。

至于那根金项链，最初陶运来准备风声过后找地方卖掉，但后来听闻警方开始查项链的事情，十分后怕，索性藏了起来。不想搬离公安科值班室时手忙脚乱，忘了放在哪里。

时间一晃，多年过去，王艳的案子似乎已经被人遗忘，连警察也不再来调查了。等2002年机械厂公安科改制，很多专案组的老面孔都离开

了，王艳父母也去了省城，他认为自己当年作下的案子就此尘封，彻底放下心来，连那根金项链也不再挂念了。

因此当朱警官说起“重启调查”时，陶运来如同五雷轰顶。他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把自己揪出来，但转念一想，之前的调查进行了几轮，都是厂公安科配合警察在做，自己作为参与者，不会有什么风险。

但2005年初，当听到陈志说保卫科也要纳入调查后，陶运来彻底慌了。冥冥之中，陶运来越发觉得，这次排查就是奔着自己来的。他再一次想到了那根金项链，那恐怕是唯一能证明自己跟“3·21专案”有关的证据，于是又开始四处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

2005年春节临近，陶运来记得陈志说过，节后新一轮DNA筛查就会开始，他最终选择了逃离。

尾声

2005年底，陶运来因犯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陈志和朱警官也因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分别被机械厂和市公安局给予表彰奖励。

2010年，60岁的陈志从机械厂保卫处处长的位置上退休，彻底告别了自己30多年的企业治保工作。退休时朱警官请他喝酒，又聊起2002年改制时陈志执意留在机械厂保卫处的事情。

朱警官说陈志的侦查意识难得，没来公安机关有些可惜。陈志喝了不少酒，虽然满脸挂着骄傲的神情，嘴上却还是说，自己当年其实就是因为工资高、待遇好才留下的，说是为了查案子，“那只是其中一个主观原因而已”。

当年的“3·21专案”已经随着陶运来的伏法彻底落下帷幕，但赵金柱和陈志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赵金柱依旧见不得陈志，每次发病后，还是会去陈志家楼下叫骂，捡石头砸玻璃。我和同事出警去控制，陈志依旧会嘱咐我们“手底下轻一点，别伤到他”。

2016年初，朱警官到龄退休，所里给他摆了“退休宴”，陈志也去了。宴毕我开车送朱警官回家，路上说起陈志和赵金柱之间的事，朱警官又对我感慨地说，干警察是个良心活，其实陈志蛮适合干咱这行的，一直留在保卫处，确实有些浪费了。

2014年12月底，一天中午，47岁的精神病人赵金柱当街追打前机械厂保卫处处长陈志。

接到报警后，我和朱警官赶往现场，只见陈志在前面跑，赵金柱拎着半块砖头在后面追。沿途行人纷纷避闪，朱警官用警车挡住赵金柱的去路，我跳下车扑上去夺砖头。赵金柱一口咬在我的肩膀上，拉扯中把肩章弄坏了。

很快，我们就用约束带把激烈挣扎的赵金柱绑了起来，陈志则气喘吁吁地回到警车跟前。陈志说，当天下午他和居委会小刘照例去给赵金柱送大米，本来一切正常，赵金柱还跟他俩闲聊了几句，但突然犯了病，抡起凳子就要打。

陈志和小刘边跑边躲，在岔路口分了头。赵金柱只追陈志，先是丢凳子，后来就捡路边的砖头朝陈志扔。我们赶到前，陈志身上已经挨了至少三块砖了，手上也带着伤。

“好在腿脚还能跑，不然被追上了，非得在医院里过年不可……”64岁的陈志感慨道。

朱警官却面露不悦，“老陈你也知道赵金柱不能见你，为啥还要去招惹他？”

陈志解释说，到年底了，他只是想给赵金柱送点米面。朱警官再次打断他，说送米面可以让居委会的人代劳，“你为啥一定要亲自去？”

陈志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19次报警都找不到的丈夫

1

2015年8月1日晚上8点，我们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转警，辖区居民杨虹求助，称被丈夫李红军家暴。

杨虹家住在朱雀小区6号楼3层，我和同事孙力赶到现场时，屋里一片狼藉：电视机摔在地上，鱼缸破了个大洞，水流了一地，几条金鱼在地板上躺着。杨虹额头肿起，坐在客厅沙发上哭，李红军则不知去向。

我建议杨虹先去医院，但她摇头，又问她丈夫去哪儿了，她说不知道。孙力让她讲一下事情经过，沉默了好一会儿，杨虹才断断续续地说：李红军傍晚回家找她要钱买麻果（一种毒品），她拒绝，李红军就动手打了她，然后把家里的东西也砸了。

孙力让杨虹跟我们一起回派出所做报案笔录，她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去卧室拿包。我看着满地碎玻璃碴，气不打一处来——那时我手里至少有7起与李红军相关的警情，第一次是2014年5月18日朱雀小区北门烤鱼店的杨老板大早上报警称，李红军砸坏了他店里的卷帘门；剩下的6次报警人都是杨虹，每次都是说丈夫吸毒和家暴。

我跟孙力说："先不回派出所。"

孙力看我一眼，"今晚搞他？"

"早晚都得搞，正好今晚没事儿，辛苦一下。"然后又转头对杨虹说，"给你老公打电话，说你同意给钱，让他回来拿。"

杨虹点点头，给李红军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们说人晚上9点回来。我和孙力安排好派出所值班事宜后，便坐在杨虹家客厅，等李红军现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9点了，人没回来，10点了，人还是没回来。我让杨虹再给李红军打电话，电话打过去，对方却关机了。眼看时间过了11点，所里有新警情需要处置。我叹了口气，只能跟孙力准备回去。

杨虹送我俩下楼，孙力去远处开车。我站在楼道口问杨虹：李红军最近在做什么？

“除了四处瞎混还能干啥？前段时间说8月初要去重庆涪陵打工，但也没见有要走的迹象。”

孙力开车过来，我把社区民警名片递给杨虹，反复交代“李红军回家马上通知我们”。杨虹接过名片不住点头，嘴里说着“谢谢警官”。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一边抽烟，一边翻着手机通讯录，打算联系特情摸出李红军的位置。打了几个电话，有人说他去了重庆，有人说他在武汉，还有人说他可能在沙市躲债，反正没人在本地见过他。又问了几个麻将馆老板，也都说很久没见他人影儿了，一些放过码钱给他的家伙也在找他。

挂了电话，我问孙力最近有没有见过李红军。孙力摇头，说自己还有两起警情与他有关，也找不到人。“都这样了你也不急，真能坐得住。”见我有点抱怨，孙力笑着说：“不是不找，是真找不到，那个混蛋死了才好。”

我叹了口气，又点了支烟——孙力说得不错，李红军真要是死了，我所有的麻烦也就一了百了了。

其实，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找这个“老毒么子”。

当初，在杨老板报案的次日，我配合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去辖区一家网吧抓“网逃”时，撞见了李红军正在用别人的身份证开卡上网。因为要配合兄弟单位工作抽不出身，李红军身上的案子也不大，又没戴手

铐，只能先让网吧保安看住他。但转头等我回来，李红军却不见了，保安说他趁乱跑了。我训了保安几句，他们很委屈，说都知道李红军吸毒，谁敢管他?

回到派出所后我被领导痛骂一顿，之后的几次会上，领导也一直因为这事质疑我的工作态度。我又羞又气，想方设法地找李红军。但邪门的是，自网吧那次“偶遇”后，我竟再也没找到他。

而这晚令我恼火的不仅是李红军，也包括杨虹——这大半年里的6次报警，每次都是李红军跑了她才拨110。我叮嘱她无数次，“下次李红军一回家马上通知我”。她每次都说“好”，但下次还是照旧——就在半个月前，李红军用晒衣竿抽得她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她先去了医院，验伤之后才来派出所报案。我无奈地给她做完笔录，又把老话重复了一遍，她依旧说好。等到了这晚却又是如此。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跟孙力吐槽：“这女的脑袋有毛病吧？！”

孙力说，这倒也正常，涉毒人员的老婆一般都比较纠结：一方面希望警察帮老公戒毒；另一方面又不想老公被警察抓。杨虹八成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还算好的——以前杨虹从来都是护着李红军，前年广化（派出）所要抓李红军去强戒（强制隔离戒毒），杨虹被李红军打得鼻青脸肿却还帮着他跑路到襄阳——她现在也算是进步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警情录入平台，打电话给所领导“批警”时，值班领导看到了“李红军”的名字，问我：“这次人抓住没有？”我只能实话实说。领导不太高兴，让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别总是守株待兔指望李红军自己出现。

挂掉领导电话，我长叹一声，去了监控室，调取了朱雀小区两个大门的监控——按照杨虹的说法，李红军晚上7点左右回家要钱，8点左右

离开家不知去向——我按照这两个时间段，紧紧盯着屏幕，把两段视频都看完了，完全没有李红军的影子。

保险起见，我到值班大厅把辅警队长叫了进来——他在所里工作多年，之前抓过李红军很多次，肯定不会认错。辅警队长把监控视频也仔细看完了，说没见李红军。

这下我有些迷糊了——杨虹记错时间了？我又把两个监控视频时间向前拉长了两个小时，跟辅警队长瞪大了4只眼睛看下来，还是没发现李红军。

“她掰（骗）你的吧？”辅警队长问我。可她用这事骗我对她有啥好处？况且她家里被打砸也是真的，她头上还受了伤。

我又想起杨虹半个月前的那次报警，情况也类似——派出所社区面监控可以保存一个月，应该还能找到上次李红军进出小区的影像——于是又翻出报警记录，查好时间，跟辅警队长一起找监控视频。

这次我俩每人“看”一个大门，时长截取了4个小时。忙活了好久，我这边啥也没看到，辅警队长那边只看到杨虹一个人踉跄着走出小区大门。

“这他妈奇了大怪了，难道李红军长翅膀了？翻墙进出的小区？”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或许李红军在这个小区里还有一处落脚地，这两次他压根没有离开朱雀小区呢。

天亮之后，我向领导汇报。领导同意我的判断，让我联系朱雀小区居委会，尽快把李红军找出来送去戒毒。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纳闷：这个小区就在我的管片内，我每天不定时巡逻3次，没事还会着便衣过去转转，一年多了，怎么愣是完全没

碰到过李红军。况且，李红军在本小区若有其他房子，杨虹也不应该不知道，为什么几次报警都不跟我说?

辅警队长顺着我的疑惑，说:“你尽快去看吧，看来朱雀小区里八成有个咱都不知道的毒窝。你去找到李红军，顺便把那个毒窝也掀了。”

2

经过协调，派出所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对朱雀小区里的租房户、外来人口和前科人员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可兴师动众忙活一番，除了发现几个藏在地下室里的“晃晃馆”（麻将馆）和几名在册吸毒人员外，还是没有李红军的踪影，也没找到他在小区里的其他落脚之地。

没等领导发作，我就又去了杨虹家，打算质问她之前两次警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大概多久能见到李红军一次？他每次回家的时间有什么规律？你再回忆一下，他有没有常去的地方，或者和哪些人走得比较近？”一股脑问了这么多，我又安抚她，“你也别有啥心理负担，我们抓他也是为了救他，如果放任他这么吸下去，你受罪不说，他本人最后也是个死。”

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跟杨虹说话，但她却一直面无表情，只是目光呆滞地流着眼泪，反复絮叨说丈夫在外面赌博、吸毒，只要没了钱就回来找她要钱，不给钱就用晒衣竿抽她，按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任我口干舌燥，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

这么说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干脆让她领我去李红军的房间，想找找这个家里有什么能找到李红军的线索。杨虹把我领进卧室，语气有些哀伤地说，李红军的东西都在这里，但他已经许久没动过了。

放眼看去，卧室陈设并不复杂：一张凌乱的双人床，堆满杂物的书桌，立式衣柜，还有三个塞满书的书橱。

“看不出来，你们家里还有这么多书。”我感慨道。

杨虹说，书多数是李红军的，他以前是设计院的工程师，吸毒前喜欢看书，也喜欢存书。

这话令我十分意外——自我来派出所上班起，李红军便是在册吸毒人员，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精瘦、佝偻的身板儿，胡子拉碴，一头乱发，脸色发黑，还有疲倦中带着亢奋的眼神。我以前能见到他的地方也多是公共厕所隔间、晃晃馆、垃圾回收站的角落，非赌即毒——真没想到，他以前竟然也是个知识分子。

我问杨虹："李红军当初怎么染上毒品的？"

她沉默了很久，方才在我背后幽幽地说，在山东的牌桌上。

关于李红军的过去，那天杨虹没有跟我说太多，可能是这些伤心事她不想再回忆。她只是说，如果当年李红军不去山东就不会迷上打牌，不上牌桌就不会上当染上毒品。吸毒前，李红军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爱读书、不沾烟酒，浪漫、知性、温柔，没有任何坏习惯。

我说估计李红军现在本人都不记得自己吸毒之前是啥样子了，你还跟他过个啥劲，离婚算了。杨虹却叹口气，说还是不想放弃丈夫——她清楚记得李红军吸毒前的样子，她迷恋那种感觉，相信有朝一日，丈夫可以回头，所以下不了离婚的决心。

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翻看着书柜，想找一下有没有李红军留下的类似车票、消费单据之类的票证，好摸出他最近的活动范围。书多是李红军的专业书籍，也有一些经典小说，很多书的扉页上都印着篆体的"李红军印"，有的还写着"××年×月×日购于××书店"。书柜最下层摞着几捆旧杂志，但看封面，都是十几年前的。

"你看哪本感兴趣拿去读就行，反正这些书也没人看了。"杨虹说，以前李红军对这些书宝贝得要命，还不厌其烦地做了书目。每本书都有固定位置，外人别说拿走，就是想抽出来瞧瞧都得看他心情。"我当年也是爱上他这一点，都说东北人粗犷，但他这一米八的东北大汉，不爱抽烟喝酒却爱读书，衬衫烫得平平整整，还做得一手好菜，心思细得像个南方姑娘……"

我看到一本1986年版的《尼采诗集》，想抽出来看看，不想书插得太紧。一用力，和诗集一同被带出的还有一个相框，黑色仿木质，里面是一张男人的五寸半身照，我一眼认出就是李红军。

“噢，这是他99年拍的，当时单位拍证件照，他顺便照了一张大的留纪念。你看，那时多好，多帅。”杨虹看到我拿着相框端详，就在一旁解释。

的确，照片上的李红军高鼻梁、大眼睛、剑眉，戴金属框眼镜，中分发型，面庞瘦削，应该是未吸毒时拍的——但这张照片又给我些许怪异的感觉。我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翻过相框，背面角落里印着“重庆大德”几个小字，之后是地址和一串手机号码。我趁杨虹不备，偷偷用手机拍了这些信息。

之后我又跟杨虹聊了一些别的事情。临走前借走了那本《尼采诗集》和另外两本书，约定下月初还她。杨虹似乎有些不舍，但又不好开口拒绝，只是细声嘱咐我说书的年份久了，纸张易破，翻书时一定要小心。

我点点头，再一次嘱咐她：“如果之后李红军回家，务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杨虹点头称是，我又拿出社区民警名片给她，她却摆手说上次给过了，还在包里。

3

之后，我大概有两个月没见过杨虹——那段时间市里总丢电动车，局里搞专项行动把我抽走。一来二去，直到2015年国庆节后专项行动结束我才回到所里。

回来后的第一次所务会上，领导上来就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我被骂得云里雾里，听了半天方才明白，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李红军又犯事了：他偷了同栋一楼住户的摩托车，还为要钱又打了杨虹两次，甚至在9月25号晚上，差点用绳子将杨虹勒死。好在后来杨虹说出银行卡密码，李红军才放过她。

那次杨虹本没有报警，但第二天上班时，单位同事发现她脖子上有勒痕，细问之下得知事情经过，便帮她报了警。所里领导一听又是李红军涉案，立马发了火，碍于我当时人在专班，不好直接打电话找我说，一直忍到我回来才发泄出来。

会上，领导不断问我："李红军到底在哪里？你都做了哪些工作？是抓不着他还是压根不想抓？还有，你跟杨虹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她差点被勒死却不报警？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他是个重大隐患，这样下去说不好哪天搞出人命来，必须尽快把人抓回来！"

李红军偷摩托车和勒杨虹脖子的案子在孙力手里，领导让我和他搭班，我主办他协办。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室，从孙力手上接过杨虹和那位摩托车失主的笔录材料。孙力说，其实两起案子都没啥难度，条理清晰，证据齐备，唯一难点还是在于李红军的去向——他偷摩托车的案子立案后局里给他上了"网逃"，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抓回来。

我心里苦笑，这话等于没说。我问孙力这两起案子案发后他有没有设法找过李红军，孙力说找过，但就是找不到。

“摩托车被偷的监控在哪里？顺线追了没？”

孙力说追了，摩托车上了国道之后便追丢了。我叹了口气，让孙力把截取的盗窃摩托车监控调出来给我看。

按照监控视频上的时间，2015年9月17日凌晨3时10分，李红军头戴鸭舌帽进场，在朱雀小区南广场附近徘徊一阵后走向6栋。那栋楼前没有监控，但两分钟后，南广场监控拍下李红军驾驶摩托车穿过，3时15分，小区东门监控拍下李红军驾车出门，沿公路径直向东离开。

“你确定这人是李红军？”我问孙力。朱雀小区是老旧社区，南广场上的探头还是十几年前安装的数字模拟型的，夜间拍摄的效果很差。视频里的人戴着鸭舌帽，拍不到正脸，即便我对李红军印象颇深，也无法通过视频确定此人就是他。

孙力说，他也不能确定这人是李红军，但所里同事听失主说是李红军，就找杨虹过来做过辨认。杨虹一眼就认出了那顶鸭舌帽，确定这人就是她丈夫，为此还给失主赔了3000块钱。

“李红军之前有过盗窃电动车、摩托车的前科吗？”我问道。

孙力说有过两起盗窃电动车电瓶案，都是“治拘”，最近一次是去年3月。

“这就更不对了，”我说，“从监控上看这人从进场到出场一共用了不到5分钟，除去路上时间，撬开摩托车只用了1分多钟，明显就是个惯犯，而且手段高明得很，李红军有这本事吗？”

孙力说这点他也注意到了，但一来失主怀疑李红军，因为整栋楼就他吸毒，之前还跟失主打听过摩托车情况；二来李红军此次作案距离上次盗窃电动车电瓶已经接近一年，真要有人教他“技术”，一分钟撬开车也不是难事；三来杨虹咬定说那顶鸭舌帽是她在夜市买的——如果不是李红军的话，杨虹为什么要主动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领导那

边的意思是，盗窃摩托车的案子暂时先这样放着，看之后李红军还偷不偷，如果再偷，迟早有天会被我们抓住尾巴。所里针对李红军和杨虹的问题开了几次会了，大家一致认为要抓李红军还是得从杨虹身上想办法。”

的确，眼下唯一与李红军发生过直接接触的人也只有杨虹。但事实上杨虹一直没有配合过我，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想让我抓李红军。

我将之前她的数次报警和查监控、查小区的事情讲给孙力，孙力也不解了：“你和杨虹接触的次数多，是否发现她这个人有啥异常？你是否想过，会不会是杨虹报假警？李红军这人，是否真的出现过？”

“8月1日晚上的现场是咱俩一起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难道是杨虹自己搞的？她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呢？诬陷老公吗？”

孙力却说，9月底那次杨虹同事报案后，技术队的胡法医按程序来看过杨虹脖子上的伤，也问了一些情况。当着杨虹面胡法医没说什么，等杨虹一行人走了，胡法医才私下跟他说，杨虹脖子上的这道勒痕有些奇怪——按道理，人被绳子勒住脖子后，会下意识地用手指去抓绳子，勒痕附近通常会同时伴有指甲造成的伤疤，但杨虹脖子上没有抓痕，至少很不明显，所以胡法医怀疑这道勒痕是杨虹自己搞出来的。

当然，这也可能跟杨虹来派出所的时间有关。根据笔录材料，李红军找杨虹要钱是9月25日晚上，那天是周五，之后双休，同事发现杨虹脖子上的勒痕是周一下午，间隔两天半，杨虹还去医院抹过药，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伤痕形态。

10月12日，我和孙力一起去了杨虹家。我带着之前借走的书，见面先跟杨虹表达了超期归还的歉意。杨虹笑着说：“没事儿。”

孙力在客厅跟杨虹聊李红军的事，我进卧室把书放回书架。前两本书的位置我都记得，放《尼采诗集》时，我记得旁边应该是李红军的相框，但找了半天却没找到，便喊杨虹进来帮我一下。她闻声而至，顺手把《尼采诗集》插在了书架上。

看是这样，我只好直接问她："李红军那张照片在哪里？我想再看一下。"

杨虹却面露迷茫，问我"什么照片"，我说，就是之前那张放在相框里的，李红军1999年拍的半身照。听罢，杨虹从书柜里掏出一本影集，从里面拿出了那张照片。说前几天整理书柜时不小心把相框玻璃摔破了，就把照片直接夹在了影集里。

我又看了看照片，确实就是一张放大的证件照而已，似乎也没上次那种怪异的感觉了，便把照片放了回去。

那天孙力跟杨虹聊了一个多小时李红军的去向，杨虹从头到尾还是说着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些车轱辘话。见问不出什么，孙力就问杨虹要李红军父母或其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杨虹说，公婆几年前便去世了，李红军还有个姐姐，一直在黑龙江工作，前几年逢年过节还会打个电话，或来看看他们两口子。说完去拿了家里的通讯本，找了半天，给了我们一个座机号码。我问有没有手机号、微信之类的，杨虹说以前有手机号，但后来李红军赌博吸毒，总打电话找姐姐借钱，姐姐换了手机号就没再告诉过他俩。

回派出所的路上，孙力问我刚才在卧室跟杨虹聊的啥。我从手机里翻出上次偷拍的照片，孙力盯着看了半天，说确实很怪。"黑色相框、黑白半身照片，摆在那里怎么看怎么别扭，而且你看，这照片边条也是黑色的，就是尺寸小点，放到A4纸那么大，妥妥就是一张遗像嘛。"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想起相框背面的“重庆大德”和地址信息，急忙按号码拨了过去——一个女人接了电话，说自己是专业定制、销售殡仪用品的商家。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4

“这女人怕不是精神有问题吧？”这是听到我们汇报后领导的第一反应。

随后，领导让我去警综平台上查，至今所有涉及李红军的警情，再把这期间所有办过李红军案子的民警都叫来办公室开会。

从2014年7月第一次接到杨虹家暴的报警至现在，李红军在警综平台上一共有19条涉警记录。除我手中的7条之外，另外还有3位民警处置过12起报警，报警人基本都是杨虹。

“你们谁在这一年里亲自跟李红军打过交道？路上遇见过、跟本人通过电话的都算数。”领导问道。但大家回忆了一番，都说没见到过本人。

领导有些恼火，“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消失了不成？”

一般民警，平时手里有两三起案子一时找不到嫌疑人的情况很正常，我们都想着吸毒人员跑不远，也许哪天碰巧就抓住了。但所有人把案子聚在一起，方才感觉不对劲——这李红军是一直涉警却一直不见踪影，这算哪门子事?

大家安静了一会儿，余警官突然开口。他说想起2015年4月份处理的一起杨虹的报案。那是一起打人的治安案件，受害人同样是杨虹，但打人者却非李红军，而是一个姓徐的男人。原因是“感情问题”。“那个男的是沙洋县一个饭馆老板，说是为了跟杨虹在一起跟老婆离了婚，但杨虹三心二意跟前夫纠缠不清，那个男的一怒之下打了杨虹。”

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事——以往与杨虹的接触中，感觉她对李红军的感情还是有的，也没听说她在外面跟别人谈过恋爱。我问余警官那起案

子最后怎么处理的，余警官说两人和解了，也就没走治安处罚程序。

“那个男的为什么说‘杨虹跟前夫纠缠不清’？是怎么个‘纠缠不清’法儿？”领导在一旁问。

余警官说，那个男的好像也是憋了一肚子委屈，但当时具体说了啥他也忘了。不过案子录了平台，有那个男人的联系方式。

男人名叫徐业辉，40多岁，是沙洋县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听我和孙力说明来意后，他把我们领进自家饭店的一个包间里。

“那个女的简直是个精神病！”

徐业辉说，他与发妻关系一直不好，2014年10月份认识杨虹后便跟妻子离了婚。但两人谈了半年恋爱，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了。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处（对象）之前她跟我说自己是死了老公的，后来在一起了又跟我说其实老公没死，但是吸毒从不回来，跟死了没两样。她说和我交往一段时间试试，合适的话她就回去跟老公离婚。当时我蛮喜欢她的，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忍了，走一步看一步嘛……”

杨虹是徐业辉喜欢的那类女人，温柔、娇小、体贴、有修养，与他膀大腰圆的前妻正好相反。徐业辉去过杨虹家，确实是长期没有男人生活过的样子。

那段恋爱的初期，两人一同去过湖南凤凰、张家界等地方旅行，徐业辉说那时他仿佛找到了青年时代恋爱的感觉。但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他却逐渐感觉到一些问题：

“我们一块住过一段时间，从2015年春节到4月底，大概不到3个月吧，我发现这女人好怪，一天到晚跟我叨叨她老公怎样怎样，让我穿

她老公的衣服、留她老公的发型，还弄那一柜子书逼我读，甚至我俩做那事儿的时候她都喊她老公的名字，你说这事换你能忍吗？”

的确，细看之下，徐业辉眉宇间和那张照片上的李红军有些许神似。

“你和杨虹谈恋爱期间有没有见过她老公？”孙力问。

徐业辉说没见过，也不想见。自己的身份很尴尬，加上早就听说吸毒人员难缠，他不想招惹李红军。

“警官……”徐业辉欲言又止，咽了咽口水说，“现在想想，这女人太不正常了，我甚至感觉她老公早被她弄死了……”

我问徐业辉此话怎讲?

“明明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却总好像在跟别人说话似的嘀嘀咕咕。家里有张她老公的黑白照片，平时摆在书柜里，杨虹没事儿就站在那儿跟照片对视，一看就是个把小时，有时还会说话。最吓人的是，我有一次半夜醒了发现杨虹不在床上，起来一看，她竟然跪在阳台上给照片上香！”说到这里，徐业辉神色中带着一丝惊恐。

我问徐业辉，这么说有证据吗?

徐业辉摇头，说两人刚同居时，他曾建议杨虹来他家住或在外租房，免得哪天回家遇上她老公发生冲突。但杨虹说什么也不同意离家，只说了句：“你放心吧，他永远不会回来的。”

“刚听这话时我也没多想，但我俩同居的那俩月，我几次听到她夜里说梦话喊‘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我想把你推下去’……第二天我关心她问是不是做噩梦了，她就发脾气，每次都跟我大吵一架，好像我戳破了她的什么秘密似的。我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一想——妈呀，怕不是她把她老公推下什么地方摔死了，所以永远不会回来了……”

“你俩什么时候分的？”我继续问。

徐业辉说，2015年4月底，有人从重庆给杨虹寄来一个包裹，杨虹有意避着他。他怀疑是她老公寄来的，醋意大发，跟杨虹吵了架，还动手扇了杨虹一巴掌。“当时是你们所的余警官来处理的。虽然当着警察面杨虹没再说啥，但警察一走她就要跟我分手，说之前她老公从没打过她。听她说这话，我也就绝了跟她继续处下去的念想。”

我按住心里的诧异，继续问：“你为什么怀疑那箱东西是她老公寄给她的？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说，杨虹之前一直说她老公在重庆，不是她老公还能是谁？如果是别人，杨虹用得着躲着我吗？但至于快递箱装的是什么东西，徐业辉说他也不知道。

“快递发货具体地址你记得吗？”——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或许这个地址就是李红军的落脚处。

徐业辉说“记得”，然后开始翻手机，翻了半晌，给了我一张照片：重庆市××区××街道××路×号，后面还有一组电话号码。

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脏似乎被一股电流击中，顿时全身震了一下——我赶紧打开手机翻出那张照片，没错，是“重庆大德”的地址。

5

回到派出所，我和孙力把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询问能不能给李红军上“技侦”，但领导说李红军的涉警记录连刑事案件都算不上，估计上级不会批，但他会尽量争取——领导可能看出了我的惊讶，解释说，摩托车盗窃案被广化派出所破掉了，人抓住了，赃车也追回了，嫌疑人并不是李红军。

这就更令人困惑了——此前辨认时，杨虹的信誓旦旦是从何而来？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她认错了人吗？

“那么从警综平台上剩余的18起涉警记录来看，李红军从未现身，而且除了杨虹外，这一年多来再无其他人见过李红军本人。”一旁的孙力说出了我的想法。

“徐业辉提供的信息十分重要。照目前情况看，李红军的去向成谜，虽然没人报案，但往小里说，他身上关系着我们18起报警记录，我们需要找他核实情况；往大里说，这事也许人命关天，李红军是死是活我们必须得有个定论。”领导给事情定了调子，我们必须查出李红军下落。

从领导那里出来，孙力问我：“你感觉有没有可能真像徐业辉怀疑的那样，李红军已经被杨虹害死了？”

“如果她已经把李红军干掉了，那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报警是为什么？怕引不起我们的注意，还是存心挑战我们的工作能力？”我反问道。

我联系了公安局技侦部门，领导前期的沟通起了作用，技侦部门同意用技术手段锁定李红军位置，但需要我提供李红军本人常用手机号码——我手机里的李红军号码早已停机，找杨虹要来新号码，但技侦经过分析之后告诉我，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号码也已停机多时。

我联系电信部门核查李红军的手机号码，对方告诉我半年前号码已经欠费停机——我找出8月1日那晚出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没错啊，杨虹当时确实给李红军打了电话，让他回家拿钱——我又请电信部门查询杨虹在8月1日当晚7点至11点间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显示，她确实拨打了李红军的手机，但是根本没有接通，更不可能有人告诉杨虹“晚上9点回家”。

结合那晚朱雀小区大门监控里根本没有李红军的影像，我开始深切怀疑，杨虹那晚所说的，恐怕都是子虚乌有了。那么，她为什么要骗我？那晚她头上的伤又是怎么弄的？另外，除了8月1日那次外，其他17次警情有哪些是真的？

我决定直接问杨虹，让她向我解释明白。

面对我的质疑和手中所调取的电信部门通话记录，杨虹坐在客厅沙发上一言不发，无论我问什么皆是有问无答。她的态度令我恼怒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耐着性子对她说：“也许你有很多难言之隐，但还是希望你能信任我们，你和李红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现在人到底在哪里？”

但她依旧不说话，怔怔地看着地板，不知在想些什么。就这样跟我僵持了两个多小时。

我只好转头去了朱雀小区的居委会，找到治安干事，让他立刻安排人手24小时盯着杨虹家，有什么人去了她家或者她什么时间出了门，马上通知我。

另一边，孙力找到了徐业辉口中2015年4月份从重庆寄给杨虹的那份快递。经过核实，发货方并非李红军，而是“重庆大德殡葬用品店”，至于发来的东西——“是一个骨灰盒，杨虹订的。”

本地也不是没有殡仪用品店，为什么杨虹要舍近求远去千里之外订购这些东西？着实有点奇怪。

孙力给“重庆大德”的老板又打了一次电话，对方说自己还依稀记得杨虹。因为这是家小店，买东西的大多是周边居民，没有网店，也从未通过快递发送过货物，杨虹是这么多年来首例邮购的客户。

“核实完快递的事情后，我顺手查了杨虹与李红军两人的购票信息。两人在2014年6月2日各自买了一张从本市去重庆的动车票，但6月8日只有杨虹买了一张从重庆返回的车票，李红军再无购票信息。”孙力说，除了铁路部门外，民航、公路部门能查的他也查了，都没有李红军的购票信息。

的确，也是从这个时间点之后，我再没有在辖区内见到过李红军。于是，整个事件的时间线大致如下：

2014年6月2日，杨虹与李红军二人共同前往重庆，7天后杨虹返回，李红军不知去向；

2014年7月，派出所第一次接到杨虹有关李红军吸毒家暴的警情，8月接到2起相同警情，9月接到2起警情；

2014年10月，杨虹与徐业辉相识并恋爱，至2015年春节前的4个月间，警方接到杨虹1起报警；

2015年春节后杨虹与徐业辉开始同居后的近3个月内，警方再未接到过杨虹报警；

2015年4月底，杨虹在“重庆大德”邮购骨灰盒，同月与徐业辉分手。此后至2015年10月，警方连续接到11次杨虹报警。

“你看，杨虹认识徐业辉后报警的频率明显降低，两人同居后再无警情，分手后警情又陡然上升。”孙力说，除非李红军“配合”杨虹，当

她身边出现恋爱对象时便不来骚扰，但这可能吗？自己的老婆在家中跟别的男人天天睡一张床，李红军不更应纠缠杨虹吗？

“2014年6月她与李红军去重庆后，李红军本人再未出现过。结合徐业辉提供的同居期间杨虹在家的非正常举止，我深度怀疑李红军恐怕已经不在人世，而杨虹至少是整个事件的知情者，甚至……”孙力顿了顿，我明白他想说啥。

我叹了口气，说这个结论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杨虹反复报警这事，你能解释得通吗？如果她在重庆时真把李红军杀了，那她应该竭力隐瞒情况，尤其是隐瞒李红军的踪迹才对。李红军本就是一个“老毒幺子”，日常行踪飘忽不定，在本地又没亲属，如果杨虹不发声，谁会管李红军的死活？可现在她反复报警，相当于推着警方寻找李红军的下落，这对她来说有一丁点好处吗？

“你说杨虹会不会真像徐业辉说的那样有精神病，所有事情都是她自己臆想出来的？我想来想去，总觉得正常人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当然这很有可能，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就算之前所有遭遇家暴的事情都是杨虹妄想出来的，但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还是——李红军去哪儿了？

6

2015年10月22日，在获得上级批准后，我、孙力和另外3位同事前往杨虹家中进行现场搜查。虽然是以搜查吸毒人员李红军住处为名，但我和孙力心里都清楚这次搜查的关键点在哪里。

杨虹似乎对我们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像接待普通客人一样给我们开门，还给每位民警倒了茶水。搜查开始前，我把杨虹拉到一旁，依旧努力用平和的语气问她："李红军到底去哪儿了，你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杨虹还是之前那副样子，低着头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提出她在2015年4月从重庆买骨灰盒的事时，她才明显怔了一下。我看事情或许有突破，接着问她买那东西干什么用？现在骨灰盒放在哪里？杨虹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似乎噙着泪水。

既然多说无益，我和同事们只好着手开始搜查。

很快，贴着李红军照片的骨灰盒在杨虹床头柜下被发现了——她并没有费心思去隐藏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十分敏感的物件。

我把骨灰盒从床头柜里抱出来，感觉有些分量，问杨虹："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作为搜查中的法定程序，我必须要杨虹亲口说出里面的东西。杨虹静静地看着骨灰盒时，我的嘴边已经准备好下个问题——"李红军是怎么死的？在哪儿被火化的？"

然而，杨虹却说了句："里面不是骨灰，你打开看吧。"

我用执法仪对着杨虹说，你站到骨灰盒前面来，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

杨虹照办，盒子打开了，所有人都愣住了，里面装的确实不是骨灰——两本日记、一摞信件、一件白色衬衫、一条西装裤还有几个小小的饰品，便是骨灰盒里所有的东西。

两本日记一红一绿，都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款式。绿皮的是李红军的，红皮的则属于杨虹。一摞信件都是李红军写给杨虹的，我打开几封看了，长短不一，大多是当年李红军写下的情诗。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都不是新衣服，剩下的就是一副耳环和几个小玩意，应该是杨虹戴过的。

孙力不死心，伸手进去又翻了一遍。我也没想到是这结果，场面一时很尴尬。

半晌，杨虹淡淡地说了句："警官，骨灰盒里放这些东西不犯法吧？"

大家铩羽而归，我又被领导骂了一顿。

我们动手可能太早了，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便抛出了骨灰盒的事情。虽然现场搜查找到了那个骨灰盒，但里面没有我们预想中的东西，如果杨虹真有问题，那么这时她也肯定对我们的动机有所察觉。

"不管骨灰盒里是什么，现在人肯定已经'惊'了。先把她带回派出所来，你们也别跟她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吧。"领导交代。

那天我们把杨虹带回派出所。讯问室里，我和孙力先询问了8月1日她虚报警情的事情，她只承认那晚骗了我们，说头上的伤是自己不小心撞的。但对于其余17次警情，她坚持称确实存在，没有骗我们。

"你最后一次见到李红军是什么时候？"我问杨虹。

"一个月前，他来家里找我要钱。"

"你给他钱了？"

杨虹点头，说自己怕被李红军勒死，说出了密码。这些问题孙力第一次受案时已经问过，当时杨虹说李红军拿走了一张建行储蓄卡，里面有7600块钱。孙力核实过那张卡，金额没错，但从没人取过里面的钱。

“9月25日那天李红军回家时穿的什么衣服？”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7月15日那次呢？就是用晒衣竿打你那次。”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6月10日呢？”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我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杨虹你放老实点，李红军天天穿那件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吗？他从没换过衣服？”杨虹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说李红军每次回家都是穿那身衣服。

“就是你在他骨灰盒里放的那一身吗？”孙力突然在一旁幽幽地问道。

杨虹愣了一下，竟然点点头，说是的，就是那一身。

孙力当场就火了。

警情聊不下去，我换了一个话题：“2014年6月2日，你和李红军一起前往重庆，7天后的6月8日你买了一张返程车票，而李红军却没有任何购票记录。这件事你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另外，你们在重庆的7天都做了什么？”

“我陪他去找工作，然后在重庆旅行，我们去了洪崖洞、磁器口、歌乐山，吃了火锅，坐了长江索道……”杨虹陷入回忆之中。她的记性

似乎很好，快时隔一年半，两人当时在洪崖洞下餐厅吃的日料，在磁器口商户买的挂件，竟然可以一一陈述。说到开心处，脸上还露出了笑容，仿佛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昨晚一样。

我仔细听了大概20分钟，打断了她，说行程够详细了，讲一下返程车票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她一人的返程票记录。“是你们记错了，我俩一起回来的，离开重庆后我们去了成都，红军要看一下他的母校……”

孙力开口要打断他，被我制止了，让杨虹接着往下说。杨虹说，李红军大学同寝室好友王平毕业后留在母校工作，他俩一起去看了王平，王平还请二人吃了饭，第二天还带他们去逛了武侯祠。

我听到新人名，马上上网查询，那所学校确实有叫王平的教师。我留下孙力在屋里继续和杨虹谈话，自己跑回办公室。先通过指挥中心联系了那所大学辖区派出所，取得了王平的联系方式。表明身份后，我问王平，2014年6月初，你的大学同寝舍友李红军夫妇是否曾到访?

“李红军？怎么可能！我跟他已经十多年没联系了。1998年夏天，他刚结婚时带老婆来过我这儿，当时我领他们在成都玩了两天。之后两人再没来过。”王平说2014年6月前半个月自己一直在北京开会，都是有参会记录可查的。

挂掉电话，恼火的我匆匆返回讯问室，想揭穿杨虹的谎言。没承想刚走到讯问室门口，就听孙力正在里面吼：“你就跟老子胡扯吧，今年是哪年你能搞清楚不？要不要给你做个尿检？你是不是也跟李红军一起吸麻果了？！”

我推门进去，杨虹坐在讯问椅上目光呆滞。孙力已经站了起来，满脸怒气，正叉着腰教训杨虹。

我问孙力怎么了。

“要不是我在重庆上过大学，还真就信了她的邪！”孙力说，杨虹说李红军带她去了重庆会仙楼吃饭，还去了楼顶的空中花园，但会仙楼2009年就被拆除了。当年孙力正在重庆读书，还记得当时爆破拆楼的新闻。

7

就在我和孙力商量如何盘问杨虹时，领导打来电话，让我俩去他办公室一趟。领导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中年男人，领导指着他介绍说，这是杨虹的姐夫，某国有企业的书记张国华。随后又说，“问话到此为止吧。”

我正揣摩领导这又是个什么意思，领导递给我一份精神病医院的诊断证明。我打开看，是杨虹的，精神分裂症。

“给警官添麻烦了，她得这病已经两年多了。”张国华在一旁面带愧色。

就这一句话，让孙力直接在领导办公室跟张国华拍了桌子：“她有精神病这种事你们怎么不早向公安机关反映？她个精神病人折磨了我们一年多，浪费了多少警力处理她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

我先把孙力劝了出去，再回到办公室。张国华脸色也不太好看，毕竟大小也是个书记，领导正在打圆场。

我强压着不满放平语气问张国华：“我去杨虹家很多次，从没见到她吃药。今天在她家进行现场搜查时也没看到家里有精神类的药物。我是社区民警，手里掌握着辖区所有精神病人的资料和情况，为何从未听说杨虹有精神病这件事？”

张国华有些不好意思，说这是他们家属的原因。之前杨虹的病情时好时坏，但吃药能够控制。他们担心杨虹丢工作，就没跟任何人提起过。“毕竟李红军靠不住，杨虹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如果单位知道她有精神病，肯定会让她转岗放假，咱这边病休的薪资待遇情况您也知道……”

说到这里，张国华面露无奈。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他的小九九——杨虹有精神病，丈夫李红军是第一监护人。但李红军因吸毒无法承担监护责任，这个责任就要落在张国华和他老婆身上。谁家也不想平白无故落个精神病人要照顾，这恐怕才是张国华一直帮杨虹隐瞒精神病的根本原因。

这话我也不好当面说破，只能继续问他什么时候发现杨虹精神不正常的?

他说大概在2014年初，是李红军说的，杨虹精神不正常，时常对着空气说话。开始他们两口子不信，觉得李红军吸毒后嘴里没实话，甚至一度怀疑李红军闹幺蛾子找他俩骗钱。但后来有一次，李红军脖子上带着伤跑去找他们，说夜里睡觉时差点被杨虹勒死。他和妻子看不像是假的，去杨虹家里，发现她精神确实不太正常，于是带她去了医院才确诊的。

我问张国华，杨虹这一年多给我们打了十几次报警电话说李红军打她，你知不知道?

张国华很吃惊，说从来没听杨虹说过李红军打她的事情。这次是因为警察上门带走了杨虹，对门邻居通知了杨虹姐姐，他才来的派出所。

“自从李红军吸毒之后，我们两家几乎没来往了。我们劝杨虹赶紧跟李红军离婚，她不同意。谁家也不想沾这么个吸毒亲戚，况且李红军还经常为钱的事来纠缠我们，所以平时没啥事干脆就不走动了……”

我便问他近期有没有见过李红军。张国华却啐了一口，“谁知道那个狗日的死到哪里去了。不提他我还不生气，如果不是李红军吸毒，杨虹也不会害上这毛病！”

他说，李红军和杨虹去重庆的事他知道，当时杨虹说陪李红军去涪陵面试。他和妻子还阻止过，因为杨虹还在吃药，李红军的样子也不像

是去找工作的。至于骨灰盒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

我说2014年6月杨虹从重庆回来之后，你们有没有再见过李红军？张国华说没见过，听说李红军走了，高兴还来不及。后来偶尔问起李红军在重庆的情况也是客套一下，杨虹一两句话带过，他们也没多问。

送走张国华，我回到所领导办公室。领导点了支烟，说眼下的问题是，即便杨虹跟我们说她已经把李红军杀了，作为一名精神病患者，她的话也很难作为证据。怎么办?

“即便做不了证据，我们也得把李红军找出来，因为他是杨虹的法定监护人，如果失踪或死亡，需要走变更监护人手续。”

“那就分开搞吧，杨虹该治病治病，继续留意李红军的下落。”领导说。

李红军涉警的案子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很快，杨虹就被送去做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确认了在之前数起虚假报警事件中不承担法律责任。她的姐姐暂时承担法定监护责任。

我问孙力，案子办到现在，你觉得李红军的失踪有多大概率与杨虹有关？孙力说：“你这是明知故问。李红军失踪的所有线索都指向杨虹，如果她不是精神病，现在几乎就可以确定杨虹在整个事件中的责任。”

的确，一纸精神病鉴定书完美解释了此前所有事件中的谜团，也给了杨虹所有不合理行为一个合理解释。

“你们处理了那么多次关于杨虹的警情，材料也做了一份又一份，都没发现她精神有问题吗？”一次所务会上，领导问其他几位处理过杨虹警情的同事。

“你说没有觉得异常吧，那真不可能，但当时都在往案子的方向想，推测她是因为某些涉案因素，想隐瞒某些真相，所以说话做事不合逻辑，可谁能想到她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呢？”一位同事说。

“你给她家人看过杨虹放在骨灰盒里的那些东西吗？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或者疑点？”领导问我。

杨虹被家人送去精神病院后，我确实协调杨虹姐姐一起去了她的住处，又找出了那个骨灰盒。那次我把两人的日记、信件都打开了，讲的全是两人过去的事情。又在杨虹姐姐的讲述下，大体勾勒出当年杨虹与李红军的爱情故事。

8

李红军1993年大学毕业后到我市工作，早年还教过书。1995年转到某研究院工作后，一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他作为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代表研究院去北京领了奖。之后在本市作公开汇报。汇报结束后，接受了市里机关报记者杨虹的专访。两人就此相识，几个月后发展为情侣关系。

最初杨虹家人并不看好李红军——杨虹父母都在四川南充老家。姐夫张国华是福建人，与杨虹姐姐结婚后，两边的老人为照顾孩子颇费周折，因此他们都希望杨虹能嫁一个本地人家，这样父母至少免去奔波之苦。另外，杨虹父亲年轻时与东北人结过梁子，杨虹母亲则一直对东北人印象不好，担心女儿会吃亏。

杨虹个子不高，穿着高跟鞋也不超过一米六，也是大学毕业后分来本市报社的。她外表柔弱但性格很要强，别人很难改变她的想法，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好在之后的相处中，杨家人发现文质彬彬的李红军确实也不错，就默许了两人的结合。

“李红军年轻的时候确实与众不同，他心很细，对杨虹也非常好，关键是两人的兴趣爱好相投。”杨虹姐姐说，妹妹从小喜欢读书、旅行，还热衷于打理花花草草，恰好李红军也喜欢这些。两人刚结婚时住在李红军单位分的公房里，不到30平方米的小屋子堆满了书籍和各种花草植物。两人还经常外出旅行，一同去过新疆和海南。

杨虹与李红军的美满生活持续了近10年。“当年设计院和机关报社相距几公里，李红军每天下班后骑车去接杨虹，风雨无阻。每周五晚上两人都会去城南的红苑餐厅吃饭，然后李红军载着杨虹去机关影院看电影，杨虹在后座搂着李红军。我那时候还总是抱怨我家那口子说‘你看人家，结婚这么多年就像刚谈恋爱一样，你再看看咱俩’。可谁也没想到，他们两口子后来会走到这个地步……”

2006年春节前，在设计院已经准备提拔科长的李红军突然选择前往山东外派工作，杨虹也整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杨虹姐姐察觉到问题，一边安慰妹妹一边打听原因。起初杨虹和李红军什么都不说，直到李红军去了山东之后，杨虹才在她的追问下说出原因。

原来，杨虹在武汉读大学时，爱上了报社带她的男记者。那个记者大杨虹十几岁，已婚。两人的地下恋情持续了半年，被记者的老婆发现。那女人先闹到报社，又闹到杨虹的大学。男记者慑于老婆的泼辣，选择与杨虹一刀两断。杨虹很伤心，不久又发现自己竟然怀了孕。

此事杨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她借钱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在毕业季的忙碌中瞒过了身边所有人。她可能以为男记者和那个拿掉的孩子只是自己人生路上一块小小的绊脚石，绕过去就行了，但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她低估了这场恋情带给自己的伤害。

杨虹与李红军的婚姻里，唯一的缺憾就是两个人一直没要上孩子。两人借外出旅游之机在武汉、长沙和北京的医院看过，后来医生确诊，杨虹受当年流产手术影响，在当时的医疗技术下已经很难生育。

这个结果令杨虹和李红军深受打击，尤其是李红军，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对自己隐瞒了这段经历。那段时间杨虹精神状态很差，甚至一度想要自杀。李红军一直陪在她身边，继续像往常一样接送她上下班，周末依旧一起去红苑餐厅和机关影院，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在李红军的陪伴下，杨虹用了一年时间才从失去生育能力一事中走出来。但正当她接受现实，平复情绪准备重新投入与李红军的二人世界时，李红军却突然告诉她，自己年后要去山东外派，时间两年。

杨虹当场呆住，哭着问李红军为什么悄无声息地要去山东。李红军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她解释外派工作的原因，只说是单位临时通知。

杨虹知道丈夫是一个温柔到不会发脾气但内心却十分执拗的人，哭着问姐姐两人会不会因此分道扬镳。杨虹姐姐说，得知整个过程后她也很崩溃，既不知道该怎么劝妹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最后只能劝杨虹放宽心——李红军需要时间自我调整，既然选择外派两年那就去吧。也许等他回来，一切便都过去了。

杨虹姐姐再次见到妹夫，已经是2007年10月。她说那时的李红军变化不大，只是整个人比之前瘦了些。李红军说自己不放心家里，申请提前结束外派回设计院上班。

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杨虹。李红军提前回来了，就说明之前的一切都过去了。之后的日子里，李红军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杨虹上下班，周五晚上带杨虹去红苑餐厅。只是那时机关影院已经关门了，两人不再去看电影。

“大概是2009年国庆，我们开始发现李红军不太正常。他频繁找我们借钱，先是三千五千，说家里买东西周转，后来三五百也借，说是应急。当时我们也没多想，便借给了他，但后来一合计，李红军前后一共借走了三四万，一直没还。”

这个数字那时对工薪阶层来说不是笔小钱，杨虹姐姐当时很纳闷：李红军和杨虹都有工作，也没见妹妹家里添置大件。起初她以为妹妹和妹夫遇到了什么困难，直到2010年春节李红军被抓，她才知道原来那些钱都被他拿去赌博和吸毒了。

在她的追问下，杨虹才讲出实情。

“那时我才知道，李红军在山东时被同事拉拢参与了驻地村里的赌局。那边有些团伙知道外派人员的工资高又没有花钱的地方，手里都有钱，所以专门‘做局’坑他们，俗称‘杀鸭子’。李红军文质彬彬没啥社会经验，很容易上道成了‘鸭子’，一年多不但输光了外派工资，还欠了同事一大笔钱，最后又在牌桌上受人蛊惑吸上了冰毒……”2007

年，李红军因吸毒被山东当地警察抓过。碍于影响，外派单位没有声张。但提前结束合同，把他赶了回来。李红军回来后大概收敛了一年，但后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本地“道友”圈。

“2010年，还是张国华偶然得知李红军因吸毒被拘留的消息，到公安局一问才知道，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如果不是他问到消息，我们还蒙在鼓里不停地借给李红军钱呢。”杨虹姐姐说，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李红军吸毒后，杨虹想过很多办法，最初想帮他戒毒，也考虑过离婚，但最终李红军没能戒毒，两人也没能离婚。

杨虹不能接受李红军吸毒赌博，但又深爱他，同时因为不能生育感觉有愧于李红军；李红军不能原谅杨虹婚前隐瞒的历史，却也深爱杨虹，本想靠外派工作暂时逃避现实，却又染上毒瘾无法自拔。两个人分不开又合不拢，只能相互折磨。

“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如果早离了，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杨虹姐姐感慨地说。

9

摸清了杨虹与李红军的过去，似乎对我们寻找李红军的去向也没有多少帮助。

我和孙力始终觉得李红军的失踪与杨虹有关，至少杨虹应该知道其中情况。我们联系重庆警方查询对应时间段的报失人口、无名尸等，对方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过核实都与李红军无关；我们又查询了长江重庆段下游一些县市提供的无名尸协查通报，也未发现符合李红军信息的线索。

后来在日常工作中，所里同事也在留意有关李红军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曾与李红军有过交往的“道友”，每次抓到后都会审问李红军的去向，但同样没有结果。有次工作中遇到之前借过“码钱”给李红军的人，我问他钱要回来没有？他摇着头说：“哪个晓得他跑哪里去了嘛，他女人又得了精神病，找哪个要钱？”

2016年8月，我陪父母去重庆游玩，一天晚上老人去坐轮渡，我晕船没有同去。在酒店里玩了半天手机，突然想起之前的“重庆大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索性打车去了那家店铺。

店子开在江边，很不起眼，店主是对50多岁的夫妇。我亮明身份，说想了解一下杨虹和李红军的事情，两人很是意外。店主说去年不是在电话里已经把情况告诉你们单位同事了吗?“不就是往你们那里寄了一个骨灰盒，两年了还不消停。早知这样当初说啥也不做那单买卖。”

我说自己只是正好路过这里，来问点事情，案子早就结了。店主说，那你快问吧，我们这里也快打烊了。

我说我想知道杨虹为什么来你这里买东西，她是如何知道你们这家商店的?

老板娘说她还有点印象，杨虹好像是一天早上来的店里，当时店子刚开门，她是第一个客人。杨虹说她老公在江边落水死了，尸体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我家店子离她老公出事地点最近。

老板娘说，那时她还问过杨虹有没有报警，没有的话她帮忙通知警察。但杨虹说已经报过警了，然后买了一个5寸的遗像相框。老板娘也就没多心。

2015年4月，老板娘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要邮购一个骨灰盒。之前没遇到过这种生意，起初老板娘没答应，但对方说自己去年去店里买过相框。老板娘想起了是杨虹，就答应了。

但挂了电话，老板娘又有些纳闷：杨虹为何去年买相框今年才买骨灰盒，难道老公的尸首今年才被发现？她加了微信后随口问了杨虹一句，但杨虹没回答，只是转了钱。

老板说，2014年他还在开出租车，是老板娘自己看店，但后来骨灰盒是他寄的，留的也是他的电话。警察打电话问骨灰盒时他才问了老婆这件事，当时还跟老婆说以后别再惹这份麻烦。

离开“重庆大德”后，我给孙力发了一段微信，把老板娘提供的情况讲给他听。孙力回复我说知道了，信息很重要，他会向上汇报。

这年年底我离开公安局，移交工作时嘱咐孙力，希望他能在之后的工作中继续寻找李红军的下落。孙力说当然，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2018年6月，我回单位处理一些事情，那时孙力也准备调回老家工作。我俩一起吃了个饭，又说起当年杨虹和李红军的事。孙力说李红军依旧没有消息，他联系上了李红军远在黑龙江的姐姐，希望对方能够提供一些有关弟弟的信息，最好能来我们这里一趟，代替杨虹为李红军报一个人口失踪的案。但李红军的姐姐拒绝了，她说自从弟弟吸毒之后，两人便一刀两断了，李红军是死是活都与她无关。

我问杨虹现在是什么情况，孙力说，病得越来越厉害了，吃药看病似乎都没啥用处。以前是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现在几乎常态化了。她姐姐、姐夫偶尔来看看，但多数时间没人管，现在已经上了公安局“肇事肇祸”的名单。

“她犯了病会穿着以前放在李红军骨灰盒里的那身衣服在街上晃悠，逢人就说自己是李红军，当年是杨虹在重庆把他推到水里淹死了。周围人都躲着她。也有人报过警，可是她这副样子，说的话哪个肯信呢？”孙力说。

在我提笔写下这个案子时，手头依旧没有李红军的确切消息，但我听到过一个有关李红军的传言：2019年，有人在南方某座城市里见过他。他还活着，而且戒掉了毒品，改了名字，以送外卖为生。

我又给孙力打过电话，他说，如果真是这个结局，他倒可以理解：“‘社会性死亡’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总比我们之前猜测的结果要好。”

搅黄了这个吸毒女的婚事后

1

2014年春节前的一个早晨，辖区一所酒店报警称，怀疑有人在客房内聚众吸毒。我与同事赶往现场后，从客房内带出6名嫌疑人，4男2女，一个个都精神恍惚。与此同时，房间内还有大量用过的计生用品、吸毒工具和疑似冰毒残渣。

其中一名女性嫌疑人叫刘丽，23岁，身材高挑，打扮入时，自称毕业于某高校服装设计专业，一直在上海做模特。前一天下午刚刚回到本市，就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出来聚会”了。她原打算今天就回父母家准备过年，不承想却被带来了派出所。

在随后的讯问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年纪不大的刘丽，着实是一个难缠的角色：被捕之初，她就一直不配合警方工作，先是在讯问室里扭扭捏捏地冲民警们撒娇，说自己吸的是“水烟”，并非冰毒。等我的同事拎起现场缴获的剩余冰毒，问她是不是拿警察当傻子时，她就立刻换了一副面孔，马上痛哭起来，说自己是第一次涉毒，不知道这东西是毒品。

我调出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网的资料，发现刘丽在上海也曾有过多次涉毒记录。谎言再次被戳破后，她开始大吵大闹起来，多次要求“打电话”。我以为她要通知家人过来，便用她的手机按照她告知的号码拨了过去——那是一个上海号码，对方一听她因吸毒被抓了，立刻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就无法接通了。

我问刘丽这个接电话的人是谁，她先说是“叔叔”，后来又改口说是“朋友”。我再问她要给这个人打电话的原因和对方的具体信息，她就一概不答了。

之后，刘丽彻底变成了一尊“泥菩萨”，拒绝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也拒不接受尿检采样。两个小时后，警方决定送她去医院进行抽血化

验，刘丽看抗拒无果，方才同意尿检——果不其然，结果是甲基安非他命（俗称冰毒）试板阳性反应。

事实无可狡辩，刘丽这才承认自己吸食毒品的违法事实。

就在同事去公安局法制科报裁的间隙，刘丽仍不住地絮叨，称自己此前吸毒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我说你这次过年回家也不是工作，她就又将责任推到与她一同被抓的另一名女孩身上，说自己是“受闺蜜蒙骗”。

但其他5人的笔录材料里都写着，他们6人自一年前便是固定“毒友”，3个月前刘丽还回来过一次本市，一伙人也曾一起相约聚众吸毒。唯独刘丽的供述里，基本没有一句是真的。

最终，6人中除2人因涉嫌多次吸毒，被公安局法制科认定为“严重成瘾”送强制隔离戒毒以外，其他4人分别被处7至15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刘丽也被判拘留10天。

执行拘留和强制隔离戒毒前，我们按照规定通知他们的直系亲属前来派出所领取《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中午12时许，我在派出所值班室见到了刘丽的父母。

2

刘丽的父母都是本市居民，父亲老刘50多岁，某厂工人；母亲竟然还算我们的“熟人”——她就在派出所隔壁的超市上班，派出所同事们都喊她“张嫂”。张嫂平日待人很热情，长得也慈眉善目，在超市遇见我们，都会主动打招呼，嘘寒问暖。

夫妻俩来了之后，我们看见张嫂，还愣了一下。大致了解了女儿的案情后，夫妻二人惊得目瞪口呆，张嫂特意拉过一个相熟的同事问：“会不会搞错了？”同事也很惋惜，说确实没搞错，都是你女儿自己交代的。

打听到我是主办民警后，张嫂赶紧来到我跟前，问我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我明白她的意思，告诉她有啥话就在这里说。张嫂犹豫了一番，还是挤出一副笑脸说：“姑娘年纪小不懂事，你看能不能照顾一下，这次就算了？”

我叹了口气说，刘丽已经23岁了，吸毒是违法行为，不是一句“年龄小不懂事”就能瞒过去的。况且，她并非第一次涉毒。

张嫂又以“快过年了”为由向我求情，我依旧拒绝了她。最后实在没办法，张嫂问我，能不能在女儿送拘留所前跟她说几句话。我同意了，把刘丽从讯问室里带了出来。

母女俩在值班大厅的角落里窃窃私语，张嫂神情时而愤怒、时而紧张，刘丽的神情也时而焦急、时而懊恼。老刘就在值班台前不断给我递烟，打听女儿吸毒一事是否会“记入档案”。

我一边应付老刘，一边盯着张嫂和刘丽母女。过了十几分钟，母女俩像是达成了某种一致，径直回到值班台前。张嫂一脸紧张地问我：“刘丽吸毒这事儿除了同案人员和到场亲属外，不会告诉别人吧？”

我点点头："这个你可以放心，警方做事有纪律，无关人员无权打听案情，警方也无权将案情泄露给无关人员。"

夫妻二人长出了一口气，向我表达了谢意后，就目送民警将刘丽带上了警车。

望着老刘和张嫂远去的背影，一位与张嫂相熟的同事还在一旁感慨：两口子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养大个女儿，人长得漂亮，大学毕业后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体面工作，张嫂一直引以为豪。"她家可是把下半辈子的希望全寄托在女儿身上了，这下可好……"

之前常听张嫂跟我们"显摆"她这个十分漂亮且"很出息"的女儿，没想到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种场合，因为这种事情。"这么年轻就吸食冰毒，还由着一群'道友'糟践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戒得掉。"我也跟着叹气。

"太难了，像她这种在上海和本地都有吸毒前科的人，一看就不是'着道'一两天了。要想戒，非得有'大决心大动作'才行……"

我正跟同事感慨着，张嫂夫妇忽然又折回了派出所，两人的脸色都十分慌张。我正想问张嫂怎么了，她却拉住我直往值班大厅外面走，一边走一边带着哭腔说："李警官，这次你无论如何都得帮帮我啊——"

张嫂还没开口，在派出所外墙边上，老刘就突然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往我怀里塞，打开一看，是两条价值不菲的"黄鹤楼"。他嘴上还在念叨："本来想拿'1916'（烟名）呢，店里一时没有货，您先将就着抽……"

我连忙推辞，张嫂却使劲攥着我的胳膊，压着声音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有点小事想请李警官帮个忙……"

一时推辞不过，我只好暂且让她说事。

张嫂说，等下会有几个人要来派出所询问女儿的案情，让我帮她撒个谎，就说刘丽是因为朋友聚会喝醉了酒，酒后和人打架被警察送进了拘留所，“可千万别说吸毒的事，更别提吸毒后跟别人……”

我有些不解：“刚不是说了吗？真要有人来问，我直接打发他走不就行了，哪用得着这么麻烦，还扯么斯谎？”

张嫂却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对方已经从其他途径得到了一些消息，怀疑刘丽吸毒。我是警察，只有我来扯这个谎，对方才能相信。

“那帮人是干啥的？你家亲戚？”我随口问。

张嫂和老刘愣了一下，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点点头，说是远房亲戚。

“啥亲戚这么好事，喜欢打听这种事情，还要专程来派出所问？理他干啥，找个理由推掉不就行了？”我更不解了。

张嫂却又说，能推掉他们就不会来找我了，这亲戚他们得罪不起。

我觉得张嫂没说实话，但转念一想，这事儿我也没必要较真。于是便说，撒谎这事儿我做不到，但在不提案情的情况下，可以帮忙把人打发走。

张嫂看确实说不动我，也只好作罢。但似乎还是不太放心，又恳求我等下她要是说什么，我别揭穿她。

我只好在一旁苦笑：“谈不上揭穿，我不参与你自家事儿就行。”

3

我们三人刚回到派出所，张嫂那几个“远房亲戚”便到了。他们看上去也是一家三口，男主人自我介绍说叫他“老陈”就行。我看他有些眼熟，问他是不是陈××，他笑着点点头，承认了。

这个陈××是邻市一家食品厂的老板，经商30多年，在市里虽算不上“首富”，但也小有名气，我在本地新闻上看到过他。我心里琢磨，张嫂这么爱显摆的一个人，竟从没跟我们说起过她有这么个厉害的亲戚。

与老陈一起前来的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子小陈年龄跟刘丽相仿，长相颇为周正，但看上去似乎有些羞涩。老陈与我的同事秦警官相熟，小陈喊了声“秦叔”，转而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民警名录，回头喊了我一声“李叔”。

我赶紧推辞，说我也比他大不了多少，喊“哥”就行。小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张嫂夫妇也赔着笑脸。老陈很快就说，想问一下刘丽的案子。

秦警官刚好接了个电话，笑着对老陈说“领导找我有事，有啥事儿问李警官就行”，然后便匆匆上了楼。我心里暗道一声“狡猾”，但也无可奈何。老陈转而看着我，我看了张嫂夫妇一眼，两人就站在老陈身后，神情十分紧张。

这个氛围着实有些反常，但我也只能说：“陈总不是我不跟你说，这事儿警察有纪律，案子的事情不能跟无关人员乱讲。该说的，我都跟张嫂两口子说过了，有啥问题你问她就行，你们都是亲戚，这点信任还没有吗？”

我以为这句话完全能堵住老陈的嘴，可老陈却摆摆手：“李警官别误会，我是听亲家说孩子因为打架被抓了，心里担心。也不知道对方损

失重不重，人伤了没有？我也略懂点法律，知道赔偿到位的话可以获得对方谅解，孩子就免得坐牢。咱都有喝醉的时候，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不是？”

听到“亲家”一词，我心里“咯噔”一下。

老陈接着说，他今天是带着钱过来的，需要赔偿多少由他来出。“亲家的家务条件（经济条件）有限，别为了点赔偿款难为孩子。”说着，他又回头冲张嫂夫妇笑了笑，张嫂夫妇脸上明显有些尴尬，但还是客套了几句说“不用”。

这下轮到我心里打鼓了——如果真如老陈所说，他与张嫂一家是“亲家”，那么刘丽吸毒一事他是有权知道的。

我转头问小陈：“你和刘丽是两口子？”小陈点点头，说3个月前两人领了结婚证，年前刘丽回来，两人便准备把仪式办了，酒店啥的都准备好了，请柬也都发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想到这关口，妻子被警察抓了，他担心会耽误之后的安排。

那时市民政系统尚未与公安系统联网，我在警综平台上看到刘丽的身份信息仍是“未婚”，否则带她来派出所之后，首先通知的必然是她的丈夫小陈。

我望向张嫂，发现她的身体已在微微颤抖了，如果不是老刘在一旁扶着，可能就一屁股坐地上了。我一下明白了她之前反复问我那些事的原因，也大概理解了她的心情——作为母亲，她最担心的还是女儿婚事的问题，毕竟涉毒这种事，不是哪个家庭都能接受的。

如果我帮张嫂把刘丽吸毒的事瞒下来，一来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告知家属”的相关规定，二来对小陈有些不负责任；可若把刘丽涉案的实情告诉老陈一家，这对年轻夫妻会不会就此一拍而散？之后张嫂一家又该怎么办？

思考再三，我觉得这事儿还是需要向领导汇报一下。

4

我让这两家人稍等片刻，匆匆跑去办公室，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带班教导员。

教导员也很为难。起先，他先是劝我尽量不要掺和这事，让他们自己私下去交流，别把矛盾引到派出所头上；但后来听说小陈已和刘丽领了结婚证，便叹了口气，让我还是跟老陈一家实话实说。“吸毒这事儿不是开玩笑的，瞒过去可能害了男方一家子，到时出点什么事情，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小陈和刘丽是两口子，他有权知道妻子的案情。另外，刘丽戒毒也需要家人支持帮助，小陈作为她的丈夫，也是戒毒的第一监护人，得让他心里有数。”

但顿了顿，教导员可能又想到了什么，接着对我说，如果当着两家人的面不方便讲，就先想办法把张嫂一家打发走，之后单独告知小陈就行。

从教导员办公室出来，我刚路过卫生间，老刘就匆匆赶了过来，迎面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再三求我帮帮忙，别跟老陈一家说女儿吸毒的事。

我叹了口气，干脆把话挑明了，说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上。

“你们当警察的，是不是应该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老刘的话里似乎带有威胁的意思。

我说，你讲的没错，刘丽和其他吸毒人员发生关系“散毒”的事情我们不会讲，但她吸毒被抓必须告诉小陈，“作为配偶，小陈也有知情权，这个你知道吗？”

老刘不说话了。我原本还想说，既然已是一家人了，隐瞒不是办法，事到如今只能两家共同面对，看之后如何帮刘丽戒毒。但我的话还没

说出口，老刘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低声说：“求你了李警官，女儿不学好犯了错，我们之后自己会教育，但这次千万别跟老陈一家说吸毒的事，不然这婚事肯定要黄……”

我急忙伸手想拉他，但老刘却怎么都不起来，非说我要是不答应他，他就跪死在派出所里，反正“如果婚事黄了，我们老两口也不想活了”。

我有点生气，说老刘你这么大个人了，做事不能只考虑自己。我还想问他，有没有站在小陈一家的角度上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想了想，还是忍住了。

那天，老刘在卫生间地板上足足跪了20分钟，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后来我实在没辙，打电话喊来同事帮忙，自己才脱了身。

回到值班大厅，我决定狠狠心，先把张嫂夫妇打发走再说。可没想到，率先开口的竟是张嫂。她一看见我回来，就一脸“开心”地告诉我，“受害者”刚刚打电话给她，说同意接受3万块钱的赔偿，不再追究刘丽一伙“打人”的事。

老陈看见我和老刘前后脚回到值班室，脸色有些狐疑，但还是对我说，这笔赔偿金由他来出，问我怎么交付给“受害人”，以及何时能把刘丽“放出来”。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这是张嫂的套路——看来她在找我的同时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不仅要把女儿吸毒的事情彻底隐瞒下来，而且要把我也绑在他们两口子这根绳子上——估计我和老刘在卫生间里的那段时间，她已经做戏骗过老陈一家了。

我心里泛起一阵厌恶，可当着众人的面不好直接拆穿他们，只好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这样，今天你们先回去，留个联系方式给我。这事儿我得再向领导汇报一下，到时给你们消息。”

听我这么说，张嫂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急忙把自己的手机号报给我，我记下来之后扭头问小陈要联系方式。

张嫂一下又警觉了起来，赶紧说自己女儿惹下的事自己家处理就行，不用麻烦亲家。但我还是坚持要了小陈的手机号，说，小陈是刘丽的“合法丈夫”，按照法律关系，他比父母还近一层，赔款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有小陈签名。

张嫂半信半疑，还想继续坚持，我没再理她，打发众人离开了派出所。

5

闹了一整天，值班室终于清净了。我先把老刘硬塞给我的两条“黄鹤楼（软珍品）”登记上缴，看到同事正在补录刘丽等人聚众吸毒案的后续材料，又把刘丽的笔录要过来细看。

23岁、模特、聚众吸毒、轮流发生关系……每一个字眼都那么惊心。我问同事，像刘丽这种情况的，结婚后戒毒的可能性有多少？

“这跟结不结婚有啥关系，你给她做材料的时候看不出来吗？问她啥都不说，毒源也一直隐瞒，她这样的能戒毒？怕是别害了她老公一家就好……”

同事还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去年我市一名男子为凑毒资，把岳父家的房本偷出来抵押给贷款公司，结果男子吸毒过量死在了外面，贷款公司拿着到期的抵押合同去男子岳父家收房，两方的官司打了一年多还没有结果；另一个是邻市之前办理过的案子，妻子哺乳期吸毒，孩子脑部落下了终身残疾。医院诊断结果出来后，丈夫一怒之下持斧头将妻子及岳父岳母都砍成了重伤，自己也进了监狱。

“平常老百姓家里，可千万沾不得吸毒人员。家里有一个涉毒的，这个家就算是完了。那个老刘也是，这关口不先想办法帮女儿戒毒，跟派出所较个么斯劲……”

听同事讲完，我决定早点把实情告诉小陈。

第二天一早，还没等我给小陈打电话，小陈父子却主动找来了派出所。老陈一见面就问我：“儿媳妇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试探着问他知道些什么，老陈也不瞒我，说自己在本地做生意多年，有不少社会关系。之前他就听过一些关于刘丽的传言，但心里一直没做真，加上儿子喜欢刘丽，所以也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这次，反倒是张嫂和老刘的表现让老陈很生疑。自己本是一番好意来帮忙，但怎么都觉得像是戳到了亲家的什么秘密。老陈说，昨天两家人离开派出所后，他就提出去看望一下被刘丽“打伤”的“受害者”，双方能和解的话尽量立刻和解，不要过夜。“拘留所不是什么好地方，快过年了，别委屈孩子。”但张嫂和老刘却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先是说那人在住院，等老陈的车开进了医院，张嫂突然又说自己记错了，“受害者”伤得不重，已经回家了。

老陈又让司机开车去“受害者”家里，想登门致歉，但走到一半，张嫂又说，人这会儿不在家，有啥事儿她和老刘处理就行。老陈跟张嫂要“受害者”的联系方式，说要跟对方讲几句道歉的话。张嫂扭捏了半天才给了他一个号码。老陈拨了很多回，始终无人接听。

于是，老陈和亲家一分开，便找到自己在拘留所工作的朋友询问。朋友也没跟他明说案由，却一直劝他再考虑一下小陈与刘丽的婚事，“这次不是打架这么简单”。

老陈有点慌了，爷俩在家商量了一晚上，决定今天还是来我们派出所问个究竟。

“小陈和刘丽是合法夫妻，他有权利知道自己老婆到底因为什么被警察抓了，对不对，警官？”老陈问我，我点点头，他又继续说，“你们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应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有规定，已婚的先通知配偶，然后才是其他亲属，父母都要排在配偶后面，我说得对不对？”

看来老陈来之前已经做了功课，我只好再次点头，然后把刘丽涉毒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陈父子。

6

尽管老陈父子应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听我说完后，两人依旧被惊得目瞪口呆。

“离婚、离婚、离婚！”回过神后，老陈一连重复了三遍“离婚”。我劝他不要激动，再考虑一下。他却冲我吼了一句：“这还考虑个么×？我们家欠她的？辛苦大半辈子，要给个‘毒么子’陪葬吗？”

小陈在一旁小声问我，刘丽这次是不是初犯，会不会是受了坏人的蛊惑。我把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系统上记录的相关信息给他看，看到刘丽在上海也有过多次涉毒记录时，小陈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但可能还是有些不舍，小陈又问我，像刘丽这种情况，多长时间能戒毒，自己能不能帮她戒？

小陈这话还没说完，老陈就敲着桌子吼：“吸食冰毒，你懂什么意思不？！一日吸毒终生戒毒，皮囊再好有个屁用！金山银山不够她吸的，你还帮她戒？小心哪天把你也拉下水！”

小陈不敢再说话了，老陈点了一支烟，自顾自地抽了起来。

沉默了很久，我问老陈父子，当初小陈跟刘丽交往时，没发现有关她吸毒的任何迹象吗？

老陈这才对我说，小陈和刘丽是中学同学。中学毕业后，小陈出国读书，一去便是七八年，眼下已拿到澳洲绿卡。去年年初，小陈过年回家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时偶遇刘丽，之后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不久便谈起了恋爱。

老陈一家原本对刘丽比较满意，一是她长相漂亮，在上海工作也算见过世面；二是两个孩子是中学同学，家又都在本地，省去了之后很多

麻烦。老陈唯一担心的是，儿子长期在国外，与刘丽的相处时间并不长，但小陈却说，自从谈恋爱后，两人几乎天天在网上聊天，刘丽也说愿意婚后跟小陈一同去国外发展。老陈这才放下心来。

结婚前，陈家给了刘家30多万彩礼，又在本市和武汉各买了一套房，打算今年年前先给两人在国内办一场中式婚礼，年后再去澳洲办一场西式的。“真是没想到啊，我和刘丽离得远，大多数时候只能通个视频。确实有几次看到她在屏幕那边嘬着根管子吞云吐雾，问她是啥，她说是水果烟。我哪能想到她是在吸毒呢……”回忆起之前视频时的场景，小陈也有些唏嘘。

“啥都别扯了，回去赶紧办离婚吧。”老陈气呼呼地摁灭烟头，站起身来，拉上儿子就往外走。临走前，他又回头叫我到车上“聊几句”。我猜出他的意思，说有话就在值班大厅里说，其他事情就没有必要了。

老陈再三感谢后离开了。

7

再一次见到老陈，已是第二年中旬。我问起之前小陈与刘丽的事，老陈说那天他一离开派出所就去找张嫂一家摊了牌，希望刘丽拘留期满后马上跟小陈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张嫂夫妇给老陈说了很多好话，也替女儿做了很多承诺，但无奈老陈一家主意已定。

刘丽释放后不久便和小陈去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前订好的酒店和仪式全部取消，陈家也索回了彩礼和房子，小陈回了澳大利亚，断绝了与刘丽之间的一切联系。

老陈再次向我表示感谢，说是我帮他们家及时止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便问老陈离婚时张嫂一家有没有什么“过激反应”？老陈说还好，张嫂开始提出要点“离婚补偿”，但老陈不同意，张嫂一家也就没再提这事儿。

老陈又问我，是不是张嫂一家找我麻烦了？我笑着点点头，“煮熟的鸭子飞了，她能不找我麻烦么？”

自从婚事告吹，张嫂就把全部的邪火都发在了我身上——去上级公安机关先后投诉了我三次，我也为此写了三份“情况说明”。

第一次，张嫂告我“泄露公民个人隐私”。我向上级说明，小陈当时系刘丽的合法丈夫，警察向其告知妻子涉毒涉案情况并不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上级支持了我的观点，并对张嫂当时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批评。

张嫂第二次告我的罪名是“索贿”，并拿出自己在所工作的超市购买“黄鹤楼（软珍品）”香烟的票据，说是我违规向她索要礼品。派出所为我出具了上缴香烟的凭证。上级没有追究，但告诫我以后“不要

去没有监控的地方谈案子上的事，礼物礼金要当场退掉，免得给自己惹一身腥”。

第三次，张嫂告我“受贿”，说我肯定是收取了老陈一家的礼金，才向其透露刘丽案情的经过。上级对我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张嫂拿不出切实证据，我也的确没有收过老陈一家的任何礼物，甚至连饭都没吃过一顿，上级最终也没有支持张嫂的指控。

我再去超市时，有时还会见到张嫂，但她再也没了以前的慈眉善目，每次见到我都恨不能把我一口吞下去。我也就不太去了。

2014年8月，有人跟我说，坊间流传了一些有关我工作过程中“吃、喝、卡、拿”的流言。我私下里调查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些留言大多还是来自张嫂。与上级沟通之后，我决定找张嫂谈一谈。

张嫂拒绝来派出所或警务室见我。无奈之下，9月份的一个傍晚，我和同事敲开了张嫂家的房门。

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旧公房，张嫂开门后见到是我，直接去了卧室，“哐”的一声关上房门后就不肯再出来。老刘没好意思直接赶我们走，自己点了一支烟，人坐在我跟前，眼睛却始终盯着打开的电视机屏幕。

坐了一会儿，同事打破了沉默，指出一些已经被我们坐实的张嫂在外散播的谣言，建议老刘劝一下张嫂，如果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去上级公安机关投诉或举报，不要采取散布谣言的方式，否则公安机关有权追究她的相关责任。

老刘不置可否，我却隐约听见张嫂在卧室里隔着房门用方言叫骂。我没有作声，同事冲着房门说“张嫂有话你出来说”，但她始终没有出门。

告知义务已经尽到，我和同事便起身要走。老刘送我们到楼下。下楼时他开了口，先是向我道歉，又让我别把那些事放在心上，自己回去一定给妻子做工作，让她不再胡说八道。

我问他刘丽戒毒的情况怎么样了，老刘叹了口气，说离婚这事儿对女儿打击很大，在家闹了很久。眼下又回了上海，他也很担心女儿在那边会不会再碰毒品。

言语之中，老刘依旧透露出些许对我的埋怨，他说也许结了婚去了国外，女儿就不会再吸毒了。我很想说，万一戒不了呢？岂不是要拉着无辜的小陈一家当垫背的了？

但想了想，事到如今，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于是摆了摆手，向老刘告了别。

后记

直到现在，张嫂每次见到我时，依旧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2016年6月，刘丽因吸毒再次被上海警方抓获，随即被裁定为吸食毒品严重成瘾，送当地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为期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

“老百姓家庭千万沾不得吸毒人员，家里有一个涉毒的，这个家就算是完蛋了。”这话从我入警初始，就常常回响在耳边。

可就在一次处理涉毒人员的相关案件中，我自己差点都被卷了进去。

真希望他下辈子能讨到老婆

1

我们之所以都认识郑勇，一是他的体形特征十分明显，身高一米六，很瘦，头上有很大一块头皮没长头发，走路时右腿还有些瘸；二是他早就是派出所的常客了，全所90%的民警都或多或少跟他打过交道。

郑勇时年42岁，无业，以开麻木（电动三轮车）为生。在警综平台上的“涉警记录”长达三页半，且绝大多数事由都令人难以启齿。

那天，郑勇坐在我面前的讯问椅上，我问他为什么盗窃成人用品店，他抬头看看我，说是同伙带他去的，想搞点钱。那天晚上，还有一名吸毒人员和他同去，没多久就在销赃时被抓获了。

我问他赃物怎么分的，他说自己分得了两个充气娃娃，其余都被同伙拿去卖了。我又问他，为什么选择成人用品店实施盗窃？郑勇说，一是那家店是“自助”的，夜里无人看管。他并不知道店里有监控，以为不会被人看到；二是他对里面卖的东西“很感兴趣”，用他的话说，“反正偷来的东西换成钱也要去找小姐的，店里有现成的小姐”。

因为行动及时，这起盗窃案的赃物被全部追回。店主很感激，说绝大多数追回的赃物都可以继续售卖，唯有郑勇分得的那两个充气娃娃被他用过了，希望警方能够帮忙找郑勇索要赔偿。

很快，郑勇及同伙因涉嫌盗窃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充气娃娃也给赔了。

郑勇的刑期在看守所就执行完了。等出狱后，我跟同事开玩笑说，郑勇看起来也是个实诚人，怎么看那次都像是“憋坏了”，才打起了成人用品店的主意。同事想了想，说这家伙应该是有些心理疾病，该带去医院查查的，或许能治。

当然，警察不可能带他去“治病”，我决定去跟郑勇的老母亲聊聊。

往后几个月里，我前后去过他家多次。40多平方米的小住宅，没有任何装修，一个黄色的、蒙着一半污垢的白炽灯吊在天花板上，墙上贴满了旧报纸。收拾得还算整齐，但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前些年，母子二人原本住在郑勇父亲生前留下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但因房间面积太小又临街，郑勇母亲就将其租了出去，在不远处租下了这间房，两边租金差不多相抵，居住条件才算是稍微改善了一些。

郑勇的老母亲70多岁了，患有严重的哮喘。一口方言本就难懂，加上拉风箱一样的喘息声，基本无法交流。我和她说了几次，老人家一直没听懂是什么意思。我实在忍不住，试着婉转地劝劝郑勇，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却怒气冲冲地说："男人都想女人，怎么到我这儿就成了病？！"此后我也只好作罢。

当时，那起盗窃案中的两个充气娃娃是被作为赃物没收的，几个月后，又重新发还给了成人用品店的店主。店主嫌它们被用过，"看着恶心"，从派出所领出后就当垃圾扔了。之后不久，我却在郑勇家见到了两个充气娃娃，问郑勇哪儿来的，他就说是捡的。

2

打从第一次和郑勇打交道，我就记忆深刻。

那时我上班不久，接到举报称一小区居民楼里有人卖淫嫖娼。等我们赶到现场，将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的郑勇拎起来时，他竟然抱怨道："你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同事训了郑勇几句，把他塞进警车里，临走前他的眼睛还一直盯着那名和他一同被抓的失足妇女。

在派出所叙述违法经过时，郑勇非常配合，讲得十分详细，实在让我们怎么听都不太对劲。越到后来，他竟在描述自己和对方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带着些许"回味"的神情。经验丰富的同事不得不几次厉声打断他，他却仍然无动于衷。

我实在没想到，世上还会有这样的人。但同事却"安慰"我说，习惯就好，他就是这副德行，"以后你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的"。果不其然，之后我参与的每次扫黄行动，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无论是街头隐蔽处的"爹爹乐"，还是深夜洗脚房的"大保健"，辖区里还有些失足妇女甚至记得郑勇，"那个瘸子啊，前天才来过……"开始我还教训他几句，后来次数多了，我也懒得说他了，抓住了就直接拖回来做材料。

与其他在色情场所被抓的人不同，郑勇总是强烈要求"拘留"。开始我还有些纳闷，后来才明白，被抓的次数多了，他也知道《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对于嫖娼的处置可以在拘留和罚款中二选一。不管怎样，他都是坚决不交罚款的，"我可没有钱"。

我斥责郑勇，问他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频繁出入色情场所，郑勇就回答说，别人都有老婆，他没有，不去这些场所还能去哪儿?

我说你娶个老婆不就行了?郑勇没好气地回我，"你说得简单，派出所发我一个?"

我气得不知说啥好，同事在一旁劝，让他别说了。郑勇不服气，还继续小声絮叨：“警察都还有警嫂……”结果同事也气得拍了桌子。

郑勇早年的经历的确颇为坎坷。1996年，郑勇在下班路上被一辆皮卡车撞倒，当场昏迷。后来虽经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一大块颅骨被置换为钛合金材料，往后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异常，腿脚也不利索了。

郑勇是家中独子，父亲早逝，母亲是市郊农民，年轻时在市里摆摊，后来上了年纪身体不好，只能在家靠糊纸盒赚钱。郑勇出事前是家里的顶梁柱，事后虽拿到了30多万的赔偿，但身体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工厂也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只能靠开麻木为生。

郑勇平时看上去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但只要交流几句便会发现异常。大多数时候，他都十分易怒，说不上两句就会跟人龇牙瞪眼。知道他情况的人从不敢坐他的麻木，不知情的乘客上了车，也常常因他无缘由地口出恶言而发生冲突。

警综平台上有关郑勇的警情，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与人发生冲突导致的。郑勇本身很矮，又瘦，主动挑起冲突后却又基本沾不到光，几乎每次都是受害方。久而久之，他的电麻木生意也不好了，经常站一整天都揽不到一个活。

揽不到活就没钱吃饭。早先有一次，我们巡逻时看到郑勇在街上的馒头铺里买了3个馒头，就着白开水硬啃。同事就顺手买了一袋榨菜递给郑勇，没想到郑勇却无端发了脾气，当街吵闹起来，怪同事看不起他。我们赶忙驱车躲开，此后也不再主动招惹他。

我问过郑勇，之前为何不趁年轻用那笔车祸赔偿款治病或者娶个媳妇？郑勇说能去的医院以前都去过了，医生说他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状况了，再想恢复，那个花销恐怕不是这点钱能搞定的。至于娶媳

妇，“做梦都在想啊”。郑勇义正词严地说，有了老婆自己绝对不会再去嫖娼，但找不到又能怎么办呢？

我说你手里也不是没钱，怎么会找不到？别把眼光放得太高嘛，找个能跟你过日子的就行。

郑勇就又不搭话了。

3

2013年初，全局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不断深入，上级要求将街面上所有提供色情服务乃至“打擦边球”的场所全部关停，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彻底消灭提供色情服务的土壤。所领导直接告诉我，盯住郑勇，他出没的地方必然存在这类非法交易。

按照以往经验，“爹爹乐”是郑勇的最爱，因为价格便宜，一次色情交易只需30至50块。

那段时间，郑勇被我抓了6次，全是30元最低标准的“爹爹乐”。交易场所有时是在居民小区阴暗处，有时是在公共厕所隔间里，还有一次竟然是在停车场的一辆五菱面包车的后厢里。郑勇被抓后也不狡辩，一五一十陈述自己的违法过程，然后老老实实跟我去拘留所。

我确实拿他没了办法。有次同事和我开玩笑，说郑勇这才是真正的“无欲则刚”，大多数嫖客，有正式工作的怕丢工作，有家有业的怕老婆离婚，有头有脸的怕丢人现眼，郑勇这家伙啥也没有，也就啥都不怕，“让他改邪归正，且难着呢……”

我说郑勇也快“玩”到头了，这次专项行动是全省范围内的，隔壁县市也在搞。过不了多久，那个“行当”就消失了，我看到时候郑勇怎么办。

同事却意味深长地苦笑一声，说留个心眼吧，真到了那时候，弄不好郑勇还会搞出什么别的幺蛾子。

2013年5月，市里扫黄打非专项行动成果显著，一大批色情场所纷纷关停。也就在那个月，郑勇突然“消失”了——他的电麻木一直停在出租房楼下，人却不见踪影。我找郑勇母亲询问他的去向，老人含含糊糊地跟我说，郑勇找他“女朋友”去了。

郑勇有女朋友了，我把这事儿讲给同事，同事们都说这下好了，他终于该“改邪归正”了。但也有同事笑笑说，他八成是去找哪个相熟的失足女了，“凭这家伙的名声，能找到女朋友就闹鬼了”。

同事虽言语戏谑，但也不无道理。郑勇在本地有个响当当的绰号，“色魔”，全是因为他频繁出入色情场所得来的。本来城市就小，街面上的流言传得很快。这些年郑勇电麻木生意差，多少也与他的绰号有关，极少有女乘客敢坐他的车。甚至平时走在街上，认识他的女性都会刻意避开。

很快，2013年8月，辖区技校保卫处来派出所报警，称学校女生多次举报，晾晒在阳台的内衣被盗。我们调看了视频监控，发现又是郑勇所为。

被盗女生内衣虽然价值不高，但郑勇的行为已涉嫌入室盗窃。他很快就又被抓了回来。我问郑勇偷内衣做什么，郑勇说没做什么，就在家里放着。同事去了他家，搜出的衣物上全是斑斑点点，回来就骂郑勇是“变态”。

郑勇交代完案情，同事去法制科报裁。等待期间，我问郑勇这几个月跑哪儿去了？他说自己去找“对象”了。我问他“对象”姓甚名谁，哪里人，两人“处”到什么地步了？郑勇却神情沮丧，“女人没一个好东西……”原来，真像之前同事说的那样，他跟一个曾经有过几次交易的30多岁的失足女去了外地。两人共同生活了3个月，到最后都没搞清楚失足女的真名叫什么。

走之前，郑勇随身带了2万块钱，失足女便对他很好，平日里张口闭口喊他“老公”，还给他做饭吃。郑勇满足极了，给她买各种东西讨她开心。后来钱花光了，郑勇便被赶了出来。“我以为她能给我当媳妇呢，我真蛮喜欢她的，没想到还是个势利眼，臭婊子……”

4

那次郑勇又因入室盗窃被法院判了半年，出狱已是2014年春节过后了。

来派出所重建《重点人口档案》时，我问郑勇今后有何打算。郑勇面无表情，“还能咋办，以前咋办现在就咋办呗”。我问他那笔赔偿金还剩下多少，他面色有些凝重，说去掉那2万之后，现在不到20万了。

我劝他还是安安稳稳过日子，再搞些有的没的，钱花光了以后生计都成问题。郑勇却说他就不信这个邪，自己想整个女人就那么难。

“那你就正儿八经娶个媳妇！再跟我这儿胡闹，老子不打死你！”我真被郑勇激怒了，骂了他一句。郑勇可能有些害怕，没敢正眼看我，只是小声嘀咕了一句，“都被你们扫完了，我还能去哪儿弄……”

其实也不是没有女人关注郑勇，毕竟他手里有一笔钱，辖区的确有几个女人一直盯着他。但对郑勇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

张曼就是其中一个，1975年出生，当时还不到40岁，长相姣好，同样无业，却是一名吸毒成瘾人员。

张曼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色魔”郑勇手里有一笔钱，且非常喜欢搞女人，便主动投怀送抱，很快就和郑勇打得火热。张曼因吸毒是警方的常控人员，郑勇刚出狱是警方的重点人口，两人的交往自然逃不开警方视线。2014年6月份，张曼就在郑勇家中被我们抓住。

同事把张曼从床下拽出来时，郑勇竟然上前阻止。我赶忙把他扯到一旁，让他想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回到派出所，张曼交代自己每次接到郑勇电话就去他家，两人发生关系，郑勇一次给她100元钱报酬；轮到郑勇时，他则说自己和张曼

在“谈朋友”，那些钱是给张曼的生活费。

公安局认定两人是卖淫嫖娼关系后，郑勇当即提出抗议，说他真的是在跟张曼谈恋爱。我说：“张曼都承认她来你这儿就是为了拿到100块钱。你见过平时不联系，只在发生关系时付钱的男女朋友吗？”

郑勇依旧不满，嚷嚷着说他真把张曼当成女朋友，不然平时自己都去30元的“爹爹乐”，怎么会给张曼那么多钱？况且张曼每次来都喊自己“老公”，说自己是她的“唯一”。

我说“道友”的话你也信？别傻了，她靠做这行攒毒资，从你这儿拿钱走了再去别人那儿赚钱，也喊别人“老公”，也说别人是她的“唯一”。

郑勇还是不信，我就拿来张曼的笔录给他看，他看完之后，又开始叫骂起来。

5

郑勇已是辖区所有管理者的一块心病。

每个季度跟街道办工作人员开治安联席会议，都避不开郑勇的问题。街道办向我反映，郑勇周边邻居对他意见很大，尤其是女性邻居，生怕郑勇对她们做出什么事，晚上都不敢出门，希望居委会和派出所能想办法解决。

我问居委会那边打算怎么解决？居委会干事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协调郑勇母子的房东在房租到期后收回房子，不让郑勇母子继续居住。“他们母子不是在别处有房子嘛，让他们回自己家住去。”

我想起郑勇那间十几平的小房子，实在不适宜母子居住。有意帮他说句话，便说：“郑勇的户籍地在我这儿，换地儿也换不出我的管区，到时候那边的居委会也还得找我麻烦。要不咱还是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吧，就当是帮我个忙。”

居委会干事虽不情愿，但也不好直接拒绝我，转而问我有啥办法。我说眼下没啥好办法，郑勇犯了事警察可以抓他去坐牢，但刑期满了就必须放他出来。“他干的那些事也不够在监狱里蹲一辈子的，到点儿还是得回归社会。不过，你们如果发现郑勇再有什么不法行为可以主动举报，算是我们一起管控他。”

听我这么说，居委会干事连忙给我说了很多有关郑勇的“情况”——比如，有居民反映，郑勇经常在没有灯的楼道里蹲着，盯着上下楼的人看，吓得女业主不敢独自回家；还有人反映，郑勇经常趁人不备钻进小广场边公共厕所的女隔间里，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吓得人不敢如厕；还有女性邻居反映，夜里下班回家路上总会看到郑勇，一边冲她笑一边用手在裤裆里鼓捣……

实际上，这些情况我们以前都有所耳闻，甚至有一次，我亲自撞见郑勇往女厕所里跑。那次我把他从女厕所隔间里拎出来，问他没长眼睛还是不识字，郑勇只说自己内急看错了。

这些行为的确已经很出格了，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大事，但上述行为依然也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没有构成违法犯罪，派出所也没法立即对他采取措施。我也只能跟居委会干事说，告诉辖区居民，以后再遇到郑勇有类似行径，赶紧打电话给我，我去收拾他。

居委会干事也只好点头说好。

会议最后，我试着问参会的工作人员，方不方便帮郑勇讨个老婆，“郑勇一直说想讨个老婆，也许有了老婆他就好了”。

大伙先是一愣，然后纷纷哂笑着摆手表示无能为力。一位熟悉郑勇的街道办工作人员还跟我讲了有关他讨老婆的往事。

其实，1996年出事前，郑勇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出事后，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郑勇对那个女孩的感情很复杂，精神正常时，说当年是自己提出的分手，因为车祸成了废人，不能耽误人家；但精神异常时，他又吼叫着说那个女的“不是人”，他是因为救她才遭遇车祸，结果出事之后却被她抛弃。

往事无以深究，我只能开玩笑说，郑勇出事之后肇事方不是赔了他一笔钱吗？那个年代，30多万按说也是笔不小的数额，就没有谁因为那笔钱愿意跟郑勇过日子？

“郑勇刚出事的时候，那30来万还真算笔钱，他也还年轻，要么花钱治病，要么趁早娶个媳妇。但那时候他既不忍心治病把钱全花了，也没下定决心娶媳妇。现在可好，这笔钱在手里一个劲儿贬值，那时候还能买套不小的房子，现在能干啥？”街道办干事有些无奈。

干事接着说，早些年郑勇母亲也找过街道办下属的婚介所，想给儿子说个媳妇，但相亲的人一看郑勇情况便摇头。郑勇本身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常年不佳，需要长期服药却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母子俩都没有固定住房，手头那笔钱够用到什么时候？本地一般女性根本看不上郑勇，偶尔有外地条件有限的女性愿意同郑勇交往，郑勇又怀疑对方的企图。

但这确实也怪不得郑勇。2003年，郑勇经婚介所介绍交往过一个陕西籍的刘姓妇女。刘姓妇女离异后在本地打工，带着一个孩子。了解情况后说自己愿意跟郑勇过日子，郑勇也接受了那个孩子。之后母子俩在郑勇家住了一年半，但两人却始终没有结婚。

后来郑勇说，那个女的是个骗子，压根不想跟他结婚，因为他提了多次去领结婚证，女人都不肯，反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花了郑勇8万多块，大部分用来给那个小孩治病。后来郑勇把刘姓妇女母子都赶出了家门，又来婚介所闹了一场。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敢给他介绍对象了。

“唉，他抱着剩下的那笔赔偿款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说句实在的，现在能跟他结婚过日子的，哪个是看上他的人，还不都是看上他手里那点钱？心肠好的想着那笔钱作为保障，跟他凑合过日子，心肠坏的想着花完他那笔钱再去找下家。别看郑勇伤了脑袋，但这事儿门儿清，他能同意？”

干事又叹了口气，说这眼下郑勇再想娶媳妇有些不太现实，不如拿这笔钱作为保障，走一步看一步。“女人，估计这辈子和郑勇无缘了……”干事最后说。

我叹了口气，为郑勇唏嘘，但也确实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6

千防万防，郑勇剩下的20万赔偿金最终也没能留住。

2014年10月份的一天，郑勇母亲颤颤巍巍地来到派出所说要求助，值班民警赶忙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了半天，值班民警才明白，郑勇被人“下了套”——说是自己遇到个“发财”机会，把家里的钱全拿走了，现在人也不见了。

警情转到我这里，我赶紧打电话联系郑勇。电话接通了，我问他在哪儿，他磨叽了半天，才跟我说自己在辖区一家酒店的客房里。我问他去那里做什么，他说见网友。我接着问他见网友带那么多钱做什么，他又支支吾吾不肯说。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叫上一位同事赶去了郑勇说的那家酒店。进入客房时，郑勇在打电话。站了一会儿，我隐约听到电话那端一个操广东口音的男子在跟郑勇讲“转账”的事情。自觉情况不妙，强行夺过郑勇的手机，想跟对方通话，对方却挂断了电话。

郑勇被我夺了手机，气得大吼大叫，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抡起客房的板凳就要跟我动手。我和同事把他控制在地板上，过了很久郑勇才平静下来。

没多久，郑勇的手机又响了，我接起来“喂”了一声，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就又把电话挂了。郑勇挣扎着上来抢电话，又被同事一把按住。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打电话的人是谁，郑勇就气呼呼地朝我吼，说自己要发财了，也要有女人了，不要阻止他“过上好日子”。

看郑勇情绪激动，同事一边按着他一边劝他说，我们怀疑他遇到了电信诈骗，好好告诉我们到底自己遇到了什么“好事”，如果真是被我们“搅黄了”，之后我们负责赔给他。

郑勇这才稍微平静一些，跟我们说，自己被一个“富商老婆”看上了，他已经给对方买了机票，两人马上就要见面了。“富商老婆”让他开好房，之后两人“共度春宵”。

这话一出，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再问下去，郑勇口中的“富商老婆”自称“王莉”，时年31岁，嫁给一名港商，后来丈夫因车祸失去生育能力，现百亿资产无人继承。她找“郑勇”是为了发生关系后怀孕，事成之后不用郑勇养小孩，还付给郑勇300万“答谢款”。

电话是通过一个陌生号码直接打给郑勇的，郑勇想都没想便信了。又按照电话里告知的联系方式联系了“王莉”，说对方的声音很好听，“骨头都发酥”。“王莉”嗲嗲地告诉郑勇，只要给她打钱买张机票，她马上飞到郑勇这里。

郑勇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给“王莉”转去了3000块的“机票钱”，之后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套路，先是“公证员”打电话来索要“公证费”，后是“律师”打电话来索要“保证金”，“重金求子”的电信诈骗就这样被郑勇照单全收了。

在被我们强行带回派出所的路上，郑勇一直在不断地挣扎叫骂。同事开车，我在后排按着他，一路都不消停。同事自嘲说，以前都是抓捕嫌疑人，这还是头一次“抓捕”受害人。

那次郑勇是真的很生气，在派出所也没停下叫骂。当然，他气的不是自己被“重金求子”骗去了巨款，而是我和同事搅黄了他的“好事”。

郑勇说，那个“王莉”跟他说过，“富商”失去生育能力之后，自己也很“寂寞”，如果郑勇“有诚意”，她以后可以与郑勇保持“稳定的两性关系”。郑勇当然愿意了，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还特意给“王莉”打去了8000块钱。

再往后，随着案情不断展开，我才知道，其实在我和同事找到郑勇之前，他已经通过银行向对方转去了6万多块。听到这个数字，郑勇母亲在派出所大厅哭了起来。

郑勇自始至终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和同事给他解释了很久，他依旧不信。那起案子我们也立案侦查了，但难度很大。郑勇极不配合，每次叫他来派出所了解情况，他一见面就让我和同事先赔他300万损失。

这种想法也直接导致了郑勇第二次被骗。

与第一次被骗经过如出一辙。2015年4月，郑勇第二次遭遇“重金求子”。这次郑勇带着所有的钱跑去了邻县，他的老母亲没能及时发现端倪。等到郑勇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那个“嫁给失去生育能力的港商、29岁美少妇陈静”时，他手里的那笔车祸补偿款已经被骗得一干二净了。

“13.5872万”，这个数字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和同事们都恨得咬牙切齿——万恶的骗子，连最后72块钱零头都没给郑勇留下。

更可恶的是，骗子似乎知道警方已经有了“阻骗平台”，即便后来郑勇已经无钱可汇，他们还是编出一幕接一幕的故事继续拖延剧情。等到郑勇意识到自己被骗报警时，他最后一笔汇款时间已过去了4天半，警方的“阻骗平台”也失去了效用。

郑勇在派出所哭天抢地，说那些钱是自己的“老婆本”“续命钱”，后半辈子全指望那些钱活着，他要杀了那帮骗他的人。我和同事劝不住他，只能站在一旁先由他发泄。过了很长时间，教导员听到嘶吼声过来查看，看到是郑勇，就叹了口气，轻轻说句“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便走了。

这一次，郑勇是真的一无所有了。

他又回到街上，把电麻木停在十字路口边“趴活”。他的脾气和生意依旧很差，人们还是不愿坐他的车，我也仍然时常看到他就着白开水啃馒头。

那段时间，郑勇不时来派出所找我，询问“重金求子”案的侦办情况。他每次来都要与我争吵一番，嫌警方动作慢，一直没有给他追回被骗的钱。开始我还跟他解释一番，后来发现解释不通，便不再理他，等他说累了自己离开。

“重金求子”的案子我们确实一直在查，但郑勇的那笔钱已经被汇去了马来西亚。能否追回、何时追回，谁也说不清楚。

尾声

2017年底，郑勇死了。死因不明，听说是得了什么突发疾病。

那时我已经离开派出所，同事告诉我消息后，我忙问郑勇死后他母亲怎么办？同事说街道办协调送她去了养老院。养老院给郑勇母亲做了优惠，优惠后的价格靠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临街房租金基本可以负担。

对郑勇母亲来说，这也算是个相对可以接受的结局。

我心下感慨，郑勇也确实可怜，想了半辈子女人，为女人受了重伤（据他说），因女人蹲了监狱，被女人骗光钱财，结果临了还是一个人走的。

同事也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命，还能怎么办呢？

不过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个传闻，他说郑勇死之前只有一句遗言，要个纸扎的女人和自己一同下葬。他说在这边没讨到老婆，到那边不能再没老婆。我问他从哪儿听来的，同事说传闻嘛，谁知道哪儿来的。

2012年7月，辖区内一家自助成人用品店被盗，嫌疑人用铁锤砸碎了自助售卖机玻璃，偷走了价值几千元的成人用品。

同事一边调监控一边说："八成是'色魔'郑勇干的。"

不一会儿，监控被调出，果不其然，其中一名嫌疑人正是郑勇，这位鼎鼎有名的"色魔"随即被缉拿归案。

走不出惩戒期的少年犯

前言

2010年6月的一天，晚上10点左右，17岁的高中生袁谷立与同学郑强、杨晓云三人因上网费用耗尽，被网吧老板赶到了大街上。他们决定去附近的小区“搞点钱”，钻进楼道，原本打算偷辆电瓶车卖掉，却发现谁也不会开电动车锁。三人正沮丧时，一名刚下晚班的中年女工走进楼道，少年们临时起意，决定打劫这名女工。袁谷立手持一字改锥，郑强拿着挂在钥匙上的折叠水果刀，杨晓云则从楼道里随手捡起了一根木棍，他们将女工逼到墙角，用从电影里学到的“狠话”抢走了女工的手提包——里面仅有21.6元现金和一部价值300元的手机。三人失望透顶，拿着打劫来的现金去了小区隔壁的消夜摊，一人点了一份炒粉，边吃边商量着去哪儿把手机卖了。女工一回家就报了警，警察循迹而至，仅用半个小时，便将他们按倒在了消夜摊上。当家长们赶到派出所时，三个少年正痛哭着坐在讯问室里等着做嫌疑人笔录。袁谷立的父亲、年过半百的采油工人老袁，走上前来，扬手便狠狠给了儿子一记耳光。家长们都恳求警察看在涉案金额只有21.6元的分上给孩子们“一次机会”，他们回去一定好生教育。但依据《刑法》规定，涉案金额并不是抢劫案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三人涉嫌“持械抢劫”，依律应当从重处罚。最终，在家长们的不断致歉和主动赔偿下，受害女工谅解了三个少年。加上案发时三人年龄皆未满18周岁，还是在校学生，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了从轻处罚：袁谷立、郑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杨晓云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1

2013年7月，袁谷立和郑强缓刑期满，因期间没有再次犯罪，法院最终决定撤销执行为期1年的实刑。按照规定，两人会前来派出所报到，由我给他们建立《重点人口管理档案》——一年前，同案的杨晓云已在建档后远赴深圳打工了。

我先见到了袁谷立。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不太相信，这个和我差不多高，戴着眼镜的腼腆少年，会是个刚刚刑满的抢劫犯。

19岁的袁谷立端端正正地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板一眼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我让他把当年的案情复述一遍，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事无巨细地讲完。

我又按程序问了他一些诸如“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是否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之类的问题。最后，问到他今后的打算时，袁谷立说自己还想上学。

袁谷立犯案前就读于市三中，3年前一落案，就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他说，本来自己学习成绩还可以，这几年也没有放下功课，自己一直坚持在家学习。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还想上学，总归是件好事，于是便鼓励他不要自暴自弃，之后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交流。

就在袁谷立下楼拍登记照的间隙，老袁低声问我，他儿子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可能回去继续完成学业？老袁又补充说，袁谷立是家族里这一辈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虽然之前走了弯路，但毕竟年纪尚小，还想谋个前程。

此前我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只能建议老袁先去三中咨询一下。老袁说他早就去问过了，学校说当年的事情太过恶劣，现在也不同意接

收。

“那其他学校呢？”我问老袁。

老袁叹了口气，说能问的都问过了，没有学校愿收。他求我去学校帮袁谷立“说句好话”，也许学校会看在派出所的情面上，对袁谷立网开一面。

我不知道这事儿是否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但看父子俩如此诚恳，也为了之后方便“重点人口”的管理，便答应了下来。

我解释说自己去也只能帮忙咨询，最终结果确实没法保证。即便如此，老袁还是一再向我道谢。

袁谷立登记完好一段日子了，同案的郑强也没来派出所。

郑强有个姑姑在本地，是他唯一的亲戚。我找到她询问郑强的去向，她就像躲瘟神一样，一听到侄子的名字便直晃脑袋，说自己不知道。

一天在辖区网吧做例行检查时，我偶然发现了郑强。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派出所登记，郑强说忘了。我把他拉回派出所教育了一番，问他今后打算干什么，他说“无事可做”。

“和你同案的袁谷立打算上学，你有没有类似想法？”本着上级对未成年案犯要求的“管理与教育并举”的原则，我还是多问了一句。

郑强脸上写满了轻蔑：“上个屁学，犯事之前就不想上了，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还去找那麻烦干啥？学出来有个鸟用？”

我叹了口气，说不想上学也没事，只要好生待着，别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按时回来找我就行。郑强一边应付地点点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要点烟。我瞪了他一眼，把香烟从他嘴里夺了下来。

2

我一心惦记着袁谷立读书的事，半个月之后便去了趟三中。校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却对袁谷立回校读书一事坚决不允。

校领导跟我讲了学校的难处——毕竟“持械抢劫”影响恶劣，案发当年，学校的宿舍管理员、班主任、级部主任和分管校领导都受到了相应处分，他们三人的班主任，直接被调离了教育系统。

现在让袁谷立回来读书，学校既无法向在校学生和家长交代——没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刑满释放人员”做同学；也无法向当年被他们牵连的老师们交代——老师们档案里的处分尚在，涉事学生却回校读书了，实在说不过去；再者说，袁谷立当年被开除了学籍，现在入学也不符合高中生学籍管理的相关程序。

校领导看上去也非常为难，建议我：“要不让他去私立学校问一下？”

等到11月的季度谈话，我没有像惯常那样把袁谷立叫到派出所，而是专门去了他家一趟。一来想看看袁谷立在家的真实状况，二来也反馈一下帮他联系学校的结果。

我到的时候，袁谷立正在餐桌上做题，见我来了，赶忙站起来打招呼。我拿起习题集，是一本文科数学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顺手翻了翻，大概做了一半。袁谷立说自己一直在家里复习，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

我鼓励他继续加油，随后又私下里给老袁转告了之前去三中咨询的情况，建议他去找找那些私立高中，看能不能把儿子塞进去，哪怕多花些钱。

老袁一直抽着烟，听我说完，长叹了一口气，说他已经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他已经在重庆找到了一所私立学校，但因离家太远，还在

犹豫。

我说，袁谷立是本地户口，能在重庆参加高考吗？老袁说，学校说按规定是不行，但只要老袁愿意出10万块的“建校费”，他们有路子，可以帮忙操作。

我劝老袁，这事儿得再想想，现在“高考移民”查得严，没听说过花10万就能搞定的。省内也有不少私立学校和“复读学校”，没必要去那么远。

老袁说行不行的还是试一下吧，帮忙办事的是自己一个朋友，“办不成的话钱能退”。

半个月后，老袁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去重庆了，问我之后的“季度谈话”怎么办。我告诉他可以改成电话访谈。聊了一会儿，老袁一直支支吾吾地不肯挂电话。好半天才怯怯地问我，以后给袁谷立打电话时能不能提前先发个短信。他说自己之所以舍近求远把儿子送去重庆，主要也是考虑那里没有人知道袁谷立犯过事。

我答应了。

之后的几次“重点人口谈话”，袁谷立的精神状态一直都不错。他说自己与同学和老师相处得都挺好，虽然落下了很多功课，但一直在努力跟进。他还说，自己已经有了心仪的大学，以后还要考研究生。

“一定全力以赴！”袁谷立在电话里坚定地对我说。

相比袁谷立，郑强则一直“行踪诡秘”，极少按时来派出所找我。给他打电话，他总说自己忙，我问他忙啥，他就含含糊糊的。

偶然一次机会，我又在辖区的一家饭店遇见了郑强。他不知什么时候把自己身上文得花里胡哨的，正和一帮“社会人”在包厢里吆五喝六。席上还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全是辖区里的不安分分子。

我把郑强叫出来，问他为什么一直躲着我。他推脱说自己是在忙“工作”。我指了指屋里，问那就是你的“工作”？郑强打着哈哈说，都是朋友，凑在一起吃饭聊天而已。

我看郑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心里来气，于是搭着他的肩膀回了屋里，说：“上季度重点人口谈话你还没做，你平时那么忙，咱俩见一面不容易，要不今天就在这儿把季度谈话做了吧。”

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很快，一个40多岁、貌似“大哥”的男人站起来，瞪着我，一脸凶相。旁边马上有人拉住他，还有人立刻摆出一副热情的面孔：“李警官，今天怎么有空儿……”一听此言，“大哥”一抹脸上的不快，还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

我把烟接过来，放在桌上，打开录音，跟众人说：“你们先聊着，我和郑强谈个话。”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反倒是那个“大哥”一脸假笑地接了茬：“李警官，按说这个重点人口谈话，不能在公共场所做吧，重点人口也是有隐私权的……”

我笑了笑，说：“你还知道这个，看来也是同道中人？姓甚名谁告诉我。”说完，我便把警官证扔在桌子上。

“大哥”愣了一下，很不情愿地把信息告诉了我。我在警务通查了一下，果然，也是公安网上挂了号的。我问他跑到我辖区来干什么，他就讪笑着说：“朋友聚会而已。”

我看了看桌上另外几个人，又拍拍郑强：“下次我再找不到他的时候，还烦劳各位给我传个话，不然我得亲自去找你们要人。”一众人都连连点头。

谈话当然不会在这里进行，警告的目的达到了，我便起身离开。郑强出门“送”我，我点了点他，说年纪轻轻，别总给自己“挖坑”。

郑强就抱怨起来，说，不就是上次谈话没去派出所嘛，“又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至于这么整我吗？”

我说你知道就好，下次季度谈话再找不到人，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

郑强听罢，没再说话。

3

2014年7月，我和袁谷立谈话时问起他的高考成绩。袁谷立非常不好意思，说自己最终还是没能在重庆本地参加高考，临考试前回了本市。可两地的高考试卷不太一样，最终只考了300多分，没能上得了大学。

我扭头问老袁，之前花的钱呢？老袁一脸怒气，说自己被那个“朋友”骗了。

我说这明显属于诈骗性质，有没有报警？老袁摇摇头，直说“算了算了”。我再问，老袁却不知有什么顾虑，不再接茬儿。

我叹了口气，问袁谷立之后有什么打算。袁谷立没说话，老袁却接话说：“不考大学了，让他学点技术，之后能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他说已给儿子在本地一家有名的厨师培训机构报了名，过段时间就去上学。

我问为何不让袁谷立再考一年，老袁的神情便满是沮丧，说，就算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他可是戴罪之身，以后还有可能翻身吗？”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老袁就失望地看了儿子一眼，说等会儿跟我说。

等我把袁谷立打发出去后，老袁点了支烟，狠狠吸了一口，才说，这些年其实他一直在四处打听，想问问看之前那个缓刑判决会给儿子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本来他曾乐观地认为，只要儿子在缓刑期内好好表现，不被收监执行实刑，以后也不再惹事，时间一长人们便会忘了。

但，现实却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这起刑事案件几乎让儿子“前途尽墨”——无论是升学、当兵、就业、考公、提干，都有一个“无违

法犯罪记录”的门槛拦在前面。“就算考上大学，他以后也考不了编制、当不了兵、进不了国企，稍微好点的工作单位都不会要他，还不是得四处打工？与其那样，还不如学个手艺算了。”

我嘴上虽然劝着老袁，但自知这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老袁转而又问我，之前和袁谷立同案的另外两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说杨晓云一直在深圳打工，还算老实。但郑强那家伙不太省心，去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说是当“业务员”，但应该就是在“收账”。身边交往的也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人，我最近打算再“敲打敲打”他。

老袁马上接话，说这个郑强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袁谷立其实根本就不缺钱，就是因为郑强的拉拢和威胁，袁谷立才勉强答应去帮郑强和杨晓云“站场”。结果却落到了现在这步田地，算是被郑强害了。

我没有接老袁的话，之前的案子判都判了，该说的也都跟法官说过了，现在再提没太大意义。我也只能跟老袁说，以后注意，让袁谷立别跟郑强走得太近，断了联系最好。

老袁使劲点头，说儿子早和郑强他们“划清界限”了。

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都得紧紧盯着郑强。

上次在饭店的“警告”似乎对郑强的效果十分有限。他还在收账，常带着两个“小弟”开着辆斯柯达在辖区里转悠。我问他车子哪来的，他就说“公司”给他配的。

我按照车牌联系到车主，车主在电话里说，车是被郑强一伙“顶掉”的——他之前打牌输了钱，临时从郑强所在的贷款公司借了4000块，这十几万的车子便被郑强等人开走“抵押”了，到现在也不还他。

车主又跟我抱怨了一通他被“黑社会”威胁的经历。我让他来派出所报案，他口头答应了，但最终也没有来。

那段时间，常有人反映郑强等人上门“收账”时泼油漆、砸玻璃，还威胁要“卸人胳膊”。我不胜其烦，找郑强出来问他想干什么，他就对那些事情矢口否认。我暂时没有证据，只能警告他“记着自己现在的身份”。

郑强嘴上答应着，转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那时的郑强俨然已成了混子圈里的“后起之秀”，他不但毫不忌讳自己过去的经历，反而将其当成自己的“光荣历史”。据说道上的混子们还挺“尊重”他，年纪轻轻的，就已有年龄大他一轮的混子喊他“强哥”了。

有一次，一位夜市摊主悄悄告诉我，郑强常带着一伙“兄弟”在他的摊上吃霸王餐。一群人招摇吵闹，故意光着膀子露出文身，吓得其他客人都不敢光顾。我让他下次遇到就打电话报警，“寻衅滋事办的就是他们这号人”。

摊主点头说好，但之后从没打过电话。隔了段时间我问他，是不是郑强一伙不去了。摊主却摆摆手说：算了，在街面上做生意不容易，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听说郑强以前坐过牢，心狠手辣，自己不想得罪他。

郑强的“名声”越来越大。领导让我加强对他的管控力度，可我也不太可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去盯郑强一伙。思来想去，只剩郑强的姑姑了。

我找到她，希望她能够帮忙管教一下这个侄子。但郑强姑姑却说自己和郑强没有关系，“以前上学时还回来睡个觉，把我家权当宾馆。现在混社会了，再不回来了”。

我也去找过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他们也说郑强“生性顽劣”，从小就是有名的坏孩子。居委会的治安干事和郑强姑姑住一个大院，跟我列举了一堆郑强从七八岁开始犯下的“劣迹”，什么往厕所里扔鞭炮，偷邻居的自行车……但当我问能不能帮忙看管时，那位40多岁的女干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管不了管不了，他这号人谁敢管？”

说完，女干事大概也觉得刚刚自己表现得有些不合适，找补说，她可以帮忙关注一下袁谷立。我笑了笑，说袁谷立就不用您劳神了。

4

2015年4月，袁谷立从厨师学校学成归来，老袁又开始四处打听给儿子找工作。

本地小饭店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经营，没人愿意雇袁谷立；想去工厂里的食堂，也被厂领导婉言拒绝了。最后好不容易有熟人在辖区给袁谷立找了一家有些规模的酒店，谈好实习3个月，月薪1300元，3个月后视实习情况转正。老袁高兴坏了。

没想到才过了半年，我便接到报警电话，说袁谷立跟人打架了。

打架的地方就是袁谷立上班的酒店，对方是酒店的一名主管。我赶去时，当事人正坐在酒店大厅的沙发上，用餐巾纸捂着脑袋，身边站着几个酒店保安和工作人员。老袁也在现场，和儿子坐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身边放着一个编织袋，里面是袁谷立的工装和一些生活杂物。

双方情绪都非常激动。我看了看那名主管头上的伤，有一点发红，也不太严重。问他要不要去医院治疗，主管说要去，便跟着同事去了医院。我则带老袁父子和另外两名“目击证人”回了派出所。

袁谷立解释说，打架有两个原因：一是酒店主管一直拖着不给他“转正”，也不退给他“实习押金”；二是主管骂他是“人渣”，他实在受不了，才动的手。我让他具体讲一下，不想袁谷立一时竟泣不成声，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老袁给我讲的。

按说袁谷立到7月就该结束实习了，但那位主管非说袁谷立属于“两劳释放人员”，能不能转正，他们领导还要“研究”——这一“研究”，便又过去了快3个月。

袁谷立每天正常上班，和正式员工干一样的工作，但每月依旧领着1300元的实习工资。父子俩商量了一下，觉得与其这样拖下去，不如再寻个新工作。

入职时，袁谷立按照酒店主管的要求，缴纳了3000元的“实习押金”。当时那位主管也承诺，如果实习期满后酒店不聘用，会将这笔钱全部退还。可当袁谷立提出离职时，主管却说，酒店并没有决定不聘用袁谷立，现在他要走，属于主动离职，3000块不退了。

袁谷立很生气，打电话告诉父亲。老袁觉得酒店确实坑人，也担心儿子在酒店和人起冲突，劝了两句就急匆匆往酒店赶。没想到还在路上，就听说儿子和那位主管打起来了。

袁谷立后来也说，那位主管一直揪着自己以前被判过刑不放。刚开始说话还算委婉，后来两人越说越急，主管就骂他是“人渣”“垃圾”“婊子养的”，还问他之前酒店夜里丢东西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他干的。随后，双方便动了手。

一同来派出所的另外两名酒店员工说，其实酒店根本不存在“实习押金”一说，一直都是那位主管自己收的。大家都交过，但转正之后也都退了，这次也是故意找碴儿难为袁谷立。

我说既然酒店不存在“实习押金”一说，主管收钱这事儿其他领导知道吗？一名员工就说，主管是老板的亲戚，知不知道有什么所谓？随后又说，袁谷立这几个月工作一直很认真，也从不跟其他员工计较什么。

“既然袁谷立这么老实，你们主管为什么还要特别针对他？”我又问。

另外一名员工就说，估计也就是看袁谷立老实巴交，又对自己被判过刑的事讳莫如深，觉得他是个“软柿子”，即便受了欺负也不敢来硬的，所以才这么算计他的。

酒店主管的伤情并无大碍。来到派出所后，却张口就跟老袁要5000块钱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否则就要让袁谷立“坐牢”。

我看着他有些来气，说，你先解释一下之前那笔“实习押金”的事。酒店主管也很硬气，说是酒店的规定。我让他把规定拿出来，他拿不出来，直言说自己是老板的亲戚，可以让老板“马上制定制度”。

“我不管你定什么制度，既然之前没制度你就敢收钱，什么性质你自己想想。”

等我说完，酒店主管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回来再跟我说话时，语气明显软了下来。

很快，他就把“实习押金”如数退给了袁谷立，打架一事也没再追究。倒是老袁执意要塞给酒店主管2000块钱“买营养品”。等酒店主管走了，我问老袁为啥要这样做，他说就算是“封口费”吧，“让他别在外面乱说”。

老袁主动要给钱，我也没办法，只能问他之后什么打算。

老袁又叹气，说袁谷立“学也上了，习也实了”，在外面打工既受人欺负，也不是个长法。他打算再从家里拿点钱出来，让袁谷立在附近租个门面房，开个小饭店，自己干算了。“早上、中午煮个面，晚上卖个消夜，成本没多少，就算赔也赔不了多少钱。”

5

2015年年底，老袁又来找我，说他看到一处不错的门面房，是我辖区内某单位的公产。本来同意租给他了，但后来对方听说是给袁谷立开店用，又拒绝了。

我去了那家单位，负责后勤的王科长直言不讳地说，单位领导有交代，必须审核租客的情况，“不能把房子租给那些来路不明或者有劣迹的人”。我解释说，袁谷立虽然是“两劳释放人员”，但平时行为还是不错的，他爸给他租房真就是为了开个小吃店赚生活，没有其他想法。

可王科长还是一直摆手。最后大概被我说急了，义正词严地来了句：“他租房你们派出所能出担保吗？能出担保我马上租给他。”

我也急了，原本想发火，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只能摆摆手告辞。

回去派出所我才知道，王科长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公家原因——领导确实让他不要把门面房租给那些“捞偏门”的；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家的原因——门面房隔壁开着间网吧，老板是王科长的嫂子。她一听说“抢劫犯”袁谷立要在隔壁的门面开店，连夜赶去了小叔子家，强烈反对小叔子把房子租给老袁。

老袁得知情况后也深表无奈，说儿子就想本本分分地谋个生计，怎么这么困难。现在连租个房子都被人歧视，“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

我劝他别把这事儿想得这么极端：“我们这里毕竟是个小地方，圈子窄，人也单纯，对判过刑的人接受度很低，这个你得理解，也得接受。”

老袁就不住地叹气。

袁谷立在本地开店的设想最终没能实现，最后，在武汉汉阳的一家美食城找到了工作。我去武汉办事时见过他一面，他请我吃了顿饭，说是自己亲手做的，算是之前对我帮助他的感谢。

聊起过往，袁谷立说，这些年自己真没想到路会那么难走。之前被判刑时，他以为自己只要改过自新，就可以被社会接纳。没想到后面努力想恢复正常生活，却处处碰壁。

我说，这有外界因素，也给你自己长个教训，毕竟，不是每个错误都是一句“对不起我错了”就能弥补的。他连连点头。

袁谷立问我杨晓云和郑强在做什么。我说杨晓云的母亲病了，他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了家，想在本地找份工作，情况和你之前差不多；至于郑强，他也跟之前没啥太大变化，“你一定要离他远点，不要和他再有瓜葛”。

袁谷立说自己早就跟郑强断了联系，之前郑强的确找过他，他没搭理。

我一下警惕了起来，问郑强找你干啥？袁谷立说也没啥，就是让他跟着去“跑业务”，但他拒绝了。

我说你做得对，郑强跑的断不是什么好“业务”。

没过多久，郑强主动来到派出所，上交了一份“特种行业申请表”给我。

我看了一眼营业地址，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当初，那间王科长无论如何都不肯租给老袁的门面房，眼下竟租给了郑强。

我问郑强要开什么“特种行业”，他就指着申请表说“寄卖行”。我问他开寄卖行干啥？他就含糊其词，“为了赚钱呗，还能干啥？”

我忍不住爆了粗口，说你开寄卖行想干啥我能不知道?“在我这儿开寄卖行的有一个说一个，除了收赃就是放贷，没有一家开过3年的。最后老板不是跑了就是被警察抓了，你想要哪个结局？”

郑强却露出一脸无辜的神色，说自己按程序规定来申请开业，我为啥又要为难他呢？我万般无奈给他盖了章，警告他之后在我辖区开店老实一点，别让我逮到尾巴。

郑强前脚一走，我后脚便去了王科长那里。王科长一改上次那般假正经的样子，推说自己并不知道郑强的情况，稀里糊涂地把房子租了，现在也十分后悔。我说那你可以把房子收回来，不然万一郑强在你这儿租房子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派出所可没法给你出“担保”。

王科长就说合同都签了，现在毁约是要给郑强“违约金”的。况且法律既没有规定郑强不能开寄卖行，也没规定他不能把房子租给郑强。“咱不能把两劳释放人员谋生的路断了不是，那不是逼着他们‘重操旧业’吗？”

这话让我十分恶心，便把之前老袁打算租房时他嫂子强烈反对的事情跟他挑明了，问他，这次是当年的同案犯郑强来租了，你嫂子怎么不反对了?

王科长被我说得满脸通红，憋了半天，冒出一句：“郑强这号人，咱都犯不上为了公家的事情跟他‘结仇’不是？”

我听他话中有话，问他是不是在租房子的事情上受到了郑强的威胁。“如果是的话你跟我说，我现在就带你回派出所取笔录材料。”

王科长又连连摆手，说：“没必要没必要。”

事后我才知道，得知郑强要在自己隔壁开店时，王科长的嫂子又去找了小叔子，王科长最初也不同意。但不久后的一天，王科长家的玻璃半夜忽然被人敲了，他嫂子开的网吧大门上也被人泼了红油漆。白天

营业时，还平白无故地多了几个小混子，坐在网吧里占着机器却不上网。直到王科长同意把门面房租给郑强之后，一切才恢复了正常。

自始至终，王科长和他嫂子都没报过警。我又去找了王科长的嫂子，说起之前网吧被人骚扰的事情。她也压低了声音说，“八成就是隔壁干的。”

我坚持拉她去派出所报案，她却像王科长一样连连摆手，说自己就想安安稳稳开个网吧，“干啥去跟抢劫犯一般见识”。

后记

2016年底，我离开社区民警岗位，带继任社区民警去居委会交接工作。提到社区内两劳释放人员的教育管控问题，居委会治安干事和王科长又一次提起郑强一伙的“恶劣行径”，要求派出所加强管控。

我起先没有表态，继任同事就问郑强的寄卖行所用房产的归属。王科长磨叽了半天，才说是自己单位的公产。同事说租期差不多到了，你把房子收回来就行。王科长却跟同事说，“警察的办法多，能不能你们想个办法？”

同事只能说回去商量一下，之后给他答复。

同事又问我，跟郑强同案的袁谷立和杨晓云的情况怎么样，我说他俩都还好。王科长就插嘴说：“那为啥郑强总是惹事？警察做事就应该因人而异，对特殊的人应该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

我点点头，说：“没错，因人而异是对的，见人下菜就有问题了。”

王科长之后再也没说话。

一对成功父母养出的疯孩子

1

2014年11月的一天，姜艳跑来派出所求助。她在值班室里哭得很伤心，说自己被“精神病”儿子打出家门，亟须警察帮助。

我在警综平台上查了当事人的档案，姜艳的儿子名叫刘进，时年30岁，并非辖区在册的精神病患者。我问姜艳具体是怎么回事。她说刘进老大不小了，“既不上班也不找对象，整天在家打游戏。今天我就说了他几句，没想到他竟然抡起凳子就打我！”

说完，她把外套脱了下来，右肩和双臂部位几处明显伤痕清晰可见。

“你确定儿子有精神病吗？”

姜艳被我问得有些蒙。我解释说，平台上暂时没有刘进患病的相关记录，如果确定他有精神疾病，我们会按照《精神病人处置措施》协助她送医，如果不能确定，就先按“一般程序”处置。

姜艳沉默片刻，说儿子脾气一直十分古怪，以前也去医院精神科看过，只是一直没确诊。

于是，我便招呼同事，带好装备，和姜艳一起去了刘进的住处，按“一般程序”出了警。

走上3楼，我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青年，干瘦身材，戴副眼镜，长相与刘进留在警综平台上的照片一致。保险起见，我还是退后了一步，一手按在腰间的单警装备上，另一只手和他隔开安全距离，让他说出自己的姓名。

青年一脸诧异，说自己叫刘进，问我找他啥事。我看他神色正常，不似精神病人发病，便问他是不是刚才动手打了人？刘进顿了顿，点头说是。

刘进的房间是一套40平方米左右的旧公房，一室一厅。客厅堆满了旧书、成捆的衣服、几样残破的生活用具，还有一台落满灰尘的电脑主机，几个脏兮兮的纸箱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杂物。屋子看起来像搬家后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样子，但从灰尘和污渍看，又似乎是很久之前就搬进了这里。

我让刘进讲讲殴打他母亲姜艳的事由。刘进说，今天母亲来拿东西，进门看见他在打电脑游戏，二话不说就上来扇他耳光。他气不过，就拿起凳子和母亲对打起来——他讲话的语气和表达方式的确与正常人相异，但似乎也到不了精神病人的地步。

在我和刘进沟通的过程中，姜艳不断打断儿子说话，指责儿子，咄咄逼人，一句一个“你爹把你教坏了”。我插话问姜艳“你家这是啥情况”，她没好气地说：“离了。”

鉴于他们的母子关系，姜艳又是受害方，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制止。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再这样下去，可能两人又要打架了。

同事示意我先把姜艳带出去。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那边的刘进就冒出一句“你个老不死的”，抄起了桌子上的烟灰缸径直向姜艳头上砸来。他的动作实在太突然，我只能一把推开姜艳，让烟灰缸砸到我肩膀上，烟灰和烟蒂落了一身。

看没有砸到母亲，刘进回手又去拿桌上的玻璃杯。同事一边阻拦一边大声呵止。我赶紧趁机把姜艳推出房间，让她先去派出所等我们。

2

回到派出所，同事把刘进带进了讯问室，我则带着早一步回来的姜艳去二楼办公室。此时姜艳身边陪着一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是刘进的舅舅，名叫姜涛。

“警官，你都看到了，这像一个儿子该对母亲做的事吗？”一进屋，姜艳就愤怒地向我抱怨。我给她倒了杯水，安慰说：“你儿子可能真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何止是精神不太好，就是精神病！”紧接着，姜艳就相继用了“暴力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等词汇来形容儿子。和在刘进家时一样，她每指责一句儿子，后面都要加上一句“就像他那个该死的爹一样”。骂到末了，又加了一句：“他现在这副鬼样子，就是拜他那婊子养的爹所赐！”

我只能等姜艳发泄够了，让她再详细讲讲儿子的情况。

姜艳说，刘进之前也上过大学，但大二便因沉迷网游退了学。后来又送他出国留学，去了一年便回来了。此后就一直赋闲在家，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光景了。他也找过工作，但都没做长，不是嫌累就是嫌离家远，还有的纯粹是因为他不喜欢，便直接离了职。如今，他每天除了打游戏就是看色情电影，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

今天，姜艳来刘进住处取东西。一进门又见儿子在卧室里闷头打游戏，顿时怒火中烧。说了儿子几句，没想到儿子竟然跟她顶起嘴来。姜艳更生气了，随手从床上抄起个东西就要“教育”儿子，不想儿子反手就朝她抡起了板凳。

我问姜艳刘进有没有结婚，姜艳更生气了，“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不提结婚她还不生气，几年前她曾给儿子介绍过一个女朋友，各方面条件都很好，都要谈婚论嫁了，却被刘进父亲强行拆散。

然后，姜艳话题一转，从刘进读幼儿园时讲起，开始细数前夫在育儿方面的过失和其他方面的各种“混账行为”。直到她讲到他们当年为儿子上高中应该选择寄宿还是走读而吵架时，我打断了她——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我劝她先别说没用的，今天主要处理刘进打她的事。

姜艳有些不满，沉默一会儿，冒出一句：“刘进是我生的，他打我，我不跟他计较，但今天这事肯定是他爹指使的，这是‘雇凶’！你们要把他抓起来！”

我一下愣住了，怕自己听错，让姜艳又说了一遍，姜艳的语气比第一次更加坚决。

讯问室里，刘进在同事的教育下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答应给母亲认错，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但姜艳却一直不依不饶，强烈要求我们把她的前夫叫来。我给刘进父亲打了电话，但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这事儿和我无关”，便直接挂了。刘进也否认当天和母亲发生冲突是“受人指使”。

我和同事商量了一番，觉得没有必要将此事扩大化，劝姜艳就到此为止。姜艳却说，今天前夫不来跟她“讲个明白”，这事儿就不能算完。

一直僵持到傍晚，陪同而来的姜涛首先沉不住气了。之前还帮自己妹妹说话的他改了口：“算了吧，没必要节外生枝……”

见姜涛这么说，姜艳一下哭了起来，说哥哥“胳膊肘往外拐”。姜涛后来又劝了几句，看没效果，便叹了口气，自行离开了。

那天，这对母子在派出所一直耗到晚上10点。临走时，姜艳终于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气呼呼地说“这事儿没完”，一定要去“找他爹算账”。签完字后也没理儿子，径直离开了派出所。

3

没想到，时隔一个月不到，我又见到了刘进。

2014年12月中旬，刘进因殴打他人又进了派出所。这次的受害者，正是他的父亲——57岁的某公司老板刘平。

我们出警赶到现场时，刘进已被小区保安控制着蹲在停车场边，120先一步将刘平送去了医院。我们在现场了解情况，目击者称，刚才看见刘平先下了楼，几分钟后刘进也从楼道里跑出来，手里握着一把餐刀。两人在楼下停车场前争吵了一会儿，刘进便对着刘平挥舞起手中的餐刀，刘平在混乱中被划伤了。

我把刘进带回派出所。他脸上也有伤，但并不严重，说不用去医院。我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刘进说，今天父亲进屋后，二话不说就打他，打完之后还不解气，又砸了电脑，之后扭头就走。刘进越想越气，从厨房里抄起一把餐刀就追了出去。

赶去医院了解情况的同事打电话回来说，刘平的羽绒服被划开了几道口子，较为严重的伤口在面颊左侧，长达5厘米，差点伤及颈动脉。但同事又说，刘平非常难交流，面对询问，只是翻来覆去哀叹："儿子白养了，跟老子动刀了。"

在医院包扎完毕后，刘平在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情绪依旧十分激动："不用扯别的，把姜艳抓来就行了！刘进这次肯定是受姜艳指使的！"

我诧异地看着他，想起3周前姜艳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便问他："今天又关姜艳什么事？"

刘平说，半个月前，前妻跑去自己公司闹事，"硬说是我指使刘进打她，非要我'给个说法'"。闹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被保安架出去的。之

后，姜艳又去了刘平父母那里，生生把家里80多岁的老爷子闹进了医院。

“冤有头债有主，前妻跟你闹，你冲儿子发什么火？”我再问，刘平就不答话了，只是摆摆手说这事先不谈，把姜艳“抓”来再说。

由于这次动了刀，稳妥起见，同事打电话通知了姜艳。姜艳嘴上答应要来，但却一直没见人，最后还是姜涛来的派出所。

我问他姜艳怎么没来：“上次不是她一定要见前夫吗？怎么这次反而‘不方便’了？”

姜涛说“算了算了”，来了两人肯定要打架，自己很清楚妹妹一家的事情，可以代为处理。

本以为刘平与前妻的关系如此，与自己“前大舅哥”的关系应该也不会好。但没想到，两人见面之后不仅没有剑拔弩张，反而很客气。刘平还从兜里掏出烟，给姜涛点上。两人在派出所大厅外小声说了几句，刘平走回派出所大厅，跟等着给他做材料的民警说：“这事儿算了吧。”

大家都很意外，问怎么就算了。刘平还是摆摆手，说爷俩之间的事情，说多了也是丢人，不追究了。我在一旁插话：“那你可想好了，这事儿今天说不追究了，之后再追究可就不算数了。上次姜艳从派出所走了跑去闹你，我们可不希望类似的事情发生第二次。”

刘平啐了一口：“警察放心，我才不会像那个疯女人一样。”

签完《调解协议书》，刘平连儿子的面也没见，便打车离开了派出所。

等送刘平上车后，姜涛又折回来，说要带刘进回家。同事这才把刘进从讯问室里带出来。不料，刘进一看见舅舅，竟像个孩子一样，当着

所有人的面哭了起来。

姜涛搂着外甥往外走。眼看两人即将走出派出所，同事把他们叫住了：“这次处理完了不代表不会发生下次。他们家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需要心里有个数。”

姜涛想了想，说先把外甥送回家，抽空再来。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问同事，派出所天天发生这种事，有必要再专门让他来一趟吗？同事叹了口气，说自己当了30多年警察，很多大案子在发生之前都有征兆，“早发现早解决，省得之后酿成大祸”。

4

原以为姜涛说“抽空再来”只是一句托词，不想他很快就回到了派出所，说自己正好也遇到点为难的事，既然今天警察问了，他也不妨讲讲，“看看警察有什么办法没有”。

姜涛告诉我们，之前刘进和父母闹矛盾，从家里搬了出来，这些年一直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日常起居基本全靠他这个舅舅照应。原本，他以为外甥只是暂时“躲个清净”，不想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四五年。姜艳和刘平离婚前还偶尔管管儿子，后来离了婚，似乎都把儿子给忘了。

我问他是不是担心房租之类的。姜涛摇摇头，说这几年刘平不时会给他转一些钱，付房租绰绰有余，刘进的日常开销也基本由姜艳负担。可自打刘进住在他的房子里后，眼见着情况越来越差，如今已经到了跟他爹妈舞刀弄枪的地步。“我和老婆都担心之后再发生别的事情，所以不想让他住了……”

“这事儿你得跟姜艳和刘平商量，商量不成恐怕要去法院打官司，警察估计帮不上你什么。”

听我这么说，姜涛无奈地点了点头，说自己之前也问过，可姜艳和刘平都不愿把儿子接到自己家，而且俩人只要坐在一起就要吵架，根本没法谈。他又不好强行赶外甥走，心里总感觉这孩子落到今天这地步怪可怜的。

我有些不解：“刘进3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要你来照应？他父母都健在，即便照应也轮不到你这做舅舅的啊？”

姜涛苦笑一声，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现实有时却不讲道理。外甥从小就跟自己亲，现在这副样子，他也实在看不下去。之前刘进也去医院查过了，医生说只是心理有点问题，还到不了“精神病”的程度。

但说没病吧，刘进现在的情况又不能说是个正常人——“正常孩子怎么会跟父母抡板凳动刀子呢？”

我问：“刘进是从小就这样，还是后来受到什么事情刺激的？”

姜涛说，应该是后天原因导致的。刘进小时候成绩一直不错，十来岁时跟他去北京出差，还说长大以后要到北京读大学。可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异常的，姜涛也说不清楚。他只记得刘进上高中时，因姜艳和刘平工作忙，在自己家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只觉得外甥胆小、腼腆、不会跟人交朋友，还教育外甥“要有男子汉的样子”。后来刘进考上大学去了外地。姜涛也是在刘进大二退学的时候，才知道外甥出了问题。之后刘进出国留学，但没待多久便回来了，说是适应不了国外的生活环境。回国后，就从家里搬出来，一直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

同事接过话茬，说现在看来，刘进和他父母之间已经不单是“闹了点矛盾”了，“还有，你妹妹和刘平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明明是一家人，却弄得像仇人一样？”

姜涛叹了口气：“还能为啥？相互置气，拿儿子当枪使呗！多少年了一直是这样，不然刘进也不可能变成现在这副样子……如今这样，全是拜他父母所赐啊。”

5

姜涛家兄弟姐妹四个，姜艳是老小。她和刘平1983年结婚，2010年离婚，刘进是他们的独子。这对共同生活了27年的夫妻，如今即便离婚了，仍旧时不时相互找碴儿。

姜涛说，自己和刘平是中学好友，这么多年关系一直不错，刘平与姜艳的结合也是自己撮合的。那时两家老爷子都是市里机关单位的领导，门当户对，刘平与自己又有同窗之谊，姜涛觉得两人本应是天作之合。谁料结果却是如此，姜涛也挺后悔。

至于两人现在闹到这个地步，姜涛说，直接原因应该还是妹妹气不过前夫娶了新妻子这事儿。“按说我妹妹真没必要为这事儿置气，但关键是，刘平离婚的第三天，便娶了一个跟儿子刘进年龄相仿的女人，还带着招摇过市，这的确让姜艳非常生气。”

我接话说，看来刘平这家伙不地道，明摆着之前就有“相好”。

姜涛说，姜艳早就知道刘平在外面有情人，离婚时刘平也承认“婚姻中存在过错”，从而少分了很多财产。真正让姜艳生气的是，离婚是她主动提的，对外的说辞也是“刘平不是个好东西，是我甩了刘平”。结果刘平一离婚就新婚，这摆明是在说姜艳是“被丈夫抛弃的黄脸婆”。她要“争回这口气”，才一直纠缠着刘平不放。

我说：“既然不想一起过了，还管谁抛弃了谁干啥？人活一辈子好多面子要争，干吗要在这种事上相互不放过？”

姜涛说，他也这么劝过妹妹，但是没用，因为姜艳和刘平一起生活的大半辈子里，一直都在互相“争气”。

姜艳是姜家最小的女儿，刘平是刘家最小的儿子，两人从小都是各自家里最受宠爱的那个。

新婚后，两个人先是争谁父亲的“能量大”——两家老爷子都是正处级退休的，没什么太大差距；后来，又争谁“能力强”——姜艳在单位里算是主要领导，刘平下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两人又是打了个平手；再后来，争的就是“谁教育孩子的方法对”——如今看来，两人算是全失败了。

假如争的都是类似问题也还好说，但平日里，两人连“家里买什么物件”“晚饭吃什么菜”“串门买什么礼品”都要一争高下，这日子便没法过下去了。

“离婚”其实很早就被两人挂在嘴边了。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姜涛接到妹妹的电话，说跟刘平过不下去了，要离婚。姜涛急匆匆赶到妹妹家里，了解情况后才得知，两人竟是为了当时刘进作业中的一道初中数学题产生了矛盾。

是什么数学题姜涛早记不清了，但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姜艳和刘平两人在他面前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细数了之前争执的全过程。在两人冗长的叙述中，姜涛忽然意识到，这两人的矛盾症结，根本不在于一件事孰是孰非，而在于这件事应该“谁说了算”——“说到底，他俩争的是家中的‘话语权’。对错不重要，关键是‘听谁的’。开始还就事论事，后来便纯粹是‘对人不对事’了。”

“既然两口子把日子过成这样，干吗不早离婚？”同事问。

“也不是没提过，但最终拖了那么久才离，一方面是双方亲人的劝阻，老人们认为两人之间并没有原则性问题，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必要上纲上线到离婚的地步；另一方面，两人一直没离成婚，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

姜涛说，以前妹妹提出离婚时，妹夫不同意，过一阵子，妹夫提出离婚，但妹妹又不同意。姜涛一开始也没搞明白，后来才知道，连离婚这件事情，他们也在争“谁先提的”这个点。“刘平那边我没亲口问

过，但姜艳跟我说过，‘刘平说离婚我就得跟他离婚，那不成了我被他甩了？那样不行，要离婚也得是我来提！’”

说完，姜涛自己都笑了。

6

姜涛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就是活受罪。“走到今天这步，也是妹妹一家……”他可能想说“咎由自取”，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既然夫妻二人要争夺“话语权”，那就肯定有输赢。赢的一方沾沾自喜，输的一方就会去找孩子的碴儿。

刘进读高中时，姜艳忙着单位的晋升，刘平忙着生意。刘进便在姜涛家住了一年多，也给姜涛讲了很多自家的事。

刘进说，自己从小就怕父母吵架，但又怕父母不吵架：一吵架，吵输的一方便要在自己身上撒气；可不吵架，两人就“铆足了劲”在自己身上找做得不好的地方，好借此向对方“开火”。

让姜涛震惊的是，妹妹和妹夫总会把对彼此的不满告诉刘进——比如姜艳怀疑刘平和公司前台姑娘有不正当关系却又抓不住证据时，就会直接当着刘进的面说：“你爹是个混蛋，在外面搞破鞋。”刘平和姜艳吵架输了，就对儿子刘进说：“你妈这个婊子养的，干别的不行，就是那张嘴好使。”

姜涛给姜艳打过电话，让她以后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这种事情。姜艳却说，自己不说刘平，难保刘平不说自己——那样的话，儿子就跟刘平成了“同伙”，自己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姜涛虽然感觉妹妹不可理喻，但自己却很难干涉。只能告诉外甥，好好学习，不要掺和父母之间的矛盾。

日积月累，刘进的性格问题就越来越明显了。

2003年，刘进考入省内一所高校的工商管理专业。入学当年就因与舍友发生冲突被辅导员请了家长。刘平和姜艳都说没时间去处理，又请姜涛代劳。

姜涛原以为只是简单的同学矛盾，到了学校后才知道，原来是整个宿舍的人殴打刘进一个。姜涛很生气，质问辅导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辅导员先是给姜涛道歉，说自己工作没有做到位，然后又把宿舍其他几名同学的谈话记录交给姜涛——原来，刘进挨打的原因是“挑拨同学关系”。

“打个比方，同学张三和李四在宿舍发生点口角，刘进便悄悄跟张三说，李四在背后说你坏话，然后又去跟李四说，张三看你不顺眼，准备搞你。大家都是同学，原本也没啥矛盾，聚在一起一通气，结果发现都是刘进在背后使的坏。次数多了，不揍他才怪……”姜涛有些无奈。

他问刘进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刘进说是担心宿舍同学吵架，就把矛盾引到自己身上。姜涛啼笑皆非，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刘进却说，“从小到大，我爸妈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辅导员帮刘进换了宿舍，姜涛也教育刘进好好学习，遇到事情多跟辅导员交流。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刘进就又被整个宿舍的同学打了。

这一次，姜涛和姜艳、刘平一同去了学校。

“那次他倒没挑拨同学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了‘内奸’。他平时独来独往，从不和同宿舍同学说话。但宿舍里的同学，谁把女朋友带回寝室，谁用了大功率电器，谁夜里跑出去上网，谁在宿舍浏览非法网站，甚至打扑克、下象棋，他都在一个小本子上一一记录下来交给了辅导员，后来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又挨了一顿打。”

姜涛跟辅导员吵，怪他不该让刘进去做这些事。辅导员一脸无辜，说自己真没派刘进去做“内奸”，建议家长带刘进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那天返程的路上，刘平一直在讽刺姜艳，说他早说了，儿子高中毕业就去国外念书，钱都准备好了，都是听了姜艳的话，非要留在国内读大学，不然哪有这么多问题。最后，刘平的一句“不会教育孩子就别教”彻底激怒了姜艳，她歇斯底里地冲刘平怒吼，半路就下了车。

大学的辅导员后来曾专门找过他们，说刘进只是性格上有些缺陷，完全可以通过心理医生的调节和集体生活的锻炼来治愈。相对而言，国外陌生的环境不利于刘进性格的转变，更何况刘进自己也想继续留在学校。“他自己也说，除了不会跟人打交道外，没有别的问题。”

但刘平却不依不饶，他说儿子不会与人相处不要紧，反正国外留学生活相比国内大学生活更独立一些，“不会跟人打交道，那就不必跟人打交道了”。

在这个问题上，姜艳最终没有争过丈夫。姜涛说：“后来他们又吵了好几次，最后的结果是，让刘进退学，按照刘平的设想去国外念书。结果刘进在国外也只待了一年就回来了。他们两口子也没跟我说原因，但我也大概能猜到，估计还是没法跟人相处。”

7

2006年，刘进回了国，家庭矛盾随即激化。

姜艳开始觉得自己在儿子上大学的事上丢了面子，但等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她又觉得自己找回了一些面子，开始频繁地用刘平先前讽刺自己的话“回敬”他。刘平则把全部的火气都撒在了儿子身上，他动不动就对刘进拳脚相加，骂他“不争气”“没出息”“让你爸我抬不起头来”。

刘进几次来找姜涛求救，说自己快被父亲打死了。姜涛无奈，去妹妹家想调和一下父子关系。但去了之后，才发现妹妹和妹夫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需要“调和”的：“挖苦、讽刺、指桑骂槐甚至人身攻击，他们家全有。都是一家人，有些话，我都想象不出他们怎么能说得出口。”

姜涛放弃了原来的想法，问外甥打算怎么办。刘进说自己不想在家里住了，想换个清净的地方，问他能不能把那套空着的老房子“借”给自己。

姜涛征求了妹妹妹夫的意见，两人倒是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刘平转身还甩给姜涛5000块钱，说是儿子的一部分房租，之后不够了再来找他拿。姜涛没收，瞪了妹夫一眼，便带外甥走了。

此后，刘进就一直住在姜涛的老房子里。独自居住后，刘进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怪异，除了把自己关在家里打游戏外，再也没做过别的事情。姜艳找人给刘进安排工作，刘进不去，刘平让儿子来自己公司上班，刘进去了几天，也不愿再出门了。

2010年底，姜艳和刘平两个争斗了半辈子的“冤家”终于离了婚。能让他们走成这一步，还是因为儿子刘进。

这一年，姜艳和刘平开始张罗着给已经26岁的儿子介绍一门亲事，而在这个问题上，两人一如既往，达不成一致。

那时姜艳已经是市里一家国企的主要领导，刘平的生意一年也能有百八十万的纯收入。姜艳一心想给刘进找个各方面都和自家相配的姑娘，刘平则觉得应从儿子的实际情况出发，找一个能接受儿子现状、愿意跟他过日子的姑娘。

夫妻俩又吵了起来。姜艳说，儿子现在已经是这种状态，不找个有能力、能够帮扶他的好妻子，这个家就完了；刘平则认为，就儿子现在这种状态，家庭条件差不多的好姑娘肯定看不上，更没人会“帮扶他”。与其找一个娶进门之后“吃干抹净”甩手就走的，不如找一个实实在在能跟他过下去的。

在这个问题上，姜涛是赞同妹夫的。姜涛说，妹妹最初相中的那个姑娘是位研究生，名牌大学毕业，分到姜艳单位上班。老家虽然不是本地的，但据说条件也挺不错。碍于姜艳是自己的领导，姑娘答应跟刘进处一下，但后来得知刘进本人的情况后，坚决分了手。

姜艳为此还挺生气，在工作中故意给那个姑娘穿小鞋，姑娘就直接裸辞回了老家。听说后来照样找到一份挺不错的工作。

后面再给刘进介绍对象时，姜艳便刻意隐瞒起刘进的真实情况，对外宣称刘进“在国内读了大学，还在国外留过学”。她相中的第二个姑娘，是公司所在集团另一家分公司，与自己同级别的领导的女儿，女孩当时也在姜艳的手下工作。为保险起见，姜艳先是和对方父母取得了联系，对方也表示支持。

第二个姑娘与刘进见过一面，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异常。姜艳很高兴，以为这件事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了。但没想到，刘平得知后却强烈反对，不但找机会给姑娘讲了自己儿子的真实情况，还直接打电话告知了姑娘的父母。

“刘平那回做得对。放任姜艳这样搞下去，不但儿子的婚结不成，她和对方父母也会反目成仇——她这是明摆着坑人家姑娘啊！”姜涛说。女孩自然与刘进分道扬镳，对方父母则认为刘平是个“懂事理的实在人”，而姜艳却是个“坏了心肠”的女人。

这件事情最终成了压垮姜艳和刘平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姜艳说，此事未成，完全就是刘平怕自己在儿子婚姻问题上“做了主”。如果说以前两口子还只是在有些事上“达不成共识”，那么在儿子找对象这件事上，丈夫根本是“存心使坏”。

姜艳和刘平重提离婚。这一次，除了双方老人依旧反对以外，其他亲属均表示赞同。

8

“其实从本心里说，姜艳和刘平两个人都是能人。”姜涛说。妹妹是公司里唯一做到主要领导位置的女性，工作能力强，拿到的各类荣誉数不胜数，风评极高；妹夫从小成绩优异，当年辞职下海，从白手起家做到身家不菲。两个人在外人眼里都是“成功者”，但凡有一个人能在家里让一步，生活就不会沦为现在这般田地，外甥也更不至于如此。

“三十大几的人了，不结婚也没工作，整天窝在屋里玩游戏不说……”姜涛顿了顿，说前段时间，自己还在刘进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些图片，似乎全是他在公共场所偷拍的女性不雅照片。他担心外甥暗地里做些非法的事情，跟刘平和姜艳说了，可谁也不愿管。

刘平再婚后，和小媳妇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每次姜涛跟他讲刘进的事情，刘平唯一会做的，就是给姜涛转账。“嘴上说自己生意忙，实际就是想花钱买个清净。”

姜艳说自己的义务就是把刘进养到成年，现在刘进早已年满18周岁，“是死是活由他自己”。姜涛让妹妹把外甥接回家去，姜艳却说，自己住在单位家属院里，周围都是多年的老同事老下属，自己“精明强干”了半辈子，现在“丢不起这个人”。按年龄，姜艳也快退休了。她说自己退休后打算去海南养老，反正已经在那边买了房子，合适的话再找个老伴，带着刘进“不方便”。

姜涛斥责妹妹“甩坨子”，姜艳却说，刘进的情况是刘平一手造成的。他现在过得逍遥自在，凭什么让自己来背这个黑锅？又说姜涛，“不想管的话就不要再管刘进的事情”。

我问姜涛之后怎么打算，姜涛说，虽然俗话说“娘舅亲”，但舅舅毕竟不是父母，很多事情他也不好做刘进的主。

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问：“那刘进自己怎么想呢？对之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打算？”

“他还能有什么打算？这些年，他差不多已经是个废人了。”

2015年春节前，在姜涛的要求下，我向上级汇报了刘进的情况。派出所和居委会决定组织刘平、姜艳和姜涛三人针对刘进的事情见面开一次座谈会。但协调再三，座谈会最终还是流产——刘平和姜艳都拒绝参加，理由很直白：这是他们的家事，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更不想为此惊动派出所和居委会。

姜涛很生气：“既不愿谈，也不解决问题，都怕打扰了自己眼前的好日子，这他娘的也太自私了吧！”姜涛的妻子更愤怒，说姜艳和刘平这次要是再不给个说法，她就收回那套老房子，把刘进赶到街上去。

还是经过姜涛的反复努力，才终于通过“家庭会议”的方式，把姜艳、刘平拉到了一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姜艳和刘平都希望以高于市场租金的价格租下姜涛那套老房子。但姜涛妻子坚决不同意——她说，这两人是摆明了让丈夫继续照顾刘进，“想得美！”

刘平后来在市里另租了处房子，好歹算是安置了儿子。至于看心理医生、找工作之类的事情，姜涛说他已经不想再管了，也没再问过了：“我就是个当舅舅的，亲爹亲妈都是那个态度，我还能做啥？爱咋地咋地吧。”

再往后，我偶尔还会在街上看到闲逛的刘进。

被榨干的养子，被抛弃的女婿

1

2014年7月，我第一次见到王安平。

那天午饭后，他便站在派出所门口吸烟，一根接着一根。等我们注意到他时，派出所门口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烟蒂。

直到傍晚，王安平还在派出所门口待着，领导让我把他叫进来，问问到底有什么事，别是来“盯梢”的。

走到门口，王安平还在那里蹲着，问他也不搭话，站起来就径直走远了。我转身回了值班室，过了没一会儿，又见他推门走了回来，说自己怀疑妻子在外面“有情况”，想请警察帮他“调查”一下。

此前我们也偶尔会遇到类似“诉求”，但很少像他这样直截了当。我叹了口气，重新打量了他一番：20多岁的样子，长得挺精神，花T恤配牛仔裤，算个潮人。

我告诉王安平，警方的技术手段只能用于重大刑事案件的侦办，不能用来调查他妻子是否有外遇。如果打算离婚，可以聘请律师，有些事情律师会处理。

王安平面色沮丧，恳求一番无果后，只好悻悻离开。

两个月后，我又见到了王安平。他来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公共厕所里贴的小广告骗了钱。

王安平说，之前来求助警方“调查”妻子外遇被拒后，一直不甘心，后来无意中在一间公共厕所的墙上看到一张“复制电话卡，调查婚外情”的广告。电话拨过去，对方要他先打8000元的“设备费”和6000元的“保证金”。

钱打过去了，对方不但没把他想要的妻子手机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发给他，反而又向他继续索要1万元的“风险金”。王安平意识到自己上了当，想要回之前的1.4万元时，对方就把他拉黑了。

王安平的遭遇着实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便说他：你这是何必呢？过不下去就离婚，费这些干戈做什么。王安平却十分苦恼，跟我说了很多妻子刘欣的“反常状况”。

临走时我劝他：“两口子过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王安平却说，离婚他可以接受，但就是不想被蒙在鼓里。

“既然离婚都可以接受了，还要查什么呢？”我脱口而出。但说完后又觉得有些不妥，问他是不是在考虑离婚财产分割比例的问题——现行婚姻法规定，有过错一方需要在离婚分割财产时给予无过错方一定补偿——“如果是那样，就赶紧找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他们会给你相关的建议，不要自己瞎琢磨。”

王安平不置可否，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2

被诈骗的案子还没侦破，我就又与王安平见面了。

2014年12月的一天，派出所接到报案，称王安平殴打他人。我和同事出警赶到现场时，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治疗，王安平则蹲在案发居民楼的门口，身边站着几个围观群众，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

被打的人是王安平的岳父，我问蹲在地上的王安平怎么回事，他沉默不语，好像还在气头上。我拍了拍他肩膀，说在这儿不愿说算了，反正也要去派出所，回去说吧。

回到所里，在医院了解伤者情况的同事打来电话，受害人伤情不重，两处软组织挫伤而已，轻微伤，没有大碍。

“你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同不同意调解？毕竟两人是亲戚，同意调解的话我这边按调解程序走。”我问同事。

同事顿了顿，却说：“你先按一般程序走吧，眼下受害人情绪激动，喊打喊杀的，还坚持要住院，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同意调解。”

我只好按照一般程序去找王安平做笔录。

王安平说，对方叫刘良可，65岁，身份有些特殊——既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岳父”。

这话乍一听有些令人费解，我让王安平解释一下：你们也不是一个姓，他怎么就成了你的“父亲”？既然是父亲，又怎么成了“岳父”？

王安平告诉我，刘良可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养父。自己从小在刘家长大，23岁那年在刘良可的建议下，娶了刘良可的小女儿刘欣，又成了刘良可的“女婿”。

这样的关系的确有点复杂，可我也只是基于眼下两人的关系进一步询问：既然你们是“亲上加亲”，这次为何闹到这般田地?

王安平说，问题还是出在他和妻子身上。

王安平的妻子刘欣，时年28岁，在市里一家商场工作，与王安平结婚4年。几个月前，她向王安平提出离婚。

这些年，王安平一直在外地做厨师，每年回家的时间很短。刚结婚时，两人的关系还挺好的，他在外打工，妻子还时常打个电话、发个视频以示挂念。

但从2013年年底开始，妻子对王安平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没有了日常的问候电话，王安平发视频连线过去，要么不接，要么含含糊糊说几句便匆忙挂掉。

王安平起初以为可能是因为自己一直忙于赚钱，对妻子的关心不够。2014年春节过后，他没有像往年一样立刻赶往外地打工，想在家里多待一个月陪陪刘欣。不料，此举却引来了妻子的极大不满。王安平说，他在家的那一个多月里，刘欣先是天天催他赶紧出去上班，看他不走，便冲他发起了脾气。

几次争吵过后，王安平赌气前往北京投奔同乡。

一次喝酒时，王安平心中苦闷，便把过年时自己与妻子吵架的事情讲给了同乡。他原本只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没想到，同乡却告诉他，刘欣在老家“有情况”了，很多人都知道，只是大家都瞒着王安平而已。

同乡说，刘欣的“情况”是一家连锁美容院老板，30多岁，据说很有钱。自己之前也几次看到过刘欣与那个老板出双入对。

王安平不太相信，说妻子与美容院工作人员走得近很正常，因为她的脸上从小便有一块很大的胎记，这些年来一直在治病。那个美容院老板自己也认识，以前是一家大整形外科医院的主刀医生，在胎记治疗方面很不错。刘欣与他走得近，应该就是为了治病的事。

那位同乡便没再说什么，王安平也没再多想。

然而，2014年6月，王安平突然接到妻子电话让他回家一趟。王安平以为家中有事，急匆匆赶回去后，却被刘欣告知，要与他离婚。

王安平一时不知所措，反复询问妻子想离婚的原因，但刘欣却什么也不说。王安平无奈去找刘良可，想让他出面帮忙劝一劝，没想到刘良可的态度也很奇怪，还对王安平说："现在讲婚姻自由，长辈也不能干涉不是？"

王安平晕头转向地离开刘良可家，思来想去，觉得之前那个老乡给自己说的事情可能是真的。可美容店老板找不到，派出所的警察也不"帮忙"，这才有了被公共厕所里的小广告骗了钱这一出。

3

那天，我问王安平，离婚的原因找到没有?

王安平点点头，说刘欣后来终于承认了，自己爱上了美容店老板。美容店老板说要跟她结婚，所以刘欣得先跟王安平离婚。

“你是什么打算呢？”我问他。

王安平沉默许久，说自己之前也想开了，论各方面条件，自己确实比那个美容店老板差太多，“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离就离吧”。

我叹了口气:“那为什么还跟刘良可动手呢？”

王安平说，自己之前打工攒下的所有的钱都在刘良可那里，共有12万，原本是打算用来和刘欣在城里买房付首付的。现在房子还没买，两人却走不下去了，他就想着把钱拿回来。一来离婚以后自己也不打算再回这个家了；二来这笔钱都是自己赚的，以后的生活还要用。但刘良可却不同意，说那笔钱都用来给刘欣治病了。王安平就和刘良可争辩，说刘欣这些年的医疗费都是自己另付的，家里的钱一分都没动。

刘良可也急了，说虽然没买房没治病，但钱就是不能还给王安平——因为王安平自打3岁起就一直生活在刘家，“吃了那么多年饭，总要交点伙食费吧……”

王安平没想到刘良可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番沉默后，他决定退一步，说自己在外打工这些年，所有的钱都寄回了家，现在离婚身无分文，希望刘良可看在养父子一场的分上，给他6万，剩下的6万自己也不要了。

刘良可脸色有些缓和，说这样也可以，但是那6万块钱不在自己手上，被刘欣拿走了，让他去找刘欣要。王安平同意了，要刘良可打电话跟刘欣说明此事，但刘良可却不肯，说自己反正是同意给他6万块钱的，“但能不能（从刘欣那里）要来，就全看你的本事了”。

王安平跟刘良可吵了起来，很快两人便动了手。

看来事情的根源就是6万块钱，那处理起来倒是简单了。我问王安平是不是要回钱来这事儿就算完了？王安平点点头，说“完了”。

我让王安平给刘欣打电话，把人叫来派出所一趟，这事儿毕竟因她而起。另外，事实判定我也不能只听王安平一个人说。

但是王安平的手机打不通刘欣的电话，“对方不在服务区”。我用自己的手机打，一下就接通了，但我表明身份之后，刚说了两句对方便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先是“不方便接听”，连打几遍，竟然也成了“对方不在服务区”。

我自嘲道：“这下完犊子了，我也被拉进黑名单了。”

王安平也苦笑：“你是警察都联系不上她，我现在更是找不见她的踪影，不然也不会直接去找刘良可。”

“这事儿你也不用着急，你俩离婚，财产问题谈不拢可以走法律程序，是你的终归是你的，不是她的她也留不下。”我告诉王安平，今天先处理他和刘良可打架的事情，之后去找个律师就好，我可以帮他介绍。

王安平点点头。

去医院“验伤”的刘良可直到傍晚才回到派出所。

我问陪同前去的同事怎么这么久，同事有些生气，说刘良可闹了一下午，非要让医院给他办住院。

我要过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确实只有两处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抬头看了刘良可一眼，心里嘀咕了一句“真他娘过分”，便把他带去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我主动提出了导致两人动手打架的那笔钱，没想到刘良可竟然发起了火。他质问我：“警察也管要债吗？”

我有些生气，强忍着说：“钱的事儿我不管，但那笔钱是你俩这次发生冲突的根源，不解决了以后还得闹。”

刘良可却说，那些都是自己的“家事”，不用警察来管。今天就事论事，他养了王安平十几年，还把女儿嫁给他，现在王安平却“恩将仇报”打了他，必须要王安平坐牢。

我说这事儿得有法律依据，还得结合你的伤情。没承想，这句话又惹火了刘良可，他说今天在医院“验伤”时警察就跟医生合起伙来“糊弄”他，不让他住院，这次如果警察不把王安平抓进监狱去，他就睡在派出所。

我有点压不住脾气，一下站了起来，说：“你睡一个试试……”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同事拦住了。他怕我跟当事人吵起来，赶忙把我劝出了办公室。

4

回到了王安平所在的讯问室，辅警正在给他办理其他手续。

王安平问我，这次我们会怎么处理他，我说得看刘良可的诉求，愿意谅解的话，你俩直接走人，毕竟是一家人；同意调解的话，你赔他医药费，给他道个歉，你也确实动手打了他；不愿谅解也不同意调解的话，估计你就只能被拘留几天了。

王安平神情沮丧，坐在那里没再说话。我担心他有思想负担，还劝他说想开点：“爱情这种事情强求不来，大家好聚好散算了，没了爱情还有亲情嘛。”

没想到这一句话却戳到了王安平的痛处：“还有个屁的亲情。”

我自觉言语失当，赶紧找补，说以后日子还长，“你有手艺能赚钱，还怕找不到好姑娘嘛”。不想王安平的情绪却突然失控了，伏在讯问椅的小桌板上，哽咽着说了句“我只是想有个家”，然后竟大哭了起来。

等过了好久，王安平才平静下来。我问他，你跟刘良可一家到底是咋回事儿，能给我说说吗？我到现在还有些迷糊。王安平想了想，同意了。

1990年，王安平的生父在外出打工时失联，村里人都说他在外地傍上了“富婆”，不要王安平母子了。生母咽不下这口气，去外地寻找丈夫，暂时将王安平交给刘良可的前妻，也是王家的远房亲戚照看。

不料生母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最初几年还有书信寄到，偶尔夹带几张钞票作为王安平的“生活费”，后来渐渐音讯全无，王安平成了一个“弃儿”。

此后，王安平一直生活在刘良可家。最初几年，刘良可对他还算好，但在生母彻底失联后，刘良可对他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也怪不得刘良可，毕竟多一个人就要多一张嘴，刘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王安平又不是刘良可的亲骨肉，心里有意见是必然的。

好在那时刘良可的前妻很喜欢王安平，她在世时，王安平一直喊她“六姨”。六姨自己没有生育男孩，一直把王安平视为己出。

可惜六姨去世得早，后来刘良可续弦，继任妻子对他的三个女儿尚且看不顺眼，对于王安平这个与刘家毫无血缘关系的拖油瓶更是没个好脸，多次劝刘良可把王安平“丢掉”。刘良可虽碍于亡妻的面子并没有将王安平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待见他，平时吃的用的都捡最便宜的买，能不在王安平身上花钱就尽量不花。

如此坎坷的经历和复杂的家庭环境让王安平性格很早熟，他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处境，为了不被“丢掉”，待人接物总是小心翼翼的，很会看人脸色。在家里，对刘良可夫妇的要求也是言听计从。

王安平说，结婚前，他一直喊刘良可“姨丈”。小学时，学校老师知道他的情况，想帮他做点什么。一次家访，班主任老师鼓励王安平喊刘良可“爸”，王安平叫了，刘良可当时没说什么，但等老师走后王安平再喊，刘良可却直接说：“我不是你爸，你爸现在不知去向，等他哪天回来了，把我养你这些年的钱还给我，你爷俩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从那之后，王安平再没敢喊出“爸”这个字。

初中毕业，王安平成绩不错，本想继续读高中，但就因刘良可说了一句“幺妹治病需要钱”，他便主动放弃了读书的想法。16岁外出打工前，刘良可只对王安平说了句：“以后赚钱了，别忘了在刘家吃过这么多年的饭。”此后，王安平便将自己生活必要开支以外的钱，全都寄给了刘良可。

5

再往后，王安平与刘欣结婚一事，也是在刘良可的撺掇下完成的。

刘欣比王安平年长一岁，是刘良可最小的女儿，也是最让家里发愁的女儿。刘欣的两个姐姐相貌都不错，刘欣本身长得也挺好，只是因为脸上天生有一块巨大的暗红色胎记，便使得她的人生道路走得有些曲折。

童年时期，那块胎记给刘欣带来了无数嘲讽和中伤。小学毕业后，她便不再上学。刘良可带她去过几次医院，得知治疗费用不菲后，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王安平这些年一直长期在外，先后在宜昌、荆门、武汉、石家庄、沈阳、北京等地的饭店工作，从洗菜工一直做到能独自掌勺的厨师。2009年过年时，刘良可把王安平单独叫到了屋里，问他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有什么打算。王安平有些害羞，推说自己还年轻，想先赚钱，还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也没有女朋友。

刘良可又问他，这些年自己对他怎么样，王安平只能说好。刘良可倒是实在，“嘿嘿”笑了笑，说其实也不怎么好。王安平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也陪着嘿嘿笑。

而后，刘良可又语重心长地对王安平说，他之前对王安平之所以“有所保留”，是一直觉得王安平终究不是自己的亲儿子，有朝一日找到了亲生父母的下落，还是会离这个家而去，到时自己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希望王安平不要怪他。

听刘良可这么说，王安平忙说，自己从小在刘家长大，对亲生父母已完全没有印象，刘良可就是自己的亲爹。即便真的有天亲生父母找上门来，自己也不会跟他们相认。

刘良可欣慰地点点头，但转瞬又是一脸愁容，不住地唉声叹气，搞得王安平也不知所措起来。但又不好多问，只能陪着刘良可在屋里干坐着。过了好久，刘良可终于开了口，说自己确实遇见了一件烦心事——就是刘欣的婚事。

刘欣时年23岁，周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已纷纷结婚生子。刘欣的两个姐姐也都在20岁出头就出嫁了，大女儿的老公是市里开饭店的，家境颇丰；二女儿读过大专，老公是邻市的公务员；只有刘欣，因为脸上那片胎记，一直没有对象，甚至连说媒的都不曾上过门。

刘良可四处托人给刘欣介绍对象，但大家看到刘欣的相貌之后纷纷表示，难度确实挺大。

“那时候，一般正常人家的男孩子都不同意和她处对象，有些年纪大的，家庭情况不好；或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家倒是同意，但刘良可又不愿意，刘欣的婚事就一直拖着。”王安平说。

2008年秋天，有人找到刘良可说要给刘欣介绍一门亲事。小伙子34岁，车祸导致一条腿有残疾，一直没结婚，但读过技校，在市里开了一家手机维修铺子，前些年还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

两家孩子见了面，对方表示可以接受刘欣的情况，刘良可也觉得男方家的经济条件还行，但不太能接受对方残疾这件事。刘良可说，女儿虽然脸上有块胎记，但年纪比对方小十几岁，这样嫁过去有些亏，思来想去，便向对方提出了20万的彩礼钱。双方就为这笔彩礼钱闹崩了。

这件事终于让刘良可认识到，像前面两个女儿那样给刘欣找一个理想婆家的难度确实有点大了。

那天，刘良可兜了几个圈子，终于给王安平亮出了底牌——王安平与刘欣年纪相仿，又从小一起长大，感情不错，也不会介意刘欣的相

貌，因此，自己希望王安平与刘欣结婚。

王安平当时吃了一惊，赶忙推辞，说自己从小就把刘欣当姐姐看待，从来没有动过这方面的想法。

刘良可很失望："没想到你也嫌弃你姐。"

其实王安平心里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刘欣，只是刘良可乍一提，他一时有些难以接受。想来自己打小跟刘欣的关系确实不错，但总归有着姐弟之名，在一个屋檐下长大，在外人看来，岂不是有些荒唐?

但最终让王安平下定决心的，还是刘良可的一句话——"你毕竟姓王不姓刘，咱们之间还是隔着一层纱的。你真要和你欣姐结了婚，咱就成了正儿八经的一家人……"

王安平思来想去，决定捅破这层"纱"。至于原因，后来王安平告诉我，这么多年过去，他太想有个名正言顺的"家"了。

2009年7月，王安平与刘欣结了婚，婚后的日子过得不错，王安平依旧在外地饭店打工，妻子刘欣在家中操持家务。令王安平尤其高兴的是，结婚后他四处打听，得知刘欣脸上的胎记并非治不好，只是治疗费用颇高。考虑一番后，他决定给刘欣治病。

从那一年开始，王安平一共花了七八万，钱到位了，治疗效果也就有了保障。这几年刘欣脸上的胎记明显消退了不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了。

只是令王安平没想到的是，胎记治得差不多了，刘欣的心却跟着那个给她治病的美容店老板跑了。而自己与"养父"刘良可，也走到了拳脚相加的地步。

6

我很同情王安平的遭遇，但眼下能做的，也只是处理他跟刘良可打架一事。

我劝王安平想开一点，“大丈夫何患无妻”，没必要跟刘家人较劲。至于那笔钱，也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有赚钱的手艺，没必要太在乎。要是真放不下，可以找律师处理，自己不要冲动，如今也不是一个靠拳头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了。

王安平也点点头，说打架这事儿处理完了自己就去找律师。

等到晚上9点多，给刘良可做材料的同事终于从楼上办公室下来了。我问他情况怎么样，同事苦笑着说，刘良可简直就是个老“财迷”。说着，他把笔录材料递给我，让我自己看。

笔录其实也没太多内容，除了当天王安平和他打架的情节外，刘良可只提了几句钱的事情。他承认王安平之前确实在他那儿放了一些钱，前后大概12万，但这笔钱他都给了女儿刘欣，所以这笔钱王安平应该找刘欣要。

我笑了笑，问同事打架这事儿刘良可想怎么处理？同事说法条讲过了，刘良可说，只要王安平不要那笔钱了，打架这事儿一笔勾销；如果王安平要钱，那他就追究到底，不谅解不和解，只求拘留王安平。

我说刘良可还真是净想好事，拘留几天换6万块钱，这事儿王安平能愿意？他拿了人家钱还给人家就是了，闹这些做什么？同事说刘良可心里其实另有盘算，只是没法体现在笔录材料里而已——刘良可也知道自己理亏，但又确实不想从自己身上“割肉”。再一想，刘欣之所以跟王安平离婚，是因为那个美容店老板答应娶她，既然这样，这笔钱就应当那个美容店老板来出。一来免了自己“割肉”，二来也让新女婿证明一下自己的“诚意”。

我说那王安平这边呢？刘良可就不念这些年跟王安平之间的情义？同事摇了摇头，说刘良可想得也挺“通透”，他说王安平终究是外人，迟早有一天会走掉的，他之前管吃管住这么多年，也算待王安平不薄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安平也没必要为这事儿恨他。

说完这些话，同事拍了拍我的胳膊，说他俩这事儿就这样吧，“处理完该咱处理的事情，其他的咱也别多问了”。

最后，王安平没有同意刘良可提出的要求，坚持索要那6万块钱。我们又劝了刘良可一番，看实在说不动，也只好按照相关法律走完了程序。

离开派出所前，王安平说这事儿没完。我只能劝他先别冲动："按我之前和你说的，去找下律师吧。”

转过年的1月，律师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最近注意一下王安平的情况："他这事，有些麻烦了。我怕他想不开走极端，还是有必要给你提个醒的。”

我忙问怎么了。朋友告诉我，王安平找到他之后，讲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利益诉求。起初，律师也就当成一件普通的离婚官司来办，可调查后才发现，王安平与刘欣当年根本没有领过结婚证。

我吃了一惊，问他有没有搞错？律师说他特意查了几遍，后来王安平也承认了，说当时两人只是摆了酒席，并没有去民政局领证——因为刘良可告诉他，当年他是被刘家领养的孩子，与刘欣属于“近亲属”，因此暂时拿不了结婚证，需要之后“解除领养关系”才行。

我问律师这话有依据吗?

“有个屁的依据！”律师也愤愤不平，“法律规定的禁止结婚条目限制的是‘血亲’，王安平与刘欣本就不是，所以也不存在‘解除领养才能结婚’的问题。刘良可这样说，不知是什么目的。”

而因为两人没领过结婚证，法律上也就不是夫妻，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分割的共同财产。我退了一步，问王安平放在刘良可那里的那笔钱呢？算赠予，还是出借?

律师却说，“什么都没法算”，一来王安平早就拿不出转账记录之类的证据了，二来其中还有7万多是以现金形式交给刘良可的，现在根本没法证明。

我感觉情况不妙，又退了一步，问那笔钱能不能未来算作刘良可的遗产?“毕竟领养子女与婚生子女在财产继承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刘良可百年之后，王安平也能通过继承遗产挽回一点损失。”

律师却冷笑了一声，说王安平就别想了。“刘良可当年根本没有给他办理过《收养证》，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两人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

我登时愣在了那里。

“王安平又去美容院找过刘欣和那个老板，钱没要到，反而挨了那人一顿打。他最后一次在我这儿时说，他必须要到那笔钱，那是他最后的尊严和希望了，否则就要杀了刘良可全家！”律师在电话里对我说。

我问他，当时王安平这话听起来是气话还是要玩真的？电话那边安静了片刻：“真不像是说气话……”

“情况告诉你了，怎么处理你看着办吧。”挂电话前，律师朋友对我说。

7

我把王安平的情况通报给了上级，所领导经讨论认定此事的确存在风险，立刻安排人手进行接触。

我也想去找王安平，但却再也找不到人了。他从律师那里走后，便凭空消失了一般，电话没人接，去住处找，邻居说已经很久没见他回来了。朋友们都不知道王安平去了哪里，我发了很多条短信试图开导他，也如石沉大海一样。

我和同事去找刘良可，劝他斟酌一下，没必要把事情搞到这种程度。然而刘良可却一脸怨气，说自己抚养了王安平这么多年，留个十几万算什么？“想当初家里那么困难……”

我说现在离婚与存款这两件事凑一起了，我们也是怕王安平想不开。

刘良可却说：“我还想不开呢！养了他这么久，不该回报一下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同事还耐着性子，劝刘良可换个角度想一想：“单从钱上论，王安平把打工挣来的钱都放在你这里，是把你当亲爹看待。你女儿新找的那个美容店老板，他能做到吗？”

刘良可听了却有些不屑一顾，说“新女婿”很有钱，单是武汉的房子就有3套，还开了连锁美容院，“王安平那点钱算什么？”同事也有点生气，说：“你既然看不上就赶紧还给他算了！”刘良可却又打着哈哈说：“想要钱的话就去让那个美容店老板给。”

这边说不通，我们又去找了刘欣，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了本人。同事劝她看在与王安平往日的情分上，把钱还了算了。刘欣却说，钱都在父亲手中，他并没有给过自己，但她同意再去找“未婚夫”商量。但没多久，刘欣就告诉我们，美容院老板一听“要钱”二字，便连连摆手，

说最近生意周转不过来，没那么多现金，况且这事儿跟他自己也无关。

我问同事怎么办，同事想了半天，说没办法了，如实汇报吧。

那天汇报完，我问领导能否使用技术手段把王安平找出来，领导没有同意。因为技术手段只能用在已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上，王安平目前的情况明显不符合规定。

领导也很无奈："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即便王安平真的要对刘良可一家做些什么，在他动手之前，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

2015年3月18日中午，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刘良可的报警电话，称女儿刘欣在城南租住的一单位家属楼房屋内被人杀害。

接到出警指令的那一刻，我便在心中隐约锁定了凶手。很快，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王安平在本市的另一处住所，并从屋内找到了王安平留下的遗书。

遗书中，王安平详细讲述了自己这场失败的婚姻以及对刘良可一家的愤恨，并说杀死刘欣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刘良可。

公安局组建了案件专班，派出一组民警24小时保护刘良可夫妇，以防连环杀人案的发生。刘良可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将存有12万块钱的银行卡摆到保护他的民警面前，歇斯底里地吼着："我把钱还给他，他把女儿还给我，我们就此两清！"

民警把银行卡塞回刘良可手中，劝他节哀。

我则跟随专班另一组民警全力搜捕王安平。我们在王安平有可能藏匿的几个地点不停地翻找。一个深夜的搜查间隙，我和同事坐在警车里取暖，我点着一支烟，递给同事，问他对这事儿怎么看。同事深吸了一口烟，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唉，没啥可说的，咱的任务是抓人、破案，仅此而已！”过了好久，同事嘬了一口烟，把脸扭向车窗外。

王安平早已扔掉了手机，技术手段在他身上未能奏效。好在公安局发出了协查通告，不久就有了反馈。

最后一个见过王安平的人是邻县的一名船夫，他说3月19日下午，自己曾载着一名身高体形与王安平相似的男子渡了江，但从衣着来看，又不像是潜逃的杀人犯——因为那名男子穿着崭新的衣服，满脸幸福地对他说自己要渡江回家，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爸妈。

我和同事按照船夫说的路线也渡了江，对岸却是一望无垠的油菜花田。

2015年3月20日傍晚，王安平的尸体在江南岸的一处油菜花田中被发现，身边扔着一个剧毒农药空瓶，经法医解剖后判定，王安平系服毒自杀身亡。

被毒虫男友拖下水的女大学生

1

2013年6月的一次辖区住宿业例行检查中，我和同事在连锁酒店客房，将刚吸食完麻果的常小斌和一个女孩堵个正着。

常小斌时年29岁，此前多次因吸毒被抓，是辖区派出所的“常客”。我和同事清理现场的间隙，他蹲在地上，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由于打火机早已被同事没收，他拍了拍我的腿，让我把打火机借给他用。我瞪了他一眼，将他嘴里叼着的烟夺下来，喝令他老实蹲着，常小斌这才不情愿地把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

与常小斌一同被抓的女孩倒是面孔很生，年龄看起来不大，戴副眼镜，满脸惶恐。我问她认不认识我，她怯生生地摇了摇头。客房角落里放着一个行李箱，看颜色应该是女孩的。我以为她是从外地过来的，要过身份证，发现竟然是本地人，名叫王洁，时年20岁。

带着两人返回派出所的路上，我问王洁为何带着行李箱，她支吾了半天，才说自己刚从学校放暑假回来。我问她在哪个学校读书，才知道她还是我的校友。

在派出所的讯问室里，王洁对我说，她和常小斌是3个月前通过网络游戏认识的，得知彼此是同乡之后就见了面，很快就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

我问她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被带到派出所，她说知道，因为吸麻果。我又问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的，她想了想，说两个多月前。

“是不是跟常小斌成为男女朋友之后才开始吸的？”

王洁沉默了半晌，缓缓地点点头，说，自己第一次吸食麻果是在一家网吧后面，那天她和常小斌一起通宵打游戏，到了凌晨实在困得熬不住了，想回家。常小斌就拉住她，拿出一颗绿色药片，用矿泉水瓶做

了个简易吸壶，让她吸一口“提提神”，王洁吸了一口感觉很恶心，常小斌就说没关系，接着吸两口就好了。

吸了几口后，王洁果真感觉精神很振奋，就问常小斌这是什么东西，常小斌说是醒酒药，王洁也没多想。

从那之后，两人通宵打游戏时经常偷偷跑到网吧外面“提神”。

起初，王洁也怀疑过，上网去搜，有网友说那是麻果，但常小斌矢口否认，说麻果是“红色感冒药”一样的片剂，而自己拿来的是“绿色五角星”，完全不一样。末了还补充说，他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不会害王洁，让王洁别多想。

可这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没多久，常小斌手里的“绿色五角星”就变成了“红色感冒药”。面对王洁的一再质问，常小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害怕你就别玩了撒”。

但那个时候，王洁已经离不开麻果了——“不吸的时候，就感觉生活很灰暗，什么都不想做。每天早上醒来，唯一的期盼就是能吸上一口。”

我问王洁这些麻果从哪里来的？王洁说，最初是常小斌给她的，后来常小斌说自己钱不够，王洁就提出自己去买，但常小斌又说，这种东西只卖给熟客。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王洁把钱给常小斌，让常小斌去买。

这两个月，王洁前后一共给过常小斌9000多块钱。我问王洁知不知道常小斌找谁买的，王洁摇头说不知道。我又问她，你一个在校学生哪儿来的这么多钱？王洁低下头，说都是家里给的。

2

王洁的家境在本市属于中等偏上。父亲在省城做生意，据说规模不小，母亲是本地某企业的中层干部。

做完笔录后，我联系了王洁的父母，二人听到女儿因吸毒被抓，十分震惊，没多久就赶来了。

一进派出所，王洁父亲就大呼着问女儿在哪。我把案情简要叙述了一遍，两人都不信。王洁父亲甚至一度非常愤怒，说女儿虽然平时有些贪玩，但学习成绩很不错，高考上的是一本。一旁的辅警就说："吸毒这事儿跟学习成绩没啥关系，学习成绩代表不了道德品行。"

王洁父亲一下就急了，指着辅警骂道："你把话说清楚，哪个道德品行不端？！"

我赶紧上前把辅警拉到一旁，又转身递过王洁的笔录和尿检报告说："先不扯道德品行的事，吸毒这事儿已经查实了，你先看看吧。"

王洁父亲还想争论，被一旁的妻子拦住了，让他赶紧看材料。王洁父亲这才低下头站在值班台前看起来，王洁母亲也一个劲儿地伸过头来想看，但她个头不高，看不到丈夫手中的材料内容，只得不断催问："到底怎么了？"

半晌，王洁父亲一言不发地将材料递给妻子，伸手从裤兜里掏了根烟，摸了半天没找到火机。我正准备把自己的打火机递给他，他却猛地把烟摔在地上，吼道："她人呢？看我不打死她！"

他摔烟的动作实在过猛，以至于胳膊落下时，直接把值班台上的电脑显示器碰到了地上。

王洁父亲做了20多年生意，社会阅历丰富。办公室里，他耷拉着脑袋向我道歉，说自己刚才情绪失控了，不小心摔坏了电脑，之后会赔偿的。我说电脑是小事，掉地上捡起来就好，但孩子出了问题，可就不是捡起来这么简单了。

王洁父亲叹了口气，神情沮丧地说，自己这些年也认识一些吸毒的，“一个个活得不人不鬼，哪天死了都没人知道”。平日见到了自己都躲着走，没想到如今，女儿竟和他们沦为一类。

我劝他也看开一点，毕竟王洁年纪还小，又是大学生，可能只是一时走错了路，只要及时干预，还有挽回余地。

王洁父亲又问我当下情况应该如何干预，我想起王洁给常小斌的那些钱，就问王洁父亲每月给女儿多少生活费。王洁父亲说，家里不想让女儿在外为钱发愁，所以经济上从没限制过，“只要她开口就给”。

“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不就为了让孩子过得舒服一点，平时都忙，没空儿管她，这不就想在钱上弥补一下……”王洁母亲在一旁说。

“疼孩子归疼孩子，也不能只在钱上疼，你看你两口子给的钱她都干啥用了？”我指着笔录说。王洁父亲这才懊恼起来，说从下月开始，王洁生活费就减半。

我劝夫妻二人趁着暑假带王洁出去走走，暂时离开现在的环境，等两个月后学校开学了，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吸毒的人只要离开了原环境，无处获得毒品，戒毒就算成功了一大半了。”

夫妻二人连连点头，说等派出所处理完了，就马上带王洁出去，开学前再来麻烦我。

最后，王洁父亲似乎犹豫很久，才开口问我，那个和他女儿一同被抓的男的是干什么的。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先前忘了交代了，赶紧给他介绍了一下常小斌的情况，又特意提醒王洁父母，务必劝女儿和常小斌赶紧分手。“那家伙年纪虽不大，却是个‘老毒么子’，王洁吸毒和他脱不开关系。”

王洁父亲闻言，立马站起来要下楼找常小斌算账。我拦住他说：“人现在在派出所，教育惩罚得我们来做，看好自己的女儿才是你们该做的。”

我费了好大劲儿，王洁父亲才作罢。临了咬牙切齿地甩下一句：“放在10年前，老子让他死到江里去……”

3

王洁因吸食毒品被处治安拘留3天。得知结果后，王洁父母恳求我说，女儿属于初犯，能否不送拘留？我说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能不拘，但可以在拘留所给她协调一个单独的监室。

警车行驶在去拘留所的路上，我忍不住又劝王洁："吸麻果的人最终都逃不过一个'疯'字，你是大学生又这么年轻，人生路还长，不要误了自己。"

王洁问我："麻果很难戒吗？"

"你刚开始碰，现在想戒还不难，时间长了，恐怕就不好戒了。这次破例给你安排了个单独监室，也是看在你还有救。出来之后不要再碰了，别让爸妈失望。"

王洁眼圈红了，使劲点头说自己一定吸取教训，绝不再碰毒品。

"你以后也别再跟常小斌打交道了，回头把他的联系方式全删了，也不要再见面了。他这人已经废了，和你耍朋友就是图你家有钱能供他吸毒。"我又继续劝她，可王洁却没做任何反应。我以为她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王洁使劲咬咬嘴唇，顿了一会儿，反问我："我不能帮常小斌戒毒吗？"

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知不知道常小斌以前被我们抓过多少次？他要想戒毒早就戒了，警察都没办法的事你能有办法？别瞎想了，管好自己才是眼下最重要的，明白吗？"

王洁这才点点头说"好的"。我也看不出她是真的明白还是应付我。

回到派出所，我发现羁押常小斌的那间讯问室依旧亮着灯。推门进去，才知道常小斌还在跟同事们僵持。

入监3个多小时了，常小斌先是拒绝尿检，大吵大闹说自己尿不出来，也不喝水，折腾了1个多小时，才被民警强行拖去医院抽了血，化验结果自然是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面对化验结果，常小斌依旧百般狡辩。先说是因为王洁吸毒时自己闻到了烟气，又说自己是吃了某种治病的药物，最后实在推诿不掉，索性借口“心脏疼”趴在讯问椅的小桌板上耍起了赖。

常小斌本人确实患有较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不然以他的情况，早就被送去强制隔离戒毒了。我上前敲了敲桌板，说：“你别跟这儿装蒜，真犯了病我现在给你打120。”

常小斌不接话。我横跨一步站到他面前，他就使劲把头偏向一侧。我明白他的意思，常小斌很清楚，我身后墙上有讯问室同步录音录像系统，他努力把脸露出来，是担心我挡住摄像头之后“收拾”他。

我笑了，说你别担心，然后拖了张椅子坐在他身边。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吸食毒品的认定需要“本人交代”和“检测阳性”两个必要条件。常小斌认为只要他不交代，单凭检测报告，我们也不足以把他送进拘留所。

又僵持了一会儿，同事把我叫出去，说能不能让王洁回来做次辨认。我说常小斌有吸毒前科，现场又有吸毒工具，检测结果也是阳性，直接搞“零口供”不行吗?

同事有些犹豫，说，保险起见，最好还是找个同案犯来指认一下。

在拘留所监室再次见到王洁，我本以为她会积极配合，不承想，她却怎么都不愿意出面指认。

我以为王洁是担心之后遭到常小斌报复，便向她保证，指认一事绝不会让常小斌知道。但王洁依旧坚持不去。我有些冒火，拘留所同事劝

我还是算了，“估计小姑娘没经历过这种事，心里害怕”。我也只好作罢。

好在之后，法制科结合常小斌吸毒屡教不改的前科，给他裁定了拘留。在送常小斌去拘留所前，我看到警务平台上半个月前还有他一次“社区戒毒”记录，便问组卷同事，这次能否送他去“强制戒毒”。

同事叹了口气，说估计没戏。“按说上次被抓就该送‘强戒’，但因为他有心脏病，体检不合格，强戒所不收。”

我说，再跟强戒所交涉一下吧，这种情况放在外面就是个定时炸弹：“要么哪天把自己吸死，要么在外面为非作歹。送去‘强戒’对大家都好。”

同事却说，这种情况，他不吸毒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拘留所收监都提心吊胆。不过还好是一个局的兄弟单位，还有的商量。强戒所那边也不是不收，但让他先治好病才行。

“那这事儿可就难办了——要送‘强戒’得先治病，要治病得先戒毒，他要戒得了毒还用得着送‘强戒’？”

同事也无奈地笑了。

我又问，这种情况除了拘留还有别的办法处置吗?

同事摇了摇头：“我们能做的也就是给他（拘留）拉满15天，放出来再吸就再抓呗，还能咋办？”

4

听说自己被裁了15天拘留后，常小斌非常不满。送拘留所的路上，在后座喋喋不休，说警察故意整他，别人吸毒被抓都是三五天，凭什么拘他半个月。

开车的同事说："常小斌你闭上嘴吧，按道理你这早就该送'强戒'，拘留15天算是便宜你了！"常小斌却嘟囔了一句："有本事你送啊……"

所里但凡是和常小斌打过交道的民警，没人不恨他。

其实他的身世也很悲惨：7岁那年父亲因卖假药被抓，判了无期，至今仍在坐牢；父亲进去后，他母亲就不知去向了，从小由奶奶抚养。

他奶奶在世时就管不住他。13岁那年，常小斌因偷自行车被抓，但由于尚未成年，并没有受到惩罚；后来奶奶去世，常小斌勉强读完初中，便成了街面上的混子。

我不知道常小斌是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据他自己说是18岁那年在外地跟一个收账"大哥"学的。后来"大哥"惹出了人命案被抓，常小斌失去了靠山，只能在街上瞎混。

第一次抓常小斌时，我还有些可怜他的身世，觉得有必要帮他一下。但后来却发现，他的可恶之处在于，不但自己不戒毒，还常年引诱别人吸毒。

常小斌天生有一副好皮囊，很像台湾某位当红明星，颇受女孩子喜欢。那些年，我至少见过他三任女友，年龄、行业各异，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吸毒。同事说，常小斌追女孩只有一个标准——"有钱"，或者"肯为他花钱"——他打着"谈朋友"的名义，实际就是在找"长期毒票"。

而让女孩心甘情愿地为他提供毒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女孩也染上毒品。

4年前，一位30岁出头的服装店女老板因贩毒被抓。交代说自己原本做服装生意收入不错，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常小斌，两人“处朋友”后就被他拉入毒窟。

往后两年里，女老板因吸毒耗资过大，被家人发现后，断了她的经济来源。没多久，女老板就发展到以贩养吸的地步。被抓后，女老板清楚自己案子的分量，对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是后悔一件事，就是“没能把常小斌那个混蛋圈进来”。

那次，常小斌并没有参与贩毒，最终只因“教唆吸毒”被判了一年。出狱后，他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聪明”了——从那以后，他和后面两任“女朋友”被抓了，警方连“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的证据也难以固定了。

那些受害的女孩，有的仍在吸毒，有的至今还蹲在强戒所，有的为戒毒远走他乡，而常小斌却依然优哉游哉地混在街上，寻找着新的猎物。

“吸毒的人玩‘圈子’，离开了‘圈子’就没处搞毒品了，常小斌压根就没想过戒毒，对拘留也习以为常了。除非哪天他犯心脏病死了，不然还真不知道有啥办法能弄他。”同事说。

5

2013年8月底，王洁父母来派出所找我，说一家人刚从海南回来。之前两个月他们把女儿看得很紧，王洁也没再碰过毒品。眼看就要开学了，女儿一个人在武汉读书，他们不太放心，问我该怎么办。

王洁父亲强调说，女儿跟他说，常小斌之前去过她学校，清楚她在哪个学院、哪间寝室。他担心常小斌还会去武汉找王洁。“那些吸毒的人，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但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寻思半天，只能说这段时间先两头分工：“我看住常小斌，只要他一吸毒我就抓人，你们看住女儿，千万不能再让她跟常小斌联系。”

王洁临去学校前，我专门去了一趟她家，带去了很多有关戒毒的资料，又与王洁谈了两个多小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劝她之后千万要跟常小斌断了联系，坚决不要再碰毒品了。

王洁说这两个月她自己已经想通了，吸毒是条不归路，之后一定不再碰。

我试探着问王洁，这段时间有没有再去想过“那东西”？王洁沉默了一会儿，说开始时想过，但都忍住了，后来慢慢也就不想了。

我很欣慰，说你碰那东西的时间短，瘾小，想戒还来得及，“一定坚持住啊！”

王洁使劲儿点头。

那天，王洁一家都很开心，她父亲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要与我同饮，母亲拿出之前在香港买的奢侈品钱包要我“一定留个纪念”。

我拒绝了“纪念品”，但陪王洁父亲喝了两杯。临走时，又反复嘱咐他们千万盯好女儿，第一次戒毒最重要，戒掉就戒掉了，复吸的话无论对她身体还是心理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再想戒就难了。

王洁父母连连称是。

王洁走后，我和同事就“贴”上了常小斌，隔三岔五找他来做尿检。大多数时候他的尿检都会呈现阳性反应，半年时间，常小斌被拘留了十几次。

常小斌对此表示极度不满，每次都说，又不是他一个人吸毒，为什么我们总盯着他搞。我说你吸毒就搞你，没那么多为什么，自己干过什么自己心里清楚。常小斌又说，那他供其他吸毒人员出来，“你去抓他们，放过我行不？”

我说你供吧。

于是，常小斌一连供了十几个“道友”，我们就把人都抓回来做尿检，大部分都是阳性反应。当然，也还是没放过常小斌。

直到2014年春节前后，常小斌又一次被我们抓到。走到派出所门口，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问我怎么才肯放过他。我说放过你很简单，戒了不就行了？你才不到30岁，还有心脏病，作死也不是这么个作法。

常小斌咬着牙说好，他一定戒毒。我说光是戒毒不行，还得离开本地，不然你戒不掉。常小斌还是咬着牙说好，自己马上就走，以后再也不回来。我说你现在不能走，至少这次拘留完了，我再找你几次，尿检不能呈阳性，到时我就不搞你了。

之后，常小斌坚持了大概3个月，其间我找他做过4次尿检，都没发现吸毒嫌疑，便降低了对他的管控力度。

等到2014年4月的一天，我又找常小斌给他做尿检，结果依旧是阴性。我说，这段时间你做得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常小斌笑着说，自己想去外地待段时间。我有些警觉，问他去做什么，他说去打工赚点钱，再去武汉治病。

我想了想也同意了，心脏病手术的费用确实不是个小数字，而我们这种小地方，打工也赚不到什么钱。那天我还问常小斌要不要帮他联系一下医院，常小斌说暂时不用。

我就这样信了他。

6

听到常小斌离开本地的消息，同事有喜有忧。喜的是终于送走了这尊“瘟神”，忧的是王洁还在武汉读书，常小斌会不会去找她？

我给王洁父亲打电话，把常小斌的行踪讲了一下，又问王洁最近怎么样。王洁父亲听完，语气有些担忧，他说妻子年前在单位办了内退，现在租住在女儿学校附近陪读。王洁不住宿舍，每天回家吃饭休息，一直没什么问题。

我悬着的心这才算是放了下来，回头对同事说事情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应该不会有问题。但同事脸上依旧带着担忧，说，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没承想，同事一语成谶。

2014年4月底的一个深夜，王洁父亲忽然给我打电话。电话刚接起来，他就在另一端几乎是嘶吼着，说王洁竟然深夜偷偷在房间里吸毒！我愣了一下，让他把事情说清楚。

王洁父亲说，最近妻子向他反映，晚上起夜路过女儿房间时，总感觉门缝里隐隐传出一股香气，“特别厚重的那种”。有时早上看到女儿，也觉得她精神十分亢奋，不像刚睡醒的样子。

一次趁王洁去上课，王洁母亲进女儿房间翻查，竟在床下找到两个打火机——王洁并不吸烟，这个发现让王洁父亲非常担忧，找了个借口来出租屋住了三晚。前两晚一切都正常，直到第三天晚上，王洁母亲起夜时又闻到那股香气。王洁父亲敲门，女儿不开，他一脚把门踹开，只看到惊慌失措的女儿和一堆还没来得及藏好的吸毒工具。

“你能确定她是在吸毒吗？”

“矿泉水瓶上插了两根吸管，床上扔着半张锡纸，满屋子麻果香气，说话颠三倒四，不是吸毒是干啥？！”

我一时愣在备勤室的床上。王洁父亲问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狠了狠心说：“你赶快报警吧，她这些东西肯定有来源，让当地警察去查。”

电话那边又是一阵沉默。过了良久，王洁父亲几乎哽咽着说：“如果报警的话，女儿岂不是完了……”

那一次，王洁父母最终没有选择报警。后来王洁出事，她父亲几次在我面前捶胸顿足，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

王洁告诉他们，麻果是常小斌给的，常小斌去武汉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了王洁。

王洁父亲说，女儿其实在2014年1月就和常小斌恢复了联系。虽然王洁换了手机号码、删了Q Q，但常小斌通过游戏账号给她写了近百条留言，全都是自己如何思念、如何后悔、如何希望王洁能够与自己重修旧好一类的话。

王洁本就放不下常小斌，经他一番哀求，又把新的手机号码告诉了他。

寒假过后，常小斌就开始不时去学校找王洁，两人谈情说爱之余，自然重新吸上了麻果——至于购买毒品所用的钱，王洁说是找同学借了一些，又从学校电线杆上贴的贷款小广告上贷了一些，总共一万多块。

听了这番话，我简直五雷轰顶——2014年王洁放寒假前后，我每次找常小斌做尿检结果都是阴性的，他明明也一直在本地待着，怎么就神不知鬼不觉跑去了武汉，还跟王洁一起吸起来了呢?

我想找常小斌核实，可他却一直躲在武汉，压根儿不敢回来。后来同事说，这事唯一的解释就是，常小斌早就摸清了尿检规律。“你给他做完尿检后马上去武汉找王洁吸毒，尿液中毒品含量消失前不让你找到就是了。”

我算了一下时间，又想起那段时间自己确实有时找不到常小斌，方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此事之后，王洁父母没收了女儿所有的通信工具，又跟学校请了长假，直接把王洁送进了武汉一家自愿戒毒的医院。王洁父母不敢惊动当地警方，又耻于跟朋友谈及女儿的事情，只能继续和我联系，询问各类事情。

王洁父亲完全放下了生意，和妻子一起，全时段关注女儿的治疗状况。他苍老得很明显，以前一丝不苟的头发，现在乱糟糟地塌在头上，人也消瘦了很多。他说这段时间自己严重失眠，一闭眼就是女儿吸毒时的样子。

王洁母亲则不断自责，怪自己没有看好女儿，又让常小斌钻了空子。

我就说我也有责任，那段时间天天盯着常小斌，还是上了他的当。

7

后来，我去过那家医院一次，王洁的状态还好。全封闭式的治疗环境，虽然价格不菲，但据说治疗效果极佳。

我问王洁，你究竟看上了常小斌什么?

王洁说，常小斌有两个方面让自己割舍不下。

一是长得帅。平心而论，一米八三的身高配上那张明星脸，的确非常符合王洁的审美标准，她最初同意常小斌的追求，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副好皮囊。

二是那种“无微不至的体贴”——王洁告诉我，从小父母就一直很忙，打她记事起父亲便在武汉做生意。母亲也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后来当上企业领导，工作更摆在最前面。多年来他们一家人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她自己也没有机会和父母交流，内心其实很孤独。

长期以来，王洁父母能做的，也只是不断在经济上补偿她：中学时，她的吃穿用度便是同学中最好的，手里始终有4位数的零花钱；读大学后，除了每月不定期的生活费外，父亲还给了她一张信用卡，需要钱就直接刷卡，不用跟父亲说。

常小斌的出现恰好弥补了王洁心里的缺憾，王洁说，如果没有吸毒的事，常小斌就是自己心目中的“Mr.Right”。大多数时候，只要王洁一个电话，常小斌便会出现在她面前，即便是在武汉读书的日子里，常小斌也经常去找她。在校园里与高大帅气的常小斌走在一起，王洁常常能收获无数同学们羡慕的目光。加上常小斌的巧言令色，就连索要金钱购买麻果一事，都被说成是“不想让王洁冒险”，反而让王洁觉得，那是常小斌对自己温柔体贴。

但同事对王洁认为常小斌在“保护她”的说法却嗤之以鼻。

他说，如果王洁直接跟卖麻果的人搭上线，常小斌就会担心自己很可能被“上家”甩掉，只有王洁离不开麻果，又只能通过常小斌获得毒品，王洁才会服服帖帖和他在一起。

一次，王洁父亲喝了酒问我：“真就拿常小斌没有办法吗？”

我叹了口气，告诉他警察对付常小斌这种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不停地拘留，只要能找到人，随时抓他回来做尿检，发现阳性反应就扔进拘留所。这个办法我之前用了，但还是被他钻了空子；二是追究刑事责任或送“强戒”，但就像之前和同事说的，他有心脏病，过不了体检，监狱给他办“保外就医”，强戒所也一直要求他“先治病”。

王洁父亲拍着桌子，说放在十几年前，常小斌这样的人渣早就不知死过多少回了。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笑了笑没接，但王洁父亲却悄悄问我，当年自己混社会时在外有几个“朋友”，回去“教训”一下常小斌，我能不能装作看不见?

我吃了一惊，赶紧告诉王洁父亲，在我这里，只有“看得见”和“看不见”两个选项，不存在什么“装作看不见”，看见了我肯定要管。我劝他不要冲动，女儿已然如此，不要再把自己搭进去。

他没有说话，只是一直恨恨地用指甲划着桌面。

2014年9月，我回武汉的母校参加聚会，午饭喝了点酒，散席之后在校园闲逛。在王洁就读的学院教学楼附近，一眼就看见了常小斌。

那时王洁还在医院封闭治疗，她的通信工具也被父母没收，估计常小斌找不到王洁，自己又断了毒资，忍不住就跑到学校来守株待兔。

我在自己辖区蹲了常小斌几个月不见人影，没想到在这里撞见了他。常小斌也看到了我，愣了一下，转身就跑。

他没跑几步就被我抓住按在地上，我问他来学校做什么，他说自己来闲逛的，我说武汉这么大，怎么那么巧就“逛”到这了？他还嘴硬，说就是这么巧，学校是开放的，没规定他不能来。我又问，那你见了我跑什么？他却回答不出来。

周围很快就有学生围观，常小斌嚷嚷说“这是武汉，你没有执法权”。我说：“你他娘的还知道‘执法权’？老子今天在这儿用不着执法权，就是想收拾你！”

常小斌面露恐惧地说：“打人犯法，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我抬头看了看围观人群，有人指指点点，远处学校保安也正往这边跑。想了想，掏出手机对常小斌说：“你打电话报警吧，就说有人打你，周围就都是你的证人。”

常小斌瞬间软了下来，赶紧说：“没必要没必要，又没真打。”

“没真打也是威胁要打。”我说完，就替他打了110。

那个下午，我和常小斌被110带去了辖区派出所。经过一番解释，常小斌尿检后被拘留。我则被当地民警说了几句，送出了派出所。

去地铁站的路上，我问送我的民警：你们这儿遇到的情况多，经验也丰富，对付常小斌这种人有没有啥好办法?

那位民警苦笑了一声，说自己手底下类似这样的“老毒么子”有十来个，为了搞毒资非偷即骗，自己也天天愁得要命，“恨不得把他们统统扔到江里去喂鱼”。

8

2014年底，王洁出院。她没有继续在武汉读书，而是办理了休学手续后回到了本市。王洁父母说，他们准备送女儿出国读书，有些事惹不起但躲得起，他们不信常小斌还能追到国外去。

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我还是有些担忧，国外环境也很复杂，况且王洁档案里有吸毒前科，到时候签证不一定好办。王洁父亲则说，他们已经联系了留学中介，“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出去！”

我很自责，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叮嘱他们在女儿出国前多加注意，一有情况及时跟我联系。

王洁父亲问我，常小斌那杂碎这会儿在哪儿？我说最近几个月一直没找到他，可能躲起来了，也可能还在武汉。

2015年2月，我见了王洁一面，离上次见面又是大半年过去了。她状态看起来挺不错，正在按照中介要求整理各种出国资料。

那天在她家我刻意不提毒品的事情，只是劝她保重。出去了是好事，读完本科再读个硕士博士，最好能留在那边，以后有机会再把父母都接过去。

王洁连连点头，说自己当年高中毕业后就想出去读大学，父母还不肯。我笑着说：“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圆了自己的留学梦啊。”

临别时，王洁送我到楼下。考虑许久，我还是跟王洁多说了两句。我说国外有好人也有坏人，出去之后可千万要时刻警醒，不要重蹈覆辙。

王洁坚定地说，自己这次是真的戒掉了，如果再碰，她就去死。至于常小斌，王洁说自己已经彻底和他断了，不但手机号码、微信、QQ等

联系方式删了，连游戏账号也注销掉了。

我想王洁出国后，两人也不可能再有实质联系了，于是也说了声好，便跟她道了别。

王洁原定出国时间是2015年6月，可就在临出国前几天，她又因与常小斌在本市城南一家快捷酒店钟点房内吸食毒品被抓了。

那天两人退房后，酒店服务员打扫卫生时发现了丢在垃圾桶里的吸壶、锡纸以及被严重烫坏的床单。

酒店报了警，警察一看东西便明白了大概，通过酒店大堂监控找到了两人。经过尿检，两人尿液均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案子是兄弟单位办的，后来我看了两人的笔录材料。两人交代，王洁出国前，常小斌提出“最后再见一面”，王洁答应了，两人便在城南一家快捷酒店开了房。我问兄弟单位同事，有没有问出常小斌之前躲在哪里？此前我担心他还在骚扰王洁，这几个月一直在找他，可怎么也找不到。

同事说，问了，常小斌一直躲在邻市，他女朋友那里。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常小斌又交新女朋友了？同事说，是邻市一个30多岁的女的，也是一个吸毒人员，后来在邻市警方的配合下一并抓了。

我说常小斌有了新女朋友，还去找王洁做什么？同事说，那天常小斌被抓时身上带着两万元巨款，他说是王洁给的……

我没再继续问，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只知道王洁之前又对我撒了谎。

出事后，王洁父母也没有再联系我。我有些“庆幸”，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再跟他们说些什么。

最后一次见到王洁，是她结束拘留后来警务室办理社区戒毒手续。那天我按照程序召集了社区和居委会的一干工作人员，在了解了王洁的情况之后，所有人都叹息说：“这姑娘算是废了……”

那天，王洁父亲陪女儿一起来警务室，见了我，也没有打招呼，只是木然地陪女儿办理着各种手续。

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最后，王洁父亲提出女儿之前办理了出国留学手续，本来近期就要走了，现在出了这事儿，不知该怎么办。社区干事告诉他，王洁办了社区戒毒，要定期来社区报到，出国读书的事情必须要推迟了。两人机械地点着头，父亲面无表情，女儿也目光呆滞。

9

2015年6月22日，夏至，王洁离家出走。

临走时，她给父母留下了一张字条，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戒毒一事她自己已然绝望，让他们不要再找她了，好好安度晚年。

王洁父母立刻报了警，可人海茫茫，王洁音讯全无。

我潜意识里觉得常小斌与这事儿铁定脱不了干系，开始四处找他，可常小斌却又一次跑了。那时，他得知了王洁离家出走的消息，又从“道友”那里获悉我和同事正在掘地三尺四处找他，连特情和耳目们也在四处打听他的去向。

常小斌一开始还对“道友”说，自己只不过就是吸吸毒，大不了拘留一下，我们才不敢把他怎么样，但一个“道友”劝他，还是先“避一避”，“那个警察放话了，要把你塞回娘胎里……”

我很快就抓住了那个给常小斌传话的“道友”，让他把常小斌给我找出来。那人的确帮我找了一段时间，后来看确实找不到，自己也吓得连夜跑去了外地。

常小斌就这么失踪了，我再也没在街面上看到他，警务平台上找不到有关他的后续信息，兄弟单位的同事也没见过他。后来我每次抓到曾与他关系密切的吸毒人员，都会向他们打听常小斌的去向，但所有人都说不知道。

同事也觉得奇怪，他说像常小斌这样的吸毒人员，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自己生活的圈子，不然没有地方搞毒品，比杀了他还难受。

我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我倒不怕他真的“人间蒸发”，只是担心他又在别的什么地方祸害其他人。

同事说这个真没办法。“不过说实话，他也是真可怜，真要是出点什么事，都没个来给他报案的。”

后记

2016年初，我听到一个传言：

半年前的某个深夜，常小斌在国道上独自行走，被一辆黑色轿车拦住。车上下来3个人，将常小斌塞入车中。之后轿车便绝尘而去，不知去向，常小斌也再没有了音讯。

我顺着传言一路查到根，也没有找到。但也就是自那时起，我确实再也没见过常小斌了。

消失的孩子

前言

2013年10月，上级指令我去参与一起刑事案件的侦办工作，探组探长是张武警官。此前我俩也在同一个班，平时他管刑侦，我搞治安和社区，彼此很熟悉。

接到命令后，我便去问张武案件的情况。张武告诉我，那是一起陈年旧案，现在有了点新情况，所里刑侦人手不够，才把我调了过来。

案件发生于11年前，2002年3月15日18时许，机械厂小区居民孔强匆匆赶到南关派出所报案，称自己6岁的独生子孔爱立遭人绑架，请派出所立刻派人跟进。孔强说，当天上午9时许，孔爱立出门玩耍，直到午饭时都没有回家。孔强夫妇出门寻找未果，却在自家门口停放的奥迪轿车雨刷器下发现一封勒索信，上面用蓝黑色钢笔写着：

“你儿子在我手上，32万保平安。莫报警，否则收尸。”

孔强夫妇吓坏了。

孔强要马上报警，但妻子杨梅不同意，说勒索信上都写了，报警会害了儿子。两人争论了许久，直到傍晚时分，孔强才下决心报了警。

绑架案情事关重大，派出所立即上报到市局。市局经研究后很快排除了恶作剧的可能，指令南关派出所将案件移交至市局刑侦支队处置。支队接手后成立专班，将案件名称定为“3·15绑架案”，并马上安排人员着手侦查。

张武当年28岁，是南关派出所的民警，事发不久前因能力突出被借调至市局刑侦支队三大队。“3·15绑架案”案发后，他也作为刑侦骨干进了专班工作。

1

我们所在的城市位于中部省份的老工业基地，60年代因三线建设兴起，整个城市犹如一个巨型工厂。居民几乎都是国企职工，言行举止间也严格遵循着厂矿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

城里的外来无业人口很少，本市有家有业的职工也很少会涉嫌这类案件。张武说，他都记不清在“3·15绑架案”之前发生的绑架案是在什么年代了。

那时候的公安机关不像现在，没有D QB（“大情报”，公安局移动警务系统）平台，没有“四侦一化”（网侦、刑侦、技侦、视侦和公安信息化），甚至社会街道上的视频监控都少得可怜。发案后，民警能做的只有搜集资料和走访排查。

被绑架的孔爱立是南关派出所辖区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其父孔强32岁，原市机械厂职工，几年前辞职下海经商，案发时在省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母亲杨梅30岁，是市某单位的财务人员。

孔强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1998年机械厂改制，他本不在企业“建议买断”人员名单中，但他想趁年轻出去闯闯，便主动辞去了公职。后来孔强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省城忙生意，节假日才回家。他原打算让妻子一起辞职，一家人都去省城生活，但杨梅在机关工作，还是干部编制，多有不舍，夫妻二人只好两地分居。

张武在走访中得知，孔强夫妇平时为人和善，不曾与人结仇。双方父母以前也都是国企职工，安分守己了大半辈子，从没听说有过什么仇家。

据孔强以前的同事、朋友和邻居反映，孔强为人热情，朋友多，以前在机械厂上班时，经常邀请大家去他家做客，平时朋友间有什么事情，他也都会尽心尽力地帮忙，没听说他和谁结过梁子。当然，大家

也都说孔强比较有钱，不说别的，光是那辆奥迪就值些钱——要知道，当时机械厂领导的座驾才是一辆桑塔纳2000。

孔强也承认自己的确是赶上了好时候，加上省城亲戚帮衬，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些钱。也是为了谈生意方便，才买了这辆车，但很少开回家来，一直在省城店里放着。至于原因，孔强解释说机械厂效益一直不好，宿舍区住的大多是原来机械厂的职工，经济条件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私家车还是比较扎眼的物件，孔强不想显得太招摇。这次把车开回来，本是要接家里一个亲戚去省城治病，没想到才回来没几天，儿子就出事了。

2

经过专案组的研判分析，绑架的疑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那封勒索信的内容——勒索信字迹工整，写作之人硬笔书法很不错。从遣词造句的简练文风来看，应该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其次，勒索信所用纸张尺寸约为64开，上有红色横线，像是某些单位发放的工作记录本，不排除绑匪有正式工作的嫌疑；再次，绑匪虽然提到“32万保平安”，却没有告诉孔强夫妇如何交付这笔赎金，这说明之后绑匪很可能还会联系孔强；

最后，就是那笔“32万”的赎金——以往绑架案中很少遇到这样“具体”的赎金数额，“要么十万八万，要么三五十万，要32万是啥意思？”张武说。更为可疑的是，根据警方调查，当时孔强家中的定活期存款总额正好就是32.6万，绑匪提出的这一数额，不知是不是巧合?

此外，孔强也提供了一条线索：中午他出去寻找儿子，去了几个平时经常与孔爱立一起玩耍的孩子家。其中一个孩子说，大概在上午11点，看到孔爱立与一个“瘦瘦的叔叔”走在一起，但孩子没记住那个“叔叔”长什么样子。

基于上述疑点，警方将侦查视线大致锁定在“男性，偏瘦，有一定文化水平，可能有正式工作单位，与孔家关系较密切”的范围内。随后，一路人马开始排查可疑人员，另外一路人马紧跟着孔强夫妇，等待绑匪再度现身。

2002年3月17日，孔爱立失踪的第三天，绑匪果然再度“联系”了孔强夫妇。那天夜里，绑匪把勒索信绑在石头上，砸碎窗玻璃投进杨梅办公室内。次日，杨梅的同事发现勒索信后交给了警方，上面依旧只有一句话：

“敢报警，嫌儿子命长？速销案，置钱于兴业路垃圾站。”

警方吃了一惊，赶紧向孔强核实还有哪些人知道他报警的事情。孔强说事发之后，除了自己和妻子外，只有父母和岳父母知道情况，但这是有关儿子生命安全的大事，自己家人绝不可能在外声张。

“警察这边有纪律，涉案即涉密，没人对外说起绑架案的情况，孔强那边也说没泄露过消息——这样事情就蹊跷了，绑匪怎么知道他两口子报案了呢？”张武说。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

3

第二封勒索信上，绑匪明知孔强报警，但依旧给出了收钱地点——兴业路垃圾站。此地距离主城区较远，旁边是省道和国道的交会处，交通便利，确实是个收赎金的好地点。警方计划让孔强按照绑匪要求放置赎金，然后在垃圾站附近部署好埋伏，一旦有人“收钱”，就地实施抓捕。

张武把那时的情况称为“守株待兔”，但不料“株”种好了，“兔”却一直没有来——警方在周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孔强夫妇也凑齐了赎金放在兴业路垃圾场内，但所有人全神贯注守候了5天，并没有人前去“收款”，反倒是那包现金差点被垃圾站的工作人员当作垃圾处理掉。

事实上，绑架案中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警方也并未气馁，依旧一边继续调查孔爱立的去向，一边等待绑匪再次发声。

然而，绑匪自此之后却销声匿迹了。

到了2002年4月初，案发过去半个月了，孔强夫妇再没收到来自绑匪的信息，民警也未能锁定绑匪身份。被绑架的幼童孔爱立，更如凭空消失了一般。

“怎么会这样？”我问张武。他说当时所有人都很蒙，大家以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谁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当时都排查了哪些人？”

张武说，市里几乎所有有嫌疑的都排查了。中小学教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从事行政、文字工作的职工，甚至一批实习大学生，统统都被纳入了排查范围。

警方着重排查了那些从事过或正在从事文字、教学等工作的人群，甚至采集了他们所有人的文字笔迹用作“文检”。但最终，所有被调查的人员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有的没有作案时间，有的没有作案动机，有的笔迹不符……后来，警方只得将孔爱立的照片印了几万份，贴满大街小巷，目的只有一个：悬赏寻找那些“3·15”案发之后见过孔爱立的目击者。

到2002年4月中旬，案发已接近1个月，关于绑匪的线索依旧一无所获。警方这边倒是接待了不少前来提供线索的热心群众，有的说在公园见过“一个女人带着孔爱立玩碰碰车”，有的说在菜场见到“一个老头带着孔爱立买菜”，还有的说“××村的刘瘸子家突然多了一个男孩，像极了孔爱立”，甚至有人说，自己在北京出差时见过孔爱立……

但经过警方核实，这些线索全是假的。

孔强夫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两人终日以泪洗面，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就不该报警。

杨梅没日没夜地与孔强吵架，怪他之前不顾绑匪威胁非要选择报警，如果当初把那笔钱给了绑匪，或许儿子早就回来了，“钱没了可以再赚，儿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孔强也完全放下了省城的生意，天天蹲在公安局询问儿子的消息。专案组只能一再解释说，正在全力以赴调查，但涉及具体的侦查细节，又没法跟孔强详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由期待变得焦躁，慢慢地又变得愤怒异常。

私下里，孔强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他通过朋友从省城找来了“私家侦探”和各种“大师”“仙人”，希望通过这些途径找到儿子。但钱花了不少，最终却发现那些人大多都是来趁火打劫的。

“能找的地方全找了，能查的人也全查了，后来排查范围也不再限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文字功底’，觉得哪个可疑就查哪个。辖区那些有过犯罪前科的、吸毒的、赌博的更是全被拎出来筛了一遍，连那些在银行贷过款、做生意欠着钱的人都没放过，最后就差一家家去搜人了……”张武说。

但一切似乎都是无用功。

专案组请来省厅专家支援，省厅专家看过案情后，都说“3·15绑架案”不容乐观：一般绑匪绑架人质后，都会急于跟人质亲属联系，他们要的是钱。但这次绑匪却失联了，情况十分诡异。省厅专家说，通常情况下，绑匪不可能供养人质长达一个月，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绑匪不再联系孔强夫妇，那么孔爱立的去向可能有两种：一是已经死亡，二是被拐卖去了外地。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孔家人难以接受的。

4

“那起案子最终破了没有？”我问张武，他点点头，说破了。我又问是怎么破的，张武神情有些许骄傲，点了支烟说：“那事儿还挺有戏剧性。”

2002年5月中旬，“3·15绑架案”已发案两个月了。警方虽然调配了海量的人员、物资和设备，又有上级专家和兄弟单位的协助，但依旧迟迟未果。侦查手段用尽，再耗下去也是浪费人力和时间。儿童节前夕，公安局经过慎重考虑，准备解散专案组，所有民警返回原工作岗位，案件交回南关派出所，由派出所负责继续跟进线索。

“专案组解散那天，我们通知了孔强两口子，但没好意思明说，只是告诉他以后再问案子直接去南关派出所，不用再来局里了。孔强两口子也没说啥，可能心里面也认了。杨梅还向我们致谢，说我们辛苦了，搞得我们心里既难受又难堪。”

没想到，专案组解散仅仅5天之后，案情就峰回路转了。

“2002年6月6日，市劳动技术学校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库房里存放的一批教学设备被盗了，案值挺高。我接到上级命令，去劳动技术学校出现场……”张武回忆说。

那天，张武进入了劳动技术学校的库房，看完现场准备离开时，目光一下被库房的东墙吸引住了。东墙上有一整块墨绿色的黑板，黑板上画着一张过时的板报，是用白色油墨写成的，大致内容是“迎接新世纪”。看板报绘制的时间，应该是在1999年底。而书写板报的字体，张武实在觉得似曾相识。

那两个月，张武反反复复看着两封勒索信不知道多少遍，每一个字都印在了脑子里，“我当时第一眼就觉得黑板报上的字体与勒索信上很

像，但具体哪里像，我又说不出来，我毕竟不是专业搞文检的，也拿不定主意……”张武说。

张武给黑板报拍了张照片，叫住了之前接待他的学校保卫处处长，问他这张板报是怎么回事。保卫处处长说这库房以前是学校礼堂，两年前学校新建了多功能礼堂后，旧礼堂便成了现在的库房。这张板报因为是用油墨写的，也擦不掉，就没再管它。

张武问他是否记得这张板报是谁写的，处长说不知道，但可以去帮张武打听。

很快，保卫处处长的消息就问回来了。画黑板报的是学校一名姓刘的青年教师，两年前，他按照学校领导的要求，为一场全校范围内的演讲比赛画下了这张板报。

张武让保卫处处长把刘老师约出来聊聊。保卫处处长此前在绑架案中也配合过警方工作，明白张武的目的，便说："这个人你们查过了，文字材料也交过，后来你们说没有问题。"

张武这才想起来，之前为文检部门"取样"时的确找过劳动技术学校，采集过几位青年教师的笔迹资料，其中也包括这个刘老师，确实没查出什么来。

但张武还是觉得应该和这个刘老师见一面，因为黑板报上的字迹实在令他生疑。保卫处处长只得给教务处打了电话，教务处反馈说刘老师这会儿应该正在上课，他们会通知刘老师的，让张武先去刘老师办公室等一会儿。

张武和保卫处处长一起去了刘老师办公室，当时办公室没人。张武坐在刘老师的办公桌旁，打量着他摆在桌上的东西。看上去刘老师是教语文的，张武从书立里拿起一个软皮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字。张武

左看右看，觉得跟勒索信上的字迹实在不像——非但不像，简直是判若两人——笔记本上的字体相当潦草，乍一看就像一丛乱草。

他翻开扉页看了一眼，确实是刘老师的名字。张武又抽出几个本子，有用完的教案本、会议记录本，打开看，也都是这样的“乱草”。

张武实在想不通，转头把笔记本递给保卫处处长，“你确定写黑板报的是这个刘老师吗？”处长接过笔记本看了又看，可能也觉得不像，说自己还要再问问。

保卫处处长又打了一圈电话，还是说应该就是刘老师，但又不好确定。毕竟过去几年了，没人确切记得那时候究竟是谁画过这么一张黑板报，只是那段时间这个刘老师在团委工作，办黑板报之类的事情确实归他负责。

张武说那咱就先等他下课吧，问一句，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5

刘老师名叫刘小明，时年31岁，未婚，1994年毕业于省内某知名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年分配至本市劳动技术学校担任语文教师。

张武跟我说的时候，我心中一惊：这个刘小明是我所在派出所辖区内的“重点人口”，早年因绑架罪被判入狱，一年前服刑期满。此前我看他的档案时，还有些好奇，一名在编教师，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我也曾在季度访谈时问过他，当时，刘小明只是简单地对我说，自己当年就想搞点“快钱”，才误入歧途的。然后话锋一转，只说感谢这些年党和政府对他的教育，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一定重新做人——没想到这个案子就是他做的。

张武说，那天他心里也充满了疑问，计划了很多种询问方式。他自认为，跟老师讲话不能像平时审犯人一样直来直去，应当想一个双方面子上都能接受的方式，毕竟自己也只是怀疑那张黑板报的字体而已。

但可惜的是，那天张武没能在办公室等到刘小明。下课铃响了，刘老师没有回来，上课铃又响了，还是不见刘老师的影子。

张武问保卫处处长有没有跟刘老师说清楚，处长也很纳闷，叫来了教务处老师。教务处老师说自己刚才是亲自去班里找的刘老师，话也说清楚了，“有位警官找你，在你办公室等”。

张武让教务处老师带自己去刘小明上课的教室，发现刘小明并不在那里。问学生，学生们说刘老师课才上了半截，就让大家自习，说自己家有急事便走了。

张武心里一惊，赶紧让保卫处处长联系门卫，门卫室说大概半小时前看到刘小明神色匆匆地出了校门，门卫向他打招呼，他都没搭理。

“刘小明跑了？！”我问张武。

张武点点头，说他不跑还好，说实话，那时自己只想找他了解黑板报的情况。但他跑了，就可疑了。

张武立即向上级汇报，上级一边派人寻找刘小明，一边指令张武在学校继续调查刘小明的详细情况。

“这一查，就真发现问题了。在几份刘小明入职时填写的档案文件中，我找到了与勒索信十分相似的字迹……”张武说。

那天下午，刘小明在市客运站被警方截获。面对询问，刘小明称自己并非逃跑，而是有急事要回老家。警方随即联系了刘小明老家亲属，揭穿了他的谎言，然后出示了相关文书，带刘小明回他住处进行搜查。

在刘小明住处，民警发现了那个64开的工作记录本，纸张与两封勒索信所用纸张相同。此外，又在刘小明住处床下角落发现半截断掉的手链，经孔强夫妇辨认，手链系孔爱立失踪时所戴。

刘小明再也无可抵赖了。

6

面对刘小明，警方讯问的首要焦点就是绑架孔爱立的动机。

身为教师，刘小明每月有固定收入，且他本人也没有吸毒、赌博等恶习。张武说，刘小明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按道理也没有“以绑架获取金钱”这种极端做法的动机，他搞不清楚刘小明铤而走险的原因。

刘小明给出的理由是，在外人看来自己学历高、工作稳定，但其实一直以来自己过得都很憋屈：毕业时，同班同学有的留在了省城，有的去了政府机关，还有的分到了著名初高中学校任教，而自己却来到了这个小城市。几年过去，其他同学都混得风生水起，自己却一直没什么起色。

刘小明谈过一次恋爱，但在结婚前夕和女朋友分了手。刘小明说他很喜欢那个姑娘，但姑娘父母就是嫌他没钱。刘小明深受打击，此后便开始四处寻找“搞钱”的路子。

他说自己也想过升职或调动工作，但苦于没有“背景”和“关系”，这条路一直很难走；又想做生意赚钱，但既无经验又无门路，不但赔光了存款，还被学校发现挨了处分，差点被开除公职。

2001年，刘小明参加大学同学聚会，昔日同窗衣着光鲜，在酒桌上侃侃而谈，刘小明却在一旁自惭形秽。有人酒后开了刘小明几句玩笑，他气得当场摔杯而去。

刘小明说，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发财”。

至于为什么要绑架孔爱立，刘小明供述，自己也算是孔强一家的邻居。当年，劳动技术学校在校内给他分了一套单身公寓，但房子面积

小不说，水电条件也不好。刘小明便在机械厂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孔强家住3号楼1层，刘小明租住在4号楼3层。

平时下班后，刘小明经常在小区院里听打牌下棋的中老年人聊天，大家的话题常常会聊到孔强夫妇身上。作为机械厂小区开奥迪车的“名人”，无论孔强平常如何低调行事，在街坊邻居口中，他的财富都会被放大很多倍。

刘小明说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一个初中毕业当了几年兵回来的工人，辞职之后随便搞点生意就能发财，还开着奥迪轿车耀武扬威，而自己这个堂堂名校大学生，却只能整日骑着破自行车，这不公平。对财富的向往，令他丧失理智，最终选择了绑架勒索。

而关于刘小明绑架孔爱立的经过，刘小明则交代，自己早就计划过绑架孔爱立，从其父孔强手里搞点钱花，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2002年3月15日上午，刘小明终于在小区路上遇到独自一人的孔爱立，机会难得，便实施了绑架。

他跟着孔爱立走了一段路，想找机会骗走孔爱立，但孔爱立年纪虽小却十分警惕，并没有上当。眼看他走到3号楼旁，刘小明心一横，直接将孔爱立挟持进了一旁的4号楼里。

“刘小明说他一直把孔爱立关在自己家里。想来我们当年也是可笑，所有人满世界找孔爱立，殊不知，他就被藏在离家直线距离不到30米的地方。这可能就叫‘灯下黑’吧。”张武苦笑道。

“那他为什么没有去拿那笔赎金？”我问张武。

张武说，刘小明开始认为有钱人怕事，孔强不敢报警。但后来发现有警察进了孔强家，心中害怕，所以中途放弃了。

张武后来去过刘小明租住的地方，从厨房窗户确实能直接看到孔强家。

“那个被他绑架的孔爱立呢？”我接着问。张武咬了咬嘴唇，说，这就是警方关注的第四个问题。

张武说，那起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在于孔爱立的去向——因为，即便警察最后抓住了刘小明，却依旧没能救回孔爱立。

刘小明认罪伊始，警方便不断质问他一个问题：孔爱立现在身在何处？刘小明交代，发现孔强报警后，他就把孔爱立放了，放人地点在市里一家商场门口。

他的说法明显有问题——6岁的孩子已经记事，刘小明怎么敢放心大胆地把他放走？这样做还不如直接去派出所投案。所有办案民警都不相信，但不管警方如何质问，到底是“放走了”还是“拐卖了”“杀死了”？刘小明一直一口咬定说是“放走了”。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说把人质放了，我们都不信，但想尽办法，也找不到其他证据。”张武叹了口气说。

至此，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即便当时刘小明真把孔爱立放在了商场门口，警方也没办法去找了。那时街面上还没有视频监控，民警也去商场了解过情况，连商场工作人员都觉得莫名其妙。

绑匪抓到了，但被绑幼童孔爱立的下落竟然成了谜。

7

得知绑匪被抓的消息，孔强一家马上找到公安局，相比于绑匪是谁、为什么要绑架孔爱立这些问题，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孩子现在的情况。

孔强甚至说过，只要绑匪将儿子还给他们，他可以不再追究，但警方也只能实话实说——追究是必须要追究的，但问题是，现在刘小明一口咬定自己把孩子放了，现在人在哪里，是生是死，他也不知道。

闻此，孔家人的情绪又一次濒临崩溃。他们频繁找到公安局，要见刘小明，杨梅甚至哭晕在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接待室里。

警方只能一边继续讯问刘小明，一边着手寻找孔爱立。

“当时啥办法都想了，按拐卖人口查，以前有过前科的一个都没放过，全都掀出来查一遍。近几年发过案的兄弟单位也都联系了，东北、新疆、广西、海南警方我们都试着做过串并案，没结果；按人口走失查，四处里布告，市里发完省里发，省里发完全国发，也没回音；后来又找各地的无名尸，只要见到年龄差不多的，也不管哪儿发现的，就跟人要DNA数据拿回来比对，也没比上……”张武说。

“最后结果呢？”我问张武。

他沉默了许久才告诉我，孔爱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检察院退查3次，但警方还是没能找到证据。本着“疑罪从无”原则，刘小明杀人一事最终没有被认定。最终，经法院审判，刘小明只因绑架罪获刑11年，而孔爱立则按照失踪人口继续调查。

“刘小明入狱后，专案组曾向孔强夫妇承诺，虽然刘小明判了，但孩子一天没找到，侦查就不会结束。警方会接着查，一定给他们一个交代。”张武说。

但时间转眼过去，那个诺言却一直没能兑现。警方多次侦查均无功而返。在“3·15绑架案”发生后的第3年，孔强夫妇因感情破裂而离婚，从此两人再也没来问过孔爱立的事情。杨梅南下去了广东，孔强也在省城再婚了。

“2012年刘小明刑满释放，又恢复了自由，但孔家却分崩离析，孔爱立至今下落不明……”张武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那，时隔11年，现在为什么又提起这起案子？”

8

张武没回答，却反问我："听了这么多，这起案子你有什么看法？"

"的确有个很明显的问题，刘小明最初提出的赎金数额是32万，而孔强家的存款正好就是这么多，难道只是巧合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张武说，当年他们也反复审问过刘小明，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金额，但刘小明咬定只是他"随口要的"，并没有别的意思。

"那当年你们有没有再查一下，比如刘小明是否有同伙，而这个同伙恰好在银行工作、查过孔强家的存款？"

张武笑笑说，也查了，刘小明没有在银行工作的同伙。

"孔爱立的家人呢？他们跟刘小明有没有关系？"存款这种事情，外人不会知道得如此清楚，我想会不会是孔家某位亲属与刘小明认识，无意中透露了存款数。

张武说，当年案发时警方便找孔强夫妇问过这件事，两人都说从没跟外人说过自家的存款。后来刘小明归案，警方又问过孔强一家，夫妻俩都说从来就不认识刘小明。

我说，那看来就真是巧合了。但张武却摇摇头，说，是不是巧合，直到现在都不好说，因为后来他自己继续调查此案时，得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什么意思？案子后来你又查过？"我问。

张武点点头，说，虽然那时刘小明已被判决，但一方面，孔爱立没找到，他自己作为案件主办民警心里过意不去；另一方面，孔强后来仍

旧常常找他打听情况，一来二去两人也算熟悉了。张武自己也为人父，于情于理，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孔强把儿子找回来。

“你刚刚说的那个‘不一样’的答案，又是什么意思？”我继续问张武。

“后来我才知道，孔强的老婆杨梅，是认识刘小明的。”

刘小明被判刑后，张武始终怀疑刘小明在孔爱立的去向问题上说了谎，便打算再去梳理一下他的作案动机和社会关系。

想起刘小明此前交代过他曾在2001年的那场同学聚会上被人嘲笑后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发财”，张武便重新去核实了那场聚会。没想到，在参加聚会的人口中，张武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杨梅。

受访者告诉张武，刘小明和杨梅曾是大学同学，而且还谈过好几年的恋爱，临近毕业才分的手。刘小明所谓在聚会上“被嘲笑”，其实就是有人调侃刘小明，问他后不后悔当初跟杨梅分手。当时的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刘小明摔了杯子要走，大家还埋怨那个说醉话的同学“嘴上没把门的”。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刘小明的脾气，劝了两句，看他执意要走，就没再拦。

刘小明昔日的同窗们说，杨梅大学时是中文系最亮眼的女生，虽说成绩一般，但人长得漂亮又会来事，在学校颇受欢迎。追求她的男生很多，即便后来跟刘小明在一起，还会不时收到爱慕者的情书；而刘小明也是出类拔萃——当年，刘小明是以户籍所在县高考成绩第三名的身份进的大学，入学后就担任了学生会干部。大学四年，不仅成绩优异，学生会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两人在一起，堪称当时师大中文系的“金童玉女”。杨梅与刘小明后来分手，源于一件事。

1993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有人撞见杨梅从一位中文系老师家中匆匆走出来。那位老师是杨梅打算报考硕士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妻子当时在国外工作。消息很快传到刘小明耳中，杨梅坚称自己和那位老师是清

白的，刘小明却不信——因为此前同学间就有传闻，说杨梅与辅导她考研的老师关系十分亲近。

两人随后便分了手。第二年，杨梅并没能如愿考上研究生，毕业分配回了老家，而刘小明则被分进了省城某机关工作，随后便和大家失去了联系。两年后，有同学去省城机关办事，想顺路找找刘小明，却得知他当年根本没有留在原派遣单位，而是和别人交换，去了杨梅老家。

后来大家聊起来，有的说刘小明明珠暗投，就是为了去找杨梅；也有的说两人毕业前就已经分手，刘小明没有理由为杨梅放弃省城工作；还有人说，可能当年杨梅和那位老师的事本身就是一场误会，刘小明后悔了，又想去争取……

但两人之间究竟还发生了什么，大家都一概不知——因为杨梅毕业后很快就结了婚，而新郎并非刘小明。

9

张武说，这些消息是他综合了刘小明和杨梅当年多位同学的访谈笔记整理出来的。但最令他不解的是，“3·15绑架案”发生之后，杨梅自始至终都没跟警方透露过一丝她与刘小明之间的关系——这就非常不合常理了——按道理，至少在警察抓到刘小明时，杨梅应该把两人之间的关系说出来的。

对刘小明和杨梅的大学同学走访结束之后，张武立即去找了杨梅。杨梅给他的解释是：自己与刘小明只是大学情侣，且毕业后双方也没再有过任何联系，所以，之前两人的关系与儿子被绑架是两码事。杨梅还强调，丈夫孔强生性多疑，若是知道此事肯定会和自己吵架。儿子已经出事了，她不想再给夫妻关系留下阴影。

“这就是她隐瞒的原因？”我觉得杨梅的答案有些牵强——作为一位母亲，在儿子去向和陈年绯闻之间竟做出这种选择，动机与目的都无法让人理解。

张武却说，这起案子还有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在与杨梅聊完后，他又去监狱问过刘小明。刘小明坚持说，自己在实施绑架时并没有考虑过之前与杨梅的关系，两人做情侣已是七八年前学生时代的事情，早就过去了。绑架孔爱立，纯粹是因为孔家有钱。

“那孔强知道妻子和绑匪间的关系吗？”

张武说，这又是另外一个让他生疑之处——当他把杨梅与刘小明过去的关系告诉孔强时，对方竟没做任何反应。

“他早就知道？！”我吃了一惊。

“他真要早知道的话，不做反应是正常的，但他嘴上告诉我的却是，之前他什么都不知道。说这话时，他和杨梅还没有离婚。”张武

说，“两口子都怪兮兮的……”

后来更令张武感到蹊跷的，是孔强在与杨梅离婚后不久对张武提起的一件事。那时候，绑架案发已经3年多了。

孔强说，绑架案发第3天早上，杨梅从梦中哭醒，说自己梦到了儿子，梦中的孔爱立站在距离城区很远的白河大堤上，朝自己喊冷、喊饿、喊妈妈。杨梅哭了很久，还说要去白河大堤。孔强也陪她去了，两人在大堤上转了几圈，并未发现什么。孔强觉得妻子是思念儿子心切，还劝她想开点。

俗话说“母子连心”，杨梅做这样的梦也可以理解。我问张武：“孔强跟你提起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抓了刘小明之后，没找回孔爱立，孔强很着急，想了其他办法找儿子，还请了‘私家侦探’和各路‘大师’，被骗了很多钱。”

我说记得。张武接着说：“其实孔强雇来的‘私家侦探’也不是啥都没做，而是帮他查到了一件事……”

那段时间，私家侦探跟踪了杨梅，发现她经常独自去白河大堤上转，有时还会带些东西，点心、玩具什么的。孔强问妻子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杨梅就说，自己之前梦到儿子在白河大堤上，所以每次想儿子了，就去大堤转转，希望能再和儿子在梦中相见。

孔强听了也表示理解，还主动陪妻子去了好几次。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孔强就不太理解了：直到离婚前的3年里，每逢节假日，妻子杨梅都要带着东西去白河大堤，而且多数时候都是背着孔强去的。当然，若是孔强非要跟她一起去，她也不拒绝。等到了大堤上，杨梅就把带去的水果、点心、玩具放在地上，念叨几句就走，也不多做停留。

张武后来也让孔强带他去过那段白河大堤，转了几圈，感觉很平常，跟普通的大堤也没什么不同。

一个失魂落魄的女人，拎着各种玩具点心站在大堤上，口中念念有词——这像极了上坟。“她觉得孔爱立死了？”我问张武。

张武说，那个场景下不好排除这种可能，但又有些不合常理——通常来说，当亲人失踪且不能确定是否死亡时，一般人都会坚信亲人还活着，这样才有继续找下去的信念，很少有人会这么快就认定亲人已去世并开始祭拜的——但这也很难说。

10

以此为节点回头看整个事件，似乎都是正常的，但又隐含着些许反常，让人心里不安。

“这些事情，你们侦办案件的时候，孔强为何不提？”我对此深表疑惑。

“孔强说，之所以办案时没告诉警方，是因为事情起因不过是杨梅的一个梦，紧要关头，谁会拿一个梦当真呢？况且他自己那段时间也经常梦到儿子。”

而后来他把这些讲给张武，是因为他与杨梅已经离了婚，心里多少怀着怨气——孔强跟张武说，“回头想想，自己与杨梅的结合其实很意外”，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从相识到结婚，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

1994年10月，24岁的孔强认识了22岁的杨梅，一开始孔强觉得两个人“没戏”——杨梅很漂亮，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机关单位财务部门工作，而自己只有初中学历，沾了退伍兵政策的光才进了机械厂上班。不论别的，单是两人间的学历差别，就让孔强觉得高攀不上。但介绍他们认识的朋友却说，杨梅对男方条件没什么要求。

见面之后，杨梅就对孔强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好感”：她说自己就是喜欢当过兵的男人，觉得“特别有安全感、有男人味”；而且孔强一家都是企业职工，有正式单位，身家清白，今后日子过得肯定放心；至于学历，杨梅说虽然自己读过大学，但对另一半的学历也没什么要求，“只要男方毛病少、要求少、能安稳过日子就行”。

杨梅的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孔强觉得自己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两个人看了几场电影、吃了几顿饭，便开始谈婚论嫁。两家父母本来都

想让孩子“再处处看”，但杨梅却怀孕了……

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件见不得人的大事，恰好当时又赶上机械厂分房子，只有结了婚的职工才有资格拿“分房指标”。情急之下，双方父母也都没再阻止，两人于当年年底就结了婚。

1995年底，孔爱立出生。孔家“三代同堂”，全家人都很高兴，但只有一个人例外——孔强。

不但不高兴，孔强反而时常觉得恼火，用他的话来说，结婚后不久，杨梅就仿佛换了一个人。她变得十分沉默，在家里甚至从来不主动和孔强说话。起初孔强还会主动找些话头，但杨梅不作声，后来孔强也跟着一起沉默，晚上两个人下班回家，经常悄无声息地过一晚上。

沉默的同时还有冷漠。结婚后，家里的大小事情杨梅都漠不关心。孔强说有一次自己工伤小腿骨折，住院期间杨梅只来过两次，出院后杨梅也从没问过他腿伤的事情，这让他很寒心。

为此，孔强向妻子发过很多次火，话说轻了杨梅不作声，话说急了杨梅也不和孔强吵架，只说自己平时上班带孩子很累，没有精力管其他。

“孔强说，他从没见过两口子有这样过日子的。在孔强面前，杨梅整天一副心怀怨气的样子，孔强问原因，她也不说，甚至有时候孔强憋不住了想和她吵架，她都懒得搭理。”张武说。

当然，这种情况只有在孔强与杨梅单独相处的时候才会出现，但凡家里有客人，哪怕是双方的父母在场，杨梅都会换一种面目示人。在外人面前，杨梅对孔强嘘寒问暖、百依百顺，还会不时向他撒个娇，但外人一走，杨梅马上就变回一张冷漠的脸。

“孔强说，这也是导致他‘人缘好’的原因之一。他约人来家做客，为的就是不想看妻子那张冷脸，不承想，大家还以为他是热情好客。”

与对孔强的态度相反，杨梅的全部生活重心都放在儿子身上，孔爱立从小吃的用的都是市面上最好的。哪怕再贵，只要觉得儿子可能用得上的，杨梅都要不计代价地买回来。

母亲疼孩子很正常，但令孔强不满的是，杨梅似乎不太喜欢让他与儿子亲近。平时孔强多跟儿子待一会儿，杨梅便会找各种事情支开他，孔强想带儿子出去玩，杨梅也必须跟着，不然就不让去。

有一次，孔强带孔爱立去商场买了一个玩具，几天后玩具就不见了，孔强以为儿子玩丢了，也没当回事。但不久后，他又想带儿子去买玩具，孔爱立却不去了，孔强问原因，孔爱立就说，上次和爸爸一起买玩具后，妈妈回家打了他，说以后不准跟爸爸要东西。

孔强仔细一想，之前自己父母也给孔爱立买了很多衣服和玩具，也统统被杨梅以各种理由收了起来。这让孔强十分生气，和杨梅大吵了一架，还威胁杨梅说，再做这种事就和她离婚，但杨梅似乎并不在乎，也不多解释，只是告诉孔强，过不下去了离婚也无所谓，但儿子必须归她。

那场风波几乎让孔强和杨梅二人走到离婚边缘。之后不久，孔强就辞去机械厂的工作，到省城做生意了。与妻子相处时间少了，杨梅态度反而变好了，对孔强不仅不再像以前那么冷漠，反而会不时担心他。

“担心啥？担心他耐不住寂寞‘扎乔子’（搞外遇）吗？”我笑着问张武。

没想到张武也笑了，说，可不就是这事儿，杨梅跟孔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所以主动要求管账。

杨梅本身在单位也是做财务的，又是自己的妻子，孔强就把生意上的账目全部交给了杨梅。两人的相处就此回归正常，此后谁也没再提过离婚的事情，甚至连不愉快都没发生过，直到“3·15绑架案”发生。

11

我问张武，孔爱立的事情，孔强从始至终到底有没有怀疑过杨梅？张武说，孔强的态度确实有过两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是在孔强离婚后。

此前，张武在将刘小明与杨梅之间的关系隐晦地告诉孔强后，很想问问孔强对此有什么看法，但那时的孔强却总是岔开话题，并同样隐晦地告诉张武，他非常信任自己的妻子。

可离婚后，孔强却一改往日的态度，主动给张武讲了一系列当年妻子的事情。他的话听起来像是简单的抱怨，但实际暗藏玄机，似乎总有意无意指向杨梅与儿子孔爱立出事之间的关系，但又不愿明说。

第二次转变是在孔强再婚之后。

2007年，孔强在省城再婚。从那之后，不管张武怎么问，他都对之前孔爱立、杨梅的事情绝口不提，要么说记不清了，要么三言两语应付过去。后来，他干脆跟张武说，他又结了婚，有了新的家庭，以前的事情就那样吧，有孔爱立的下落跟他说一声，没有下落就不要再联系他了。“事情总有过去的一天，我不能把上一段生活的阴影带到现在的生活之中，那对我现在的家庭不公平……”孔强当年这么说。

“孔强这话虽是没错，但孔爱立毕竟是他的亲儿子，即便再婚，他也不该如此‘理智’的……”我感叹道。

张武说，当年孔强跟他说那段话时，他也这么觉得，但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张武又想去找杨梅，希望她能配合警方继续寻找孔爱立，但却一直没能再联系上人。杨梅家人说离婚一事令她深受打击，人已经去

了广州，和家人也都没了联系。而对于孔强，杨梅家人似乎意见很大，都不愿多谈。

再后来，张武辗转找到杨梅的妹夫，从侧面了解了一些情况。杨梅妹夫说，孔爱立出事后，孔杨两家闹得不可开交，外人可能不知道，但两家老人还曾在私下场合拳脚相向。张武问原因，杨梅妹夫说事发时他还没娶杨梅妹妹，不知道具体情况，但就在他结婚后不久，孔强与杨梅办完了离婚手续。孔强又以生意缺钱为由，从杨梅父母手里借走了20万。这20万中有一部分钱是他的，老丈人当时只说“拿来用用”，但后来孔强一直没还钱，老丈人也就没把钱还给他。他曾主动提出要去找孔强要钱，但老丈人不许。

“婚都离了，关系已经闹得这么僵，孔强还能从杨家借出这么多钱来，怕是背后有问题吧？”我说。

张武点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拿出一沓资料递给我：“你先看看这个吧。”

12

资料内容不多，我很快就看完了。

不久前，白河大堤整修，在现场挖出一些骨头。因为附近有村民的家族墓葬区，施工队与当地村民发生了冲突，惊动了辖区派出所和村委会。有村民说施工队挖了自家祖坟，要求赔偿损失，但施工队坚持说项目早就提前做过勘察，施工地点虽然距离墓葬区很近，但确实没有越界，村民是敲诈勒索。

为了确定施工队到底是不是错挖了村民的祖坟，辖区派出所请来了法医。法医看了骨头之后，说确实是人骨。当地村民就此对施工队提出赔偿要求。施工队怕耽误工期，答应花钱息事宁人，但不料有四户人家同时提出赔偿要求——如果四家都赔，数额是施工队不能接受的，因此要求法医对骸骨进行司法鉴定。

但鉴定结果却出乎人的意料——经鉴定，这些骨头属于同一个人，死亡时年龄五六岁，时间是在十多年前，但与提出申请的那四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施工队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邻市警方觉得这些骸骨很可疑——现场既无墓碑，连棺椁都不曾发现，本地根本没有这样下葬的风俗。于是，他们在网上发出了骸骨协查及认领通告，并采集骸骨DNA上传数据库。

很快，DNA数据比中了一个人——刘小明。

刘小明入狱服刑期间采集过DNA，库里有现成数据，邻市警方马上通知了南关派出所。张武得到消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据他所知，刘小明一直没结婚，更不可能有一个五六岁时死去的孩子。

张武一下联想到孔爱立，他赶忙把孔强2010年为寻找孩子留在“打拐DNA数据库”中的数据交给邻市警方比对，但比对并未成功。

“杨梅那边呢？”我问张武，印象中当年打拐DNA数据库需要采集失踪儿童父母双方的DNA数据，有孔强的，也就应当有杨梅的。

然而张武说，库里没有杨梅的数据，当年通知过她，但她一直没来。

没想到，时隔11年，事情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你得想个办法，把刘小明叫回来。”张武说。

我当即打电话约“重点人口”刘小明到派出所做季度谈话，但刘小明说他现在人在广州。我把情况告诉张武，张武说这次务必得让他回来，“但电话里不要提DNA这事，你俩之间有业务关系，你联系他不会让他起疑。想想办法，至少弄清楚他现在的真实位置……另外，广州大了，具体哪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还有，你确定他跟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说，这个他没必要骗我吧？张武却说，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很可能跟杨梅在一起，因为此前据杨梅亲属说，杨梅也一直在广州。

2013年10月26日，刘小明被我“骗”回本市，他在派出所做完第四季度“重点人口”谈话笔录后，就被张武等人留在了办公室。张武拿出那份DNA资料放到刘小明面前的办公桌上，让他解释。

刘小明没法解释。那天，他直截了当地向警方承认，这个孩子就是当年被他绑架的孔爱立。当年他对警方说了谎，没有把孩子放走，而是掐死后埋在了白河大堤上。

这又一次让警方始料未及。

事实上，刘小明返回本市前，警方已重启了“3·15绑架案”的侦查工作。张武将自己近十年来所有的调查结果与疑点在案情分析会上和盘托出，认为骸骨很可能是当年失踪的孔爱立，并指出孔强与杨梅二人在当年就案件真相对警方有所隐瞒。

参会大多数民警都同意张武的看法，但也提出，如今案件已经过去11年了，很多关键人证、物证已灭失，查清真相的难度可想而知。刘小明杀害孔爱立的这个推测，若刘小明死不认账，警方眼下几乎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指控他。

这同样是张武所担忧的。

会上，警方制定了多种讯问策略，以应对刘小明到案后的不同情况，但谁也没想到，刘小明竟然在看到孔爱立骸骨检验结果后直接供认了——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3

刘小明随后就供认，当年自己并没有放走孔爱立，之所以第二次投递勒索信后再也没有联系孔强夫妻，是因为那时孔爱立已被自己失手杀死。

他说，那天孔爱立吃饭时试图逃跑，他既愤怒又恐惧，打了孔爱立。孩子大声哭叫，刘小明担心声音引来邻居，又上前狠狠扇了孩子一个耳光，不料用力过大，孩子倒地后当场死亡。

发现孔爱立死后，刘小明吓坏了，他将孔爱立的尸体放入一个装被褥的口袋里，连夜骑自行车运去了白河大堤，找了一个地方就把尸首埋了。

11年前，刘小明自恃警方没有找到孔爱立的尸体，拒不交代杀害孔爱立的犯罪情节。现在孔爱立尸体被找到，刘小明感觉再也瞒不过去了，所以直接认了罪。

面对这份笔录，张武没有表态，只是反复问刘小明一个问题：孔爱立怎么会是他的儿子？他和杨梅到底是什么关系？

刘小明说，自己与杨梅大学时谈过恋爱，毕业前因“性格不合”分手。本以为两人就此无缘，但没想到毕业分配工作时阴差阳错来到了杨梅老家。刘小明的确想与杨梅再续前缘，但杨梅却执意要嫁给孔强，他一怒之下强奸了杨梅，可能孩子就是那时候怀上的。后来他绑架孔爱立，一方面是眼红孔家财产，另一方面，也是想报复当初杨梅拒绝自己。

对于刘小明以上的供述，张武只用两个字评价——“胡扯”。他紧接着问刘小明，杨梅在“3·15绑架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刘小明说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的，和杨梅无关。

张武又问刘小明，杨梅现在何处？刘小明说不知道。张武拿出了刘小明手机通话记录，指着其中一个有频繁通话记录的号码问他：“这个人是谁？”

刘小明看到号码，陷入了沉默。

其实在刘小明归案的同时，另一组刑警已飞赴广州，找到了刘小明的住处。据邻居反映，与刘小明长期共同生活的，的确还有一名女子。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那名女子，果然就是孔强的前妻杨梅。将杨梅带回本市后，警方马上对她进行了DNA采集。经比对，刘小明与杨梅，正是那具儿童骸骨的遗传学父母。

刘小明对此的解释是，自己之所以在广州与杨梅同居，是因为自己一直深爱着杨梅。绑架并害死孔爱立，也是因爱生恨，而且后来杨梅已经原谅了他。

而同样的问题，杨梅的回答则是，她接近刘小明，是为了获知儿子孔爱立的真实下落。杨梅承认自己婚前曾遭刘小明强奸，但当时没有报警，之后很快就与孔强结了婚，所以她也不知道孔爱立是刘小明的孩子。

张武问刘小明，知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结果？刘小明说，知道，绑架撕票，必死无疑。张武指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牌子告诉刘小明，他还有一个赎罪机会，哪怕给自己换一个死缓。

但刘小明沉默了许久，最终依旧坚持说，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和旁人无关。

14

我和张武反复梳理着案情：

2002年，刘小明绑架了孔爱立勒索孔强，在控制孔爱立过程中失手将其杀死，之后在白河大堤埋尸；

警方通过笔迹鉴定抓住了刘小明，但没有起获孔爱立遗体，最终只能以涉嫌绑架罪将刘小明移送公诉；

张武后续发现孔爱立之母杨梅案发后行为怪诞。经核实，杨梅与刘小明系大学情侣，但案发后，两人皆隐瞒了这一情况，并在2012年刘小明刑满出狱后共同生活；

2013年，孔爱立遗骨被起获，经DNA检验，发现其亲生父母系刘小明和杨梅。

……

我说案子查到现在，如果杨梅没有嫌疑，那就是我们见鬼了。张武则一脸愁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么多年，他也一直怀疑杨梅参与了绑架案，但手里确实没有有力的证据。

“或许，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呢？”我自嘲道。

张武并不认同，他说，杨梅与刘小明是大学情侣，婚前怀上刘小明的孩子、婚后又对丈夫十分冷漠。而且，绑架案发时，她这边劝阻丈夫报警，那边刘小明提出的赎金数额又与孔家存款数额相近。更何况，儿子“失踪”后，杨梅就去埋尸的大堤上“寻梦”，而刘小明出狱后杨梅又在广州与他同居……

如此种种，如果每个情节单独发生，可能就是巧合，但全部连在一起，还会是巧合吗？张武不相信杨梅是无辜的。

随后，孔强也被警方叫回本市，张武希望在他身上找到杨梅的突破口。

彼时，孔强的生意做得不错，与第二任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孩子那年刚满6岁。听张武提起杨梅和刘小明的事情，孔强只说自己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不在乎之前那些事情了。

但不论孔强是否在乎，张武还是把当时的调查结果告诉了他。孔强沉默了一会儿，也说，其实这些年他想了想，感觉当年从结婚到孔爱立被绑架，全是杨梅和刘小明给他设下的“局”。

“最开始她（杨梅）不让我报警，说是担心绑匪撕票，但这都是那个女人算计好的，如果当时我真听她的，才正好着了道，不但孩子回不来，那个女人过不了多久也会跟我离婚。得亏我报了警，不然我得人财两失啊……”孔强说。

张武当时没有表态，继而又问起当年孔、杨两家的关系，以及他从杨家借出的20万。张武问孔强，那时他与杨梅已经离婚，为何杨梅的父亲还愿意借他这笔巨款？孔强推说，那是正常的民间借款，杨梅父亲同意借钱，是因为他承诺支付10%的月利息。张武后来去核实，杨家的说法也跟孔强一致。

张武问孔强要不要看一下孔爱立的遗骸，毕竟共同生活过6年。孔强沉默许久，说：“还是不看了吧。”

后记

那天离开公安局前，杨梅从法医中心领走了孔爱立的骸骨，哭得很伤心。

办完手续后，我和张武一路跟随她走出公安局大门。等候出租车的间隙，杨梅回头对我们说："谢谢。"我和张武都没有说话。杨梅大概也觉得场面有些尴尬，又问我们法院会怎么判刘小明。我说应该是死刑吧。说完，我就看着杨梅，她却将脸扭向了一边。

5个月后，刘小明被法院判处死刑，没有上诉。

一辈子不肯吃亏的女人

1

我接手河西社区警务室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刘婶。

刘婶的面馆就开在警务室隔壁——说是面馆，其实只能算一个简易的自建摊位——那里本是医院废弃的配电室，刘婶把炉灶安置在里面，算是“操作间”。外面是四根水泥墩子做底的铁杆支起的防雨绸，下面摆了几张桌子和几个马扎，是客人们用餐的地方。

刘婶的面馆开了有些年头了。南关派出所的治安副所长还是河西社区片警时，刘婶面馆就在这。我接手时，警务室已装修过三回，外墙上挂的民警牌子换了四茬，只有隔壁刘婶的面馆一直坚挺在那里。

刘婶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北话，接客拉人时甩着只有本地人才明白的词，以至于最初我一直以为她是本地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自己是山东人。

当年刘婶在医院后勤工作的丈夫病故，她带儿子从山东老家过来奔丧。料理完后事，医院可怜他们孤儿寡母，便出面给刘婶安置了一份工作。最初，她在医院苗圃养花，但工资微薄，后来医院便把这个废弃配电室租给她开个小餐馆，每月象征性地收一点租金。

早年，刘婶只做医护和病人的生意，后来医院推倒后墙修了路，配电室就成了临街房。早上中午卖各种面条，下午4点后卖炒菜，夏天晚上还会支起架子卖烧烤和小龙虾，刘婶的面馆全年无休。一件蓝色“大桥鸡精”的工作服，夏季单穿，秋冬就在里面套件棉服，使得本就矮胖的刘婶更显臃肿。

那时候，不在所里值班，我就去警务室待着，早上就近在刘婶的面馆过早。刘婶的手艺不错，热干面、炸酱面、财鱼面、肥肠面做得都很地道。后来逐渐相熟了，她经常和我讲自己的事。

刘婶1962年生，儿子比我小一岁，在离面馆不远的商场租了柜面卖家具。母子二人在医院南面的老家属区有套房子。刘婶说儿子小时候脑袋受过外伤，有后遗症，稍有刺激就会发狂。周围的人大多也都知道，平时很少招惹他们。我处理过几次刘婶儿子的警情，基本都是因为做买卖砍价时情绪激动发了病。因此，虽然商场的地段很好，但刘婶儿子的家具生意却异常萧条。

“我们命苦啊……”聊天时，刘婶经常把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接下来便从自己结婚那年讲起，一直讲到前几天下雨淋坏了她堆在配电室门外的东西，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有时情绪激动，还会冒出几句夹杂着山东和湖北两地方言的脏话。

“哎，老天不公啊，灾事儿都落在我头上了，不知道哪天干不动了，我们娘俩怎么办。”这句话一般被用作每次聊天的结束语。

2

刚开始，我总会尽可能地帮刘婶做些事情。一方面算是邻居，另一方面也的确可怜她的境遇。

我能做的很有限，不过是每天在她的摊位过早，向朋友推荐去她的摊上消夜，或有地痞流氓、酒麻木闹事时尽量帮她赶走。刘婶也很感激我，偶尔过早会免费给我加个茶叶蛋或肉圆子，消夜送我一瓶“勇闯天涯”，反正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推辞。

小店地段不错，味道也挺好，可刘婶的生意却总比不上附近的其他店。白天来吃饭的人寥寥无几，晚上消夜也多是周边几个摊位客满后，才陆续开始上人。

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对刘婶不太友好，警务室的社区协管员老姜表现得最为明显。每天早上，他宁愿骑电动车去两公里外的早市吃饭，也绝不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好像也有意躲避老姜似的，只要看到老姜在警务室，就从不进来。有时正跟我说着话，老姜从外面回来，刘婶也会立即告辞离开。

平时很讨厌嚼舌头的老姜多次跟我说，“这人不咋地”，让我少跟刘婶打交道。连师傅宋警官也让我别在刘婶面馆过早，但他说得很隐晦——“年轻人多活动一下，别总在门口吃完饭就回屋坐着。”也有同事说话比较直接，“那家伙是个定时炸弹，趁早赶她走。”社区居民有时来警务室找我，看到刘婶在屋里坐着，都要把我叫出去说话。

起初我不明白，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才发现刘婶的确“不太好相处”：

刘婶很喜欢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但大都不会空手回去，有时拿几包抽纸，有时拜托我打两页广告，还有时“借”盒茶叶；看到放在警务室墙角的废纸箱或包装盒，刘婶也会“顺路帮我扔掉”。有些东西是工会发的福利，有些东西是废品，我倒也没太在意；至于扫帚拖把之类的更

是借用频繁，老姜每次打扫警务室之前都会站在门口喊刘婶把扫帚拖把还回来。

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老姜总瞧爱占小便宜的刘婶不顺眼，有几次刘婶进来拿东西，老姜就问她：“用不用雇辆车把警务室搬你家去？”刘婶气呼呼地说：“不就是几包纸嘛，人家李警官都没说啥……”当然，还是把东西拿走了。

刘婶的坏脾气，在周围也是尽人皆知的。那时我在警务室里，常听到她在隔壁跟人吵架，和客人、相邻店铺，甚至社区来收卫生费的物业人员都吵过。刘婶骂人很难听，嗓门也大，一旦开骂对方基本插不上嘴。有时实在不堪入耳，我便出门制止，刘婶见有台阶下了，方才骂骂咧咧收场。

我劝过刘婶几次，别这么冲动，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刘婶就解释说南方人不实在，她是外地来的，孤儿寡母，不厉害一点会受人欺负。我不想跟她掰扯这些道理，摆手让她继续去做生意。

街面上做事，难免有各种摩擦。我理解刘婶的难处，但协管员老姜却一直对她嗤之以鼻，说她这样下去“迟早被人收拾”。

有一次又说到此，我笑着问老姜以前是不是跟刘婶发生过口角。老姜啐了一口，说何止是口角，他以前没在派出所当协管员的时候，曾被刘婶拎着菜刀追过两条街，“住平房时我们两家是邻居，她偷电，供电所查不出来就把我们整排房子的电闸拉了，我气不过举报了她，后来不知怎么被她知道了，拎着菜刀就来了我家……”老姜说。

我头一回听说刘婶还有这等过往，有些震惊，老姜就让我回去看看刘婶的涉警记录，“早跟你说过，这人不是啥省油的灯”。

3

刘婶在派出所的涉警记录确实很多，几乎月月都有，有时一个月甚至有七八起。内勤同事存档的有关刘婶“当处现调”（当场处罚、现场调解）的材料是单独装起来的，有满满一档案袋，“这还只是通过派出所走了程序的，那些没经过派出所处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我顺手抽出几张“现场调解”协议书看，大多是邻里纠纷、占道经营、食客口角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她报警举报别人，有时是别人报警举报她。我不禁感叹：“咱派出所一年1/3的简易程序案，差不多都被她包圆了啊！”

“你还不知道吧，刘婶有个绰号叫‘刘不亏’——就是从来不吃亏，三五毛钱的事情能扯着对方头发在地上打滚。吃亏是不可能的，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内勤同事解释说。

“不会吧，她还请我吃过茶叶蛋、肉圆子和‘勇闯天涯’呢，没觉得她不亏呀？”

同事笑了笑说：“那你小心点吧，她的茶叶蛋、肉圆子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当时，我并没把同事的话放在心上，自以为和刘婶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平日里，刘婶买了水果会分我一些，我单位过节发的酱油、松花蛋，也会直接送给刘婶。我一个片警，刘婶一个买卖人，哪会有什么利害冲突呢？

然而很快，我跟刘婶就闹掰了，那是2012年10月。

2012年入夏后，刘婶跟我商量，下班后能否不关警务室门口的照明灯，这样她晚上做生意方便些。我答应了。后来，她又问我警务室旁边储藏室的钥匙能否借她用用，夏天夜里街上人杂，她担心收摊后桌

椅板凳堆在外面不安全，想放进储藏室里。我想储藏室里也没什么重要物品，便答应了她。作为感谢，刘婶还给我抱来了两个西瓜。往后一切如常。

国庆节后，协管员老姜突然找我要储藏室的钥匙，说是想看一下电表。我找了半天才想起来，唯一的一把钥匙我给了刘婶，便问她要，但刘婶却总推说忘了带。接连拖延了好几天，老姜直接砸了储藏室的锁头。

和老姜一起进储藏室的还有个电工。电工检查了一番说，电表被人动了手脚，多出一根线，然后顺线拎出了一个插排。

警务室的电表一直安在储藏室，老姜每月负责交水电费。之前他跟我提过一次，说这几个月电费比之前高了几倍，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夏天开空调用电量大了而已。前几天老姜去交电费，发现又比上个月高出了一倍。

我告诉老姜，刘婶之前找我借过钥匙，老姜顿时火冒三丈，说肯定是刘婶偷了警务室的电，“她有前科”，说着就要去找刘婶算账。我拦住老姜，说我来查查是不是刘婶干的，“我们不要冤枉好人”。

当天下午，我下班后没有回派出所，而是换身衣服去了警务室对面的彩票店。傍晚7点左右，刘婶来到储藏室门口，看到坏掉的门锁愣了一下，但还是进屋拉出了插排。我来到她的消夜摊时，刘婶已经接好了电烤炉和一干电器，隔壁另一位摊主也拎着插排来找刘婶接电。

我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上前质问她：“说好了借用储藏室放桌椅，怎么还要偷电？”

刘婶先是尴尬地站在那里，但很快堆起了笑脸：“反正都是公家的电，不用白不用。”我反驳说这么大的功率，线路着火烧了警务室你负得了责？然后一把扯掉了插排上的电源线。

那晚我收走了刘婶的插排，又找电工把电表恢复原状。老姜让我“法办”刘婶，说这几个月的电费已经超过立案标准了。但我念她开店不易，还是觉得算了。只把她叫来警务室批评了一顿，然后自己补了几千块电费进去。

本以为刘婶会见好就收，但不承想，她却恨上了我。很快就有摊主告诉我，刘婶一直在外说我“吃骨头不吐渣”。她用电之前给我“上过供”，所以警务室的电可以“放心用”。因此她不但自己用，还“转让”给其他摊主用。

我又把刘婶叫到警务室，让她说明白给我“上了什么供”，是那两个西瓜还是之前的茶叶蛋、肉圆子？她说不出来，但一脸不忿，我便从兜里掏出100块钱给她，算是还她之前“送”我的东西。老姜又去超市买了两个西瓜，“李警官这事儿跟你两清了，再在外面胡说八道小心遭报应。”

从那之后，刘婶就再也不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了，平时见面也变得爱搭不理的。

4

2013年7月，市里拓宽道路，商场拆迁，刘婶拎着马扎就去商场帮儿子“维权”了。上级要求我立即前往处理。

当时，绝大多数商户均已搬离，只剩下刘婶儿子的家具柜面还“坚守”在商场里。之所以不搬，只是因为赔偿没有谈拢。刘婶说，自己并没有提前收到商场拆迁的通知，年初刚进了一批家具，现在突然搬迁，家具无处摆放。商场负责人则说，他们3个月前就通知了所有商户，不可能只瞒她一家。刘婶不认，非要商场赔偿损失。

商场早已设定了统一的赔偿策略：提供免费仓库暂存家具，外加5000块搬迁补偿，另外新商场建好后优先给她提供柜面位置。但刘婶不愿意，要求商场必须按售价“消化”她所有的进货，然后再给3万的补偿金，新商场建好后，还要免除她一年的租金。

商场负责人气坏了，直说刘婶这是“敲诈勒索”，并向我解释，年后全商场的商户知道要拆迁，都在打折卖货，只有刘婶儿子一家拼了命进货，明显是来碰瓷的，“按照售价买她的家具，起码要十几万，她是打算在我这儿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呢！”

我耐着性子找刘婶谈，让她看长远一些，新商场在市中心，生意肯定好，现在商场老板又答应优先给铺位，多好的事情。但刘婶却一口咬死“不见钱，坚决不搬”。刘婶的儿子也把菜刀别在腰上，声称自己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商场要是敢硬来，他就“见一个砍一个”。

我看形势不对，急忙向上级汇报。上级开会研究后派来了防暴警，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谈判不成就强行带离。刘婶一看到防暴警，立刻倒在地上打滚，她一边滚一边哭喊：“官商勾结坑害老百姓！”很快，母子二人就被带离了。

事后，商场负责人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决定给刘婶一家提供仓库免费存放家具半年，外加1万元的“补偿”。虽然距离刘婶当初提出的要求还差很多，但刘婶似乎十分满意。

找她签调解协议时，刘婶略有自豪地说，如果不是当初去“闹一闹”，商场哪会多给她这5000块钱?

我有些厌恶，“之前人家答应给你5000块，还优先给你提供新商场柜面，结果你一闹，新商场柜面那茬人家再不提了。你儿子那些家具咋办？以后生意还做不做了？”

刘婶却不以为意，说等新商场招商时她再去租就行，又不是不给租金，“到时还不是谁去得早租给谁?优先嘛就是一句空话，哪有真金白银来得实在？！”

听刘婶这么说，我没再搭话。

5

2013年底，我又接到了刘婶的报警电话。这一次，她声称自己被偷了300元钱。我和同事赶到案发现场，竟然是南关小区张姨的裁缝店。

刘婶一直没什么朋友，这几年，只有裁缝店的张姨有时会来找她聊天。张姨过去也在医院做后勤工作，刘婶丈夫去世时是她负责通知和接待刘婶一家的，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之前，张姨常对我说，刘婶这性格也是生活所迫——她幼年丧父，小学没读完，18岁嫁给穷得叮当响的丈夫，20岁出头丈夫招工来了湖北，老家的负担全压在刘婶一人身上；30岁出头丧夫，原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结果儿子又受了伤；如今年过半百，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她以前失去得太多了，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她的自我保护吧。”

从本心来讲，我也十分同情刘婶的遭遇。想起过去刘婶逢人便讲，几年前医院换了领导，要收回当初租给刘婶的那间配电室。刘婶仗着自己泼辣能闹，迫使医院妥协，把收回配电室这事儿暂时搁置了。“要不是我当时舍下脸来斗狠，现在八成已经在街上要饭了。”

听我说起这件事，张姨却说，别的事情她说不准，但作为医院的退休职工、刘婶的好朋友，她觉得刘婶办的这事儿其实非常划不来。

“当时医院要收回配电房是真的，新领导想彻底‘割断三产’，但别人都可以闹，刘婶不该闹……”张姨说，当时针对刘婶的问题，院里也做过一番研究。

当年刘婶的丈夫去世后，院里跟刘婶签了一个长期劳动合同。刘婶作为“职工遗孀”，虽没有编制，也算是后勤职工，等年满50周岁就可以按照职工身份退休。之前刘婶丈夫留下的养老保险，医院和刘婶个人共同补缴，医院出大头，刘婶出小头。这样一来，刘婶退休后每月都

能领一笔退休金，不比正式职工低多少。至于开面馆，市里不缺临街房，在哪儿干不是干，真要找不到门面房，医院也可以返聘她回来做些保洁之类的活，两份收入加起来不比她开面馆低。

可无论医院怎么给刘婶做工作，她死活不肯接受这份安排，尤其是听说自己还要补缴几万块钱养老保险时，当场就跟院领导撒起泼来。张姨当时也劝过刘婶，但刘婶也和她翻了脸，说张姨跟医院合起伙来给自己挖坑。之后这事儿就这么黄了，废弃的配电室依旧给刘婶继续用，每月象征性地收100块租金，但按照职工标准退休一事再也没有了下文。

“哎，刘婶这人，没啥文化，见识也短，低头只能看到裤腰带，连脚丫子都看不到……”最后，张姨说。

那天一进裁缝店，我就看到张姨面无表情地坐在缝纫机后面，刘婶则一脸愤怒，叉腰站在屋中央。刘婶说她来张姨店里改衣服，钱包里放了300块钱，改衣服时她和张姨聊天，张姨动了自己的钱包。临走时，她的钱包从缝纫台移到了柜台下面，再拿出来，里面的300块钱就不见了。

刘婶虽未明说怀疑张姨偷了钱，但向我陈述案情时，她反复强调“自始至终店里只有她跟张姨两个人”。我劝刘婶再想想，是不是记错了，或者干什么事儿花掉了，毕竟她和张姨这么多年朋友，张姨是什么人她应该了解。

但刘婶却不依不饶，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她从家出来啥也没买，也只有张姨动过她的钱包。我叹了口气，问张姨当时的情况。张姨说确实屋里就她跟刘婶两个人，她也确实动了刘婶的钱包，不过是因为刘婶进门后随手把钱包放在了缝纫台上，她担心两人聊天顾不上，有人进来顺走钱包，才拿到了柜台下面放着。至于里面的300元钱，自己从未见过，更不会去拿。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刘婶一下就怒了，气势汹汹地说，屋里就两个人，难道是自己栽赃她?“还担心被人顺走？！真是说得比唱得好听，这么多年交情，我瞎了眼了，认贼做朋友！”

“贼”字一出口，张姨立马就掉了眼泪。没再说话，低头从包里拿出3张百元纸币递给刘婶，说今天什么也别说了，她认了，这300块算是自己补偿刘婶的，让刘婶以后再也不要来找她。

刘婶二话不说，气呼呼地接过300元钱就要往钱包里塞。同事急忙制止，问刘婶确定这是自己丢的300块钱吗?刘婶分辩说，这钱不是张姨还能是谁拿了?况且张姨自己都认了。

我看情况不对，一把夺过刘婶的钱包，说既然报了警，这事儿就得警察处理，先别急着往里放钱，确定你包里再也找不出300块钱再说。刘婶见钱包已经被我夺去，只好接受我的要求。

我把钱包拿到执法仪前，当着三个人的面翻找钱包。那是一个大号女式手包，折了三折，刘婶说她的钱就放在中间那折，“3张一百元的新票”。我确实没在中间那折里找到钱，但当我拉开第三折夹层拉链时，3张百元新票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下轮到刘婶尴尬了，她盯着钱包里的300块，手里攥着张姨刚给她的300块，一时不知该如何收场。同事意味深长地看着刘婶，等她自己把事情圆回来。半晌，刘婶挤出一句“没事了”，放下张姨的300块钱匆匆离开了裁缝店。

我和同事也告辞离开。张姨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等我俩走出店门，屋里才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滚——！”

路过的行人向我和同事投来狐疑的目光，我俩赶紧冲他们摆手：“不是我，不是我。”

6

2014年中旬，新商场建好。刘婶收到消息后赶紧去问铺面招商的事情，但商场负责人告诉她，铺面已经全部租了出去，新入驻的商户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没有空位租给她。

刘婶很生气，说当初拆迁时商场答应新商场铺面优先租给她。商场当即拿出当时和刘婶签订的调解协议，上面没有任何有关“优先租赁”的字迹。负责人解释说，其他按时搬离并签了协议的商户确实都有权利享受“优先租赁”，但当时刘婶拒绝签协议，而且已经收了商场一万块钱“补偿”，也用了商场提供的免费仓库，便没有资格再享受“优先租赁”的权利。

另外，商场要求刘婶立刻把仓库里的家具搬走，因为当时协议上写的是免费使用半年，现在她已经用了一年多了，也没找她收钱。商场限刘婶15日内将仓库中的家具运走，否则将代为处置，并追缴她后半年的仓库管理费。

这次为了防止刘婶再闹幺蛾子，商场提前聘请了律师，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刘婶又想带儿子去“闹一下”，公安局也早有准备，刘婶和儿子在新商场门口“维权”的家伙什还没摆开，便被巡特警带离了。

刘婶主动来找了我，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问我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说没办法，商铺是人家的，爱租给谁租给谁，我能有啥办法？另外，我劝刘婶赶紧处理仓库里的家具，不然真被商场告上法庭划不来。

我话还没说完，刘婶脾气一下又上来了，说之前半年都没通知她，现在让她15天内搬走，不是逼她死吗？我不想和她说话，老姜就在旁边说，你不搬也行，到时候人家“代为处置”，当废品给你卖了，那钱都不一定够补缴后半年仓库管理费的。

刘婶双目圆瞪，说谁敢把她的家具当废品卖她就去杀谁全家，老姜赶紧说："你牛你牛，你这么牛还来找我们做什么？"

抖狠归抖狠，到了时间该搬还得搬。

搬仓库那天，商场负责人找了两台车和十几名搬运工，把刘婶暂存在仓库里的家具全搬到车上，运去刘婶的住处。刘婶坐在仓库门前的水泥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哭喊，她的儿子则被同事夺去菜刀押在警车里，等待处理完毕后送去医院做精神病鉴定。

家具搬迁只用了一个上午便完成了。之后的两天，刘婶的面馆都没有营业。第三天见到刘婶时，她正张罗着在家门口搭雨棚。我问她要干啥，她说一时找不到价钱合适的仓库，只能先把家具放在雨棚下面，一边保管一边打折处理。

家属区的马路本就不宽，刘婶的雨棚又占了一大半。周围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厌恶的目光。和我说话的工夫，刘婶也不断用凶狠的眼神四处巡视，仿佛在寻找一些可能存在的威胁。

刘婶的雨棚没能搭太久，当天便被周边住户匿名举报，随即被城管拆除了。为此，刘婶绕着小区叫骂了很久，几个以前跟她有梁子的住户楼下更是被"重点照顾"。好在没人搭理她，刘婶骂累了，自己回了家。

过了几天，刘婶又来警务室找我，支支吾吾地问能不能再把警务室的储藏室借给她用用，暂时存放一部分家具。我带她来到储藏室，才发现里面已经被老姜摆满了防爆盾牌、钢叉等警械，还有两张架子床。老姜在一旁解释说，储藏室已经被上级改成了夜间巡逻队的备勤室，不方便借给她。

刘婶悻悻而归。我问老姜真的假的，我怎么没收到消息。老姜说难不成还得再雇两个人进来躺着？"你钱多是吧？后街上就有仓库出租，

她又想来占你便宜。忘了你那几千块钱电费长啥样了？”老姜说。

7

刘婶最终还是花钱租了个仓库，又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剩余家具低价处理掉了。

新商场开张后，生意很好。商场“回馈老伙伴”，给当年签协议的商户很低的租金。据说当年与刘婶儿子在同一楼层卖家具的商户都发了财，甚至有人还在邻市开了分店。

刘婶又来找我念叨，每回都咬牙切齿，说自己被商场坑苦了，迟早要让商场的老板“血债血偿”。我懒得理她，只等她发泄完了自己离开。

往后，刘婶的脾气就越来越差，她心里似乎一直揣着莫大的委屈，动不动就要跟人吵架。折了继续开店的本钱后，刘婶的儿子也失了业，只好和刘婶一起经营面馆。但周围人大多领教过刘婶的厉害，也听过她儿子腰别菜刀自称“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的叫嚣，一个个避之不及。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以至于客人宁愿在别的摊位等位，也不来刘婶面馆消夜了。

其间，我拘留过刘婶两次。一次是因为泄愤，她砸了隔壁商户停在门口的面包车玻璃；另一次是因为15块钱的餐费，她用马扎敲掉了客人的半颗门牙。刘婶儿子也被同事送过两次精神病院强制就医，因为发病后肇事肇祸。

2016年初，医院附近棚户区改造，废弃的配电室被划入拆迁范围，这次刘婶是非搬不可了。我又出了好几次有关她的警情，都是医院保卫处报的警，原因是刘婶到医院闹事，说自己是职工遗孀，拆迁后失了业，要求医院给她补偿。

“我们对她真的已经仁至义尽了……”出警时，医院保卫处处长一见面便向我抱怨。他说当年医院周边没有餐馆，她的面馆算是大半个食堂。躺着赚钱的活儿都被刘婶干黄了，因为她不是缺斤少两就是偷奸

耍滑，别人还不能提意见，一提意见她就发飙骂人，说别人欺负她是外地的。后来，大家宁愿多跑几里地找餐馆，也不吃她的饭。

“2009年院里准备收回配电室，给刘婶安排得多好，给职工身份，院里帮助补缴大部分养老保险。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政策，就是为了照顾她是病故职工的遗孀，很多人眼红得要命啊！但她本人死活不愿意，守着那个半死不活的面馆，非说医院要赶她走还坑她的钱，跑到老院长家里闹，站在楼底下叫骂，骂得那叫一个难听，结果把院长老伴的心脏病都骂出来了……”

我只好跟刘婶讲政策，告诉她配电室的产权归医院，她没有所有权，即便拆迁也不能把补偿款给她。

刘婶就骂，说自己作为职工遗孀是不是应该受到照顾?

我没好气地说：“之前医院不是提出过照顾?你觉得吃亏，不答应嘛！”

尾声

2016年3月，刘婶面馆在拆迁中被推平。医院名义上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实际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给了刘婶两万块钱补偿。

刘婶离开了我的管片，去城南重新开了一家面馆。但没多久，我就在一个网吧看到刘婶，她在那里做保洁。我问她新面馆开得怎么样，刘婶一脸不开心，说新地方居民“欺生”，社区民警还总找她麻烦，面馆开了几个月就关门了。

2016年底，我离开派出所，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刘婶。2018年底，我回单位办事，跟师傅宋警官谈起刘婶，他说刘婶早就卖了房子，带着儿子回了山东老家。

“这家伙也是泼辣，临走之前，她把咱这儿她认为这些年来欺负过她和她儿子的人轮流骂了个遍，挨家挨户地去，就站在窗户底下骂，找不到人的就在街上骂，一连骂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个骂的就是你。”

我心里有点唏嘘，“怎么说呢，说她命苦，也是真苦，但说她活该吧，也真活该……当年摆在她面前的条条都是好路，但硬生生地都被她这‘不吃亏’的暴脾气带着走歪了。”

“这嘴上够狠的人，往往命里也够苦哎……”最后，师傅叹了口气。